谨以此书献给：

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复兴无私奉献的人们

毛泽东及其无数先烈的在天之灵

中国千百年来倍受欺压的亿万农民

扉頁圖說明：

2005 年夏，原中央顧問委員會副秘書長郝盛琦老人家啓程去北戴河時，送行人員將拙作《巨人的背影》（第一版）給郝老，當時郝老已經 81 歲高齡。他後來說：一本書他一般也就讀幾頁，但該書他連讀兩遍。隨後在書的扉頁上寫下了该批語。本書第二版直接用帶郝老筆評的扉頁代替原有扉頁。

郝老從北戴河返京後即招作者進京。對作者這麽年輕就寫出這樣的一本歷史反思性的書感到意外（作者寫作此書時 37 歲，該書更早的雛形即著名八章網文《爲毛澤東辯護——兼談鄧小平的歷史責任和本來面目》寫成時，不到 33 歲）。郝老給予了作者極大的鼓勵，并贊譽道：“這是社科院包括各專業的團隊才能完成的工作，讓你一個年輕人完成了”。後來郝老將該書送交胡錦濤和溫家寶，建議中央一字不改出版內部發行版。據聞，郝老是胡錦濤任總書記後拜訪的第一位退居二线的老人家。



2016 年 12 月，作者登門看望郝盛琦老人家。

巨人的背影

东生 题

——爲毛澤東辯護及當代中國問題省思

（第二版）

The Back View Of A Giant Man

——Defend Mao Zedong And Study Of China Nowadays

Version 2

董玉振博士 著

By *Dr Dong Yuzhen*



南洋出版社

Title: The Back View Of A Giant Man——Defend Mao Zedong And Study Of China Nowadays
Author: Dr. Dong Yuzhen

巨人的背影

——爲毛澤東辯護及當代中國問題省思 (第二版)

作者: 董玉振博士

責任編輯：周 妍
出版發行：新加坡南洋出版社 South Ocean Publishing House
地　　址：37A Hong Kong Street, Unt 2191, Singapore 059676 Singapore
電　　話：0065-90210286
電子信箱：south_ocean2002@163.com
QQ：455829029，微信：gudongz
合作公衆號：南洋智庫
網　　址：nanyang.ws
出版日期：2003 年 4 月第一版（平裝），2018 年 8 月第二版（精裝）
國際書號 ISBN：978-981-11-5218-4



感謝新加坡李氏基金的贊助！

建议零售价：$46

右圖：2003 年該書第一版出版後引起關注。當年正值毛澤東誕辰 110 周年，新加坡主要中文電視臺——新傳媒第八波道于 12 月 26 日在"名人不怕書"節目對作者做了專訪（可上 YouTube 搜該視頻）。新加坡廣播電臺 95.8 城市頻道兩次安排訪談節目。南洋一帶因早期中共的意識形態輸出，尤其是新馬一帶共産黨游擊隊與執政當局的嚴重對立，南洋媒體對毛澤東誕辰這類日子一向比較低調。



22 消息站／体育 联合早报 2003年12月27日星期六

今日万花筒

●讲座

"巨人的背影"—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

（27日，14时－17时，兀兰区域图书馆地下层礼堂（从兀兰MRT站走3分钟），免费）

电话：62709579，63380696

"巨人的背影——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讲座，将于本月27日（星期六）下午2时至5时在兀兰区域图书馆地下层讲堂举行，入场免费。

这项讲座的讲演者是南洋出版社社长董玉振博士，他是毛泽东研究专家。

董玉振博士将谈论的主要内容是：

1. 他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一本书？
2. 毛泽东时代的真相。
3. 邓小平在毛泽东时代的失策。
4. 从改革开放的得失回眸毛泽东时代

讲座的主持人是茶渊读书会的鲁爱民。

这项讲座是由新加坡读书会发展协会主办，友联书局联办，兀兰区域图书馆协办。

从兀兰地铁站走3分钟，就可到达讲座地点。

联络电话：62709579／63380696。

上圖：新加坡國家圖書館兀蘭分館與另兩家民間機構聯辦紀念毛澤東誕辰 110 周年演講活動，邀作者做專題講座。這是兩家本地報紙的演講公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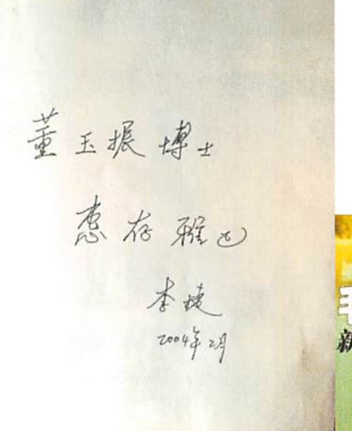
下圖：2004 年 2 月，新加坡一年一度的華族文化節，邀請作者在國家圖書館阿裕尼分館舉辦專場講座。這是當時國家圖書館製作的活動宣傳單。

Goodlife! @ the Library

秋海棠系列
从挑战新中国历史的《巨人的背影》
看历史研究的态度取向
主讲人：董玉振博士，南样出版社

《巨人的背影》通过对新中国领导人，尤其是开国元勋毛泽东的透彻分析，让读者对当代中国的进程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巨》是出版学人董玉振博士的一本力作。董博士也研究《金瓶梅》并出版了这部古典名著的简体版本。

Saturday, 28 February, 3.00 - 4.30 pm, GECL





左圖：2004 年 2 月于中央文獻研究室得到李捷副主任(現《求是》社長)接見，并承蒙贈書。



2004 年 4 月 9 日，馬來西亞《南洋商報》與友誼書齋于吉隆坡的報社總部聯辦講座，邀請作者做“爲毛澤東辯護”的演講。4 月 11 日《南洋商報》在“名人專訪”欄目全版報道了作者及其成果。2006 年《南洋商報》再次邀請董玉振于總社發表演講，并給予大篇幅報道。該報一位高層領導評價道：董博士對改善中共形象的宣傳效果超過中國政府過去 20 多年的外宣成效。



自 2003 年以來，作者應邀于馬來西亞新山、吉隆坡、怡保、檳城、古晋、詩巫、馬六甲等地演講，備受關注。馬來西亞主要中文媒體如《星洲日報》《國際時報》《聯合日報》《光華日報》《詩華日報》《中國報》等都做了大量報道。



联合晚报　　2007年5月25日　星期五　33

特辑

2007年世界书展

世界书展 WORLD BOOK FAIR

世界书展今天起一连举行10天

地点：新达新加坡国际会议与展览中心

中国民族文字展首次狮城展出

书展办多个讲座

书展期间，有多个讲座将会举行，以下是其中的一部分。

·毛尖“中国人的情爱政治”
5月26日（星期六）下午2时

·刘墉“超越自己的新人生观”
5月27日（星期日）下午3时

·董玉振博士“如何分析直销公司”
时间：5月29日（星期二）傍晚7时至晚上9时

·董玉振博士“毛泽东——在中华民族复兴中的地位”
时间：5月31日（星期四）下午2时至4时

·超脑高级教师“左右脑开发”
时间：5月31日（星期四）傍晚7时至晚上9时

2007 年新加坡舉辦的世界書展上，作者應邀作“毛澤東在中華民族復興中的地位”演講。作者因在直銷學領域的成就，還做了“如何分析直銷公司”的演講，成爲新加坡直銷史上唯一被公共機構邀請做直銷知識分享的學者。

Delete　Reply　Reply All　Forward　Actions　Apply

thanks for your good job　　Tuesday, May 9, 20

From: "@lci.kent.edu" <@lci.kent.edu>

To: gudongz@yahoo.com

Hi, Gudongz:
Just finished reading your published paper: Defend for Mao Zhe-D
couldn't stop crying. I'm thirty now, and read lots of paper everyd
but this's the first time, I couldn't help crying for just one paper.

Search results　Archive　More

I support your artice - defend Mao ZeDong (2)

Web China <webchina@hotmail.com>　09/11/99 at

To gudongz@yahoo.com

Search results　Archive　More

[No Subject] (5)

09/11/99 at 10:58 AM

深有同感. 我想将文章在当地华文报

Search results　Archive　Move　Delete　Spam　More　Collapse All

[No Subject] (5)

@moe.edu.cn>　09/22/99 at 4:45 PM

To gudongz@yahoo.com

同志你好:
不知道怎么称呼,我感到你说出了我的心声,我已经被压抑了十几年了,早已想把这些话说出
到了你的<为毛泽东辩护>,太高兴了,禁不住马上给你发E-mail,上午我还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

看了您的为毛泽东辩护的文章，我好几次热泪盈眶。　Thursday, September 23, 1999 12:50

From: "lo" <@mail zj cn>

To: "gudongz@yahoo.com" <gudongz@yahoo.com>

Full Headers

看了您的为毛泽东辩护的文章，我好几次热泪盈眶。

请不要误会，我今年30岁。

Archive　Move　Delete　Spam　More

[No Subject]

@sanlian.com.cn>　11/01/99 at 11

To gudongz@yahoo.com

读了先生对毛泽东的评价,感想只有一句,这才是实事求是,这才是辩证唯物主义.

读者:建

Email: @sanlian.com.cn

該書原始雛形是 1998 年作者寫成的著名八章網文《爲毛澤東辯護——兼談鄧小平的歷史責任和本來面目》。該文首先郵寄中央高層，并以打印件在朋友中傳閱。1999 年 9 月 9 日，作者將該文在海外網上刊出，瞬間引爆網絡，作者在該文上留下的郵箱也在幾天內收到上千電郵，對作者表示感謝，不少讀者表示“含泪讀完此文”。之後兩年不斷有讀者來信鼓勵，對作者于 2002 年着手完成此書第一版是重要鼓勵。



自 1999 年開始，作者爲創辦晶圓處理工廠而多次回國籌集資金。2001 年受邀參加由團中央和歐美同學會主辦的歸國創業研討活動，很榮幸得到李嵐清副總理接見。上圖第五排右五爲作者。



来自中国山东的董玉振是理工科出身，却对社科、文学等多方面有广泛兴趣，甚至为古老的珠算古籍做注释。

他曾为理想耗光积蓄，但在妻子的支持下，一直坚守着对事业与理想的追求。

理工科博士的人文坚持

张金宇（特约）/报道
受访者提供照片

他，是机械工程师、电子工程师、康复工程学博士、智能材料博士后。

他，是城市规划师、战略咨询和产业研究、旅游及物流策划专家。

他，专注财政及毛泽东研究，是《金瓶梅》学者、企业管理学者、珠算传承人和出版人。

这个跨界跨行的杂家，就是来自中国山东，定居狮城20载的南洋出版社社长，曾任裕廊镇管理局公司副总裁的董玉振博士。

董玉振清华大学博士毕业后，于1996年来到新加坡，进入南洋理工大学做博士后研究。

董玉振以南洋出版社社长的身份接受了笔者的采访，采访的话题主要围绕他的著作及所出版的书展开。

为出书成立出版社

虽然是理工科背景，董玉振在社科、文学等方面也有广博学识，常在报刊及网络发表时政文章，他的多篇文字被转载，粉丝众多，"新加坡学者董玉振"这个冠以"新加坡"的名字成了新媒体时代的"网红"。

时光追溯到1998年，董玉振用一星期时间完成了著名的网络文章《为毛泽东辩护——兼谈邓小平的历史责任和本末重任》，其对毛泽东时代经济、社会和基础建设成就的特殊分析方法，后来被学术界和政界人士广泛引用。

2002年，他将该文扩充成《巨人的背影》一书，并辞去半导体行业工作，成立了南洋出版社出版此书。董玉振因该书而获得毛泽东研究专家的称谓，同时该书引起中共高层关注。

该书出版后，新马两地的媒体对董玉振做了报道。

工学博士的研究方法，往往让董玉振能在人文科学研究中独辟蹊径。

在对毛泽东的研究中，毛泽东对《金瓶梅》的评价"《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这句话引起了董玉振对该书的好奇。2002年他着手研读《金瓶梅》三大版本，敏锐的学术直觉告诉他，古代学术界具代表性的观点，即"词话本是祖本"的论点可能有问题，崇祯本更可能是依祖本刻印，便尝试寻找"崇祯本"是祖本的证据。

在资料缺乏的新加坡研究古典文学自然不易，工学博士的研究方法让他独辟蹊径，历时半个月，在崇祯本的评点中找到一明确证据。之后，他主编一套双版本《金瓶梅》，以消除读者的版本困惑。

2016年在暨南大学召开的第12届《金瓶梅》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董玉振发表的关于版本研究的论文，受到与会学者的关注，被编在论文集的第一篇。

注释珠算古籍

珠算已被列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然而，当代珠算教学广泛采用新式珠算，一些古老的珠算口诀正在被遗忘。

董玉振1965年生于山东曹县孙老家公社董庄，其家族几百年传承下来一本誊抄了常用珠算口诀和应用算学的书。他9岁时曾在父亲指导下用该书习演珠算。由于该书污损严重，书中一些古老打法已少有人懂，只有加注解才能更好地传于后世。经过董玉振两年的努力，以高档宣纸印制的珠算及古代算学书籍《曹县董家祖传·经典珠算术集萃》终于在2016年面市。

妻子的理解与支持

有这样一句行业咒语叫"要破产搞出版"，的确，董玉振辞职办出版社几年后，就几乎耗尽了他的大部分积蓄。虽说是一段艰难时光，但董玉振回忆起来却面带笑容，浑身洋溢着幸福。笔者不解地询问原因，他说，是因为她。

这个她名叫周娇，比董玉振小17岁，获得英国威尔士大学的MBA后留在本地工作，后来考取了英国注册会计师。董玉振财务上的尴尬、两人年龄上的差距都没有让周娇止步，尽管朋友质疑、亲人反对，但她还是毅然决然选择嫁给了董玉振。

周娇对董玉振在文化理想上的追求给予了充分理解和支持。在出版《曹县董家祖传·经典珠算术集萃》一书时，董玉振投入了大笔资金，而且市场预期并不乐观，即便如此，周娇也毫无抱怨。

婚后两人育有一对儿女。长子静仁念小四，在校表现优异，被选拔进入学长团和武术校队。女儿乖巧可爱，刚刚学会走路。

多年来，董玉振都会在所居住的地方做社区义工，笔者约他访问时，他正忙着为儿子所在的武术校队参加校际比赛当义务摄影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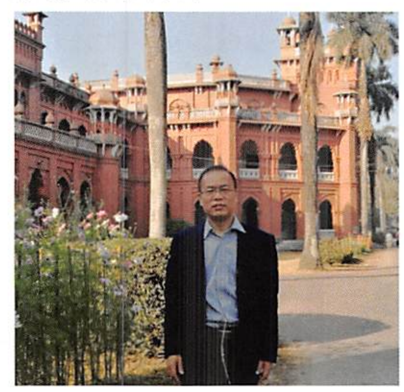
董玉振在坚持学术及文化理想的同时，于2011年加入城市规划与咨询行业，以其跨越多个理工科、社会科学的广博知识，在战略咨询行业如鱼得水，与同事们一道将新加坡成功经验分享给各国客户。



董玉振将自己的研究集结成书。

左圖：2017 年 5 月 29 日，新加坡《聯合早報》就作者在文化傳播和學術方面的貢獻，對其做了人物報道。

下圖：2017 年初，作者參與"一帶一路"項目：孟加拉國吉達港中國工業園戰略諮詢做現場調研途中，順道參訪達卡大學。





第一版 前 言

本書以全新的視角帶您重新認識毛澤東時代，及中國未來的出路。

要瞭解中國的過去、現在和將來，不能不瞭解毛澤東。無論是客觀把握毛澤東領導下的歷史，或經濟、政治、軍事等全方位的遺產，還是探詢中國未來的出路，毛澤東始終令人無法回避。然而，今人是否真正瞭解毛澤東及其時代呢?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已五十多年。作爲新中國創建人的毛澤東至今受到各種議論、批評、甚至指責謾罵，當今日的中國面臨什麽困難時，人們還象八十年代那樣將毛澤東作爲代罪羊(如就業壓力在于毛澤東沒搞計劃生育等)。至于這些指責的合理性已沒有人深究了，因這些指責一般都不會遇到强有力的辯護；甚至中共中央也不會正式出面爲毛辯護，因擔心這可能導致外界對改革開放方向的誤解；他們同樣抱有其它的諸多顧慮。中共中央本身對毛澤東聲譽的損毀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而中國的知識分子要麽因個人過去的遭遇而不能客觀看待毛澤東時代的全貌，要麽帶著文過飾非的心態，或因對毛澤東時代乃至整個中國國情的不够全面瞭解，而在維護毛澤東形象時捉襟見肘。而大多數人批判毛澤東的人則是人云亦云而不假思索。

今天，我們繼續享受著毛澤東給我們留下的豐富遺産，而我們很多人却對此視而不見，反而以不負責任的語調對毛澤東繼續進行攻擊和批判。他離開我們已二十多年了，這期間中國社會發展的風雨歷程，應能使今日的人們以更客觀的眼光看待毛澤東及其時代，但很遺

憾，對毛澤東無理的攻擊、批判甚至污辱至今廣泛存在，什麼"毛澤東時代的經濟乏善可陳"、"毛澤東不抓計劃生育導致今日人口負擔"、"'文革'十年中國一團糟""毛澤東搞獨裁"、"亂搞女人"等。而"博學多識"、理應負起社會良知的知識分子更是批判隊伍的中堅力量。每念及此，作者內心總感强烈刺痛，再也按捺不住積蓄多年要還毛澤東本來形象的衝動，挺身而出，爲毛澤東在天之靈，也爲自己和千百萬人的感受和尊嚴辯護，爲本來屬于中華民族的一份榮耀辯護；也爲了糾正已被扭曲二十多年的一段歷史。

對毛澤東時代進行全方位認識和反思，超越了個人的能力。但如果只集中于個別方面進行探討，那麼，反毛人士將會立即從其它方面對毛澤東進行攻擊。因此，筆者只好做此自不量力之事，在多個方面對毛澤東及其時代進行全面的再認識。筆者長期以來對中國過去、現在和將來的關注和思考，知識積累的廣種博收，以及個人的人生經歷，爲完成這本涉及廣泛領域的著作，作了長期而必要的知識準備，才不至于將一本漏洞百出的書放在讀者的面前。

爲辯護而辯護，或僅僅滿足于對過去的回顧，其意義是有限的。正確對待歷史的目的之一是爲了今日和將來。毛澤東時代作爲中國歷史上非常特殊的時代，有經驗的積累，也有含帶血泪的教訓。如果對經驗不予總結和繼承，將是中國的一大損失。但如果對教訓不予汲取，中國勢必白交了這筆學費。筆者對毛澤東時代的興趣，部分是因爲對當今中國問題的困惑，不得不從海外的横向和歷史的縱向中尋找綫索。面對中國泛濫的貪污腐化，中共高層和知識界總能找到推脫的藉口，但如果和毛澤東一代曾遭遇的困難比起來，當今中國的問題又算得了什麼呢？只能說明當今中共領導隊伍德能的欠缺。本書結合各主題進行反思的同時，聯繫當前的實際，和國家將要面對的問題進行了探討，并提出了一些見解，希望能爲廣大讀者，甚至中國决策階層

提供有益的參考。

“中國人靈歸何處？”、“中國女性站起來了！可站得更優美”等章節，則就當今中國人的心態、信仰重建等課題，進行了探討。當然，面對這些龐大的題目，本書很難做到完美無缺，如果能帶起讀者的興趣和思考，已超額完成了這些章節的使命。

毛澤東高大的背影，既確立了高不可攀的政治標尺，同時，也留下了斜長的倒影。本書無意也不可能全面評價毛澤東及其時代，這實際上遠超一人，甚至一個時代之力。但本書如能啓動對毛澤東時代歷史研究，及中國復興命題探索的新思維，無疑將是筆者最大的滿足。

對于那些由于毛澤東領導的失誤而承受個人和家庭痛苦的政治運動受害者，筆者同情他們的不幸遭遇，完全理解他們對毛澤東及其時代的憤恨。但這本書的目標并非全面評價毛澤東，因此對他的過失談得很少，而且也無須多談，因這類話題已被談的太多了。

作者也希望該書能爲臺灣同胞和海外華人客觀瞭解毛澤東時代及當代大陸的發展提供些許參考。由于大陸在毛後時代極力否定毛澤東，使得港臺和海外讀者對毛澤東的認識不可避免地存在偏差。希望本書將爲他們提供瞭解大陸和毛澤東時代全方位真相的參考。

本書中有幾章的部分內容最初寫作于 1998 年 9 月。但直到 1999 年 9 月 9 日毛澤東祭日，才將其以“爲毛澤東辯護——兼談鄧小平的歷史責任和本來面目”爲題目（筆名：古董）貼在網上。出乎意料的是，網友們的反應异常熱烈，并被轉貼到很多網站。不少網友來電郵，希望能將其成書出版，以便于學術參考。多位網友，包括解放軍軍官、大陸公務員、海外中國留學生，甚至聲稱含泪讀完幾章的內容，更令在下受寵若驚。直到四年後，還有網友來電郵，談他們閱讀該文的看法。筆者對網友們的鼓勵和抬舉非常地感謝，不敢以帶太多瑕疵之文

予以褻瀆，筆者怎敢以兩周寫就的拙作，貿然出版呢？該文自此存在計算機裏，幾被忘却。直到 2002 年中，筆者得空回顧過去幾年不平坦的人生歷程，如同夢中，更似天意；爲今日個人思想的成熟，上了最好的一堂實踐課。在感慨少立興邦之志，青年發奮攻讀，胸懷天下；讀書不下萬卷，行路不下萬里；而今却浪迹天涯，壯志難酬，不禁感觸良多。將自己的所思所想成書，以爲社會留下些許的思考綫索，多少實現一些人生的價值，也算有些意義吧。網友們昔日的鼓勵再次喚醒筆者，該書的初稿才從計算機裏復活過來。伴隨近三個多月的晚霞和晨露，趕在 2002 年 9 月 9 日毛澤東逝世 26 周年前初步完成對這些龐大題目的探討。但由于多種原因，直到幾個月後 2003 年，該書才得以正式付印。

該書在寫作過程中，雖然不時在學術性和可讀性之間徘徊，但最終渴求能二者兼顧，結識更廣泛的讀者群。因此，在確保了嚴密的邏輯推理和事實引證的同時，避免煩瑣的數據和圖表；同時引入了散文的寫作手法，甚至難免嬉笑怒駡的成份；如果某些寫作手法令您不快，敬請諒解。見縫插針地插入 100 多幅毛澤東時代的宣傳畫等，可能圖不對題，希望能引領讀者進入時間隧道，感受那火紅的時代。對于港臺、海外讀者及大陸年輕一代來説，這些圖畫應是比較新鮮的。

這本書能一字不改地在中國大陸出版，是筆者的最大心願，雖然這一天還非常遙遠。這一天到來之日，也必將是中國全面復興之時。

筆者的電子信郵爲 gudongz@yahoo.com，可否勞駕傳來您的斧正建議或思考？毫無疑問，您的智慧和熱情，必將令筆者受益匪淺，也會爲本書的進一步完善提供助益。謝謝！

作者 2003 年 3 月于新加坡

第二版 自 序

第二版終于面世了，自第一版售罄已經多年，這對期待該書的讀者，尤其是對于我本人，是一個漫長的等待。對第一版沒有涉及的大饑荒慘劇、廬山會議與彭德懷悲劇，以及“文革”起因的新發現，讓筆者即不忍以原有版本再印後提供給讀者，也不敢倉促出版第二版，在兼職確定不適合做這類複雜課題研究写作情況下，筆者2017年8月離開諮詢公司後得以全力以赴開展這方面的研究，才使得在毛澤東誕辰125周年來臨前終于出版了補充完善後的第二版。

拙作第一版2003年出版，適逢毛澤東誕辰110周年，由于該書與普世觀點的巨大差別，筆者有一份急切被認可的期待，也有份自信。在出版當年新加坡新傳媒電視第八波道即破天荒在毛澤東誕辰當天邀請筆者做了現場直播的專訪（讀者可以上https://youtu.be/觀看搜“董玉振”），并于第二天在新加坡國家圖書館兀蘭分館和新加坡讀書發展總會的安排下舉辦了紀念毛澤東專場演講。這對于一向因毛澤東早期支持東南亞共産黨而比較敏感的南洋各國來說，有點突破性的意味，緊接著新加坡華族文化節，馬來西亞《南洋商報》等機構和媒體接連不斷的演講邀約和采訪報道，對筆者是莫大的鼓勵。

來自于中共體制內鼓勵，是筆者非常期待的。

筆者在2004年2月于中央文獻研究室得到李捷副主任（現《求是》社長）的接見。很榮幸得到李主任簽名贈書。

2005 年，原中顧委副秘書長和中共中央書記處辦公室負責人郝

盛琦老人家在細讀該書後，召我進京面談，對該書給予極高評價，并表示：他會親自送給胡錦濤和溫家寶，建議中央一字不改出版內部發行版。雖然最後中央沒有批准這一建議，但這是對作者莫大的精神鼓勵。感谢郝老！

來自民間的反饋同樣令人鼓舞和感動。某位來新加坡考察的黨校老師打電話給我：這是一本罕見的書，無論從學術還是歷史認知角度上，都特別新穎和有價值。一位曾陪同首長參加 1980 年《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决議》草稿討論的退役軍官來電說：當時在京西賓館爭論的內容，對外是保密的，您不可能知道，但這些爭論在您的著作裏却有充分的體現，太不可思議了。不少留學海外的大陸讀者很少海外買書，但我却常收到來信表示他們不僅買該書，而且還作爲禮品帶給國內的師友。國內某著名時政網站在轉載本書雛形網文《爲毛澤東辯護》時加編者按寫到“這是一篇以事實爲依據、以理性對待事物的好文章。如果你出于公心，不帶任何偏見，讀後，你一定會對我國所謂的改革有一個新的、正確的認識。”中國學者張宏良教授在他的博客轉發上述網文中的《鄧小平的歷史責任和本來面目》一章時更是不吝溢美之詞：“這是 30 年來難得一見的好文章。僅摘錄其中幾段話,就可以看出這位海外華人的思想水平和政治見識，遠遠超過中國大陸所有高層智囊和文化精英的總和。”

很显然，來自各方對拙作的反應，即體現了民衆對歷史真相的渴盼，也說明歷史本源必然回歸的趨勢，我只是剛巧做了點工作。

據網上消息，前述李捷主任曾在一內部場合說過：不公開歷史檔案，不是擔心毛澤東的形象受損，而是擔心其他人的形象受損。

如果李主任真的有上述講話，我并不感到意外，他曾作爲中央文獻研究室一室的主任，對毛澤東有關的歷史梳理和研究具有權威性。體制內學者不能盡情做真實歷史的公開闡述，體制外學者又缺

乏接觸第一手資料的機會，構成了新中國歷史研究的無奈和缺陷。

李主任的這段網傳表述不論真假，都道出了當今中共的一個無奈：毛澤東的形象已經觸底反彈，高層已經不太擔心毛澤東的形象進一步受損，反正毛澤東作爲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垃圾桶”已經有三十多年，再臭也臭不到哪裏去；而其他同時代領導人（其中有些成爲改革開放時期的核心領導層成員）的“頭蓋”如果被揭開，必然會帶來輿論的巨大波動，那些人們心目中還算不錯的領袖們的形象被毀，對中共中央來說，其後果的不確定性難以掌握。所以，我完全能够理解中共的這種拖延術，但我同時堅信，將會有越來越多的學者（如筆者），通過非官方渠道來爲民衆逐漸撥開歷史的迷霧，撥亂反正，恢復毛澤東的本來形象。其他領導人的歷史責任，必然在未來被逐漸認知，因爲這是一部完整的共和國歷史不可或缺的內容。沒有了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這些當時和後來主要領導人在毛澤東時代實際作爲的描述，那共和國的歷史只能留下一段空白任由他人去隨意發揮了。筆者也期望中共中央能對如拙作這樣的著作的民間流傳網開一面，給民衆逐步認識共和國開國元勛的真實歷史面貌創造一個逐漸開放的環境，或借助于民間力量來給民衆打“預防針”，或傳達中央不方便出面傳達的歷史真實。這也算是官民分工，各有側重，相互尊重，殊途同歸，渠道不同，目標一致。

歷史在某個時期是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從長遠的角度來看，歷史是由人民創造的，也必然由人民來書寫。

這類著作的寫作，會隨著越來越多資料的披露和局勢的改變而有些內容顯得過時，但對毛澤東時代的認識，同樣不能忽略站在十幾乃至二十年前的中國現實下進行觀察，不能因爲今日中國的一些問題得到解决或變得更好而忽略毛後時代中共曾經出現的問題。本著保留對歷史的思考軌迹，本書第二版出版時，對新增內容明確標

出，對第一版的內容除非發現較大的錯誤或問題，一般不做更動，反毛運動最猖獗的時代是改革開放至第四代領導集體上臺之前，尤其第二代領導人，帶著歷史積累的私怨和爲給改革開放找理由，极力否定毛澤東時代，因此，以改革開放首 20 年和毛澤東時代進行類比，是必要與合理的，因此，本書第二版繼續保留了 2000 年之前改革開放的“偉大成果”相關數據與當時中國經濟社會的相關描述。

爲了讓讀者方便區分第二版新增內容，有些第二版注釋和參考文獻，直接在頁脚標明，而第一版的參考文獻還是保留原來模式列在書後，這次不做更動。

該書的出版，連同筆者 1998 年所寫的八章網絡熱文《爲毛澤東辯護——兼談鄧小平的歷史責任和本來面目》，對恢復毛澤東時代的真實歷史形象發揮了一定的作用，彌補了筆者 1995 年博士畢業時報考國家公務員失敗後無奈下南洋的遺憾。由于該書第一版完稿時沒有出版社願意幫忙出版，使得筆者當年不得不辭掉半導體行業工作而成立南洋出版社，進入這個注定賠錢的行業，幷在幾年內耗光積蓄。適逢父母暮年，受限于經濟狀況而沒能經常回國探望父母，構成了自己人生中最大的遺憾。可以說，我對得起毛澤東，對不起父母。本書第二版出版之際，難免勾起這段難以平復的記憶與遺憾。所以，筆者權借第二版出版來聊表對父母的感恩和紀念！

該書第一版出版後，得到各方人士的支持，出版後不久收到了新加坡李氏基金的贊助金；新馬兩地友誼書齋創辦人宋兆裕夫婦多次資助我去馬來西亞的演講活動；其他友人如練佩紅、鄭文咏、李萬植、鐘惠明先生等，也都給予多方面支持；東生老人家（曾任胡喬木秘書）爲第二版題寫了書名；在此一幷表示衷心感謝！

作者 2018 年 6 月于新加坡

目　　錄

特別提示

※本書第二版的修改完善原則是：第一版除非有明顯錯誤，否則，儘量不改，哪怕有些描述隨著中國的發展已經不符合當今的情況。因爲就毛澤東時代與改革開放前 20 年進行類比，具有可比性，可更鮮明看清毛澤東時代的成就，以及改革開放後領導人拼命詆毀毛澤東時代時，他們自己做得幷不像宣傳的那麽高明。本書中有些文字如“當前”“今日”等，凡是第一版的很多沒有修改，因爲把“今日”修改爲“按照 2000 年情況”，將非常累贅。新加的內容，所說“今日”“當今”等描述的時間爲 2018 年近期情況。第二版中大段新加內容都做了脚注。

※本書的插圖幷不與內容一定關聯，第一版插圖的文字說明爲簡體中文，第二版時這些文字也保留簡體，新加的或修改的圖或文字說明則用繁體。以示區別。



第一章　人本經濟的成功嘗試[1]

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毛澤東

一、輝煌的發展成就

“毛澤東不懂經濟”幾乎成了定論，而被海內外人士所接受，筆者也不願將毛澤東視之爲經濟學家幷爲此進行辯護。作爲一位政治家、執政黨領袖和國家元首，關鍵在于在他任內國家的

[1] **特別閱讀提醒**：1998 年寫出本章網絡版，2002 年完善成本書第一版內容，當時正值非毛化最猖獗的歲月，所用的類比數據均爲 2001 年以前的。2018 年第二版出版時，中國各項發展有了長足進步。但不能因爲今日或未來發展的更好而對毛澤東時代的經濟發展吹毛求疵，繼續保留第一版時的數據，是認識毛澤東時代的有效類比依據。即使一百年後，中國高度發達了，這一類比手法仍然有效。

經濟等方面是否取得了巨大的進展。求全責備，或因一時的經濟失誤而否定經濟的整體成就是不客觀的。至于“毛澤東時期經濟一團糟”、“毛澤東耽誤了中國的發展”等觀點，更是輕率和不負責任。

在毛澤東領導革命的早期，既發現并抓住了中國社會的根本問題，即農民問題，并由此啓動了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土地改革，實現了“耕者有其田”，極大地解放了農業生產力，也爲中國最大的群體過上自尊的生活提供了根本的基礎——土地。就影響和意義，超越後來的任何單項經濟改革，如聯産承包責任制、經濟市場化等。尤其重要的是，毛澤東通過土改和暴力革命，徹底鏟除了到處盤踞的地方勢力，包括地方經濟霸權、地方武裝和地方政治山頭、黑社會組織，實現了國家的真正大一統局面，促進中國各地方、各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經濟流通等，爲中國社會的長治久安和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內部環境。而 1949 年之後，毛澤東領導建立起高效清廉的各級政府機構，爲經濟的發展建立起必要的領導力量。公有制計劃經濟體系的確立，對于在資源極爲有限的情況下集中力量幹大事，發展必要的基礎工業和重工業、科教、文化、衛生等事業，提供了制度的保證。毛澤東對人民的動員和民族凝聚力的空前提高，則爲經濟、社會各項事業的發展，提供了强大的社會基礎和動力。雖然計劃經濟已爲今天所放弃，但自 1949 年之後在經濟、科技文教、國防等領域的巨大發展成就，是無法否定的。

建國之初，除了東部和內陸中心城市的紡織和一些輕工機械等，根本沒有值得一提的工業基礎，甚至連燈油都要靠進口。經過二十七年的高速工業化，中國成功建立了完善的工業體系。1952年，工業占國民生産總值的 30%，農業占 64%（三年實現經濟恢

復，1949 年沒有詳細資料，可以肯定非常糟）；而到 1975 年，這個比率顛倒過來了，工業占國家經濟的 72%，農業則僅占 28%了。在毛領導下中國的工業總產值增長了三十倍。即使“文革”十年期間，工業總產值也翻了一番，從 1965 年的 1402 億元發展到 1976 年的 3207 億元[1]。這樣的高速增長居然被第二代領導人和大陸經濟學家貶之爲“停滯不前”、“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而經濟崩潰的所有先兆如：物價飛漲、失業增加、收支狀況惡化等全部沒有踪影，讓人不僅要問：“何處不是崩潰的邊緣？”

以下是幾個重要產業的發展數據：

從 1952 年至毛澤東時代結束（以 1978 年爲截止年，因 1976 年至 1978 年是毛澤東時代經濟的自然延續。毛澤東時代的大型基礎建設和重工業項目也在 1979 年前大部分投產），鋼鐵產量從 140 萬噸增長到了 3180 萬噸，煤炭產量從 6600 萬噸增長到 6 億 1700 萬噸，水泥產量從 300 萬噸增長到了 6500 萬噸，木材產量從 1100 萬立方米增長到了 5100 萬立方米，電力從 70 億度（千瓦小時）增長到了 2560 億度，原油產量從根本的空白發展到了 1 億 400 萬噸，化肥產量從 39000 噸上升到了 869 萬 3 千噸，農藥從 2 千噸增加到 53 萬噸[1]。同時，中國從無到有，建立起規模龐大的航空、航天、原子能及門類齊全的軍工體系，并在這些領域取得了奠定中國大國地位的巨大成就。至毛逝世時，中國已由一農業國發展成爲從噴氣式飛機、運載火箭、核潛艇到工業成套設備和所有農業機械無所不能造的工業大國。中國在 1976 年時的工業門類齊全程度、技術水平和開發能力在發展中國家中是首屈一指的，并在部分領域接近甚至達到發達國家水平。中國的經濟實力在全球排名從 1949 年的第 13 位上升到 1976 年第六經濟大國（這在海外學者中被認可，雖然有匯率的爭議，但如果按照貨幣購買力來計算，

這個位置幷不離譜。只要按國際市場價格算一下當時能源、原材料、冶金、農業等基礎領域的産出就能明白這一資料的可靠性）。

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共完成了八十多萬公里的公路（不包括遍布鄉村的非油面道路建設），兩萬多公里的鐵路，其中絕大部分是穿越于群山峻嶺和戈壁沙漠，使雲南（除了早期的一條窄軌）、廣西、四川、貴州、青海、福建、新疆、寧夏、河套平原等結束了沒有鐵路的歷史（甘肅省在解放初期的鐵路只有隴海鐵路到天水段，解放後延伸到蘭州，幷建設蘭新綫）。在水利建設方面，完成了主要大江河的治理工作，興建了五萬多座水庫，庫容在 20 億立方米以上的 31 座超大型水庫中, 30 座爲 1949 年後所建。僅淮河治理就修建了 3400 座水庫（現在即使建 3400 座標準游泳池也是一個浩大的開支）。爲毛澤東之後從容發展經濟創造了條件。

在文教方面，“文革”結束時基本實現了義務教育，教育經費的投入最高曾達國民生産總值的 5%, 建立了上千所大專院校和完善的基礎教育體系（改革開放後至 2000 年前，中國的教育經費投入沒達到過 3%這一世界平均綫，人大代表每年喊破嗓子，政府就是不理）。在“文革”期間，學齡兒童根本不存在上不起學的問題，與後來普遍存在的失學兒童現象形成鮮明對照（當時在農村一些家長不讓女孩讀書，純粹是封建餘毒的影響，幷不是上不起學的問題。筆者家鄉就有幾十位這樣的女孩，包括筆者的姐姐）。1975 年學齡兒童入學率更達到 96.8%的歷史高點，毛逝世後却連年停頓在這一水平綫以下，一直到 1987 年，才恢復到 97.2%；初中畢


愚公移山 改造中国(油画)

業升學率在 1975 年爲 60.4%, 從此至 2000 年再沒有達到過這一數據，1998 年爲過去二十多年的最高點，才達到 50.7%（筆者家鄉就是個證明，1976 年高中畢業生每年有十幾位，後來再沒出現過這種情況，高中生越來越少）；在校學生數占總人口的比例，1976 年爲 22.4%，1977 年爲歷史最高點達 22.7%,後來再沒達到這一比例，1998 年爲後來的最高點，才達到 17.3%，和“文革”爆發的 1966 年相差無幾（15.7%）。在校中學生數，1977 年爲歷史最高點，達 6779.9 萬；小學在校學生數的歷史最高點爲 1976 年，達 1.5005 億，後來的中、小學在校學生數從來沒有達到過上述數據，因學費負擔而輟學的問題，自改革開放後一直沒有很好解決過[2]。毛澤東時代的升學率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是最高的。這也表明了毛澤東對提高中國人民的整體素質所做的貢獻和中國社會的高度平民化色彩，這和今天“貴族”式教育相比，具有更高的道德層次；當考慮到經濟發展的不同程度，這種對比變得更加鮮明。改革開放之初，海外和香港商人對在中國投資普遍的擔憂是：在大陸是否能招到接受良好教育的勞動力（他們以爲大陸像菲律賓和印尼）。各級官員和學者也在胡說八道什麽“勞動力素質是制約中國吸引外資的障礙”。但令最初試探性投資的外商驚奇的是，擁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勞動力到處都是，這在其它發展中國家是不可想像的。雖然取消高考使得高等教育受到極大的摧殘，但不能因此否定基礎教育的偉大成就，至于那些說什麽“文革”期間沒人好好學習，更是犯了一葉障目的錯誤，除了“文革”開始的兩年，後來的教育（包括絕大部分高校）受政治運動的影響很小。

毛澤東時代的另一個巨大成就是建立了規模龐大、分布領域廣泛的科研院所，爲中國科學研究和設計的全方位發展，打下了基礎（保守估計有 3 千多所）。而這樣龐大的科研體系，在發展

中國家是唯一的，在全球範圍來看，也只有美、蘇擁有這樣齊全的科研門類配套。沒有這些科研機構，中國在解放後二、三十年建起的較高素質的民用和軍事工業，根本不可想像。這些院所的存在，爲改革開放後對進口技術的消化吸收、設備及零部件國產化、跟踪國際高技術產業的發展等，發揮了必不可少的作用。

在醫療衛生建設方面，各縣城和公社建立了衛生院，幷培養了遍布鄉村的赤脚醫生隊伍（這真是個世界獨一無二的偉大創意）。城市居民實現免費醫療，農民看病也收費低廉，發燒感冒類打針吃藥費用只相當于幾個鷄蛋的價錢。相對完善的醫療保健體系，使得 1976 年中國人的平均壽命達到男人爲六十六歲，女人六十九歲，這在發展中國家中幾乎居于最高水平。這從一個方面賦予毛澤東時代中國政府及其執政體制的人道主義的色彩。雖然在政治鬥爭中有些反人道內容，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全國絕大多數人民所享受的人道待遇。

值得一提的是，所有這些成就是在國際環境惡劣、大戰不斷的情况下，通過自力更生實現的。在毛逝世時，既沒留下外債，也無通貨膨脹，這在發展中國家是極其罕見的。毛澤東時代還留下大量外匯儲備，截止 1977 年共有黃金儲備 1280 萬盎司和外匯儲備 23.45 億美元（請記住：70 年代毛逝世前還引進了幾十億美元的飛機和工業設備）。爲華國峰和鄧小平時代大規模的技術引進準備了條件。

即使鄧小平也承認："三十年來，不管我們做了多少蠢事，我們畢竟在工農業和科學技術方面打下了一個初步的基礎，也就是說，有了一個向四個現代化前進的陣地"，"總之，我們還是建立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物質基礎"，以及"我們搞社會主義雖然犯過錯誤，但總的來說，改變了中國的面貌"[3]。



二、人本經濟的意義

由于建國初期國民生産總值基數低，即使保持 10%的年增長率也難以支持如此快速的工業化進程，支付如此龐大的教育、福利和軍費開支。

實際上，毛澤東時期的經濟數據幷没有反映經濟的實際活躍程度，只反映了其中一部分。另一大塊未被計入的經濟成分，如果按市場經濟的角度考慮，是勞動力成本。例如，在華北平原上某低窪處修建一座水庫，因無需炸藥開山，也沒有機械參預，只有發動群衆義務勞動建造，這座水庫的建設成本約爲零。這一活動在當時的經濟統計數據上根本反映不出。但同樣一座水庫如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建造，其勞動力成本將成爲投資部分，建成這座水庫對經濟發展的直接貢獻將等于其實際完成投資額而被計入。

鐵路建設是另一特例。兩萬多公里鐵路因多建在地形複雜的地區，工程之浩大是難以想像的，最著名的要數全長 1100 公里，橋隧占總長度 40%以上的成昆鐵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將難于應付如此龐大的鐵路工程項目。但當時鐵路建設是由勞動力零成本，訓練有素的鐵道兵完成，在低投資下確保工程的質量和進度。在地形極爲複雜的地區修建鐵路，不少解放軍戰士爲此付出寶貴的生命。

在毛澤東時代，勞動力開支的低微對確保重工業發展所需要的資本積累是必不可少的。人民的高度主人翁精神確保了當時工程建設的效益和質量。看一下在科技日益發達的今天，中國建設

了不在少數的“豆腐渣”工程，再看看毛澤東時代建設的諸如南京長江大橋等工程的質量，就能明白毛澤東時代國家和民風建設的成就。

至此重新回到主題，即到底何謂“懂經濟”？如果以經濟增長速度來衡量領導人是否懂經濟，那麼毛領導下年均兩位數的增長速度（不包括廣泛存在的勞動力零成本所關聯的經濟活動，以及忽略和其它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重工業的較高技術層次等因素）無疑證明毛澤東是一卓越的經濟領導人。是否只有懂得市場經濟才是“懂經濟”呢？市場經濟是否是人類發展的唯一選擇？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在短短二十七年間所取得的輝煌成就，無疑給了否定的回答。

以毛澤東的智慧和他在舊中國生活的經歷，他不可能不知道市場經濟、股票市場等概念。但他試圖尋找發展經濟的一條新路，只有這樣中國才能更快地趕上英美等發達國家。這條新路筆者稱之爲基于計劃的“人本經濟”。它的特點是以人爲中心，以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作爲推動經濟發展的力量；它并不否定貨幣，但貨幣僅作爲分配物質資源的手段，而不用于購買或激勵勞動力。而市場經濟體系中，人和其它生產資料一樣，不過是生產成本的一部分。相對而言，人本經濟體現了對人的尊重。但它的實現需要較苛刻的環境，即：道德高尚的領導集體，群衆覺悟的空前提高，明確的發展目標，將個體意志轉化爲群體意志的共同信仰。相對來說，市場經濟實現的條件比較簡單，即爲個人欲望的實現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即可。

綜觀毛澤東的革命生涯，他始終將人和人的教育改造放在中心地位。他用最通俗的語言、簡單的口號讓他領導下的軍人和群

衆明白國家的目標、個人的價值和信仰。這是他領導下的軍隊戰勝强大對手的重要法寶，也是他領導下的群衆在沒有物質刺激情況下勞動積極性空前提高的重要原因。這是他比其它領袖們遠高一籌之處。

雖然人本經濟已不適于今天的現實，但這幷不能成爲否定昨天的理由。畢竟毛澤東創建了適于人本經濟發展的環境，幷取得了輝煌的成功。對昨天的簡單否定將使今人失去了吸取其精華，幷完善當前市場經濟的機會。毛澤東的經濟實踐爲人類的發展道路開闢了新的思路。未來的經濟學家將會發現，毛澤東的人本經濟實踐很可能是人類經濟發展的未來狀態，畢竟它比市場經濟更好地體現了對人的尊重；當然也能更充分地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譬如，中國在工業和科技基礎極其薄弱的環境下，只用十多年的時間就成功地發射了人造衛星；只用 9 年就完成百噸級“運十”客機的試製。而在市場經濟環境下，在幷不很差的基礎上幷同時還伴隨著技術的引進，在第一輛桑塔納合資汽車引進二十五年後才推出一輛不太差的國産轎車。

直到今天，在國家重點工程、大型市政建設項目方面，有關負責人往往將其作爲一“政治任務”來監督，大大提高工程的進度。這其中已明顯存在人本經濟的核心內容。

三、經濟發展戰略的選擇及影響

當毛澤東逝世後的中共領袖們否定毛澤東的經濟成就時，得

到群衆的附和，爲什麼？原因很簡單，以鄧小平爲首的中共中央調整經濟發展戰略，大力發展消費品工業，以滿足人民的消費需求爲重點。而毛澤東時期，敵對的國際環境、薄弱的工業基礎要求中國不得不將重工業的發展放在優先考慮的地位。

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戰略主要有重工業優先、輕工業優先、進口替代、出口導向、進口替代和出口導向幷重等。對于小國來說，出口導向是唯一選擇；中等發展中國家，如馬來西亞等，輕工業優先，進口替代和出口導向幷重則爲合適選擇；但對中國這種大國來說，在惡劣的國際環境下，只有優先發展重工業幷兼顧進口替代的發展戰略就成了毛澤東時代的不二選擇。除軍品工業的需要外，中國民用工業的發展也對基礎裝備工業和工業母機提出了龐大的需求；對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來講，完全依賴進口根本不現實。

沒有毛澤東時代奠定的重工業基礎，毛後時代的輕工業，特別是耐用消費品工業的快速發展根本不可能實現。國家不得不拿出大量的外匯去購買昂貴的電站設備、大型機床、采礦機械和載重車輛，彩電、冰箱生産綫的引進就成了一句空話。由華國鋒和第二代主要領導人主導下開始的以寶鋼一期工程（耗資 178 億美元，此數據援自寶鋼一期工程投産時，上海一家報紙的相關報道）爲代表的“洋躍進”，耗幹中國全部外匯，導致巨額財政赤字，幾乎斷送了“文革”結束時還不是太壞的中國經濟，就是一突出的例證。而所消耗的外匯一部分是在毛澤東時期通過國家的節儉而積累的外匯盈餘。

沒有毛澤東時代在中西部地區交通、能源、原材料、軍工企業和三綫企業等方面的巨大成就，今日的中國將面臨更加棘手的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單地形複雜的中西部地區交通設施等基礎

建設就足以讓鄧小平的改革無所誇耀。很明顯，輕工業的發展要比發展重工業和搞基礎建設容易的多。

中國對蘇“一面倒”的政策後來受到一些人的非議。但如果考察一下蘇聯對中國 156 項工業項目的援助和影響，應不難明白，和蘇聯的短暫蜜月時期，蘇聯、東德、捷克等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以負責任的姿態，爲協助中國的工業化打下了初步的基礎。而與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要進行類似的合作，是根本不可能的。

156 項主要爲重工業和軍事工業。在各工業領域的分布搭配經過了中蘇專家的認真研究，甚至在各項目的地理布局上都認真推敲。在中國還缺乏對工業化發展全面認識的情況下，蘇聯專家在吸收蘇聯工業化經驗的基礎上給予了必需的知識協助。就拿機床工業來說，機床工業所有類型的製造廠，如車、銑、刨、磨、鑽、沖等，全部包括在內，還有象投資 6 億元建立的齊齊哈爾第一重型機器廠等一系列重機廠（建這類工廠要比“聯想”之類的電腦廠和家電組裝廠困難的多）。這些工廠的建立，不僅使中國的機床製造裝備水平在解放後不久立即進入世界先進行列，也在基礎工藝發展、知識傳授和人才培養方面，扮演了必不可少的角色。今天，隨著數控系統的完全國產化，中國機床工業水平已直指日、美、德先進國家；沒有早期的基礎，今日國產數控機床、加工中心的製造將不可想像。



學習蘇聯先進生產經驗，
爲我們祖國的工業化而奮鬥。

如果想一下上海寶鋼等大型引進項目建設時，日本將一些二手設備塗上新漆運來中國，而美國至今不願將先進設備賣給中國，更別提軍工企業和技術引進了。由此不難明白，中國如果沒有和蘇聯的短暫蜜月時期，



中國民族工業的迅速崛起將面臨更大的困難。沒有第一汽車製造廠、一系列重機和機床廠的建立，後來的十堰第二汽車製造廠、萬噸水壓機和萬噸輪等大型工業項目的迅速建成將面臨更大的困難。在世界所有發展中國家和除蘇聯及個別發達國家外，中國是唯一有能力完全靠自身的工業力量建立起如此規模的現代化汽車廠的（二汽于 1969 年開工建設，1975 年第一輛汽車下綫，共安裝四千台新設備，300 條生産綫，117 條自動化流水綫，載重車産能位居世界第三。單看建設的速度和自動化程度，就可以駁斥所謂“文革”期間沒人搞生産和科研的謬論）。如果沒有蘇聯援建的哈爾濱鍋爐廠、電機廠和汽輪機廠，後來的四川東方動力集團等一系列大中型動力設備企業將難以迅速崛起，中國大型電站設備的建造能力將很難短期建立起來，畢竟這類設備囊括了機械工業幾乎所有的加工工藝（例如，大型電站鍋爐的焊接技術，汽輪機的轉子動力學、合金鋼和精密製造等，都是機械工業領域相關技術的最高水平）。八十年代後半期，哈爾濱鍋爐廠能利用美國圖紙建造 60 萬千瓦的超大型電站鍋爐，與以前打下的基礎密不可分，也驗證了中國焊接技術的世界級水平。東方動力集團能製造 60 萬瓩大型汽輪機組，標志著中國動力設備領域正全面達到世界一流水平。

可以肯定的是，毛澤東時期的經濟政策和政治環境，使得中國這樣一個赤貧的國家，一步跨越了市場經濟國家需更長時間，甚至上百年才能完成的原始資本積累階段，而得以展開大工業的發展和壯大。即使在改革開放二十多年後，中國的民營企業也沒

有能力在重工業領域（尤其是基礎裝備及原材料領域）進行商業冒險。

在中蘇蜜月時期，還得到了其它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技術和設備支持，而中國除壯大了社會主義陣營，分散了美國的戰略力量外，在經濟和技術上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回饋微乎其微。[1]

當今日的一些中國人就毛澤東時代對第三世界國家的大力援助予以指責時，可能沒有意識到，在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國際援助方面，中國是最大的受益國。中國對外援助無論在規模上、技術層次上還是產業的合理搭配方面，與中國在這方面所得到的國際援助相比，根本不可同日而語。另外，大國和富國對其它國家的經濟援助本來就是非常正常的，一個拒絕對外援助的大國必然面對外交上的尷尬，印度對外援助的資金曾長期維持在高水平。

即使在接受中國對外援助方面受益最大的越南、朝鮮和巴基斯坦，對改善中國的周邊安全環境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國援助他

[1]本書雖然强調了蘇聯對中國早期工業基礎建立的巨大幫助，但後來毛澤東和蘇聯的决裂是否能說中國忘恩負義呢？或者說中國是否欠蘇聯的一份情呢？目前很難準確回答這一問題，因爲中蘇交往的歷史不少還沒有公開，比如：毛澤東 1949 年訪問蘇聯爲什麽掃興而歸？斯大林鼓動金日成發動韓戰，最後美國介入後蘇聯本應伸出援手，爲什麽蘇聯不出兵而使得中國不得不出兵？中國出兵後蘇聯答應爲中國提供 60 個師的裝備，本來應該免費提供，後來却讓中國還這筆冤枉債，是否過分？除了 60 個師的裝備，還有哪些交換條件？由斯大林在朝鮮闖禍，中國替蘇聯收拾殘局，那麽包括這 156 項在內的援助是中國應得的，是韓戰中幾十萬將士和毛澤東的兒子的生命換來的，根本不需要感謝。再考慮到毛先後對斯大林和赫魯曉夫提出重新處理蒙古問題而被拒絕，蘇聯在日本投降後利用和國民黨政府簽署的《中蘇友好條約》便利拼命搶劫東北工業設施，蘇聯紅軍在東北爲所欲爲等；在毛澤東一代領袖的心中埋下了中蘇走向决裂的種子。中蘇最終從盟友變成不共戴天的仇敵，蘇聯要負主要責任。當然，蘇聯後來國防負擔的加重和最終解體，是自做孽的報應。

們的主要目的是“保家衛國”，中國不能允許周邊小國被世界强權作爲對付中國的橋頭堡。[1]

如果就外交爲國家利益服務的目的而言，毛澤東對蘇聯的“一面倒”外交政策，無疑是一極爲成功的外交案例。就毛澤東的個性和民族主義色彩來說，沒有天大的好處，他會輕易地叫別人一聲“老大哥”嗎？當斯大林送給毛澤東一輛小轎車時，他老人家慷慨地回送了一串自己喜愛的紅辣椒（他老人家真够幽默的）；可當蘇聯希望在地廣人稀的黑龍江建一個簻萄罐頭廠時，他的民族主義情節立即發酵：您把機器給我，我們生產的簻萄罐頭賣給你們還機器錢。當然，最後不了了之。（請讀者不要以現在的引進外資和當時的情況相提幷論，當時以發展民族工業爲唯一目標無疑是正確的）

韓國雖然在朝鮮戰爭後三十多年成爲亞洲四小龍，創造了

---

[1]中國給于他國巨額援助（越南、朝鮮和巴基斯坦得到援助最多），令不少國人心痛，李慎之甚至輕率地說毛是爲了個人在國際上的形象，毛有那麽俗嗎？沒有中國援助，越南不可能打敗美國；如果美國在越南站穩脚，中國的周邊安全環境將急劇惡化。考慮當時和陸上鄰國蘇聯、印度的關係，毛澤東誓死不能允許美國控制越南，別說 200 億元援助，即使更多中國也會毫不猶豫地拿出來，這肯定比中國和美、印等同時在中國領土上開戰合算的多。中國大力支持巴基斯坦有同樣的考慮，巴是牽制印度唯一可靠和有效的力量；但單憑自身力量，巴不是印度對手，如果巴被迫倒向美國或蘇聯，中國西部邊境的安全就麻煩大了。直到蘇聯入侵阿富汗，中美才在援助巴問題上利益趨向部分一致。這種援助也有助于鞏固睦鄰關係。60 年代中期以後，中國確實也不希望越南和朝鮮完全倒向蘇聯，雖然蘇聯也始終給他們巨大幫助。1954 年奠邊府戰役是中國軍事顧問團指導下打的，隨後越法會談期間，法國拒絕了越南提出的柬埔寨、老撾爲越南一部分的要求；越南求助于中國的支持，但沒想到作爲反法盟友的中國明確反對越南要求（如果中國支持，法國必然作出讓步）。一個人口衆多，面積中等的越南，顯然不如三個小國更符合中國的利益。這說明，在考慮國家長遠利益方面，毛澤東比任何領袖都看得長遠，也更果斷，更吝嗇。毛反對印支三國合幷、培植東南亞共産黨，筆者懷疑毛有建立以中國爲核心的東亞“蘇聯”的目標。



在共產黨和毛主席領導下，把中國建設成爲一個繁榮富强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國家！
1954年作

“漢江奇迹”。造船工業的生産噸位多年居世界第一，但其大型船用引擎長期依賴日本進口。而中國在 1976 年以前已具備了各種船舶（從魚雷快艇到萬噸輪和核潜艇）引擎的製造能力。韓國現代重工也學會了製造電力機車，但其關鍵技術全是進口。而中國則具有完全獨立的機車製造能力，在種類和技術層次上雖然比個別發達國家（日、法、德）落後，但在全球範圍來看，則居于一個較高的水平。

臺灣，雖然在經濟上有長足的進展，但其早期的主要産品以輕工業品爲主。

如果拿 1976 年時的自有工業技術層次和綜合製造能力進行對比，除韓國三星剛起步的半導體工業外，韓國和臺灣根本無法和中國大陸相提幷論。他們生産的家用電器的元器件主要靠進口。

即使從全球角度來看，1976 年的大陸的工業規模、技術水平和研發能力，是發展中國家最高的，幷在部分領域接近發達國家水平。

七十年代中後期，微電子工業和電腦技術的迅速騰飛和大規模集成電路在包括家電、鐘錶、自動化控制等工業領域的廣泛應用，才迅速拉大了中國和周邊小龍在某些新興領域的距離，尤其是自八十年代初期開始的，以個人電腦及其全方位應用爲標志的工業革命，加劇了這種差距。當然，中國在以消費品爲主的輕工業領域的産業不足、相關領域技術準備不够、對消費品經營理念的缺乏、體制上的欠缺靈活（這對重工業的影響遠不如對消費品工業的影響大；在計劃經濟時代，重工業産量便于計劃，而對消費品工業進行計劃是困難的，也是不可行的），以及外國對中國的技術封鎖（在 IT 領域的封鎖非常嚴重，當 1024 分辨率的電腦

顯示器在美國大量應用時，中國國防系統只能從香港偷買），是中國沒能及時趕上的主因。

即使韓國、臺灣和新加坡在半導體工業領域已取得巨大成就，但他們中沒有一個具備獨立發展半導體工業裝備和基礎工藝原理的能力。這是美國這種經濟强國最難于被別人追趕或超越之處。而中國大陸在七十年代初期，就獨立發展了集成電路製造所需要的離子注入機（中科院上海矽酸鹽研究所研製），日本買去一台加以研究，後來日本發展了自己半導體設備工業。中國靠自己的力量建起了早期的半導體工業，從拉單晶、設備製造、到集成電路製造全過程，積累了人才和知識。而當時具備這種能力的國家除中國外，只有美、日和蘇聯了。當然，中國後來半導體工業的落後原因就不談了。筆者本人横跨多個理工科領域的知識，和基于對衆多工業領域及經濟發展規律的深入認識，才有信心爲毛澤東時期重工業路綫進行辯護，也才得以認識到毛澤東時期所發生的工業革命和對中華民族崛起的全面的、基礎性的偉大貢獻。

當然，大多數經濟學家則更喜歡從經濟發展的宏觀數據進行評判，而忽略經濟微觀結構的極端重要性（即使從宏觀數據來看，也沒理由質疑毛澤東時代的經濟成就）。沒有强大的基礎裝備、原材料和零部件工業，即使世界上大部分的電器產品都在中國生產組裝，中國最多只能算是個經濟大國，而决非經濟强國。

當我們看到外國技術上的領先而埋怨毛澤東時，實際上我們已將自己放在了和發達國家競賽的擂臺上。這樣的比賽規則對于1976 年時的中國幷不公平。

令人遺憾的是，當中國人在吃完第十個餅不再肚餓時，將前

九個餅的功勞忘得一乾二淨。當一些國營企業的退休老工人因目前企業的困境而不能及時領到退休金時，中國政府和民間是否已忘却了他們的貢獻？正是他們這一代人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在個人不計酬勞，國家高積累的情況下，才有了中國工業化的輝煌成就，才爲今日豐富的消費品供應打下雄厚的基礎。

但國企改革中，他們中的大部分被無情下崗。他們已經沒有青春，沒有社保。政治沒有人性，放弃責任，只有效益。這不是下崗工人的錯，而是錯誤理念下由糟糕政客操盤的所謂改革成果。

四、閉關鎖國的無奈


学习大庆精神.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伟大方针

毛澤東另一項讓今人能作“事後諸葛亮”的即閉關自守，不搞對外開放。

在建國前，毛澤東曾表示過訪問美國的意願。但形勢比人强，建國不久，美第七艦隊進駐臺灣海峽，接著中、美即在朝鮮半島兵戎相見，戰爭的結果更讓老美顔面掃地。圍堵中國成了美國的重要戰略。在軍事上，東面有日本、南韓美軍基地，臺灣的蔣介石隨時準備“反攻大陸”，東南方有菲律賓的美軍基地，在西南方的印度受到美國的大力援助；六十年代中蘇關係惡化，北方邊境緊張；越南戰爭使中國南國境綫吃緊。從解放至毛澤東逝世惡仗不斷，計有五十年代初的朝鮮戰爭，間接參與印度支那戰爭，六二年中印之戰，六十年代援越抗美，六九年珍寶島戰爭，緊接著蘇聯威脅對中國核設施進行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使得中國不得

不“深挖洞，廣積糧”；七四年西沙之戰。如果中國對外開放，也只能面向朝鮮、巴基斯坦、老撾、緬甸和泰國。美國作爲戰後最大的資金輸出國和最大市場，不能爲我所用，且盡力在技術輸出上封鎖中國。直到八十年代初，美國主導的巴黎統籌委員會對中國的技術禁運高達一百七十多項，而對其死對頭蘇聯的禁運才一百五十多項（當然，這與蘇聯技術較進步有關）。台、港、東南亞直到八十年代初還沒能力大量輸出資金，即使有良好開放環境，也難有所作爲。如果說鄧小平時代打開窗戶進來蒼蠅的同時還能進點新鮮空氣的話，那麼在毛澤東時代則沒有新鮮空氣可以進來。毛澤東是一位充滿自信的領袖，他一生何曾懼怕過挑戰?那些想當然地認爲毛澤東擔心外來思想會動搖他的地位和威望，是對毛澤東的根本不瞭解。

解放初期，解放軍完全有能力一鼓作氣解放香港，但毛澤東將香港的殖民地狀態保留下來，以便能充分利用，作爲打破西方封鎖的窗口。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澤東不僅不準備閉關鎖國，而且盡力突破封鎖，以取得國家發展所必須的資源。

建國至中蘇决裂，中國的國門曾面向蘇聯、東歐打開；這種開放是以引進技術和成套設備爲主。這期間，蘇聯對華一五六項成套援助奠定了中國重工業和軍事工業的基礎，而且大多數項目屬于蘇聯最先進工業技術。就開放給中國帶來的相對收益而言，這段時間决不遜色于改革開放前十多年對外開放的成果。

1970 年代初，中美、中日關係緩和後，中國立即從美、日、法、英等引進包括石油化工、化肥製造、冶金、采礦和石油鑽探、熱電廠、波音客機等設備。1973 年，僅中美貿易就從七千萬猛增到八億美元。打開中美關係大門後一年多就有如此巨大的國際貿易和設備引進，怎麼看也不像閉關鎖國，反而顯示出毛澤東時代

突破封鎖的急切感。當時的設備引進是在全面統籌基礎上，以提高民族工業實力和技術層次爲目標，具有非常强的針對性，引進設備均産生良好的經濟效益。

從開放爲增强國家實力和自力更生能力的角度來看，毛澤東時代從蘇聯、東歐和後來美、日、英、法等的技術和成套設備引進所帶來的效果，絕對不亞于改革開放後以吸引投資爲目標的引進。



五、“大躍進”與“洋躍進”

談到毛澤東在經濟方面的敗筆，就不可能回避“大躍進”。它確實給當時的經濟造成了很大的破壞，導致後來三年經濟的極端困難，及重大的人間悲劇，成爲共和國歷史上慘痛的一頁。不論毛澤東及其政黨爲民族的崛起做過多少偉大的貢獻，由于政策的失誤而導致人民大量死亡的歷史事實是不能否定或粉飾的。將人爲的失誤而導致的經濟災難稱之爲“三年自然灾害”并不客觀。筆者對此的一點發言權來自于一個不值得羡慕的優勢：筆者的家鄉所在地——山東省菏澤地區是三年困難時期的十個重災區之一，筆者家鄉的小村子也餓死了六人。

三年困難時期，至少在筆者家鄉，自然的灾害并不比往年嚴重。但在“大躍進”和“大鍋飯”中，一系列荒謬的行爲極大地摧毀了正常的生産活動。

關于大饑荒的背景原因，在該書第一版沒有觸及，本次第二

版專章討論，請參見“第三章 大饑荒解析”。

作者在此無意爲“大躍進”辯護。但深感遺憾的是，當我們不斷批評“大躍進”時，却很少有人檢討在毛澤東逝世後由華國鋒和第二代主要領導人主導的“洋躍進”及嚴重脫離實際的“十年規劃”。這是否存在著評價歷史問題時的雙重標準？毛澤東曾爲“大躍進”的失誤檢討，而無人對“洋躍進”承擔責任。雖然作個檢討也許不難，但面對今日中國無所不在的貪污腐化，中國哪一位領導人向人民公開作過檢討呢？

“洋躍進”的特點是無視國家的外匯支付能力，通過大型工業項目的全套引進來迅速提高工業的生產能力和技術水平。由于嚴重脫離實際，缺乏科學論證，致使出現巨額財政赤字和外債（從1977年的23.45億美元外匯儲備，到1980年的12.96億美元的淨外債），爲八十年代初可能爆發嚴重通貨膨脹埋下了種子。一些大項目不得不半途停工。值得慶幸的是，中國農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迅速成功，不僅緩解了財政狀況，而且節省了一筆進口糧食的外匯，化解了“洋躍進”對經濟的巨大衝擊。否則，中國經濟真要被拖到“崩潰的邊緣”。



“洋躍進”的另一惡果，是由于論證的草率而導致的地區發展不平衡的加劇和對地方產業結構優化的永久性破壞。上海就是一例。

因上海遠離能源、原材料基地，兩條鐵路已緊張不堪，而上海的優勢在于一流的科研力量和勞動力隊伍。因此，上海的產業發展方向應是優質輕工業品和高附加值的高科技產業。然而，重點全套引進項目——寶山鋼鐵總廠的

建設却使上海的產業結構不可挽回地繼續走重型化的道路。當上海汽車工業占中國市場半壁河山時，人們已經忘了它正是“洋躍進”留下的苦果。當然，這也進一步加劇了上海與其它地區的發展不平衡（題外話：中國政府應迫使上海將汽車工業的增加產能，設在有一定機械工業基礎，同時又相對落後的城市和省份，如洛陽、貴陽附近城市、太原、南昌、株洲、柳州、德陽、寶鶏等）。

當第二代領導人在一九八一年主持通過《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决議》（以下簡稱《决議》），批評毛澤東“不按客觀經濟規律辦事”時似乎忘了，他們所犯同樣的錯誤還沒來得及糾正。



我们要革命，风庆要远航（第一艘2万吨级货轮“风庆”轮下水，1974）

六、國營企業的貢獻、問題及出路[1]

當今日的人們評論毛澤東時期的經濟時，難免會提到當時建立的大量“低效率”的國營企業。如何看待和理解國營企業的貢獻和今日的尷尬，不僅關係到對中國經濟和工業發展史的客觀認識和評價，也將影響對中國未來企業發展，尤其是對國有企業改

[1] 本節內容寫作于第一版，今天中國國有企業的狀况和整體經濟實力已經于2002年時不可同日而語。本書在出版第二版時，這部分內容大部分還保持原貌，作爲對中國經濟演進過程的一個記錄。本來嘛，該書的目的就是揭示歷史的真相，當時的情况不論與今天的狀况差別多麽大，今天和後來人也不能因爲今天的成功而忘記或否認曾經的對中國經濟的懷疑，或曾經走過的彎路。

革和管理的探索。

前面已經對毛澤東時期的重工業建立的意義有所論述。本節將集中討論一下毛澤東時期國營企業的貢獻和如何看待今日國營企業的低效益問題，同時闡釋中國國有企業的未來出路。

必須肯定的是，正是中國在計劃經濟時代建立的龐大國有（包括全民、地方國營和集體）企業，才奠定了中國工業大國的基礎。如果完全按照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則的話，中國會有龐大的金融、運輸、輕工業和房地產公司，但指望民間的力量建立大規模工業企業，尤其是規模龐大的重工業群，根本是不可想像的。這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獨特優勢，也是“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具體體現。改革開放二十年來，中國民營經濟的發展就是個很好的例子。

當今，中國最大和最成功的大企業群體仍主要由國有企業組成，根本原因就在于，國有企業的領導人在制定企業發展戰略時，患得患失的思想沒那麼重，因此也較易把握企業發展的良機；而民營企業家在風險承擔能力上相對弱得多。

亞洲“四小龍”成功的私人企業在重工業領域達到較高水平和規模的屈指可數。韓國雖然是個例外，但與韓國歷屆政府對幾大家族式財團的慷慨支持密不可分。這種無保留的支持雖然帶來韓國大企業的迅速膨脹，也導致了整體經營效益的低下，國營企業的所有弊端它們幾乎全有，至于其中所包含的道德問題自然是不可避免的。即使臺灣在過去二十多年建立不少高水平的信息產業，與蔣經國時期打下的基礎有關；如，今日世界最大的集成電路代工企業——臺灣集成電路公司（台積電 TSMC），當初就是首先由政府出資和飛利浦合資創辦，因只有政府能承擔得起幾億美圓的初期投入和投資風險，而民間力量根本不敢貿然涉足。待台積電走上正軌開始贏利時，臺灣政府才將股份賣出，退出對公

司的經營。以此爲起點，臺灣半導體工業才迅速騰飛起來。

美國企業能在短時間內壯大，與美國本身的龐大產品銷售市場和資本市場規模有關，但對一個落後的發展中國家來說，二者皆不具備。

中國在毛澤東時代建立的國營企業，後來不少面臨關停并轉的命運。這除了企業管理人員的經營水平和後毛澤東時代道德水平下降的因素外，與早期國營企業建立的環境和目的密不可分。

中國爲了實現自力更生的目標，追求所有產業的配套完善。由于國外對中國的技術封鎖，如果不能達到幾乎全面的零部件自給，對工業的整體發展必然帶來制約。如，中國圍繞核武器工程的啓動，就建了三百多家各類配套企業。當然，這類企業的產量是很低的，也許一年只造幾十件某種零部件，但沒有這類企業的建立，中國的核武器根本不可能建造出來。當然，任何一類零部件的生產都需要一套工藝裝備和科技及生產人員配備，如果將這類企業放在市場經濟狀態下，沒有贏利的可能，但這又是中國必不可少的產業。這類情況遍布在任何軍工類行業，和航天、航空領域等。僅航天工業從零做起，建起了五大研究院和上海航天局，以及龐大的生產配套企業。正是中國在工業領域的全方位發展，以市場經濟角度來看不論是否符合效益原則，都爲中國建立起全面的技術開發和生產配套能力打下了初步的基礎。這一基礎的存在，爲改革開放後引進產品和技術的國產化創造了條件。

中國在九十年代的驚人發展，外國人不能理解這種從“無”到富的跳躍性。當然，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建設和商業意識的全面覺醒是至爲關鍵的，但毛澤東時代積累的產業能量得以充分爆發出來，是一不可忽視的因素。

如果中國沒有外部的封鎖，完全參與全球經濟分工的話，那麼，中國能分到什麼樣的一塊“蛋糕”呢？對一窮二白，人民教育程度低下的中國來說，只能分到輕工業低端產品的下游組裝部分，中國後來在某些高科技領域的狀況（如手機，電腦等）就是明證；甚至更糟。畢竟中國後來在參與國際分工的時候，已經有了相當雄厚的基礎，在大部分領域，如機械、電機和原材料領域已有了相當豐裕的家底。比如，長虹集團能在電視機領域取得巨大成功，甚至韓國三星電子、東芝等日本家電企業也采用長虹的行輸出器件、高頻頭（電視機上的關鍵部件）等，與長虹和中國電子業在過去幾十年的積累是分不開的。在外資企業和私人經濟得到優惠政策的扶植下，國營企業繼續是出口創匯的主要力量，2000 年，在 200 大出口創匯企業中占據半壁江山。

中國各類國營和集體企業的建立，也爲中國的發展培養了一支龐大而高素質的產業工人。筆者在和曾參觀或工作過的外資企業對比中，不得不承認，在外國私人企業裏要找到像中國的八級工那樣高素質工人真是不太容易（筆者在國內做課題時，曾親眼目睹航天部二院的老師傅在普通車床上給本人加工的一個 0.3 毫米厚的錐型彈簧片；筆者敢說，全世界沒有第二個國家的工人敢做和能做這樣的加工）。而中國工人的整體素質之高，創造能力和組織性之强，是世界罕見的，但幾乎完全被世人所忽略（某日本學者著作《中國製造》開始注意到中國工人的高素質，但可惜的是，這位作者缺少工程方面的背景而無法去發掘更令他驚嘆的事實）。在錢學森創辦航天部第一研究院時，大部分人員是從部隊轉業的軍人，他們文化程度之低可以想像，也沒人進過工廠，可就是這些人爲航天工業的崛起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們以極大的熱情爲國家發展奠定了基礎，也使自己成了一流的產業工人。這

樣的事例在毛澤東時期建立的各類國營企業中俯拾皆是。在毛澤東時代，一個中型工廠能分配到幾個大學生還真是寶貝。

筆者在八十年代中期曾在上海的一些國營大廠實習，因筆者的一貫興趣而對那兒的管理給予特別留意。後來在深圳和國外的一些企業的經歷，使筆者相信，中國國營企業的微觀管理絕對不亞于大部分外資企業。尤其在海外工作幾年後，更對國有企業的前景充滿信心。當然，由于中國企業的宏觀管理上存在嚴重的問題，和今日管理人員道德觀的淡薄而導致企業管理層在毛後時代的貪污腐化，進而導致國營企業效益的下降和員工工作熱情的降低，則是另外值得探討的問題。

至于國營企業的內部管理和經營，需要中國在工商管理教育和科研以及相關人文和專業教育方面多做工作，很遺憾，這方面中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如，前幾年大、小企業發瘋一樣搞多元化經營，摩托車廠造方便面，電子公司開藥廠；一會兒又大談 CI，把商標換來換去；今天又神經病一般到處在談“資本運作”等，好像資本一運作，中國就能有世界一流企業。聯想集團和清華同方學習外國大企業而將筆記本電腦和數碼相機走“貼牌”路綫，說不定哪天全中國到處猛刮起“貼牌”風。這裏有個問題：如果中國頂尖大企業都不作研发（外殼設計不算）和尖端產品生產工藝開發，那中國工業素質的提高將會面臨嚴重問題。聯想是在學習 IBM，可 IBM 走技術服務和委托加工路綫，是因爲它擁有在相關領域不比中國科學院弱的基礎研究實力和應用技術開發能力，它賺的是技術錢而不僅僅是品牌錢，而品牌價值的“後臺”不是生產，而是强大的研發實力；看一下 IBM 在人類技術進步領域的一些里程碑式貢獻，如電子隧道掃描顯微鏡、集成電路的銅芯製



造技術及高密度磁盤存儲技術等，就能明白它的强大基礎研發實力。IBM 委托加工的是對它來說太低的技術，如電腦組裝，但不會把大中型服務器委托出去；而筆記本電腦和數碼相機的製造對于聯想的現有技術層次來說，幷不算太低的技術。相對來說，中國企業的品牌價值是建立在低端産品開發能力和市場營銷上，這種牌子是經不起純粹“貼牌”考驗的。

進入 1990 年代，隨著公司上市，從聯想開始，中關村響徹雲霄的是要造就多少百萬富翁，甚至千萬富翁（清華大學一上市公司老總的豪言壯語），更是全球企業界最無知、最荒誕、中國獨有的怪現象，那些由教授和研究員組成的經營團隊根本不考慮其它員工的感受和忠誠度，對企業文化肆意踐踏，表現出典型的暴發戶嘴臉，爲中國企業界樹起了一面黑旗。

中國企業經營中的問題與企業家隊伍的整體素質，和中國知識分子的自身問題及企管教育方面缺乏創意等密切相關。

大量國有企業的關停幷轉，幷不意味著昔日的建立是浪費。中國在過去十多年中，一些大型國有企業的崛起幷非從零開始，實際上是在原有企業的基礎上，通過將其它企業的資産劃撥而實現大企業集團的迅速膨脹。無論是海爾、春蘭、一汽、上汽、長虹、青島啤酒等，都在成長過程中低成本或無成本（資産劃撥）地兼幷了其它的國有或集體企業。即使過去十多年崛起的民營企業中，不少都曾通過對原國有或集體企業的購買或合資經營。在一個破舊的企業基礎上發展，也比一切從頭做起方便快捷的多。

創立一家貿易公司易，創立一家工廠難。尤其是一家需要一

定技術力量和裝備的企業，僅論證過程就是一個不小的挑戰；在某一空白領域發展工業，困難更大。毛澤東時代的工業發展填補了工業各領域的空白，自然也創立了今日工業發展的起點。私人購買一家國營企業，啓動階段的設備、工藝、人員配備等重要資源已一步到位。其實，不少虧損的國有企業，只需要換個經營人，就可以令它起死回生。員工的整體素質和現成工藝裝備是重要的保證。例如，新加坡豐隆集團購得中國優秀柴油機製造企業——廣西玉林柴油機廠的控股權，全部技術和車間管理都由原玉柴員工負責；而新加坡根本就沒有玉柴這樣的企業和相關技術，自然也派不出技術員工。豐隆在中國幷購的另一個杰作就是新飛冰箱，而新加坡也不可能派得出任何的技術人員。

中國大量國有和集體企業的另一個貢獻是中國城市赤貧階層的消失和落後地區工業化火種的散播。

如果沒有計劃經濟時代的國有企業的發展，而完全依賴市場力量的話，中國將會出現一大批超級富豪，但中國城市貧民窟也將同時遍地存在；而中國的產業布局也將高度集中在傳統上的沿海工業中心和內地幾個點上，而西安、蘭州、貴陽、成都的發展將嚴重滯後，更別提綿陽、齊齊哈爾、洛陽和柳州了，只要看一下這些中西部城市當今吸引資金的難度就可一目了然。沒有長虹的綿陽，沒有二重的德陽，沒有遼化的遼陽，沒有一拖的洛陽，沒有二汽的楚西北，沒有冶金基地的六盤水，沒有東方電機和第二重型汽車的樂山，沒有陝飛的漢中……，您能想像這些城市的今天會是怎樣？這將導致的一個嚴重後果是，中國平均購買力的薄弱，地區發展不平衡的嚴峻，社會關係的嚴重惡化，今日南美和東南亞國家的問題，也必將在中國更早暴露出來，而且會更嚴


我们的大学生回来了

重，並將從根本上窒息中國的發展步伐。

毛澤東時期工業化的一個直接成果是，財富平均地散布民間，使得中國成爲一個平民階級爲主導的社會。大量財富均布在全民或集中在國家手裏，南美和東南亞國家的資金嚴重外流的現象才不至于在中國過早的發生。今日中國雖然也有資金外流的問題，但與國家的整體實力和每年的外匯流入相比，已不太會迅速威脅中國經濟的穩定。看一下蔣介石管理大陸時期中國貪官和富豪往海外的財產轉移，就能更好地理解上述說明。印尼在 1997 年金融風暴和“排華”事件後，估計有一千億美元以上資金逃亡國外，因其財富主要掌握在流動性强的私人手裏（看一下海外賭場裏的中國豪賭客就該明白，如果沒有早期集體和國營經濟的基礎而純粹靠私人資本，中國將會怎樣）。

即使到今天，國有企業仍是國家財政收入的最大來源。在改革開放最初的二十年，中國政府一直推行非平等國民待遇政策，外資企業的增值稅爲 17%，而國營企業長期維持在 33%的高位。政府很清楚這對國營企業的不公平，但又長期無可奈何，因爲中央財政難以承受國有企業稅收削減帶來的收支不平衡挑戰。

固然，一些國有企業後來經營中的問題，爲國有商業銀行帶來不少的呆壞帳累積。但從中國國有經濟的整體來看，何嘗不是從一個口袋裏拿出來，然後放到另一個口袋裏。當然，今天國有銀行的資金抽逃和內外勾結的騙貸而導致的呆壞帳，則屬另一個性質的問題。

可以預期，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內，國有企業將繼續扮演中國產業進軍國際的主力軍角色，尤其在需要高投入的產業領域。關鍵問題不在于企業內部的微觀管理和資產結構上，而在于中

央、省市或國有投資機構作爲投資主體對企業的宏觀監管上。這才是擺在中國政府面前的最根本問題所在。

在 1980 年代，中國經濟學界給政府開了不少的“藥方”，來醫治國有企業的“頑疾”，其中最被各界認可的“藥方”之一是企業股權結構的改變，即國有股份的變更。其實，自北大厲以寧教授在八十年代中後期提出“國有企業的出路在于股份制”，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造就已經開始醞釀，後來大有“一股就靈”的意味。厲教授的這一理論也促使筆者在哈工大碩士畢業後，放弃進京工作的機會而南下深圳，基于對這一理論的本能懷疑而去尋找證據；但很遺憾，筆者的人輕言微使得國家錯失了一些有價值的發現。

筆者幷不反對企業的股份制改造，但必須認清，股份制可以讓企業更加透明，也可以靠引進策略性股東來規劃企業的未來戰略，但不應認爲是改善企業管理的根本通道。對于政府投資主體來說，通過將優秀企業的部分股權釋出，可以爲公衆投資人提供良好的投資選擇，同時也使政府本身獲得可觀的資金收入，降低投資風險等；對個別無關國計民生的行業，政府可以通過股份制得以逐漸淡出。所有這些都不應作爲改善企業經營的手段。那些認爲股份制可提高企業的經營水平，是沒有充分理據的。一個簡單的疑問是: 哪怕政府只擁有一家企業 10%的股權, 那麼, 這 10%的股權如何管理?

可見，如果把國有企業的出路定在股份制改造，一個必然的推論是：國家放弃所有股份，實行完全的私有化。那麼，當今和未來中國，有多少投資人能抽得出足够的資金來買下中國數家電信公司、中遠、中國石油、中信、寶鋼、中國電力、中石化、中

國糧油等企業呢？在大型國有企業中，市值在百億，甚至千億人民幣以上的企業何止這些。在當前人民幣實際購買力和匯率倒挂，以及國家經濟剛處于起飛前期階段的情況下，如果把國有大企業股權大量賣給外國投資者，同時將套現的資金用于低收益的基本建設或彌補經常項目開支，對國家的長遠利益將是得不償失的，甚至有“崽賣爺田不心疼”的意味。只要對管理人員的監管和獎罰措施明確，即使不盡完美，中國不少國企的經營將會有一個大的改觀，簡單地一賣了之，未免有點可惜。[1]

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這類大型國有企業也在增殖，所以即使在未來相當長時間內，中國也沒有多少投資人能吃得下大部分國企的股權。畢竟這是中國在過去幾十年中積累的全民資產的大部分，在中國這樣一個非私人資本主導的國家，這些企業的國家股權是社會財富均布的重要體現，也爲國家調控經濟運作提供了一個特別的手段，以及爲國家組織重大技術攻關和產業化，提供了一個重要而安全的平臺；在其它不具備這一條件的國家，政府的產業導向有時因需要政府的無償財政支持而帶來道德的風險。

當然，對于中國企業宏觀運作如何管理，是個幾句話說不清楚的問題，但政府對管理層的個人操守監督力度理應大大加强，同時借助于職工民主調查，來評估企業管理層的表現。尤其是大型采購項目，政府不應完全放開。中國華能和其它電力公司在過去十多年建的大型電廠，不少是用的進口機組，對此中國政府沒能給予應有的糾正是不應該的，否則，中國三大動力設備集團如何生存？在航空公司選擇機種的過程中，國家同樣有義務督促配

[1] 寫作第一版這部分內容時，做夢也沒想到後來的中國政府居然在對中小型國企私有化完畢後，開始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來漸進式蠶食優質國有企業資產。私欲激發動物智慧，也放縱人性的貪婪和醜惡，順便借助于蠢人手中的權利。唉！

合中國航空工業的發展戰略；政府“該出手時就出手”。對一些采購的審計方面，國家或各級政府作爲主要投資人理應加强監督機制的完善。

政府不應該過多幹預公司的運營，但完全放手同樣不符合國家的最大利益。即使美國這樣的高度市場化的國家，在協助本國企業爭取國際定單方面，從來積極介入。而中國政府在國企采購上完全不管，則未免過于灑脫了。其實，這裏面并沒有什麼法規制度的問題，也不必要設立可能與 WTO 衝突的條例，而是一種政府責任意識的欠缺與否，同時也是國企管理人員的心態問題；這類問題完全依賴于制度，是不可想像的。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尋找中國的國有企業出路時，就不能老盯著股份制改造，否則，將永遠找不到國企改革的出路。因爲是在舍本而逐末。

必須肯定，國家的投資主體角色本身，并不是企業經營不善的根源所在。例如：在新加坡經營最好的大企業，包括新加坡航空公司、新加坡電信、港務集團、發展銀行等，都是國有、國家控股或國家爲單一最大股東的企業，它們的經營水平是一流的；新航曾多次被國際權威機構評爲世界最佳航空公司；而港務集團的管理水平也不遑多讓，它將管理軟件轉移給合資的大連港務局旗下港口，使大連港裝卸效率提升到日本港口的四倍。這些企業的政府股份由一家叫淡馬錫控股的全資政府投資公司管理。當然，新加坡國有企業并非沒有投資或經營失誤，但這類失誤與股權的結構沒有任何的關係，而是公司高層决策人的判斷問題。即使私人上市公司也有倒閉的。這些公司在推動新加坡本地工商業發展方面發揮了私人企業不可能完全取代的作用。

新加坡國有或國家控股企業能運作良好，根本的因素在于擁

有一個廉明的政府體系，以及雖然有些控制，但還能聽得到的輿論監督。如新加坡副總理李顯龍的夫人、李光耀的兒媳婦何晶，辭掉新加坡科技集團的董事長而出任淡馬錫控股的執行董事，引起人們的議論，使得總理吳作棟出面向媒體解釋任命何晶的理由。吳作棟提到，在何晶嫁到李家前已和吳在黨務工作中認識，她已表現出較强的能力，吳作棟曾鼓勵她從政；以及新加坡國小，不能因爲她是李的夫人而犧牲一個人才等；不論民衆是否接受這一解釋，新加坡微弱的輿論監督已逼迫總理出面有所交代；而何晶則在民衆的質詢聲中也解釋了新加坡科技在某項投資上失誤的原因。其實，如果吳作棟不出面解釋，人們也拿何晶沒辦法，但這表現了政治和公衆人物對輿論的敏感性，以及監督的有效性。

很顯然，這種有效的輿論監督是中國所欠缺的，實際上也是中國國有企業宏觀監控所必不可少的環節；因它的資産屬于全民。

當朱總理爲國企改革表現出雄心壯志的時候，筆者不禁擔憂：朱總理不論多麽有才幹，當您試圖在中國當今政治的亂象中建立理想的國企監管體系，根本等同于在沙灘上建一座大厦。至于向國有企業派遣監事或代表，只能是理論上好聽，實際上不好用。只需要一捆人民幣就可以將您派去的代表砸得暈頭轉向。

國有企業改革的問題，實際上是內部監管和責任與激勵機制的問題，宏觀環境上，需要中共中央在社會宏觀監督反饋機制和廉政紀律方面進一步强化。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政治體制改革的社會基礎早已存在，如果不能及時推動政改的話，必將影響到發展經濟這一主要矛盾的解決。

至于將企業賣給管理層的作法，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荒謬透頂。這無疑給管理人員掏空國有資産提供了動力和渠道。可悲的是，還真的在中國實施了。

當然，在國家現有的體制下，中國國有企業的經營好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業管理人員的道德操守和對國家及人民財富的高度責任心。雖然是無奈的，但即使中國在未來有了完善的宏觀管理體系，這種企業家精神對中國的國有或民營企業來說同樣是必不可少的。它在相當大程度上左右著企業文化的建立。看一下美國大企業的財務醜聞，就能更好地理解這一點。

對于今日的企業家來說，面對上百億的資金流能獨善其身，且必須在沒有强力監督的情况下自覺而忘我地工作，承擔經營的輿論風險，確實是一種偉大和悲壯；就其道德層次和貢獻來看，完全可以稱得上是真正的民族英雄和社會精英，因這體現了一種對利益的非凡超脫和自我犧牲精神，是中華民族最寶貴的精神象徵。海信的老總周厚鍵在海信上市時主動放弃自己應得的股份認購權；青島啤酒集團的彭作義，這位將青啤從年産十萬噸的企業在短時間內發展成爲中國最大啤酒集團的企業家，喜歡念的一首詩是陸游的《蔔算子 · 咏梅》：

零落成泥輾作塵，只有香如故。

表現了一代著名企業家對個人得失的超然，只希望能留“香”于人間。他的英年早逝似乎又在加重著這種悲壯。

看一下中關村的一些高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整天喊著“要不是我企業不會有今天”、“當初創業時只是幾萬元起家，今天我當然該得個較大股份”等，他們就沒想想：你的創業不承擔任何個人風險，自己分文沒投，“關係”還在學校和研究所，住著公家的房子，和研究所或學校屬于雇傭關係，個人知識投入是受雇者的責任，你的巨大貢獻理應多拿點股份，但沒必要過分强調自己，好像研究所或學校虧你多大情似的；如果當初失敗了，還可以回去搞研究或教書，這和拿風險投資公司一筆錢出來自己創

業有本質的區別。如果你們幾個創業者當初辭職下海，領著老婆孩子租房住，搞到今天這個局面，那才令人佩服得五體投地呢。而可愛的中國消費者對民族工業的一貫支持，更被他們視爲理所當然或忽略不計（只要性能過得去，即使裏面電路板粗糙一些，中國消費者也樂于支持國貨。幾年前隨便打開中國幾個知名品牌電腦機箱，看一下主機板，就能明白中國消費者的寬容）。

當然，國有企業本身的內部管理和企業文化的建立同樣具有自己的特點和優勢。

國有企業的最大優勢就是企業員工能非常直接地體會出“主人翁”的意識，這是民營企業需要加倍努力才能達到的。當然，管理人員的個人操守即能輕易地推動員工主人翁意識的建立，也可輕易地摧毀它。中國的優秀民營企業，如中國最大的通訊設備公司——深圳華爲技術公司的創辦人任正非，在公司强調的是“華爲以産業報國和科教興國爲己任”；他本人雖然不是中國首富，但却以上繳個人收入所得稅全國第一爲自己，也爲華爲員工樹立了一面旗幟。

中國企業家的奉獻和犧牲精神在任何時代，任何體制下都是必須的，不論中國的國企管理體制如何改革，這種精神是中國企業超越國外强大對手最重要的“利器”之所在，就像早期的中國乒乓球隊一樣。因爲它凝聚了中華民族的價值核心。





七、國企改制和混合所有制改革[1]

將企業賣給管理層，是國際上比較有代表性的一種企業股權轉讓模式。但在中國，這一點本來是不合適的，因爲中國的企業性質是全民或集體所有，在缺少足够透明和公正性的情況下，盲目進行賣給管理層改制，必將導致賤賣國有資産的問題。這一點中央也心知肚明。但中央第二代和第三代領導集體，還是邁出了這人類歷史上最喪心病狂地流失公共資産的一步，比俄羅斯市場化改革中的國有資産流失還要不透明。這其中包括大量地方優秀國有企業，甚至一些五、六十年代國家勒緊褲腰帶建設的大型國企被一股腦地改制給管理人員和地方官員。[2]

中國國企改制的方式是：把企業直接“賣”給管理層，可國企管理層都是受薪階層，薪水不高，不可能有那麽多錢買股權，甚至沒有私産向銀行抵押，那怎麽辦？就是以企業估值抵押給銀行，或者乾脆辦理個股權過戶手續，政府把債務也包下來。中國國企改制，幾乎是類似于資産免費贈送的形式，實現國有公共財産的私有化。銀行也是國有的，所以，抵押給銀行其實也是您從我右口袋開個白條把我左口袋裏的東西變成自己的。

---

[1] 這一節爲第二版新加內容。第一版的第七、八、九節相應改爲第八、九、十節。

[2] 這個由右派領導的改革，從根本上動搖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基礎，固化了一個龐大而更無節制的官僚資産階級。國企改制中，高級幹部的白手套深入其中，他們有强大公關能力而更加肆無忌憚地攫取無限的公共財富，銀行、保險牌照這類稀缺資源，國企都不易搞到，這些民企則輕易搞到而發展起來。公權力無形地支持著這些企業的發展，一旦社會動蕩，這類企業就是壓垮國家的最後一根稻草。

這是不考慮任何正當性的改革！和國企職工下崗政策一起，構成了最無耻的改革！！共産黨性質的改變從這一改革開始！！[1]

實際上，即使管理層以企業股權抵押向銀行貸款，這筆錢實際是不用還的，而是繼續貸款，反正經營虧損，扔給國家，如果賺錢，就是自己的。中國用億萬人民幾十年積累的龐大財富，一夜之間創造了一個龐大的，以共産黨幹部爲核心的資産階級。他們沒經過艱難的創業冒險，上來就擁有了一個包括人才隊伍、現成設備和産品、現成市場的成熟企業。這是建國初期私人企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逆操作，但更不合理，更不公平。

這些改制企業實際上多數都是賺錢的。就拿最大的民營鋼鐵企業沙鋼集團來説，它是張家港市屬企業，有不錯的利潤。但 1995 年改制，這家企業改成了張家港市委副書記和沙鋼黨委書記沈文榮的私人企業。至于這種改制的合理性在哪裏，只有天知道。反正張家港市全體有戶口居民再也沒有了在其中本來擁有的股份，而且他們也不知道是如何流失的。沙鋼和其它民企借助于國家環境管制松的契機野蠻擴展成最大民營鋼鐵企業，但在技術創新和産品幾品種及質量上都無法和寶鋼、武鋼、首鋼相比，所謂民企比國企創新能力强的神話，在很多行業都只是停留在“神話”層面。民企無法給員工歸屬感，是其不易但又必須邁上的臺階。而且，“私有制一定比公有制效率”同樣是一些所謂經濟學家編造的神話。國企改制後的民企，在技術革新和産能擴充中，繼續大

---

[1] 解放初期，上海等工業城市失業率高，爲此，毛澤東要求企業儘量多安排工人就業，一個人的工作兩人做，政府機構降低預算開支，用節省的錢補貼企業的薪水開支。國企改革中政府摔包袱，一股腦逼工人下崗，買斷工齡，沒有保險，導致下崗工人瞬間成爲城市貧民，自殺、賣淫者普遍，他們中不少是優秀的勞動者和各類獎章獲得者。工人下崗政策制定者與毛澤東比，政治道德何止天上地下！

量收取政府給予的優惠扶持。這就是中國改革的怪异之處，國家把公共資産給了私人，債務留給納稅人，國有銀行繼續給予信貸傾斜，政府還要繼續給予各種優惠和扶持，而笑納了一家國企的管理層從來家人就不需要勒緊褲腰帶。

這些國企改制的受益人不費吹灰之力獲得一個現成的企業（創業最難的是第一桶金，創業者最初階段陣亡率在九成以上，而這些改制受益者完全跳過這個階段），筆者無意對這些人本身說三道四，他們沒有過錯，是人類歷史上最荒謬改革下的産物。如果說官員貪污一百萬元就要坐牢，那這些動輒拿到幾億免費財富的新權貴則完全合法，而且政府還給了他們一大串的榮譽，成爲改革先鋒。但改制對中國社會所造成的傷害之大却從來沒有被認真研究。實際上，政府也不允許對此進行研究。

筆者長期觀察發現，中國官員沒底綫貪污其實是在國企改制開始後不久。那些改制中沒有撈到一家企業的高官意識到自己錯過了一個天大的機會，除了後悔，就是開始心安理得地撈錢。而"讓少數人先富起來"的這些少數人，幷沒有對自己撈個大便宜有感恩和戒懼謙卑之心，相反，大多數改制的受益者不僅用自己的財富去腐蝕官僚體系以獲取更大財富，而且將財富和子女送往國外，甚至炫富，破壞社會價值體系。不會因爲這些財富的原創股東是全民或集體所有制下的國民而懷感恩報答之心。

這些改制企業也爲其它優秀國企管理層帶來心態的動搖。比如，長虹集團在倪潤鋒帶領下成爲中國優秀的電視機及零配件製造企業，但在改制的大潮下，他爲了把這個企業改制而刻意降低企業盈利，以達到降低估值，便于改制的目的。這麼一個優秀企業和杰出企業家，最後走向了墮落。那些認爲私字當頭進行改革

就能激發人的積極性，却忽略了另一個同樣可能的方向：私字當頭同樣可以激發人類內心的貪婪與邪惡。

萬達集團的王健林說："自己的錢想怎麼花就怎麼花"。如果王健林不是靠改制自己管理的國企發起來，而是自主創業有這樣的成就，您的話完全合理，但您是通過一系列手段將一個國企改制成自己的私產，雖然程序合法（合的是那個改制的無耻法則），但幷不意味著您已經對原創股東沒有道義上的責任。萬向集團的網頁上寫著"創辦人盧冠球當初帶領工人辛苦創業"，更是荒謬透頂，1969 年那個生產萬向節的寧圍人民公社（現爲寧圍鎮）農機修理廠創辦時，盧冠球是因爲會打鐵而被徵召進廠的普通工人。後來您把這個公社幾萬人的公共財産變成自己的，搖身成了"帶領""創業"的化身，太缺乏對歷史的尊重了。您家族的榮譽和財富是借"改革歪風"從寧圍百姓手裏免費獲得原創股而打下的基礎。

人運氣好時可以占個大便宜，但占了便宜還賣乖就有點不厚道了！我對這些改制的受益者幷無妒忌，因爲不是他們的問題，是中央政府的問題。但他們不應該忘記自己的道義責任，比如沙鋼集團沈文榮家族和沙鋼主要股東，應該以感恩的心態去回饋張家港市百姓，而不是污染留下，財富帶走。

中央政府裏總有些讓人無法理解的弱智大腦。最近幾年中小型國企改制的差不多了，只剩下央企這塊"肥肉"，他們又來以莫名其妙的理論打央企的注意，造出一個"混合所有制改革"。在中國一旦形成政策，市場規律和公正立馬就變成陪襯（我一直懷疑中央高層智囊和管理層有受西方資助的第五縱隊）。很顯然，私人投資者不是傻子，央企必須拿出優質資産來進行合作才可能貫徹政令。問題是，這些國企的優質資産，有必要混合嗎？央企

在混合的要求下，到底有多少優質資產被混合掉，難以統計，因爲完全不透明。有朝一日揭開這個蓋子，很可能發現，是國有資產大流失的又一次“壯舉”，搞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這一代領導人，將身負國有資産流失和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徹底動搖的歷史罪責。當然，這個既得利益集團和政治人物不可能讓這個蓋子揭開。

中國的股票市場已經有相當的規模，渠道還算暢通。如果政府真想釋出部分優秀央企的股權給民間投資，完全可以通過股票市場來透明合法地完成，根本不需要制定行政命令來完成一個純粹的資本運作。比如新加坡優秀國有企業新加坡航空公司、星展銀行等，通過在新加坡股票交易所上市來釋放出淡馬錫控股手中持有的部分股權給公衆投資者和機構，而不是通過新加坡內閣制定行政命令，在完全不透明的情況下對優秀國企股份出讓給特別選擇的私人資本。新加坡電信公司是優秀國企，當時上市時，政府爲了讓全民受益（因爲新電信客戶是全民，資産屬全民，國家給全體國民參與 IPO 機會）

中國中央政府似乎更喜歡在普通民衆無法參與，輿論無法監督的情況下，通過不透明的行政命令的壓力，來幫助那些有實力的私人企業（普通民衆和小企業可沒資格來混合進去）進一步做大，背後的動機到底是什麼？爲這些私人企業未來主導國家命運做鋪墊？爲中國徹底放弃資本主義化夯實經濟基礎？

考慮到中國的國情，國家應該將國企 IPO 前融資的特權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就是只給國字號的投資機構和養老金、扶貧基金等，或者給中西部地區一些落後省份的財政基金。但國家似乎有股力量，就是設法爲央企或國企打入私人的鍥子。如果有朝一日中國出現動蕩或國企經營出現問題，這些“鍥子”將會借機做大，蛇吞象的時刻就會來臨。擁有巨大資源優勢的國企將會成爲

一些家族政經力量的打手和舞臺。

我堅决支持中國創立公平的環境，促進民營經濟發展，這是釋放全民智慧的必由之路。但這種促進民營經濟發展靠行政之斧幹掉國有企業的手段，是拙劣和不公正的[1]。實際上，不論民營經濟如何發展，中國政府必須要清楚，保留和發展一個龐大而高素質國有企業群是中國經濟穩定發展的需要。私人財富的流動性和社會公共責任心的不足，正是國有企業的獨到優勢。

交通部所屬香港招商局集團就是一個代表性案例。

創立于清朝末年的輪船招商局，是由李鴻章督辦的官股为大股东的合營企業。自創立之日起，招商局協助國家發展近代運輸，引進西方先進的工業技術和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立下大功。後來清朝滅亡，民國創立，再軍閥混戰，日本侵華，國共內戰，直至共和國成立，招商局始終沒有改變其國有的性質。雖然 1949 年後一部分退到香港發展成爲今天的香港招商局集團（另一部分跟隨蔣介石去了臺灣，成爲後來的陽明海運集團），但在幫助內地購買緊缺物資，協助內地發展方面，招商局繼續貢獻良多。1980 年深

[1] 鋼鐵業就是個例子，國家 2008 年命令武鋼防城港項目和寶鋼湛江項目這兩個極大優化國家鋼鐵產能布局，而且技術非常先進的優質國有鋼鐵項目停工，但却同時放行高污染低技術民企鋼鐵項目上馬，放行了四億噸的產能，其中以民企爲主。直到 2012 年鋼鐵業放緩，發改委才放開上述兩個項目在日益殘酷的市場上來優化鋼鐵產能布局。如果當時武鋼項目能够順利完成投産，則後來就不會出現亏損而被迫和寶鋼合幷的命運。從鋼鐵業可以看出，國家發改委爲支持民企發展已經完全不在乎中國的鋼鐵產業布局是否合理，技術是否先進。這也說明，先富起來的人是如何用他們借助政策妖風積累的財富來左右和竊取公權力。這部分內容摘自董玉振的博客文章《大字報：就華北霧霾和鋼鐵業布局問責國家發改委》（見博客 blog.sina.com.cn）。該文的和諧版被《財經》雜志 2015 年第 14 期發表了專家稿，標題爲《鋼鐵業病態布局之禍》。



圳經濟特區創立，國家急需改革開放的經驗探索。國內企業普遍缺乏這方面的經驗，隸屬于國家交通部的香港招商局集團受命于國家需要，投資創辦蛇口工業區。因爲是國企，所以在政治上也可以大膽探索，爲深圳經濟特區快速成功和積累改革開放經驗立下不朽的功勛。今天，招商局繼續在世界各地投資基礎設施，不論到哪裏，投資什麼，這些投資都會是中國全體國民的財富。招商局與斯裏蘭卡政府簽訂的合作協議中，有一塊屬于招商局的 99 年地契的土地，事實上代表中國政府以商業模式在外國的土地上運作屬于中國國民的財富。在蛇口工業區建立初期，招商局還投資了中集集團，後者爲中國海洋工程産業發展貢獻卓著。

如果招商局是私人企業，上述所有這些投資活動還可以想像嗎？1980 年，香港、臺灣和海外私人企業如此大規模投資內地的一家也沒有，也不可能。霍英東在廣州投資白天鵝酒店，泰國正大集團在深圳投資一個工廠已經讓中國政府感恩戴德。只有招商局這樣的國企，在任何時候都可以將國家需要置于核心位置，隨時厲行必要的國家使命——無論是改革開放還是“一帶一路”。

國有企業在保留國民財富和國家復興的火種與基因方面，有著不可替代的優勢。

一些民企如萬達集團大量對外投資時，那些海外投資項目與中國有多大關係？如果王健林和主要大股東都移民海外，這些投資與中國已經沒有了關係。民企在投資時，對于公共利益的兼顧上，經常是放在次要位置。就拿萬達來說，管理層很有能力，它確實賺取巨額財富，但在各地拿地時的强勢作風，肆意要求變更城市用地規劃，只爲了自身的商業利益，而完全不顧作爲大企業

的社會責任。以長沙萬達廣場爲例：萬達廣場所處五一路口，背靠五一商圈，面向湘江和橘子洲，從區位價值、城市天際綫及臨江景觀考慮，這一帶都是發展高層酒店和高檔辦公樓的合適地塊，但長沙市政府爲吸引萬達，只好同意萬達的要求，將該地塊改爲住宅用地，對這一關鍵節點位置的城市形象造成破壞。但萬達才不管城市形象如何，反正改爲高層住宅用地而爲公司帶來巨額“快錢”目的已經達到。在萬達廣場、辦公樓和酒店建成後沒幾年，萬達就在賺足了長沙的錢後將這些賣掉。這樣的企業真是中國需要的嗎？對國民的利益又在哪裏？“先富帶後富”如何體現的？大連市西崗區將區屬國企改制給王健林等，西崗百姓得到什麼好處？所有這些問題，給出了一個顯而易見的疑問：改制到底爲了什麼，目的是否達到，還是事與願違？

當然，筆者無意否定王健林等萬達高管的經營水平，但能力與責任幷不一定同時存在，在不顧責任的情況下，能力只會帶來更大的破壞力。萬達是個很典型的案例，就是國企通過改制變成民企，國家改制的目的是這個改制後的民企能够先富帶後富，爲國家和社會均富做出更大貢獻；但改制後的民企很快把自己是如何來的，以及改制過程中賦予的道義責任忘得一乾二淨，然後以完全市場化和利益最大化來决策，甚至爲了商業利益不惜犧牲公共利益，原有的道義責任完全不復存在。相反，大量以國企底子做大的民企以這個企業爲依托，變成資本“大力士”，借助于他們本來在官場的厚實資源條件，開始通過影響媒體和政府决策，更大規模影響社會輿論和蠶食社會公共利益，甚至債務和污染留在國內，轉移資産至海外。他們的行爲給那些愚蠢的搞改制的官員和經濟學家一個響亮的耳光，幷將這些所謂改革派官員和經濟學家牢牢地釘在歷史的耻辱柱上。

當然，民營企業海外投資是必然趨勢，這方面也是他們的權力，只要不是把債務和污染留下，隨便去哪裏都是他們的自由。如果他們能從國外銀行搞到錢去國外投資，那是值得喝彩的。英國對外投資長期在全球居于高位，這絲毫無助于扭轉英國自身的衰退，最後只是換得可能已經移居海外的那些投資人財富增長。友邦保險創立于上海，但後來它成爲一家美國公司；匯豐銀行創立于上海，後來成爲以英國殖民地下的香港爲總部的銀行，在獲得香港發鈔權的情況下，1997 年前它又將總部遷往倫敦。你指望這樣的企業來肩負起一個國家穩定經濟和金融秩序的責任？而 1872 年同樣創立于上海的輪船招商局，則成爲現在的香港招商局集團和臺灣陽明海運，爲兩岸三地的發展持續做出積極的貢獻。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那些不分青紅皂白將優秀國企改制和“混合”的領導人，他們的魯莽、愚蠢和輕率，早晚受到歷史的評判，從理論上，還是道義上，甚至國家長遠利益上，都是說不過去的。政治家的短見永遠是國家最大的危害之所在。至于國內那些大談改制和混合所有制的經濟學家們，我承認你們是西方經濟學的優秀學生，但在我看來，你們屬于戰略層面的白痴，如果你們不是收受海外基金贊助而別有用心的話。

至于國內一些整天爲國企改制和私有化搖旗吶喊的媒體，笔者實在不明白，你們到底能從中得到多大的好處而喊叫的如此賣力。爲某些權勢階級和既得利益集團去摧毀自己子孫後代的和諧生存環境，算得上是中國媒體人和知識分子最無聊的一種嗜好。

如果說共產黨當年沒收官僚資本是一場革命，那麼國企改制則是逆操作，將公共資產强制私有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實際上是改革旗號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向資本主義經濟基礎漸進式、隱

蔽式過渡的公私合營，是 1949 年建國後私人企業社會主義改造公私合營的逆操作，是徹底葬送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基礎的關鍵一步。中共中央如果不立即喊停，那就必須回答一個問題：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下一步到底是社會主義中級階段，還是徹底退回資本主義階段。如果是後者，國企改制將實際上成爲動搖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一場沒有硝烟的“政變”，而不是什麽偉大的“改革”。那毛澤東晚年所擔心的真的變成了現實，無數革命先烈的血真的白流了。1949 年後又何必搞社會主義改造呢？毛澤東時代一代國人在共産黨領導下煥發主人翁精神而無私奉獻換來的産業基礎，最後徹底葬送，改革開放這幾代領導人將永遠無法洗脱推動國有資産流失和社會倒退的歷史罪責。

强制國企私有化，到混合所有制，下一步可能就是徹底私有化國有資産，這種“溫水煮青蛙”的步驟怎麽看都和西方國家及國際貨幣基金會兜售的理念吻合，這僅僅是巧合，還是中央高層出現了西方的代理人，還是中央高層領導人在精神上成爲西方的奴僕？這是值得深思的疑點。

下一步就是由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了！！

八、如何看待私人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1949 年新中國建國後，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務之一是對私營經濟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其方式是首先通過公私合營，逐步過渡到完全的公有化。在這一過程中，民族工商業者受到應有的尊重，

在合營企業裏享受著管理權和很高的薪金待遇，甚至有些資本家在離開原來的企業進入政府部門擔任要職後，仍享有比同等級別的官員遠遠高出的薪金待遇。正因爲初期公私合營階段的謹慎和務實，使得資本家在接受新政權的管理方面，困難較少，有所謂“敲鑼打鼓進入社會主義”。直到“文革”爆發，資本家的合法權益（也包括不合法權益）被制止，公私合營經濟被完全公有化。

今天重新來看待這一事件，不可否定，對待資本家和私人資產的粗暴手法是不恰當的。畢竟，中國民族工商業者的大多數是愛國敬業的經營者，爲中國上個世紀前半葉民族工商業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但我們，尤其是那些資本家及其後代，是否應因此指責毛澤東呢?

歷史的進程幷非直綫條的。二十世紀最重大的政治事件莫過于社會主義國家的大量出現，使人類似乎看到了解决資本主義社會一系列非人道、不公平現象的道路選擇。人類顯然把一種全新的生存形態的産生和規劃看得過于簡單了。在私人經濟向社會主義制度下的過渡，和如何對待資本家這個課題上，在世界所有社會主義國家中，沒有一個處理的完美，更談不上絕對公平。相比較而言，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的私營經濟改造，雖然有對資本家的不公平之處，但却是所有社會主義國家中手段最柔和，也相對較具有合理性的一個，至少在“文革”之前是這樣。而蘇維埃俄國則對資本家不是進行改造，而是一殺了之。

雖然今天私營經濟受到鼓勵和保護，但今人沒必要，也不應該因此而對過去否定私營經濟的歷史後悔或指責，即使歷史讓中國百姓重新選擇，在 1949 年的情況下，在毛澤東和蔣介石之間，在國民黨和共産黨之間，在公有制和私有制之間，中國人民會選擇誰呢? 這是中國歷史發展中的一次不可能完美的試驗。對那些

曾爲地方工商業發展做出貢獻，後被沒收財產的資本家，後人只能留有一份感謝，這是面對過去這段複雜歷史時，不得不有的宿命情節。畢竟，完全憑靠私營經濟，中國在毛澤東時期的重工業和軍事工業成就是不可能取得的；因此，從國家發展的整體得失來看，中國人選擇社會主義道路，是在 1949 年的當時背景下相對較爲有利的選擇；雖然社會主義道路到底該怎麼走，至今還在“摸著石頭過河”。

土地改革過程中被沒收的土地和被批鬥的地主，也有不少人是樂善好施的；但沒有這場帶有血腥味的土改，中國土地的高度集中就無法根治，將使占人口大多數的廣大貧民失去生活的保障，中國農村生產力的解放和對多數人的人道主義就無從談起。臺灣在 1950 年後開始的，以官僚資產和沒收日資股份換取臺灣地主的土地，然後分配給廣大貧民的做法固然溫和，但這種做法在貧窮而遼闊的大陸則根本行不通。“革命”則成了唯一可行的選擇，那些樂善好施、遵紀守法的地主和資本家部分遭受不公平對待，也就在所難免了。

在社會大轉型時，要確保所有利益集團之間的完全公正，是不太容易做到的。關鍵是，社會的大多數人的利益和國家的整體利益，是否在轉型過程中趨向更好。毫無疑問，1949 年後大陸的社會發展成果給出了相對滿意的答案。以今天的政治環境，去評價昨天的道路選擇，并不是客觀理智的歷史觀。

如果那些資本家和地主的後代純粹基于自己家族的損失而對毛澤東及其時代予以否定，雖然在情感上可以理解，但也暴露了他們的自私和狹隘。

當然，後來國企改制又把這些企業改給另一個共産黨家族，上節已談到，這沒有任何正當性可言！對革命先烈極具諷刺性！

九、如何看待同時期日本的崛起

反毛和反共人士常用中國和日本戰後的不同發展結果，來說明毛澤東時代經濟的失敗；理由是：五十年代中、日兩國國民生產總值相當，至七十年代末期，日本經濟已相當于中國的三倍。

即使沒有任何政治好惡傾向的人士，似乎對此也給予認可。社會各界人士，無論是日本人還是它國人，無論是政治家、經濟學家及廣大民衆，更异口同聲地將日本的戰後崛起，視之爲“奇迹”，至今無人對此提出質疑。

日本戰後的迅速崛起果真是奇迹嗎，還是發展的正常結果？

雖然匯率的確定和合理性存在不同的看法，可以肯定的是，日本經過同樣三十年的發展而成長爲世界經濟强國，而中國仍停留在發展中國家的層次，這是不爭的事實。如何看待這一發展結果上的差距呢？其實，這不僅僅是爲毛澤東時代和中共領導能力辯護的問題，實際上也是一個如何看待日本發展國策的問題。這也將影響到政治家們在制定國家發展政策時的戰略考量。

二戰以日本的戰敗而結束。在整個戰爭過程中，日本的城市和工業設施部份被摧毀，說日本部分城市成爲“廢墟”幷不算過分誇張。但要說日本的大部分社會財富因此而化爲烏有，則不切合實際。至少有下列設施和資源還很好的保留了下來：幾乎所有的交通道路設施，包括公路、鐵路、大部分橋梁和港口（港口上的房屋建築相對于鋼筋混凝土結構的碼頭本身而言，其價值微不

足道），城市自來水和通訊、輸電系統的地下管綫，廣大中小城市和農村。更重要也是最具根本意義的一筆財富完好地保留下來，那就是“人”。日本高素質的勞動力隊伍，包括工程師、教授、現代工商業經營管理人才以及近百分之百的全民識字率等，爲日本的戰後崛起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二戰結束前，日本的現代工業已具有世界一流水平，具有建造飛機和航空母艦的技術實力。這在亞洲國家是獨一無二的，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

因此，日本的重新崛起正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日本所需要的“東風”，包括將高素質的勞動力轉化爲物質生產能力所必須的資金，以及推動工業發展所必須的市場。日本是幸運的，美國的資金援助、美國駐軍所提供的就地采購資金、朝鮮戰爭提供的市場機會、美國市場的低關稅進口優惠、降低至零的國防開支等，無不爲日本的崛起創造了完整的條件和環境。日本對美國成熟技術的模仿和美國對民用技術轉讓的寬鬆，自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之後蓬勃發展的民族主義，以及日本戰敗後的“哀兵”之勢，也爲日本的崛起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因此，日本在戰後的崛起，根本不是什麽奇迹，而是事物發展的正常結果。

做個不太恰當的比喻：如果一場大地震將東亞“四小龍”的工商業設施摧毀，但絕大多數工程師、管理人才等社會精英力量和具有一定教育素質的平民得以幸存。這時，如果有一筆龐大的國際資金援助和世界主要市場的准入優惠，那麽，該“四小龍”將會在短時間內重新崛起。但如果同樣的一筆資金和優惠給非洲的埃塞俄比亞和索馬裏，即使多給他們三十年的時間，他們也難于達到四小龍的發展水平。

1949 年後，中國除了廉潔的領導集體，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

人民的積極奉獻精神，上述日本所具有的有利條件，中國一樣也不具備（除中蘇蜜月帶來的有限技術援助）；而同時代的中國，除沿海城市和內陸中心城市有一些輕工業，沒有值得一提的現代工業，國家的基礎設施也不堪一顧，很多縣甚至缺乏公路和基本的現代交通工具，國家的教育體系和人民的整體文化素質極爲低下。八年抗戰和三年內戰，使本來就薄弱的基礎設施遭受巨大破壞。尤其糟糕的是，中國惡劣的國際環境，使得國家不得不拿出有限資源的不小部分支持龐大的軍事工業和國防力量。國內惡劣的自然環境，也使得國家在毛澤東時期從來沒有停止過大規模的水利建設。

另外，中日兩國勞動力素質的巨大差异，也决定了在相同的資金投入的情況下，經濟發展的素質和運行效益也必然存在巨大差別。

因此，將中日同時代的經濟發展相提幷論是不客觀的，因根本就不具備任何的可比性。如果非要拿中國和其它國家進行對比的話，那麽，印度可能是唯一具備相似起點而國情相近的國家；而在毛澤東逝世時，中國的各項經濟和社會發展指標均已全面超越印度。

至于日本戰前所確定的優勢和今天日本的工業技術水平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建基于日本在過去一百多年中對它國，尤其是對中國的掠奪。當然，中國過去百年的艱難困境和今日的巨大差距，除朝代更迭、制度落後和傳統社會的轉型等因素外，日本對中國近代化進程的巨大破壞是不應該否定的。

對中日兩國實力對比具有深遠影響的當數甲午賠款。

甲午戰爭是日本蓄意挑起的，但中國的戰敗和《馬關條約》簽訂的戰爭賠款，極大地削弱了中國的財政能力，而同時則極大

地提高了日本的國力，幾乎在一夜之間，使日本解决了近代化發展所面臨的問題，日本也迅速成了暴發戶。

僅拿《馬關條約》規定的賠款來說，中國向日本賠款 2 億兩白銀，加上贖回遼東半島的費用 3000 萬兩，威海日軍駐兵費用 150 萬兩（真是無耻到了極至），共 23150 萬兩白銀，折合當時的日圓爲 3.5 億元，相當于日本全國年財政收入（8000 萬日圓）的 4 倍多。除此以外，日本還在中國掠奪了相當于一億日圓的大量戰利品。日本面對這突如其來的滾滾財源，“無論政府和私人朝野頓覺無比富裕”（曾任日本外務卿井上馨語）。日本用這筆錢的大多數（約 3 億日圓），建立了以軍事工業爲核心的産業群；其中著名的八幡制鐵所僅用了不到 60 萬日圓，打下了日本鋼鐵工業的基礎。由此可以想像，那筆巨大的資金幫助日本建立了什麽樣的龐大工業基礎。日本一步跨越了西方國家要一、二百年才能完成的資本原始積累，也爲日本幾十年後成爲世界經濟軍事强國，做了最好的前期準備。

這筆資金也協助日本建立了金本位的貨幣制度，把日本納入國際貨幣金融體系。這筆款項還推動了日本全民教育，爲建立高素質的勞動力隊伍打下了基礎。

日本在戰前確立的優勢在戰後迅速恢復，幷在資源爭奪方面長期居于有利地位。所以，當今天的日本人不承認他們應對先輩的孽債負責時，實際上是對歷史的漠視，和對民族發展漸進性和承繼性的無知。

如果今天中國政府突然得到從天而降的 5 萬億元資金（中國年財政收入的 4 倍），那麽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一系列問題將立即得到解决，中國的潜力也會得到迅速而强大地爆發出來。

爲了償還這筆賠款，清政府先後向俄、法、英、德的銀團完

成三筆貸款達 3.09 億兩白銀，并在還清本息前，海關又外國人控制。中國政府爲此支付的本息達 6 億兩白銀。面對這筆龐大的支付，中國近代化的步伐已很難再有前進的能量。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歐洲列强無暇東顧之際，中國民族經濟的發展才算有了喘息的機會，并迎來了持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長。雖然中國的經濟發展并不完善，區域布局也過分集中在沿海的幾個中心城市，但國家經濟在內陸地區軍閥混戰的硝烟中已有了起飛的徵兆。非常悲哀的是，在中華有望中興的時刻，日本再次發動侵華戰爭，阻止了中國經濟的强大勢頭，使得中國的崛起再次夭折在日本人的手裏，爲民族復興帶來的巨大損失，無論怎樣誇張也不算過分。

上面這段文字似乎超越了本書的主題，但還是不厭其煩地回顧這段痛心的歷史。對于中國人，這段歷史必需記取并認識它對中國發展的巨大遲滯作用；對于日本人，必須明白他們對中國的永久性虧欠。

如果向日本索賠的話，日本對中國的欠款本息將在 10 萬億美元以上，那麼日本將立即變成一個窮光蛋。在過去的二十多年中，日本對華貸款本息幾百億美元，還經常大放厥詞。考慮到德國對猶太人和以色列的賠償，中國政府完全有理由拒絕償還這筆貸款。當然日本政府能主動本著中日友好放弃這筆貸款的話，多少可以爲先人的孽債作象徵性的補償，也爲後世日本人帶來少許的體面。

八年抗戰，再經三年內戰，中國再次淪爲一窮二白。而蔣介石在大陸的最後兩年，大印鈔票貨幣，還預先徵稅，一口氣預征到 1985 年（真够無耻的）；更通過金圓券將大陸的黃金搜刮一空。

共產黨手裏更是空空如也，以至于 1948 年 11 月 26 日人民幣開始發行時，沒有黃金作爲貨幣基礎。發行當天，《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讓對貨幣的金本位機制有所瞭解的人笑不出來的可笑社論，社論宣布：人民幣不以黃金爲基礎，因爲“我們的人民不喜歡黃金”。

蔣介石將搜刮來的黃金運到臺灣後甚至舉辦展覽，讓臺灣人民領略他老人家僅有的豐碩戰果。49 年前，一些資本家將資産移往香港、臺灣和海外，更削薄了大陸本來就薄弱的家底。

司徒雷登離開中國的時候搖頭嘆息：很難想像誰能讓這個國家的人民擺脫貧窮。

不難想像，1949 年毛澤東接手的是個什麽樣的爛攤子。在此後短短一、二十年裏，當飛機上天、巨輪下水、核彈爆炸、衛星遨游、完整工業體系確立、公費醫療、義務教育、江河得到治理、逃荒要飯基本消失、和美法蘇印等所有大國交手并取勝、國際威望空前提高……，并在航天、航空、軍工、體育、基礎科學等領域把日本拋在後面。此時此刻，天下任何炎黃子孫都不難想像，毛澤東及其領導下的大陸人民爲中華民族的進步做出了什麽樣的偉大貢獻！

在世界主要大國中，中國和日本是用最短的時間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日本是通過掠奪的手段來達到，而中國則是通過對“一盤散沙”的人民的有效組織，和愛國主義及勞動熱情的强力激勵來實現的。

而領導組織和激勵中國人民的核心人物，就是毛澤東。

十、小結

中國自一八四零年以來，山河殘破，國無寧日；只有在共産黨革命勝利後，中國才真正有了江山一統和發展經濟的良好內部環境。對于毛澤東和鄧小平這一代人來說，希望國家儘快强大起來本是可以理解的，犯一些拔苗助長的錯誤也不應給予過多的指責。畢竟他們也是出于良好心願，而非個人英雄主義作祟，換了別人也很可能犯類似的錯誤。總結歷史的目的應在吸取教訓，而非指責先賢。更不應以雙重標準，貶毛以揚鄧。

鄧小平的改革實際上是將毛澤東時代基于計劃的人本經濟轉化爲新時代的市場經濟，將重工業優先的産業政策轉向輕工業優先、出口導向和進口替代幷重的政策。這種轉化本身幷不存在進步或倒退的問題，只是選擇適合當時社會環境的經濟發展道路。鄧小平的對外開放也是將毛澤東時代没條件開放下的閉關自守，轉化爲外部條件許可情况下的打開國門。將改革開放稱之爲一場革命，是不客觀的，也有違歷史的辯證法。

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的改革事業是漸進式和借鑒式的改良運動。這也是爲什麽至今没有系統性的指導理論來規劃中國的未來，如果中共領袖們的隻言片語不包括在內的話。

如果要說中國的“革命事業”，其實從 1949 年，甚至更早就已經開始。1999 年 8 月 10 日建國 50 周年來臨前夕，《洛杉磯時報》發表了該報駐北京記者 Rone Tempest 的一篇報道，他寫道：“許多專家現在相信，到目前爲止中國得以如此迅速向前推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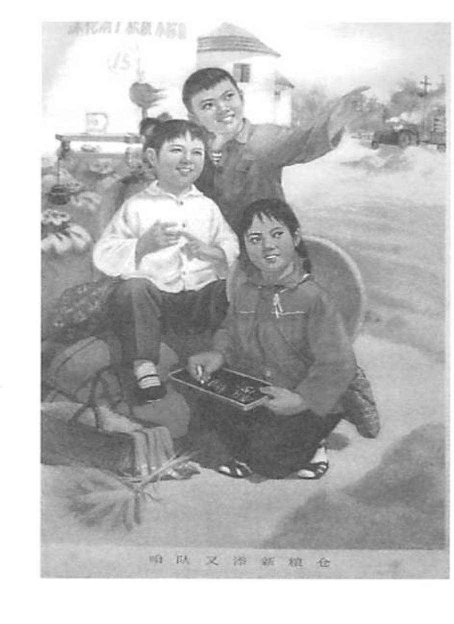
原因是部分得力于較早時更徹底的改革。人們只主要記得毛澤東時代 1960-1961 年大躍進失敗之後的饑荒和 1966-1976 年‘文革’的政治迫害。但是，特別是在 50 年代，中國却得利于土地的重新分配、普及義務教育、簡體字和保健與福利政策以及有助于恢復中國的精神和自尊的其它改革。雖然從今天來看問題要複雜得多，但是對宗教、迷信、秘密會社、三合會和宗派的鎮壓也幫助中國打破了盤踞地方上的貧窮”。哈佛大學經濟學家阿馬提亞·森（Amartya Sen）在比較中國和印度的發展狀況時稱：“中國對印度的相對優勢是其改革前奠基工作的產物，而不是其改革後重訂方向的結果。”

毛澤東的經濟幷非完美無缺，它是經濟高速發展過程中所不可避免的。但不應因此來否定毛澤東時代的經濟成就，進而證明改革的合理性。正如美國耶魯大學教授莫裏斯·邁斯納（Maurice Meisner）所說：“毛澤東時代遠非現在普遍傳聞中的所謂的經濟停滯時代，而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之一，與德國、日本和俄國等幾個現代工業舞臺上主要後起之秀的工業化過程中最劇烈的時期相比毫不遜色。……如果沒有毛澤東時代發生的工業革命，與鄧小平一同出名的經濟改革家們，將找不到他們要改革的對象”[4]。



中国人民有志气。图中右边两位为钱学森和陈永贵

第二章 計劃生育與農民[1]



將計劃生育與農民放在一起討論，概因中國的計劃生育問題歸根到底是農民問題。即使在五十年代，大多數城市家庭的孩子數量也不超過兩個。在討論經濟問題時，沒有太多涉及農業，比較毛、鄧對農業的貢獻不能回避計劃生育對農村經濟的影響。

一、毛澤東時代計劃生育的不可行性

毛澤東無視馬寅初的《人口論》，不搞計劃生育，導致今日沉重的人口負擔；即：錯批一個馬寅初，中國多生幾億人。海內外人士在批評毛澤東的這一錯誤上，始終保持著驚人的一致。

[1] 本章內容在第二版增加了第六和七節。其它部分基本沒變。雖然中國今日的三農問題已經與該部分最初寫作時的 1998 年和第一版写作時的 2002 年有很大不同，但當時的歷史狀況是觀察政府在“三農”和計劃生育問題不可忽略的背景要素。實際上，過去十多年城市化過程中農民繼續是受剝削的弱勢群體。

《人口論》無疑是真理，當年毛澤東曾肯定馬寅初的理論，幷支持馬在國務會議上闡述他的《人口論》思想。但真理轉化爲科學的實踐幷非無條件的。首先是現實的需要及該需要的迫切程度；其次是可行性，即操作的難易程度。如果現實迫切需要，操作有難度但非不可操作，或現實有需要但不迫切，而操作容易。這兩種情况下，雖有爭議，但真理具備轉化爲實踐的條件。但如果現實需要不迫切，且操作極其困難，再完善的理論也失去了實踐動力。毛澤東時代搞計劃生育，即屬于後一類情况。

首先，在五，六十年代，沒有控制人口的緊迫性。解放初期，人是中國的唯一資源，無論在戰場上，還是在人本經濟的建設中，人的因素被發揮的淋漓盡致。在廣大農村地區的自然經濟狀態下，養一個孩子的負擔幷不比養一頭小猪重多少。因此，沒有立即控制人口增長的迫切需要。

在"文革"期間，村莊墻壁上寫著"計劃生育，利國利民"的大標語。它除了讓我們這些上學的孩子們練習這幾個漢字外，幷沒有任何的用處。鄧小平主政後極力推動計劃生育，加大宣傳力度，但在農村收效甚微。對廣大農民來講，他們的晚年除了依賴子女外別無選擇。如果說城市年邁父母只需子女生活上的照顧，退休金或養老保險能大幅度减輕對子女經濟上的依賴，那麼農村子女則將承受照顧老人生活和經濟上的雙重負擔。"一胎化"雖有可以理解的無奈，但對農民則是極不公正的。

面對農村基層計劃生育工作的困難和人口快速增長的嚴酷現實，各級政府面臨了來自上級的巨大壓力。自八三年起在中國廣大農村掀起了异常瘋狂的計劃生育風暴，對中國農民的生活和農村經濟發展造成了巨大的影響。這一影響被社會學家完全忽略。

這場風暴是以高額罰款、拘留等手段，對付超生的農民。聯產承包責任制讓農民剛嘗到甜頭，高額的計劃生育罰款又將其全部拿去。就拿作者家鄉來說，當時多生一個孩子被罰二、三千元，約相當于當時一個家庭年收入的二到三倍，單一個三百人的小村莊一年的罰款額就高達四、五萬元人民幣，連續多年保持這一水平。對大多數付不起的家庭，除要求來年補足外，還被牽走羊、猪等家禽，拿走農具等；甚至一度推出個連續罰款十三年，孩子不得上戶口的殘酷政策（後來被取消）。每到檢查計劃生育季節，小村莊就陷入一片恐慌。老人們講“當年國民黨還鄉團也沒這樣壞過”。

由于罰款額由基層幹部確定，罰款也無收據，而國家政策中也無此項明文規定，所有罰款全部被貪污。如果說價格雙軌制開啓了城市特權階層大肆劫掠社會財富大門的話，農村幹部的大面積鯨吞農民財富則始于計劃生育罰款。毫不誇張地說，農村年輕夫妻如生第二胎，就必須爲基層幹部家白乾三年活。

中國的農民是最易知足，也最通情達理的群體，即使在他們被罰得苦不堪言時，您聽他們怎麼說：“計劃生育不管也不行，看咱村上的田地快被房子占完了，以後沒地種還吃什麼”。如果鄧小平能象毛澤東那樣善于做思想工作，幷將罰款用于公益事業，農民的抵觸情緒也不會那麼强烈。計劃生育對農村經濟和社會關係的破壞也不會那麼巨大。

在毛澤東時代，不要說計劃生育政策執行過程中的種種强制手段被廣泛應用，即使在北京郊區發生幾起這樣的事件，也足以讓毛澤東對整個計劃生育政策喊停。毛澤東那一代領袖們對農民的感情太深了，虧欠農民的也太多了。他們很清楚，是農民的巨大犧牲鋪就了革命成功的道路。當農民終于盼來了解放，成了土

地的主人時，却因多生個孩子而被他們爲之犧牲的政權牽走牲畜，罰得傾家蕩産，甚至四處躲避；毛澤東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這樣的事實。他寧願選擇和人民一起挨餓。

如果當時實行每對夫婦只生兩個的話，將面臨一個嚴酷的問題，那就是誰還願讓自己的孩子去當兵。這對處于充滿敵意的國際環境中的中國來說，是不可能不予考慮的。

尤其是核武器的産生和可能應用，對中國第一代領導人來說是不能忽略的。作爲一位杰出的戰略家，毛澤東不會天真地幻想敵人不會對中國使用核武器；他在嘲笑原子彈是“紙老虎”的同時，加緊建造自己的“紙老虎”。五七年，在莫斯科十月革命勝利四十周年慶典上, 毛澤東針對美國的核威脅發出豪言壯語: “極而言之，死掉一半人，還有一半人，帝國主義打平了，全世界社會主義化了，再過多少年，又會有 27 億，一定還要多”。不少人對毛澤東的發言大加貶斥，批評毛澤東對人類生命的漠視。筆者也不認爲毛澤東是在開玩笑，更不會膚淺地認爲他不珍惜生命，作爲中國的元首，他應該認真地考慮過核戰爭的可能性，幷有一定的心理準備，幷以老莊思想無懼地面對隨時可能來臨的核戰爭。從後來披露的資料顯示，1969 年蘇聯對中國的原子攻擊已經是箭在弦上，才使得中國不得不“深挖洞，廣積糧”，幷加速三綫建設的速度和規模，我讀小學時村莊的墻上還時不時貼上如何防核武器的布告。美國曾五次考慮對中國動用核武器。毛澤東去世後，中共第二代領導人說什麼“毛澤東錯誤地估計了戰爭的形勢”等。沒有爆發原子戰爭和第三次世界大戰，幷不能說明當初的準備是錯誤的，相反，抱著僥幸心理而不做充分的準備才是愚蠢和不負責任的。面對原子戰爭時代，避免亡種滅族的最有效、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多生孩子。

徵兵問題將很快成爲中國的一個頭疼問題。未來的中國會有打大仗的經濟實力，但支撐大規模戰爭的社會基礎將變得异常脆弱。（關于計劃生育政策下的軍隊建設，請參考第十章第五節）

直到 70 年代中美關係改善，中國的周邊安全環境也相應得到改善，蘇聯侵略中國的可能性也同時降低；“計劃生育”才重新走上檯面。1975 年底，毛澤東在審查國民經濟發展計劃報告時提到：看來人口非控制不可了。但是，無論是毛澤東還是周恩來的身體狀況决定了，這時已很難啓動一些涉及全局的重大政策，留下了永久性的遺憾。只有留給後來這些只懂得罰款的政治人物去胡亂折騰了。

合作社里装电灯（1958）

很顯然，在毛澤東時代，人口控制不具備任何的緊迫性和必要性，在實踐上具有相當大的難度，甚至可以說根本不可行。

二、農業改革的尷尬

計劃生育罰款開闊了基層幹部的胃口，在計劃生育罰款開始不久，農村亂收費的浪潮又起，中央政府制定的政策性收費就高達三十多項。名目繁多的收費已使“幹部進村”和“鬼子進村”具有同樣的含義。農民集體砸壞鄉鎮政府，趕走幹部，乃至幹部嚇得不敢回家的事在一九九三年之前已時有所聞。作者每當聽到這樣的消息難免“幸灾樂禍”，“幸”的是它讓我看到了農民的

希望，對毛澤東的“造反有理”更有了深入的認識。老實且富忍耐力的中國農民只要過得去，就不會到政府門前示威，也就沒人注意他們的遭遇。他們只能以農民式的幽默表達不滿，如“毛主席萬歲，鄧小平萬稅”；江澤民主政後，則有“毛宰東（家），江宰（人）民”（在江北一些地區，“宰”有時和“澤”讀同音）等。農民的積極性確實被調動起來，但他們不積極行嗎？否則，他們不可能有餘錢購買下一季的化肥等生產資料。“文革”期間，農民每天的工作時間約爲十至十二小時，現在至少會在十四個小時以上。當鄧小平的改革讓他們獲取大量收益時，政府和貪官的手又將其全部拿去，留下幾枚可憐的硬幣。農民的節儉會讓他們幾年後建起磚房，買上電視，但他們對此幷不領情。他們說“如果按當年毛主席的方法，咱們現在也會蓋新房，買電視，幹得也不會這樣累”。農民的心中自有一公平秤。

作者開始讀博士時，對家鄉農民來說無疑是學識“淵博”的。每次放假探親，鄉親們總焦急地問：“政府還讓不讓咱們活”，“共產黨還是毛主席那時的共産黨嗎”，“以後這農業怎麼搞法”。他們用微弱的聲音呼籲“政府能讓我們歇三年，也能攢點生意本不”。很遺憾，我無法給他們一絲安慰。由一群不懂農業，對農民沒有深厚感情的官員制定的農業政策，是不會給農民機會的。政府在城市改革方面謹小慎微，但在農業問題上則輕易使出十八套劇本，雖然劇本的內容糟糕透頂。

改革開放之初，沿海農民大力發展鄉鎮企業，乘上經濟發展的頭班快車。當內陸地區農民商品意識覺醒，準備搭上後一班快車時，計劃生育罰款和無窮的收費已無情地剝奪了他們買票的權力。也許，內陸地區的農民們已永久地錯過了本來存在的發展機

會，因創業的成本越來越遠地偏離他們的能力。

直到一九九三年，中國政府才不好意思地取消了對農民的二十九項收費（真够無耻的）。這是涉及農民生活每個細節的收費。其中有些收費只需到農家小院站上五分鐘就能發現它的荒謬。之後，筆者曾上書國務院，希望政府考慮將糧、棉、油基本作物有關的農業稅全免，經濟作物和農副產品稅收削減。這一建議顯然未被考慮。農業稅收在國家的整體稅收中所占比例很小，經開源節流，縮減基層政權的人員編制，不會對財政造成太大影響。和幹部吃喝開支相比根本微不足道。但這確是給農民的一點安慰和希望。[1]

如果您到廣大內陸地區的縣城走一遭，會見到漂亮的路燈，新修的街道，大型的商廈。可當您得知這兒沒有一家工廠賺錢的時候，就會明白是誰在支撑這個城市的運轉。給農民一份希望，也等于給城市一份希望，給國家一份希望。國家對每個城市人口在市政、就業方面要大量投資，國家給農民的僅是一塊本來就屬于他們的土地。

直到進入了新的世紀，面對中國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和農村消費不振對經濟發展的制約，中國政府才認真具體地對待農民收入停滯不前，甚至實際收入減少的問題。但面對异常龐大的基層幹部隊伍，到底能取得什麼樣的成效呢？只有拭目以待吧。

固然，農村改革讓中國有能力養活衆多的人口；從國家的角度來看農業政策，顯然是成功的。但如果站在生產者的角度，以“投入產出比”這一慣用的方法來評價的話，考慮勞動量增加和

[1] 直到 2004 年（本書第一版上市一年後）第四代領導集體上臺，才取消了農業稅等多項稅種。同時取消基礎教育學費，農民負擔才得以減輕，但這時，城市工資快速提高，農業已經吸引不了年輕人了。

生產資料價格的大幅度上漲及子女教育費用（屬勞動力再生產活動）增加等因素，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的農業政策如果不算一場徹底失敗的話，至少也乏善可陳。

農業改革能迅速取得成功與毛澤東時期打下的基礎密不可分。70 年代初引進的 13 套大化肥設備至 1979 年建成投產，極大地改善了農業用肥結構和肥效。利用農閑時間把全部的農民組織起來，完成了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後的農田水利基本建設，開挖了密布的河網，大小水庫和小水電的建設基本完成，“文革”十年排灌動力機械增長 4.9 倍，旱澇保收的物質基礎建成。千百年來靠自然形成的農村羊腸小道被筆直寬闊的道路網所取代（這同樣是空前絕後的成就。改革開放後很少再修路挖河），極大地方便了農民生活和農業機械的推廣。農業現代化裝備水平也有較大提高，1975 年拖拉機和手扶拖拉機的產量分別相當于 1965 年的 6.7 倍和 66 倍（中國的拖拉機既是農村最佳運輸工具，又是收割、耕地、灌溉、打場的設備）。雜交水稻等優良品種開始推廣。農村基礎教育的普及直接推動了農業新技術的應用。遍布各省、各專區的各類農業大、中專院校也在毛澤東時期建立起來。所有這些成就爲農業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聯產承包責任制”已經發揮到極限，當農民走向城市，或試圖發展其它產業時，農業生產已變成了令人關注的問題。是否應重新走農業合作化、集體化甚至企業化道路，已再次引起專家的興趣。畢竟，靠那人均一畝多土地的單幹，是不可能有農業的現代化的。生產成本的居高不下也制約了農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三、“社隊工廠”與“鄉鎮企業”

人們也許會拿鄉鎮企業說明改革政策的成功。成功的鄉鎮企業在廣大內陸農村幷不普遍。實際上，在“文革”期間，中國農村大隊及公社一級的“社隊工廠”已有一定的規模，但農村改革後，這些企業像集體農業機械一樣被廢弃、鯨吞。像作者家鄉所在大隊在“文革”期間建起了塑料袋廠和肥皂廠，購置了用于運輸和農耕的拖拉機，但現在一家企業也沒有。江、浙一帶鄉鎮企業在改革開放後迅速崛起，與這之前所打下的基礎密不可分。尤其是毛澤東時代來自上海的知青，在江浙一帶鄉鎮企業的發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從薄一波的回憶文集中可知，在改革開放之初中央從來就沒想過鄉鎮企業這回事，中國農民的巨大創造力豐富了改革的思路[5]。當然，中央政府毫不猶豫地將其劃入自己的政績，似乎鄉鎮企業只有到了改革開放才出現一般。

毛澤東時期的社隊企業，爲農民帶來了最初的工業化概念，也爲社隊帶來了一筆可觀的收入，爲毛澤東時代農村學校的建設、衛生事業的發展、農業機械的采購提供了資金，也促進了公社所在地的城鎮化發展。但當今日的人們談論“文革”的劣迹時，從來沒人去注意發生在中國廣大農村的，這一具有革命性的進步。雖然在中國政府的統計資料裏難以查到有關的準確數據，但以筆者家鄉（在中國屬于相對較落後地區）的當時發展狀況，筆者可以肯定，農村大隊、公社及縣級工業在1976年已達到了驚

人的規模，使得從來沒見過工廠什麼樣的中國農民，近距離地感受了工業的運作。至于較發達地區的江浙一帶的地方工業規模，將更爲可觀，這爲後來這些地區的鄉鎮企業的大發展，作了多年的技術和人才上的準備。沒有當時的社隊企業的基礎，後來的鄉鎮企業和一些私人企業的崛起將是不可想像的。例如，浙江著名的私人企業家魯冠球和他的萬向集團，以汽車萬向節爲主導産品，幷銷往海內外。但是，魯冠球的萬向節工業的起點在哪裏呢？在 1969 年當地成立的“寧圍人民公社農機修理廠”。當時作爲打鐵匠的魯冠球和幾位農民，以公社投資的 4 千元資金（在當時這可不是小數目，那時一台 25 馬力中型拖拉機連同拖斗和耕犁的價格不到 4000 元，一個大學畢業生的月薪低于 50 元。到八十年代中，“萬元戶”還是巨富）成立這個廠，生産拖拉機用的萬向節。如果沒有這個廠，魯冠球個人絕對沒有能力拿出最初的這筆資金，進入一個全新的行業，當時的他也難以設計出生産萬向節的構思，這超越他當時的眼界。再者，在這個工廠裏，每個人抱著純樸的心態工作，沒有獎金，大家在爲集體做事。如果一開始就讓魯冠球自己搞到大筆錢去辦廠，員工是否還會不計酬勞的奉獻呢？可以說，這個原始的工廠給了魯冠球一個機會，讓他瞭解工業的運作和萬向節工業的市場特點。如果沒有這個廠，今日的萬向集團根本就不會出現，也沒人知道魯冠球是誰？

在中國像魯冠球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因此，當今日的魯冠球等私人企業家、成功的鄉鎮企業，和關心中國工業發展的人們在謳歌改革開放的偉大時，最好不要忘記毛澤東時代的基礎性和全域性的貢獻，對“文革”期間中國的實際發展，應該保持一份尊重和感激。魯冠球們和今日鄉鎮企業發達地區，實際上是毛澤東時期公有經濟發展的直接受惠者。他們在取得一定成就後有責


爸爸这段是这样写的（扫除文盲 作于1954）

任回饋社會。當然，對過去歷史的强調，絲毫不影響對當代杰出民營企業家個人能力的肯定。

這裏順便談一下改革開放後進行的一場基層行政區劃的改革：

在毛澤東時代，中國告別了舊有的鄉鎮和自然村的基層政權體系，確立了人民公社和生產隊黨政體系。固然，這一體系的確立，是毛澤東時代的農村集體化和人民公社化的產物。但到了後來，它本身已經沒有了成立初期的極“左”色彩，實際上和人民公社化前的鄉鎮政體已沒有太大的區別。而改革開放後，它和現在的鄉鎮黨政體系已具有同樣的職責和性質；雖挂了個“左”帽子，幷不影響改革的進行。但後來基于徹底否定毛澤東時代一切“左”的內容，人民公社黨政體系也隨之被解散，取而代之的是鄉鎮黨政體系（按五十年代初的鄉鎮區劃，有的稱鄉，有的叫鎮）。這項改革所造成的嚴重問題被中國學者和政府部門完全忽略。[1]

第一個問題是工商業的巨大損失和集體經濟的流失。

在毛澤東時代的人民公社，建立了大量的社隊企業。由于公社改鄉鎮在行政區劃上發生變化，隨之帶來産業歸屬的問題，伴隨著人員的流動（因原來的企業領導和技術人員是幹部編制），大量企業被關閉。這類企業對于發達地區來說，或被私人承包，或發展壯大，對當地經濟造成的不良後果較小；但對于廣大內陸地

---

[1]真是悲哀，涉及中國農村和農民利益的問題經常被社會學家和政府忽略。真不明白養那幫人幹什麽。養一群鷄還會下個蛋；可他們如果下“蛋”的話，經常是些“臭蛋”。中國的社會科學工作者有必要二次下鄉。讓他們通過電腦網絡可以瞭解城市，但無法瞭解農村基層。

區來說，這類企業則是當地工業化僅有的火種。一旦這些火種熄滅，對當地有限的工業資源幾乎是徹底地斷送。今天廣大內陸地區的就業不振，鄉鎮企業發展緩慢，與此難脫幹係。

第二個嚴重的問題是基層黨政人員總編制的膨脹。

公社改鄉鎮，基本是恢復解放初期原有的鄉鎮行政區劃，因此，這一改革導致鄉鎮政權單位增加了一半以上，後來有些太小的鄉鎮進行了合并，但筆者家鄉所在的山東菏澤地區所有縣的鄉鎮數量仍比原來的公社多。這爲今日龐大的基層黨政編制埋下了伏筆。這是中國農民負擔過重和教育經費缺乏的主要負擔來源。

第三是資金和土地上的浪費。

在這種分家的過程中進行了大量的土木建設，耗資巨大（不少鄉鎮是以大集鎮爲鄉鎮公所，但原來這裏沒有辦公室和家屬院，必須全部建新的）；而後來的合并又導致原來建設的房屋閑置，土地浪費，或不能充分利用。

可見，在毛後時代基于對毛澤東的否定，進行了不少不理智的行爲。這是令人痛心的。

四、政權的無情、無能與農民的新苦難

自改革開放以來，農民最感到滿意的時代是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最初幾年，約在 1986 年前；雖然計劃生育罰款對農民的收入造

成較大影響，但計劃生育政策本身的必要性畢竟能讓廣大農民理解，爲了多要個孩子，即使艱苦一點也在心理上能够接受。而同時，鄉鎮企業使得一些地區迅速富裕起來，城鄉差別在個別地區迅速縮小。雖然受惠的地區和人口是少數，但傳媒的大力宣傳推動，使得農民看到了發家的希望。因此在農民的心態上比較平和。隨著苛捐雜稅在 80 年代後期的迅速增加，官員貪污的表面化，學費的急劇提高，尤其是生產資料價格的成倍增長，農民收入（無論相對還是絕對收入）出現了大幅度的下滑，農民對改革的熱情降溫，精神和生活上的困苦也隨之來臨。

沒有爭取就難有獲得，而在對國家資源的爭取方面，農民哪是城市的對手！中國的政治家在面對輿論時不會意識到，農民對輿論的影響隨著中國傳媒業的改革和媒體從業人員的庸俗化，也越來越微弱。

只要想一下中國這樣一個農業大國的中央政府，竟然在九十年代初的兩年多時間內，沒有安排一位專責農業工作的副總理就能明白，在糧食供應問題不再威脅到政府的威望和生存時，農業和農民利益在中國新一代政治家心目中的分量，是多麼的微不足道。

中國農民收入的問題由來已久，八十年代生產資料價格放開後就已開始顯現，但直到今日才引起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當然，至今還僅僅是“重視”而已，何時能出“重拳”？！

朱熔基任總理後一再表示對解決農民收入問題的關注和急迫感，幷邀請著名經濟學家會診，這雖然晚了點，也多少令筆者欣慰。但提高農民收入問題真的那麼難嗎？如果中國的政治家和經濟學家們能將中國農民看成自己衣食父母、同胞兄弟，您將會發現，解决或至少緩解農民收入問題將易如反掌。

新加坡《聯合早報》2002 年七月三日的報道稱，“中國可能取消由國家規定的底限糧價，如果落實，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已經蒙受慘重損失的農民，將面對另一波打擊。中國政府智囊團提出改革，讓私營貿易商自定價格，直接向農民購買穀類。一旦實施，這將給中國 9 億農民增添新壓力”。中國的糧食采購體系存在不少問題，有改革的必要，但在相關維護農民收入穩定的措施沒有作好準備前，這幫策士們就敢提出放開糧價，真是莽撞得可以。而一大陸經濟學博士在香港鳳凰衛視一論壇節目中更闡述了的如下觀點：中國的發展不得不犧牲農民的利益，以集中力量發展城市。

聽到這些經濟學家們和所謂的“精英階層”的言論，您不得不承認：愛因斯坦對經濟學家開的那個黑色的著名玩笑，在中國真的部分變成了現實。對這幫學者，筆者無意評判他們的道德，但從他們的言論中您不得不藐視他們的專業水平。一個讀書人，只要稍微瞭解一點經濟學常識，對一個健康經濟體追求的指標有丁點的認識，對國家的“可持續發展戰略”哪怕只是聽說過，即使純粹從經濟和政治的角度來考量，也不會提出如此愚蠢的論調。

現在的糧食價格如果算是對農業補貼的話，政府也沒有值得炫耀。僅毛澤東時代國家工業化就向農民剝削了巨額的財富，這筆財富在完成工業化發展的原始資本積累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最露骨、最直接的手段之一就是實行三十多年，由陳雲發明的“統購統銷”政策。

所謂“統購”，就是農民必須把指定的農作物産品賣給政府，而且以政府確定的價格交易。這種方式保證了城市的糧食供應，但農民却面臨自身的糧食自給和布票等一堆票證的限制。根

據不同學者的研究，從 1952 年至 1986 年，通過“剪刀差”向農民暴斂了 6000 億至 8000 億的財富[6~10]。除此之外，在 1952 至 1978 年，農業稅收共達 7264 億元，扣除國家給農業的發展建設等方面資金 1730 億元，農業在這期間的淨貢獻至少在 5534 億元[10]。因此從五十年代初期至八十年代後期政府開始提供糧食價格補貼爲止，政府從農業剝削的總財富將不少于 15000 億元。如果考慮通貨膨脹因素，將是一個天文數字。

當然，讓政府和城市償還農民這筆錢是困難的，那麼如果把它看成農民給國家的無限期貸款如何？政府在初期的三十多年沒有爲此支付利息，以利息加上本金，那麼在八十年代末期（以 86 年爲截止年）政府欠了農民多少錢呢？即使按年均 6%利率和每年等額貸款計算，這個數據將在 6 萬億以上（忽略政府導致通貨膨脹的莊家角色，雖然債務人讓貨幣貶值稍微可耻了一點）。那麼從八十年代末期政府需每年爲此支付近 3600 億的利息。因此，今天的糧食補貼款將連這筆利息的零頭都不够，其餘款足以讓所有農家子弟免費讀完從小學到大學的全部教育，同時協助大多數鄉村在未來幾年內完成普通的油面公路和通訊設施建設。

更何況，中國的經濟（尤其是農村經濟和農民消費）是一個准內循環系統，農民在生活和生產資料上的開支，最終經過一個很長的消費鏈流入城市，促進了城市經濟的發展，對中小城鎮的影響尤其巨大。政府支付的這點“利息”將轉化爲政府的財政收入、綜合消費能力的提高和城市居民的就業機會。而政府在大都會的開支或向外國的工業項目貸款，將有更高的比例流入國際市場。

所以，農民根本不需要爲那點糧食款補貼道謝，因這是他們應得的回報！而中國政府更沒資格將此當作自己的政績，或視爲



春雨（宣传画、1975）

對農民的關懷和照顧！但是，今天的中國政府官員和城市知識分子，根本忽略對農民的這些巨額虧欠。

當中國加入 WTO 時，政府瀟灑地犧牲了農業的利益而至今不設置任何的補救措施。筆者無意懷疑朱熔基對農民收入問題的“真頭疼”，更不敢指望朱總理的個人智慧能解决所有問題，關鍵是您老人家是否意識到，您身邊的那幫所謂的“智囊”實在是“窩囊”得可以。

上述分析，幷不需要高深的經濟學理論，甚至一個僅能識字的農民也能讀懂上面的文字。但非常可悲的是，至今沒有任何官方經濟學者或政府官員公開做出類似的闡述，相反，從經濟學家到不少高層官員都在忙著强調糧食價格補貼對中央財政的負擔和對農民的關愛，逼得筆者這樣一個理工科畢業生不得不在此激揚文字，以多少彌補中國知識分子和政府官員那嚴重虧欠的良心！

有時，筆者身爲一名工學博士，真希望能對這幫所謂的“經濟學家”大吼一聲：住嘴，你們這群飯桶！

令廣大的農民群衆難于容忍的除經濟問題，更要命的是基層和各級幹部的全方位腐化，使得老實的農民在缺乏任何有組織反抗的情況下，只有默默地忍受强加到他們頭上的不公。中國基層黨政和民主體系至今沒有設置保護農民利益的有效機制。最近幾年，中國中央電視臺有一個很受注目的節目《焦點訪談》，揭露了一系列坑農的事件，誰都知道，這不過是冰山之一角而已。

農民已從總體上成爲中國的二等公民：在經濟上，他們已嚴重地被邊緣化；在接受平等教育的權力上，他們已無力應付高不可攀的學費（筆者不能理解，國家教委在推動教育普及和實現受

教育機會平等方面責無旁貸，而中國的教育國情不難把握，可教委過去十多年的作爲，分明在把國家帶往相反的方向。而筆者對基層教育的認識，沒發現教委做過任何有價值的行動來改善農村的教育質量，降低入校門檻）[1]；從國家體制上，由于官員的日益腐敗，權力尋租的結果使農民的正當權益得不到基本的重視；走向城市的農民工，在安全、薪水和尊嚴等多方面受到城市的剝削和欺負（如無薪加班加點，對工人的漫駡，缺乏工會保護，農民工拿不到工資等）而很少受到體制的制約，中國取之不盡的勞動力大軍，使得私人企業、外資企業（尤其是港臺企業）對以農民工爲主的員工任意剝削，而不擔心勞動力的短缺；而各地爲了吸引外商投資，對員工所受的不公平待遇置之不理；在輿論上，他們沒有自己的渠道，更在“穩定壓倒一切”的原則下而順便“壓倒”他們的吶喊……。

總之，農民，這個占人口大多數的群體，曾爲共和國的建立和發展給予過無私的奉獻，也是歷朝歷代保家衛國將士的主要來源，新中國的多次民族戰爭中，農民子弟始終是衝鋒陷陣的主力，今天，至少在事實上已成爲國家政權的弃兒。

資本家已經成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合法勞動者，讓他們加入共產黨筆者不會反對，但共產黨必須肩負起代表農民階級利益的責任；這即是共產黨的社會基礎所在，也是對執政黨的道德要求。即使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裏，如果占人口大多數的群體不能

---

[1] 第二版加注：教育産業化是第二、三代領導集體給中華民族挖的個大坑。在當時導致衆多農民家庭孩子學費成爲難以應付的開支。希望工程應運而生。所以，我不歌頌希望工程，就是因爲這是政府瀆職的結果。直到 2004 年第四代上臺，才取消了小學學費。但教育産業化導致農村公立教育衰微，優秀教師被挖進城鎮私立學校，使得很多家長不得不把孩子送進昂貴的私人學校讀書，繼續承受著教育體系的剝削。教育産業化——這是中國這種人口大國最白痴的政策之一。

很好地得到政府的保護，同樣將面臨道德和政治利益上的挑戰。如果忽略農民利益，那震天動地的“三個代表”中至少一個“代表”就要立即作廢。

中國農民，亞細亞生產方式和中國傳統文化造就的獨特群體，剛毅中不失一分柔和與忍耐；無比的堅韌和吃苦耐勞。中國這個農業大國的輝煌歷史從本質上講是農民鑄造的歷史。他們看似愚昧落後的外表下，始終保留一份狹義和大公。當民族面臨危急關頭，他們也許沒機會成爲領導者，但始終是救亡圖存的最堅定參與者。西方人不可能瞭解中國，因爲他們不可能瞭解中國的農民。中國的政治人物和城市知識分子同樣難以瞭解農民，因爲他們已在城市的浮華和功利世界裏丟失了自己寶貴的樸實和俠義精神。外國對中國農民的不瞭解，使得他們以爲在軍事上占領城市就可以統治中國，而最終敗在主要由農民組成的中國軍人的手下；中國精英階層對農民的不瞭解，使得他們以爲搞好城市就可以搞好中國，而最終必將付出慘重的代價。

如果政治家在虧待老實巴交的農民時，以爲沒人會注意到他們的施政缺陷，或不影響他們的歷史地位的話，那就大錯特錯了。雖然大多數生活在舒適城市裏的學者不太注意農民的利益，但至少還有象筆者這樣有點良知，且知農愛農的知識分子的存在，隨時準備站出來爲農民的苦難命運大鳴不平！

不知中國未來是否還會出現一位令農民感懷的政治領袖，他懂得將農民放在心裏。中國社會的媚俗化傾向，將使得中國所謂的“精英階層”逐漸遠離樸實和泥土。這樣的知識分子因與社會大衆的脫節而必然影響到他們判斷和政策諮詢的科學性。日益庸俗化的公務員隊伍，更對底層人民的疾苦視而不見。

對今日的中國領導人是誰，以及有什麽“高見”，或劃時代

意義的偉大思想，農民們已沒有多大的興趣，因他們對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已不敢抱多大的希望。去年底，家鄉縣委宣傳部門到各村莊瞭解農民學習江澤民“三個代表”情況。筆者不質疑“三個代表”的正確性，但讓面對孩子學費問題而愁眉不展的農民學習“三個代表”，真是滑稽得離譜。憨厚的農民膽量越來越大，這讓筆者感到欣慰。他們對縣委領導的調查回答到：“能讓當官的不貪污，別說三個代表，三十個我也能學會”、“支書、主任和會計，他們三個全代表了，就不代表老百姓”……。農民的幽默真令筆者自嘆不如。

今日的底層農民如果在政府部門沒有親朋關係，或認個當官的作乾爹或乾兒子，在面對委屈時，他們的主要選擇就是“忍受”，因政府和司法系統已失去保護弱者和維護正義的功能。下面的這個例子雖然極端，但就其實質來看，具有相當高的代表性：

山西榆次市烏金山鎮大峪口村農民胡文海，自 2001 年 3 月 16 日起，將搜集的家鄉貪官證據材料，征得村裏 121 名黨員、幹部、群衆簽名，開始艱苦告狀的過程。從鎮、區、市一直到省，循著公安、紀檢兩條路徑，時間長達 8 個月。但是各級當權者只是大筆一揮，按原路批回給當地鎮有關部門。當地權貴是腐敗受益者，當然壓下，不予理睬。這期間，村党支書欲殺人滅口，胡文海曾遭鐵鍬襲擊頭部，險些喪命。于是胡文海忍無可忍，用獵槍、斧頭等凶器，對村幹部及其家屬進行“慘無人道”的“血腥屠殺”。結果胡被判死刑。

雖然從法律的角度來看，這樣的判決是正確的。但該農民與幾百年來的英雄俠客有什麼本質的分別呢？共産黨曾教導筆者那麼多關于舊社會某某人殺死惡霸和劣紳，投奔共産黨的動人故事。那麼，這位山西農民的命運又如何看待呢？他沒有投奔共産

黨的敵對勢力，或跑到國外瞎喊，而是從認真搜集材料，徵求民意支持，再一級一級上告，受到官府的推諉和貪官的威脅，走投無路，進而被迫行凶；說明他幷不是個鹵莽之徒，對國家的法制和共產黨還曾有過希望。面對國家政權機器的欺負，如果不是徹底的絕望，斷然不會做出如此的“壯舉”。他很清楚這樣做等待他的是什麽。

固然，筆者堅决反對一切罔顧國法之行爲，但請中南海的那些“英明偉大”的領袖們告訴民衆：在胡文海狀告無門而又受到報復打擊之時，應選擇忍受，還是造反？是在沉默中死亡，還是在沉默中奮起？據筆者對中國民族性格的理解，“忍耐”可以說是最鮮明的性格特點，這既爲逆境中生存，進而發展壯大提供了突出且優秀的民族素質，但同時使中國社會失去了完善和進步的動力，幷導致草根階層的長期苦難，因最劣質的政治文化也能長期生存而不擔心民衆的挑戰。因此，筆者堅决主張對邪惡進行造反而不是忍耐，應成爲中華民族的主流性格。即使按照共產黨的“光榮革命傳統”，也應該支持胡“在沉默中的奮起”。如果中國民衆都像胡文海這樣的“魯莽”，中國的貪官們肯定不會如此放肆，類似胡文海的悲劇也許根本不會發生。

胡文海在法庭最後陳述中說到：“我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我希望自己成爲一個正直善良的人。爲此，我不斷地去努力實現自己的理想，自己從小時侯起的性格就是仗義執言、敢做敢爲。村裏的那些無權無勢的善良村民和我和睦相處，有時，我就成了他們利益的代言人。然而，近年來，歷任村幹部貪污行賄、欺壓百姓，村裏的小煤礦（村民冒著生命危險生産）等企業上交的 400 餘萬元被他們瓜分。4 年來，我多次和村民向有關部門檢舉反映都石沉大海，公安、紀檢、檢察、省、市、區的官老爺

們給盡了我們冷漠與白眼……。可是，我們到那裏去說理呢？誰又爲我們做主呢？我去公安機關報案，那些掙著工資的人民的公務員開著 30 多萬元買的小車耀武揚威，根本顧不上辦案，甚至和村幹部相互勾結欺壓老百姓……。我只有以暴制暴了，我只能自己來維護老百姓的利益了……。實際上我每年的收入都有 4 至 5 萬元，我完全可以不管這些事，但是，我不能，我的良心告訴我不能這樣做，我不能對此置之度外，官逼民反，我不能讓這些蛀蟲們再欺壓人了……。我知道我將死去，如果我的死能够引起官老爺們的注意，能够查辦了那些貪官污吏，我將死而無憾，否則我將變成厲鬼也不放過他們……。”旁聽席上爆發出一陣掌聲。這是勇士在“共産黨反動派”統治下的最後戰鬥。

很痛心，凶手成了俠士，受害者却不值得同情；中國陷入嚴重的“合法不合理，合理不合法，合法不合情”的尷尬境地，其根源在于中國“基本法”的嚴重扭曲，和政治環境的嚴重惡化。

讀到這裏，讀者是否會對毛澤東發動“文革”，高呼“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歷史背景産生一些聯想？ 如果毛澤東九泉之下有知，面對中國農民的悲慘命運，他會毫不猶豫地再來一次“文革”或清洗，當然也會毫無疑問地得到人民的“萬歲”；然後被清洗的這些特權階級逮著機會就會罵毛澤東對他們的迫害。

如果筆者是法官，同樣會判胡死刑，以維護中國法律的尊嚴；但當砍下他的頭顱時，內心會向他致敬，因在這顆頭顱下面支撑著的是一個不屈的脊梁；這根脊梁又何嘗不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性格保障！筆者做夢都希望中國農民能有十萬個“胡文海”涌現，這是在國家司法體系失靈的情况下，農民自救、自保和自强的一點希望。



毛主席1955年杭州考察时得知吸血虫病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给予高度关注。在他直接关怀下，虽然物资匮乏，但彻底消除了这一危害12个省，1000万人感染，1亿人受威胁的传染病。1958年6月30日，毛主席得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的消息，“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写下了脍炙人口的《七律二首 · 送瘟神》。

筆者拭目以待，看中央的領袖門如何處置那些“踢皮球”的官員，以及在這場殺戮中漏網的貪腐之徒。腐敗的晚清朝廷因“楊乃武與小白菜”一案能連撤一百多名官員；民國初年“楊三姐告狀”一案，七十多名相關官員被追究，那麼，在自稱“代表先進文化和多數人民利益”、“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英明領導下的新中國，面對胡文海一案，又將有多少官員被處理呢？

很顯然，這群擁有高學歷、講話必“重要”、旗幟必“高舉”、領導必“英明”、舞文弄墨、權謀高超、能歌善舞，就是不幹事的“白麵書生”們，不可能給你帶來任何的希望！[1]

權借上述文字爲胡文海及受冤屈的億萬農民作點紀念吧！考察中國歷史和國民黨統治大陸的最後歲月，筆者有信心地認爲：當今大陸基層政權的無耻、反動和殘暴程度，比歷史上任何時代都要嚴重。再看看鋪天蓋地學習各種“偉大理論”的報道，您不得不承認，當今中共政權是集幽默、荒唐、可笑于一體的“政治馬戲團”。這真是對文明古國人民智慧的空前戲弄。

不論城市建設得多麼富麗堂皇，高速公路多麼發達，也不能掩蓋這共和國歷史上最黑暗、最不道德的一頁。而第二、三兩代

[1] 第二版加注：改革開放以來，被特權階級剝削欺壓下受冤屈的總人數有多少呢？至少是“文革”、反右擴大化受傷害總人數的十倍。領導幹部和知識分子受迫害固然令人同情，但中國精英階層有多少爲受冤屈的底層人民吶喊？這就是政治道德的差別，也凸顯精英階層的無耻！城市化過程中，犧牲農民利益的例子遍布全國。

政權將毛澤東時代的絕對政治優勢完全斷送，可謂創造人類歷史上政治道德墮落的新速度。

中國共産黨，這個成長于草根階層的政黨，也是讓筆者三十年來愛戴、尊重、參于、寄予民族復興希望的政黨，是否正在悄悄地背離本來的軌道，而駛向它曾經打倒和批判的對立面?

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裏埃。

今日歡呼孫大聖，只緣妖霧又重來。

面對當今人們對毛澤東的緬懷，他的這首幾十年前在政治鬥爭的環境下寫就的詩，却給了最準確的解釋。這真是歷史的天大反諷。

五、毛主席和農民心連心

毛主席和我们心连心

農民，中國這樣一個農業大國人數最多的群體，却是中國最弱勢的群體，他們遭遇了太多的無助和欺壓。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上，只有毛澤東以他有力的大手給予過農民幾十年的有限呵護。當然農民給予毛澤東及其政權的回饋也是巨大的。雖然在毛澤東的領導下，農業和農民繼續遭受著國家整體經濟的剝削，城鄉剪刀差沒有縮小，城鄉差別不斷擴大，但他領導下的時代是中國農民最具尊嚴的時代；農民們也無須爲孩子的學費擔心。雖然沒有今天這樣齊全的法律，但沒有人欺負他們（除三年經濟困難時期那個無耻的政權時代）。而今天，一個肥頭大耳的黨支部書

記足以讓全村人民生活得不自在而不會擔心受到制裁。而中國政府裏的這幫文弱書生們，至今沒有拿出像樣的行動，來保護農民的正當權益。

即使毛澤東時代的錯誤政策曾導致三年經濟困難和數百萬農民的死亡，但樸實知足的農民輕易地原諒了他，原因很簡單，領導幹部們同樣在遭受饑餓的折磨，就連毛澤東的女兒也難以幸免（筆者相信這在人類歷史上幷不多見，雖然人類的災難接連不斷），只需要和曾經歷的舊社會作個比較就不難看出根本性的差別: 那是一個好心做的壞事, 是自己“家長”的錯誤; 與那種“朱門酒肉臭，路有餓死骨”的悲慘時代完全不同。有些外國學者研究這段歷史的時候不能理解: “爲什麼中國沒有爆發大規模農民暴動, 那一定是軍警的强力打壓所至”。實際上, 在筆者的家鄉, 當人人挨餓的時候, 縣糧庫只有兩個民兵把守。農民們雖然挨餓, 但看到領導幹部也在風雨同舟的時候; 這是和歷次人爲或自然災害最大的不同之處。

農民的寬容樸實，雖然比那些只以自己錢包作爲判別標準的市儈可敬得多，但也暴露了中國農民悲慘命運的性格原因——他們太容易滿足了，這根本建基于他們過去遭受的欺壓太多了。即使在三年困難時期，廣大的市民拜“統銷”之利而沒人被餓死，種糧食的農民却在饑餓的生死綫上掙扎而得不到政府的有效救濟。今日，那些對進城的農民横眉怒目、鄙視“鄉下人”的城裏人，你們是否意識到自己的虧欠和人格的卑微? ！

中國的農民，在過去百年的民族獨立和解放戰爭中，他們的先輩曾毫不猶豫地獻出自己的生命，他們爲共和國的建立付出過巨大的犧牲和貢獻。他們也許無法料到，在共産黨革命成功之後，甚至今天國力日盛之際，他們再次面臨幾千年來已經習慣的厄運。

毛澤東給了他們的雖然有點缺憾，但却是值得回味的集體記憶；畢竟，幾千年來，留在他們回憶中的美好內容實在太少了。對中國的廣大農民來說，能有這麼一點美好記憶已經是奢侈……。

在一九六五年六月底，毛澤東曾談到建國十五年來醫療資源是如何分配給人民的，他批評道："告訴衛生部，他們只爲全國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服務，而這百分之十五之中主要是大人先生們，而廣大的農民群衆沒有得到任何醫療。首先，他們沒有醫生；其次，他們沒有藥物。衛生部即不是人民的衛生部，爲什麼不改名叫城市衛生部，或甚至叫城市大人先生們的衛生部呢？"[34]。毛澤東的尖銳批評，促使衛生部于當年 9 月制定了把衛生工作重點放在農村的報告，報告指出："今後需要經常保持 1/3 的城市醫藥衛生人員和行政人員到農村。醫療防疫、教育、科研等機構分出成套的人力和設備，由城市延伸到農村，抽調部分城市衛生人員長期留在農村工作，爲農村培養醫療衛生人員，大力生産和供應農村需要的大衆化藥品，增加生産和供應農村需要的常用醫療器械，降低農村藥價和醫療費用，對看不起病和買不起藥的農民，繼續實行減免辦法，由國家醫藥救濟費解决"[40]。隨著農村衛生人員的培養，後來發展出世界獨有，對廣大農民意義重大的赤脚醫生事業，改變了農民缺醫少藥的問題。

在毛澤東時代，尤其是"文革"期間，農村基礎教育體系的確立和義務教育的普及，讓億萬農民的子女有機會進入學堂。爲豐富農民文化生活，縣及人民公社都成立了電影放映隊，挨村下鄉爲農民放露天電影（這才是爲人民服務）；但改革開放以後，

農民們再也沒有這個眼福，大多數農民已二十多年沒有在自己村莊上嗑著瓜子，抽著烟，和老鄰居談著天看場電影了（現在的電影多屬“農民不宜”）。沒有毛澤東，那個時代會有幾億農民至死不知道電影爲何物，他們誰捨得跑幾十裏路，用賣幾斤麥子的錢看場電影？再者，電影院售票處那個小市民只需一大聲就能讓這些老實巴交的農民們不敢張嘴。看一下今日中國衛生部、教委、文化部等部門對農村和農民利益的漠視，就不難明白毛澤東的政治道德和對底層人民的深情，也自然理解億萬農民爲什麼輕易原諒了毛澤東的領導過失。

鄧小平去世時，村民們見面打聲招呼“鄧小平死了”。沒有怨恨，但也始終無法產生“毛主席和我們心連心”的那種感覺——他們村邊的河是毛主席領導下挖掘的，路是那時修的，橋也是那時建的，當然已經殘破……。

等江澤民下臺或百年之後又將留下怎樣的背影？胡錦濤呢？政治領袖們始終無法牢記：生前的任何贊譽都是沒有意義的，歷史的鐵筆是公正的，但又是有情的；關鍵在于，政治人物是否能抓住自己人生難得的機遇，爲人民留下一段情深義重的回憶。

至于個別政治人物或經濟學家以經濟效益或現代化建設爲理由，而將犧牲農民利益合法化和合理化，根本不值一駁。他們談不上專業智慧，更沒有道德和愛心。中國農民幷沒向政府要求醫療保障、工交系統及優秀教育體系配備，他們希望的僅僅是政府的一點體諒，和對貪官污吏的哪怕是象徵性的懲罰。

可就這點要求，政府都懶得給予。

中國在改開三十年有幾個鄉鎮及大隊幹部被送上刑場，又有幾個不該得到這樣的懲罰？再翻翻毛澤東領導“三反”、“五

反”時的報紙，每天都有長長的被槍决的名單。筆者家鄉就有一個生意人因在鷄肉中摻水而被判死刑。沒有毛澤東的鐵碗政策和政治教育的配合，後來中國二十多年的社會安定和高尚社會道德的建立根本不可能實現，處在社會最底層的農民的權益也就根本談不上了。

天安門廣場有一條永不乾涸的人河流入毛主席紀念堂。其中，經常可看到衣著樸素、年逾花甲的老人，在兒孫們的攙扶下表情肅穆地步入紀念堂。他們不知如何獻花，也不習慣城裏人鞠躬的禮儀，只知道用磕頭來表達對先人的懷念和敬仰。如果紀念堂允許的話，中國億萬農民的雙膝，一定能在堅硬的大理石地板上跪出兩個深深的凹痕。

(作者按：在本書 2003 年第一版出版後不久，中央在農村和農業工作上采取了一系列減輕農民負擔的措施，基礎教育的學費減免。總算讓農民的日子不再那麽艱辛，教育産業化、計劃生育罰款、無窮稅收這三座大山下的農民總算可以喘口氣。如果基層體制改革上相應配合，鄉鎮及行政村幹部任免民主化和行政透明化，對中國農民來說，才能真正有個不太憋屈的日子。農民和農業問題始終是中國社會的根本問題，如果不是唯一根本的話。中國未來任何領導人和學者們都必須時刻牢記這一點，否則，他根本沒資格談論中國的政治和經濟。第五代領導人上臺後大力反貪，但在基層收效不大；農民子女在衰微的公立教育體系下不得不花高昂的學費把孩子送入私立教育體系，負擔一樣很重。中國政府應該明確制定用人原則：沒有農村生活閱歷者不得參與涉農問題的研究和政策制定)

六、反思："一胎化"是一次民族自殘[1]

在"一胎化"政策推出不久，即有學者對這一政策的必要性提出過質疑，幷以實際的例證說明即使允許二胎也不會導致人口的快速增長，但幷沒有引起政府的興趣。當時住房難和就業難等問題的存在，似乎爲"一胎化"政策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本來，第二代領導人對人口的急刹車式控制，如果能以二胎爲限，還不至于有嚴重後遺症，但"一胎化"則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社會和家庭的結構與價值觀。隨著人們生活水平提高和子女養育成本的增加，人口的自然增長率將很難提高，這已經被發達經濟體廣泛證實。中國也必將面臨保持人口穩定的巨大挑戰。

人口衆多，在很多人眼中是負擔，但如果社會經濟有較好的發展和服務配套，人口素質提升，則人口就成了社會發展最大的資源優勢。而且把眼光放到全世界，中華民族幷不一定都生活在960 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人口的對外遷移不僅是時代的潮流，也是中華民族生存空間的和平拓展[2]。而這種拓展中最重要的資源不

---

[1] 本節爲第二版新加內容。

[2] 中國從政府到一些憤青，似乎對出國的人有種天生的情感抵制，以爲出國就是叛國。政府在政策上也有此類表現，比如 2004 年前，公安部要求所有出國的都要同時吊銷戶口，回國後才能再恢復，結果大量出國留學人員因出國時是集體戶口而歸國不成，清華大學就有一萬多畢業生出國被吊銷戶口，回國落戶變成所有人的頭痛問題，筆者就是直接受害者。政府和憤青們都缺乏思想的戰略高度：中華民族應該走出去，到全世界去生根發芽，澳大利亞、加拿大那些廣闊的土地本來就不是歐洲白人的，中國人一樣有權力獲取。國家應該對國民出（接下页下）

是武器，也不是財富，而是人口的規模。

從今日中國的發展現狀其實不難發現，中國過去三十年的高速增長所仰仗的正是龐大的勞動力和消費市場。這是毛澤東早期留下的最重要一筆財富，雖然他老人家自已都沒有意識到這筆財富的重要性。

筆者在城市規劃和諮詢行業常接待一些中國來的考察團，常被問的一個問題是：新加坡成功的最核心要素是什麼？我的答案是：最核心的原因不是李光耀和他建立的廉潔公務員體系，而是有賴于上個世紀 60 年代之前那些偉大的華人母親們，她們的高生育率奠定了新加坡人口的結構，才有了後來的發展。當時南洋華人家庭生育多子女非常普遍，我的朋友同事中，兄弟姐妹超過十個的就有四個家庭。但李光耀後來推行“家庭計劃”，鼓勵只生兩個，而現在越來越多的新加坡單身、晚婚、晚育等情況的嚴重性，已經威脅到新加坡人口的結構。中國未來的人口問題可能更加嚴重，因爲新加坡好歹還可以通過從中國、馬來西亞等國吸引華人移民來維持種族比例的穩定和國家人口規模的緩慢增長，而這條路對中國則行不通。即使有選擇地吸收外來移民，也只是杯

（接上页下）國定居（除公務員和一些特殊人物）和回國省親創業給予多方面方便，不要小肚鷄腸地對待這些新時代的海外拓荒者，他們自掏腰包和承擔風險在幫助中華民族開拓生存空間，傳播我們的文化和價值觀，無論對整個民族還是中國本土都是利遠遠大于弊的。至于他們的智慧爲他國服務，這首先是他們海外立足和被人尊重的本錢。再者，中國政府只要有好的政策，全世界各民族的優秀人才都可以爲我所用，還在乎幾位國人的出走？沒有選賢任能的體制，好的人才在國內也是浪費。我 1995 年考國家計劃委員會公務員落榜（您懂得）而無奈出國，就是個黑色案例。落葉歸根已經是個不值得提倡的落後概念！國家媒體也要少報道海外華人如何“回饋祖國”，這只會增加當地華人與各國政府及土著的不信任，對海外華人的生活生存有百害而無一利。其實，只要適當支持各地的中華文化傳承就足够了。文化的紐帶中性而强大。

水車薪。

計劃生育政策對中國帶來的傷害，遠不止人口結構的問題。

計劃生育在優待少數民族情况下，對漢族采取地區無差別對待，其負面影響在內陸地區不明顯，但在邊疆省區則帶來嚴重後果。毛澤東時期通過創辦生產建設兵團，上山下鄉邊疆開荒等，竭盡所能爲新疆、黑龍江、內蒙、青海、西藏增加漢族人口，對促進邊疆省份的發展和穩定打下了基礎；但計劃生育的無差別對待，對毛澤東一代好不容易取得的戍邊成就進行了釜底抽薪式摧殘。筆者在 1990 年代在國內讀書時曾和朋友們“胡扯”自己的幻想：國家打擊“超生游擊隊”，對農民超生罰得傾家蕩產，對公職人員采取撤職等處罰，如果能借機將這些超生的家庭全部遷往新疆，國家資助他們在當地生根墾荒，可以極大幅度地增加邊疆漢族人口，是將“超生游擊隊”轉化爲國家邊疆發展和穩定的原動力。但筆者人輕言微，就連一些體制內學者對“一胎化”的合理質疑都引不起重視，還會有人理會一個學生的胡言亂語?

隨著當代生活壓力的增加，養育成本提高，和享樂主義的蔓延，中國將面臨嚴峻的人口挑戰（甚至海外炎黃子孫人口面臨同樣的挑戰）。爲此，我建議以下幾點：

（一）在生育觀念上再次回歸傳統。

（二）國家在政策上應該給予孕期和哺乳期婦女更多的照顧。

（三）對于邊疆省份多子女家庭給予經濟支持。對于內地夫婦移居邊疆將給予生育和子女撫養上的支持。

（四）國家將幼教納入到公辦教育體系。

（五）針對一些文化、政治上不太激進的國家女高才生提供獎學金，比如東歐地區（被西方欺騙過的東歐國家民衆，會對社

會主義有較高接受度；該地區人口整體素質高，女性多）、東南亞等，以及海外華人，吸納進入中國高校讀本科，如果她們和中國男性結婚幷生育後代，國家將在綠卡和公民身份方面開綠色通道。政策上不鼓勵外國外族男性（外籍華人例外）和中國女性結婚。因爲計劃生育導致男女比例失衡，必須正視這一問題。

（六）單身大齡（30 歲以上）女性生育權應得到尊重，她們有權在不結婚的情况下生育後代幷登記戶口。

七、“三農”改革不能都走大農場化[1]

最近幾年，關于農村和農業改革出現過不少響亮的口號。一是城市化，這個不談了，因爲沒有産業和經濟發展的城市化，根本就是製造城市大難題，是不切實際的。另一個就是農村土地的貨幣化和資本化。後者似乎越來越多地進行試點和應用。

看待三農問題，不能只從經濟上看，還有個更加重要的要素始終沒有引起重視，就是由自然村落組成的農村所承載的厚重的中華傳統文化和生活方式。這些傳統文化在今日的大都會和小縣城都已經越來越難以看到。這些豐富多姿的傳統文化，很多幷沒有通過文字做豐富的呈現（也不可能完整呈現），在城市人看來，甚至將其視之爲落後的東西。但這些却構成了中國人幾千年來最具有特色的地域生活方式的一部分。甚至中國人的思維習慣和倫

[1] 本節爲第二版新加內容。

理觀念，在這些鄉土文化中得到了更原始的傳承。

筆者在研讀《金瓶梅》[1]時，感覺裏面的用詞、人際交往和社會活動，似乎就發生在昨天。幾百年來，中國人就是這麼生活的。而這些內容對于今日的城市人來說，則顯得那麼陌生和遙遠。

三農問題非常複雜，在處理時要格外謹慎，本處難以對這個龐大的課題做深度分析，但有幾點是基本原則性的思路：

（一）城市化必須遵循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原則，科學引導，而不是拔苗助長。農村青年移居城市是大勢所趨。政府在改善農村居住環境，創造農村留人條件方面做些工作。

（二）一個地區的農業用地的改革探索，本著積極進取和謹慎保守相結合，不可一刀切。中國這個大國三農問題的複雜性決定了，任何一刀切式强制改革都必然副作用嚴重。

（三）“三農”不論未來的出路在哪裏，政府必須盡到基本的公共責任，修好路，發展鄉村基礎教育和幼教，環境保護及垃圾處理，做好村民自治制度建設與完善。不論鄉村未來是什麼，這些工作永遠是必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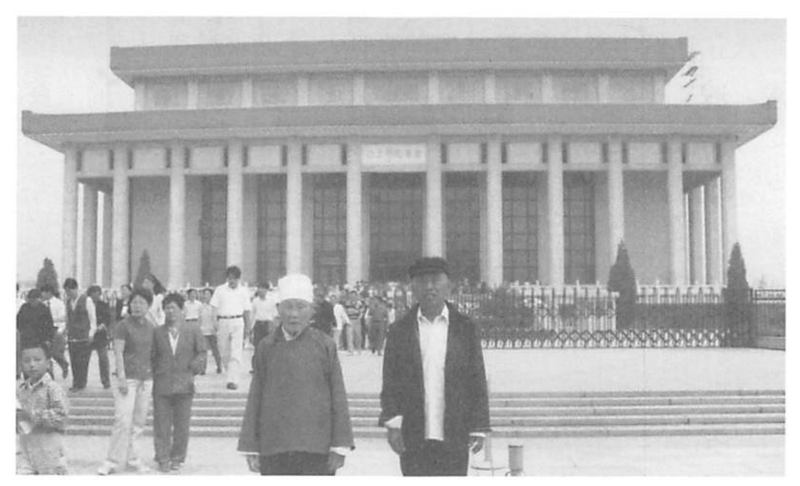
（四）做好地域民俗文化的保護與發掘。比如，我老家山東曹縣鄉村幾十年前曾普遍使用的農具、紡織、婚喪嫁娶節日習俗等，都在快速消失中，當代人已經搞不清楚他們的祖先是如何生活的，這些都是亟待發掘保護的鄉土文化財富。筆者所在的山東曹縣孫老家鎮老家，父母往生後，收拾出很多他們用過的織布縫

[1] 《金瓶梅》作爲世情長篇小說的開山鼻祖，是中國古典小說的一座奇峰。毛澤東對《金瓶梅》有深度的認識和理解，他說：《金瓶梅》是《紅樓夢》的祖宗。筆者對《金瓶梅》從早期的沒感覺，到後來的被吸引，其中豐富的民俗文化展現和歷史場景感起到一定作用，讓筆者看到了草根階層的丰富生活面貌，這是歷史書籍裏看不到的。可見，民俗文化有它不可替代的魅力。

衣等做家務活的用具，就萌生在老家建一座民俗博物館的念頭，把老一代的生活方式展示出來。但精力和經濟實力限制還無法實現這個願望。

（五）共產黨在過去幾十年的改革中已經培育了一批龐大的“共產黨反動派”，或者極右翼共產黨幹部和知識分子精英，“低端人口”這種社會達爾文主義和極右思想下的詞匯，居然堂而皇之地出現在中國首善之區的北京政府官員口中，可見中國政治道德已經墮落到何等地步。農民和城市低收入階層應該獲得社會的尊重，這是共產黨必須重視的意識形態建設內容。讓農民不以移居城市作爲成功的標志，農村一樣是廣闊天地和高品質居住地。尤其是那些與農民打交道的政府部門公務員，要做好素質教育。他們中素養低劣、趾高氣揚的小市民太多了。

（六）特色小鎮建設的特點在“特色”，不太可能成爲普適性的方向。傳統自然村的保護、發展、合幷（如新農村）、搬遷等，要慎之又慎。需要對此做好基礎性的研究工作。



參拜毛主席紀念堂川流不息的人河，比任何官方文件和學術報告更準確地反映出人民對偉人的評價。（先父先慈于 2000 年）



一九五六年九月的『八大』主席臺上。他們中誰是主要劊子手？

第三章 大饑荒解析[1]

中國共產黨執政以來最大的敗政就是三年經濟困難及由此導致的百萬人民死亡慘劇，在和平時期造成如此慘絕人寰的重大事件，不論如何解釋和辯護都是不可原諒的，這是中共的悲哀，也是民族的哀痛。

對這段歷史假裝不存在，或隨意推卸責任給“自然災害”，是對歷史和逝去同胞的不負責任。對這段歷史的探討，一方面是對死去同胞的基本尊重，再者去探尋造成這一悲劇的制度原因，進而激發後人完善國家管理的思路。厘清毛澤東和當時各位主要領導人在這個事件中應該承擔的責任，是追求科學歷史觀的必然要求。這是對正確客觀認識這一代建國領袖所無法回避的一頁。

一、對當前社會認識的基本質疑

自第二代上臺後，在《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决議》

[1] 本章爲第二版新加內容。

中，批評毛澤東不按客觀經濟規律辦事，以及反右擴大化和極“左”思想的破壞時，中共全黨和全國人民一股腦地將大饑荒的責任推到了已經沒法自我辯護的毛澤東身上，似乎毛澤東是畝產萬斤“放衛星”、大食堂、“共産風”等荒謬行爲推動者，及最終導致斷糧的罪魁禍首。但歷史幷不以一個文件或一個時期人們的認識爲轉移，歷史的真實必將在後人的追根求源地剝去輿論的塵埃而顯現出其本來的真相。這是時代賦予知識分子的責任。

但很遺憾的是，筆者在撰寫這部分內容時，包括《人民日報》在綫資料庫等，都不完整，刻意去掉了這段時間有關農業發展和“共産風”的一些報道，尤其是劉少奇和鄧小平等人當時活動和講話的新聞報道，而非权威網上資料要進行真實性確認才能采用。中央在刻意隱瞞些什麼？這一有選擇性掩蓋本身就值得懷疑。

筆者對第二代領導層引導下强加在毛澤東頭上的這一責難的懷疑，基于以下這個基本的認識：在中共當時負責政治建設幷在內政事務上退居二綫的核心領導人毛澤東，負責經濟建設的核心領導人如劉少奇（當時已經指定爲毛澤東的接班人）、周恩來、鄧小平等人，毛澤東是唯一種過地，真正懂農業和農民的人，他怎麽可能會糊塗到相信畝産萬斤的荒謬報告？當時毛澤東是黨主席，主抓意識形態和軍事外交，劉少奇和周恩來以及總書記鄧小平等人，當時在幹什麽？這些一綫經濟管理領導似乎完全沒有責任，所有的錯誤都是那位不直接負責經濟而且是唯一懂農業的毛澤東鑄造的，您不覺得這裏面有個基本的邏輯扭曲嗎？毛澤東對農民的感情和親近感遠非其他領導人可比，他會如此折騰農民？

在對這段歷史的批評聲音中，其他領導的缺位是極其不正常的。根據毛後時代對毛澤東的輿論導向性否定，任何同時代其他

領導人要麼以當時如何反對毛澤東所犯錯誤，要麼以受害者身份而紛紛登上各大媒體，進而證明自己當時的正確性。但在談論三年經濟困難和大饑荒事件時，唯一被常提起的中共主要領導的聲音是劉少奇在大饑荒結束後的 1962 年舉辦的七千人大會上的那段“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看似坦誠的講話，可劉恰恰又是三年經濟困難時期的核心內政事務最高領導人，他在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到底講了什麼，如此關鍵時期的講話，却從沒見諸于毛後時代的報端，只要您有半點的理性和不帶偏見及預設立場，請思考一個簡單問題：如果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彭真等主抓內政事務的核心領導在農業“放衛星”和接踵而來的大饑荒時期，哪怕有隻言片語的反對，第二代核心領導層能不予以大篇幅報道渲染，進而劃清與大饑荒的政治責任嗎？尤其對鄧小平本人和其政治盟友劉少奇二人有利的宣傳，在鄧小平主政時期絕對不會放過絲毫。當時僅有的，在第二代領導時期被反復提及的大膽質疑“放衛星”的領導人也就彭德懷及其在廬山會議上的“萬言書“了。

這裏有個參考案例：人們從第二代核心領導層上臺後，大力宣傳鄧小平如何受迫害，周恩來如何艱困中保護科學家等，但從來沒有關于劉少奇和鄧小平如何在經濟困難時期大力支持“兩彈一星”的任何報道，雖然鄧小平主政時期歷經“兩彈一星”成功二十周年和三十周年紀念重大事件。而毛澤東、陳毅、聶榮臻等領導是如何在極其困難時期堅持搞“兩彈一星”的，則不斷出現在各方面的媒體和回憶文章中。瞭解中共輿論模式的讀者自然從中不難看出，這事實上昭示了劉少奇和鄧小平等人在“兩彈一星”事業上似乎沒什麼值得宣傳的內容，而以當時他們所處的最高領導位置，又不可能不參與這類重大決策，那就奇怪了，他們如何參與

的呢？後來有學者根據回憶錄和一些歷史事件的撥鱉抽絲中發現，劉少奇和鄧小平是三年經濟困難時期主張“兩彈”下馬的主要領導人。

從“兩彈一星”這件事情的有關報道所體現出的中共輿論模式，我們有理由懷疑，既然沒有任何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當時如何反對畝產萬斤浮誇風和“共產風”的報道，那更接近歷史事實的可能是：他們是這類荒謬行爲的實際推動者和認可者。而在鄧小平主政下反毛輿論最猖獗的時代裏，毛澤東對畝產萬斤的質疑也時不時見諸于報端，則爲厘清毛澤東在這件重大歷史事件中的責任敞開了一條思想的門縫。

稍微考察一下當時歷史就不難發現，大躍進、吹共產風、公共食堂、人民公社、窮過渡等，這些作爲這段歷史的標志性詞匯和運動，毛澤東都不是創造者和始作傭者。而這些名詞和運動的最早推動者和發明者則是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等人。如果由劉周鄧發明創造，由毛澤東推動鼓勵的話，您不覺得太抬舉劉周鄧的理論水平了嗎？有據可查的事實是，以上這些歪風的最早、最堅定糾正者恰恰是毛澤東。

二、大饑荒發生時期的中央領導體制

研究歷史不能忽略其中每個領導個體的職位權力和責任。一個基本原則是，說直接負責的領導人對錯誤沒有責任，反而是一

位不直接負責的領導人來承擔全部責任，是荒謬的。大饑荒從醞釀到慘禍發生的關鍵時段裏，中共高層各主要領導的職權需要有個厘清。

1953 年 3 月斯大林去世。斯大林身前拖著老邁的身體事無巨細參與一綫決策，而沒有爲身後的權力過渡預留時間，導致斯大林死後蘇聯出現重大的政治轉折和高層政治鬥爭。毛澤東對斯大林的教訓極爲警惕，于 1953 年下半年，毛澤東提出中央領導層分一綫二綫的設想，即毛澤東退居二綫，其他領導人處于領導一綫。1956 年 9 月召開的中共“八大”則是對這一設想在領導機構方面的具體落實和確認。

“八大”正式選舉出幾位中央副主席，確立中央書記處總書記領導職務。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八大”政治報告，幷當選排名第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而鄧小平則在本次大會當選爲總書記及政治局常委。劉少奇－鄧小平中央日常事務領導體制由此確立。

“八大”期間，毛澤東在會見參加大會的各國共産黨代表團時，談到了人事安排的問題。他表示：“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只能‘跑龍套’，唱戲的是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同志”。他還說，“我本想辭掉主席的職務，幹個名譽主席……，現在同志們都不贊成我下臺，我說，拖幾年也可以。”

毛澤東的這番公開表態及八大的高層領導職務安排，表明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已經開始有組織、有計劃地解决“接班人”問題。

1957 年 11 月，毛澤東訪蘇期間，與赫魯曉夫談到他不當主席

的問題。據當時擔任翻譯的李越然回憶：“赫魯曉夫問他，‘誰來接班呢？有這樣的人嗎？’主席講得很清楚，‘有！我們黨內有好幾位同志完全可以。’接著他說第一個是劉少奇，第二個是鄧小平。”毛澤東的談話，表明了中共黨內已經進一步明確了接班人，幷且在“劉少奇第一、鄧小平第二”這一接班人的順序上取得了共識。

1959 年 4 月劉少奇在第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當選爲國家主席，其照片開始和毛澤東幷列于《人民日報》等媒體。明確宣示了劉少奇的接班人地位。

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從以上事件可以看出，以“八大”爲分界點，毛澤東退出中央日常工作，劉少奇、鄧小平開始全面主持管理黨和國家的日常工作。毛澤東則繼續領導軍事、外交和意識形態領域。劉少奇作爲毛澤東接班人的位置，不僅在體制架構上，還是輿論方面，都已經確立，幷宣示天下。鄧小平以中共中央總書記身份領導中樞，包括宣傳系統事務，以及任當時權力極大的中央反右領導小組組

長。而毛澤東則對自己一手推動的接班人培養機制給予充分支持。1961 年毛澤東在接見英國元帥蒙哥馬利時，客人問毛澤東是否有明確的繼承人時，毛澤東明確回答："很清楚，是劉少奇，他是我們黨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後，就是他。"是公開對這一接班人安排的再次確認。劉少奇的升位是毛澤東主動讓賢的結果，而不是被迫，更不會如後來某些人所說的劉少奇位置提升引起毛澤東的妒忌和不快。

固然，以毛澤東的威望，劉少奇雖然成爲國家主席和接班人，但威望上與毛澤東有很大的差距，但其接班人的特殊地位，以及鄧小平的迅速崛起和總書記身份，決定了任何高層領導人和省區縣領導都明白他們未來的頂頭上司將是劉少奇和鄧小平，這個政治風向標如此明確，每個高層政治人物要想有安全的政治生命和光明政治前途，就不能不認真揣摩和順從劉少奇和鄧小平的政治傾向和言論，自然也會有越來越多的政客們開始向劉鄧身邊靠攏。同樣的道理，劉少奇鄧小平的言論也必然具有方向性和輿論導向的影響力。因此，毛澤東在大政方針上的方向性指引的最終實施及執行效果，取决于劉少奇鄧小平領導下的一綫領導集體的具體政策制定和輿論引導。要知道，當時鄧小平身爲總書記，是宣傳系統的直接領導者。劉鄧有可能很好執行毛澤東領導黨中央制定的宏觀大政方針，但也有可能念出歪經。

很顯然，三年經濟困難發生及前後的整個時間段，中央日常事務是由劉少奇和鄧小平及時任總理周恩來在負責，但毛澤東去世後提到這段歷史時，整個中共輿論壓根就不提劉周鄧的具体責任。而鄧小平作爲第二代領導核心，即當裁判也兼運動員，顯然

不可能對歷史有公正的評價。由此，筆者可以得出一個具有必然性的結論：第二代領導核心鄧小平主導下對這段歷史的評價是不可能客觀公正的，必然有他自己的傾向性和選擇性。明確了這一點，就爲今日及後來人以“空杯心態”來重新認識這段複雜而荒謬的歷史真實創造了條件，也必將爲中共中央在鄧後時代對新中國歷史的再認識逐漸厘清一個比較客觀的方向。

由此可以看出，在鄧小平主導下推出的歷史總結性文獻《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决議》必須進行檢討，必須把鄧小平和他政治盟友如劉少奇等放在歷史的天平上重新評價，才能對共和國歷史有準確的描述。才能讓人們對共産黨和共和國主要締造者毛澤東有準確的認識。

三、大饑荒發生的輪廓

先把大饑荒産生的粗略框架輪廓做個簡單描述，以方便讀者初步有個粗綫條，再去探究每一個細節。輪廓可以讓讀者有個快速的印象，而魔鬼存在于細節裏。

1958 年大躍進開始，工業方面大躍進本處不談，只談農業領域。“共産風”和“浮誇風”下各地爲攀比成績，開始出現了不切實際的高指標，但農業的實際産量達不到怎麽辦？基層官員開始冒出一些謊報産量的現象。毛澤東對于畝産千斤、幾千斤，甚至萬斤的報告深感懷疑，他多次要求降降溫，即使有高的産量也暫時不讓報道，但在警惕浮誇風時，他又謹慎地要求不要打擊人

民的積極性，這是政治方向的把握。由于各地攀比産量，必然導致糧食徵購的高指標。到 1959 年，有些地方政府爲了把自己謊報的高産量給掩蓋住，不得不努力完成上級下達的交公糧指標，以至于把糧食種子都交上去了。接踵而來的就是不少地方産糧全部交上去，種子不够用，導致荒田萬裏，糧食斷産，在口糧不濟的情況下，逃荒要飯開始遍布全國，啃樹皮、挖草根、餓死人的現象在一些嚴重的地區開始蔓延，直至失控。

國務院在人民生死綫上掙扎的關鍵時期的 1959 和 1960 年還邪惡地出口了 680 萬噸糧食。如果用這些糧食及時救灾，雖吃不飽，但可確保沒有人被餓死，出口糧食多爲優質糧，剩下的反而是瓜乾麵和玉米麵等低熱量的粗糧。當饑荒發生時，基層黨委有些擔心影響官職而隱瞞不報，沒有及時請調糧食援助，有些基層糧庫有糧，但基層幹部不敢開倉賑灾，也不敢請示。缺少糧食種子，人民在饑餓中也沒有力量勞動，導致灾荒持續時間延長。可以說，大饑荒的原因是：錯誤的政策、中央一群胡塗蛋、各級黨委王八蛋共同導致的結果。基層欺上瞞下、虛報邀功，使中央無法瞭解基層的實際情況，導致錯上加錯。

在這個過程中，有個重要的意識形態背景，就是極左路綫執行和反右擴大化。前面已經有提及。人們在寧左勿右的思想意識下，對浮誇風起到助推的作用。但這種助推作用一般會走向某個偏離科學的方向，但如何把糧食産量推到如此離譜到有違常識的地步，必然有高層的推波助瀾，這是執政實施過程中的結果，而不是錯誤理論的必然。不難想像，只要中央主要領導人都保持起碼冷靜，不去煽風點火，僅僅靠基層幹部的浮誇，絕對不至于荒腔走板到如此不可思議的地步。省市縣一級的領導即便有天大膽

量也不敢如此膽大妄爲地不顧基本常識而肆意亂來。舉國高中低層幹部的全面浮誇風必然有最高級別的輿論引導爲憑靠。這是中共政治生態下必然的邏輯。

那麼當時是誰在助推這種極端荒謬的舉措呢？各大媒體喉舌的編輯們在聽命于誰的指令來大篇幅報道“放衛星”的輿論導向呢？這是必須回答的歷史命題。

四、劉少奇：“共産風”的主要鼓吹者



先看看身爲負責中央日常事務的最高領導，國家主席和中央內部已經形成共識的毛澤東接班人劉少奇當時的作爲。

劉少奇從工運走來，本身幷沒有農業方面的經驗。也沒有證據證明劉與農民有密切的接觸與互動。但大躍進（“大躍進”這個名詞首見于 1957 年 11 月 18 日《人民日報》社論，該社論只經過劉少奇和周恩來審閱，而沒經過毛澤東）開始後，劉少奇在農業和農村發展上，却不斷發出激進的言論。尤其是多次關于快步進入共産主義的極左論述，在全國逐漸掀起瘋狂的“共産風”方面，他作爲最高領導人發揮了煽風點火和推波助瀾的作用。在關于快速向共産主義過渡的理念論述方面，劉少奇是表述最多，也最激進。

1958 年 4 月，劉少奇在開往廣州的火車上，曾與周恩來、陸定一、鄧力群等人一道談共産主義，說“我們現在建設社會主義，

就要爲共產主義創造一些順利條件”。談話內容很廣泛，如托兒所、生活集體化、工廠辦學校、學校辦工廠、半工半讀等等。[1]

7 月 5 日，他在與北京石景山發電廠工人座談時曾樂觀地說：“中國進入共產主義，不要好久，你們大多數人可以看到共產主義。”[2]

1958 年 6 月 14 日，劉少奇在與全國婦聯黨組織談話時說[3]：“婦女的解放，包括從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要擺脫家務就要普遍建立公共食堂。”接著他舉例說：“河南有一個農業社，有 500 多戶人家，其中 200 多戶搞公共食堂，家庭不再作飯了。組織起來之後，出工人數增加了三分之一，從前 200 多人作飯，辦起食堂後, 只需 40 多人作飯, 而且還吃得飽些、好些, 還節省了糧食。”他大膽地預言：到將來我們到共產主義不要多遠。十五年可以趕上美國，再有十五年等于三、四個美國；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國可進入共產主義。

這就是導致巨大糧食浪費的“大鍋飯”的根源，是由一綫最高領導人劉少奇親自發動的。沒有最高領導人的推動，很難想像“大鍋飯”會風行全國。

7 月 7 日、8 日，他視察了河北武清、香河兩縣和天津市。他邊聽彙報，邊與河北省、天津市和有關縣委、街道負責人談話，所談內容據時任河北省委書記處書記、省長劉子厚說：“總的精神，就是加速社會主義建設，加速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問題。”[4]

---

[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3 年版。
[2]金沖及《劉少奇傳》下册，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8 年版。
[3]見《同全國婦聯黨組織談話》一文。
[4]河北省檔案館藏《1958 年 7 月 14 日河北省委書記處、天津市委書記處聯席會議記錄》。

7 月 19 日，劉少奇在天津視察時提出：在幷社時一鄉一社，政社合一。將來是否叫社，農莊也包括不了，因爲有工業，有學校，有商業，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實際上是共產主義的基層結構。這就是組織起來的公社，有農業，有工業，有學校，有商業，生老病死都在這裏，這是共產主義公社。

可以說，當時劉少奇的講話體現了他對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强烈期待。如果這種思考僅僅限于學術理論層面倒不是大問題，但不幸的是，劉少奇手握國家經濟社會事務一綫領導大權，他的話就不可能只是談想法，必然要進行實踐的。即使他不去推，下面也會去做。

河北徐水縣成了劉少奇共產主義實踐的第一個試驗田。[1]

河北徐水縣是個窮縣，土地貧瘠，1957 年畝産量才 200 斤。實現農業合作化以後，1957 年秋末，徐水縣委領導全縣人民大興水利建設（秋冬農忙結束後，組織農民開展水利建設是正確的，這種利用農忙淡季搞水利和修路，全國範圍一直持續到毛澤東逝世，這是必須肯定的），對全縣十多萬勞力統一調度，實行軍事化組織與管理，打破鄉社界限，搞大兵團作戰。各單位自帶工具，自備糧草。爲適應日益高漲的“大躍進”形勢，全縣普遍實行了小社幷大社，辦起了公共食堂、幼兒園、敬老院、縫紉廠，使家務勞動集體化和社會化。

1958 年 2 月，分管農業的書記譚震林聽了時任徐水縣委第一

[1] 這部分內容參考了宋連生文章《徐水“共產主義試點”决策始末》（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主辦的“民間歷史”網站）、中共中央黨校主辦的中國幹部學習網 http://study.ccln.gov.cn 等。

書記張國忠的彙報後到徐水考察，對大兵團作戰興修水利的做法很感興趣。隨後在河北省三級幹部大會上大力表彰徐水。回京後，指示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陳正人赴徐水，系統總結經驗，準備全國推廣。譚震林的表彰與推薦，對提升徐水經驗的影響力發揮了重要作用。陳正人于 3 月 14 日給中央的報告肯定了徐水經驗。毛澤東讀了報告覺得很好，批示："徐水縣的經驗普遍推廣。"[1]

1958 年 8 月 4 日，毛澤東親臨徐水視察。毛澤東視察了徐水縣南梨園鄉大寺各莊農業生產合作社。看到莊稼長勢喜人，聽說小麥獲得畝產 754 斤的大豐收，毛澤東感到由衷喜悅（對于農民出身的毛澤東來說，這個畝產量令他激動興奮）。贊揚了徐水的工作，尤其是對組織、管理軍事化大爲贊賞。他的談話隨興而發，經媒體報道便迅速傳遍全國，幷深刻影響著各地的"大躍進"進程。但毛澤東從來沒有講共產主義的隻言片語。毛澤東對徐水的贊揚被一些人利用來指責爲毛澤東支持後來的共産主義實驗。

8 月 6 日，也就是毛澤東視察後第三天，陳正人再赴徐水，傳達劉少奇同志指示在徐水搞試點，搞共產主義，搞工、農、兵、學、商結成一體等，他還傳達了劉少奇的一些具體指示，如在徐水擺兩座大工廠，全縣可搞一個大聯社。[2]

有劉少奇這位最高一綫領導的指示，中央、省委、地委和縣委組織了有 100 多人參加的規劃班子，參與制定向共產主義過渡的規劃。在中央、省地工作組的具體指導下，徐水縣委于 1958 年 8 月 22 日繪製出宏偉藍圖《關于加速社會主義建設向共產主義邁進的規劃草案》。草案提出的目標是："1959 年基本完成社會主

[1]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7 册，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2 年版。
[2]徐水縣檔案館藏《1958 年 8 月 8 日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陳正人副部長在徐水縣鄉、社幹部座談會上提出一些指示》。

義建設，幷開始向共產主義過渡，到 1963 年即進入偉大的共產主義社會。”[1] 所規劃的共產主義前景諸如：今冬實現灌漑機械和加工機械化，明年實現耕作機械化，農村初步電氣化；1963 年實現高度機械化和電氣化。1959 年每人平均占有糧食 2000 斤，食油 20 斤，肉類 50 斤。1963 年每人平均主要生活資料初步實現各取所需。1959 年，30 歲以下的文盲都消滅，到 1963 年，達到高小以上文化程度；再過 5 年，30 歲以下的人都達到高等專科以上的文化程度，成爲專家。[2]

在這篇“共產風”原始方案的“規劃草案”公布不到一個月，徐水縣委于 9 月 20 日又向全縣人民頒布《中共徐水縣委關于人民公社實行供給制的試點草案》。草案規定：每個人的吃飯、穿衣及主要生活必需品的需要，由公社有限制的，按照工農商學兵大體平等的標準計劃供應[3] “試點草案”的基本精神是吃飯不要錢，幹部、工人、職工、農民不發薪金，每月只給幾元錢的補貼，服裝、日用品都由公社統一發，連洗澡、理髮、看戲、看電影都由公社統一包起來。“試點草案”規定了實行供給制的範圍包括農民、工人、幹部、職員（包括教員、商業人員）及一切在徐水的工作人員。“試點草案”公布後，舉行了群衆游行，抬著“慶賀全縣實行供給制”、“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紅匾，敲鑼打鼓，高喊“擁護供給制”、“以實際行動加速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口號，開始了“共產主義生活”[4]

然而這種脫離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共產主義試點”，僅兩個

[1]《河北黨史資料》第 15 輯，119 頁。
[2]《河北黨史資料》第 15 輯，120 頁。
[3]《河北黨史資料》第 15 輯，162 頁。
[4] 見《徐水日報》1958 年 9 月 19 日。

月就面臨物資供應和資金短缺問題而草草收場。

這裏有個關鍵事件值得留意:

在徐水“共産主義實驗”高潮時的9月10日，劉少奇來徐水視察工作。聯想到上述徐水縣委于9月20日頒布的“全民供給制草案”，很難想像，如果劉少奇視察期間稍微降點溫，這樣的“全民供給制草案”是否會出爐。或者換個角度理解，由于該“試點草案”的內容幷沒有出現在8月22日編制的《關于加速社會主義建設向共産主義邁進的規劃草案》，所以，“全民供給制草案”和劉少奇的視察時間剛好是“前脚走後脚制定頒布規劃”的時間順序。雖然筆者沒有找到劉少奇當時的完整講話，但劉當時有這樣的話“全民所有制還幷不就是共産主義性質的”。顯然，劉少奇認爲徐水在上述規劃草案裏沒有跳出全民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性質，要真正走向共産主義，也只有全民供給制了。從劉離開到頒布草案的中間9天的時間空間用來制定和徵求意見，是非常紧張的，筆者有理由相信，“全民供給制”是劉少奇的要求下起草的，否則，縣級黨委吃了老虎膽也不敢如此“大躍進”。有些人拿劉少奇的這句話說成是劉少奇的提醒和告誡，以此爲劉洗脫責任，則不符合邏輯，因爲當時的政治環境下完全無法想像劉少奇前脚刚走，縣委就敢違背劉的講話精神而著手起草“試點草案”。

對徐水的實驗，毛澤東有所警惕。1958年9月，毛澤東把身邊的18名工作人員派往徐水實地調查半個月（下面將提到的毛澤東令田家英等秘書室人員去四川種地來瞭解實際畝産量，可以看出毛澤東對劉少奇和鄧小平管控下媒體報道信息已經不太有把握）。反映了徐水縣普遍存在的“共産風”和强迫命令等問題引起毛澤東的警覺。10月15日至17日，毛澤東連續3天在天津聽取

徐水、安國、唐縣 3 個縣的第一書記和河北省委負責人的工作彙報後，對徐水提出了警告和批評。10 月 29 日，河北省委開會討論徐水工作和落實毛澤東的指示問題。此後，徐水把一縣一社改爲三級實權制，幹部、職工恢復幷補發了工資，房屋仍歸原主所有。那一年的秋糧本來長勢很好，但由于受大煉鋼鐵、大辦工業的衝擊，收穫時丟糟爛現象嚴重，入庫的糧食遠沒有預想的那麼多，公共食堂被迫開始定量，“津貼”也沒有了。雖然毛澤東顧及到劉少奇作爲接班人的體面而沒有徹底否定和取消徐水的實驗，但這個瘋狂的實驗就此不了了之。

但從全國來看，“共產風”和浮誇風還將繼續。劉少奇不會因爲徐水實驗的失敗而有所醒悟和冷靜。劉少奇的極“左”和“共產主義夢想”似乎已經根植于他的意識之中。他對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宣示在徐水實驗的同時和之後一直沒有停止過。

據《光明日報》1958 年 8 月 4 日報道，7 月 14 日到 18 日劉少奇來到山東壽張縣視察，少奇同志在參觀了台前社畝產將達 3 萬至 5 萬斤的玉米，3 萬至 5 萬斤的穀子，30 萬斤地瓜和宏偉社畝產 15000 斤籽棉的豐產後，贊揚他們說：“你們壓倒了科學家，他們沒敢想的，你們做到了，這是個革命。”劉少奇不但對如此荒謬的浮誇風不予壓制，還對此給予鼓勵。

《人民日報》1958 年 9 月 30 日報道國家主席劉少奇視察江蘇常熟縣，聽到畝產萬斤時，他說：“一萬斤還能再多嗎？你們這裏條件好，再搞一搞深翻，還能多打些。”一時全國上下紛紛放衛星，產量成了衡量幹部政績的重要指標。這個講話一出，各地的實驗田、豐產田紛紛把原來畝產一千幾百斤、幾千斤的牌子換爲幾千斤、上萬斤甚至十幾萬斤的牌子。



劉少奇和鄧小平審定的，1958 年 9 月 13 日的《人民日報》發表的《高舉人民公社的紅旗前進》社論，是鼓吹“共產風”、“窮過渡”，和“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證據。這篇社論沒有經過毛澤東審閱。在當時的人民公社化運動中，起了很壞的導向作用。社論要求在建立人民公社時，一定要建立公共食堂、托兒所、縫紉組一類組織，要求婦女勞動力全部參加生產，只有這樣做才能體現人民公社比農業生產合作社更加社會化，更加集體化的優點。鼓吹一般的人民公社實現由集體所有制轉到全民所有制時，經過三、四年或者五、六年就行了。社論公然把 8 月 29 日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擴大會議通過的《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决議》中由毛澤東加上的“或者更長一些時間”這半句刪去。[1]

1958 年 9 月 16 日至 18 日，劉少奇到河南視察，9 月 24 日人民日報以《少奇同志在河南視察時具體闡述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幾個條件》爲題目報導了這一重大新聞。報導說：劉副主席在 9 月 13 日的《人民日報》社論中，已經强調，有條件的可以立即過渡到全民所有制，條件還不成熟的最慢不能超過三、四年或五、六年。劉少奇提出了一系列嚴重脫離實際的過渡到共產主義的預備條件。劉的講話違背了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的講話精神。毛澤東說：人民公社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不要過分强調共產主義。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人多，生產規模大，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建立以後，要忙于改集體所有制爲全民所有制，在目前還是以集體所有制爲好，過渡到全民所有制，它的性質還是社會

[1]摘自中共中央黨校主辦的中國幹部學習網 http://study.ccln.gov.cn。

主義的各盡所能，按勞分配[1]。

《人民日報》報導還說，劉少奇在河南視察時，還“聽取了新鄉七裏營人民公社、修武人民公社和遂平人民公社黨委的彙報，幷作了重要指示。”具體作了哪些指示報導沒有具體講。但從毛澤東 1958 年 10 月派吳冷西和田家英率領調查組到新鄉七裏營人民公社和修武人民公社的調查報告看，可以認證劉少奇指示的後果：實行一縣一個公社，全縣統一核算，統一收支，共負盈虧，貧隊和富隊一齊拉平；實行全民所有制，搞供給制，實行十六包；實行消滅家庭，搞男女老少分別編班，分開做事，分開居住等等。[2]

從上述一系列劉少奇的講話可以看出，他罔顧組織原則，嚴重脫離實際，不顧中國人家庭倫理需要，大搞共産風，而他視察幷發表講話的河南，也就成了百萬人民慘死的重災區。

以劉少奇的身份，他的講話是對“共産風”和浮誇風最有效的煽動，從各級領導到基層民衆會毫不猶豫地當成政治綱領或行政命令。尤其是在鄧小平領導下强力進行反右擴大化的背景下，各級黨委如果不跟著接班人劉少奇的話去做，那等于找死，隨時會被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因此，從劉少奇的講話不難看出，他作爲一綫最高領導人，對大饑荒和一系列荒謬現象的發生負有不可推卸的嚴重罪責！

---

[1]毛澤東：《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講話》。高凱主編《毛澤東大觀》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 年版，116 頁。

[2]摘自中共中央黨校主辦的中國幹部學習網 http://study.ccln.gov.cn。劉爲啥不在中南海和自己家人那裏先這樣試點？中共高層幾十年來的通病就是，對社會最底層的農民隨意行政。


人民日報
RENMIN RIBAO

麻城建国一社出現天下第一田
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
福建海星社創花生亩产一万零五百多斤紀录



五、鄧小平：背負歷史罪責而罔顧正義

鄧小平作爲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和政治局常委，執掌中樞機關，他成爲二代核心後又放任民衆和輿論對毛澤東的過分責難，他的角色同樣有必要做一下整理。

1958 年 10 月 1 日《人民日報》刊登新華社關于鄧小平李富春 9 月去東北視察的報道。報道如下：

《鄧小平李富春視察遼吉黑三省時強調說，東北要大挖潛力支援全國》

新華社 30 日訊　中共中央和國家領導人鄧小平、李富春、李雪峰、劉瀾濤、楊尚昆、蔡暢和趙爾陸等同志，9 月 10 日至 29 日先後到黑龍江、吉林、遼寧三省視察了工作，對東北地區工業、農業、文化教育、城市公社、整風等方面工作作了重要的指示。

鄧小平等同志視察了哈爾濱近郊的金星人民公社、雙城縣的幸福人民公社、蓋平縣的太陽升人民公社，并聽取了三個省的農業情況的彙報。小平同志指出：東北三省的農業生産，按常規來說，同過去來比，是有進步的。但是，目前是一個出奇迹的時代，全國糧食産量今年可能增産 100%以上，而東北三省糧食産量增長不過百分之幾十甚至只有二、三十。這樣一比較，東北的農業就還沒有翻身。（作者點評：令人髮指的邪惡政治指標）

鄧小平同志指出：全國農業增産的經驗，概括說來就是水、肥、土、種、密加上田間管理齊頭并進。這是農業生産的“憲法”，

是毛主席的“憲法”[1]，是事實證明瞭完全正確的“憲法”，是已經創造了奇迹的“憲法”。東北的某些領導人和廣大地區沒有堅决執行這個“憲法”，而繼續執行著寬壟淺耕、廣種薄收的老一套，不是用革命的辦法而是用改良的辦法領導農業，結果使農業生產大大落後了。這個事實，反映了農業生產戰綫上兩條道路兩種方法的鬥爭還很尖銳，說明農業方面還有白旗未拔，思想還沒有解放。

鄧小平同志在視察幸福社和太陽升社的時候指示說，每一個社明年都應該指定一兩個耕作區作大面積豐產試驗。可以把現有土地耕種面積縮小一些，集中力量搞好密植，提高單位面積產量。這樣，既可以增產糧食，又可以使一部分土地綠化，一部分土地輪休。

據河北日報消息：

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同志和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李雪峰、候補書記劉瀾濤、楊尚昆等同志，于10月8日至14日，在河北省城市和農村進行了視察。鄧小平同志在視察過程中，還談到了城市人民公社問題。他說，全國6億農村人口都實行公社化了，只剩了5000萬城市人口，形勢逼人，公社非辦不可。他要求各地對城市組織人民公社作出規劃，積極進行試點，總結研究經驗。對城市組織人民公社問題作了若干原則指示。

---

[1] 農業八字憲法（即土、肥、水、種、密、保、管、工），是毛澤東根據我國農民群衆的實踐經驗和科學技術成果，于1958年提出來的農業八項增産技術措施，對實現科學種田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發揮20多年的影響力。但在1958至1960年“大躍進”期間，浮誇風推動下歪曲和誤解了農業“八字憲法”。

據《人民日報》1958年10月22日《堅决執行農業生產"憲法"永吉縣拔掉思想白旗，深耕運動出現高潮》一文報道：

中共永吉縣委根據鄧小平同志的指示，堅决貫徹農業生產的"憲法"，領導全縣廣大黨員、幹部和人民群衆，就深耕問題開展了兩條道路的鬥爭，拔掉了白旗，插上了紅旗，全縣出現了深耕高潮。

鄧小平同志到吉林永吉縣視察時，對這個縣明年農業生產作了指示，要求每人平均要達到三千斤糧食，收入三百元錢。

《人民日報》1958年10月28日報道：《搶在封凍前翻完秋茬地　東北三省堅决執行農業"憲法"　力爭明年糧食産量至少翻一番》（本書作者按：這篇報道是對鄧小平指示的細化）

本報哈爾濱27日電　中共中央和國家領導人鄧小平等同志視察遼寧、吉林、黑龍江時，對東北三省農業生産所作的重要指示，在東北三省千百萬農民中已産生巨大影響。目前三省農民正以每天深翻地五百多萬畝的進度和嚴寒冰凍賽跑。

在東北地區廣闊的田野上，白天到處都是千軍萬馬，夜晚是燈籠火把，連夜苦戰。各地集中了大批的能工巧匠，晝夜不停製造繩索牽引機，以加快深翻地的進度。黑龍江省已有好多縣，平均每一百五十畝地就有一台繩索牽引犁。除此以外，拖拉機、畜力犁、人拉犁、翻地的鐵鍬等都一齊上陣。城鎮居民也全力支援農業生産。大部分縣城機關只留幾個人駐守，下鄉幹部不僅是田頭辦公而且和農民一起翻地。即便是瀋陽這樣的工業城市，鋼鐵等生産任務十分緊張，仍然有八萬人編成連隊，分赴十一個縣（市），大戰二十天，幫助農民翻地。哈爾濱市區十萬多職工、學生、駐軍，上星期天冒雨到郊區參加義務勞動，一天幫郊區農

村深翻地三萬六千畝。

……



铁的证据：1958 年 10 月 8 日鄧小平在天津接見畝產十一萬斤先進代表時留影。戴帽者是河北省委第一書記林鐵，他旁邊光頭是劉瀾濤，黑衣者是鄧小平，鄧小平身後白襯衣者爲楊尚昆。

東北三省今年農業生產都比過去大大前進了一步，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增產幅度，分別爲 30％到 52％。但和關內各省農業增產一倍以至幾倍以上的情况相比，還沒有徹底翻身。根據各地總結經驗、教訓，必須全面執行毛主席所指示的“水、肥、土、種、密、害、工、管”這個農業生產“憲法”，才能使農業得到徹底翻身。爲了使明年東北三省糧食產量至少要比今年翻一番，各地首先抓今年執行農業“憲法”中比較薄弱的土和水兩個重要環節。先搶深翻地，使耕地普遍深翻一尺以上；改進和推廣去冬水利施工經驗，利用冬季大幹水利；同時抓緊積肥和準備好足够密植需要的良種。

作爲農業生產方針重大革命性的措施，黑龍江省明年耕地面積比今年要縮减六分之一，即減少播種面積一千六百多萬畝，變廣種薄收爲精耕細作。一部分縣和人民公社開始醞釀，使現有耕地生產糧食、休閑、種樹各占三分之一，實行“種的少，種的好，收的多”的農業生產方針。

三省各級黨、政領導人分析了過去東北三省對農業生產“憲法”執行的不全面，主要原因是思想還沒有徹底解放，“唯條件論”、“習慣論”的影響還沒有完全肅清。因此目前正在深翻耕地的高潮中，普遍發動農村幹部和群衆，在田間地頭學習討論了小平同志的指示，就農業生產的徹底翻身進行了鳴放辯論，通過鳴放辯論來發動群衆，以大搞群衆運動，推進農業上的徹底革命。

從大量的當時報紙報道中，可以看出農業方面完全外行的鄧小平對農業問題隨意指示，盲目減少耕地面積，追求高指標，更惡劣的是，還動輒將達不到高指標上升到政治認識和路綫鬥爭層面，在反右擴大化的恐慌陰影下，這是最讓各界官員和知識分子忌憚的，因此，鄧小平“浮誇風”指示往往具有極大的震懾力，甚至具有强制命令的效果。這類對鄧小平視察和講話的報道，不是其他領導人可以來“搶功”的，因爲當時《人民日報》這類黨的喉舌和中宣部直接領導者就是總書記鄧小平。而他領導下的報紙在記錄他的活動的同時，也將他的歷史罪責清晰記錄在案而永遠無法抹去。鄧小平作爲中央反右領導小組組長的身份，給他的權威性和對各級官員的震懾力提供了“核武器”，因爲他以反右主帥的角色可以對任何不配合和達不到指標的幹部扣上右傾的帽子。當然，對于那些積極配合他講話精神的地方領導，則不論正義邪惡，都大加支持和保護。

鄧小平是如何保護那些搞浮誇風最惡劣的地方酷吏的呢？

在導致大饑荒的省級領導層面，有五隻吃人的“老虎”，分別是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舒同、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中華大地出此類妖孽，真是民族之大不幸）

在去廬山會議的路上，田家英曾向李井泉提及四川餓死人的事，李冒出了他的名言：“中國這麼大，哪朝哪代沒有人餓死！”李對民衆沒有任何的同情之心，沒有任何的責任承擔，自己管理的省份有餓死人發生，他居然沒有任何的羞愧和廉恥感，此等喪心病狂的政治惡魔是如何在共産黨體制內生存和升官的，真是個可悲的現象。

廬山會議結束後，他利用批評彭德懷還沒有向下傳達的間隙，故意來考驗四川幹部對彭德懷談看法，那些認可彭德懷的人都被他打成右派或嚴懲。這種下流的手段，也只有他能用的出；彭德懷畢竟是國防部長，是元帥，在中央沒宣布對彭德懷的批判之前，基層幹部和民衆自然對彭德懷多一份尊重，但李用這種卑鄙手段來引蛇出洞。1959 年他強制四川的糧票作廢，將群衆辛苦積累的保命機會切斷。據楊繼繩調查，鄧小平曾對李井泉講：在北京餓死人的政治影響比在四川山村餓死人的影響要大，從全局考慮。所以李井泉有了尚方寶劍來大量抽調四川糧食支援全國，四川百姓的生命就這樣被犧牲掉了。所以，四川雖然是饑荒最嚴重的省之一，但李井泉在後來的清算中却得以過關。李井泉不僅是鄧小平的鐵杆政治盟友和執行者，兩家也是通家之好。在七千人大會上，李井泉做了自我檢討而難以過關，鄧小平則出來表態：“調糧的問題，井泉同志檢討了。中央也有責任，這個問題不能怪四川省委，四川調糧調得多了些，死人死得多了些，中央也有責任。”（鄧小平對家鄉四川大量死人，如此兩個“多了些”，真的是“舉重若輕”）鄧小平絲毫不提李井泉的罪惡不僅僅在調糧，而在“放衛星”方面，李爲全國開了個惡劣的先例。在鄧小平複出後，中央討論對毛澤東的定位和起草《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决議》時，李仍然是受邀參與討論的高級幹部之一，讓這種殘害百萬四川人民的劊子手來討論一位偉人的歷史評價，具有極大的諷刺意味。

另一個超級混蛋就是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

吳芝圃通過在河南大搞反右擴大化，大煉鋼鐵和沒有科學論證下的大修水利等基礎設施上的亂來行爲，在農業上“放衛

星”，在信陽地區用殘酷手段對付饑餓的農民，河南饑民逃荒要飯遍布全國，大量人口餓死，官方數據顯示河南餓死 150 萬，特別“信陽事件”就死亡大概 120 萬。

吳芝圃這個雙手沾滿河南人民血泪的王八蛋，“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揪鬥清算（“文革”被打倒的幷不都是好人），死于 1967 年，這本來是因果循環的必然。吳對自己的罪惡有清醒認識，他自己曾在檢討中說：“省委和我犯的錯誤嚴重得很，罪惡也很大。組織上無論如何嚴肅處理，我都沒話講的。處以極刑，我也應引頸受戮。” 他至少還有半點廉耻和自醒。但吊詭的鬧劇在毛澤東去世之後上演。

1979 年吳芝圃被平反！

1979 年 1 月 24 日下午，在北京全國政協禮堂，鄧小平親自爲吳芝圃平反幷主持追悼會。悼詞中宣布：“對于强加給吳芝圃同志的一切誣衊不實之詞應予全部推倒，徹底爲吳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說他“爲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共産主義事業鞠躬盡瘁，無私地貢獻了自己的一生”。顛倒黑白如此，黨性、人性、原則何在？就連吳芝圃自己都承認犯下極大罪惡，對河南大量餓死人負有責任，但鄧小平却將此稱之爲“一切污蔑不實之詞”，河南百萬死難同胞的亡魂就這樣被再次戲弄！！鄧小平在大贊吳芝圃時，不可避免地捆綁了他們共同的歷史片段，爲後人提供了一個參考聯想的空間。

筆者沒有找到吳芝圃和鄧小平之間親密合作起于何時，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大躍進期間吳芝圃在河南反右擴大化和瘋狂“放衛星”時正是鄧小平主抓中央日常工作幷任反右領導小組組長之時，鄧小平是吳芝圃的領導，他們二人在罔顧客觀經濟規律而在推動浮誇風方面，都“戰果輝煌”，一位是以中共中央總書

記、政治局常委、反右領導小組組長之職（副組長是時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的彭真，彭在第二代成爲五老之一，與和鄧小平的政治盟友合作歷史有關），利用他管控的黨的喉舌媒體煽風點火；一個則在中原大省的實際操作中，充分實現高層意志和精神，將劉少奇對河南的指示徹底貫徹，將浮誇風吹到無以復加的極端。沒有鄧小平在浮誇風中的支持，吳芝圃斷沒有膽量如此狂妄而不計後果（廬山會議後，吳芝圃無視毛澤東的三令五申而沒有任何收斂），沒有鄧小平對吳芝圃深體“聖意”的高度贊賞，就不可能有後來鄧小平對吳芝圃的平反。在平反冤假錯案時，以吳芝圃當時的官位，實際上是不可能勞動得了時任副總理和具有最高政治影響力的鄧小平親自主持平反和親自致悼詞的，但鄧小平一反常態地做了，而且給予吳芝圃極高的贊譽。由此可以判斷，鄧小平和吳芝圃在那并不長時間內形成的關係是如何的密切，進而形成政治上的捆綁。鄧小平對吳平反和高度贊譽，恰恰暴露了鄧小平的政治人格中那令人遺憾的污點：爲了個人的好惡完全不顧原則，放弃黨性乃至人性。

我不會因爲鄧小平的歷史污點而否定他對改革開放和國家統一事業所做的偉大貢獻，但我同樣不會因爲他晚年的貢獻而對他必須承擔的歷史罪責視而不見。鄧小平的政治人生，有人評價爲舉重若輕，大智大勇，“鋼鐵公司”等美譽，但看他毛後時代公開鼓勵軍隊經商而對人民軍隊進行了精神上的摧殘，公開釋放大貪官進而導致貪污盛行等行爲，結合上述歷史事件，我更傾向于認爲，鄧長于術，而疏于道。



六、周恩來：明哲保身下任由蒼生倒懸

再看一下另一位核心領導人周恩來總理當時做了什麼。

周總理領導的國務院，是中國經濟社會決策與領導執行的最高領導機關。筆者掌握的資料中沒有可靠的關于周總理推動還是抑制浮誇風的證據。周恩來作爲國務院總理，對“放衛星”和糧食徵購沒有任何的反對和抑制措施，使得他無法逃脫百萬人民慘死的領導責任（徵購糧食是國務院的直接責任），雖然他的具體責任只有等歷史檔案解密後才能一窺其貌。

這位備受人民愛戴的總理，在如此荒謬的浮誇風面前，居然找不到任何的蛛絲馬迹來證明他曾對浮誇風做任何的抑制和警惕，而關于周總理在文革期間如何利用自己的權力來控制“文革”的破壞和如何保護科學家的歷史片段則耳熟能詳。一個最高政務官在關鍵歷史時期不作爲，說好聽點是明哲保身，說難聽點是不負責任，對萬民倒懸置若罔聞。如果當時周總理哪怕私下在毛澤東面前稍微表示自己的擔憂，毛澤東在抑制過熱的浮誇風方面也不至于孤軍作戰。在百姓最危難的時候，周選擇隱身，而不做哪怕是基本的責任承擔。當人們對他吃著農村帶來的難以下咽的窩頭而感動萬分時，似乎沒有去追問，在農民被基層官員像瘋狗那樣搶走手裏最後一粒糧食時，身爲人民的總理，您在哪裏？人民需要的不是幾句溫情的語言和幾滴眼泪，而是一個政治家在關鍵時候對民衆的强大責任和擔當。

無論如何爲周恩來開脫，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周恩來在

明知饑荒蔓延時，非但沒有利用他的職權緊急開倉放糧救濟饑民（當時各地糧倉實際上是有存糧的，據我父親講，我的家鄉山東曹縣孫老家公社當時的黨委書記，就敢于拿出公社儲存的公糧救濟灾民，才使得孫老家公社餓死人情况沒周圍地區嚴重），在饑荒最嚴重的 1959 年和 1960 年，還繼續大量征糧，幷出口了 680 萬噸糧食，用賺得的外匯于 1960 年進口了大量黃金。周恩來很清楚這些黃金可以挽回多少農民的生命。

不論周恩來對知識分子和老幹部們多麼好，對底層農民的無情——想想那些種糧的農民一個個家庭在饑荒中消失的慘況，使得我這個農民的兒子無法對他產生一份感动。中國精英階層對底層人民的漠視，周恩來也沒能免俗。

在關于三年經濟困難時是否要下馬“兩彈”問題上，同樣找不到周恩來的任何表態。

當然，筆者對周恩來當時的處境有幾分建立在揣測下的理解，不排除作者有小人之心的可能性。

當時劉少奇已經被公認爲是毛澤東接班人，劉少奇的照片已經和毛澤東幷列在《人民日報》的頭版，任何要在中國政壇生存下去的政治人物，都不得不考慮劉少奇這位未來頂頭上司的言論和思想，不論您是否喜歡。周恩來可能已經意識到，毛澤東對劉少奇作爲接班人的堅决支持下，他否定劉少奇的言論與思想，即使在毛澤東那裏也可能未必得到支持，但却冒極大的政治風險。周恩來具有很强的政壇生存能力，他不表態支持，似乎已經表明了他的反對態度；但這種沉默幷沒有任何的力量，最多只是給熱愛周總理的民衆帶來些許心理的安慰，以及對他的理解與寬容。這種明哲保身的中庸之道帶來的如此嚴重後果，則讓人難以平抑

內心的那份矛盾和責備。

在“文革”期間劉少奇被打倒，周恩來是贊成的，至少表面上如此，第二代領導人時期出現不少所謂“周恩來贊成打倒劉少奇是違心的”的說法，筆者持保留態度。且不說大躍進期間劉少奇所作所爲對于聰明如周恩來者，豈能看不出問題？在延安整風時期，劉少奇也排斥過周恩來。劉、周不是一條道上的政治夥伴，但却不得不在一個屋檐下共事，使得周恩來在劉少奇被確定爲接班人之後變得格外謹慎也就不難理解了。劉少奇在歷史上整人的“輝煌成績”，和排除异己的鐵血手段，高層不少人應該多少有點印象和自保意識。

楊繼繩提到，在 1961 年底，針對到底餓死多少人的調查，當時糧食部長陳國棟、統計部長賈啓允、還有糧食部辦公廳的主任周伯萍要求各省填一個表，到底餓死多少人，可能有兩千萬人。周伯萍說，周恩來看了報告，要求趕緊銷毀。過了一個星期，周恩來問他們銷毀了沒有，他們說銷毀了，我們三個人一起銷毀的，連板都銷毀了。

從這個事件中，可以看出周恩來的做事風格。他也許是個不錯的協調人，但在筆者人到中年仍然還不失率真的性情中，就是不欣賞這種中庸處事風格。周恩來的做法可能出發點是好的，但社會需要擔當，領導需要原則和作爲。

豪情從來就難容中庸！偉人必然勇于擔當！



1966 年刘周邓最后的聚首

七、毛澤東的作爲和責任分析

在談論毛澤東對待農業的立場，不得不提一個由毛澤東發起制定，幷獲得黨代會和人大通過的重要文件《1956～1967 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

1955 年下半年，中國農業合作化運動迅速發展。爲迎接幷推進當時預期即將來臨的農業生産高潮，毛澤東在 1955 年 11 月間，先後同部分省、自治區黨委書記就全國農業發展問題共同商定了《十七條》。隨後，在毛澤東主持下，將《十七條》擴充爲《1956 年到 1967 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于 1956 年 1 月 23 日提交最高國務會議討論後公布。1958 年 5 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原則通過了《1956 年到 1967 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第二次修正草案）》，委托中共中央委員會再作必要的修改。1960 年 4 月 10 日經第二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通過，頒布了《1956 年到 1967 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幷號召全國人民爲實現此綱要而奮鬥。

《1956～1967 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主要內容有：

（1）鞏固農業合作化制度。爭取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或者更多一點時間，把所有的農業合作社鞏固起來，使大多數合作社趕上或者超過當地富裕中農的生産水平和收入水平。（2）提高糧食和其他農作物産量。從 1956 年起，在 12 年內，糧食每畝平均年産量分別達到下列水平：在黃河、秦嶺、白龍江、黃河（青海境內）以北地區，由 1955 年的 150 多斤增加到 400 斤；黃河以

南、淮河以北地區，由 1955 年的 208 斤增加到 500 斤；淮河、秦嶺、白龍江以南地區，由 1955 年的 400 斤增加到 800 斤。簡稱爲“四、五、八指標”。這是綱要的基本點。棉花畝產（皮棉）由 1955 年全國平均的 35 斤，按照各地情況，分別增加到 40 斤、60 斤、80 斤和 100 斤。在優先發展糧食生產的條件下，積極發展紡織原料、油料、糖料、茶葉、烤烟、果類、藥材、蔬菜等。（3）發展畜牧業、林業、漁業和副業。其中包括：1967 年達到農村平均每戶養猪 2～3 頭（不養猪的少數民族地區等除外），12 年內綠化一切可能綠化的荒山荒地等。（4）推行增產措施和推廣先進經驗。增產措施的主要項目是：興修水利，發展灌溉，防治水旱災害；大力增加農家肥料和化學肥料；改良舊式農具，推廣新式農具；積極繁殖和推廣適合當地條件的農作物優良品種；擴大復種面積；多種水稻、玉米、薯類等高產作物；實行精耕細作，改進耕作方法；改良土壤；開展水土保持工作；保護和繁殖耕畜；防治和消滅病蟲害；開墾荒地，擴大耕地面積。（5）興辦農村各項事業。包括農村文化教育事業、廣播網、電話網、郵政網、商業網、交通運輸、信貸合作、氣象、水文以及農村科學研究和技術指導事業等。（6）提高農村生活水平。提高勞動力利用率和勞動生產率以增加社會財富和農村人民收入，改善居住條件，增加糧食儲備，除四害（指老鼠、臭蟲、蒼蠅和蚊子），努力消滅危害人民最嚴重的疾病，以及保護婦女兒童等。（7）城市支持農村，工人和農民相互支援。

上述綱要內容符合國情和農業農村實際，是對中國農業發展的科學策劃和高瞻遠矚的指引。筆者小時候就常聽大人們講要“跨黃河”（畝產 500 斤），“過長江”（畝產 800 斤），就是

該綱要所提畝產量目標的形象化。從該綱要可以看出，毛澤東對農業的準確認識，沒有任何好高騖遠的浮誇氣息。如果當時的一綫領導集體能够按照該綱要的指引來科學施政，中國農業和農村不僅不會發生大饑荒，而且會有個不錯的發展。但在 1958 年 5 月剛剛黨代會通過，劉少奇和鄧小平們在兩、三個月後就狂吹起“共產風”和浮誇風來（見前面內容），視黨代會决議文件如無物。

毛澤東對待虛報糧食高產的態度是什麽呢？他作爲唯一真正種過地的高層領袖，根本不相信這種產量。但八大之後，遞交給毛澤東的文件都要經過總書記鄧小平，毛澤東事實上是被他信任和任命的同志所屏蔽，他應該看到什麽，不應該看到什麽，已經由不得他了。這是毛澤東政治悲劇的開始。[1]

1958 年 11 月 2 日開始至 10 日，毛澤東召集部分中央領導人和地方負責人在鄭州舉行工作會議。在會上，毛澤東批評了急于想使人民公社由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以及企圖廢除商品生產等錯誤主張。在《關于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問題》的講話中，他指出：“提倡實事求是，不要謊報，不要把別人的猪報成自己的，不要把 300 斤麥子報成四百斤。今年的 9000 億斤糧食，最多是 7000 億斤，把 7400 億斤當數，其餘 1600 億斤當作謊報，比較妥當。人民是騙不了的。過去的戰報，謊報戰績只能欺騙人民，欺騙不了敵人，敵人看了好笑。有真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偃師縣原想瞞產，以多報少，也有

[1] 筆者對鄧小平當時作用的瞭解，是從一篇回憶文章中看到（忘記作者和標題）。該文介紹聶榮臻爲向西北原子彈項目參與部隊請調糧食而給毛澤東寫報告，他爲了避免鄧小平將報告壓下或拖延，而不得不將請調糧食的部分寫在最後，因爲他知道鄧小平是堅持原子彈工程下馬的主要領導人。當時看到這篇文章的一些細節，很意外，也很震驚。當然，這篇文章是否是歷史真實，有待考查確認。

的以少報多。《人民日報》最好要冷靜一點。要把解決工作方法問題，當成重點，黨的領導，群衆路綫，實事求是。”他强調：“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廢除商業，實行産品調撥，這就是剝奪農民，只會使臺灣高興。”“河南提出四年過渡到共産主義，馬克思主義‘太多’了，不要急于在四年搞成。不要以爲四年之後河南的農民就會同鄭州的工人一樣，這是不可能的。”（本書作者提醒：請讀者留意毛澤東這個講話的時間點，與徐水實驗和劉少奇河南講話、鄧小平地方視察時講話的時間點，可以看出毛澤東實際上在警告和糾正劉少奇鄧小平們已經和正在犯的錯誤。但可惜的是，毛的警告沒有被一綫領導集體重視和尊重，毛與一綫領導集體已經分野成兩個不同的思想中心）

緊接著，1958 年 11 月 21 至 27 日，毛澤東又在武昌主持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有部分中央領導人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在武昌會議上的講話》中，他指出：“鄭州會議提出的《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初稿，現在要搞成指示，作假問題要專搞一條，不要同工作方法寫在一起，否則人家不注意。現在橫竪要放‘衛星’，爭名譽，就造假。”“不要去爭虛榮。比如掃盲，說什麼半年、一年掃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掃除了就不錯。綠化，年年化，年年沒有化，越化越見不到樹。說消滅了四害，是‘四無’村，實際上是‘四有’村。上面規定的任務，他總說完成了，沒有完成就造假。”他强調：“現在的嚴重問題是，不僅下面作假，而且我們相信，從中央、省、地到縣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級相信，這就危險。如果樣樣都不相信，那就變成機會主義了。群衆確實做出了成績，爲什麼要抹煞群衆的成績，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錯誤。比如一千一百萬噸鋼，你說一萬噸也沒有，那當然不對了，但是真

有那麼多嗎?又比如糧食，究竟有多少，去年 3700 億斤，今年先說 9000 億斤, 後來又壓到 7500 億斤到 8000 億斤, 這是否靠得住?我看 7500 億斤翻了一番，那就了不起。”“現在有種空氣，只講成績，不講缺點，有缺點就臉上無光，講實話沒有人聽，造假，講得多，有光彩。講牛尾巴長在屁股後面，沒有人聽，講長在頭上，就是新聞了。”“破除迷信以來，效力極大，敢想敢說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過分了，把科學真理也破了（本書作者按：請參考前面所提 1958 年 8 月 4 日《光明日報》報道劉少奇同志表揚山東壽張縣的話）。比如說，連睡覺也不要了，說睡覺一小時就夠了。”11 月 25 日，毛澤東還在《一個教訓中》强調：“千鈞重擔壓下去，縣、鄉幹部沒有辦法，只好硬著頭皮去幹，少幹一點就被叫做‘右傾’（本書作者按：鄧小平作爲反右領導小組組長在浮誇風中所發揮的作用，前面有分析，與此處毛澤東的批評對應。“千鈞重擔”顯然是指高層的指標壓力），把人們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顧了生產，忘了生活。解決辦法：(一)任務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過群衆精力負擔的可能性，要爲群衆留點餘地；(二)生產、生活同時抓，兩條腿走路，不要片面性。”（本書作者按：毛澤東一直强調“生活”，與劉少奇把農民家庭分開搞大兵營式居住形成鮮明對照）

毛澤東在 1958 年 11 月連續在鄭州和武漢會議發聲，再聯繫到 10 月中旬對徐水共産主義實驗的批評，作爲退居二綫的領導人如此密集發聲來喝止和降溫浮誇風和“共産風”，苦口婆心，也難以讓劉、周、鄧這些一綫領導人有所警醒，他們繼續帶領全國瘋狂奔向大饑荒的懸崖。他們在毛澤東的警告後哪怕稍微有所收斂，那場慘絕人寰的人間悲劇也不會如此慘烈。但毛澤東已經不

在一綫，他在批評一綫工作時又不能不顧及對自己培養的接班人的尊重，他有威望但在中央高層的實際權力已經被架空，他的話被人用來“鍾馗打鬼”，但也被“鬼”用來打人。

面對全國各地上報的離譜的糧食產量，毛澤東高度懷疑，他不得不自己來親自收集農村的真實情況（真悲哀）。爲了搞清楚實際的畝產量，采取了一個不得已的措施，就是讓自己最信得過的秘書田家英帶領秘書室的戚本禹、逄先知、李學謙、駱文惠，1959 年初親自到四川農村去種試驗田（前面提到，劉少奇河南講話後，毛澤東曾派吳冷西和田家英等帶隊去河南瞭解情况，毛劉最後决裂的種子已經在悄悄埋下）。作爲諾大一個國家的最高領袖，不得不用這種低效率的方式來瞭解實際的國情，是一種悲哀，整個秘書室下基層也必然影響到毛正常的辦公，但不是因爲萬不得已，毛澤東怎麽會走出如此無奈的一步。作爲他的同事和下屬的其他高層領導，難道不是失職嗎？不覺得有辱自己的職業使命和職業道德嗎？毛澤東之所以選擇四川，是因爲時任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上報的四川最高畝產量上萬斤，平均是畝産兩千多斤。

毛澤東要田家英等五人去四川省，找一塊最好的地，用最好的種子，用農民的最好方法，自己種，自己管理，不要別人插手，從播種到收割全部自己來，看到底能打多少糧食。打下的糧食也要自己稱，是多少就是多少，不准多一斤，也不能少一斤，回來上報毛澤東本人。[1]

這一行五人，在四川新繁縣大豐人民公社分散到不同生産隊種植早稻，戚本禹是其中農業耕作經驗最好的，最後實際畝產量

[1] 摘自《戚本禹回憶錄》，此處只提取精簡內容。

是 500 多斤。這在當時是較高的產量。最後，由戚本禹等三人向毛澤東提交了親自種植考察報告《關于四川新繁縣糧食生產真相的報告》。毛澤東因此對李井泉進行了嚴厲的批評。

問題是，李井泉謊報產量如此之離譜，身爲一綫最高領導的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和主抓農業工作的副總理譚震林爲什麽就沒有發覺？這是無能和瀆職，還是因爲李井泉滿足了自己跑步進入共産主義的理念而盲目樂觀？

鄧小平身爲總書記，是下面信息上達毛澤東等領袖的中樞，不能爲身爲黨主席的毛澤東提供準確一手國情資料，無論如何解釋，要逃脫不掉最輕的譴責：瀆職。中國之大，如果每個行業都要最高領導人親自派身邊人員去基層調查才能獲得準確的國情資料，不僅效率低下，而且根本做不到，國家治理就失去了可靠的數據依據。

作爲黨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被浮誇風下的虛假信息所包圍，就連劉少奇等高層都在爲這個虛假的畝産量而提高期望值。劉少奇是毛澤東支持的接班人，不到萬不得已毛澤東必須顧及這位接班人在領導集體的尊嚴和體面，以强制命令式的方式要劉少奇和鄧小平等人對浮誇風降溫，有違毛澤東確定的一綫二綫的制度安排；毛澤東的冷靜與客觀已經很難經過國務院和媒體轉化爲實際的執政措施（《人民日報》甚至膽敢不登載或刪減毛澤東的講話）。面對農村愈演愈烈的浮誇風，毛澤東在“鄭州會議”等多種場合三令五申的關于“實事求是”內容的講話精神（諷刺的是：鄧小平後來高舉“實事求是”的大旗剝奪華國鋒的權利，以此爲旗幟開始瘋狂的非毛運動），根本貫徹不下去，整個中央似乎已經架空了這位主動讓賢的黨和國家創建者。各種不切合實際



《人民日報》曾刊登這個畝産萬斤的照片，小女孩坐在“密植”的麥垜上。毛澤東從報上看到這位小女娃嘻戲地站在稻秧上的照片時，當即搖頭風趣的說：娃娃，下來吧，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毛主席還接著說：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種過地的，畝産10萬斤，堆也堆不起來麽！（許全興：《毛澤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第138頁，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5年版）

的瘋狂“指標”照舊壓民，“浮誇風”及“亂下命令”的風氣依然嚴重危害農民的利益和黨的聲譽。在萬般無奈之下，毛澤東只好越過所有制度層級，向全黨各级幹部發出了一封公開信：

黨內通信：致六級幹部的公開信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志們：

我想和同志商量幾個問題，都是關于農業的。

第一個問題，包産問題。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産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只管現實可能。例如，去年畝産只有三百斤，今年能增産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際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又例如，去年畝産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是不可能的。

第二個問題，密植問題。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許多年青幹部和某些上級機關缺少經驗，一個勁兒要密植，有些人竟說愈密愈好。不對，老年人懷疑，中年人也有懷疑的。這三種人開一個會，得出一個適當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産，密植問題就得由生産隊、生産小隊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因此，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的命令，省委可

以規定一個密植幅度，不當作命令下達，只供下面參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爲好，積累經驗，根據因氣候不同，因地點不同，因土、肥、水、種等條件不同，因各種作物的情況不同，因田間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個比較科學的密植程度的規定，幾年之內達到一個實際可行的標準那就好了。

第三個問題，節約糧食問題。要十分抓緊，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閑時少吃，閑時半幹半稀，雜以蕃薯、青菜、瓜豆、芋頭之類。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緊。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緊很緊，而且要抓得及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一定要有儲備糧，年年儲一點，逐年增多，經過十年八年奮鬥，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須知中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一件大事。

第四個問題，播種面積要多少的問題。少種高產多收的計劃，是一個遠景計劃，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內不能全部實行，也不能大部實行。十年內，只能看情況逐步實行。三年以內，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內，要力爭多種，目前幾年的方針是：廣種薄收與少種多收的高額豐産田同時進行。

第五個問題，機械化問題。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機械化。要有十年時間，四年以內小解決，七年以內中解決，十年以內大解決。今年；明年、後年，這三年內，主要依靠改良農具，半機械化農具，每省每地每縣都要設一個農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學技術人員和農村有經驗的鐵匠、木匠，收集全省、全地、全縣各種比較進步的農具，加以比較，加以實驗，加以改進，試製新式農具。試製成功，在田裏實驗，確實有效，然後才能成批製造，加以推廣。提高機械化，用機械製造化學肥料這件事，必須包括在

內，逐年增加化學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個問題，講真話問題。包産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講做得的假話。各項增産措施，實行八字憲法，每項都不可講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于人民事業有利，于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的。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願，使下面很難辦。因此，幹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

以上六件事，請同志們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見，以求得真理爲目的。我們辦農業、工業的經驗還很不足。一年一年積累經驗，再過十年，客觀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們認識，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就有自由了。什麽叫自由？自由就是對必然的認識。

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裏唱的是低調，目的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産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爲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

毛澤東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毛澤東的這封信內容事無巨細，體現了對中國農業問題的深度理解和擔憂，同時又有對中國農業發展的前瞻性考慮，其中看不到任何冒進的成份。尤其特別的是，信中特別提醒各基層不要聽上級的指標。作爲党的最高領導人，居然公開要各級官員違背組織原則不要聽上級關于密植、浮誇的指標命令，在世界政治史上都是罕見的（筆者懷疑，毛澤東後來發動“文革”，摧毀組織

原則，鼓勵造反有理，與這些背景有關）。毛澤東寫此信時對農業和口糧問題的深切擔憂，對高層領導盲目施政的無奈和自己的無能爲力，躍然于字裏行間。

但是，當時中央决策層和媒體已不在毛澤東手裏。如果當時的主要領導人能從這封信獲得一些警醒，1960 年和 1961 年大饑荒還來得及制止。但這一切都是假設，中央高層和他們最欣賞的那些冒進省份的領導人繼續在極端不負責任的浮誇下將本省人民拖入到家破人亡的深淵。

筆者人到中年，幷不容易爲政治和歷史事件而動情緒，但讀到毛澤東的這封信時，却禁不住泪眼模糊。作者身爲農民的兒子，父母兄姐都曾在那個年代挨餓，毛澤東看到國家的危機和底層民衆的痛苦，而整個信中又不便于使用命令的口吻批評自己支持的接班人，他本來期望以他的個人威望能够扭轉乾坤，但在那個他已經無法掌控的中央權力體系中，事實上他已經難以靠這封信來挽救萬民于水火。筆者一直堅信，毛澤東通過這期間與一綫領導集體不成功的合作，在他的內心裏埋下了對高層領袖的不信任，這爲後來發動"文革"，寧可相信工農群衆和紅衛兵也不相信身邊一起鬧革命的同志，埋下了伏筆。是的，他身邊這些因他的偉大領導而得以登堂入室，名垂青史的領導們太令他失望了。

後來動輒指責毛澤東要承擔起大饑荒主要責任的領導人和民衆，請你們仔細多讀幾遍毛澤東在大饑荒出現苗頭時寫的這封信，將會有完全不同的理解與感受。當時中央一綫領導完全辜負了毛澤東對他們的栽培和期望，用他們的愚蠢和盲動給中华民族留下了一段黑暗的歷史。

但他們轉身就將所有責任推給了對浮誇風一直保持警惕和批評態度的毛澤東。政治的厚黑，莫此为甚！



八、將大饑荒推責給廬山會議太牽强

有很多人將大饑荒的責任推給廬山會議，是不客觀的。因爲通過 1958 和 1959 年的浮誇風，饑荒已經發生，餓死人現象已經出現。1959 年 7、8 月間廬山會議召開時，各地荒種現象很普遍。實際上，廬山會議的目的是在糾左，結果却成了打倒彭德懷軍事集團的繼續反右。

打倒彭德懷有著更複雜的原因。很多人以爲彭德懷的“萬言書”抹黑了大躍進而受到毛澤東的批評，進而改變了廬山會議的本來議題。這是毛後時代政治宣傳的結果，而不是歷史的真實。

爲避免分散本章主題，關于廬山會議的歷史分析將在下一章討論，讀者可以與本節內容相互參考。本節主要厘清廬山會議之後與大饑荒有關的關鍵細節。鄧小平主政後，在輿論上將大饑荒加深的原因導向廬山會議，又將廬山會議沒能糾“左”的責任，導向彭德懷“萬言書”刺激毛澤東借批彭繼續大搞極左路綫的方向上來；這一邏輯和歷史解說已經成功洗腦成全民“共識”。因此，分析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之後是否真的放弃糾“左”就變成歷史真僞的判斷切入點。

毛澤東本人的理性頭腦幷沒有因爲打倒彭德懷而變糊塗，他同農村工作中極“左”行爲進行鬥爭幷沒有停止。

除廬山會議前他給六級幹部的上述公開信，會議後的 1959 年 12 月 27 日，在《對部分地區人民公社所有制過渡情况材料的批語》中，毛澤東批道：“問題：五年社有化，十年國有化，是否有可能呢？”

1960 年 3 月 23 日，毛澤東爲中央起草了《堅决制止重刮“共産風”等違法亂紀行爲》强調：“平調方面的處理，一定要算帳，全部退還，不許不退。對于大貪污犯，一定要法辦。一些縣委爲什麽沒有注意這些問題呢?他們嚴重地喪失了職守，以後務要注意改正。”

1960 年 3 月 30 日，毛澤東又在《反對官僚主義，克服“五多五少》中指示上海局、各協作區委員會、各省委、市委、自治區黨委，中央一級各部委、各黨組:“中央在一九六〇年三月下旬將山東六級幹部會議的一期情况簡報，批發給你們，請你們對于人民公社的許多嚴重情况，提起充分的注意，務必在三四月間，利用省委召開的六級幹部會議和縣委接著召開的四級幹部會議，對于那些不可允許的、極端嚴重的情况，務必徹底地整頓一次，到下半年再整一次。”

1960 年 11 月 15 日，毛澤東在《徹底糾正“五風”》中指示各中央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區黨委：“必須在幾個月內下决心徹底糾正十分錯誤的‘共産風’、浮誇風、命令風、幹部特殊風和對生産瞎指揮風，而以糾正‘共産風’爲重點，帶動其餘四項歪風的糾正。”

1960 年 11 月 28 日，毛澤東再次指示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永遠不許一平二調》！

1960年12月30日，毛澤東在《堅决退賠，剎住“共産風”》又强調：“縣、社寧可把家業統統賠進去，破産也要賠。因爲我們剝奪了農民，這是馬列主義完全不許可的。平調農民的勞動果實，比地主、資本家剝削還厲害，資本家還要花點代價，只是不等價，平調却什麽都不給。一定要堅决退賠，各部門、各行各業平調的東西都要堅决退賠。賠到什麽都沒有，公社只要有幾個人、幾間茅屋能辦公就行。”（作者董玉振評：能够想像毛澤東當時泣血的焦慮，對自己的黨和各級領導的亂來，已經到了咒駡“不如地主、資本家”的地步）“看來‘五風’中最普遍、危害最大的是‘共産風’和瞎指揮風。首先要把它們整掉。究竟哪些是生産瞎指揮風要搞清楚，不然就會變成無指揮、無計劃。”“有的同志提的，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麽反什麽，有多少反多少，這幾句話是好的。”

1961年3月13日，毛澤東再次要求《反對兩個平均主義》：

劉、周、陳、鄧、彭五位同志，以及北京會議各同志：

今天派陶鑄同志到你們那裏來，向你們作報告，并向到北三區會議的同志們提出一些建議，以供參考。大隊內部生産隊與生産隊之間的平均主義問題，生産隊(過去小隊)內部人與人之間的平均主義問題，是兩個極端嚴重的大問題，希望在北京會議上討論一下，以便各人回去後，自己并指導各級第一書記認真切實調查一下。不親身調查是不會懂得的，是不能解决這兩個重大問題的(別的重大問題也一樣)，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調動群衆的積極性的。也希望小平、彭真兩位同志在會後抽出一點時間(例如十天左右)，去密雲、順義、懷柔等處同社員、小隊級、大隊級、公社級、縣級分開(不要各級集合)調查研究一下，使自己心中有數，好做指導工作。

我看你們對于上述兩個平均主義問題，至今還是不甚了了，不是嗎?我說錯了嗎?省、地、縣、社的第一書記大都也是如此，總之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務工作，不作親身的典型調查，滿足于在會議上聽地、縣兩級的報告，滿足于看地、縣的書面報告，或者滿足于走馬看花的調查。這些毛病，中央同志一般也是同樣犯了的。

我希望同志們從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當然要堅决改正。你們爲什麽那樣忙呢?開三天會太少了，至少五天至七天才行。爲什麽南方三區反倒不忙，開七天，北方三區倒那樣忙呢?因此，派陶鑄同志到你們處走一遭。

今天去，明天回。另派廖魯言同志于幾天後回北京，去作北方的調查工作。我的那篇《關于調查工作》的文章也請同志們研究一下，那裏提出的問題是作系統的親身出馬的調查，而不是老爺式的調查，因此建議同志們研究一下。可以提出反對意見，但不要置之不理。

毛澤東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三日上午八時，廣州

毛澤東在 1961 年 6 月 12 日《總結經驗，教育幹部》中有如下論述:

一九五九年四月，我在北京召集中央常委和在京參加人代會的一些同志談了一下，就給六級幹部寫了那六條。那六條等于放屁，因爲我們各級幹部中許多人不懂得社會主義是什麽東西，什麽叫按勞付酬，什麽叫等價交換。一九六〇年春看出“共産風”又來了。先在廣州召集中南各省的同志開了三個小時的會，時間這樣短。接著在杭州又召集華東、西南各省的同志開了三四天會，

議題不集中，將搞小高爐、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機械化和半機械化等等一些問題都插進去了，整一平二調沒有成爲中心。一次會只能有一個中心，一個中心就好。一次會發很多文件，沒有一個中心就不好。後來又在天津召集東北、西北、華北各省同志開了會，也不解决問題。那時候提倡幾個大辦:大辦水利，大辦縣社工業，大辦養猪場，大辦交通，大辦文教。這五個"大辦"一來，糟糕！那不又是"共産風"來了嗎？去年七八月的北戴河會議，百分之七八十的時間是談國際問題，只剩一個尾巴談糧食問題、農業問題，也沒有批評兩個平均主義。一平二調問題的徹底解决，還是從十一月發出十二條指示（指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內容共十二條）開始的。十二條指示，在執行中發生了一個錯誤，就是只搞了三類縣、社、隊，其他一類、二類放過了，沒去動。河南用整整半年的時間搞三類縣、社、隊，一、二類不去觸動，"共産風"、命令風、浮誇風、瞎指揮風、幹部特殊風沒有普遍去整。一提"五風"，說是一、二類可以放心，現在一查，那些地方"五風"可厲害了。

只要讀者有時間好好讀讀當時毛澤東的講話和他主持下會議通過的文件，就不難發現，毛澤東的頭腦始終是清醒的，對各種歪風始終保持著警惕和批判，并試圖去制止浮誇風和極左路綫對社會經濟的破壞。毛澤東的這類講話很多，這裏就不一一抄錄了。但從上面說列舉的時間間隔可以看出，毛澤東的謹慎是一貫的。

毛澤東的農業經驗和對"放衛星"的理性懷疑，多次要求冷處理超高畝産量新聞，無法轉化爲中央執行層的施政措施，這個一

綫領導層是他本人親自挑選和支持的，使得毛澤東無法逃脫一定的領導責任。但反右擴大化中，作爲中央反右領導小組組長的鄧小平，以其鐵腕手段對反右擴大化發揮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看一下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這位鄧小平極其欣賞的地方大員在廬山會議之後還何等地膽大妄爲，就該明白，將一切推給廬山會議是不合理的，當然推動浮誇風的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已經將全國推上了一條“持續高燒”的不歸路，除非他們倒臺，靠一次會議來扭轉當時的局勢很難，因爲一旦確認過去浮誇風的極端錯誤，那必然有中央高層領導要承擔責任，有關責任人必然不會輕易就範。打倒彭德懷，對毛澤東來說是政治上的考慮，對其他人來說則是一種自我保護。而廬山會議前後毛澤東持續不斷對浮誇風和農業發展極“左”行爲的鬥爭，有大量頒布日期很頻密的記錄，都足以證明毛澤東不得不親臨一綫對這個一綫領導集體所造成的危機進行糾正與焦慮。

毛澤東本來是退居二綫只抓意思形態，但從給六級幹部的公開信和後來的一系列講話和起草的文件中，可以看出，他不得不涉足本來由劉周鄧負責的一綫事務和具體行政管理措施制定和執行層面。尤其是 1959 年餓死人事件開始發生，他密集發聲，對國家困局表現出極度的關注和憂慮，盡力制止浮誇風和極左行爲，但他栽培的一綫領導集體已經聽不進他的話了。劉少奇是毛澤東指定的接班人，不到萬不得已，毛澤東不會以批評的口吻對劉講話，但從《反對兩個平均主義》那封信已經將劉少奇列入批評的對象之一。在給六級幹部的信頒布後，1960 年初共産風再度刮起，劉周鄧已經難以逃脫歷史的譴責，他們對毛澤東的批評完全置若罔聞。

在將大饑荒主要責任推給毛澤東的理由中，有一條是毛澤東對“反冒進”的批評。根據吳冷西著《憶毛主席》記述，針對 1956 年出現的“反冒進”，南寧會議和成都會議都成了反“反冒進”的會議。吳冷西在其著作中也認爲毛澤東反“反冒進”是錯誤的。但仔細研究毛澤東發起反“反冒進”的原因，是毛澤東對“反冒進”口號這種激進宣傳手法的批評，正如《憶毛主席》第 48 頁所說： 毛主席認爲，一個時期搞得快些，多一點，調整一下是可以的，但不要提出“反冒進”的口號。“反冒進”挫傷幹部和群衆積極性，是錯誤的方針，是反對多快好省的方針的。他指出《人民日報》1956 年 6 月 20 日反冒進社論（題目叫《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是錯誤的。吳冷西本人也認爲，毛澤東的反“反冒進”是錯誤的。

但筆者對此有不同看法。

毛澤東整個革命生涯，始終把調動民衆和民衆參與作爲主要政治目標和手段。黨的喉舌以社論形式“反冒進”，毛澤東的批評算不上過錯，更沒有因爲反“反冒進”就必然要走浮誇風的道理。正如當前改革開放以來，中央在經濟上一放就亂（通貨膨脹），一抓就死（通貨緊縮）一樣的道理。改革開放以來，雖然各地都有過各種“熱”，最被人詬病的是房地產熱，但中央從來就沒有，也不應該，以社論和中央文件的形式來“反房地產熱”。這種激進的降溫手法將帶來極其嚴重的後果。在毛澤東提倡多快好省的背景下，“反冒進“的旗幟舉的太高，將勢必讓民衆和各級黨委無所適從。如何算冒進，如何算不冒進？1956 年，在第一個五年計劃大功告成的背景下，全國人民勞動熱情空前高漲，對國家前途充滿信心和希望，各條戰綫上人民忘我工作，這個時候您《人民日報》高唱“反冒進”，對全國人民的勞動積極性必然造成危

害，人民都不知道是否還應該甩開膀子拼命勞動了。

1956 年反“反冒進”與 1958 年開始的大躍進和共產風扯到一起，將相隔兩年的兩件事視之爲因果，是完全沒有道理的。浮誇風的真正根源是“共產風”，而不是“反‘反冒進’”。

吳冷西老先生，您任人民日報社社長時，辜負了毛主席對您的信任和期望，對鼓吹浮誇風，您將毛主席的忠告置之腦後，犯過大錯，這次您又錯了！您在書中對沒聽毛主席反浮誇風的話而後悔，說明您老人家還是位有自省精神的人。

九、大饑荒分析小結

作爲一綫最高領導人和“共產風”主要鼓吹者的劉少奇，無論是其所處職位，還是其所說所做，都清楚表明，他必須對大饑荒的發生負有主要罪責。他本應該主動來承擔起領導責任，但在“七千人大會”上，劉却義正言辭地大談“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避而不談自己應該承擔的責任。而毛澤東則勇于承擔：“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爲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在毛澤東主動就自己的領導責任承認錯誤的情況下，劉少奇却沒有跟進認錯。鄧小平更是來個大而化之，人人有責式的淡化個人錯誤。鄧小平不僅個人是浮誇風的主要鼓吹者和領導者，更因其反右領導小組組長的身份而加大了他所作所爲對饑民的殺傷力；他身爲中共中央總書記執掌中樞，直接領導和

協調媒體、下情上達、毛澤東指示的宣傳和執行等重要功能，使得他的罪責是無論如何都難以洗脫，他同樣逃脫不了百萬人民餓死的重大罪責。而其他領導人則以劉、鄧馬首是瞻，也必須承擔起部分責任。周恩來在歷史關鍵時期的無作爲和瀆職，爲其政治人生留下了無法被洗刷的污點。

從對大饑荒的教訓總結和主要領導人的整個表現看，毛澤東最大的錯誤是選擇劉少奇作爲接班人，讓鄧小平任總書記幷同時兼任中央反右領導小組組長。無論是個人能力、對國情的認識深度、敢于承擔責任的勇氣，劉鄧都不是理想的人選。毛澤東對用人失察是必須承擔責任的。

周恩來這種高情商政治人物，正因爲其看上去的完美，與悲慘的國運不匹配，使得我很難對他的完美肅然起敬。面對百萬個家庭走向滅亡，他居然還去出口糧食來購買黃金，讓我試圖爲他尋找諒解的努力變得毫無價值。但我一遍一遍地讀毛澤東那些頻密的大力呼籲和糾正浮誇風的書信與文件時，我能够感覺到毛澤東情牽百姓安危的那份焦慮，甚至讓我禁不住熱泪盈眶，但我從周恩來（還有劉鄧）身上怎麼也看不到百姓的踪影，更無從獲得一份毛澤東帶給我的那份感動。

周恩來在“文革”中保護了一些幹部和高級知識分子而成爲美談，那就讓這些幹部和知識分子去對他好好感謝吧，至少，占人口大多數農民身上，看不到周恩來智慧和大愛的體現，無論是大饑荒時期，還是農村醫療衛生建設方面，沒有毛澤東的督促，周恩來處理農民問題上的智商接近于零。周的成長背景決定了，他對廣大農民缺乏感同身受的那種親情。

毛澤東愛鄧小平之才幹，晚年還給鄧機會複出，但毛萬萬沒想到的是，鄧小平這個劉少奇的盟友在毛身後再次登上權力中

心，對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進行了徹底的動搖，通過釋放沈圖、寬容高級幹部及家屬特權將毛澤東教育培養的共產黨幹部的黨性和覺悟推向懸崖，通過國有企業的改制更是將大量國有企業免費送給權勢階層，造成人類歷史上最無耻的國有資産流失和分贓，讓一部分通過不正當手段先富起來，而上千萬曾經忘我工作的工廠主人翁成爲下崗工人，轉眼回到解放前，變得一無所有；甚至放任對毛澤東本人進行了污蔑與詆毀……，這就是無數革命先烈抛頭顱灑熱血所追求的新中國嗎？這是習近平所說的中國夢嗎？大饑荒導致的千萬同胞死亡的慘劇難道僅僅需要一個對歷史真相的刨析嗎？

千萬同胞的亡魂必須讓後人牢記并保持警醒：政治權力必須保持足够的透明，并給人民監督和參與的機會，對各級黨政部門與領導必須有嚴格的監督與民意反饋機制，才能政情民情暢通，以民爲本，避免大範圍禍國殃民事件的重演，指望共產黨幹部的個人自覺是不靠譜的。但從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國家各方面的經歷，又不能不讓我們看到，這條從通往政通人和的道路還遠遠沒有暢通！





第四章 不一样的“廬山會議”[1]

廬山會議是指 1959 年 7 月 2 日至 31 日在廬山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8 月 1 日準備下山的毛澤東，被迫改變日程，又臨時決定自 8 月 2 日起召開八屆八中全會，至 16 日正式結束。

當前關于廬山會議的已有認識是：上山爲了糾“左”，但因爲彭德懷的“萬言書”而激怒了毛澤東。彭德懷這位耿直的軍事將領，立下不朽功勛，却僅僅因爲說了真話，揭露了饑荒的真相，而被毛澤東打成反黨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幷連同他人一起被打成反動軍事俱樂部成員，本來糾“左”的目的反而旁落，繼續在極“左”的道路上前行，加深了大饑荒的危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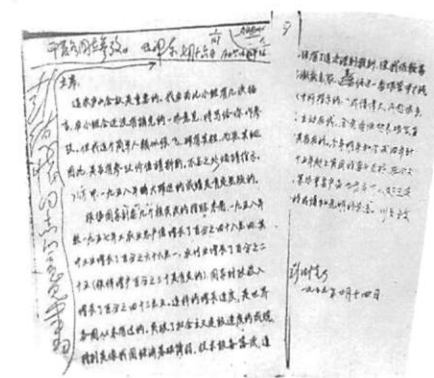
這個第二代領導集體時期的叙事，已經成爲中國人的“共識”，筆者本人在很長時間內也對此深信不疑，這也是爲什麽本書第一版時沒對廬山會議進行起碼的探討，筆者始終秉持著學者的一份責任和研究論述方法，那就是對就是對，錯就是錯，我不能因爲毛澤東的偉大功績而對他的錯誤做刻意的辯護。

---

[1] 本章爲第二版新加內容，參考了《在毛澤東身邊十五年》(李銀橋著)、戚本禹著《戚本禹回憶錄》、《彭德懷自述》、《德懷列傳》（劉亞洲著，傳閱資料）等，不一一細標。

但在最近幾年逐漸掌握的資料中，尤其是寫大饑荒一章的內容時，開始激起我的懷疑和好奇，并在逐漸掌握更多資料的情況下，發現一個完全不同的“廬山會議”。

一、廬山會議的疑點及毛彭關係回顧



彭德懷寫給毛澤東的萬言書

魔鬼存在于細節中，第二代領導人的輿論導向下，有幾個經不起推敲的疑點：

疑點一，彭德懷的“萬言書”所描述比毛澤東對當時局勢的判斷還要糟糕，但至少都是在對當時極“左”政治的質疑和批評，也就是說，彭德懷和毛澤東的判斷，只有程度不同，而沒有方向性對立，他們在一個共同的方向上做了不同程度的判斷而已。因此，說毛澤東被該信激怒，是完全沒有道理的。

疑點二，彭德懷如果因言獲罪，那也是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但對彭德懷的最後批判關鍵點在搞“軍事俱樂部”，而且會後他的軍隊領導職務被撤銷，連帶被批判的還包括總參謀長黃克誠，這和“左”右傾相比已經偏離太遠了，因爲彭德懷的“萬言書”中壓根就沒涉及軍事。

彭德懷和毛澤東是一對長期共事的革命戰友，又因爲各自強烈的個性而不是很合得來，他們之間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雖難免恩恩怨怨，甚至不少誤會，但因爲共同的理想和彼此都對中國革

命所作的貢獻，而能放下私人好惡，相安無事。彭德懷因爲支持毛澤東抗美援朝幷立下奇功，在朝鮮戰爭結束後官至國防部長和副總理。從彭德懷的職位任命中，不難看出毛澤東的胸懷氣度，任人唯賢而不是任人唯親。彭德懷稱毛澤東“老毛”而不是“主席”，甚至可以徑直沖進毛澤東的臥室。這是幾十年長期合作下形成的戰友關係，即便談不上親密，但至少對彼此有較大寬容度。

彭德懷個性耿直，這種個性令遠距離的人們有好感，但却讓靠近的人不舒服。尤其是在政治環境下，高層領導人言談的影響力决定了，耿直有時候具有極大破壞力，對自己還是對他人都可能帶來負面影響。就拿彭德懷對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的毛澤東有關的談話，簡單羅列如下：

1959 年 1 月 30 日，他在解放軍後勤學院畢業典禮上講到：“軀殼都是要死的，人家說萬歲，那是捧的，是個假話。沒有哪個人真正活一萬歲。”在當時的環境下，以彭德懷的身份，這樣的講話雖然正確，但很不得體。毛澤東即是彭德懷的上司，也是全國人民愛戴的領袖，喊“萬歲”也是一種表達崇敬的傳統方式。

幾天後，他在回顧共和國建國史時說：“不從客觀歷史上研究，結果就會誇大個人的作用。毛澤東是一個人，他在歷史上有一定的作用，但對整個歷史，他不起决定作用。”彭老總的話同樣是真理，毛澤東也說“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但彭老總有必要做這樣的闡述嗎?

諸如此類的講話不少，不一一列舉。這類講話對于深知彭德懷的毛澤東來說可能不是個問題，但對于聽到這些講話而又對毛澤東無比崇敬的人，則感到不舒服；從追求黨內團結，黨外民衆對共產黨領袖的崇敬角度來看，又具有破壞力；對于那些有意整彭德懷的政治對手，這則是授人以柄。從廬山會議到後來文革期

間，彭德懷的此類言論就成爲別人攻擊他的“武器”，很容易獲得認同。到毛澤東晚年，彭的此種表現則令毛澤東對自己身後彭會否成爲政局不穩定的因素而有所疑慮。

做這樣的背景介紹，有助于瞭解毛、彭這對戰友和他們之間的關係，有人認爲是因爲毛岸英犧牲而毛澤東委責于彭德懷，在沒有任何根據的情況下，只能將這種揣測理解爲“小人之心”。

彭德懷廬山會議之後命運的悲劇種子，其實在會議之前就已經埋下。至于何種因素發揮了作用，還是多種因素叠加下的結果，在資料有限的情況下，還是可以做有價值的梳理的。

會議進行到7月10日下午，毛澤東談了形勢、團結等問題，强調“總路綫”是正確的，從全局來看，成績與缺點錯誤還是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關係。7月14日，會議印發了《廬山會議諸問題的議定記錄》（草稿）。截至此時，毛澤東的典型領袖處事風格得到體現：認清和解决當前問題，但肯定方向和路綫。雖然現在很多人對此不以爲然，但如果深入研究不難發現，毛澤東當時不論形勢如何，都不能否定總路綫和“三面紅旗”，否則，必然導致一系列重大政治問題，幷影響到中央的團結，這在國難當頭之際，顯然是必須避免的。如果路綫有錯誤，那也只能逐漸調整，而不是推倒重來。

廬山會議糾“左”議程結束時，毛澤東于14日收到彭德懷的“萬言書”。根據李銀橋回憶，毛澤東收到彭德懷的信幷不是很生氣。從彭德懷後來抱怨毛澤東不該公開此信，可以看出，彭德懷這封信壓根就不是針對毛澤東的，但他不想此信被公開，似乎可以理解爲：彭很清楚這封信對其他高層領導人帶有明顯的，有針對性的批評（彭德懷後來說，他這封信的主要批評對象是劉少

奇，雖然沒點名）。毛澤東收到這個信後，畢竟是來自于副總理兼國防部長的信件，而且彭幷沒有注明爲私人討論信件，毛不可能把信當成私信來處理，所以，毛澤東公開此信也無可指責。但該信的公開使得彭德懷立即成了衆矢之的，所有一綫高層領導和幾位搞浮誇風最瘋狂的省級大員，立即如芒在背，該信所揭露的嚴峻形勢如果形成中央統一認識或會議决議，必須有人來承擔責任甚至下臺。

很顯然，一綫極“左”領導集體不可能坐以待斃，現在這些身負大饑荒罪責的領袖們就等毛澤東的態度了。他們在毛澤東表態前，其實已經向彭德懷頻頻發難。根據權延赤著《走下神壇的毛澤東》回憶，毛澤東沒有參加中央全會，會議吵得很厲害，吵得聲音很大。吵聲傳來，毛澤東睡不著覺，他睡不著覺是要發脾氣的，叫我去看看。我跑步去了，見許多人同彭德懷吵。回來學一遍舌。毛澤東發火了，寫了批示。

7 月 20 日淩晨，楊尚昆向毛澤東彙報各組討論的情况時，毛澤東講了四點意見：“一、欠債是要還的，不能出了錯誤，一推了之。去年犯了錯誤，每個人都有責任，首先是我。二、缺點還沒有完全改正，現在腰杆子還不硬，這是事實。不要回避這些事情，要實事求是。三、有些氣就是要泄，浮誇風、瞎指揮、貪多貪大這些氣就是要泄。四、準備和那些‘左派’，就是那些不願意承認錯誤，也不願意聽別人講他錯誤的人談一談，讓他們多聽取各方面的意見。”[1]

至此，毛澤東的講話還溫和而就事論事。

---

[1]楊尚昆著《楊尚昆日記》（上），中央文獻出版社。

但 7 月 23 日，毛澤東的講話風向開始發生變化，甚至談到"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組織紅軍去"等，從此會議開始轉向。到底是什麼因素導致了毛澤東對彭德懷態度的大轉彎呢？

如果僅僅是這封信，毛澤東不論是何態度，都不至于將這位帶刺的老戰友置于被公開批判的地步。另一件事則更可能是毛澤東轉向來批判彭德懷的動因。

二、"彭赫秘會"導致的信任危機

廬山會議之前彭德懷訪問蘇聯、阿爾巴尼亞等東歐國家，中間一些插曲，則可能成了彭德懷要被打倒的關鍵動因。

在這次訪問中有個插曲，就是赫魯曉夫和彭德懷在阿爾巴尼亞撇開中方翻譯進行了一次單獨會晤[1]。按照中國外交紀律，外事活動不能一個人單獨進行，必須要有同伴參與，而且這類外事活

[1] 有些渠道則說是彭德懷與蘇聯高層領導人在訪問莫斯科時舉行了單獨會晤。本章內容有關彭德懷"裏通外國"的資料來自于很多渠道，包括回憶錄和外國人著作，但都不是官方公布的資料。彭後來否認有此事。彭德懷出訪的隨身翻譯在接受調查時否認彭在阿爾巴尼亞和赫魯曉夫有單獨會晤，稱彭根本沒有條件和時段可以隱瞞其他中國隨團人員而和赫魯曉夫單獨會談。因此，只有等中俄兩國政府解密相關檔案後才有可能被證實或證僞。高層有人借彭的不謹慎來陷害彭，惡意編造向毛澤東舉報的可能性幷非不可能。我傾向于認爲，蘇聯試圖分化中國高級將領來推翻毛的企圖是存在的，彭對當時的中國內政不滿意，和蘇聯領導人在互動時可能言談有些不謹慎，但是否真做對中國不利的事，我不敢貿然揣測。這裏之所以整理這方面的資料，概因讀者需要多個視角來審視那段特殊歷史和彭德懷晚年的悲劇。而打倒彭是毛被輿論詬病的內容之一，需要多元化內容給讀者參考。

動必須要向中央彙報，畢竟外交無小事。

彭德懷并没有將與蘇聯領導人的私下會晤向中央彙報，這個消息傳到毛澤東耳朵裏，難免引起毛的揣測。彭德懷身爲副總理和國防部長，蘇聯又是中國如此重要的外交對象國，當時中蘇關係又極爲敏感和不穩定，這麽重要訪問中的一個没有預先安排的會晤，您老人家到底在隱瞞什麽？這難道只是談美食聊文化的隨意閑聚而讓彭老總覺得没有彙報價值？還是其它别的原因？尤其是當時蘇聯高層領導人對毛澤東極其反感的背景下，任何中國領導人和蘇聯的單獨互動都極其敏感。我堅信彭老總不會聽從蘇聯人的安排來做對國家不利的事，但對于毛澤東所處的位置，這不能簡單地用“相信”來解决了，他掌握的情報資料要比局外人多的多。赫魯曉夫在廬山會議前向毛澤東提出在中國建長波電臺的要求而被毛澤東拒絕，但彭德懷身爲國防部長却對此有些曖昧。[1]

問題還不只是如此。

彭德懷在去廬山的路上，談了他東歐訪問的所見所聞，看到祖國的慘狀，他說出了一段“大逆不道”的話：“中國問題嚴重，困難繼續下去，也許只有靠蘇聯紅軍幫助我們才能解决了。”這種氣話被密報給毛澤東，自然毛澤東不會等閑視之。這畢竟是從手握槍杆子國防部長口中講出的話。而且又發生在上述秘密私人會晤之後。

如果僅僅這樣，毛澤東還不至于在廬山會議上下决心整肅彭德懷，更不會把其他幾位一起整肅成一個反革命軍事集團，因爲還有另外一件加碼的導火綫。

在廬山會議期間，陳毅在北京留守中樞。這期間，蘇聯駐華

[1] 此信息來自《戚本禹回憶錄》，暫時找不到另一個可靠互證來源。



彭德怀和妻子浦安修

武官拜見陳毅[1]，開門見山地說：中央在廬山開會, 您在北京可以乘機將權力拿到手裏。陳毅很警惕，立即報告給了毛澤東。

陳毅傳來的消息，和上面彭德懷的兩件事結合起來，毛澤東就無法再等閑視之；毛澤東這個時候應該自己也心裏沒底，到底蘇聯人還在動員分化哪位高級將領來推翻他，以及彭與蘇聯領導人的私人會晤是否屬于此類。可以肯定的是，蘇聯在試圖分化拉攏高級將領來對付毛澤東，則已經是迫在眉睫必須面對的挑戰。

在廬山會議期間，恰恰發生了彭德懷、黄克誠（時任總參謀長）、周小舟、田家英、張聞天等人在一個不開燈的小黑屋裏聚會的事，其中還有李鋭，後來這事被李鋭告發給毛澤東。李有聲有色地告訴毛澤東說，彭德懷罵毛比斯大林晚年還要壞等等，李鋭甚至還揭發說，在他們開小會的時候，他親耳聽到彭德懷給部隊打了電話。[2]

這一系列看似偶然的個體事件，無法不讓毛澤東有所聯繫，毛所掌握的情報肯定比公開的要多的多。將上面這幾件事結合起來，有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感覺，打倒彭和與其過往甚密的幾位爲軍事俱樂部性質的反黨軍事集團，就是順理成章的了。筆者認爲，“打倒”看似極端了點，但如果不用這樣的霹靂手段，就沒

---

[1]另一份非正式出版物裏提及鄧力群回憶，說是蘇聯駐華大使尤金拜見陳毅。

[2]李鋭還揭露田家英如何罵毛澤東，加上田家英後來政治上傾向于劉少奇的“三自一包”，導致毛澤東對田家英失去信任，可能成爲田家英後來自殺的遠因。

有充分理由剝奪他們的兵權，這是毛澤東當時所追求的目標。[1]

毛澤東心中對彭德懷有個“裏通外國”的疑問，但無法用“疑問”來剝奪兵權，因爲無法對外對內交代。在信任動搖後，彭德懷繼續掌握兵權看來是不合適了，不論是否冤枉彭。至于用什麼樣的理由來剝奪彭德懷的兵權，那就只是個藉口的問題。“萬言書”的分量可能連個“藉口”的威力都算不上。但彭德懷得罪了另外一群浮誇風的主要責任人，則使得“萬言書”有了强大的威力，促成了反彭德懷的“高層群衆基礎”；彭德懷在國防部長職位上的粗暴處事風格，批評劉伯承和粟裕這兩位有廣泛军政高層群衆基礎的將領等，都讓他樹敵衆多。對毛澤東來說，以“右傾機會主義”來打倒彭德懷，在高層內部容易獲得支持，對公衆和國際社會來說，也是可以拿來作爲宣傳的“幌子”。

筆者沒有查到陳毅將蘇聯武官的話反饋給毛澤東的具體日期是在彭德懷遞交“萬言書”之前還是之後（筆者判斷，最可能的是在7月23日的前一兩天）。如果是之前，毛澤東已經準備下山，那麼毛澤東可能準備到北京後找彭德懷溝通一下他在出国期間的私下會面細節再做定奪，畢竟剝奪抗美援朝英雄和國防部長的兵權，對于毛澤東來說不是一個容易做出的決定，尤其是涉及到蘇聯，也無法向公衆和各級官員公開這些內幕，毛澤東也擔心會給民衆一“鳥盡弓藏”“一言堂”的糟糕印象。但“萬言書”道出了極“左”路綫的破壞，得罪了一群當權派，以及彭德懷的火爆脾氣上來對著毛澤東“罵娘”，進而給了其他人攻擊他的把柄，

[1]總參謀長黃克誠被连带打倒與他和彭的個人淵源有關。黃代替與劉少奇關係密切的粟裕任總參謀長，而黃和彭從平江起義開始共事，有密切的關係。兩位手握軍權的重量級將領這個時候搞到一起，對毛澤東來說不能不倍加小心。

也給了毛澤東一個機會以順應"民意"，通過打倒彭德懷"右傾反黨集團"來剝奪他的軍政大權；這至少比對外講堂堂副總理兼國防部長涉嫌"裏通外國"來的體面。

三、"萬言書"引發浮誇風集團反擊

在打倒彭德懷"反黨集團"中，毛澤東的表面角色被廣泛傳播，但廬山會議的另一面則被官方媒體完全忽略。而這個"另一面"構成了彭德懷被打倒的重要推動力。

廬山會議的核心議題"糾左"，"萬言書"揭露了當時中國的災難，這與會議主題是一致的。但問題就出在，以這樣的猛藥來糾誰的"左"，導致中國陷入災難的一綫領導集團就成了"萬言書"的衝擊對象。毛澤東對廬山會議的定位是糾"左"，而不是批"左"，或鬥"左"，根本上是希望糾"左"的錯誤，而不是深究誰的責任，毛澤東很清楚，一旦針對個別領導人問責，將引發激烈的高層權力鬥爭而偏離糾左的當務之急，毛澤東和劉少奇一綫領導集團的決裂就是必然的了（而且涉及面太廣。這種黨內決裂延遲到"文革"爆發還是不可避免的發生了）。當時毛澤東并沒有準備否定劉少奇這個自己指定的接班人，也要繼續維護劉少奇的威望和體面，因此，廬山會議第一階段沒有針對任何領導人來糾"左"和追責，而只是個解決當前現實問題找思路和方向的糾"左"會。劉少奇剛在當年四月的人大上接過國家主席的職務，只要糾左追究到個人，劉少奇是必然逃脫不了的，這對于

黨和國家的形象及政治穩定都是致命的。因此，毛將廬山會議定義爲“神仙會”是有道理的，即解决當前急務而對事不對人。

想必彭德懷看到廬山會議似乎沒有解决問題才寫那封信。彭德懷的耿直和倔强，與毛澤東的深謀遠慮在這個節骨眼上却奇怪地發生了不和諧的對接。

彭德懷的“萬言書”把問題赤裸裸地擺出來，對導致這個局面的一綫領導人就太難堪了。他總結的問題第一條最後一句“雖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經提示全黨要把沖天幹勁和科學分析結合起來，和兩條腿走路的方針，看來是沒有爲多數領導同志所領會，我也是不例外的。”這句話點到事實，却否定了整個一綫領導集體，打擊面太大。

他總結第二條“小資産階級的狂熱性，使我們容易犯左的錯誤。在 1958 年的大躍進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徉，爲大躍進的成績和群衆運動的熱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傾向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總想一步跨進共産主義，搶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風；把党長期以來所形成的群衆路綫和實事求是作風置諸腦後了。”[1]這個總結同樣到位。上升到“小資産階級的狂熱性”層面，有點太嚴重了，甚至有路綫鬥爭的意味；雖然當時一綫領導人的作爲比這還要嚴重。這兩條總結已經將整個一綫領導集體擺在了自己的對立面。而與毛澤東當時以團結中央領導集體來解决當前問題爲目標的“神仙會”定位相衝突，

可以想像，那些浮誇風的主要責任領導，成爲批評彭德懷的

---

[1] 《戚本禹回憶錄》裏提到，據田家英回憶，“小資産階級狂熱性”是張聞天建議彭德懷加上去的。張這次和彭德懷一起被打倒，可能与此及黑屋聚會（李鋭舉報）有關。但毛澤東對張還是瞭解的，張後來并沒有受到太大衝擊。但這句話與赫魯曉夫的批評大躍進的用語相同，連累到張聞天也不令人意外。

急先鋒。

由于第二代領導集體對于歷史問題的選擇性叙述，使得人們對廬山會議的印象都是毛澤東如何霸道地對付彭德懷，如李鋭的《廬山會議實錄》就是個典型的叙事手法[1]，其他領導人當時對彭德懷的態度細節則很少披露。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慢慢會有更多的內容以各種方式浮出水面。

當時會議進程也可以看出點眉目：

7 月 14 日，彭德懷將“萬言書”遞交毛澤東

7 月 16 日，毛澤東批示將彭德懷的信印發到會同志討論。討論中一些人贊同信中觀點，一些人表示强烈反對。

7 月 23 日會議上，毛澤東對彭德懷的一些意見表示贊同，但這次會上毛澤東對彭的批評開始變得激烈。

7 月 31 日，毛澤東宣布會議結束。幷沒對彭做出决議性批判。

8 月 1 日，準備下山的毛澤東突然改變主張。

8 月 2 日，舉行八屆八中全會。

8 月 16 日，全體會議通過了《關于以彭德懷同志爲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决議》、《關于開展增産節約運動的决議》、《爲捍衛黨的總路綫、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的决議。

是什麼因素導致毛澤東在 8 月 1 日改變主張？而且一下子將會議的規格從“神仙會”提升到八屆八中全會的層次？據毛澤東衛士長李銀橋回憶：“回到住處，毛澤東本是吩咐我們收拾東西，

[1]筆者因此對李鋭的爲人和他對待歷史問題的客觀性持懷疑態度。他能有機會一直那麽活躍，與他和第二代的輿論傾向高度配合有關。這個以歷史見證者的身份活躍的政客，通過他的書對歷史事件的選擇性叙述更加歪曲了歷史。李鋭加深了人們的偏見。尤其他還曾任毛澤東的秘書，對信任自己的毛如此玷污性渲染，可見其人品實在不敢恭維。他和李志綏可歸入同類，都屬于賣主求榮奸邪之徒。李鋭把自己賣給第二代領導集體，李志綏賣給了美國反華反共集團。

準備散會走人。可是有些領導同志不幹了，提議解決彭德懷的問題。當天晚上，我便正式得知不下山了召開中央全會。"這裏能影響毛澤東的"有些領導同志"是誰呢？一綫核心領導人中，陳雲和鄧小平當時沒在山上，周恩來和朱德都不可能主張用激烈手段對付彭德懷，唯一有影響力，又有充分動機的只有劉少奇了。後來回憶文章指，劉少奇甚至建議將彭德懷開除出黨，但毛澤東不同意而作罷。劉批評彭德懷有"魏延的反骨"，以一綫最高領導人來對彭德懷做這樣的評價，等于政治上判了彭的"死刑"。

雖然我們能掌握的廬山會議上主要領導的講話細節不多，有待未來的檔案解密，但彭德懷對極"左"的批評受到當時極"左"代表性人物的反擊則是不可避免的。筆者判斷，劉少奇要徹底打倒彭德懷，除大饑荒問題，還有個更長遠的考慮：劉少奇在作爲毛澤東指定接班人情況下，劉沒有軍隊根基，必須培植自己在軍隊的團隊才能確保接班的順利，而彭德懷是首只攔路虎。

四、彭德懷晚年悲劇的必然性

毛澤東不是心胸狹隘之輩，在剝奪了彭的軍事權力後，毛澤東還給過彭機會，甚至還安排彭任三綫建設副總指揮。只要彭能消除"裏通外國"的嫌疑，我相信，毛澤東是可以原諒的，因爲這與百團大戰時彭德懷所犯的組織錯誤相比，還只是停留在情報層面。之後毛彭之間還有著多次接觸。但彭德懷倔强的個性下，始終沒有和毛澤東有過推心置腹的溝通來消除毛對他的疑慮。毛

對于那些坦誠認錯的同志，一向極爲寬容。在七千人大會上，當劉少奇講到：“有些同志也講過一些同彭德懷講過差不多的話，例如什麼大煉鋼鐵‘得不償失’呀，什麼食堂不好、供給制不好呀，人民公社辦早了呀，等等。但是這些同志和彭德懷不一樣，他們可以講這些話，因爲他們沒有組織反黨集團，沒有要篡黨。(毛澤東插話：沒有國際背景)彭德懷同志帶領中國軍事代表團在國外走了幾個月，回來以後就急急忙忙寫了那封信，是有陰謀的。當然，不瞭解情況的同志，是看不清楚的。在廬山會議的時候，有些同志也看不清楚，那不能怪他們。”[1] 可見，彭德懷自己根本意識不到他的私人會晤（也可能誣陷）和去廬山途中的隨意講話所帶來的嚴重後果——信任危機。在七千人大會之後，彭曾向毛澤東寫過一篇八萬字的信爲自己辯護，就與蘇聯接觸這件事，彭不承認“裏通外國”，但毛澤東掌握的情報則無法支持彭的自我辯護：彭德懷在蘇聯訪問時表示支持赫魯曉夫的一些政策方針；之後蘇聯安排一位華裔情報人員單獨與他聯繫[2]；赫魯曉夫于廬山會議期間剛好在美國訪問，公開表示對彭德懷的認可和支持。據彼得 · 瓊斯等著《中蘇關係內幕紀實》描述，赫魯曉夫 1959 年 5 月至 6 月正式訪問阿爾巴尼亞期間會見了彭德懷；彭讓赫魯曉夫看了一份强烈抨擊“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備忘錄；而

[1] 劉少奇于 1962 年在《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道出了彭德懷被打倒的原因，尤其是毛澤東“沒有國際背景”的插話（另一份非正式出版物則說毛澤東插話“只要不裏通外國”），已經把根本原因點明了。但劉的這個講話在收入《劉少奇選集》時被刻意刪除這部分，以維護劉的形象，使得打倒彭德懷成爲毛澤東個人“一言堂”的結果。這也暴露了第二代領導集體時期極其荒謬之處：讓他們最應該感恩的對象毛澤東來背負建國以來所有錯誤的責任；這種忘恩負義之舉，到了必須糾正的時候了。中華民族如果容忍忘恩負義，將難稱“偉大”。

[2] 引自《戚本禹回憶錄》。

這份備忘錄的主要內容與彭德懷的“萬言書”內容相似……。

我相信彭德懷沒做損害國家利益的事，但他外事活動和日常講話的不謹慎，授人以柄。

彭的八萬字長信內容沒有公開，但從一些回憶錄中可以看出，該信主要爲自己辯護，彭德懷被打倒也引起了“一些不明真相的群衆”的反彈，這是毛澤東 1962 年批駁“翻案風”的原因。再後來的吳晗《海瑞罷官》被理解爲是映射彭德懷的廬山反抗，進而引爆中國政壇“原子彈”。面對這些歷史的曲折片段，在毛又不願意公開彭德懷“裏通外國”嫌疑的情況下，只能任由後人去對毛本人來胡亂指責了。那些身居局外而又自以爲是的書生們哪搞得明白高層內部的風起雲涌！

據黃克誠回憶：“早有一次，主席對彭開玩笑似地說：‘老總，咱們定個協議，我死以後，你別造反，行不行？’”將帥猜忌如此，還有將的活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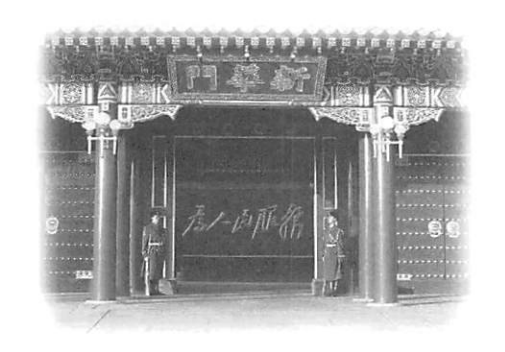
“文革”期間彭德懷被迫害致死，作爲普通人，我和每一位善良的中國人一樣，對彭德懷的不幸命運感到難過，但站在毛澤東的角度來看，彭的最後命運又是那麼的必然。現在一個創業老闆在年老時還在擔心子孫們是否能够繼承和興旺家族企業，一個小家庭家長年老時還在考慮兒孫是否能團結友愛，毛澤東一生爲建設一個理想的中國殫精竭慮，在他年老體衰時，他最顧慮的是什麼？肯定不是兒女們會否當官發財，而是無數革命先烈的流血犧牲換來的共和國是否會變顏色，百姓是否會遭二茬罪，國家是否陷入動蕩，在北面還有個虎視眈眈而又貪得無厭的蘇聯隨時準備侵略中國的背景下，任何可能內外勾結的風險因素都必須消滅在萌芽之中。和毛澤東一起幹革命的這一代領袖們都不是省油的燈，毛不能不擔心他死後誰能控制得了這些已經被列入不信任對

象的老帥如彭德懷者。站在毛澤東的深邃思想面前展望未來，能懷婦人之仁嗎?

有人說是彭德懷功高震主，未免太小看毛澤東了。因爲僅僅靠軍功來"震"住毛，似乎忘記毛澤東的軍功了。毛將林彪緊急徵召到廬山，很多人說是毛搬救兵來對付彭，其實毛不缺少這一位救兵，但毛澤東確實需要一位信得過的將帥來隨時接管彭德懷手上的軍權，林彪毫無疑問從能力、軍功和當時的政治局委員身份，以及與毛的信任程度上，都是一個看來不錯的人選。

讀史難免會爲歷史人物而傷感，但讀者真能做到把自己置身其中，您可能首先感受到的是刀光劍影，不論是權勢的爭奪，還是對宏大理念的執著。但凡歷史人物能以公心用權，不論結果如何，都應該得到後人的起碼尊重。畢竟，在毛澤東的所有政治鬥爭中，不論多麼殘酷，從來沒有一次是爲自己家人的利益，甚至都不是爲個人的權力（否則他就不會六十多歲壯年時就指定劉少奇爲接班人幷放下大部分實際權力）。這和現在爲了家族財富而弄權者，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彭大將軍的軍旅生涯站對了隊伍，有毛澤東這樣的統帥，使得彭德懷比杜聿明、廖耀湘等人幸運，他的軍事生涯光彩奪目，名垂史册。但朝鮮戰爭之後，他站錯了位置，他是杰出的軍事將領，是戰場上的强者，但不是政治家，是政治智慧的弱者；他不懂得急流勇退，在一個幷不適合自己個性的舞臺上踏空了舞步，最終摔死在舞臺上。這是個人的悲劇，因他的偉大光輝而又成爲民族的哀痛與遺憾。這是人類歷史上不斷上演的類似片段，而且以後也不可能完全避免。



第五章　民主與獨裁[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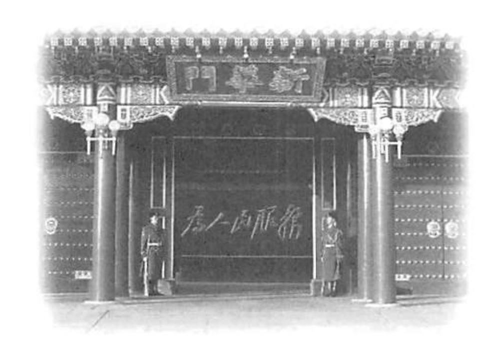
毛澤東時期的政治體制與理想中的民主政體還有不小的差距，而毛澤東後來出現的所谓“家長制”作風，似乎更鮮明了否定了他所建立的政治體制的民主性；是否因此就可以說毛澤東是個反民主、熱衷于獨裁統治的大獨裁者呢？這不僅關係到對毛澤東的個人評價，也涉及到對中國未來民主化方向的探討。

要瞭解毛澤東的民主思想和新中國政治體制的設計，乃至政治運動發動的動機，毛澤東的《論人民民主專政》實際上給了一個最高的理論概括。其中，他對中國的“民主和獨裁”有一些精彩描述：

“你們獨裁。”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講對了，我們正是這樣。中國人民在幾十年中積累起來的一切經驗，都叫我們實行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總之是一樣，就是剝奪反動派的發言權，只讓人民有發言權。

這是毛澤東對人民民主專政的“獨裁”性質的準確描述。他進一步解釋：

[1] 本章內容除個別文字和段落，基本保留第一版的內容。



第五章 民主與獨裁[1]

毛澤東時期的政治體制與理想中的民主政體還有不小的差距，而毛澤東後來出現的所谓“家長制”作風，似乎更鮮明了否定了他所建立的政治體制的民主性；是否因此就可以說毛澤東是個反民主、熱衷于獨裁統治的大獨裁者呢？這不僅關係到對毛澤東的個人評價，也涉及到對中國未來民主化方向的探討。

要瞭解毛澤東的民主思想和新中國政治體制的設計，乃至政治運動發動的動機，毛澤東的《論人民民主專政》實際上給了一個最高的理論概括。其中，他對中國的“民主和獨裁”有一些精彩描述：

“你們獨裁。”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講對了，我們正是這樣。中國人民在幾十年中積累起來的一切經驗，都叫我們實行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總之是一樣，就是剝奪反動派的發言權，只讓人民有發言權。

這是毛澤東對人民民主專政的“獨裁”性質的準確描述。他進一步解釋：

---

[1] 本章內容除個別文字和段落，基本保留第一版的內容。

人民是什麽？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産階級和民族資産階級。這些階級在工人階級和共産黨的領導之下，團結起來，組成自己的國家，選舉自己的政府，向著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産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凶們實行專政，實行獨裁，壓迫這些人，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如要亂說亂動，立即取締，予以制裁。對于人民內部，則實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論集會結社等項的自由權。選舉權，只給人民，不給反動派。這兩方面，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爲什麽理由要這樣做？大家很清楚。不這樣，革命就要失敗，人民就要遭殃，國家就要滅亡。

從毛澤東的這段論述，我們不難認識到毛澤東對中國民主概念的獨到闡釋。這種民主中的獨裁和獨裁中的民主的結合，說明了毛澤東的民主理念和形式。這和現在的泛民主和大民主存在重大的差別，也必然在體制設計和具體操作上的迥异。這和美國式的金錢支配下的民主更有著本質的不同。他的理論在强調民主的同時，也强調打擊反動派，將維護社會公平放在同樣重要的位置。毛澤東的上述論述，表明了毛澤東在孫中山的資産階級民主革命失敗後，對中國未來政治形態的深邃研究。

因此，我們據此可以說，不論在後來的具體操作上毛澤東做了哪些反民主的事，也不能否定毛澤東是一個杰出的無産階級民主思想家，他提出了中國基于廣大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産階級和民族工商業者利益的民主發展的獨到思路。



一、毛澤東政治獨裁的歷史必然性

毛澤東在延安回答黄炎培有關中共能不能跳出幾千年的興衰周期率時指出：“我們已經找到了一條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個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負起責來，才不會人亡政息。”

中國從幾千年封建帝制過渡到民主共和政體需要一個過程。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建國理想固然好聽，但在帝制餘毒甚深的環境下根本不好用，導致袁世凱復辟和接踵而來的軍閥混戰；也給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塗上了濃重的“書生造反”的色彩。至蔣介石執政時期，已只有民主的幌子，再無半點民主的行動。

抗日戰爭接近尾聲時，毛澤東對戰後中國的政治體制提出了建立多黨聯合政府的構想，他在《論聯合政府》（1945 年 4 月 24 日）中指出：

毫無疑義，中國急需把各黨各派和無黨無派的代表人物團結在一起，成立民主的臨時的聯合政府，以便實行民主的改革，克服目前的危機，動員和統一全中國的抗日力量，有力地和同盟國配合作戰，打敗日本侵略者，使中國人民從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來。然後，需要在廣泛的民主基礎之上，召開國民代表大會，成立包括更廣大範圍的各黨各派和無党無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樣是聯合性質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領導解放後的全國人民，將中國建設成爲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强的新國家。一句話，走團結和民主的路綫，打敗侵略者，建設新中國。 我們認爲

只有這樣做，才是反映了中國人民的基本要求。

毛澤東很希望能和蔣介石組成聯合政府，真心希望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的現代中國，願意以議會政治鬥爭代替武裝鬥爭，毛甚至不顧他人勸阻和個人安危赴重慶談判。毛澤東一定認爲：如果國共再開戰，毛也許可以在戰場上取勝，但國軍力量比共軍强的多，戰爭要持續很多年，導致生靈塗炭。無論從共産黨的利益、自己的政治抱負（毛畢竟已是 52 歲的人了，再打十年結果難測的苦戰，歲月不饒人，毛也沒有料到後來的內戰打得那樣順手）、還是民族利益出發，組成民主聯合政府都是上選。因此，筆者不認爲毛澤東要成立聯合政府的呼籲是在演戲。毛澤東與美國特使赫爾利達成 5 項協議提出廢止一黨專政、統一軍隊、開放黨禁、言論自由、建立多党聯合政府應是真誠的。國軍和共軍都是抗日主力，組成聯合政府無論在道義上還是在心理上都是可行的；共産黨打了十多年爲自己爭得合法性和第二大黨地位，也算成功。可當時蔣自恃擁有八百萬大軍，三個月可消滅中共而頑固發動內戰，使中國錯過了一個建立多黨民主國家的有利機會。不少人責備 1949 年後共産黨搞獨裁，可“原罪”在蔣介石。1949 年後的大陸，共産黨無論在歷史貢獻、付出的犧牲，還是力量上都一黨獨大，組成多黨聯合政府的環境已不存在，只能組成“共産黨領導的多党合作制”政體。可以說，是蔣非置共産黨于死地，導致中國錯過了一個民主化良機，也使得毛澤東的民主建國理念不得不重新設計。海峽兩岸後來各有一個具絕對優勢的超級執政黨，使得兩岸的獨裁成爲可能。今日兩岸分裂的責任自然不應由毛澤東承擔。

1949 年建國時，毛澤東創造性地建立了在社會主義國家中獨一無二、由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愛國人士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制

度，其中甚至包括蔣介石的愛將寵臣及其它國民黨人士。由共產黨人前仆後繼打江山，却和民主黨派共享勝利成果，這不僅需要毛澤東有民主的意識，更需要民主的胸懷。這一制度曾讓共產國際和斯大林深感困惑。“文革”前，在部長級幹部中非共產黨員曾占三分之一。五七年毛率團去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勝利四十周年慶典，代表團中更有孫中山的遺孀宋慶玲，他是否有意展示自己党的民主和自信?

毛澤東時期發動的一系列運動雖然後來被批評爲“大民主”，但它建基于毛澤東對人民的信賴和對自己政黨的信心（如大鳴、大放、大字報，游行等），而這種信賴和信心自毛澤東之後則消失歹盡，後來的中共各級官員則將人民的不滿情緒當作威脅而施以高壓，維穩經費長期處于高位。這種信心的消失也阻滯了中共民主化的步伐。毛澤東時期的口號是“群衆的眼睛是雪亮的”，但今天這句話已經不再出現在中共媒體和官方語境中，取而代之的是媒體廣泛使用的詞匯——“不明真相的群衆”。

中國走什麽樣的民主道路至今還是頗有爭論的問題，尤其是“六 · 四”和蘇東巨變，才讓中國的知識分子認識到民主建設的複雜性和漸進性。站在今天的立場上要求毛澤東時代有一個健全的民主政體，顯然是不客觀的。

毛澤東本人雖有民主的思想，也建立了人民代表大會、政治協商會議及黨內民主集中制的民主體系，毛澤東本人在日常政治生活中也非常重視聽取各方意見，但該體系幷沒有很好地發揮作用。原因主要有二：首先，缺少實施民主政治的文化環境；對中國人來說，明主比民主重要，官府施仁政比自己參政重要。在毛

澤東時代，領導幹部普遍的廉潔奉公使人民對民主監督、參政議政及民主體制建設根本沒有興趣，也認識不到它的必要性（今日民主意識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受貪官污吏的“推動”）。其次，毛澤東太高的個人威望成了政治民主化的重要障礙。“文革”後檢討五十年代政策失誤時，鄧小平等老一輩政治家曾說：“我們也是有責任的，也是舉手贊成過的”，這决不是謙詞，原因是“長期的革命實踐中，當對某問題有不同意見時，最終都證明毛主席是對的，主席看得比我們遠”。在美國人特裏爾所著的《毛澤東傳》中，形象地描述到“當毛澤東思考時，他的人民已習慣于將自己頭腦中相應的一部分關閉”。在這樣的環境下，民主政治根本就是空談。“一言堂”和家長制作風的出現將是必然的。

毛澤東的超凡智慧，造就了新中國的誕生，也帶給中華民族獨立、自尊和信心，導致他身邊戰友和廣大人民對他的智慧和力量的過分依賴，進而導致民主環境的破壞和“一言堂”的出現。很顯然，這幷不全是毛澤東的過錯，這更多地屬于歷史的必然。

“現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動只是一股逆流。目前反動的逆流企圖壓倒民族獨立和人民民主的主流，但反動的逆流終究不會變爲主流”。這段話來自于“文革”時期人人必學的“老三篇”之一——毛澤東的《愚公移山》， 說明民主在毛澤東思想中的地位。後來反毛人士批評“文革”是毛澤東搞的一場“大民主”，你可以否定“大民主”，但這個詞匯中必須要有“民主”二字。

實際上，“文革”時期農村基層民主選舉的普及和實效比改革開放後的“村民自治選舉”有過之而無不及（主要選舉當時擁有基層實際領導權的生產隊長，而且自願報名，差額選舉，筆者


选队长（作于1970）

少時曾經歷多次這類選舉），但被後人完全忘却。好像只有當今知識分子和民運人士才知道民主的好處。

從毛澤東對接班人的培養所表現出的勇于放手和信任，從另一個主綫也可以反證所謂“毛澤東搞獨裁”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毛澤東在 1956 年放手政府一綫領導的大權給劉少奇，自己退居二綫。當時毛只有 62 歲，比現在的很多高層領導都年輕。毛泽东的放权显然不是独裁者所能为。但劉的作爲讓毛失望而不得不換掉。林彪得到毛澤東的信任放手治理軍隊，但林完全不顧形象而把自己毫無經驗的兒子直接放在軍隊核心圈而大加培植，甚至最後要謀害栽培他的恩師[1]。在毛澤東晚年，他感到時日無多，國家需要良將接班，重新啓用鄧小平，但鄧小平這個反右時的極“左”頭子，却突然右傾起來，爲“文革”翻案。1975 年在“反擊右傾翻案風”中不得不再次打倒鄧小平。毛澤東放手栽培的三個接班人都令他失望。1975 年底，自感時日無多的毛澤東寫下了最後一首詩《訴衷情》抄給周恩來:

當年忠貞爲國愁，
何曾怕斷頭?
如今天下紅遍，

[1] 林彪在廬山會議後權勢日盛之際，提拔太太叶群爲上校，任辦公室主任插手軍政事務；劉少奇在“四清”時毫不避嫌地把王光美拉進權力中心，在這兩位接班人大大咧咧幹此事時，毛澤東還在約束著江青，直到“文革”爆發。可見，劉、林都不是做統帥的合適人選，不顧影響，吃相太難看。毛晚年啓用江青，重用毛遠新，可能原因是：在悉心栽培劉少奇而遭背叛後，身邊沒有多少可信任和可用之才，尤其林彪這位相隨信任半個世紀的戰友的背叛對毛的打擊太大了。



1976 年 5 月 12 日，毛澤東會見新加坡總理李光耀。當時的毛澤東已經身體虛弱，多數時間把頭仰靠在沙發上。

江山靠誰守？
業未就，
身軀倦，
鬢已秋；
你我之輩，
忍將夙願，
付與東流？

短短幾行，透露出耄耋之年的毛澤東在先後經歷過劉、林兩位接班人背叛，又失去對鄧的信任後，對接班人選擇難題和國家未來的深深擔憂，也可以讓人們對毛晚年一系列行爲有個更深層的理解：他老人家其實一直都在爲政權的平穩交接和社會主義事業後繼有人而嘔心瀝血。獨裁和專權從來就不是毛澤東的目的。

當鄧小平在《决議》中批判毛“家長制”作風時，他自己也將犯同樣的錯誤。以軍委主席身份在四年內撤換兩個党的總書記，不能說沒有“家長制”作風，而且更嚴重，至少毛有“家長制”作風時自己正在“家長”的位置上。毛的“家長制”帶有明顯體制色彩和歷史因素，而鄧的“家長制”則更側重于人治的色彩。無論哪一種“家長制”的出現，都揭示了體制中的重大缺陷。

二、“一國兩制”基本思想的首倡

毛澤東擁有民主開明思想的另一例證是于五十年代末，在海

峽兩岸統一問題上，首次提出臺灣實行三民主義，大陸實行社會主義，即在一個中國的條件下兩岸各保留自己的社會制度這一“一國兩制”的核心思想。1974 年，耄耋之年的毛澤東接見英國前首相希斯時，曾就未來香港問題做出類似的表示（當時鄧也在座）。然而，今人已將“一國兩制”的發明權毫無疑問地送給了鄧小平。如果說海外華人、華僑的這一失誤還有情可願的話，那麼生活在大陸的中國人和中國政府在這一問題上的錯誤則是令人費解的。作爲毛澤東時代主要領導人，鄧小平不可能不知道毛澤東有關台灣和香港問題的這一重要精神。但面對群衆誤送上來的榮譽，中共中央并沒有作任何的糾正。

當然，鄧小平作爲第一位成功實踐“一國兩制”的領袖，爲國家的統一做出了歷史不可磨滅的偉大貢獻。

三、中國民主化的出路

在追尋民主化的道路上，中國已拖著沉重的脚步探索了一百多年。至于如何評價過去的民主化成果，另當別論；可以肯定的現實是，中國今日的政治環境離民主政治還有太大的差距。如果說毛澤東建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黨內民主集中制是中國民主建設道路上的一大進步的話，那麼，從此以後，再也沒有值得炫耀的成果。如果說黨中央高層的“集體領導原則”還算是一個民主的嘗試，那麼同樣肯定的是，這一制度本身只能是權宜之計，因

爲參與這一“集體”的人員產生過程沒有任何規範的制度，“集體”內部的責任承擔和職責安排也被模糊，結果是：對一系列問題議而不决，同時也削弱了中央的權威，而這個“集體”幷沒有給“集體”外人士的參與提供合理的管道；即使强調維護“核心”的重要，但因“核心”本身產生的過程及其個人的操守和能力，也給這個“核心”的權威帶來不確定性。與過去不同的是：個人的獨裁轉化爲“小集體”的獨裁，當今中央高層的產生和運作始終沒有從落後的黑箱作業中解脫出來；個別領導人的上升和下降，根本上與他的“人際關係”密切相關，而與治國的能力和貢獻沒有關係；這必然導致“逆向淘汰”現象的出現，不能不說是中國政治的一大悲哀。“集體領導原則”和突出維護“核心”只能是權宜之計，而不應，也不可能成爲中國高層政治的常態。而集體內部的拉幫結派，難免形成占優勢的組合，則可輕而易舉地摧毁內部的民主氛圍。

在探索中國民主化道路時，必須首先明確的是，中國民主化道路在未來相當長時間內，不能考慮對共產黨本身執政地位的挑戰；這與是否喜歡共產黨無關。否則，不僅無助于民主的發展，很可能導致中國民主化的停滯，甚至倒退，看一下“六·四”對民主化進程的破壞就明白了。中國經受不起“推倒一切，從頭再來”的衝擊；其社會成本的高昂將與民主化本身的目標效果背道而馳。這幷非刻意維護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其實，即使在筆者加入共產黨的發展會上也坦率地承認：本人首先是個民族主義者，然後才是共產主義者，因爲“中國共產黨”組織的基礎是“中國”兩個字。

在筆者深思國家未來出路時，從來不把共產黨的利益作爲考

慮內容，而國家和民族利益才是唯一考量的對象；而共產黨不過是服務于國家的政治工具罷了。但在考慮具體的民主化步驟時，共產黨當今的執政現實和形態是必須要考慮的，否則，再好的民主化設想也無法變成現實。至于五百年後是否應政黨“輪流坐莊”，只有未來才能知曉。如果按照共產黨的理想，到時也許已發展到社會主義的高級階段——共產主義社會，到那時，就連共產黨本身也已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更別談多黨制了。

其實，多黨制固然是民主政治的一種，但是否真能達至民主的社會效果，僅看有幾個黨是不够的，各政黨自身的素質實際上扮演更關鍵的角色。如果各個政黨內部運作是非民主的，各政黨領導人和參選人的產生過程中有明顯的反民主色彩，政黨對外又缺少對輿論的敏感和有效反饋機制，那麼，不論哪個政黨能成爲執政黨，它組成政府的民主素質也必然值得懷疑，因它缺少民主的素養，僅有一個民主的外殼而已。看一下當今世界上不少多黨制政體的運作質量就能明白這一點。

因此，當今中國民主化的首要任務，不是去爭論是否建立反對黨，而是共產黨內部的民主化建設，和外部的人民及輿論監督體系的確立。這實際上是個共產黨群衆路綫的落實過程和落實方式。只有明確了這一目標，才能把握中國民主化的正確方向，同時又不會給國家帶來巨大的政治風險。

當然，如果這一過程進展順利的話，中國共產黨將成爲真正服務和來自于人民的政黨，將吸引所有優秀分子加入該党中去。使他能在凝聚民心，激發民志，社會動員，精神建設等多方面發揮更好的作用。而現有多黨制政體中，政黨僅僅是選舉的工具。

至于中國共產黨民主化建設的終極目標是什麼，此處無意多談，因那是較爲遙遠的課題。當前，中國共產黨民主化建設的首

要任務應該是處理好以下一些理論課題:

第一，如何理解“党領導一切”？

“党領導一切”是中國共産黨的一大執政特點，組織建設上反映在各級黨委的存在和對大小事物的最後裁决權。可以不誇張地說，在今日中國大陸，包括厠所、墳地、生孩子、喪葬、學術職稱評定、職工福利、法律裁决、軍隊等，共産黨無所不管。按照現有大學的職稱評定制度，大學黨委書記有權干預教授職稱的評定，問題是，一個學術水平一流的學者，共産黨可以剝奪他的“先進個人”評定資格，但無權否定他的學術造詣，而“教授”的職稱則是建立在學術水平的基礎上。同樣，他是否應被分到三室一廳的房子，同樣是根據他在科教方面的貢獻，而不是“是否跟著黨走”，否則的話，那楊振寧和李正道這些“反動學術權威”被清華大學聘請爲教授只能說明，清華黨委成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應屬被打倒之列。城市區或街道黨組有權决定公共厠所的建設。而党的主要領導對司法的干預，也成了中國法制化建設的根本障礙。

這種對國家大小事務的無所不管和過分干預，實際上是對“党的領導”理論的嚴重曲解。在共産黨的任何一個理論中也找不到這種無所不管的理論根據。由于這種過分干預和領導，幷沒有一個規範的體制，各級黨委書記就成了實際上的各級“土皇帝”，爲黨的領導帶來了强烈的人治色彩。由于各級黨委組成人員素質的制約，更嚴重地敗壞了中國共産黨的威望和社會基礎，爲黨的事業帶來了巨大的破壞。

因此，中共中央對共産黨改革的一個主要方向，是弱化對具體行政事務的干預，而將“党的領導”定位在對國家重大事務和

發展方向的把握上，同時在先進文化的宣傳、民衆動員、擁軍優屬等方面繼續扮演關鍵角色；適當削弱基層黨委的行政職責和權限。就一個縣如何引進外資而言，“黨”的職責是，肯定引進外資的正確性，但對如何引進，引進什麼，實在不該在黨的管轄範圍，這是個純粹的行政和經濟問題。當然，党本身對各級行政部門的行政質量，尤其是黨員是否有違法亂紀行爲，具有監督的權力和職責；各級“黨鞭（紀檢委）”的作用當然不能削弱，甚至應加强。

如果能本著上述方向弱化對基層具體行政事務的領導，中國共産黨將可以立即實行黨的各級領導班子精簡，甚至可縮小三分之二的黨務人員編制，爲各級財政節省大筆的開支。農民的負擔也將隨之大爲减輕。

上述改革思路，不僅不會挑戰“党的領導”這一核心問題，而且具有相當强的可操作性。請中共中央政治局考慮這樣一些簡單的問題：一個鄉鎮黨委書記爲所欲爲，如果削弱他們的權力，對中央高層的個人利害有什麼不利影響呢？當中國的國家政權繼續掌握在共産黨手中，那麽，基層黨委權力的削弱是否就破壞了中國的政權性質了呢？答案應是顯而易見的。[1]

如果回避這一改革，各級黨委和行政之間的扯皮、責任推諉、分工不清、獎罰不明等弊端，將會長期地持續下去。中國法制化建設的步伐，沒有快速前進的可能，因共産黨成爲一捆緊雙脚的脚鐐。

中國在過去幾年搞的最著名的民主化改革是“村民自治選舉

[1] 十九大後將武警權力收回軍委，就是對基層權力的弱化。過去各級黨委書記利用武警涉足强制拆遷等不少壞事，嚴重敗壞了黨和政府的形象。

制度”的建立。但至今在中國廣大農村沒有很好地貫徹執行。除各級黨委和政府督促不够，還有個更根本性的原因，就是這個制度本身的缺陷。

現在，中國農村行政村或大隊（“大隊”是農業集體化的產物，一般包括幾個自然村。現在的行政村仍以“大隊”爲基礎，農民仍習慣使用“大隊”一詞），主要領導有“三大員”：黨支部書記、主任和會計組成的村委會。村民自治選舉制度所選舉產生的幹部是“主任”這個角色。由于“党領導一切”，在三人中，黨支部書記是實際的“一把手”，而主任只是“二把手”。這樣，村民興高采烈地選出來的是個沒有最高領導權的“老二”。只要“一把手”對村民選上來的人不滿意，這個民主的“產物”就別想開展工作，他手中的民意將分文不值。

由此可見，如果中國共產黨不能很好地處理“党的領導”，中國的民主化建設將寸步難行。即使僅就村民自治選舉制度的完善，而弱化行政村黨委書記的權力，讓人民選舉出真正的“一把手”，中國基層民主化建設也將取得根本性的進步，基層貪污之風將會得到有效遏制。同時，民主的“種子”也將通過幾年的選舉而在人民心目中生根發芽，爲將來更大範圍的民主化建設準備社會基礎。

只有當民主的概念融入到人們的生活和思維習慣中，“民主”才真正成爲中華文化的一部分，否則，它將永遠停留在政治理念和學術的層面上。

第二，如何處理“反對黨的領導人”和“反黨”的關係問題。

這一問題處理的好壞，將從根本上影響到中共高層領導幹部對輿論監督和民主制衡的態度取向。

自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黨內的鬥爭很多是党的領導人之間領導權的爭奪，而和“路綫”沒有關係。而黨內鬥爭的失敗者，更被冠以“反黨”的天大罪名而永遠不得翻身。這不能不說是共產黨歷史的一大污點。同時也說明了共產黨在處理個人和組織關係上的模糊，和對組織名譽的濫用。

最近十多年的一個可喜變化是，中國共產黨正逐漸擺脫過去的鐵血風格，變得更加理智、中庸和對政治對手的寬容，使得趙紫陽成爲共產黨鐵血傳統的最後一位受害者，當然，也是最後一個“党的分裂分子”。中國軍隊在國家權力安排中角色的淡化，就是一個明顯的標志，也是中國軍人和軍隊建設更加成熟的體現。

中央政治局同樣有必要考慮這樣一個問題：如果某省委或縣委書記的危法亂紀行爲被媒體揭發的話，是否會影響到共產黨整體的威望呢？對您本人又會有什麼傷害呢？他可能是您栽培和提拔的，但他後來的違法亂紀和當初的提拔是兩個并不一定矛盾的問題；不能因爲您的提拔而對他個人負永久的責任。作爲中央高層的領袖也應看到，對一個聲名狼藉的貪官進行袒護，本身就是在毀滅您自己的威望（這樣短見的高官比比皆是）；爲一個不值得愛護的下屬而毀掉自己的清譽，是否太不明智了呢？很遺憾，當今中央高層的領袖們，有幾個人沒做過這類胡塗事？自毛澤東的第一代領導集體之後，很難再找到有這種基本遠見的領導人。

筆者在思考中國的民主化方向時，從來不把“人”看成是理想的，甚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也被理論上看成是有私欲的，而不是共產黨傳統所宣揚的理想革命者；只有這樣，才能確立起穩定而有效的民主體制。因此，上述請中央政治局委員考慮的問題，也顧及到對他們自身群體利益的傷害程度；否則，再好的民主化改革建議，也很難通過高層那一關。這是無奈的，但又是負責任

的和非對抗性的，最終將比激進式的改革更能實際推動中國的進步。“六·四”之後中國民主化發展的停滞就是最好的例證。這也決定了中國的民主化改革是漸進的，而不是跳躍式的。

第三，有效輿論監督體系的確立

第一章談到國有企業的出路時，曾涉及到輿論監督方面的問題，之所以沒有深談，是因爲根本問題在于：輿論監督體系有效與否，不僅涉及到國有企業改革的成敗，也涉及到中國民主和法制化建設上是否能取得實質性的進步。這實際上是個關係全域的問題。

隨著中國傳媒業的改革和重組，昔日的直屬各級黨委的形態將會有所改變，將會爲輿論的監督提供更寬闊的活動空間。如果讓《河南日報》揭發河南省委書記親屬的違法行爲，顯然是困難的，但如果讓它成爲全國發行的大報，進而去揭露貴州和黑龍江省高層的違法亂紀行爲，則具有可操作性。因此，中央應栽培并鼓勵一些有較好基礎的媒體集團向全國發展，并鼓勵它們將報道的內容覆蓋全國，這樣，各級領導人在胡作非爲時，必然要面對更大的風險。而中共中央也應考慮讓全國人大擁有一份較具獨立性，同時又是全國性或大區性的報紙。只有這樣的報紙，才能對各級黨政部門及領導人進行更有效的監督。很顯然，這絲毫不會威脅党的領導地位，但肯定會影響個別領導人的地位。

全國政協也可考慮設立獨立媒體，除議政外，重點監督各級黨委和政府的執政質量和操守。

在中國的政治生活中，是否允許輿論充分監督，實際上是黨和政府的運作是否要民衆參與的問題，這將決定執政黨的本質。

第四，中國民主化改革的啓動方向應遵循從下而上和從上而下兩個方向。

所謂“從下而上”，是指從基層作起，如上述村民自治選舉制度和基層黨組織的功能弱化。如果能同時伴隨基層黨組織自身的民主化建設，如党幹部的黨內選舉和群衆評議制度建設等，那麼中國共産黨的整體執政素質和威望將會有大的提高，也將爲黨內民主化發展作必要的測試和準備。待行政村級民主建設穩定後，再逐步上推至鄉鎮和縣。在城市，則從街道起步，進而上推至區和市級。

所謂“自上而下”，是指從中央高層作起，其中包括黨中央高層權力架構的完善，黨政職責的明確化，權力交接制度的確立等。這可能會面對較大的困難，但是必須要走的一步。困難不在體制的設計，而在高層領袖自身的胸懷和遠見，正如上文所說，筆者不把他們當成是理想的革命者，也增加了改革的難度。自中共十六大召開前就中共未來領導核心成員的各種傳聞也可看出，中共高層體制的改革已到了非進行不可的地步。讓中南海裏那幾個人“攪得周天寒徹”，未免帶來道德的質疑。“尊敬的党和國家領導人”隨時有變成“黨內一小撮”的可能。

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國共産黨省一級黨委和政府的民主化改革將是最後，也是最難把握的一環。主要原因在于中國邊疆少數民族聚集省區的過快民主化，可能帶來地區“政治和民意孤島”的潛在問題，進而影響到邊疆地區的穩定和統一；對此就不贅述了。但這幷不應成爲回避輿論監督、放慢法制化和黨鞭體系改革的藉口。

上述改革思路肯定不是中國改革的長遠目標，只能是在現有基礎上的第一步，而這一步是無論如何不可能跳過或回避的。如

果能在不久的將來完成上述初步改革，未來改革的方向將視具體改革的效果而定。上述黨內改革，配合黨外監督渠道的加强，以及人大作用的强化，如果能產生不錯的民主效果，未來的改革方向將側重于完善已有改革，并在原來的大方向上予以深化，直至整個共產黨系統的民主化改造完成。如果能在五年內達至上述初步目標，十年內完成整個共產黨系統的改革和完善的話，那麽，對中國民主化進程來說，將是一個質的飛躍，對共產黨來說也是一個脫胎換骨的改造。

如果上述改革完成後，黨內民主無法發揮應有的效力，黨外監督無法有效運作，那麽，中國共產黨的“多黨化改造”將是不可避免的。

由于中國共產黨過于强大，且党國一體，要在中國培育反對黨將异常困難和漫長。最快捷且能保持意識形態穩定的“法寶”就是：將共產黨一分爲二，成立兩個左派政黨，他們擁有同樣的歷史和意識形態，但各自獨立運作。在具體民主化的游戲規則上，本處就不做細談了，因這一天是否會來臨還是未知數。

當今中國共產黨的高層領袖們，如果要避免未來的不得不分裂的命運，唯一的選擇就是加快自身的民主化改造，并以較寬宏的氣度爲黨外監督創造條件。

第五，司法和紀檢體系的改革勢在必行。

不論什麽樣的政治改革方案，保證它能有效實施和運作的關鍵要素是司法體系和黨鞭的有效性。

當今中國的司法體系和黨鞭系統，是由各級中央和地方黨委會領導下運作的，這必然帶來的問題是：紀委在監督領導自己的

黨委操守時的失效，以及法制體系維護社會公正和國家法律尊嚴上的局限性。如果不徹底解决這個問題，各級黨委必然成爲擁有行政資源、經濟資源、宣傳資源、司法系統、武裝力量的實際上的地方山頭，民主和法制社會的建立就成了空中樓閣。因此，中共當前改革的首要任務之一，是將現有的司法和紀檢體系的橫向領導割斷，全部改爲縱向領導。法院和監察體系的最高領導機構，應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負責。而紀檢委則直屬政治局常委會。這樣，雖然離完美還有距離，但中國的民主化和法制化將邁出根本性的一步。配合上述監督輿論體系的確立，打擊貪腐和特權的制度基礎也就初步確立起來了。

自習近平爲代表的第五代領導集體上臺以來，大力反腐倡廉，力度之大古今罕見。老虎蒼蠅一起抓。但現實是，老虎抓不少，蒼蠅群體大的多，抓的遠遠不够。甚至可以說，中央大力反貪，省級總體上應付，地市級和縣級只傳達文件。即高層力度到了基層就是强弩之末。筆者認識一位市紀委副書記，整天沒事做，就是玩書法藝術之類的。我很好奇他爲啥這麼輕鬆，他答：投訴很多，信息很多，但市委書記不批准調查的案子，紀委不能貿然調查，他就只好落個清閑。這是 2016 年的中國基層反貪的荒謬現狀。可這樣的市委書記遍布中國大多數城市，但一個都沒有因爲不反貪而被以“不作爲”之名予以撤職。如果以後高層反貪高壓減弱，基層貪腐必將捲土重來，只會更加猛烈。所以，沒有制度的完善，我對共産黨的未來不敢太樂觀。[1]

中央可以參考人民銀行設立大區行的思路，考慮設立大區級

[1] 這部分文字爲第二版新加內容。

法院、監察和紀檢體系，以取代現有的省市區縣級部門。今天一有大案要案都要中央直接插手，顯然是低效率的。

第六，各級人大的功能强化，和各級人大代表産生過程的民主化。

當今的人大體系，雖然從憲法上講具有很高的合理性，但因“党領導一切”而帶來具體操作上的非民主色彩，導致了功能的弱化。各級人大其實是各級黨委的橡皮圖章和民主化的裝飾品，實際的監督作用根本沒有發揮。人大代表産生過程缺乏民主程序，很多勞動模範成爲人大代表（這在人大代表中還算不錯的呢），但與民主無關。讓這些勞動模範成爲社會的道德樣板無疑是有意義的，但讓他們去批評和監督向他們授予榮譽的領導幹部，則有些難以操作。由于人大代表産生過程的非民主，導致 90% 以上的大陸人民不知道代表他們所在社區的人大代表是怎麼産生的，甚至根本不知道是誰。

另外一個荒唐的現象是：各級人大的例會（全國人大除外）很少受到關注，他們都討論些什麼內容，也無人知曉。筆者這種極爲關心國事的人，也不知道省、地、市、縣級人大一年中，除每年一次的例會，是否還有其它的例會，如每季度例會等，以及人大代表都對哪些事務提出過議案或進行過辯論。

更荒唐的是，大陸的城市街道、鄉鎮和行政村一級，沒有人代會式的法定議事和監督機構（如，村民監理會，鄉鎮人民代表大會）。缺少了這兩級的議會體制，基層的民主化就根本談不上了，基層人民利益的維護和當家作主權力的行使，也就成了一句空話。很顯然，這是大陸民主制度建設中的一大疏漏。

面對世界發展大勢，中國的民主化改革將是世界注目的大

事。作爲世界上第一個創立文官制度和考試取仕制度的國家，中國朝廷的執政素質曾長期處于領先地位，保證了中華文明的傳承和發展。今天，面對必須要走的民主化道路，只要中國共産黨領袖們能更高瞻遠矚，具更博大胸襟，一定能建立起世界最完善、最科學的民主政體。它不僅具有西方民主政體的民本性、開放性、包容性，同時也將具有西方民主政體所欠缺的高效性、前瞻性和全域觀，尤其避免西方民主政體所固有的選舉型或短期利益追求型的執政特點。

四、對臺灣民主政治的一點看法[1]

臺灣在借用它山之石的基礎上，已進行了積極的民主化改造。不論當前臺灣的民主政體有多少問題，筆者從來不準備嘲笑。但阿扁當選那天的晚上，實現了政黨輪替，因統獨問題也引起廣泛擔憂。我從戰略高度深度分析後，似乎發現了阿扁的個性對于國家統一的難得機遇（當時給中央高層寫了封建言信，但中央對陳水扁的判斷與我不同）。

臺灣在民主化道路上已取得一定進展是不容置疑的。雖然今天還有立法會罵人的現象，但比蔣介石時期的坐牢，和李登輝時

[1] 該部分內容第二版增加最後一條。有興趣瞭解作者對臺灣問題觀點的讀者可以進入微信公衆號“南洋智庫”或作者新浪博客 blog.sina.com.cn/nanyangbook，參考裏面的九篇臺灣系列文《臺灣是如何失去大陸的》。



期議會的肢體衝突，已經是不小的進步。作爲一名積極探詢中國命運的大陸知識分子，筆者對臺灣的民主化之路從來都給予由衷的祝福。畢竟這是建立民主化中國的一部分。

但過去兩次的大選所發現的一些問題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臺灣各政黨必須進行內部的民主化建設。

沒有執政黨內部民主的確立，不論臺灣的政黨輪替多麼熱鬧，都難以避免行政作業上的反民主動作。因爲當選人當初能代表自己的政黨參選，只能說明他在黨內高層人際關係運作上的能力，而和治國能力、政治遠見、全體黨員中的威望以及民衆基礎等毫無關係。[1]雖然選民投票給他，有相當比例是“看在黨的面子上”，而不代表對當選人本人的認同。而日常政治運作的時候，黨的參與又是非常有限的。

其實，從上面對大陸民主化的思路也可看出，政黨內部的民主化和外部的民主化一樣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話。

對于國民黨來說，下次大選如果能以黨內公開選舉的方式産生候選人，無疑將是國民黨的一大飛躍。但對于講面子的中國人來說，讓馬英九和連戰爭這個位置顯然是困難的。所以，在黨內民主體制設計上，照抄西方的公式，看來會遇到可操作性的問題。

[1] 2016 年臺灣大選，筆者借助于臉書全程參與了洪秀柱的初選階段，正因爲對國民黨內部文化的瞭解，我很早就預測到朱立倫可能造反“換柱”。果不其然。之後我曾宣揚洪秀珠應該獨立參選，但她很顯然對國民黨繼續抱有希望。而後來的黨主席任上座位沒坐熱即被替換，進一步凸顯了洪秀珠的理想主義：對于肌體病入膏肓的政黨抱有希望，除了失望，不可能有作爲，只是浪費自己的政治生命和支持者的熱情。

但如果不邁出黨內民主選舉這一步，國民黨的徹底內部改造將遙遙無期。對于連戰來說，是否參加下次大選，或是否當選臺灣最高領導人并不是關鍵問題，如果連戰能完成國民黨的民主化改造，爲臺灣留下一支高素質的政治力量，那麽連戰可以笑對國父和蒼生了。而把盛負民意和年齡優勢的馬英九推向前臺無疑是值得考慮的。

連戰希望爲國民黨奪回在自己手裏失去的江山，是可以理解的。如果能在下次大選前向外界表明：如果自己當選將只幹一屆。到時，以此爲契機，啓動全黨直接選舉的方式產生候選人（連戰不再爭取候選人機會），馬英九應能通過選舉而代表國民黨出選（不能因爲馬英九的民望高而放弃民主選舉的過程，這涉及到一個新制度的啓動）。那連戰對國民黨的貢獻將足以名垂青史。而國民黨作爲民主和高素質政黨的輝煌時代，才能真正來臨。

臺灣其它黨派同樣面臨黨內民主化改造的問題。

第二、從選舉制度上確保當選人能代表多數民意。

上屆大選，雖然導致了政黨輪替的民主表像，但當選人陳水扁以不足 40%的少數民意當選，則成爲這次民主選舉的一個缺憾，也對民主的素質和效果提出了挑戰。

實際上，參選人超過兩組情況下，這種結果早晚都會出現。當臺灣引進美式選舉制度時，忽略了美國實際上的兩黨競選體系。如果要找參考樣板的話，歐洲國家的第二輪選舉制度，才比較適合臺灣的政治現實。即，在第一輪選舉中，如果沒人得到超過半數選票，得票最多的兩組候選人進入第二輪選舉；這樣，在第二輪選舉中勝出的候選人，必然超過半數選票，代表多數民意。

希望阿扁是最後一位在不到半數的情況下當選的“總統”。

當然，如果引進第二輪選舉制度，民進黨如果不放弃“台獨”黨綱，當選的可能性將大幅度降低。而“泛藍政團”應利用當前在“國會”中的優勢，促成“第二輪選舉制度”的立法。這樣，即使未來國民黨和親民黨合作失敗，不得不各自參選的話，“台獨”黨派也少有在第二輪勝出的可能。



第三、輿論監督水平的同步提高，是臺灣民主化建設走向成熟的必然環節。

由于存在著“統獨”之爭，導致了島內輿論的分野，幷和島內各政黨的“統獨”傾向攪在一起，從根本上動搖了輿論監督本來應該具有的中立地位。在真正民主的社會裏，如果沒有了輿論的中立，民主監督的效果必然受到削弱。比如，傾向“台獨”的媒體，面對民進黨政府的錯誤，總不可避免地從正面進行闡釋和包裝，而對統派陣營的言行，則盡力從負面進行報道和分析。很顯然，指望這樣的媒體監督民進黨政府，是不可能有效的。

在報道與大陸有關的新聞時，這很顯然是臺灣必須關注的話題，臺灣媒體幾乎都傾向于進行負面解讀，給臺灣人民更好地瞭解大陸提供了帶傾向性的內容。如：在統獨問題上比較中立的《中國時報》，在“集集大地震”期間曾在頭版頭條刊出一則新聞，指大陸阻止俄羅斯對臺灣地震的救援。然後臺灣媒體全面轉載了這則新聞，給臺灣人民的心理造成很壞的影響，也必然影響到百姓對大陸政府的看法，對兩岸之間的理解和諒解帶來必然的破壞。但後來證實這則新聞是錯的，于是，該報在內頁不起眼的地方刊登了一個更正啓示，而不是在頭版顯著位置，但對海峽兩岸

交流的負面影響已經造成。

這類例子在臺灣媒體中幷不鮮見，至于大陸政府方面的一些善意言行，更被傳媒經常忽略。大地震時大陸政府隨時準備援助臺灣的表示等類似情況，臺灣報紙則低調處理。

在臺灣加入國際性組織問題上，這類處理手法更是明顯。臺灣有那麽多國際法專家，不少臺灣人具有開闊的視野，他們很清楚大陸必然阻止臺灣加入任何只能由主權國家參加的組織，即使讓臺灣媒體的編輯大人坐鎮中南海，他們同樣會加以阻止，但是臺灣媒體遇到這類情况時，從來沒有冷靜的分析和對民衆的勸諭，相反，都是對大陸政府情緒化的指責。很顯然，在促進臺灣人民理解大陸，增進諒解方面，臺灣媒體是非常失職的。

臺灣媒體輿論監督的質量和層次，不要說跟上民主社會輿論監督的獨立性和公正性要求，即使在職業道德建設方面還有太長的路要走。至于啓動社會思考，引發思想交流，積極地探詢社會、政治和民生問題的功能，就更不要奢望了。

甚至可以說，如果有朝一日兩岸關係真的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臺灣媒體從業人員將無法逃避歷史和良知的譴責。

至于臺灣在大陸的民主化建設方面是否能扮演“復興基地”的角色，實在不敢抱太大的希望。兩岸的政治現實、社會基礎、民衆文化素質、經濟發展水平等均存在太大的差距。臺灣因政治體積較小，即使民主化改造出現失誤，損失將是有限的。而大陸則經不起政治上的大波折。在一定層次上的民主集中混合體，將是未來相當長時間內大陸民主政治的模式，也適合大陸當前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超級複雜狀態。雖然沒有臺灣的民主精彩和熱鬧，但一定程度上的有限獨裁對大陸却是適用的。

實際上，大陸制度中的獨裁成份，爲海峽兩岸在談判的基礎

上尋求統一提供了較從容的環境。如果大陸真正實現了臺灣式的民主，在兩岸統一談判中大陸政府再也沒有能力輕易地做出讓步。

至于臺灣是把握還是錯過這個機會，讓時間去回答吧。

第四，兩岸統一是臺灣民主政治走向成功的必由之路。

目前臺灣深藍和深綠選民占選民的比例分別達２０％。這個４０％的選民是基本不看政綱和行政質量的，只看統獨傾向或顏色決定選票投向。這是各陣營的選票基本盤。就是說，臺灣民主體制對行政質量的監督只有最多６０％的有效性。在這６０％中，有部分淺綠和淺藍選民，在評估行政質量時又加入了自己的藍綠傾向。還有一部分對政治徹底失望的選民，抱著“選哪個蘋果都是爛的”思想而懶得投票。可見，在統獨問題沒有徹底解決之前，臺灣不可能有高質量的民主實效，不論其制度多麼完善。只有將這個 40%基本盤的力量完全從統獨情結中跳出來，專注于施政質量的監督，臺灣高素質的民主政治才真正有可能到來。



信儿捎给台湾的小朋友（1974）

毛主席语录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

《严重的教训》一文的按语

第六章 知識分子、反右與“文革”

1958年，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提到：不能靠法律治多數人，多數人要養成習慣；……憲法是我參加制定的，我也記不得。法案條例靠養成習慣才能遵守；人的工作做好，物也就有了。

毛澤東的上述談話，表明他對政府作爲最高教育者角色的態度。從第一章中可以看到，毛澤東的上述判斷，已經讓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受惠，也爲他政治生涯中不斷的政治運動作了最好的注脚。

一、知識分子的特點和反右

毛澤東作爲一代“明主”，對文人賢士以禮相邀，厚待有加。建國時，請文化界德高望重的人士加入政協，甚至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開國大典。至于這些老學究們對新政權的建立是否作過值得一提的貢獻，是否有一謀一計之功，不談也罷；他們在舊中國文藝界的聲望和地位獲得新政權的認可和尊重也是正常的。至于

他們在新政權的領導下能有多大作爲，毛澤東等建國的領袖們未必抱太大希望。原因很簡單，他們除了認識幾位中央領導人外，沒證據顯示他們對新政權的本質有深入的認識，他們在古紙堆裏積累的學識也難以應付國家工業化的需要。他們同樣缺少毛澤東那種對中國社會的深刻瞭解。

以著名的學者梁漱溟教授爲例。他曾在延安對毛澤東表示了自己對抗日的悲觀看法，與毛澤東抗日必勝的信心成鮮明對照。他固然是位錚錚鐵骨的學者，一代大儒，有著對農民的深切同情，他的“九天九地”論體現了對農民命運的憤憤不平，但他對城市工業化的消極思想與社會發展的方向差距太大。他在《鄉村建設大意》裏強調和追求的“農民自覺”，對教育程度低、一盤散沙的農民來說，根本是書房裏的幻想。沒有像毛澤東這樣的政治家，要組織起中國的農民，幷發動他們的群體自覺性，根本是不可能的。他的“鄉村組織”建設構想更是有趣，指望靠“商量著辦事”，既沒有任何的可操作性，也沒有理論價值，與現在的民主思想更不沾邊。他在 1953 年的政協會議上和毛澤東的當衆爭論，固然表現了知識分子的骨氣和特立獨行；但他在大會上對正得意非常的毛澤東（國民經濟快速恢復，各類舊社會毒瘤被鏟除，抗美援朝取得勝利）提出公開“挑戰”，在方法上則太有問題；即使美國反對黨國會議員，也不會以挑戰的口吻不分場合地對付美國總統。如果拿他當時的語言放在後來的鄧小平和江澤民身上，等待他的很可能是秦城監獄。毛澤東不是個聖人，而是有著常人的喜怒哀樂。學者提個思想或發發牢騷不難，也應該給予這個權力（可惜這種權力幷不總是存在的，尤其在尋求全民思想上高度統一的時候。這種權力也不應該在任何場所，任何情況下都給予滿足），政治家必須考慮到更多實際的問題。但“文革”結束後，

人們將二者决裂的全部責任推給了毛澤東，是不公平的，也是毛後時代極有代表性的處理手法。

遺憾的是，這些老學究中的一些人幷沒認識到自己的局限性，更不會到田間、工廠去爲自己的學識注入新內容；還以爲似過去的文臣謀士，靠引經據典就可以治理一個現代國家。進城後不久老學究們就開始爲自己的不被重用和待遇太低而牢騷滿腹。毛澤東在《七律·和柳亞子先生》詩文中的“牢騷太盛防斷腸”，即表露了對類似柳亞子等老學究們的規勸和無奈。而柳亞子對自己有“奪席談經”才學的自負和不被重用的牢騷，突顯了中國知識分子的通病。

這些老學究們所爲幷非偶然的，實際上表露了中國知識分子群體所共有的一些特點。這些特點對毛澤東發動反右、“文革”、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起了重要的作用。

知識分子在中國是一個相當特別的群體。中國知識分子受傳統文化的熏陶，在他們身上聚集了這個民族文化的精髓和糟粕：一方面，膽小怕事、追名逐利、斤斤計較、自私自利、附庸權貴、投機鑽營；另一方面，淡薄名利、胸懷天下、大公無私；高雅與庸俗一體，自不量力與博學廣聞同在，眼高手低，目空一切，脫離實際。從群體的角度看中國知識分子，囊括了中國人品行的整個光譜，且表現得比工人農民更强烈、更鮮明。故在中國老百姓眼裏有“文化人難打交道”和“讀書人知書達理”的矛盾認識。香港科技大學校長吳家瑋教授曾一針見血地談到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本身就是時代的問題”。作者曾在新加坡某公司工作，有一次當從報上看到幾位日本議員要登釣魚島的消息，公司的幾位來自山東的工人（中學文化程度）均義憤填膺，紛紛表示“如中國和日本開戰，立即回去參軍”；公司的一名來自中國、擁有本

科學歷的工程師則有另一通高論：“回去幹什麼？中國那麼多人，沒有你們就沒人打仗了嗎？”此類精明人在知識分子中幷不罕見。他們隨著知識的豐富，幷沒有同步建立起更高的個人素養、道德價值和對社會的責任意識，但原來身上的那份寶貴的純樸已消失殆盡。

毛澤東作爲開國“明君”和大知識分子，他清楚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奠定了中國文化的基礎；廣開言路、從諫如流開創了大唐盛世。五十年代發生的“匈牙利事件”和“波蘭事件”让毛澤東驚醒，他要充分廣開言路，爲共産黨提意見，化解共産黨和群衆之間積累的矛盾，避免東歐事件在中國重演，所以，他 1957 年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了一個內部講話（該講話後來被正式以《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中央文件頒布），鼓勵“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給共産黨官僚主義提意見，幫共産黨整風。毛澤東講話創造了一個暢所欲言的寬鬆氣氛。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開始不久，雖然大多數知識分子幷不抱什麼政治企圖，但少部分知識分子的自不量力、目空一切、追逐名利的毛病逐漸顯露出來。他們在戰爭年代膽小怕死，只能躲在學堂裏或香港指點江山，清談國政；“百花齊放”似乎讓他們看到了“坐江山”的機會，什麼“紅旗能打多久？”、“外行領導內行”相繼出爐。對社會主義制度的非議，對共産黨領導的質疑隨之出現，甚至出現歌頌赫魯曉夫及其“秘密報告”的情況。在攻擊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産黨領導體制的聲音中，不乏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人士。

很顯然，上述現象超越了學術爭論和向共産黨提意見的範疇，直接挑戰現政權和政治體制的意味甚濃。如果回憶一下“六·

四”前部分知識分子的表演，就能想像反右前一些知識分子自不量力的形象。毛澤東作爲政治家，出于維護政權的本能而發動反右，是非常自然的反應。當然，反右是中共中央集體討論决策的，不是毛澤東個人的專斷，最後的發展也超出毛澤東的預料。但現在把反右的“屎盆子”扣在毛澤東一個人的頭上是不公平的。

反右運動開始後，需要一個指導性文件，毛澤東把他的講話，結合高層的意見後形成了《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個文件是綱領性的，在政治上是開明的。但具體的執行效果，還要看執行層面的操作和掌握了。鄧小平以中共中央總書記兼任反右領導小組組長，彭真任副組長，來具體領導反右工作。劉少奇當時已經確立爲接班人和一綫最高領導人地位。反右擴大化的具體責任在誰，您還能都怪毛澤東嗎？根據一些回憶文章[1]，毛澤東當時認爲全國右派有四、五千人。而鄧小平以反右領導小組組長的身份在中央黨校講話中，提出按照 10%的比例打右派，而且後來全國各單位就是按照這個比例執行的，一下子打了五十五萬右派。在右派平反問題上，毛澤東主張調查事實，有錯必糾。但鄧小平告訴統戰部的部長：右派一律不能平反，有什麼問題以後

[1] 這部分第二版做了調整補充。由于缺乏官方資料，目前關于反右的文章都是回憶類文章。筆者無法肯定反右擴大化中各位領導的責任，可以肯定的是，鄧小平主政後所有關于反右及其擴大化的描述都具選擇性，這一點和前述大饑荒情况類似，因反右時期一綫領導人劉少奇和反右領導小組正副組長鄧小平、彭真不僅是直接責任人，也是政治盟友，他們主導下的輿論不可能公正。因此，可資參考的回憶文章可能有傾向性，但鄧主政時的宣傳則肯定有傾向性。期待中央解密這段歷史檔案，才能對有關領導人給出公正評價。鄧曾說自己對反右擴大化是有責任的，但具體責任不詳。當時他和劉關于反右的講話很難找到，這與他們所處的一綫位置很不相稱。身爲反右領導小組組長，他有執行和反饋之責，有具體執行“度”的控制權力。他又有總書記身份可以直接插手黨媒，因此，要說鄧小平對反右擴大化負有主要責任，不會與事實偏離太遠。

再說，現在不宜平反。（以筆者理解：反右擴大化是鄧小平主導，如果刮起平反之風，鄧擔心自己被追責，所以，無限期拖延下去就是鄧最期待的選擇。拖到毛死後，他把所有責任推給毛）

反右擴大化中將不少無故的知識分子錯化成右派，將正常向組織提意見者也給予打擊，是令人遺憾的。“反右”過程中，一些文人借機打擊對手的做法就不值一評了。

令人痛心的是，“反右”幷沒有制定一個可操作性的標準，導致投機鑽營者借機爬升，打擊异己，而耿直的知識分子則受害者衆。這也是歷次政治運動的可悲之處，直接導致政治運動實效和目標的偏離。

毛澤東逝世之後，一些領導人和學者將毛澤東提出上述“雙百方針”和後來的反右聯繫起來，幷將其視爲毛澤東有意采取的“引蛇出洞”手段，來達到整肅异己的目的。毫無疑問，“雙百方針”的提出，激勵了一些學者的言論膽量，幷導致後來的反右，但這種因果關係是否爲預先設定的圈套，實在沒有任何的可靠證據加以證明；只是後人爲否定毛澤東而任意地發揮他們的豐富想像罷了。

從一些回憶文章及越來越多披露的資料可以看出，毛澤東提出“雙百方針”的講話幷沒有在黨內預先討論，而只是毛澤東個人提出的觀點。他的講話在黨內引起很大抵觸，不少人對毛澤東這個講話是有意見的，毛澤東爲此很是苦惱；所以，當後來一些人借機來和共産黨分權時，毛澤東受到了來自黨內同志的壓力，不得不同意反右。

知識分子以政治的理由遭受打擊，從政治上不論多麼可以理解，都是令人遺憾的，這是幾千年來間隔上演的悲劇。這裏面存

在著統治文化進步程度的制約。中國文化的全面復興離不開中國政治環境的全面民主化、開明化和理性化。沒有文化的復興和爲此配套的政治環境的改善，中華民族的新盛世將只能是一個幻想。這有賴于中國政治家的智慧和信心。當然，如果知識分子以理想主義的心態思考，不會有太大的問題，但如果以同樣的心態訴諸于政治上的行爲，則未免太輕率和冒險了。如果中國的知識分子總以爲自己是真理的化身，不能認識自己的局限，知識分子和政權的對立將長期存在。當我們責備秦始皇坑儒，終結了“百家爭鳴”時代的時候，最好不要忘記這些儒生們對“分封制”的鼓吹，和對郡縣制的嘲諷。今天回頭來看，不得不承認，雄才大略的秦始皇推行的郡縣制是對的，他確立了中國萬年一統的基業和文化，爲中國百姓奠定了安居樂業的政治基礎。而那幫儒生們真的是大錯特錯了。

當毛後時代的知識分子評價毛澤東時，到底有多少是基于個人的得失，又有多少純粹是從歷史和宏觀的角度去把握？“千萬不能得罪讀書人”，這已爲千年政治史所反復證實；這除了說明知識的力量，也從另一個方面反映了讀書人的狹隘和自私。當中國知識分子評價毛澤東時，他們完全沒有考慮一下廣大工人和農民的感受，以及他們在毛澤東時代的得失，而只以自身及大城市的受害者作爲唯一考察對象，甚至大城市的工業化成就和工人福利政策也被忽略。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余英時教授對于諸如劉邦、朱元彰、毛澤東等人能成爲帝王，而飽讀詩書的知識分子却沒有這樣的“幸運”感到遺憾和不能理解。其實，如果余教授能認真地內視一下中國讀書人的那份文强志弱、心强體弱，就該理解到：在朝代更迭之際，中國讀書人如果不拖後腿已經是萬幸。像到了民國時期

還留著辮子，爲男人納妾和女人裹脚辯護的大學者辜鴻銘先生，他那樣的學者在中國任何時代更迭之際都大有其人。中國讀書人在歷史的關鍵時期，更多地扮演了解釋歷史的角色，而不是創造；即使有些思想的開創，也缺乏行動的心力。而劉邦、朱元彰、毛澤東等人，則能果敢地和過去道別，并以堅强的意志和遠見推動歷史的前進。劉邦攻打匈奴失敗，立即嫁去公主，漢匈和親，爲最終的崛起創造了可能，并爲確立中國在東方的千年統治地位保留了機會；如果不是劉邦這樣一個“小流氓”，而是大學者當皇帝，那麼他放得下知識分子的面子而把公主嫁給別人嗎？對毛澤東和對手的巨大實力差距，哪個書生能無懼地面對并取勝？如果余教授不幸生活在秦始皇或毛澤東時期的中國，很可能也是被“坑”或被“反”的對象，因您看不到朝代開拓者的力量之所在，認識不到知識分子自身之不足。

當然，今天的中國在很多方面都已經更加成熟，重新啓動由秦始皇終結的“百家爭鳴”的時機也許已經來臨，政權主要關注于人民生存的時代已經過去，而應更多留意國家全面發展的機會。一個政權只强調生存權，而忽略人權更廣泛的內涵，那麼，人的價值和動物有何區別？法國啓蒙運動的價值在于賦予了人們自由、平等、天賦人權、主權在民思想等普世價值的廣泛認知，同時也强化了巴黎成爲歐洲文明的中心和世界主要的文化之都。雖然法國自啓蒙運動以來歷經興衰，在歐洲政治版圖上的地位也歷經升降，但巴黎的文化中心地位始終得以維持；直到今天，法國人民仍從中受惠。這本身也說明，精神文明具有比物質文明更强大、更持久的生命力。

中國自身的歷史是個更好的例子。幾千年來的分合興衰，并沒有阻斷中華文明的傳承和發展。相反，正是中國優秀文化的强

大功能和生命力，才使得中華民族從多次的分裂和衰敗中成功崛起。所有這些都說明，文化的興盛是一個民族或國家得以存在和發展的最根本性的元氣所在；而物質文明的繁榮則有階段性和暫時性的特點。

當然，文明的進步與專制、文字獄等是相互抵觸的。文明足够强大，必然會瓦解專制；而專制的存在，必然阻礙文化的繁榮。當中國人解决了基本的生活需要之後，建立一個繽紛多彩的文化中國，就成了執政黨和文化界義不容辭的新任務。而中國知識分子自身修養的提高與否，將根本上决定中國文化復興的走向和成敗。這是“本”之所在，而政治力量的介入也許會有所幫助，但始終是“末”。到中國大學的人文科學系、藝術院校，看一下那兒的一些年輕學人的頹廢及物質化的精神面貌以及過去二十年中國學術界彌漫的歪風邪氣，似乎表明，中國知識分子離“成熟”和“高尚”還差得遠呢。一些學子們甚至連社會的平均道德水平都達不到。中國藝術家和作家的作品和作爲公衆人物的形象，不把社會帶向混亂和頹廢已經是萬幸。

二、知識分子的改造



花开三月回山来（宣传画，大学生下乡）

知識分子無疑令毛失望，“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與生産勞動相結合”，是毛澤東改造知識分子、教育青年人的重要嘗試。

中國知識文人輕視勞動，遠離民衆生活的惡習是頗有歷史

的；毛澤東試圖讓他們放下高貴的腰板到生產第一綫接受鍛煉。今天看來，這種改造知識分子的方法實在有些粗糙。學外語的沒必要在農村生活五年，學物理的不必要知道如何種田。但不能因此而否定“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政策包含的積極內容。

中國知識分子脫離實際、遠離民衆的毛病至今幷沒有完全扭轉。“六 · 四”前，如果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能深入基層瞭解一下工人農民的想法，他們就能知道他們理想中的民主在中國到底有多大的市場。很遺憾，如果某教授到基層去一定是指導工作，而非學習。看一下過去二十年中國文藝工作者的作品、媒體的媚俗化、社會學家政治家對底層人民生活的漠視和無知，也可看出毛澤東改造知識分子的合理動機。

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的學者們多瞭解社會尤其必要，否則必將對國家禍患無窮；因他們中不少人將對國家的政策制定産生影響。筆者自大學一年級起，即對政治等國家發展事務産生濃厚的興趣，幷經常利用節假日自覺進行多層面的社會考察，幷盡可能利用課餘時間博覽群書，在廣泛的專業領域充實自己，提高對社會的認識分析能力。在多個理工科、社科、文學等領域都有了一定知識積累，爲更好適應社會和認識社會提供了知識儲備。然而，社會科學方面的學子們，又有幾人能主動自覺地做到這一點?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政策及毛澤東教育思想值得教育界深入地研究和借鑒。這種教育和生産勞動相結合的理論思路，可以進一步完善，但不應該簡單否定。對于中國這樣一個極爲複雜的大國來說，沒有對社會的深刻研究和生活體會，要正確地把握中國的國情是不可能的，也自然影響到國家政策制定的科學性。

四九年後，中國教育體系受兩千年來傳統教育思想的影響，



重知識傳授、重書本知識、重師道尊嚴；而受蘇聯模式和國家工業化意識的影響，教育結構上存在著重理工，輕文科的傾向。學制長、課業重的現象已相當嚴重。對于這種傳統教育體系的第一批判者就是毛澤東。在 1964 年的春節座談會上，他尖銳指出：“現在的考試辦法是用來對付敵人的辦法”、“還是考八股文章的辦法”、“這種做法摧殘青年、摧殘人才，我很不贊成，要完全改變”。毛澤東對傳統教育體系所進行的多次“革命”，有許多左的錯誤和有違教育規律的簡單做法，但其中包涵的帶有革命性的精髓是不應被簡單拋弃的，值得中國教育界認真地總結和繼承。

實際上，只要看一眼現在小學生背上那沉重的書包即可發現，今天的教育現實已遠比毛澤東所聲討的五六十年代教育狀況嚴峻殘酷得多；教育部門已經注意到現今應試教育體系的巨大危害，幷重新評估“文革”期間基礎教育的閃光點。

作者讀小學時正直“文革”後半期（1972 年），學校要求學生每周至少參加集體義務勞動一天，放學後按要求揀糞、割草、采集中藥材。這些勞動幷沒影響基礎課的學習，却對學生的品質進行了塑造。中國某著名演員形象地稱：“‘文革’讓我們少學了很多沒用的東西”。而今天的學生除了考試，再無其它。甚至連青少年時期應該具備的一份基于愛國主義的理想和對未來人生的美好憧憬，也在家庭、社會及教育失敗的影響下而越來越庸俗化；孩子們的那份純真已受到社會大環境的污染而沒有得到學校教育體系的有效呵護。

從改革開放後中國知識分子的表現，尤其是知識分子集中的大學和科研院所內的不良氣氛，似乎在提醒著人們，中國知識分

子的自我改造和完善還有太長的路要走；而毛澤東不過是在用教鞭敲打讀書人的腦袋時，用力稍微大了些，且敲了一些不該敲的人。但不能因爲毛澤東對知識分子改造中的偏差，就否定知識分子身上固有的毛病，和知識分子自身改造的必要性。

毛澤東去矣，但中國知識分子的自我改造和完善步伐不應該停止。當然，今天任何試圖用政治的手段促成這種改造都是荒唐的，中共中央高層也沒有這樣的道德力量來推動知識分子的改造，那麼，就只好有賴于知識分子的自覺了。

（隨想：自中蘇關係惡化後，核戰爭和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陰影在毛澤東頭腦中一直盤旋。“保存骨幹力量”是否在“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動機中扮演一定角色？很顯然，如果中國的知識階層全集中在城市，一旦受到核武器攻擊，中國最後生存下來的都是受教育程度低的山區農民，那麼能領導和組織起這些農民的力量就不存在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可能是一種人才上的“三綫”戰略。當然，筆者的這一隨想沒有直接證據，毛澤東也不可能將他全部的思路表達出來。“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不僅是部分動機，也是個冠冕堂皇的理由）



三、再探“文革”

如果說反右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針對知識階層和城市青年的話，那麼“文化大革命”則可能是毛澤東試圖從文化上對整個民族的一次重塑，儘管它出現不少的偏

差。而“破四舊”則作爲“文革”期間的一項主要行動貫穿始終。

“文革”的起因較複雜。擔心出現“中國的赫魯曉夫”，“文革”前有所抬頭的幹部搞特權現象令毛擔心資産階級可能在黨內出現（現在已沒有人懷疑這一點。在中國共産黨的原來或現有體制下，沒有政治運動和輿論的推動，要避免腐敗是不可能的。止水必然積污）。當時嚴峻的國際形勢也使得毛澤東對內對外都保持高度的警惕，對內追求認識上的統一和革命隊伍的純潔。“六·四”後重新回憶毛的一些講話，發現他對西方要在共産黨第三代（赫魯曉夫即屬蘇共第三代領導人）實現“和平演變”有相當高的警惕。這些有可能在發動“文革”方面發揮了一定作用。1967年2月，毛澤東接見阿爾巴尼亞書記處書記希斯尼·卡博時，談到“文革”的意圖：“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鬥爭，工廠的鬥爭，文化界的鬥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决問題，因爲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一次廣大群衆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看這氣魄和自信，天下執政黨和政治家誰堪一比？毛澤東政治人生的最大特點就是相信群衆，依賴群衆。對黨內外始終保持高度警惕，屬于最具憂患意識的政治家），“文化大革命是唯一能解决問題的一種形式”。

有些學者認爲，毛澤東過分誇大人的主觀能動性的作用。在“大躍進”失敗後，他試圖尋找其它途徑加速中國的發展。尤其是，49年建國後國家一直都籠罩在戰爭的陰影下，難有發展經濟的和平時期。因此，毛澤東試圖通過純潔人的精神以最大限度地調動人的積極性。

毛對自己民族的落後和失望可能是另一重要因素。在延安時，他曾針對自己的成就戲稱“山中無老虎，猴子稱霸王”。建國後，代表中華民族最優秀群體的知識分子又令他非常失望，從

他對秦始皇焚書坑儒的理解和同情即可看出毛對知識分子的痛苦感受；農民和城市底層人民的純樸和愚昧令他愛恨交加。民族覺醒和崛起，并將中華民族發展成爲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肯定是他最大的願望。從他上面的談話中可以看出他對發動人民思想“革命化”改造的强烈願望。

“破四舊”（伴隨“文革”開始的，以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爲號召的一場文化運動）在“文革”開始後即迅速展開，對人民進行精神文化改造的企圖非常明顯，也具有强烈的文化革命的色彩。筆者一直懷疑“文化大革命”的名字由此而來。

“破四舊”運動從動機上來說無疑是積極的，但在操作上沒有認真規劃，放任“紅衛兵”的打砸搶，對私人收藏的文物和一些文化古迹造成了一定的損失，是令人痛心的。就連筆者孩童時玩的一對小銅鑼也被“革委會”當作舊文化沒收，至今下落不明。

但“破四舊”的積極意義是，它確實推動了廣大人民群衆從一些極爲落後的風俗傳統和迷信泛濫的精神枷鎖中解脫出來，表現了其革命性的一面。毛澤東來自社會的底層，他非常瞭解底層人民的這種生活方式，他揮舞巨大的拳頭將一切舊風俗、舊文化打碎，將人民從落後和愚昧中解放出來。

比較一下印度社會中的種姓制度更能說明問題。雖然憲法已明確否定了它，但至今仍深植于印度人的思維和生活之中。不少印度學者認爲，毛給中國的發展打下了一個太好的社會基礎。而建國之初，中國和印度有很多相似之處，如地方勢力、宗教問題、語言、農民問題、城市貧民等。但毛澤東用暴力和政治的手段，打碎了一切思想、地域和政治上的籬笆，不能不說是對中國的一個偉大貢獻；雖然暴力的使用難免會導致血泪和個別的偏差，但

毛主席语录

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在首都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的讲话

却爲後人的歡笑打下了基礎。

因此，從“文革”“破四舊”對中國底層勞動人民生活和觀念的影響來看，說它是完全失敗的幷不客觀。（關于“破四舊”及毛澤東對中國人觀念的改造，請參閱第八章第一節）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燦爛的文化中幷非沒有污點．中庸思想的泛濫，服從和忍耐意識的普及，雖然爲國家保持長期的穩定提供了文化保證，但其負面影響也是不能回避的。中國底層人民的苦難，從一定意義上講與此民族特性密不可分，一個貪官可輕而易舉地對幾百乃至上千的百姓進行盤剝而不會受到强有力的反擊，就是一代表性的例證。這一民族特性的一個直接後果是，人們捍衛社會正義的懦弱，和對醜惡的妥協。這種國民性即使到了社會主義時代，人民可以當家作主的時候，仍然保留著這份積累千年的“劣根性”。使得公民意識在中國人的思維中始終難以居于較高的位置。鄒容在《革命軍》中更直接地稱這種超級服從和忍耐的國民性爲“奴隸的根性”。魯迅當年在日本學醫的時候，因從教學電影中看到中國人的麻木而弃醫從文；至今還不時發生一些流氓强盜公開作惡，百人圍觀而無動于衷等，都體現了缺乏組織的中國民衆性格的極端懦弱。這種國民的特性在 49 年後幷沒有根本的改變。

毛澤東來自于中國社會的底層，有著對中國民衆的瞭解和對底層人民的深切同情，對中國人民的懦弱和服從性格進行革命，是否在發動“文革”動機中扮演一定角色呢？毛澤東的“造反”運動，幷不僅僅是砸爛過去，更重要的是塑造未來；他要打碎由儒家思想和漫長集權統治下所塑造的中國人的服從和忍耐性格，

摧毀舊的文化習俗和社會秩序，建立一個人民真正思想解放和當家作主的新秩序。當看到朝氣蓬勃的學生們勇敢造反，人民砸爛泥像石佛，打倒高官顯貴而昂首挺胸走向街頭，他老人家是否曾爲民族的新生而感到欣慰?

三年經濟困難結束及經濟逐漸恢復之後，許多不良現象逐漸出現，脫離群衆、官僚主義、貪污腐化、特權現象抬頭，使得毛澤東看到中國每 7、8 年就需要一次政治運動的必要性；尤其考慮到他取消軍銜制的動機，似乎組成了毛澤東思維中濃烈的反精英主義和平民化色彩（看一下當今城市權貴及富有階級的腐朽，就該對毛澤東的平民化思想有更深入的瞭解。我們現在看到的，毛澤東早就預料到了，這是人性發展的必然）。1963 年，在毛澤東推動下開始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及“四清”（在農村）和“五反”（在城市）運動。這些運動的效果，毛澤東幷不滿意，毛澤東對資産階級産生和復辟的擔憂一直存在。就拿當時一些人的不正常高收入舉例說明:

“文革”爆發前，一些特殊利益集團的收入高得很不正常，生活方式與時代很不協調，他們包括不少原私企管理層、文藝界人士以及昔日資本家手下有不合理的保留工資工作人員。當時一個身經百戰的師長的工資才 170 元左右，毛澤東的工資爲三百多元，請看當時一些人的收入：江蘇省副省長劉國鈞（原是常州市私營大成紡織品公司總經理）月工資 1,000 元，省人委還給車馬費 200 元。上海萬里造漆廠一般職員張志堅，月工資 538 元。上海靜安區房産公司 24 級的辦事員楊格（原在外商單位工作）工資拿 400 元，等于他應得標準工資的七倍多。那些參與私人企業公私合營改造的中共幹部也被資本家以高薪水腐蝕。

文藝界高報酬現象尤其普遍和高的離譜。

著名藝術家周信芳月工資 1760 元，高出國家規定的文藝人員一級工資標準四倍多；他錄音三小時，得酬金 3000 元。京劇演員馬連良，月工資 1366 元。當時熱演的戲劇《千萬不要忘記》作者叢深，成書後得稿費 7,000 元，這位提醒人們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作者，每天翻報紙看哪個單位演出了他的作品，就去信催版稅，他因此得到幾萬元的高額收入。文藝界普遍的高收入，不是偶然的，而是得到政府的認可和支持，陸定一和周揚領導的中宣部和文化部在這方面發揮了極其惡劣的領導作用。1964 年 12 月文化部發給幾個製片廠的《關于故事片各類稿酬的辦法（草案）》中規定：名作家的稿費，每千字爲 10－15 元，青年作家 6－8 元，（詩每二十行算一千字）；電影劇本的稿費：長故事片 2,000－6,000 元；短故事片 1,000－3,000 元。音樂作曲：長故事片 300－800 元；短故事片 150－400 元。歌詞每首 50－100 元。導演成功每個影片，酬金 500－1,500 元（長故事片）或 300－700 元（短故事片）。

這些高收入者不僅有高的離譜的收入，還擁有不少政治特權，在各級人大、政協、青聯等都有他們的身影。聯想到當時一個剛畢業大學生月薪只有 40 多元，中專生（在當時屬于杰出人才）20 多元，以及當時多少工人和科學家完全不計個人酬勞在大西北、在偏遠三綫等地忘我工作，文化部放任文化界如此高收入，是對社會主義價值觀的挑戰和踐踏，在經濟收入上埋下了資産階級復辟的種子。

這些拿高工資的人不少保留了在舊中國養成的臭毛病，追求高消費，與當時全國人民艱苦奮鬥的精神極不協調。甚至在三年困難時期，他們照樣毫不掩飾地享受奢侈的生活，造成很壞的社會影響。天津市京劇團演員周嘯天，月工資 750 元，兩個老婆，



養兩隻狗一隻猫，經濟困難時期都是喂細糧、猪肝、鶏蛋、牛奶，還帶狗去理髮館剪毛。[1]

可以說，“文革”前的“高薪制”中，大部分人實際上是在剝削他人。這些人奢侈的生活方式對那些追求思想進步和奉獻精神的年輕人帶來思想的腐蝕。那些資本家們在平反後隻字不提他們在舉國挨餓的時候毫不掩飾的奢華生活。在毛後時代檢討“文革”錯誤時，陸、周都變成沒有任何政治缺點的受害者，而所有的過錯全是毛澤東的（陸、周搞出上述《關于故事片各類稿酬的辦法（草案）》，他們彙報的上司是劉少奇。沒有劉的批准，這樣的政策文件不可能出爐，而毛澤東是不可能批准這樣的文件的。因這屬于具體行政事務，是一綫領導集體的職責範圍，劉少奇難脫干係）。後來文藝界成爲歇斯底里反毛的急先鋒也就不足爲怪了。如果沒有“文革”，這些人復辟資本主義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中國可能再次淪爲特權階層的歡樂場，而多數人的利益將不可避免地受到傷害。加上當時高幹階層特權行爲的抬頭，毛澤東對資產階級復辟的擔心，幷非空穴來風。[2]

如果說建立新中國，使毛澤東得以對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進行改造，山河得以重整，那麼一系列政治運動，尤其是“文革”則是他對這個民族精神文化進行改造的嘗試。也許這就是爲

[1]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對于“高薪階層”的調查報告》（1960 年代）。

[2]第二版加注：毛澤東所擔心和極力避免的，在今天的中國真的發生了，而且人們已經習以爲常。今天文藝界所享受的高的離譜的收入和天量財富，對青年人是誤導，對努力打拼的中老年人是諷刺。這些高收入的文藝界人士，同樣已經遍布當今的人大和政協了（我真不明白這些名演員和歌星到底對中國社會有多少瞭解，能提出多少高素質提案）。“文革”力求否定的已經捲土重來，到底是“文革”不該否定他們？還是我們這個時代錯了？還是“文革”有它的合理性？

什麼打敗蔣介石和發動“文革”是他至死都感到得意的兩件事。

那些認爲毛是爲了打擊异己而發動“文革”的想法，顯然是淺薄的。以他在黨、政、軍和人民中無可爭辯的威望，打倒劉少奇用不著發動新疆的紅衛兵，更不至于讓他將此列爲最自豪的成就之一。更何況，拆除觀音廟顯然與劉少奇是否被打倒沒有任何的聯繫。而劉少奇被打倒後“文革”并沒有馬上結束，也可證明打倒劉少奇并不是發動“文革”的核心目的或唯一目的。如果說權力鬥爭可能是起因之一的話，那麼，這也是一個并不發揮决定作用的內容。

中國在遭受以蘇聯爲核心的社會主義陣營排擠的情况下，“文革”則極大地吸引了西方國家的左派組織和青年學生，觸動了一些知識分子的精神內核，中國幾乎成了國際共運的新中心。尤其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青年學者中，毛澤東及其“文革”已成爲他們追逐和學習的新內容。在美國和歐洲的大學裏，不少青年學人被“文革”所吸引。在此抄錄一段美國文學理論家和文化批評家弗雷德裏克·杰姆遜（Fredric Jameson）對“文革”的評論，它從一個側面展示了西方學者對“文革”的看法：“毛的文化政治體制，提供了一種新型政治允諾……它從傳統的階級範疇中解脫出來”。杰姆遜將毛主義看成是“一種用來打破古老的卑微順從習慣的戰略，這種習慣在人類歷史上一切勞動者和被剝削階級那裏業已內化爲一種附加的本性”[11]。

不論今天對昨天的“左”派如何看待，不可否定的是，這些左派以青年和知識分子爲主，他們聰明而對社會有理想和抱負。尤其是當那些歐、美、日本等發達國家的知識分子都在追隨毛


日本年輕人響應文化大革命

澤東及其“文革”時，不能簡單地認爲這些人都是幼稚而被矇騙的，相反，今人更多地思考內容應該是：毛澤東和“文革”到底是哪些內容吸引了全世界的青年和知識分子，這些內容對改造我們社會的弊端是否有參考價值，尤其是，中國當時作爲一個落後的發展中國家，而又是長期被西方社會看不起的“落後文化”環境下，毛澤東和“文革”必然有極其突出的魅力，才可能打動這些一向自我中心主義的西方社會的才俊們。

不可否認，毛澤東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政治家，嘗試賦予人民最大的權力，同時，徹底改變中國民族性格中的負面內容，而中國的歷代統治者則極力維護和利用中國人的服從和懦弱性格。

在 20 世紀，對中國國民性格最深入瞭解，幷一生致力于國民性格改造的代表人物，在文化界當屬魯迅，而在政界則首推毛澤東。他們的强烈個性和執著决定了，這兩個人也許很難共事（魯迅如活到新中國時期，很可能被打成右派），但都在自己能够發揮力量的人生階段，最大限度地去影響了中國民衆。當然，魯迅作爲一個文人，力量畢竟是有限的，他也只能在知識界和讀書人中傳播他的理想，但只有毛澤東這種可以最大限度調動一切社會力量的政治家，才真正能够對中國社會各階層民衆思想的革命化改造，發揮有效的作用。

看一下“文革”之後二十年共産黨幹部的腐化、人們思想的混亂、“六 · 四”對中共的嚴峻挑戰，也許能讓後人對“文革”有更全面的認識。江澤民在蘇聯解體後不久的內部會議上曾說：如果重新回頭看“文革”，將得出（與《决議》）不同的結論。

毛後時代有人假設：如果毛澤東在“文革”之前下臺，中國就會避免這一悲劇。這個假設經不起推敲。順便在此作個假想：



如果按照當代西方國家所慣用的民主選舉的方式進行投票，毛澤東是否會落選呢？以他在歷史上的巨大貢獻和在百姓中的威望，中國人民知恩圖報的民族特性，毛本人的政治智慧和煽動能力，筆者實在想像不出，當時的中央高層領袖中誰會是他的對手。要想推翻毛，唯一的手段就是“陰謀”。

假如毛澤東在“文革”前被强制奪權的話，中國將面臨什麼樣的危機和機遇呢？對于機遇，肯定不會有“文革”的發動，但更嚴重的危機將會接踵而來，甚至有可能徹底斷送中共的領導，乃至整個國家來之不易的統一和前途。首先，毛澤東畢竟曾領導中國共産黨、軍隊和人民進行了幾十年的革命，在普通黨員、全體解放軍指戰員（極個別高層軍官例外）和人民的心目中，毛的地位是不可取代的，除非通過輿論否定整個中共的革命歷史。“文革”前毛澤東的地位和影響遠比第三次反“圍剿”結束後的情形强的多。毛澤東被推翻（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中共的主要領導人多具有軍旅背景，也自然帶有鐵血風格，即：要麽被打倒，要麽繼續掌握領導權，幷不存在目前政治上的灰色地帶），必然會引起毛澤東和社會的强烈反彈，幷將輕易導致一場新的內戰，後果將不堪設想。因此，如果當時的高層領導人真的在策劃一場推翻毛澤東的陰謀的話，那無意將是一個極爲輕率的驚天冒險。

其次，即使考慮到“文革”期間，中國經歷的一系列重大外交事件，沒有毛澤東的領導，中國國家利益的維護簡直不可想像（參考“毛澤東與個人崇拜”一章第二節）。在極爲複雜的國際環境下，高超的外交手段是彌補國力不足的主要途徑；除毛澤東，無人具有那種在複雜艱困的國際環境下，駕禦全域，縱橫捭闔，

謀取最大國家利益的能力。

因此，如果歷史重新演繹，那麽，在毛澤東發動“文革”和毛澤東被推翻這二者之間作個取捨，您會作何抉擇呢？

“文革”初期的發展超越了毛的預料和控制。雖然他反武鬥、倡文鬥，但武鬥之風在“文革”爆發前兩年很嚴重，甚至造成人員傷亡。荒唐行爲更超出他的預料。這成爲“文革”備受詬病的方面之一。毛澤東作爲“文革”的發動者，對此負有領導責任，但真正的原因可能還需要更多的資料來支持。考慮到第二代時期的輿論傾向，根據已有的公開資料來判斷武鬥興起的原因可能出現偏差，所以，在論據不充分情況下，本書不在此探討武鬥的起因。只是論述一下毛澤東對此的態度。請看毛澤東關于武鬥問題寫給周恩來的親筆信：

給周總理的親筆信[1]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恩來同志：

最近，不少來京革命師生和革命群衆來信問我，給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臉、游街是否算武鬥？我認爲：這種作法應該算是武鬥的一種形式。這種作法不好。這種作法達不到教育人民的目的。這裏我强調一下，在鬥爭中一定要堅持文鬥，不用武鬥，因爲武鬥只能觸及人的身體，不能觸及人的靈魂。只有堅持文鬥，

[1]該信原刊于 1968 年武漢出版的《毛澤東思想萬歲》，一說此信寫于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此處抄自馬克思主義文庫：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

不用武鬥，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才能鬥出水平來，才能真正達到教育人民的目的。應該分析，武鬥絕大多數是少數別有用心的資產階級反動分子挑動起來的，他們有意破壞黨的政策，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降低党的威信。凡是動手打人的，應該依法處之。

請轉告來京革命師生和革命群衆。

毛澤東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毛澤東的這封信已經非常清楚表明了他的態度，甚至將搞武鬥的人上升到“資產階級反動分子”的高度，要求依法處理。由此可以判斷，武鬥絕對不是毛澤東授意或能够接受的，相反，這是他堅决反對的行爲。後來人們詬病“文革”時將武鬥之責任推到毛澤東身上，甚至用各種方式暗示毛澤東是允許武鬥的，使得歷史真相被淹沒。

“文革”也造就了不少冤假錯案。但受害人數却頗有爭論。西方一些人稱蒙冤人數爲二、三千萬之衆，也有幾百萬之說，以此證明毛澤東及其政黨的殘暴。但據作者瞭解，這些數據明顯被誇大了。“文革”對廣大農村和小城市幷沒有造成太大衝擊。以作者家鄉及周邊地區來說，田照種、工照作、學照上，只是政治學習在學校爲每周一次，在生産隊則最多每月一次。村莊和縣城的墻上或樹上經常貼些標語和口號。偶爾有兩個被抓的小偷在街上游行。對地主富農的批鬥大會也僅限于幾個老農的“憶苦思甜”，絕不允許身體傷害。家鄉爲百萬人口的大縣，很少聽說誰受了冤假錯案。作者後來在上海、哈爾濱、北京求學，前後相處的幾十位來自大城市的同學，無一人的親屬蒙冤。如果按當時大

小城市共有五千萬個家庭考慮的話，三千萬人蒙冤顯然是不可能的。中國政府公布的“60 萬人蒙受冤假錯案”應是接近客觀事實的。第二代領導人在極力批判“四人幫”時，甚至捏造謠言予以抹黑，根本沒有壓低數據掩蓋“文革”醜陋的動機。

當然，即便哪怕只有一個人蒙受不白之冤，也是社會的悲哀。科學和文化藝術等方面遭受的干擾和破壞，是一筆令人痛心的巨大損失。尤其當聯想到“文革”期間發生的諸如遇羅克、張志新、老舍、吳晗以及我們身邊的老師等的不幸遭遇，要以平靜的心態來看待“文革”和毛澤東時代，幷非易事。但從對一個時代的學術研究和宏觀把握的角度來講，雖不能忽略這些不幸，但又必須能適當超越這些不幸。

但中國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又有多少人因沒有權勢或沒錢送禮而蒙受不白之冤呢？所不同的是，毛澤東時代的冤假錯案是建立在不同政治理念基礎上的，且蒙冤的大多數是領導幹部和知識分子；而過去三十多年蒙受冤屈的人數更多，但多是無權、無勢的平民百姓。就政治道德而言，過去二十年幷不比“文革”高尚。但不能因此而否定整個改革開放。

第二章第五節中提到毛對“衛生部只爲城市大人先生們服務”的不滿，可以看出他對建國已十多年後仍然存在的社會不公的憤恨。隨著三年困難時期的結束，中國部分高層領導幹部及其家屬的特權思想和特權行爲，存在日益嚴重的趨勢。“糖衣炮彈”的威脅已經引起毛澤東的擔憂：即資産階級可能在黨內出現。今天看來，這種擔憂絕非杞人憂天，甚至更糟，因爲今日黨內出現的已不是什麽“資産階級”那麽簡單，更確切地講，是宗派主義、封建主義、官僚主義、資本主義、以及腐朽思想“五毒俱全”的

集大成者。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宣传画)

四、“文革”十年中國人在幹什麼?

要以該書有限的篇幅羅列這十年的時間跨度內中國所發生的一切是不可能的，之所以還要專節談論此事，只是希望强調：我們對“文革”十年的“一刀切”看法，存在對事實的嚴重扭曲。

提起這十年，在今人頭腦裏的印象不外乎：從不停息的階級鬥爭，沒完沒了的憶苦思甜，老幹部和不少知識分子被批鬥，人與人信任關係的破壞，文物被毀……，總而言之，那個時代的中國人沒人正經搞經濟，沒人搞科研，沒人好好辦教育，中國的發展乏善可陳。事實到底是這樣的嗎？或者說，這十年中國人到底在幹什麼?

由本書來特別談論這個不得不談的話題多少有點可悲，因爲過去這段歷史離我們今天太近，清楚瞭解這段歷史幷經歷過這段歲月的人不少才到中年。然而，又有誰去認真恢復它的本來面貌呢？不談歷史研究，也可不論對毛個人的評價，但如果不能對這段時期中國人的生活形態有個正確評判，後人將面對良心上的譴責，因爲我們完全抹殺了這十年當中我們的先輩、兄姐爲祖國富强所做的巨大犧牲和貢獻。

有關中國在這十年之中的經濟、文教、衛生、軍事等方面的成就，在前面一些章節中已有提及，在此不再重複。就“文革”對中國正常發展的巨大破壞來看, 1966 年後半年至 1968 年上半年



的一年多的時間內，非常嚴重；各種後來倍受指責的荒唐事，也主要發生在這段時間。即使從經濟發展數據上也可看出這兩年經濟各方面的急劇下滑。

但是，自 1968 年，“文革”一些極大破壞正常經濟和社會安定的激烈行爲受到制約，經濟發展也很快有了恢復性的快速增長。“文革”期間的階級鬥爭教育，雖然有一些負面作用，但它是一把雙刃劍，在更大程度也發揮了統一人民思想，激勵作社會主義新人的積極性，并直接促進了各項事業的發展。請看以下“文革”期間兩個“五年計劃”的執行情況：

“三五”期間（1966 年至 1970 年）：國民經濟年平均增長 9.95%，工業年增長 11.7%，農業爲 3.9%。

“四五”期間（1970 年至 1975 年）：基本任務是：狠抓備戰，集中力量建設三綫戰略後方，建立不同水平、各有特色、各自爲戰、大力協調的經濟協作區（作者按：出于備戰考慮。原子彈摧毀一個地區後，其它地區工業生產不會因産業門類配套問題而停頓），初步建成中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由于 1969 年中蘇關係的急劇惡化，使得這五年中國拿出大量的資源進行備戰，雖然影響了其它門類的發展，但完整、獨立的國民經濟體系基本建成。這五年經濟增長速度爲年均 7.76%，工業爲 9.1%，農業爲 4.0%。

這兩個“五年計劃”期間的經濟增長速度高于或接近“五五”（7.64%）和“七五”（7.9%）期間。從“三五”執行情況來看，雖然其中有兩年受到“文革”初期政治運動的巨大干擾，但後來的恢復速度也异常的快，整個五年計劃的年均經濟增長速度相當高（中國規模龐大的社隊企業和第一章所談的“人本經濟”

創造財富，根本不可能在統計資料上反映出來，因此，“文革”時期的經濟發展數據只會被低估，而不會被高估）。國民生產總值在這十年翻了一番。

不是說“文革”期間大家都在搞運動嗎，怎麼會有這樣的增長速度？是否搞錯了？如果說有錯的話，那是當今人們對這十年期間大多數人民敬業精神的完全忽略。請看一下 1969 年 9 月，首鋼向武鋼、包鋼、太鋼、重鋼提出的開展革命競賽的建議，競賽倡議主要有：一、深入持久地開展大批判，促進“鬥、批、改”各項任務的完成；二、所有幹部都要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做到定工、定時、定量、定質；三、根據國家需要和本單位情況，把一切機器都轉動起來，把所有礦山都開起來，努力完成和超額完成國家計劃，力求產品都是高質量的；四、逐步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堅持合理的規章制度，嚴格遵守勞動紀律和勞動制度，保證安全生產，最大限度地保證一切設備不受損失，按照不同的條件和各廠的可能性，最大限度地節約燃料、電力和原材料；五、大力開展技術革新運動，創造優异的成績，爲祖國爭光。

以上競賽倡議中，除第一條有明顯的“文革”色彩，後面的具體行動方面和改革開放後有什麼區別呢？！如果有的話，那是當時領導幹部的以身作則和中國產業工人的高度主人翁精神。今天人們對“文革”期間各項事業的發展視而不見，是對客觀歷史的無知和對中國億萬人民無私奉獻的根本否認。

下面再列舉一下“文革”時期，中國各方面發展的具體事例，當然，在這裏要列舉所有的成就是不可能的：

1966 年 10 月，第一次進行了導彈核武器的成功實驗。

1966 年 10 月 17 日，第一座合成苯車間在上海建成。

1966 年 12 月，中國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結晶牛胰島素這

種有生命活力的蛋白質。這是生命科學史上的里程碑意義的成果，但因是集體成果而無法獲得諾貝爾獎。

1967 年 1 月，中科院完全利用國產組件，研製成功最新型半導體大型通用數字電腦。

1967 年 5 月，氫彈爆炸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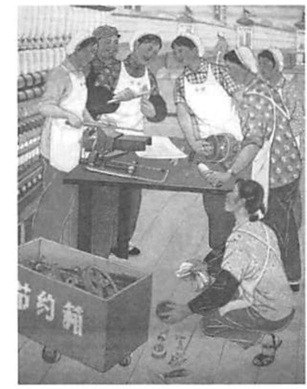
1968 年 1 月，第一艘萬噸輪“東風”輪建成，采用國產 8820 馬力增壓發動機。

1968 年 12 月，南京長江大橋建成通車。

1969 年 7 月，“紅旗渠”建成。

1969 年，國家決定加速“二汽”建設。

1969 年 9 月，第一台世界水平的 12.5 萬千瓦雙水內冷汽輪發電機組研製成功。



革新创将（宣传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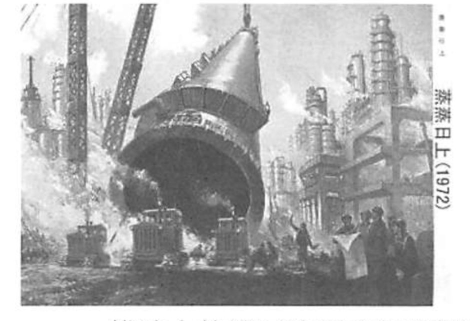
1969 年 9 月，第一台礦用重型 32 噸載重汽車製造成功。

1969 年 12 月，第一套全自動長途電話設備投入運營。

1970 年 4 月，人造衛星發射成功。同年“運十”飛機立項。[1]

---

[1]據一些資料顯示：運十因是“四人幫”支持搞的，後來一個大人物竟然將其污蔑爲“王洪文那小子在上海搞了一個波音七〇八”，有些領導人提不起發展的興趣。而民航局、航空部等著發財的高層則以“專業”眼光拒絕使用國產飛機，財政部拒絕給予三千萬元撥款等于宣判了運十的死刑。首貪爲八十年代收取麥道公司兩千萬美元賄賂的民航局長沈圖，被捕後揚言要揭發有關人員而被鄧小平所放，移民加拿大延續著富足而肮髒的人生，後來回國養老，居然沒人再追究，好像從沒發生過，得以頤養天年，死于北京（真是奇葩政治時代）。鄧小平以此案終結毛澤東的廉政時代，開啓中國高官貪污賣國大門。運十于 1980 年試飛成功，標志著中國繼美、蘇、歐之後成爲世界第四個擁有百噸級大型幹綫飛機研發能力的國家，研製費用僅六億元，略高于當時一架波音 747 的價錢。如果繼續進行十多年的貨運飛行測試和完善，繼波音和空中巴士之後的世界第三大飛機製造公司已經在中國崛起。可以說，運十的夭折是美國公司和中國漢奸聯手的結果。1985 年麥道對《時代》周刊表示：“因爲上海搞過‘運十’，我們才和上海合作，如果不打倒‘運十’，美國飛機就不好打進中國。”後來組裝 MD-90，（接下页下）


蒸蒸日上(1972)

1970 年，開發遼河油田。

1970 年 5 月，河南、安徽、江蘇三省的大型水利工程竣工。標志著規模浩大的淮河治理工程取得决定性的成果。

1970 年 6 月，治理大清河工程提前完成。

1970 年 7 月，成昆鐵路建成。

1970 年 12 月，中國最大的金雅城鉬業生産基地建成。

1970 年 12 月，開始建設葛洲壩水利樞紐工程。

1971 年 1 月，改造都江堰工程完工。

1971 年 6 月，第一艘兩萬噸的“長風”號貨輪下水。

1972 年 1 月，6000 馬力液壓傳動內燃機車製成。

1972 年 8 月，武鋼 1 米 7 軋機引進。

1972 年 10 月，902 公里的湘黔鐵路建成，溝通西南三省和京廣鐵路大動脉的聯繫。

（接上页下）國家付出 40 架的技術轉讓費，結果只生産了兩架，航空公司拒絕采用；這是波音和中國航空公司高層再次聯手的結果。後來和空中巴士 100 座飛機合作計劃，中國民航的官員宣稱不需要 100 座客機，可聯合研製告吹後中國某航空公司立即訂購空中巴士 100 座級的 A318。過去三十年，民航系統一再誤導否定國産飛機計劃，肥了不少貪官，但斷送了整個民族的利益。中國民航是外國在中國設立的最大、最成功的顛覆組織。念及運十和民用航空工業過去 20 年的坎坷命運，令人嘆息，更加懷念毛澤東時代那爲官清廉、人人講奉獻、國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時代。如果毛主席和周總理在世，以他老人家的脾氣，非把運十搞好不可；周總理一定會親自搭乘運十出國訪問，這一直是他的心願。自私的官員和短見的高層斷送了中國航空工業騰飛的契機。運十項目下馬導致研製隊伍的培養學費付之東流，30 年後國家上馬 ARJ21 和 CA919，雖然整個工業基礎已經大爲改善，國際合作更加便利，但運十所要經歷的每一步，ARJ21 和 CA919 一步都不能少，只是白白浪費了 30 年時間。只要看一下外國對中國技術封鎖最徹底的航天和軍用飛機領域在過去 30 年的成就及人才隊伍建設成果，就更能體會第二代中央的短見對民用飛機工業所造成的破壞。


工厂劳模

1973 年 9 月，大慶至秦皇島 1152 公里輸油管建成。

1973 年及以後兩年，和日、美公司簽訂 13 套大化肥項目，徹底改變中國農業用肥的結構，爲未來農業穩産高産打下基礎。

1974 年 5 月，大港油田建成。

1974 年 6 月，長城 203 臺式電腦研製成功。

1974 年 9 月，勝利油田建成。

1974 年，青銅峽水利樞紐建成。30 萬千瓦水輪發電機組製成。

1975 年 2 月，石景山發電廠高井電站應用電腦控制 10 萬千瓦熱電機組獲得成功。

1975 年 12 月，800 公里的焦枝鐵路建成。

1976 年 1 月，中國第一台原子鐘研製成功。

1976 年 1 月，秦皇島 7 萬噸貨輪碼頭建成。

1976 年 2 月，第一台激光手術刀研製成功。

1976 年 4 月, 自行設計製造施工的京滬杭通訊幹綫同軸電纜建成。

1976 年 5 月，海上石油平臺“渤海一號”誕生。

1976 年 5 月，賀蘭山煤炭工業基地建成。

1976 年 6 月，大連新港建成。

1976 年 8 月，中國第一艘 5 萬噸級油輪下水。

簡單羅列以上事例，至少已經證明：所謂“文革”十年沒人搞生産和科研的論調是多麼的不堪一辯。僅 1966 年至 1973 年底建成的大中型水電站就有 20 多座，小水電 5 萬座。這 10 年共建成 8 大鐵路幹綫，化肥施用量增長 3.1 倍，用電量增長 4.7 倍，雜交水稻開始推廣，建成多個大型能源基地和重工業基地，完整工業體系建成。僅軍工系統中的飛機項目就有殲 6 甲、殲 7I,II、殲 8,I、殲 12、殲教 6、轟教 6、水轟 5、轟 6 丁、强 5 乙,K,II、運 7,8,10,11、

直6、直701、延安2（直）、靶6、長虹1號等20多項（如此密集的新機型研製和改進，在世界航空工業史上是罕見的，考慮中國當時的基礎，尤其不可思議），以及新型常規潛艇和戰略核潛艇、洲際導彈、巨浪1潛射導彈、一箭多星、回收式衛星、多種戰術導彈、新型驅逐艦等也在這十年內完成或啓動研發。後來批判“十年動亂”時，犯了“把澡盆裏的孩子連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嚴重錯誤。除了“文革”剛開始的一年多，後來八年的經濟發展和科研，都取到巨大成就。後來的幾年裏，學校教育工作也發展很快。而中小城市受到“文革”運動的衝擊更是微乎其微。在“文革”冤枉少數人時，却使全國大多數人的思想得到革命化教育改造，極大地提高了他們的思想覺悟和勞動熱情，使得“廢寢忘食”地忘我工作，已不是什麼典型。

這段時期，內陸三綫企業的大發展帶來了內陸地區經濟發展的高速度，縮小了和發達地區的差距。而全民備戰期間修建的，遍布各中心城市的地下防空洞，能够容納大中城市總人口的60%，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民防工事。僅北京就有一個至今對外保密的地下城市，而哈爾濱在八十年代中期將位于市中心的地下防空洞改造成地下商業街，進入這個三層的地下社區，即可一窺中國民防設施建設的成就。這些防空洞雖然沒立即排上用場，但確保了中國是世界所有大國中抗核打擊能力最强的國家。當美國總統在核戰爭中登上滯空時間最多二十幾個小時“空軍一號”時，中國的軍事指揮系統和人民，已經轉移到更安全的龐大地下城市裏，確保了以後的中國具有最强的生存能力。很顯然，這是一筆可用上百年的財富。

當城市知識分子批判毛澤東的“文革”錯誤時，在廣大農民

中很難找到知音。實際上，“文革”十年，是中國基層教育事業爆炸式發展的十年，也是農村醫療衛生體系從無到有，再到發展壯大的時期，也是縣及公社衛生院大發展的時期，縣及社隊工廠也在這期間有了巨大的發展，爲後來鄉鎮企業的崛起作了必要的準備。而所有這些成就，使得占中國人口大多數的廣大農民和中小城市居民受益匪淺，也極大地提高了中國人口的整體文化和健康素質，對中國社會的進步意義是無論如何誇張也不算過分的。

當然，本書無意爲“文革”進行非分地辯護（也無意過分苛責，因爲它的影響將隨著時間推移而得到更清晰的認識），同樣反對對這十年歷史認識上的一葉障目。毛澤東對人民的教育和思想改造，極大地激勵了大陸人民的集體主義、愛國主義精神和高漲的勞動熱情，并直接推動了各項事業的發展。人民“抓革命”的目的是“促生産”。人民跳“忠字舞”、“早請示，晚彙報”，聽起來很荒唐（發生在“文革”開始的兩年），但這和當今各類宗教有多大區別嗎？毛澤東確實給人民提供了一種宗教般的信仰，使得人民在跳完幾分鐘的“忠字舞”和“早請示”之後，積極投身到國家建設中去，并激勵人們做出成績，否則，這“晚彙報”可就沒法彙報了。筆者讀書期間經常寫《决心書》和表“理想”，但這一點沒有影響到課業學習，却對少年時人生觀的塑造，發揮了正面的作用。當今日的人們批判“紅衛兵”（中小城市和農村的紅衛兵不但沒有幹多少壞事，實際上做了不少好事，他們中的大多數是品學兼優的學生）、“造反派”時，却忽略了另外一個遍布各行業的群體——勞動模範和技術革新幹將，還有學校裏的少先隊員。當批判“文革”初期的打、砸、搶時（主要發生在大城市），忽略了遍布各行業的各種形式的建設大會戰、勞動競賽和技術比武，極大地提高了中國産業工人的思想覺悟和技術

能力（像各行業產生的高級技工，如八級工）。“文革”十年的發展成就雖然不能歸功于“文革”本身（但“文革”期間通過“破四舊”而極大地解放了人民思想，人們的革命精神和奉獻精神空前高漲，不知是否算是“文革”的成果？），但完全忽略這十年社會各方面的輝煌成就，更是對歷史的不負責任和對先輩無私奉獻的褻瀆。簡單地以“十年動亂”予以概括是不客觀的。

五、毛劉之爭——林彪事件的預演[1]

在本書第一版出版時，筆者不認爲打倒劉少奇是“文革”導因。但過去幾年的研究，開始對這個觀點有所修正。

“三年經濟困難”一章已經對毛澤東栽培劉少奇爲接班人，幷給予大力支持做了闡述。幾百萬人餓死的慘劇，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主動檢討幷承擔責任的情況下，作爲一綫核心領導幷承擔主要責任的劉少奇幷沒有主動跟進承擔自己的一份責任，相反，劉在這次大會及以後多個場合，還動輒義正言辭，大有將責任轉嫁給毛澤東的意涵。後來劉少奇甚至對毛澤東講：人相食，你我都是要上書的。總之，劉少奇的語言永遠義正言辭（可能是鄧小平時代刻意爲之，以達到粉飾劉少奇，嫁禍毛澤東的目的，但效果往往相反），作爲扶持他作爲接班人幷主動讓權的毛澤東不僅得不到劉的感恩與尊重，而且還不得不替劉背黑鍋。在劉少

[1] 本節爲第二版新加內容。後面的原第一版各節的編號相應後延。

奇沒有主動承認錯誤情况下，也很難有人主動發難來逼迫劉下臺。

幾年的合作表明，劉少奇并不是一位合格的接班人，無論是能力（包括對國情的瞭解程度）、胸懷，還是勇于承擔的責任心，毛澤東已經意識到劉少奇的局限性。關于毛劉的分歧，各類論述文章很多，從對“大躍進”的看法，到 1964 年對“四清”運動的不同看法[1]，到農村“三自一包”等，毛劉的分歧越積越多。

作爲全黨已經形成共識的毛澤東的接班人，在劉少奇主導一綫領導權的幾年中，已經逐漸形成了以劉爲核心的當權派，毛澤東的讓權，并沒有換得尊重，甚至有被架空的風險。“大躍進”期間毛澤東在大饑荒蔓延時批評浮誇風的多次講話根本引不起重視，甚至發生中央媒體擅自删减或不報道毛澤東重要講話的事件。考察歷史不難發現，在封建皇權時代裏，皇上和太子的關係經常是很微妙的，處理不好就會成爲你死我活的關係，即便是骨肉親情也時有發生。毛劉之間構建的接班安排，是建立在共同的治國理念和信任基礎之上的。但當一系列合作中的矛盾産生，理念嚴重不合，這種接班人架構不僅面臨解體，而且雙方都可能因長期的理念不合而動搖對彼此的信任，那更糟糕的可能趨勢就是你死我活了。如果認爲劉少奇壓根就沒動過打倒毛澤東的算盤，那只能是浪漫主義者的幻想，而不是殘酷政治環境下的寫生手法。

---

[1] 關于“四清”運動的話題，是個大題目，與後來的“文革”興起及劉少奇命運有關聯，爲避免分散本書主題，本處不多談，請讀者自行搜索有關內容。劉少奇和王光美的“桃園經驗”不僅開闢了高層夫人參政的惡例，而且一些學者將其視爲劉少奇極左路綫實踐和“文革”的一次預演，很多極端手段被廣泛采用。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就是第二代領導人開始的非毛揚劉輿論方向下，决定了目前大多數網上的官媒文章和回憶錄都帶有明顯傾向性。本書即使想細談，也缺乏全面的資料支持，只有等中共解密有關檔案後才能有個更詳細的梳理。

1964 年發生的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在毛澤東住處豐澤園安裝竊聽器一事，就是個值得玩味的“戰前插曲”。

筆者最早知道與楊尚昆有關的竊聽器事件，是《北京日報》2007 年 6 月 19 日登載的由巴人撰寫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講述的是始于 1958 年 11 月由葉子龍和楊尚昆主導的秘密錄音，其目的是爲了更準確、更完全地保存黨中央會議和中央領導同志在會議上講話的歷史文獻資料。但後來毛澤東在 1959 年 11 月的杭州會議上明確要求不能錄音，從此作爲毛澤東的機要秘書和中辦機要室主任的葉子龍，停止了機要室跟隨毛澤東錄音。該文提到這個錄音建議是葉子龍倡議的，但葉子龍作爲毛澤東機要秘書，敢不經過毛澤東的批准做出如此大膽的行爲嗎？ 1961 年春毛澤東專列安裝竊聽器被毛發現，又是誰幹的?

1961 年 4 月 26 日晚, 正在保定市調研的中辦主任楊尚昆突然被緊急招回京。楊尚昆在當晚日記中寫道：“腦子中很亂，整夜未睡好。”4 月 27 日下午 5 時 20 分，楊回到北京，在永定門車站他“當即向小平、彭真略談了一下情況”。回京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向處于中央一綫工作的最高領導人彙報，看來此事非同小可！此後幾天，楊又先後找到中央辦公廳機要室副主任、周恩來秘書康一民、毛澤東秘書、中共中央辦公廳機要室主任葉子龍等人多次談話。而這幾天來攪得楊尚昆吃睡不寧的，正是震動中央高層的所謂“竊聽器事件”(也稱“秘密錄音事件”)。5 月 2 日下午，楊尚昆向剛剛返京的周恩來總理彙報了“錄音事件”。當晚，楊尚昆仍感“心情不安、坐臥不寧”。5 月 8 日晚，楊尚昆提筆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對錄音事的疏于檢查作檢討并請處分”。

葉子龍曾經在回憶錄中寫道：“在所謂‘秘密錄音’一案

中，不僅中央辦公廳的領導幹部和機要室的許多同志被迫害，而且還株連了中央和地方的一些單位的負責人……” 撥亂反正以後，黨中央重新審查了“秘密錄音”一案，幷爲有關人員平反。

這是一篇很怪异的報道。由于楊尚昆曾任國家主席，屬于第二代的元老之一，權勢極盛，突然楊去世多年後官媒出來上面這樣一篇文章，大有值得玩味之處。

這裏值得琢磨的疑點有:

（一）楊尚昆極其緊張，但最後却沒有因爲這件事受到嚴厲懲罰，誰在保護他? 他沒有責任的話，那緊張什麼?

（二）楊是中辦主任，按照現在說法是中央的大管家。這個管家本來首要的服務對象就是黨主席毛澤東，但毛却成了被竊聽的對象，楊監守自盜。那是誰授意楊進行竊聽的? 楊自己去竊聽毛不僅沒有必要，而且風險極大。他的後臺是誰?

（三）楊從保定回京，向處于中央一綫工作的最高領導人彙報，這個最高領導人顯然是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都已經點出來了），可報紙却刻意隱去，瞭解中共輿論的都該知道潛臺詞了。

（四）如果楊尚昆不是被劉少奇或搭檔如鄧小平（時任總書記，楊尚昆的直接上司）授意竊聽，那麼劉、鄧爲了避嫌必然將楊尚昆往死裏整。但楊不僅沒事，而且後來成爲國家主席。其中的遠近親疏一目了然。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歷史角度看，楊尚昆和彭真都是劉少奇 1930 年代末在天津主持北方局時的核心班底成員，這種淵源往往是最可靠的信任關係。中辦主任是劉少奇的人，而不是毛澤東的，這是個值得玩味的安排。

（五）葉子龍回憶錄中所謂因竊聽事件被迫害，很滑稽。當時負責對有關人員（不排除替別人背鍋的可能性）進行懲除的是

劉鄧周，後來平反他們的是鄧，有點錯亂。竊聽毛澤東被懲罰也叫“迫害”？是罪有應得！讓後來的中辦主任竊聽鄧小平、江澤民或習近平試試看！

中央授意寫這種前言不搭後語的文章，到底要達到什麼樣的目的？直到幾年後，當我看到《戚本禹回憶錄》時才恍然大悟，原來，該文的目的是“狸猫換太子”，試圖轉移視綫來掩蓋另外一件發生于 1964 年的由楊尚昆執行的竊聽毛澤東的事件[1]。抄錄書中內容如下（有些不必要的用省略號）：

楊尚昆在主席的菊香書屋臥室和洗手間裏安放竊聽器，是通過機要室的吳振英（劉少奇的機要秘書）、康一民（總理的機要秘書）兩個人來做的。葉子龍調離機要室後，機要室就由吳振英、康一民負責。1964 年的夏天，在一天中午休息的時候，好多人都在中南海丙樓的前院乘凉。我聽見康一民在跟人大聲地說，“他媽的，出了事就當縮頭烏龜，這麼大的事，讓我來頂罪。明明是你們叫幹的，現在你們沒事，就我有事”……後來楊尚昆找康一民談了一次話，康一民就不再講了。

……

主席 1966 年 7 月回到北京以後還是沒有去豐澤園住，而是先住釣魚臺。不久後又住到“游泳池”去了。……

在 1964 年“竊聽器事件”被查出來以後，毛主席就下令把楊尚昆調離中央辦公廳。可到了 1965 年主席發現楊尚昆仍在中南海工作，他發了火，劉少奇、鄧小平這才把楊尚昆調去廣東省委當

---

[1]我從另一個角度審視《北京日報》的這篇文章，發現也有故意透露某個信息的可能性，因爲楊去世十年了，可能有人要揭蓋子了，通過該文爲歷史真相打開個縫隙。故意露出破綻也是一種手段。

了書記處書記。……

1966 年 5 月 24 日中共中央下達了中發（66）277 號文件，公布了楊尚昆的問題。文件明確指出，“楊尚昆不顧中央多次關于禁止安裝竊聽器的决定，背著中央私設竊聽器，私錄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講話，竊取黨的機密”。

毛澤東擁有豐富的政治鬥爭經驗，他不會不清楚楊尚昆背後是誰。尤其 1964 年竊聽器事件後楊還能在中南海走動，沒有劉、鄧的保護是不可想像的。在毛發脾氣後，劉、鄧還是沒有立即懲罰楊，而是外調廣東任職。由此可以看出，毛的權力不被尊重和被架空，也可以看作劉、鄧的權力傲慢。中辦主任是劉鄧的人，鄧又是總書記，毛被架空不可避免，研究歷史不可忽略人事安排。

通過以上兩次竊聽器事件，毛澤東已經感覺到劉少奇這個黨內二把手已經不再是值得信賴的同志，相反，是個極其危險而且不擇手段的對手。將 1961 和 1964 年兩次竊聽事件聯繫起來，劉少奇的政治操守和黑暗手段是無法讓毛澤東放心的。如果劉成爲最高領導人，中共政治生活會否成爲斯大林時代貝利亞風格，竊聽和暗殺成爲高層權力鬥爭常用手段，就比較令人不放心了。很顯然，毛、劉政治鬥爭上的你死我活，將不可避免的上演。

1964 年開始，毛澤東就不斷到各地游歷。1965 年 11 月直到 1966 年 7 月，毛澤東離開北京周游各地達 7 個多月之久（廣爲人知的只是毛回京前在湖南滴水洞居住十多天），筆者判斷，一是毛澤東是在深入思考未來的政局走向，二來毛澤東擔心自己久居北京的安全問題。因爲劉少奇羽翼豐滿，毛不能不有所顧慮：劉是否有比竊聽器事件更嚴重的策劃，毛不能不防。與後來林彪事件之前毛澤東沿京滬和滬杭鐵路的南巡做個類比，也許可以發現

一些相似軌迹。毛在軍隊的威望使得任何軍方的風吹草動都可能傳到他的耳朵裏，他對自身安全的擔心不會是杞人憂天或猜忌，必然有一定的可靠信息來源。1966 年文革爆發後不久，康生在北京師範大學召開的群衆大會上和中央文革小組的會議上，指責賀龍和彭真私自調動軍隊搞“二月兵變”。雖然當時和第二代核心時對此辯解爲：當年 2 月，北京軍區根據中央軍委指示調了一個團的部隊給北京衛戍區加强民兵訓練等任務。但這種說法能說服得了誰呢？尤其是與賀龍關係密切的廖漢生當時正擔任北京軍區政委，讓毛澤東怎麽能安心待在北京？他們可能真是冤枉的，但瓜田李下的，在人人首先追求自保的前提下，站錯隊，表錯態，往往是不可挽回的。

據曾任北京市長和政治局委員的吳德所寫《吳德口述：十年風雨記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在 1966 年 7 月毛澤東回京前的這段時間裏，毛澤東令周恩來籌組了一個“首都工作組”，葉劍英任組長。該文提到：

該工作組不僅負責改組北京衛戍區、北京公安局，甚至包括北京市委[1]。葉帥對吳德講：“北京的秩序，安全工作沒有做好前，毛主席不能回來”。可見，建立工作組的首要目的和任務是保證毛澤東回北京的安全。換句話說，就是防政變，防止黨內高層和其他人對毛澤東搞政變。

在周恩來領導的“首都工作組”完全控制了北京後，毛澤東才于 7 月從湖南滴水洞小住後返回北京，8 月召開八届十一中全會上，劉少奇黨內第二把手位置被林彪取代，劉的排名降至第八位。

---

[1]作者董玉振注：北京市委過去是彭真的大本營，而彭和劉鄧關係密切。彭真任第一書記的北京市委于 1965 年 12 月被毛澤東指責爲“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彭在鄧小平主政時期成爲元老之一就不足爲奇了。



很顯然，如果毛沒有抓到劉的把柄，這樣重大的人事調整難以服衆，更別說劉很快被打倒了。

劉在中央一綫最高位置上多年，像鄧小平、彭真、楊尚昆這樣的鐵杆盟友不在少數，對中共領導機構進行徹底清洗是必要的，否則，萬一毛先劉去世，那劉捲土重來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對毛澤東來說，這是必須要杜絕的，甚至比廬山會議後他對彭德懷的不信任還要嚴重的多。在劉少奇被奪權後，毛澤東放任紅衛兵對劉的批鬥就不足爲奇了。劉少奇的最後慘死也自然在命定之中。但毛澤東對劉的盟友鄧小平手下留情，則給自己埋下了身後被“鞭尸”的禍根。

由于劉少奇在高層耕耘多年，所以，他被打倒對高層政治格局幾乎是連根拔起，推倒重來，受衝擊的幹部之多自然不難想像。雖然這些受衝擊的幹部不少是冤枉的，但政治傾向性和“站隊”本身在政壇就是一個决定成敗的重要因素，這不存在對錯問題，甚至不存在冤枉與否的問題。就拿賀龍來說，和劉少奇有密切的私人關係，甚至傳出差點成爲兒女親家。賀龍 1964 年 9 月在解放軍政治學院曾說：“你們爲什麼不請劉少奇、鄧小平、彭真作報告，王光美也可以嘛。…… 要知道，現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四清）的總司令是劉少奇。” 這番話即顯示了賀龍與劉鄧彭的密切關係，也顯示了在軍隊有巨大影響力的賀龍政治上的不成熟，提到王光美這個高官夫人更凸顯了賀的明显傾向性。毛打倒劉少奇必然要打倒其黨羽，尤其是掌握槍杆子的將帥，賀龍不幸而必然地被納入劉的同黨，最終被批鬥慘死。賀龍冤枉嗎？以普通人的角度看可能是冤枉，以政治鬥爭的角度看則無所謂冤枉與否了。這和歷朝歷代政權更迭時的情形沒有本質區別。如果說錯在哪

裏，他和彭德懷情況類似，都是戰場上的巨人，政壇的矮子，都沒掌握好進退。

今天，人們很容易對劉少奇等人的晚年遭遇產生同情，但歷史無法隨意演繹。如果劉少奇沒有被打倒，萬一毛澤東被打倒或被暗殺，那中國將會出現怎樣的局面？人們是否又會一面倒地同情毛澤東？劉少奇如果打倒毛澤東，一樣會對親毛派進行大清洗，一樣會有一大批幹部蒙受“冤假錯案”。以這個邏輯不難理解，鄧小平成爲二代核心後，通過迅速恢復靠邊站的幹部（多數是劉鄧派）職權來取代親毛派，對毛澤東親密追隨者的打擊一樣不手軟，毛澤東至少還放王光美一條生路，而鄧小平直接要判毛澤東的夫人江青死刑；而且江青最終死于獄中。在第二代的輿論慣性下，誰又會爲毛澤東夫人的悲慘遭遇掬一滴清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鄧小平再次演繹這個政治“箴言”，幾億自以爲是、滿腔憤懣，以爲終于抓到真理而起哄著批判江青和毛時代的民衆（尤其是知識分子），不過又做了一次被人利用的道具罷了。

看待歷史人物時，請暫時放一下我們的那份同情心，而應多一些理性的態度，也許不會有太大的認識偏差。比如，劉少奇搞竊聽毛澤東的做法，不僅有違政治倫理，也破壞正常的合作與信任關係，這種做法只會把政治搞的醜陋與惡性循環。但即使批毛最激烈的歲月裏，也沒聽說毛澤東用這種手段來對付他的同志。我不想在這裏用“光明磊落”來形容毛澤東，以我的智商能够判斷到的層次是：毛澤東深知用竊聽和暗殺這種手段將徹底破壞組織原則和高層信任關係，和蔣介石就沒什麽兩樣了；有問題擺出來，有錯誤就承認錯誤，才能有健康的合作關係。而大量的事實都表明，毛澤東的政治生涯確實是這麽做的，他的隊伍中有大量

曾經批判、整過他的人，甚至犯過嚴重錯誤，違反命令和組織原則的人，後來都保持了長期的合作關係，其中包括周恩來（參與剝奪井岡山根據地開創者毛澤東的一切權力，將毛澤東辛苦建立的井岡山根據地搞跨，被迫長征，損失掉幾萬紅軍，此罪够大否？）、陳毅和朱德（朱陳在井岡山時期都曾反對過毛澤東）、彭德懷（百團大戰明顯違反組織原則，彭對井岡山袁文才和王佐的死，及其袁王隊伍被迫投靠國民黨負有責任。袁王是毛開拓井岡山根據地的功臣，對紅軍有恩）、林彪（遵義會議時曾建議讓彭德懷任前敵總指揮；遼沈戰役時毛澤東從全局考慮要林彪打錦州，林公然不聽毛澤東的命令，在毛幾道“金牌”的督促下才勉强服從；後來林反對抗美援朝。有人說，林彪違抗毛澤東的命令的次數超過其他幾位老帥）等。毛澤東身邊能够聚集一大批軍政方面的非凡人才是其成功的保證，這些人才不可能靠竊聽來維持忠誠度，而是需要胸懷和責任承擔。蔣介石手段耍盡，他的軍統更是竊聽暗殺無所不用，搞到人人自危，人心喪盡。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毛澤東打倒劉少奇完全在政治鬥爭的邏輯之中。至于賀龍去世後毛澤東說“看來搞錯了”，那是在威脅消除情況下給幾十年革命戰友的一份身後體面，正如毛澤東一直不公開批評彭德懷“裏通外國”一樣的道理。

至于劉少奇被定位爲“叛徒、內奸、工賊”，比其他被打倒的領導人多出這些“頭銜”，可能有些歷史的原因或誤會。可以佐證的資料：“文革”開始前後，毛曾秘密下令調查劉在白區工作時是否叛變。笔者從一位退役的軍界朋友那裏聽說（此人曾陪同首長參與和見證了1980年《建國以來黨內若干歷史問題的决議》草案討論），在延安時期，陳毅就曾向毛澤東抱怨說，劉少奇可能是內奸，原因是劉在新四軍政委任上整了很多幹部，包括原葉

挺的老部下。當然，這些因爲找不到有說服力的證據，只能當成是“坊間傳聞”，或者摻雜著個人的恩怨。但劉少奇在新四軍時發現了粟裕的軍事才能幷重用之，是對中共的一大貢獻。

林彪試圖暗殺毛澤東失敗而被定性爲“反黨集團”，劉少奇試圖對付毛澤東失敗而被打倒，但却被鄧稱爲“冤假錯案”。這只不過是成王敗寇邏輯下兩次相似的歷史事件，貶低林彪或美化劉少奇是權力階層“站隊”的結果。作爲智者，更應取冷眼旁觀的姿態才能看出真正的熱鬧和一些政治人物的百態。



六　“文革”的點滴啓示

作爲今日的領導人和科教工作者們，是否能從“文革”中捕捉到某些有用的信息呢?

那些曾在歐美大學有研究經歷的中國學者，都會對那兒自由的學術空氣有深刻的印象。反觀中國研究機構中的論資排輩、權威遍布、攀權附利、學閥作風、大樹典型的現象，實在令人感到强烈的反差和遺憾。甚至一個黨委書記，都有權讓一個優秀的學者活得不自在。那些曾經作過開創性、奠基性工作的學者們理應受到後來者的尊重，但這種尊重是一種純粹人際關係概念，而與科學本身幷沒有必然的聯繫。在科學的殿堂裏，是不應該有權威存在的。而學閥作風更體現了某些學者的霸道和狹隘。在今日的中國大學裏，兩個學者可能因畢業于不同學校、或對某一領域的

發展有不同的看法而相互排斥（比如在系主任等領導崗位的爭奪、在相關學會的理事職務分配上）的現象幷不罕見。

至于研究機構裏“樹典型”的現象更是滑稽。如果說雷峰、孔繁森這樣的典型對推動社會教化有積極意義的話，那麼研究機構裏“樹典型”（培養權威的主要方式之一）則應格外謹慎。

中國研究機構“樹典型”的一個特點是：“典型們”可以輕而易舉地得到所有好處，而他人要得到其中的一樣好處也會非常困難。當然，如果“典型”們真的那麽優秀也就罷了；問題是，他們能被樹爲“典型”的一個重要條件往往是和院系領導有著不一般的關係，或者作過學生幹部，而非在學術的領域裏有什麽特别的建樹。至于那些才華横溢的“怪才”們，只有在這些成爲學術帶頭人的“典型”手下默默耕耘的命運。當然，這些“典型”們不久就可以成爲新的“學術權威”和博士導師，以證明領導人當初的栽培是多麽的有知人之明。至于他們在成爲權威的過程中剝削了多少别人的勞動成果，已沒法深究了，因爲他們有權在其領“導”下的任何一篇論文上署上自己的名字，而不管他們爲此論文的完成是否給過建設性的指導。

記得臺灣歌星周華建在評價香港“四大天王”和其本人“天王殺手”的“封號”時表示：媒體這種“封號”的方式不利于新的優秀歌手的出現和成長。看來中國科研教育界的領導和權威們的認識水平，幷不比一名流行歌手來得高。中國的幹部選拔制度又何嘗不存在類似的弊端？！當然，對國家的危害也更加嚴重。在公務員中的“跨世紀接班人”及“梯隊培養制度”，和八十年代風行的中學生分班制度有著相似的弊端。自由和公平競爭意識的缺乏，將極大地制約中國的復興。

毛澤東在“文革”期間鼓勵或默認年青人“造反有理”，

“打倒權威”固然不可取；但年青知識分子應勇于打破常規思維，勇于懷疑和挑戰“學術權威”，不正是中國科技界目前所缺少而又至關重要的一種精神嗎？中國目前遍布文化科技界的一些“歪風邪氣”，除體制方面的原因外，知識分子本身難道沒有責任嗎？中國知識分子應進行深入的自我反思，這，也許是毛澤東及其“文革”給中國知識分子留下的一些值得注意的課題之一。

對“文革”十年采取“否定一切”的作法，是國家的一大損失。它使我們放弃了對“文革”期間一些有價值的創意進行整理和繼承。哈佛大學商學院某學者對發明于“文革”期間的“三結合”給予過高度的評價（改革開放後中國高校的校辦企業受到政府的鼓勵而得到巨大的發展，將科研和生產結合起來，這和“文革”期間的“三結合”有什麼區別？今天人們忽略了“文革”期間中國各類學校大量校辦工廠的涌現和發展）。美國一個小鎮爲遏制嚴重的偷盜行爲，采取將捉到的小偷游街示衆的“文革”手法，取得明顯效果。我們能從中學到些什麼呢？作爲毛澤東改造中國的一場實驗，“文革”從總體效果上講不算成功（如果“破四舊”,以及勞動熱情的空前提到而帶來的經濟和基礎設施建設的偉大成就都不算“文革”的成果的話），正如一次失敗的科學實驗一樣，它其中一些有價值的片段是不應被忽略的。至少，將那些貪官污吏在他的單位和家鄉游行批鬥，從中國人最看重的“面子”上予以打擊，應能產生更好的阻嚇遏制效果。

“文革”中最受詬病的如“劃清界限”、“兒子告老子”等，被認爲是對中國人價值倫理和信任關係的最嚴重破壞。如果這些行爲不是以階級鬥爭爲指針，而應用到當前極力推行的法制建設，那麼，這不失爲一項值得參考的法制建設思路。當今中國雖有法律條文對知情不報和窩贓予以治罪，但當用到罪犯家人身

上，該法律條文似乎沒有很好地發揮威懾作用。尤其對當前洶涌澎湃的貪污浪潮，如果一人貪污，多數情況下都會株連全家，無疑會增加貪污的機會成本；但如果一人坐牢（運氣好的話則未必一定坐），幾代豪門，那貪污的誘惑就太大了。當前的貪污行爲中，貪官家屬的角色是值得注意的。如果“兒子告老子”、“劃清界限”作爲人民法制意識加强的目標予以宣傳，不失爲一項有益的嘗試；它將提供挽救自己多數親人的動力和渠道。

這實際上關係到中國人的公民意識建設，應該從中小學階段開始灌輸，貪官的孩子以父母貪污爲傲將對一代人傷害巨大。

大鳴、大放、大字報，是“文革”期間的一大發明。“文革”結束後不久，即被中共中央完全否定。固然，“三大”在文革期間發揮了一些不健康的角色，但在民主化建設的今天，當人民沒有合適的信息反饋渠道，這“三大”是否可以在一定範圍加以利用，幷扮演言論自由、揭露腐敗、民間自我調控的補充角色呢?

毛澤東時期的另一偉大發明——赤脚醫生和基層醫療衛生體系，極大地改善了農民的醫療條件（見第二章）。但今日城鎮醫院醫療費用的高昂，已使農民獲得醫療服務的成本越來越高。因此，面對越來越多的醫科畢業生，國家可以考慮對赤脚醫生和基層衛生體系理念進行改造和推廣，這是爲人民辦實事的具體體現。

當然，“文革”給我們得出的最重要的結論是：國家的命運是不應寄托在個別領袖身上的，不論他多麼偉大。毛澤東這樣的偉人，尚且會不小心踩著我們的脚，何況他人？民主、法制和教育，才是避免“文革”式群衆運動的根本之道，也是中國實現全面現代化的必要條件。沒有民主政治的確立、法制體系的完善、全民教育的普及，以及由此帶來的公民意識的建立，人均收入不



論多高，中國也不能算是一流的現代化國家，看一下高收入的石油輸出國的狀況即可一目了然。

七、中國已走出“文革”的陰影了嗎？

趙紫陽一夜之間從共產黨的總書記變成“分裂党的分子”；各級黨委幹部的爲所欲爲；十六大前一年多時間內，有關未來高層領導權力安排的各種傳聞；江澤民有關“陰謀家”的談話，及由此引起的揣測；輿論控制和其巨大威力，使得法輪功頃刻瓦解……。從這些事件中，今日的中國人是否能捕捉一些值得注意的信息呢？

輿論的單一導向，領導幹部任免和交接班的非制度化，黨對各項事務的全方位領導，黨政幹部淩駕于法律之上，等，今日中國所缺少的唯一與“文革”不同的要素是“人”，即領導人的個人威望。很顯然，國家仍然停留在危險而不確定的層面上，“文革”爆發的黨、政環境基本上沒有改變。

丘吉爾和戴高樂在二戰後黯然退出政治的中心，爲歐洲一體化和德國統一作出巨大貢獻的科爾敗給施羅德。然而，在中國的現有體制和文化下，這類事情不可能在中國發生。也就是說，如果哪天中國真的出了個這樣的領導人，解決了現在困擾中國的一系列問題，進而享有崇高的個人威望，那麽，一場類似于“文革”式運動的發生，將不令人奇怪。至少，在鉗制輿論、個人獨裁和

打擊异己方面，他將不會受到強有力的制約而所向披靡。

看來，中國要完全避免另一場“文革”，或“文革”式政治事件的話，還有太長的路要走。而在相關體制改革方面，除了鄧小平結束領導幹部終身制以外（很遺憾，在關鍵的党和軍隊領導職位方面留下個不易割斷的尾巴，不知未來是否會有個領導人主動解决這個本來不難解决的問題，其實只需一點自知之明和責任心就够了），自“文革”結束二十多年來，實際上并沒有根本性的進步。

八、讀書人的毛澤東情結

幾千年來，中國的讀書人背負著國家的興衰和家族的榮辱，有人會投靠權貴，也有人潦倒一生或壯志難酬，但在讀書人的內心裏永遠都有一份對無知權貴們的本能輕視。但面對毛澤東這樣一位學識淵博、才華橫溢、手不釋卷、出身寒微、戰功卓著、生活簡樸、哲思遠慮的領袖，中國的知識分子難免會有一種親近感。毛澤東身爲一名博學的大知識分子，他身上嗅不到中國傳統酸臭文人的腐朽，也沒有一些依附權貴者的猥瑣，更沒有嘩衆取寵文人的乖謬，有的是樸素、恢弘、博大的氣勢，散發著泥土和墨香的濃厚氣息，以及和勞苦大衆的無間接觸。而毛澤東的膽略和意志，又彌補了中國讀書人缺乏而又渴盼的領袖性格。這就不難理解，爲什麼毛澤東在重慶談判時發表的瑰麗詩篇《沁園春·雪》能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造成巨大影響和吸引力。中國知識分子們

對文采飛揚的毛澤東的心理嚮往，自然强于武夫形象的蔣中正，如果抛弃政治理念的話。這樣的政治家恐怕未來相當長時間內將難于再現。無論是喜歡打橋牌的鄧小平，還是多才多藝的江澤民，都難于像毛澤東那樣對讀書人具有恒久的魅力。有位對政治沒有絲毫興趣的朋友，在首次出國時，在笨重的行李裏只帶了兩本書：一本《英漢詞典》，一本《毛澤東詩詞》。

在反右和“文革”中有不少知識分子蒙冤，對其本人或國家都是個損失。“文革”結束後，有些人進行了瘋狂的報復。但同時也有些人坦然面對過去，沒有半句怨言；出于他們對毛澤東其人、其事、其文的認識。一位被錯劃爲右派的老師曾講：毛主席作錯什麼事都不是爲自己，看他的家庭就能知曉；他并非鼠目寸光的領導人，看他的文章即可明瞭；他絕非心胸狹隘的庸俗之輩，讀他的詩詞即可了然；他所犯的錯誤是不能用世俗的得失去評判的。曾和一中國作協的朋友談及毛澤東，他說：毛主席詩詞中所表露的霸氣、偉美和雄麗在唐宋詩詞中也難見；其文章更如行雲流水，讓下層人民讀之不以爲深奥，讓知識階層讀之不以爲土氣，高雅而不洋，平凡而不俗，淺顯中見深理，盡顯“五·四”白話文運動之精髓；毛雖沒讓他擁有彩電，但深以曾在毛澤東時代生活爲榮。在這些知識分子身上，頗有“以死在英雄劍下爲榮”的豪俠氣概，體現了中國知識分子極爲不俗的一面。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第七章　毛澤東與個人崇拜

“崇拜”是人類的一種正常情感形態。它不同于尊敬和佩服，而是遠超越之。是對崇拜對象的崇高德行、健康心態和强大力量所產生的發自內心的崇敬和無上欽佩，對被崇拜者有强烈的難于企及感。

“搞個人崇拜”是被寫入《决議》的毛澤東的一條罪狀。作者曾試圖尋找這一罪狀的證據。有關人民群衆自發地對毛澤東崇拜的例證比比皆是，但毛澤東自己刻意追求個人崇拜的證據則無從尋找，倒發現了毛澤東對到處建塑像作法的厭煩。

從一些資料中可以看到，毛澤東有時對來自人民的崇拜熱情抱持認可的態度，幷認爲人民的熱情不可打擊。從毛澤東時期人民的思想覺悟和勞動熱情可以看出，這種對毛澤東的崇拜其實已使共產黨直接受惠，也直接推動了國家的建設。一美國學者稱：“毛澤東和他的思想在幾十年中給人民以使命感”，部分說明了個人崇拜對新生共和國的積極意義。尤其聯想到今天中國人的“誰也不服”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可以讓後人更清楚地看待人民對毛澤東的崇拜情結對統一全民意志，激勵愛國熱情的積極意義。



1976年9月11日，法國巴黎群衆舉行游行，哀悼毛澤東主席去世。標語上寫著毛主席語錄“群衆是真正的英雄”。

一、對毛澤東崇拜情結的由來

群衆對毛澤東由佩服、尊敬到崇拜有一個過程。如果說井岡山時期至三次反“圍剿”勝利，人們對毛還停留在佩服和尊敬的層面上的話，到達陝北後不久，根據地群衆對毛澤東的熱愛已上升到崇拜的高度。斯諾在《紅星照耀中國》（又名《西行漫記》）中記述了如下情節：毛澤東一度便秘，常由衛兵陪伴到很遠的山坡上方便；如果哪天毛方便成功的話，頓時能在當地群衆中引起一片歡騰。很顯然，這其中已不再是簡單的尊敬了。對延安軍民在毛澤東領導下所表現出的狂熱，斯諾幽默地寫到：“他們是不是唱的太多了”。

建國後，伴隨著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順利實施，農村完成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土地改革，城市工業化全面展開，中國人民一百多年的强國之夢終于看到了實現的曙光，人民的勞動熱情空前提高，流落在外的科學家們紛紛歸國，人民群衆對毛澤東的崇拜也節節升溫。這種崇拜决不是盲目的，或經過輿論鼓動的，它是中國人民切身的感受。試想想：國家經過百年的紛爭終于實現大統一局面，賣淫、嫖娼、吸毒、黑社會組織等醜惡現象一夜根除，外國在華勢力和一切不平等條約被徹底終結，那些祖祖輩輩爲別人家種地過活的農民突然有了自己的土地，生活無保障的城市居民走進工廠幷有了醫療退休保障，才華橫溢而報國無門的科學家們突然看到了國家的希望和報國的機會，窮人家的孩子無憂地走

進學堂……，多少過去想都不敢想的事“突然”變成了現實。建國不久，中國更不得不參加了本世紀實力最懸殊的戰爭——朝鮮戰爭，那是一個一無所有的窮光蛋和以世界第一强國爲首的由十七個國家組成的聯合國軍的對峙。戰爭的結果更令世界目瞪口呆。讓這個一百多年來屢戰屢敗的“天朝大國”重新尋回了大國的自信。所有這一切以前看來不太可能的事，却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實現了。毛澤東及其所領導的軍隊的戰無不勝已無人懷疑。感激、熱愛、敬佩已不能涵蓋人民心中對毛澤東的那份感受，“崇拜”也可能是唯一合適的詞語。考察世界上一些主要宗教的形成過程，我有理由相信，如果這一切發生在一千年前，一門新宗教的誕生將是毫不奇怪的。

如果忽略朝鮮戰爭，就不能理解爲什麼毛澤東在第三世界國家所具有的巨大影響力，也不能理解“文革”期間對毛澤東的崇拜浪潮何以波及國際社會。朝鮮戰爭是典型的以弱制强的戰例，它給弱小國家和民族追求獨立鬥爭以極大鼓勵，推動了後來風起雲涌的全球反殖民化浪潮。當然，受益最大的還是全球炎黄子孫。

長期以來，留著大辮子，躺在床上吸鴉片，是中國人在西方人眼中的固定形象，而二戰初期國軍在東北和華北的無能表現更令世界對中國軍隊不以爲然。韓戰結束後，美國學術界在政府充足經費的支持下，掀起了研究中國的熱潮，從政治、軍事、歷史到文化藝術，誕生了大批中國問題專家。這是鴉片戰爭以來，西方世界首次對中國的全面深入認識。輕視甚至蔑視中國的現象在美國政界和學術界中逐步消失，這基于美國民族優越論的自然邏輯：美國不應輸給一個劣等民族。當毛澤東 1949 年 10 月 1 日宣布“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强權世界沒人當真，他們根本不相信這個一百多年来任人宰割的民族能憑一句口號就能站起來。

但韓戰的炮聲則讓全世界驚呀而清晰地認識到這句口號竟是如此具體！

韓戰的勝利極大地提高了中華民族的自信，改善了民族形象，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自韓戰以來，世界上再也沒有哪個國家將中國和中華民族等閑視之。當海外華人自信地行走在世界各地，是否還能意識到毛澤東的存在？（由于祖國的百年虛弱和任人宰割，海外華人從南亞到歐美，無論窮富，都是政治地位低下的二等公民。但韓戰正酣的 1952 年，美國加洲廢除對華人諸多歧視性州憲法條款）

抗美援朝確保了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後來中美衝突的避免。它也標志著中國已從民國時期的被動防禦，轉化爲拒敵于國門之外的主動防禦。如果放弃抗美援朝，則中國在鴨綠江北岸長期大規模駐軍的開支將不會比參戰的代價小，而且直接影響東北重工業和能源工業發展戰略的制定。韓戰對中國民族精神的振奮帶來了直接的推動，幷爲後來的高速發展創造了社會條件。今天有些學者埋怨什麼“韓戰耽誤了中國的經濟發展，導致海峽兩岸分裂至今，等”，根本是缺乏全域觀和發展觀的無稽之談。



1971 年 4 月 25 日，美國學生在華盛頓國會大樓前舉起毛澤東畫像及揮舞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綫國旗，抗議越南戰爭。

二、超凡的智慧和膽略

韓戰之後的二十多年，毛澤東一再用他高超的智慧爲國家謀取最大的利益。在此列舉幾個建國後的軍事和外交事例，到今天

仍看不出任何的瑕疵。即使最傲慢的人在毛澤東的智慧面前也不得不保持一份謙卑。如果您認爲可以做得更好的話，您絕對應到中南海報道，“上書房行走”，那必將是中華之幸。

例一，對印反擊戰

從 1958 年中印邊界發生小規模軍事衝突，圍繞邊界劃分問題，中國謀求外交解决。朝鮮戰爭後的中美對峙和美國對中國的弧型包圍，中蘇關係也進入了一段微妙時期，中國太希望能有一段和平建設的時間，絕對不希望再得罪印度這樣一個大國[1]。但印度自以爲是“萬隆會議”的發起國，不結盟運動的首領，如果和中國衝突，必會獲得國際支持。而且印度人對中國一點也不瞭解，英國的占領讓印度有一種莫名其妙的優越感，以爲中國是極端落後的，即使朝鮮戰爭也沒能改變印度人對中國的看法。直到今天，印度有些網友還在談“印度要好好幹，千萬別讓中國趕上”、“中國照這樣發展下去，十年就能趕上印度”等，印度外交部長在 2002 年來華訪問前揚言：“中國的經濟增長數據是假的，不可能那麽快”。這種自我感覺良好和對對手的輕視往往是戰爭爆發的心理根源。當時印度政府顯然把中國的忍讓當成軟弱，把中國的三年經濟困難當成機會，而完全忽略了毛澤東的軍事才能和經歷過無數戰爭磨練出來的中國軍人的超强戰力。到 1962 年，印度步步進逼，中國被迫反擊。

這場反擊戰是一場成功的閃電戰。解放軍勢如破竹地摧毀了印度軍人的全部防綫和信心，毛澤東訓練出來的這支隊伍的英勇

---

[1] 好像只有當今的政治家才知道韜光養晦的好處，而深研歷史的毛澤東好像不知道。事實是：毛澤東也不喜歡打仗，但中國的崛起讓別人不自在，這不是他的錯。沒有毛澤東打下的國威，今天的中國還能大張旗鼓地“韜光”嗎？

令印度軍人聞風喪膽；[1] 這和解放軍歷次戰爭比較沒什麽特別之處。極爲特殊的是結束戰爭的方式。中國軍隊在取得壓倒性勝利後迅速撤退以結束戰爭。將在反擊戰中繳獲的大批武器、車輛進行擦拭維修，將繳獲的其它軍用物資進行整理包裝，然後交還給印度。對被俘人員，一律不殺、不打、不罵、不侮辱、不沒收私人財物。生活上給予優待，受傷者給予治療。甚至麥克馬洪綫以南部分領土繼續讓印度占領[2]，表明中國謀求中印邊界和平的誠意。

---

[1]解放軍的勇猛迅速瓦解了印軍的精神防綫，大部隊不戰而潰。有一解放軍戰士單人擊潰印軍一個炮連，繳獲四門大炮。八名解放軍戰士俘虜 180 名印度兵。半個連的 30 名戰士，硬是在邦迪拉外阻擊了裝備齊全的 3000 印軍，印軍打了幾次衝鋒，死了幾百人還是無可奈何。還繳獲一車美國援助的最新武器。中國至今沒有一部電視系列片來如實地展示中國軍人那讓世界軍事史上任何英勇軍隊不好意思自豪的神勇。這是繼美國後第二個大國被解放軍搞得舉國恐慌。

[2]這場戰爭及以前中國實際拿回的領土面積，應該是將清朝以後西南邊界陸續丟失的領土大部分拿了回來。中印爭執的面積約 30 萬平方公里，它包括東西兩部分：一塊是東段藏南圍繞麥克馬洪綫附近領土，另一塊是位于新疆和印控克什米爾接壤的阿克塞欽地區，還有錫金的歸屬。毛主席于 62 年戰前會議曾說：“中國人都知道，中國有 960 萬平方公里的國土，小學課本裏寫著呢，連小娃娃都知道，不能到了我毛某人的手裏就成了 930 萬平方公里，憑空少了 30 萬平方公里，你們不能讓我背著賣國賊的罪名去見祖先”。也就是說，在 59 年的中方實際控制綫已經圈進了這 30 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大部，至于是什麽時候拿來的，肯定是解放西藏後。因中印邊界環境複雜，駐軍不便，歷史上這條邊界在大部分地段沒有明確劃分過，是歷史形成邊界。肯定的是，戰爭前後，在西綫中國全部拿回自己的固有領土，約 20 萬平方公里（印度則要求按英國人搞的一條傳統綫劃分，中國當然不答應）；錫金繼續讓印度占領；東綫則以達旺至下察隅往南部分由印度占領（這也是 59 年實際控制綫），中國宣稱有 9 萬平方公里，可筆者怎麽也量不出這麽多，大概約 4 萬多平方公里。總之，中國前進麥克馬洪綫以南不少距離。中國一直强調中印邊界談判應以 1959 年實際控制綫爲基準，是否說明中國已經拿回屬于中國的大部分土地？這種邊界問題，政府必須考慮歷史和現實以及未來談判策略等要素，沒有哪國政府會聲稱自己已滿意了。本書以印度還占著中國九萬平方公里的便宜來論述。

在美國弧形包圍，蔣隨時反攻大陸，和中蘇關係出現危機之時，（接下页下）

這一招令不少人費解。一位英國學者在其《中印邊界戰爭》一書中嘆道：中國在取得壓倒性勝利的情況下沒有提出任何的賠償和領土要求是奇怪的。曾參加過這場戰爭的解放軍將士至今還有人難于接受。筆者本人也爲此生毛澤東的氣達十年之久，直到最近幾年才逐漸認識到毛澤東在處理這一問題上的精妙之處。

毛澤東在戰爭指揮上從來就不是個喜歡手下留情的主兒，打殲滅戰，“對敵人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是毛澤東的偏愛，但這次却如此的寬宏，內中必有隱情。

在股市上有一個說法：會買的是徒弟，會賣的是師傅。在戰爭上同樣如此，常勝將軍固然偉大，但善敗將軍更顯智慧。而毛澤東在對印反擊戰上不僅常勝，而且更是善退。

中印邊境遠離內地，交通極爲不便。如果從西寧運一車的彈藥去中印邊界，那麼需要有一輛油車跟隨，且通西藏的公路穿越不少的複雜地理環境，經常導致交通中斷。再看印度一方，在喜馬拉雅山南麓地勢平坦，鐵路直達中印邊界。毛澤東作爲一名軍事家，對這樣的後勤保障條件不會忽略。何況，在韓戰時中國軍隊的補給綫受到敵人飛機的狂轟濫炸下，後勤保障一直困擾著前綫部隊（按一美國軍官的說法：如果中國前綫部隊能保持一個月的後勤保障，而不是僅一周，韓戰早結束了）。因此，中印之戰

(接上页下) 印度又來挑戰，使得當時領導人在解决和周邊國家邊界問題上有迫切感，導致這期間邊界劃分上的倉促和太多忍讓是非常遺憾的；但承認緬甸對江心坡的主權則構成這代領導人在領土問題上最令人非議之處。可如果和緬甸關係搞僵，導致緬甸投靠其它大國，則是一個令人頭疼的問題；中國的地緣政治和周邊安全環境將急劇惡化。這是衰弱的歷史留給這代領導人的難題。如果中國不能和周邊國家解决領土問題，我們將得罪所有鄰邦，因和幾乎所有鄰邦都有領土爭執。當時江心坡在緬甸控制下，不通過戰爭很難拿回。毛澤東當時也可能認爲緬甸早晚會成爲東方“蘇聯”的一部分。



只能是有限規模的速决戰。如果變成長期的消耗戰，對我方肯定不利。因此，發動戰爭易，如何體面地退出戰爭就變得格外重要。

事實證明，毛澤東退出戰爭的方式是妙不可言的。

首先，中國暫時没有拿回部分屬于我們的領土，因爲我們根本無法拿回。如果堅持控制這塊領土，中國既無力完全消滅對方的力量，又難于和平地控制這片領土，中印之間肯定陷入長期邊境戰爭。這顯然不是中國所願意看到的。何況，在中印戰爭時，蘇聯偏袒資本主義的印度，標志中蘇關係破裂的表面化，而赫魯曉夫在歐洲訪問時，已公開談論“黄禍”。如果中印戰爭不能迅速結束，中國將陷入極爲險惡的國際環境。在北方對蘇關係不明朗的情况下，和美、印兩個大國同時對峙，中國是一定要避免的。

瞭解印度人對這場戰爭的看法是必要的。

印度人對這場戰爭的態度基本上是惱火，窩囊，難于理解。難于理解印度的軍隊爲什麼如此不堪一擊，其實并非印度太弱，而是中國軍隊的戰鬥力太强。惱火的是，印度再也没有機會一雪前耻。中國在結束戰爭時采取的手法是如此的寬宏和大度，得到國際社會的同情。如果印度繼續進擊的話，頗有“給臉不要臉”的意味，在國際輿論方面將遭受另一場徹底失敗。其實，中國在1962 年戰爭爆發前，爭取和平解决領土問題的誠意已爲國際社會所認可，這也是爲什麼對印反擊戰爆發後，印度期待的國際輿論支持并没有出現的原因。

中印戰爭就像是一場拳擊賽，中國在第一個回合戰勝對方，然後拿起金腰帶就走，聲稱自己赢了。問題是，一場拳擊賽的輸赢要經多個回合的較量才能分出勝負。很顯然，毛澤東巧妙地修

改了游戲規則，以便自己在第一個回合取得勝利後就結束戰鬥，再不給對方機會。這無疑令自尊心脆弱的印度人有說不出的惱火和窩囊。

至于那幾萬平方公里的領土如何收回，就看中國未來領導人的智慧和膽略了。尤其在印度導彈的射程越來越接近北京的今天，中印之間解决領土問題的合適時間已經所剩不多了，如不解决，未來將變得更加困難。如果在强調經濟建設的中心目標時，忽略其它稍瞬即逝的機會是非常可惜的。如果印度的導彈無法打到北京，中印戰爭發展成核戰爭的可能性是沒有的。但筆者實在懷疑中國當今和未來的文官政府，是否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氣來解决這一問題。尤其是中國現有的高層領導幹部的權力交接制度的不規範，黨、政、軍權力的人爲分割，那幫領袖在五年的任期裏要花一半以上的時間搞權力鬥爭，哪還有工夫策劃如此重大的戰略課題。[1]

這場戰爭的另一個直接後果是：印度國際地位的急劇衰微，尼赫魯和不結盟運動留下的那點外交老本也消耗殆盡。不可一世的尼赫魯兩年後鬱鬱而終。在亞洲兩個大國的相對國際影響力較量中，中國迅速占據絕對優勢。在中國的陰影下，10 億人口的印度的聲音已引不起國際社會的興趣。

中國也在這場戰爭之後，順勢坐上了“丐幫（第三世界）幫主”的破椅子。當然，這個破椅子比任何沙發都舒服。

毛澤東在 1962 年的智慧構思，直到今天還有很多中國人沒能

[1] 在 2017 年洞廊事件發生後，我曾撰文《中對印戰略及當前對策分析》（共九節，2017 年 8 月），發表在筆者的新浪博客 blog.sina.com.cn/nanyangbook 和公衆號“南洋智庫”。被網友廣泛轉載到一些熱門軍事論壇。

參透其中的奧妙，智慧的差距可見一斑。

例二，反擊蘇聯的核威脅

中蘇關係的破裂和中國原子彈、氫彈的爆炸成功，給蘇聯造成了不小的壓力。而美、蘇戴維營協議的簽署，也使美、蘇的對抗出現了一段相對和緩的時期，使得蘇聯希望借助美國與中國對立的時機，于 1969 年計劃對中國進行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以摧毀中國的核武器基地、軍事工業和政治中心北京。形勢的高度緊張，使得中央高層的一些官員出于安全考量，而在國慶 20 周年到來之前離開北京南下。很顯然，中央領袖們如果在建國 20 周年之際停留在北京，那將是非常危險的；但如果毛澤東不能屆時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對全國人民的心理將帶來巨大的陰影。

熱中于時尚和表演欲過強的勃烈日涅夫，顯然低估了毛澤東這個深藏不露的對手。1969 年 9 月底，中國在西北進行了兩次百萬噸級的核試驗（一次地下，一次大氣層）。之後，幷沒有像以往那樣發布公報，而是保持沉默。這令外界對核試驗的目的產生了懷疑，幷導致諸多猜測。一位西方人士稱：中國的核試驗看來不是爲了獲取某個實驗數據。兩次核實驗也必然給蘇聯領導層帶來了極大的震懾和心理壓力，傳遞了中國已有所準備的强烈信號。

10 月 1 日建國 20 周年的國慶大典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毛澤東滿面春風地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

筆者于 1992 年在一本書中讀到上述歷史秘聞時，心中有一種難于言表的感受。在毛澤東領導時期，中國的力量和突然崛起令全世界不習慣，我們經歷了太多的險境，他都能領導我們成功跨越，而我們對此全然不知。人民在沒有任何擔憂的和平環境裏生活，可我們是否想過他老人家爲此所付出的心力，和所承受的巨


紧跟毛主席 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

大壓力？當他沒有離開北京而登上天安門城樓時，人民群衆不過多喊了幾聲“萬歲”而已。就是這聲“萬歲”却成了毛澤東的一大罪狀。難道他不配這聲“萬歲”嗎？如果沒有毛澤東，結局會怎樣？建國 20 周年來臨前的北京城，必然是一片領導幹部們和其家屬外逃的人流車海，幷對社會的穩定和人民的心理帶來嚴重的挑戰。當周恩來急速跑到中南海游泳池旁將蘇聯核打擊企圖的緊急情報告訴毛澤東時，周的緊張是自然的，而毛澤東的回答顯得格外輕鬆：“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1]

就是這個“不稱霸”，給剛上臺的美國尼克松政府傳去了一個極爲重要的信號，促使尼克松政府在中蘇之間倒向中國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這三個字讓美國人相信，毛澤東幷不是好戰的，中蘇决裂的責任在蘇聯，以及對美國構成威脅的還是蘇聯，而非中國；雖然當時的美、蘇關係相當緩和，而中、美之間還處于對

[1] 1969 年蘇聯對中國核打擊的風險下，毛澤東做出了疏散高層領導人（包括靠邊站的中央高層）到外地的决策，以確保萬一北京受到核打擊時可以保留核心領導力量。朱德、董必武被疏散到廣東，葉劍英被疏散到湖南，陳雲、王震等被疏散到江西，聶榮臻、陳毅等被疏散到河北，重病在身的劉少奇用擔架抬上飛機送到河南開封，被打成“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鄧小平被送往江西南昌，被打成“黨內第三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陶鑄被送到安徽合肥。這本來是毛澤東基于國家安全利益而做的安排，自己承擔最大的風險。但毛澤東之後，這段歷史被嚴重妖魔化，鄧小平的親信在一些文章和著作中，甚至寫成鄧小平被“下放”到江西“牛棚”，日子過得有多苦，受到何等的迫害等等（牛棚配厨師？）。他們似乎忘了，歷史是人民來寫的，歷史的真實可以被暫時扭曲，但不會永遠被掩蓋。高層政治人物的是非曲直歷史自有公斷，其家人親信爲先輩做不符合實際的“美容裝飾”，只會起到反效果。毛澤東在國慶節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承擔的風險比江西的“牛棚”大得多。何況那個“牛棚”本身就是虛構的。顛倒黑白，忘恩負義，莫此爲甚！

峙階段。這個信號也促使美國出于自己的全球利益，在最終徹底結束蘇聯核訛詐方面，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非常痛心的是，直到今天還有人對毛澤東當年的“深挖洞，廣積糧”以及大力發展“三綫”的全國備戰說三道四，說什麼“毛澤東錯誤地判斷了國際戰爭形式，誇大了戰爭爆發的可能性”等。對于毛澤東這一代人來說，國家面臨的最大問題有兩個：首先是生存，而且必須自尊地生存下去，然後才是發展。作爲一個身經百戰的領袖，如果面對蘇聯在中、蘇邊界陳兵百萬，美國對中國實行弧形包圍，南大門的越戰正酣，西南面與印度敵視時，不做萬全的準備將是極爲輕率的。

避免戰爭的最好方法就是爲戰爭做好準備。戰爭沒有爆發，并不能說明當初的備戰是錯誤的。毛澤東不可能采取蔣介石曾對日、蘇、法的妥協政策。多數老百姓人云亦云可以理解，但中國的不少學者和高層政客也在不動腦筋，就未免有些悲哀了。

第三，毛澤東發動歷次民族戰爭的戰略考量

毛澤東 1949 年之後的歷次用兵，固然有冒險的成分，但沒有一次的軍事行動是輕率的莽撞行爲，或意氣用事。

中國敢于出兵朝鮮，因美國的戰略重心在歐洲，而中、蘇有一個《中蘇友好同盟條約》（這個條約是否“好吃”不得而知，但符合毛澤東要求的“好看”，“同盟”兩個字是毛澤東要求加上去的），美國斷不敢對華全面戰爭，進而可能導致蘇聯在歐洲的行動。因此，毛澤東加入韓戰，除出于國家的長期安全考慮，也必然有信心地認爲，這將只可能是一場局部戰爭，而不太會發展成中、美之間的全面戰爭。美國雖然有原子彈，但蘇聯也在韓戰爆發前八個月，原子彈試炸成功。

對印戰爭之時，雖然中、蘇關係已出現問題，但還沒到勢不兩立的地步，蘇聯當時不可能幫助資本主義的印度，否則，蘇聯在社會主義陣營的領導地位和形象必然受到摧殘。而美國人當時根本不相信中、蘇會决裂，不相信蘇聯會放弃中國這樣一個對東方陣營極爲重要的力量[1]，只要戰爭很快結束，中國所冒的兩面作戰的危險是沒有的。

中、蘇珍寶島戰爭道理是相同的。蘇聯也絕對不會冒和中國全面戰爭的風險，因爲北約和華約之間的對立不可能根本消除。歐洲部分因靠近蘇聯的政治、人口、經濟和軍事中心而成爲蘇聯國防的重點。蘇聯一旦陷入和中國的長期戰爭，必然導致自身力量的消耗而難以解脫，歐洲方面隨時都會給蘇聯帶來不測。北約和華約不可能達至什麼互不侵犯條約，也沒有任何互信基礎，無論出于意識形態方面，還是歷史文化的因素。

雖然毛澤東對美、蘇都信不過，但對自己的智慧和東、西兩大陣營之間的根本性對立還是有把握的。他高明地利用了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矛盾作爲自身的資源，適時地對準他們的“軟肋”痛擊。

今天回過頭來看，中國實際上是冷戰中最大的贏家。在這場當代“三國演義”中，以蘇聯解體，美國背上沉重的國債而收場。中國國力最弱，但却通過軍事和外交的手段，不僅全身而退，而且衝破雅爾塔格局，成功確立了中國的大國地位。

毛澤東敢于直面這一系列的威脅，概因藝高人膽大。

---

[1]據美國一些著作揭示，一直到珍寶島戰爭，蘇聯計劃對中國核打擊，美國政界才確信中蘇之間真的已經破裂，在這之前，西方不少戰略家懷疑中蘇之間所謂關係惡化，可能在策劃一個重大的戰略陰謀。這也反襯出赫魯曉夫和勃烈日涅夫這一代領導人戰略眼光的短視。



1976 年 9 月 17 日，瑞典群衆在斯德哥爾摩舉行游行和追悼會，悼念毛澤東逝世。這是游行隊伍舉著毛澤東遺像和紅旗，走向追悼會會場。

例四，蘇聯解體的强大推手

蘇聯解體的原因，很多人都會提到美國里根政府的“星球大戰”計劃，認爲是這一計劃帶來的軍備競賽拖跨了蘇聯。暫且撇開其它的原因，如蘇聯的內政問題等；就外因而言，沒有中國因素的存在，單憑“星球大戰”計劃就能拖跨蘇聯，是不可思議的。

自美國鼓噪“星球大戰”計劃至蘇聯解體，只有八年的時間。然而，蘇聯應付東部和中國接壤的邊界防衛則自六十年代中期就開始，在長達二十多年的時間裏，蘇聯不得不保持一支百萬大軍，專門對付來自中國的壓力（壓力總是相互的。從 72 年毛澤東和尼克松的會談內容可知，蘇聯在中蘇邊境的駐軍比歐洲部分還多）；同時大力支持越南，入侵阿富汗，以達到對中國的戰略包圍。中國雖窮，但畢竟是個大國，不同于美國在日本和韓國的駐軍。當蘇聯和中、美兩個大國（集團）爲敵時，必須爲同時應付兩大軍事强國的兩面作戰做準備。它人口數量、經濟規模、軍事力量和過分漫長的國境綫相比，難免捉襟見肘，也必然給蘇聯政府和國民帶來長期的心理壓力，并進而影響到蘇聯長期發展戰略的制定。因此，當赫魯曉夫帶著俄羅斯傳統的沙文主義色彩而得罪毛澤東時，已經決定了蘇聯必須面對歷史上最重大的戰略灾難。中國在東方的存在，從蘇聯的東方屏障和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强大對手，突變爲蘇聯東方的惡夢，使得蘇聯的國防負擔無論在物質上、人數上、還是在心理上，都成倍增加。而毛澤東在處理對蘇、對越（珍寶島戰爭，西沙之戰）和全球發展中國家關係上的强勢作風，更使得蘇聯不敢掉以輕心。同時代的全球政治人物

沒人懷疑：毛澤東是個什麼人都不怕，和什麼人都敢幹，且能幹贏的超級對手。北約擁有財富、科技和全球影響力，而中國擁有龐大的人口（意味取之不盡的兵員）、悠久的文化和民族凝聚力，膽大包天的領袖和不怕死的將士，以及在第三世界的國際影響力，這些顯然都是蘇聯的短處。這種四面楚歌的外部環境决定了，蘇聯的國力不論多强，也不可能持久。尤其是毛澤東啓動“乒乓外交”，拉近中、美關係之後，一加一大于二的局面形成，更加劇了蘇聯的國防噩夢。

今天，不少大陸學者對毛澤東失去蘇聯而對毛澤東的外交政策說三道四。我們無法確定毛澤東當初的想法。毛澤東當初對赫魯曉夫的沙文主義和意識形態言行不太客氣，當然有對沙文主義的本能反感，從他 1957 年訪蘇時對克里姆林宮的馬桶和床褥的諸多挑剔，人們懷疑他是對當年到西柏坡的蘇聯特使要求吃新鮮魚的報復；毛澤東這個“叢林裏來的戰士”（赫魯曉夫語）對生活可從來沒什麼奢侈要求。當赫魯曉夫提出在中國沿海建設潛艇通訊台時，更受到毛澤東的當面斥責。筆者認爲，毛澤東也可能是認准蘇聯不捨得失去中國而能做出些讓步，進而爲中國謀取更大的好處，以及在社會主義陣營裏取得平等地位。但他打交道的已不是斯大林，而是沒有戰略眼光的“二楞子”赫魯曉夫；這正是打麻將不找臭手的道理。而蘇聯在中國經濟最困難時要中國償還韓戰中蘇聯提供的軍火債務，加劇中國的饑荒；更表露了北極熊的無耻和不義，使得毛澤東對蘇聯徹底痛恨和失望。

但從長遠的和歷史的眼光來看，中、蘇决裂對中國的危害非常有限，但對蘇聯的危害是致命的。如果中蘇關係不破裂，中國也許會得到進一步的技術支持，但已不可能象斯大林的“蜜月時期”那樣親密；中國的國防負擔也不會那樣嚴重，“文革”也許

不會發生（其它政治和文化改造運動肯定會有）。但如果不割斷和蘇聯的聯繫，中國的核武器、航天工業等軍事和相關民用工業的發展不會那樣緊迫，當然也不會取得後來的巨大成就；中國工業的製造能力雖然有了初步的基礎，完全獨立地走向自我發展的道路將會推遲，後來中西部地區的大三綫建設高潮不會發生，或推遲發生（“三五”和“四五”期間完整工業體系快速建成，與中蘇决裂直接相關）；蘇聯的國防負擔也不會成倍增加，蘇聯的解體甚至不可能發生。當然，中國獨立的外交政策將難以實質開展，中美、中日及與其它西方國家的關係的改善將極大地推遲，進而影響到中國的全方位外交（中、美之間的不信任本來更嚴重，對抗更直接。中、美走到一起完全是由于來自蘇聯的威脅）。那麼，沒有中、美在蘇聯解體前二十年的合作，及由此建立起來的基本信任和瞭解，後來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和今日經濟的騰飛將不可想像（無論是經濟和商業管理理念，或者是後來的 IT 工業的能力，蘇聯都遠遜于美國。蘇聯只能在某些領域給中國技術援助，而中國從美國可以學到更多，雖然美國技術上封鎖中國）。蘇聯解體後，美、俄關係的似熱還冷，似親還疏，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沒有長期共同利益上的合作，要在兩個文化迥异、曾尖銳對立的大國之間建立起信任關係，談何容易。當蘇聯解體後，美國準備將槍口對準中國時，中美之間無論是民間交往方面，還是官方關係方面，都已經渡過了最初的童年期；看一下蘇聯解體後的布什政府高層和中國的友好交往歷史就明白了。而兩國人民之間的相互好感和認識，也有了初步的基礎。

當中國迅速崛起，中、蘇之間的摩擦不可避免，一是歷史和文化的原因，二是社會主義陣營“一山不容二虎”。 毛澤東在中蘇關係最好且蘇聯給予巨大援助的時候，也拒絕和蘇聯簽署邊界

條約，讓斯大林很不舒服。在蘇聯給予極大幫助的情況下，毛澤東却斷然拒絕蘇聯提出的在海南島建橡膠廠和在東北建罐頭廠的要求，除他老人家的民族主義情節，也可能與他對蘇聯的由歷史形成的本能不信任有關。他老人家也可能看准了斯大林絕不捨得失去中國。

蘇聯解體雖然讓世界和平受惠，但受益最大的實際上是中國，畢竟，中國的邊境上失去了一個强悍的對手。只有中共理論家和無知政客們才會有兔死狐悲的哀嘆。中國寧可單獨對抗美國，也不希望在中國的邊疆有個强大的蘇聯。美國肯定會令中國頭疼，但蘇聯則會讓中國亡命。“美國能够毀滅世界，蘇聯則敢于毀滅世界”（尼克松語）。

蘇聯解體，是俄羅斯幾百年來强烈沙文主義和俄羅斯民族强悍個性的必然結局。一百多年來身受其苦的中國，在不經意間爲蘇聯的解體扮演了必不可少的推手角色。在蘇聯解體後不久，正在北京讀書的筆者特意去了一趟毛主席紀念堂，告訴他老人家北鄰的巨變。這一結果雖超出他的意外，但其中有他的智慧和膽略，使得毛澤東的中國成爲蘇聯解體過程的主要外部因素之一。

順便提一下蘇聯解體後，中國錯失的一次潛在機會。

當蘇聯解體後不久（約 1992 年底），筆者曾給高層去信，建議借機通過購買或發動有限戰爭的手段，奪回從圖們江往東至綏芬河西岸的一小段領土（不包括海參崴）。目的在于：

一是爲打開東北的海洋出口，推動東北經濟發展，及木材、糧食、煤炭外運的便捷通道。使得黑龍江省不再是“盲腸”。

二是爲了切斷朝鮮半島與俄羅斯的地緣聯繫。中國尊重朝鮮半島的主權獨立，但任何强權在朝鮮半島的利益爭奪，均直接影

響到中國的重大利益，使得中國不可能置身事外。因此，如果切斷朝鮮半島和俄羅斯的地緣聯繫，將自然加重中國在朝鮮半島的分量，朝鮮半島將無須顧慮俄羅斯的利益和干涉。中國在朝鮮半島不需要謀求任何的特權，如果沒有外力的參與，朝鮮半島自身將不會主動挑戰中國的利益。

三是爲了大大縮短從中國領土至日本心臟地帶的空中距離，進而取得對日本的戰略優勢，爲未來解决臺灣問題、釣魚島問題上的對日威懾，創造條件。今天，從日本西部和硫球群島軍事基地至北京和上海的距離，要比中國山東和江蘇的軍事基地到東京的距離近很多。如果打開東北的通道，從東北的空軍基地至日本所有大城市的距離，將比從江蘇和山東的空軍基地至日本重要目標的距離近得多。這種距離的縮短對中國帶來的好處，和日本對我預警時間的挑戰將同步增加。

在中國政府沒有任何反應的情況下，後來又去信南德集團總裁牟其中，因他和俄羅斯作生意很成功，在俄有廣泛人脉，四架飛機的易貨貿易更使他名揚天下，且在發展滿洲里倉儲業務，以及委托俄羅斯發射衛星業務。他派了一位高層官員到訪筆者位于北京清華大學 19 號樓 407 室的宿舍，聽了上述分析，很感興趣。筆者向他保證：只要能買回這片領土，即使花一百億美元（當然分期付款），中央也會全額支付，南德無需花分文錢，即可掌控這片土地，并把它發展成中國最大的經濟特區。中央要的是國家的戰略利益，南德要的是商業好處。

雖然這一策劃似有理想的成分，但只要認真觀察一下當時俄羅斯的處境和人民的心態就會發現（蘇聯解體後最大的衝擊就是人們心理的瓦解），將這一策劃變成現實并非不可思議。對中國來說，這是千載難逢的機遇。只要中國在戰爭推進的同時，配合

外交努力的緩衝，不奪海參崴，不主動攻擊對方的城市，讓俄羅斯清楚中國戰爭的目標，那麼，發展成全面戰爭和核戰爭的可能性是沒有的。而這場戰爭因目標明確而有限，雙方都無意升級，因此，中國海空軍的劣勢不會太大影響戰爭的結果，中國陸軍的優勢將發揮作用。在俄羅斯貨幣嚴重貶值之時，百億美元也是足以令人動心的巨額外匯。如果軍事和銀彈攻勢配合應用，既讓俄羅斯看到保住這片領土的代價和難度，同時又有金錢鋪就的下臺階，那麼，問題的解決可能更易。這可能會令中國的經濟發展推遲五年，但相對于收穫，五年的損失是值得的。中國在强調“以經濟建設爲中心”時，不應該置寶貴機會于不顧。

很遺憾，機會稍瞬即逝，除了毛澤東複生，沒有人敢于嘗試筆者的這一戰略策劃。在當今的政治環境下，筆者明知不是作公務員的料，後來還是報考公務員，包括這件事在內的諸多因素發揮了作用。筆者從不謙虛地認爲：祖國將會因爲我而更好，將會因失去我而損失。知毛者，振也；知振者，何人?

後來聯合國計劃開發署提出在中、俄、朝交界的圖們江三角洲發展成東北亞的特區，令筆者終日提心吊膽：如果特區設在中國領土上，幷疏浚圖們江[1]，或中俄在波謝特灣或圖門江入海口共

[1]筆者長期感到奇怪：中國擁有圖們江主權，爲什麽沒有用来發展航運業務，以開闢東北的海運通道？蘇聯曾一再要求中國承認圖門江出海口屬于蘇聯，遭到中共歷届領導人拒絕 在蘇聯解體，中俄關係改善後，是否有可能開闢這條航綫呢？但驚聞如下消息，令人震驚和欲哭無泪：1999 年底，江澤民和葉利欽簽訂了秘密的《中俄全面勘分邊界條約》（因至今沒有在媒體公開報道此條約的細節，希望能進一步查證），承認圖門江出海口屬于俄羅斯，封死了進入日本海的通道。同時爲保住珍寶島而不惜丟失幾十個江心島（不保珍寶島沒法向全國人民交代，但他們以爲百姓都是傻瓜）。如果上述條約内容屬實，歷史終會唾罵第三代領袖。毛澤東之後十幾年這些人的骨頭就軟了。希望未來全國人大能否决這個條約，畢竟它還沒被全國人大通過，也就是說還沒有法律效力。

建港口，那麽這個計劃對中國有利；否則，中國不該參與。沒有中國的參與，該計劃就沒有成功的可能。看當時國內的權威輿論，對此一片叫好聲，甚至喊出“打造東北亞的香港”，真擔心冒出幾個有決策權的傻帽。至于如何打開東北的海洋出口，就看他們的智慧了。

例四，乒乓外交

當美國乒乓球隊提出訪問中國的要求傳到中央高層時，毛澤東讓周恩來和外交部對這一事件進行評估和研判，以決定是否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最後，周恩來向毛彙報了研判的結果：時機不適宜邀請美國人來訪。對此毛澤東陷入了沉思，最後乾綱獨斷，決定發出邀請。

今天重新回過頭來審視這一事件，不論如何贊美這件外交經典之作也不過分。在當時中、美嚴重對立的情況下，周恩來和外交部作出那樣的研判結果是非常正常的；而這更反襯了毛澤東的偉大和非凡。

然而，外交部門在評估國家的外部形勢和謀取最大國家利益時，如果不能作到必要的超越，是非常令人不放心的。即使看一下在過去十多年中共在外交和臺灣事物上的表現，就能明白，要達到毛澤東那樣的高度，還真的不容易。[1]

---

[1] 第二版補充：2015 年，印尼主動就南中國海九段綫西南緊鄰的納吐納群島做出主權聲明，中國對此機會完全沒有利用就循規蹈矩地宣布承認印尼對該群島的主權要求，這是又一次按照常理出牌的結果。筆者于 2015 年 11 月在博客 blog.sina.com.cn/nanyangbook（公衆號“南洋智庫”轉發）發表《中國在處理印尼納土納群島問題上的手法令人痛心》，分析了借此次外交事件中國可以抓住但却錯過的機會。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去公衆號或博客參閲。

例五，中美關係和對台問題上的戰略把握

臺灣《中國時報》報道了《基辛格秘錄》的部分內容，幷給予評論。其中提到：在對臺灣問題上，毛澤東在 1973 年和 1975 年兩次對基辛格提到“臺灣問題可以等一百年”，但强調一百年後非要不可，打仗也得要。值得注意的是，毛說這些話時，美中關係正常化停滯不前，雙方的關係已頗冷淡。此時毛的健康也很壞，講話已很困難了。毛澤東完全是從高瞻遠矚的大格局思考，那時中國的頭號敵人是蘇聯，在聯美制俄的大戰略上，臺灣自然退居次要位置，毛才說出“我們能暫時不要臺灣”的話。周恩來、鄧小平的眼光不如毛，所以會在解决臺灣問題上顯得急切，1972 年周與尼、基會談時，觸及和平解放臺灣時，就直接對基辛格說：要十年的時間解决這一問題太久了[12]。

從以上例子中不難看出，作爲大外交家的周恩來總理在毛澤東的智慧面前，總擺脫不了小格局的局限。毫無疑問，周恩來是舉世公認的外交家，是外交政策的一流操盤手，但是，毛澤東才是國際大戰略的一流玩家。當舉國人民把那麼多的贊歌獻給周恩來（周恩來也許無愧于這些贊歌），那麼多的指責和漫罵送給毛澤東時，是否曾自問：沒有周恩來，中國將失去一杰出的外交家和國家領導人，那麼沒有毛澤東呢？

中國將要失去的是更廣泛、更深遠的國家利益！

不，也許無所謂失去，因根本不可能得到。

毛澤東的令人敬佩，還體現在哲學、詩詞文章等方面。任何研究二十世紀中國哲學史的學者，都不可能忽略毛澤東的《實踐論》和《矛盾論》。在毛澤東的軍事政治經濟文章中，充滿了閃



为伟大领袖毛主席争光
为伟大社会主义祖国争光

光的哲學思辯。他的軍事思想更開創了新的戰爭形式，在未來相當長時間裏無人可以企及。當這些廣博的學問集中在一個人身上時，佩服已經不够，“崇拜”也就是自然的了。

至于詩詞方面，一首《賀新郎 · 別友》，通篇沒一個“愛”字，却使得詩人和妻子楊開慧的愛切情深布滿字裏行間，溢于詩詞之外；一句“眼角眉梢都似恨”讓中國最浪慢的現代言情詩人想“恨”而不知如何再“恨”。“戰地黃花分外香”（摘自《采桑子·重陽》）讓戰地詩人們回味無窮。即使從大學者如郭沫若、柳亞子和毛澤東的詩詞唱和中也能明顯感覺到毛澤東和詩的更高意境，和譴詞造句上的更深功力[1]。

就連香港的算命先生也驚嘆道：毛澤東真是高不可測！將開國大典放在下午三點後舉行極不合常理（人們一般將慶典安排在早上太陽升起後舉行，而沒人安排在下午太陽西下時），但却是一天中最好的時辰，主早年多波折，國運日隆之相（但願如此）[2]。

對毛澤東的崇拜在“文革”時期達到高潮。這時，崇拜浪潮已波及海外。如果說朝鮮對金日成父子的崇拜，連一水之隔的中

---

[1] 請參考毛澤東的《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和郭沫若原詩《七律·看〈孫悟空三打白骨精〉》，《浣溪沙·和柳亞子先生》和柳亞子原詞《浣溪沙》（1950 年 10 月 3 日）。

[2] 筆者 2016 年去暨南大學參加第十二屆《金瓶梅》國際學術研討會時，偶遇一老者，隨意聊起此事，他不僅知道，而且更多的內容從他口中流出。之後，他帶我去他住的酒店，將一本他寫的與毛澤東和共和國相關的書簽名贈我，并叮囑不可外傳。該書在香港少量上市後即停止銷售，以免造成誤導。看來毛澤東在天之靈，有意做此安排，自己早期引用的文字居然 14 年後與原創者偶遇，玄妙！

國朝鮮族人都不受影響的話，那麼對毛澤東的崇拜則波及外族。

據估計，“紅寶書”共發行了數十億册，成爲歷史上發行量最大的出版物之一。其中約有上億册由外國發行。中國政府對外宣傳上的一向笨拙，不太可能對推動海外崇拜浪潮産生大的作用。對毛澤東的研究及熱忱甚至波及美國和歐洲大學校園。在“文革”期間，毛澤東的著作是西方“左”派青年必讀的書，甚至一些學生團體利用節假日上街分發毛的“紅寶書”。清華大學就有數位當時從美國畢業後受毛澤東和他的思想感召而回大陸工作的臺灣學子。他們從不爲當初的選擇後悔，相反，他們對今日大學生只追求自我，缺乏信仰深感惋惜。在毛主席紀念堂籌建時，一位匿名的臺灣同胞甚至輾轉寄來了一個材質精細的大理石。今天，它已被雕刻成花盆永置于毛主席紀念堂裏。至少它說明了，即使在最反毛、反共的環境裏生活的中國人，仍然能對毛澤東爲中華民族所做的貢獻給予高度評價和崇敬。也許人們永遠不會知道它是誰寄來的，僅知道它來自于臺灣其實已經足够。

三、人民曾經的精神支柱



1976年9月10日，左翼青年在意大利羅馬揮舞寫有毛澤東語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的標語,悼念毛澤東逝世。

中華民族是一個含蓄而不狂熱的民族，即使對待宗教信仰也持追求實用但不執著的態度。但在毛澤東時代，這個民族却异常的狂熱，到底誰之過?

在海外期間有機會和來自菲律賓、泰國的小夥子接觸，他們

總要和我談有關毛澤東的事。一個菲律賓年輕人坦率地說："我最佩服毛澤東關于槍杆子裏出政權的理論"。五七年在莫斯科舉行的"十月革命勝利四十周年紀念大會"主席臺上，毛的魅力甚至讓東道主赫魯曉夫沒勇氣走在毛的前面，雖然赫幷不喜歡毛。基辛格在回憶錄中如此描述他見毛時的感受："我的孩子們談到流行唱片藝術家身上的一種'顫流'，我得承認自己對此完全感覺不到。但是毛澤東却的確發出力量、權力和意志的顫流"。法國前總統德斯坦評價到："現代社會的國家領導人幷不體現一種哲學思想。他們只是解决一些問題，諸如經濟、社會、軍事等等。法國人却認爲毛澤東體現了一種哲學思想，幷且努力地把它付諸行動。這正是我們對政治的認識。我們在 1789 年進行的'大革命'，正是爲了一種哲學思想。我們清楚地認識到毛澤東思想也正是使中國走向一種哲學，即給予中國人民最大的權力和最高的地位"，以及"由于毛澤東的逝世，人類思想的一座燈塔熄滅了"。七十年代初，某非洲國家元首訪華，因未能見到毛而泪流滿面地離開了北京。直到 2002 年的今天，委內瑞拉那位在政變中反敗爲勝的民選總統查韋斯，公開承認毛澤東是他的導師，毛澤東的著作是他的政治教材。

可以肯定的是，在二十世紀的世界政治舞臺上，沒有哪一位亞洲人像毛那樣受到全世界的一致推崇，也許幷不喜歡。一些西方學者就毛澤東的貢獻進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給予的評價之高超越受益最大的中華民族的學者們所給予的贊譽。直到今天，仍有那麼多西方國家的學者能超越意識形態，在瞭解了毛澤東的一系列失誤後仍給予毛極高的評價。作者對《决議》內容的懷疑，也是由《决議》通過後不久一篇法國人的文章引起的（該文刊登在《參考消息》上），文章作者直言不諱地指出：中國對毛澤東

的評價太低了。

從某種意義上講，毛澤東和中外歷史上的其他政治家、軍事家的一個重大不同點在于：毛不僅是一名軍事領袖或政治領袖，在相當長時間裏，他更扮演了中華民族精神領袖的角色；而這即體現了他的偉大，也賦予了過重的責任，同時也必然導致人民對毛澤東的長期精神追隨。也難怪，中國底層人民的苦難和無助，知識分子對國家命運的軟弱無力感，不可一世的文明故國所遭受的國破家亡的苦難，使得在中國這樣一個沒有明確宗教信仰的國度裏，在帝制消失以後，又多麼需要一個能凝聚全民的精神支柱。

而毛澤東的出現毫無疑問地填補了人們渴望已久的精神需要。毛澤東那厚實的肩膀，讓被洋人和地方官僚豪紳欺負怕了的中國百姓，暫時找到了安全的憑靠。而志士仁人追尋民族復興的百年悲歌，總算在毛澤東身上看到了凱旋的曙光。

中華民族在毛澤東時代异乎尋常的狂熱幷沒什麼不正常，它正是這個灾難深重、注重信義、知恩報恩的民族正常的反應。毛澤東作爲中華民族歷史上罕見的人物，在他身上體現了這個民族的優秀素質和豐厚的文化積澱。他在東方的出現引起一陣興奮和騷動是完全正常的。

“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第八章　中國人靈歸何處？



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宣传画，1965)

一、毛澤東對中國人的精神改造

要詳列毛澤東對中國人思想和精神的改造幾乎是不可能的。這種改造貫穿于毛澤東政治生涯的全過程。在長征期間，他利用一切機會，教導農民“打地主，分田地”，傳播平等和共産思想；後來建立新中國，他反對一切精英主義思想，通過一系列政治運動鏟除了一切特權，賦于民衆更大的權力，將中國建設成世界罕見的高度平等的國家，使得平民意識成爲中國的主流意識，爲中國未來發展的方向做了價值觀的鋪墊。

毛澤東同樣在中國傳統文化土壤裏置入了辨證唯物論的思想。從中、小學開始的政治課學習，馬克思的辨證唯物論都是必修知識，不論學生的宗教信仰是什麽，都不能避免唯物思想的影響。經過毛澤東幾十年的改造，今日的中國人雖然會靠近甚至加入某種宗教，但要完全剔除已根深柢固的唯物論思想已不可能。在美國的一些教會中，中國新移民的人數越來越多，但教會的神

職人員大都明白，要讓這些中國人虔誠地投入到宗教中，非不可能，但實屬不易。雖然唯物論思想給一些宗教的傳播帶來不小的挑戰，但也從根本上避免了迷信思想或宗教極端思想的泛濫。使得本來對宗教信仰就有著强烈實用主義色彩的中國人，現在要非常投入地信奉一種宗教，或像西方人那樣爲宗教獻身，變得更加困難。當基督徒宣稱上帝在六千年前創造了世界，中國知識分子不論是否反共，都會一笑置之。

當然，唯物論思想的傳播，因是自中、小學時代就已開始，因此對中國的回教徒等有宗教背景的人幷沒帶來很大的不自在，但却使得中國的穆斯林和基督教群體與國外相比，較多地表現出中庸的色彩。如果一個回教徒不表明自己的宗教傾向的話，中國的其它民衆已很難分辨出他們與其他人在個人行爲和價值觀上的明顯區別；而中國的回教徒在宗教儀式和生活習俗上，也不像其它國家的回教徒那麼嚴格（中國的回民被視爲一個少數民族，則是荒唐的。回民實際上是信仰穆斯林的各族，包括漢族，經過千百年融合的結果，如果按信仰分民族，那麼，佛教徒、道教徒和基督徒呢？因此，中國五十六個民族中應該取消回族）；如華東和華北一帶的回民，幷不忌酒，除猪肉外其它皆吃，女人也沒有帶頭巾的。對中國國家整體而言，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民之間具有較少的行爲和價值觀差异，無疑是個積極的信號，它有助于避免不同宗教信仰和不同族群之間的衝突；而這種基于宗教的衝突在世界很多國家幷不鮮見。

可以說，毛澤東時期奠定的辨證唯物論思想和平民化意識，已從政治的意識形態範疇溶入到中國的主流文化之中，成爲中華



砸烂千年铁锁链

文明的一部分。當年修建京滬鐵路時，因擔心動到龍脉而避開曲阜向西繞道兗州；這樣荒唐的工程方案再也不會出現了。

毛澤東在新中國建設時期推動的公有化和集體化道路，也直接帶來了中國百姓集體意識和公民意識的建立和强化。雖然集體主義思想是中國文化的重要內涵，但中國人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從來沒有像毛澤東時代那樣對集體主義有如此切身的體會。而集體意識是建立健康公民社會和大工業化時代必須的社會基礎。可以說，長期自給自足的封建社會帶來的中國人根深蒂固的小農意識，在毛澤東的領導下被終結。

在毛澤東的革命生涯中，對中國人思想改造影響最深遠的當數“文革”，以及伴隨“文革”而來的“破四舊”運動。關于“文革”前面已有論述，這裏詳細談一下“破四舊”的積極意義。

過去科學的落後，制約了人們對人類社會、自然及宇宙的認識，産生了無數的帶有宗教或迷信色彩的門派和相關信仰活動；各種文化的交叉融合，使得其中不少的宗教門派以强大的生命力延續下來；中國底層人民的困苦生活又爲這類宗教迷信活動提供了生存的土壤和理據。由于中國歷史的悠久，文明的延續，同時也積累和延續了大量的文化糟粕，影響著世代中國人的精神生活。

到了社會主義的時代，人民當家作主後，工業化和集體化運動要求思想覺悟的相應提高，毛澤東顯然無法容忍這些制約人民思想的封建文化和習俗繼續存在下去。“破四舊”運動的發動，既是對“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開展的一場革命。這場革命的動機和目標是顯而易見的。

毛澤東 1965 年回復法國前駐華大使馬爾勞的信中，就中國婦



姐姐，兄弟姐妹中最聪明伶俐，却没能上学，从6岁起照看弟弟，洗衣服，送他们上学。因一字不识，一个人出远门都难，更别说做生意了。如果“破四旧”和“文革”能早点开始，姐姐的人生将完全不同。毛泽东无疑是中国亿万女性和弱势群体的大恩人。

女解放的問題寫到：“從開始便給婦女法律平等，但到現在一切仍然有待完成。造成舊中國婦女地位低落的那些思想、文化和習俗一定要消失，而無產階級的思想、文化和習俗必須出現。中國婦女還未存在于群衆中；但他們已開始要求存在”[34]。這段信雖然是關于中國女性解放問題，但清楚地表露了毛澤東對“四舊”的關注和“破四舊”的部分動因。任何在中國農村生活過的人都能明白，毛澤東的這一論述極其準確地把握了當時中國舊思想的巨大不良影響。如：雖然當時讀書幾乎免費，但農村家長就是不讓女孩子上學，總認爲女孩讀書沒用，不如在家幫助做點家務，筆者的姐姐保華（父母六個兒女中唯一的女兒，排行大哥之後）、幾個姑姑和堂姐等一大批大家庭的女孩子成了這一傳統陋俗的最後一批受害者；但老爹却慷慨地花 150 元買了一架當時憑票也不易買到“上海牌”縫紉機，讓姐姐學習裁縫；這筆錢在當時足够資助兩個學生完成從小學到高中畢業的全部教育。而我的大哥和姐後面的四個弟弟都有機會接受教育。（家鄉靠近曲阜，傳統的力量尤其巨大。毛澤東敢批“孔老二”實在膽大，但實屬正確，儒家思想帶給中國文明的秩序，也帶來不少負面影響。）

“破四舊”的積極意義是，它以政權的力量推動了廣大人民群衆從一些極爲落後的風俗傳統和精神枷鎖中解脫出來，表現了其革命性的一面。

在“文革”之前的北方農村，每逢春節，晚輩都要給長輩叩頭。面對越來越多的長輩，年輕人越來越頭疼，因他們實在心疼

自己的那條過節日才捨得穿的新褲子。聽父母講，一個春節下來，硬是跪的兩腿酸痛；那些輩分低的人就更別提了，因全村大部分人都有資格接受他們的磕拜（讀一下《金瓶梅》，對中國民間的這一磕頭陋俗就會有更充分的瞭解，拋開裏面的色情描寫，該書是中國傳統生活方式的“百科全書”）。除了給活人拜，還要拜祖先。還不能忘了那衆多請到家裏的“爺”，如老天爺和老天奶奶（人們有板有眼地說這對最偉大的神聖夫妻姓張，當然端坐在堂屋正廳；估計是姓張的編造的）、財神爺（設在堂屋裏的門後，有求財不露之意）、灶王爺（設在廚房裏，臘月二十三號重點照顧對象，要好好給祂老人家拜拜，因爲這一天他要帶民間調查報告上天庭彙報，從小就聽我爹講，這天要念“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二十三日去，三十五更回”，得罪灶王爺，祂在老天爺那裏說您點壞話，可不是鬧著玩的）、牛王爺（一般設在牲口棚裏，保證你養的牛肥馬壯。中國祖先太人道主義了）……。白天還必須叩拜衆多的廟，在筆者家鄉附近三公里之內就曾有觀音廟、牛王廟（拜牛王爺的）、泰山廟（拜泰山或東岳大帝的）、關帝廟、土地廟（拜土地爺的）、火神廟（拜火神爺的，這是很厲害的神）等，不出 7 公里還有城隍廟、天宮廟和一間龍王廟（拜龍王的，較大的河流旁邊常有這種廟）等。翻一下中國地方地圖，就能發現那衆多叫“什麼廟”的村鎮，就是圍繞當地的廟宇形成的地名。山東一帶直到“文革”之前還有“朝泰山”的習俗，老人和家長要走幾百里去泰山朝拜（《金瓶梅》中的西門慶大老婆吳月娘去泰山朝拜，就是這一習俗的寫照。可見，不論文化精華還是糟粕，都極具生命力，沒有强大政治力量的介入，五百年後中國人還在去拜泰山呢！）。千百年來，中國人就是以這樣的方式生活，哪個“爺”都不敢得罪，哪個廟都不敢錯過。

毛澤東來自社會的地層，他能忽視這一社會現象嗎？當他帶領中華民族向現代化邁進時，還能容忍這種陳規陋俗繼續對人民思想和行爲的鉗制和束縛嗎？他揮舞巨大的拳頭將這一切打碎，將人民從落後和愚昧中解脫出來。如果不是政治力量的强制介入，以中國人的厚重傳統和中庸性格，不太可能解脫得如此迅速和徹底；好面子的中國人，誰也不願意被說成不懂規矩或沒有教養。

但除了毛澤東這樣的領袖，中國乃至世界歷史上，又有誰擁有這樣的能力、遠見和魄力，來推動這一影響全人類四分之一人口，對延續幾千年的强大傳統習俗的偉大“造反”運動？唯有毛澤東！

當今信仰迷失，以及人民的信仰重建，則是另外一個問題。不可能要求毛澤東具體告訴我們到底是拆除觀音廟呢，還是拆除火神廟？在毛澤東時代，他爲人們提供了充實的信仰，人們幷沒有因摧毀了泥佛土廟而承受精神上的痛苦。

今天，陝西某村又建了一座廟，其中供奉的是毛澤東像，北京的汽車司機也在擋風玻璃處挂了毛澤東像，據說可以保平安。可以肯定的是，毛澤東本人的豐功偉績和創造的精神食糧，使人們對其他“神”的依賴大大減弱。今天人們對毛澤東自發的祭拜，在于毛澤東一定程度上成爲人民需要的精神寄托對象，這幷不是偶然的，實際上不過是毛澤東逝世前已有的精神寄托基礎上，經過二十年社會變遷和考驗後，人們精神的一種回歸和延續；尤其當今中國社會的亂象，領導人的軟弱無能，更讓人們對過去那尊穿中山裝的“神”深深地懷念。當然，要比原來的“崇拜”理智和現實的多。

當毛澤東逝世，尤其是全面否定“文革”之後，人們在精神



上陷入一種脫節狀態，在新的信仰體系沒有確立之前，人們的價值觀在部分保留原來的社會主義價值體系基礎上，也進入了一個相對迷茫的時期。尤其是商業社會的來臨，貪污腐化和特權思想的返潮，人們昔日的“革命理想”變得越來越稀薄，而改革開放後進入學校的年輕一代，已將“個人實現”放在了首要地位，“信仰”已變得無足輕重；可當人們失去了信仰，對個人欲望的實現這種自然屬性的側重，也就是難免的了（第二代領導人其實也有意識地引導人們走發財致富的路，而且不擇手段，從國企改制，到貪污腐化，真個是“黑猫白猫，抓住老鼠都是好猫”；直白一點講，您只要是撈到錢，搶到財富，不論是采用改制還是混合所有制，就是充分解放思想的榜樣，“三個代表”中至少你能抓到一個）。今天有些人將信仰迷失的責任歸咎于毛澤東和“文革”，根本是顛倒黑白。至少，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和弱勢群體絕對不接受這種對毛澤東的誣賴。

毛澤東時期對人民思想的教育改造難免有些粗糙的地方，但卻是千百年來對中國人精神信仰的一次大清洗。只有將那些毒害和鉗制人民精神的迷信內容徹底或大部分鏟除，才能爲建立更健康的信仰體系創造一個“乾淨”的環境。沒有毛澤東時代對人民思想的“革命”，在中國這樣地域遼闊的國家裏，各種邪教或會道門都可輕易找到乘隙而入的機會。象臺灣這樣一個高度發達的小島上還曾發生過以宗教騙人的事件，何況人民整體教育水平不高的大陸呢。

簡單比較一下世界上其它文明古國的人民，如埃及、中東、希臘、印度等，至今受制于傳統習俗，而現代化思想的傳播卻困

難重重，就不難明白毛澤東對中國人思想改造的巨大成就和意義。瞭解了這一點，我們不能不爲中國曾擁有毛澤東這樣的領袖而感到驕傲和僥幸。人們也許爲“破四舊”中被毀掉的破廟和幾幅近現代名家的字畫而傷心；中國藝術精品層出不窮，但幾千年來又有哪個皇帝在認真切實地推動民族思想的進步改造？和整個民族的精神解放比起來，那幾件名家字畫或拆除的廟宇又算得了什麼呢！？（毛澤東推動“破四舊”本身沒錯，也產生積極的效果，但在執行過程中被一幫執行者把“經”念歪，導致一些文物被毀，是令人痛心的）

另外一個值得參考的資料是：隨著毛後時代人們道德意識的降低，90 年代以後文物被盜的數量比過去幾十年被毀的文物多出數倍，而且價值要高得多。但卻沒有領導人爲此受到指責。


現代民間自發的對毛澤東的供奉與崇拜

二、中共對待人民精神需要的誤區

筆者長期受共產黨教育，自認爲是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當看到他人燒香拜佛的時候，既沒有嘲笑（這是基于對他人信仰的一份尊重），也沒有特別的感受，更談不上認同。筆者也參加過一些不同宗教的宗教集會，看過一些宗教類的書籍，但是以更好瞭解他人或其它國家的文化背景爲目的。但人生中的一段特別經歷，才促使筆者對宗教，尤其是中國人的信仰危機和出路這類重大課題，有較直接的感受和較深入的思考，也促成了本章內容的



新加坡四马路观音堂

寫作。

1998 年中，當從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博士後出站後，面臨未來個人發展方向的選擇[1]。由于博士和博士後期間的研究方向較爲“邪”門，發展前景暗淡，對在工業界求職也沒有任何幫助。而自大學一年級開始的作公務員的夢想又看不到實現的可能。同時，個人經濟上也面臨嚴峻的困境。這是筆者人生中最暗淡的一段時光。唯一能給予鼓勵的是那句老話：“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弗亂其所爲”。在短短的幾個月裏，除了沒挨餓以外，差不多全經歷了。一位在困難中給于物質和精神支持的老友感嘆：“你真行，居然還笑得出來”，概因“天降大任”這一空頭支票的鼓勵（中國文化的偉大也許正體現在這些人生哲學上）。本書的雛形（即《爲毛澤東辯護——兼談鄧小平的歷史責任和本來面目》

[1] 在讀博士期間，曾聽清華大學微電子所副所長做關于中國集成電路工業的報告。這個講座彌漫著無奈和焦慮，中國集成電路工業看不到追上發達國家的希望。1998 年在南洋理工大學博士後出站前後，我向新加坡所有的大型半導體公司寄簡歷，希望以自己機械和電子等多個領域的知識來認識和探尋中國半導體工業的發展道路。但當時趕上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企業聘請新人很謹慎，而我的學歷高，却沒有半導體行業學歷和經驗，沒有企業聘我。直到 1998 年秋，看到一個美資半導體公司招聘操作工，我才隱瞞碩士和博士文憑去應聘，最後獲得個助理工程師的職位。并在半個月後抓住機會，以自己的機電一體化的能力在二十分鐘修好一台全自動晶圓洗刷設備而證明自己的專業素養（該設備癱瘓幾個月了，製造商來人都修不好，在我的請求下，那位獲得美國電子電器博士文憑，在德州儀器工作過的老闆允許我這個機械系本科背景的助理工程師去撞運氣），在老闆大感驚奇時，我才亮出博士文憑，從此開始了 4 年半導體行業的工作。直到該書第一版找不到出版社願意出版，自己無奈成立出版社來出版此書爲止。這次經歷是自己國家情懷的一次體現，同時也證明，個人能力而不是名校文憑才是立足的根本。

這篇八章網文）就是當時花兩周的晚上完成的。那時能深刻體會爲什麼司馬遷不坐牢就不可能完成《史記》。當然，筆者無意鼓勵把所有的才子都關進監獄。

這種無業的日子持續了一段時間後，“當世孔明”已束手無策；在老友的鼓勵下，决定求助于宗教的力量。

對一位無神論者，深感爲難的是該去基督教堂還是去佛堂呢？曾參加過不少基督教集會，也和朋友一起“禮拜”過，可能因爲對《聖經》中一些內容不能得到滿意的解釋，也可能因當今世上有太多虛僞的基督徒，影響了對基督教堂的選擇；中國世俗文化受佛教的巨大影響，這時發揮了關鍵的作用。最後去了位于新加坡四馬路的觀音堂。當時筆者的緊張程度决不亞于第一次和女孩約會，雖然那位慈眉善目的觀音娘娘比那個女孩好伺候的多。

可是，當人進得廟裏，香烟繚繞之間，突然虔誠起來。上香三支，跪拜搖簽，得一不錯的簽，言及時運不到，機會在秋冬等。當筆者試圖在電腦上鍵入該簽幾十字的內容時，連續死機三次，無法存盤，甚爲罕見，可能天意不可泄之故，故不能抄錄于此，難以與讀者分享。

當天的中飯不禁胃口大開。然而，回到家後即陷入了沉思：筆者對共産主義理論的認識不可謂不深，加入共産黨的那份一晚完成的幾十頁《入黨申請書》，被一向嚴格的系黨委副書記稱爲幾年來最好的入黨報告；筆者的入黨也是經過長期的考慮和思想準備後提出申請的，絕非那幫政治投機分子可比。本人對于共産黨理論和國際共運的書籍閱讀量也不會亞于中央黨校的畢業生。然而，在筆者最困難的時候，這份信仰沒有發揮任何的作用，無論是《共産黨宣言》，還是《中國共産黨黨章》都不能帶來點滴的安慰；至于“全人類實現共産主義的偉大理想”更不可能帶來

任何的精神鼓勵——自己面臨人生的困難關頭，哪還有工夫幫助全人類實現共産主義?

這次經歷讓筆者不禁頓悟：一個國家擁有全民一致的政治信仰無疑能推動國家的進步，但如果試圖讓政治信仰在人民的精神領域裏發揮統治作用，將是非常不切實際的。最終的結果是，人們對政治說教的厭煩，和精神世界的迷失。而今日中共中央的錯誤就在于：繼續試圖以政治的信仰强迫代替精神屬靈的那部分內容；而政治信仰越來越没有動員功效的情况下，人們精神依歸的不知所向，就在所難免了。

因此，如何重建中國人的精神世界，應成爲中共中央當前的新任務，它的重要性當不亞于“以經濟建設爲中心”的戰略任務。爲此，中共中央必須跳出傳統的意識形態範疇，以更恢弘的視野，看待人們的精神需求。

對鄧小平提出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中的兩個基本點應修改爲：推動社會主義的政治信仰和建立中國人持久的、健康的精神信仰體系。

筆者一直將上述經歷視爲天意。因爲“天降大任”，先令筆者困苦不堪，然後進得廟裏，再後來突有感悟，爲世人揭示當今中國人的精神出路，意義自然非同小可。“天”的智慧在于没有去選一位脾氣暴躁的反共人士，或對中國人整體命運漠不關心的傢伙，而是選了一位有點見識而又憂國憂民的共産黨員。不過，筆者對“天”的這份“厚愛”實在感到恐懼，以後再有什麽需要“厚愛”的話，去找別人吧。

中國燦爛的傳統文化基本能解决當今中國人面臨的大部分精神世界的問題。如，本人上述



經歷，當時非常後悔之前沒有花點時間去研究一下老莊哲學，如果能對《周易》有所認識，可能會帶來更直接的幫助。

而中國傳統文化的特點在于其實用性。中國重要的哲學著作《道德經》只有幾千個字，其分量不亞于西方任何的哲學體系。《論語》、《莊子》等都是薄薄的一小本。學術界也可能會討論它們的宗教性或哲學性，但對學術圈以外的中國人來說，它對人們普世價值觀的塑造確是直接和有效的。

被全世界“左”派政黨視爲最高哲學體系的馬克思《辨證唯物論》，提倡世界的本原是物質的，物質是運動的，運動是有規律的，規律是可以被認識的等，然後還給出了一個對規律認識和利用的方法論體系。至于馬克思哲學體系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指導人類的活動，它的可操作性如何，是令人存疑的。而馬克思哲學體系對人類精神活動的指導沒有多大價值。但《周易》就不同了，不管是唯物還是唯心，是物質還是意識，完全忽略一切表像的內容，在這裏世界由陰、陽組成，表現了比馬克思哲學體系更高的概括性，更能表現出哲學對普遍規律的研究目標。至于世界萬物怎樣組成，靠八卦和六十四卦推演而出。筆者在學習電腦理論課時，發現用 0 和 1 來表達八進制數的表達方式居然和八卦完全相同，在模擬信號數字化成功，幷可以通過電腦來對大自然各類運動或現象進行運算處理和預測，實際上意味著 0 和 1（在易學裏就是陰和陽）是可以用來描述世間一切事物，幷可以進行運算的。我們老祖宗的這個具有極高可操作性的哲學體系與當代電腦技術高度吻合，馬克思那套理論乃至當代各派哲學體系，相對來說，過于概念化而有失可操作性了。

至于用《周易》“算命”是否可能，如果按馬克思哲學體系推論，人的命運如果是一種運動的話（當然是），它當然是有規



1974年作

律的，既然有規律，當然是可以認識的（否則就陷入反動的不可知論），因此預測人的命運也是可能的。筆者的這個推論曾讓一位嚴肅的黨委書記不知所措，也肯定讓“左”派原教旨主義理論家感到痛苦。很顯然，《周易》在可操作性方面，比馬克思哲學强得多。當然“易學”幷不是僅僅用來算命。但《周易》已被打入純粹的學術領域，或在民間被引入“胡亂算命”的歧途，其哲學的內核已被忽略。

當今中國的整個教育體系已將教育定位在純粹解决現實科技和社會問題能力和謀生手段的培養上。如果說系統性的人文教育，也是以意識形態的考慮爲出發點，這直接導致了當今中國大學生知識結構上的嚴重缺陷——中國人的人生觀和世界觀方面的殘疾。理工科專業培養出的大部分是高級技工。而社會科學培養大量脫離實際的自大狂。

今天人們信仰的迷失幷不可怕，可怕的是，理應肩負起人民教化職責的中共中央和中國政府無視這種“迷失”的存在，而繼續以毛澤東時期的政治宣傳手段對人民進行洗腦。問題是，今日的中國政治環境已今非昔比，今日的政治人物，如果不讓老百姓討厭的話已經是萬幸。昔日毛澤東曾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人民的精神支柱，人民對毛澤東的教導有一種宗教般的虔誠，不論毛澤東的教導是否正確，人民畢竟有了一個精神的憑靠。但今天人民對于中共中央的宣傳已具有一種本能的抗拒心理。在這樣的環境下，能把政策宣傳下去就已經不錯了，還奢談什麼精神革命。

中國共産黨在自身文化定位時，所犯根本性的錯誤在于只看到“共産黨”三個字所代表的意識形態內涵，而將“共産黨”名


少數民族地區供奉毛主席像

字前面的“中國”兩個字給忽略了。這兩個字決定了中國共產黨不同于其它共產黨的特點，也決定了中共的意識形態必須以中國的文化爲基礎，否則，中共在文化上的角色便成了無本之木，無源之水，中共的理論體系和說教也自然成了空中樓閣。今天的事實已經無可辯駁地證明了這一點。[1]

當前國家的法制化建設只能爲人們 5%的日常行爲制定規範，但 95%的內容，法律無法觸及。法律可以告訴人們不能做什麼，但無法教育人們應該做什麼。只有信仰的建立，無論是宗教的還是世俗的，才能爲人們的行爲提供有效的規範和引導。當沒有任何信仰時，人們的行爲將很少受到約束，私欲橫流難免，那麼，中國這樣一個人口龐大的社會就未免有些太可怕了。（其實看一下南洋出版社出版的書如何被猖獗盜版，而本應明是非的讀書人却毫不在乎地去購買盜版，就可以看出，中國文化和信仰轉化爲人們自覺行動，還有漫長的路要走）


廟中供奉毛主席像

中共中央必須在新的政治環境下，以新的思維方式，尋求精神和道德重建的新出路。

[1] 本章的大部分內容爲第一版所寫，在第二版出版時沒做大的改動，雖然第五代中央領導集體上臺以來，大力推動優秀民族文化建設，本書第一版的內容也沒必要隨時代而修改，畢竟該書的目的是研究歷史，而不是隨時代需要而動。不可否認，本書 2003 年出版時，本書觸及的諸多社會問題是非常嚴重的。

三、中國人的信仰重建和宗教改革

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整理，去粗取精，并以學校教育等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開展對中國傳統文化精髓的教育學習，應是中共必須著手開展的工作，這實際上也是中共“三個代表”之一——“代表先進文化”的具體體現（誰敢說不先進？）。

對于中國部分知識分子而言，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容，已能很大程度上滿足他們對精神引導的需要。傳統知識分子不少報著“既讀聖賢書，何須敬鬼神”的自信。孟子更狂言：“華夏之無君，勝夷之有君”，正是建基于這種對中國文化教化功能和華夏民族文明程度的信心。但對絕大多數受教育程度較低的中國人來說，《四書》、《五經》可能還不够，這是世俗文化的功能性缺陷所至；宗教則可扮演補充的作用。當然，也只能是補充輔助的角色。中國在 1949 年前大量帶有宗教色彩的學校，在今日的中國已不再需要。至少在年輕一代中國人的思想中置入世俗文化的豐富內涵，對他們識別、抵抗迷信和邪教的誘惑是必要的。至于他們成人後的信仰選擇，會以他們較爲成熟的心智作出判斷。

與世俗文化的教化作用相比，宗教的力量在某些方面顯得格外突出，并能爲社會提供特別的精神需要。

一門宗教往往包括下列基本結構：一、該教的偉大或合理性，對人前世、今生和來世做出揭示；二、勸人向善和忍讓，如果加入該教且遵從教規，揚善止惡，會有哪些好處；三、如果不加入

該教，或不向善，會有什麼可怕後果。

上述宗教結構，造就了宗教的强大功能，第一點構成了宗教的美麗外衣和吸收教徒的功能，也構成宗教的神秘感和威懾力；第二功能構成了宗教對推動社會進步的正面作用，也賦予該宗教高尚的道德形象；第三功能則直接針對人類的自私本性和懦弱，做出强力的規範和制約。尤其是第三點，爲世俗文化所欠缺。正是第三功能的存在，才導致第二功能的有效性。

宗教的强大生命力在于它的出發點：人是自私和野蠻的，而同時又是可以教化的。宗教不同于世俗文化，它絲毫不回避人類的本能弱點。宗教必然有唯心的成分，否則，它的力量也就不存在了。

當然，這幷不是說將宗教在中國的傳播和管理完全放開。爲了充分利用宗教的教化功能，而同時避免宗教傳播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無論中國政府還是宗教界人士，或社會科學工作者，都可以有所作爲，共同構築中國自由、健康、多樣化的信仰體系。

就中國當前宗教的傳播來看，中共各級黨委對傳統宗教采取了嚴格的限制，如禁止建設佛堂或道觀等，但同時，基督教各派別在民間的傳播則沒有受到太大的干擾，這對佛教和中國傳統民間宗教的傳播是不公平的。那些追隨羅馬教廷，而不接受中國天主教“三自愛國會”領導的天主教徒，另當別論；對他們的活動進行管制是必要的。畢竟聽命于羅馬教廷的天主教會，曾對中國人民作過太多的壞事，聲譽已壞，豈是旦夕可以恢復？2000 年，梵蒂岡不顧歷史事實和中國人民的感受，對那些于過去一百多年中在中國幹盡壞事的神甫封聖；羅馬教廷在蘇聯解體方面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天主教徒的執著和對教廷的無條件服從，等。所有這些不能不引起中國政府和人民的謹慎。

下面就各主要宗教在中國的傳播、問題及出路，做進一步分析。

中國繽紛多采的民間信仰暫不多談，它們構成了中國民俗文化的一部分，如拜關公、財神、媽祖、灶王爺等，有些被納入道教，而有些則是以“散兵游勇”的方式在民間“活動”。筆者反對將此簡單列爲迷信。實際上，如果沒有了這些內容，中國文化的哲學內涵不受太大的影響，但文化的平民性和表像將肯定受到破壞。筆者家鄉每到過春節時都要有一系列祭拜活動，極大地增加了節日的氣氛，使得春節成爲不同于一般日子，擁有濃郁民族特色的節日。尤其當筆者在城市度過幾個春節後，更加思念家鄉的春節。雖然本人總是破財，但幷不影響過節時給財神上柱香的積極性，這是人們求個吉利的方式之一；至于財神是否肯幫忙，那就看祂的了。

首先談談基督教，包括新教和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及值得注意的問題。

基督教傳入中國是在唐初，當時叫做“景教”，後來唐武宗滅佛，景教也一同被滅。至明朝時以利瑪竇爲代表的西洋傳教士東來，基督教才又登陸華夏。至于基督教在中國的貢獻和孽債，讓專家去研究吧。不可否認的是，基督教已經成爲中國流行宗教之一。尤其最近三十多年，在中國政府及文化界賣力宣傳西方文化時，不小心拉近了基督教和中國人的距離。基督教已逐漸深入到偏遠的鄉村。筆者家鄉的小村莊也有了基督教團體，筆者的奶奶、伯母等 20 多位中老年人成了最初的基督徒，這給筆者提供了機會，以近距離觀察基督教在中國傳播的方式、特點和效果，也

產生了一些擔憂和希望。筆者在海外期間頻繁接觸基督教，是希望通過觀察和比較，發現基督教可能給中國帶來的問題和影響。當然，這個全球十億人信仰的宗教，其對推動人類進步的作用是不應該被否定的。

但必須肯定的是，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和在歐洲的早期傳播肯定有所不同。因爲，基督教進入歐洲時，歐洲幷沒有强大的文化體系可以對抗，而基督教的傳入則極大地豐富了歐洲人民的精神世界，推動了歐洲文明的進步。而今日的中國則擁有强大、系統、根深蒂固且極具生命力的文化基礎。也就是說，中國的基督徒不論對基督教多麼虔誠，都不可能避免中國世俗文化對價值觀的影響，甚至是居主導地位的影響，不論中國基督徒是否承認這一點。只要將一位歐洲基督徒、一位中國基督徒和一位不信上帝的中國人放在一起，就可輕易發現，那兩個基督徒之間擁有比兩個中國人之間更顯著的不同。雖然我接觸的華人基督徒都拼命感恩耶穌，而不是孔子。

就傳播方式上來看，基督教和伊斯蘭教是最具有强烈進攻性和排它性的宗教，因此也導致了至今未了的宗教衝突。只有自己的是正宗，其它都是迷信或邪教，要徹底摧毀（在《聖經》上類似“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恐怖字句多處）。正是基督教的這一特點，導致歷史上一系列對人類其它文明的摧殘甚至毀滅。如，古羅馬帝國對埃及圖書館藏書的徹底銷毀，切斷了埃及文明的延續；西班牙登陸中南美洲後對當地异教徒的屠殺和對書籍的焚毀，使得中南美洲的燦爛文明淹沒在歷史的長河裏，留下人類文明的永久傷疤。在人類文明的幾大源流中，已有兩大源流被基督教所切斷。

也正因爲如此，當今基督教傳播雖然已沒有了過去的血腥，但引起宗教衝突的根源是值得留意的。筆者對此產生高度警惕是由以下事件引起的:

筆者的伯母加入教會之後，請教會人員到家裏“清理門戶”。結果，所有與基督教信仰相衝突的祭拜物品全被拋弃，包括祖宗牌位、香台、灶王爺像等；春節等節日也不再擺貢品，門神也不貼了。這引起了家人的極大不滿，尤其是高齡的伯伯對不拜祖先很是惱火，節日的情趣也蕩然無存。伯伯後來一病不起。他兒子氣憤地講：“宣傳‘在主’（即：信主）的人什麼時候能死光啊！”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在這個小家庭裏變成了現實。至于當初她和筆者的奶奶是如何被基督教吸引進去的，說來可笑，和法輪功的宣傳手法類似；就連當地的小孩都學會唱“在了主，不生病，不受苦，不打針，不吃藥……。”這沒法不讓高齡的婦女著迷。這些從沒讀過書的人，總算學會了一個字——“十”。

後來在海外參加的一些基督教活動，教徒們都或多或少地表現出自身宗教的優越感，這沒什麼，但也都表露諸如“佛教、道教搞迷信”之類的語言。很顯然，基督教的這種傳播方式和對其它宗教的態度，與過去對埃及和美洲文明的摧殘相比，具有不同的程度，但有相同的性質。

因此，基督教廣布華夏帶給人們精神充實的同時，如果也爲國家、人群、家庭帶來文化的衝突和打擊，中國的民俗文化因此而被“清理門戶”，那麼，基督教對中國的登陸就未免有些敵意了。畢竟，在過去的幾千年中，沒有基督教的哺育，耶和華神的眷顧，炎黃子孫們生活得很好，甚至避開了西方和中東兩千多年來綿延不斷的宗教戰爭和思想壓迫。就讓他們的後代死後都去地

獄吧，中國的列祖列宗因不信上帝和耶穌都去了地獄，他們的子孫理應到地獄陪伴在側，幹嗎非要去天堂享福？他們在現世能不因爲信仰而吵架已經不錯了。

從宗教寬容性的角度來看，基督教和伊斯蘭教排它性較强。佛教從來不談其它宗教的長短，不論對誰皆以慈悲之心待之，大乘佛教更“高尚”到要普渡衆生。相對來說，基督教只“渡”信上帝之人，而不信者皆被打入地獄，不論他是否象雷峰一樣勤于助人，樂善好施；這還不罷休，最後還要末日審判；至于信上帝者，即使犯十惡不赦之罪，也有進天堂的機會，這多少降低了基督教的社會教化作用，甚至道德形象；因此在過去兩千年間，西方基督教國家之間和對外域的殘酷侵略就不令人奇怪了。道教更寬容得徹底，在新加坡的道教場所，甚至擺放著專門介紹孔子和耶穌的小册子。道家追求反樸歸真，回歸自然，與儒家的禮教思想有些對立，老子更不客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令孔子的門徒可能不太舒服；但正是寬容精神的廣泛存在，使得文化百家和各宗教流派能在中國大地上和平共處。很難想像，如果先知穆罕默德嘲笑諷刺耶穌，這兩大教派之間的衝突將更加嚴重。由于耶穌爲猶太人所害，看一下基督教徒兩千年來對猶太民族的態度就明白了。

因此，基督教的上述問題如何面對，基督教如何傳播和發展，是基督徒、文化界和中國政府應認真對待的課題。當然，最後起决定性作用的將是基督教會本身，如果中國政府不强力規範的話。政府被迫出面，顯然是最糟的處理方式。

任何一位基督徒讀到這兒都不應懷疑，筆者對基督教沒有任何的偏見或惡意。佛教傳入中國對豐富中國文化和教化人民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樣作爲外來宗教的基督教，沒有理由受到中國的

刻意排擠。如果它能像佛教一樣完全溶入中國大地幷促進道德水平的提高，這肯定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

另一個發現使筆者保持對基督教在中國傳播的高度熱情：在老家雖然發生了上述伯母家不愉快的事，但大部分信徒在加入教會後都有明顯的改變，甚至一些性格怪异、自私自利的農夫，在加入後變得樂于助人，懂得忍讓。因此，筆者每次回家都會勸一些經常吵架的小夫妻加入教會（當地缺乏有組織的佛教團體）。基督教的強大教化功能是筆者看重的，本書對基督教的嚴苛剖析，只希望它能變得更加完善，爲滿足中國人的精神需要提供一多樣的選擇，做出更好的貢獻。

關鍵是，基督徒們是否爲此做好準備，還是準備在中國對其它信仰和民俗文化趕盡殺絕?

筆者出于對中國人信仰的選擇，和基督教在中國與其它文化的“和平共處”，特向一些博學的宗教人士請教：“《聖經》是否可以做些改寫？”“基督教可否象佛教那樣不否定（當然不須肯定）其它信仰？”、“對中國人來說，拜祖先是傳統民族文化和道德的一部分，貼門神雖有鬼神傳說的背景，但畢竟是民族文化一部分，對此基督教可否持寬容態度，甚至自己家過春節時也貼上門神以渲染節日氣氛？”、“基督徒甚至反對祭孔，是否有點忘本的嫌疑？”……。

如果基督教會不能很好地處理上述問題，文明的衝突，以及自身信仰和教育背景的衝突將是不可避免的。

筆者結識的一位新加坡三一神學院的神學博士，對上述問題的答覆是：“《聖經》不可改，沒有任何錯誤，因爲那是上帝的活動和談話的記錄”，“世界只有唯一真神，其它宗教什麼都拜，確實是錯的”，“信上帝就不能再拜祖先、孔子和其它”……。

後來從其它基督徒得知，這種說法是所有基督徒的共同答案。

至于《聖經》不可改，以下內容至今沒人給出合理解釋[1]：

例一，《舊約聖經》“創世紀”第一章開頭：“起初，神創造天地。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

因起初地是混沌狀態，從後面的段落中可以看出，此時“天”還沒有產生，空氣和水還沒有分開（後面的第六段寫道：“神說：‘諸水之間要有空氣，將水分爲上下。’神就造出空氣，將空氣以下的水、空氣以上的水分開了。事就這樣成了。神稱空氣爲‘天’”），因此，在起初不可能有水面的存在。只有在有了“空氣”後，水面才可能產生，“地”不再“混沌”。

例二，《舊約聖經》“創世紀”第一章第 26 節，“神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象，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神就照著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這裏有兩個問題，一是“我們”指的耶和華和誰？得到的解釋是：三位一體，“我們”包括耶和華和聖子耶酥和聖靈；雖然這不符合上帝的習慣，因上帝創造宇宙不需要和兒子及“聖靈”商量；這個解釋權當通過。那麼，亞當是照著神的模樣造的，可夏娃呢？由于男女身體差別很大，而耶酥也是男的（是聖子不是聖女），因此，夏娃沒有原形。“三位一體”的解釋同樣值得懷疑，在《舊約聖經》裏很難再找到耶和華用“我們”，是否上帝還有位夫人，如果是這樣，夏娃的模型就找到了；不過這和中國的“老天爺、老天奶奶”有點巧合。再者，沒有“上帝夫人”，何來聖子？當然，如果創造萬物的還有位“夫人”，

[1] 請基督徒讀者諒解，筆者無意挑戰基督教，而是讀書時的壞習慣，那就是對任何書都挑毛病，當然包括共産黨的理論，這確保了本人是個很好的讀書人，但對信仰宗教和共産黨的政治學習則有點不可救藥，這本一反中共和學術界普遍認識而寫就的書，就是筆者一貫獨立思維方式的體現。

“唯一神”的說法就多少有些問題了。到時候可以將“三位一體”修改爲“四位一體”，以作補正。

例三，《舊約聖經》“創世紀”第二章中，敘述夏娃和亞當生該隱（人類歷史上第三個人），再生亞伯（人類歷史上第四個人）；後來該隱殺了亞伯。上帝要流放該隱，該隱對上帝說：“……我必流離飄蕩在地上，凡遇見我的必殺我。”耶和華對他說：“凡殺該隱的必遭報七倍”，“耶和華就給該隱立了個記號，免得人遇見他就殺他。”從這一段很明顯可以看出，當時的世界除了亞當和夏娃這一家子，肯定還有別的人，而且不僅僅是一兩個人，而是隨處都可能有人，這些人從何而來？《聖經》中對家族的世代傳人都有不厭其煩的交代，而創世紀初期，如果這些人還是亞當、夏娃所生而不做任何交代，是奇怪的。該章中提到該隱和亞伯時，反復用到“兄弟”，如果那些人也是亞當、夏娃所生，理應用“兄弟”，而不是“人”來稱呼。

至于“諾亞方舟”，宗教界和考古學者相信，當時的那場大水是發生在五千年前的幼法拉底河洪水，可問題是，當時的中國人生活的好好的。除了諾亞一家，還有東方大地上的這群已具有高度文明的人群生存下來。當然，基督徒全部否定同位素年代測定法。因爲這個太致命了。中國大地上擁有高度文明的考古發掘已經到一萬年前。

讓我們接著分析《聖經》有錯的可能性：

基督徒們相信，《聖經》是上帝說的話或活動，通過信徒的手把它記錄下來。那麽信徒是人不是神，而人總會犯錯誤。在信徒記錄上帝的話時，有兩個犯錯的機會：一是耳朵沒聽清楚，或沒記准；另一個犯錯的機會是記錄的時候寫錯字。很顯然，這兩個環節出錯并不奇怪，這不是上帝的過錯，而錯在人爲。

另一個對原意的扭曲是翻譯的過程。《聖經》最先由希伯萊文寫成，後翻譯到希臘文，再從希臘文翻譯成英文和中文等語言，而語言翻譯的過程不可能百分之百準確保持原意，尤其是這種宗教或倫理方面的書籍，并不象科技、經濟類著作那麼容易翻譯。新加坡的李光耀資政對受英文教育的華人能否很好地繼承中華文化優秀的價值觀沒有把握，曾問哈佛大學的當代新儒家杜維明教授：如果不會中文而通過翻譯，可否準確掌握儒家思想？杜維明教授回答：不可能。很顯然，這是杜教授在美國多年研究教學經驗的心得。這鞏固了李光耀在推動新加坡華人學習中文方面的決心。當然，這與儒家思想的世界性并不相矛盾，只是存在一個認識"度"的區別。如"仁"字的字意，中國人可以意會，但不易描述。要找一個能準確反映原意的英文單詞和它對應，根本不可能，就"仁者愛人"和"殺身成仁"中的兩個"仁"，足以令最傲慢的翻譯大師傷透腦筋。

不會中文的華人（他們好歹還會些廣東話或福建話，詞句結構基本相似，且價值觀在家庭環境裏已有所學習），在只經過一次翻譯的情況下，尚且不能完全準確地把握祖先文化的內涵，何況《聖經》經過了兩次且時間跨度巨大的語言轉譯。其中詞匯的應用和經意的扭曲是不可能避免的。

而如果在《聖經》裏有人爲過錯的話，難道也不可以修改嗎？

如果寫和翻譯《聖經》的人不會出錯，這實際上是在神化人的能力，和對上帝真神的間接褻瀆。如果《聖經》是可以修改的，也應該是可以修改的，那麼其它問題也就有了解決的可能。實際上，《聖經》中文版出現過多個版本，目前流傳較廣的有兩個版本，當然兩個版本不少文字是不一樣的。請所有超級頑固的神學士和所謂"《聖經》不可改"的基督徒們告訴我：這兩個版本哪

個是錯的？如果該書一個字不能改，那這兩個版本肯定有一個翻譯是錯的！如果都對，那如何解釋兩個版本那些不一樣的文字？

上面提到中外基督徒之間明顯差异的存在，概因中國傳統文化的巨大影響。因此，當聽到基督徒對祭孔的非議時，筆者甚爲難平。在推動教育平民化，强調讀書的教化作用方面，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宗教或先哲像儒家思想和孔子那樣的重視。這也直接推動了中華文明的繁榮和發展。

我曾問一位執著向我傳教的華人基督徒朋友：一個歐洲基督徒及一位華人非基督徒，您和他們誰的價值觀更接近？她可能意識到問題的陷阱，咬緊牙關說和那個歐洲基督徒更接近。我又問：世界上基督教和天主教信徒占人口比例最高的是菲律賓和埃塞俄比亞，新加坡到處是菲律賓女傭，您是否覺得和她們最接近？我看到她略顯尷尬而微紅的臉。這個故事其實道出了一個華人信基督教的根本原因：發達的歐美白人所體現出的文明，和他們在教堂宗教活動的優雅，以及華人對西方文明的崇拜。但這些是歐美物質文明和科技發達的結果，衣食足而知禮儀，而從俄塞俄比亞和菲律賓可以看出，這不是基督教傳播的必然結果。中國人是在長期的歐風美雨的浸潤中成長的，因此而對基督教有親近感，但這不是這個宗教的本質特徵。華人不能因爲信基督教而對自己祖先減少半點感恩敬重。

實際上，通過筆者長期對教會的考察發現，華人基督徒有個普遍性的問題，就是不懂得感恩民族先賢，將一切美好的都歸功于耶穌，存在嚴重的民族虛無主義，他們對自身文化知之甚少。更有甚者，華人基督徒把猶太人看作上帝特選子民，普遍把猶太人看得高人一等，自覺成爲精神上的二等人。筆者最後一次參加

教會活動時，那位來自臺灣擁有物理學博士的牧師公開講“猶太人就是比中華民族優秀”，太荒謬的。他們喜歡拿猶太人獲得諾貝爾獎人數和在當今世界財經界的影響力來說明，實際上，這些猶太人普遍來自于歐美，非洲的猶太人有拿諾獎和成爲銀行家的嗎？猶太人的成就與他們處在過去幾百年世界經濟科技中心在歐美這樣的背景密切相關。他們可能比其他歐洲民族優秀。一個族群最高智慧的體現是國家管理能力，中國人經過商周兩朝，摸索出了人類最成功的國家管理智慧，這是中華文明持續不墜的保證，而猶太人從來就沒搞清楚如何管理一個國家，就更別說管理像中國這樣一個地域廣闊的大國了。猶太人三千年前在迦南地的首次立國很不成功，只持續三王和百年，同時代的中國周朝則管理著面積大的多的國土，東西周共存續八百多年，創造了人類最繁盛的文化體系。體現生命智慧的經絡學和宇宙規律的易經，唯中華民族擁有幷受益幾千年，而上帝却沒有施恩惠于猶太人。

再過五百年後回頭再看吧，現在下結論稍微早了點。唯一可確定的歷史證據是：猶太文化在中國被中華文化徹底同化。强弱對比一目了然。如果一個人因爲信教而變得超級愚蠢和自虐，那看來該宗教真的有些問題。

考慮到中華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基督教不可能在中國人的精神需求方面取得主導地位。因此，加入到中華文化之中，去適應它，而不是去貶低它，對抗它，就成了基督教值得考慮的戰略選擇。沒有一個本土化或中華化的改造過程[1]，基督教也不可能變得

[1] 第二版加注：2018 年 3 月 28 日，中國基督教全國兩會在南京發布了基督教中國化五年工作規劃。在本書第一版做出此項倡議之後 15 年，國家終于認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幷開始采取具體的措施，這是值得欣慰的。

像佛教一樣成爲中華文明的第四大支柱。

如果沒有這樣一個中華化的過程，基督教和中華文明的衝突將是難以完全避免的。考察中國文明史，可以肯定的是，如果這種衝突發生的話，基督教沒有取勝的可能，將成爲最終的受害者。

在基督教發展歷史上，沒有馬丁·路德的改教，就不可能有文藝復興的出現，也不可能有歐洲文明在今日世界的主流地位，同樣不可能有基督教今日遍布全球的盛況。因此，無論是佛教還是基督教本身的歷史，都證明了宗教改革對自身和人類文明進步的重大意義。

全球華人基督徒在對基督教進行新的改革方面，可以扮演主導的角色，因爲在這些華人基督徒成長的過程中，已接受了豐富多彩的中華文明的影響。而中華文化的豐富內容和浩瀚典籍，豈是一本《聖經》可比？對華人基督徒來說，不論他們多麼虔誠，也不過是在自己已有的豐厚文化內涵的基礎上，添加了十字架標志和一些基督教的佐料罷了（類似于去蛋糕店訂生日蛋糕時，特意插上去的那個“生日快樂”塑料簽和上面用奶油或巧克力塗上的文字，但這個蛋糕與那些沒有這些標志的其實是一樣的）。因此，他們如果不對自己的信仰固步自封的話，應具有其它種族的基督徒難以比擬的優勢和文明視野，去完善和改造自己的信仰。

最近幾年，西方年輕人信上帝的越來越少，估計已不足60%。面對西方社會的一系列問題，西方人開始瞄向東方，尋找人類靈性的新出路。背靠東方文明的華人基督徒豈能步落人後？面對科學的進步、競爭的加劇、全球交流的加强，尤其是中華文明的復興，如果基督教不做必要的跟進，基督教文明在全球的衰落將不是不可能的。

因此，新時代“東方馬丁·路德”的出現，正其時也。

關于伊斯蘭教的傳播，筆者只做個簡單的分析。

該宗教在中國只在幾個少數民族內傳播，尤其作爲最大民族的漢族人除非通過婚姻關係，一般不改信伊斯蘭教。上面對基督教在中國傳播所作的分析和建議，對伊斯蘭教有參考價值。筆者只在這裏對中國的回民和其他穆斯林讀者提些建議。筆者也曾上過一些中國穆斯林的網上論壇，發現一些值得注意的問題。

首先，任何信仰，形式在其次，內容爲根本。這一點穆斯林尤其應該留意。中國是個多民族大家庭，各成員之間的差异性越小越好，當您處處追求這種差异性時，您事實上在您與其他人之間豎起了一堵墻，哪怕是“玻璃墻”。這對于那些爲人父母者尤其要注意，多數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被同齡小夥伴看成另類。

其次，佛教徒的一些做法可以供穆斯林參考。有些佛教徒比較極端，比如吃素就拒絕一切可能沾葷的菜。我特別請教過有道行的法師，得到的答覆是：刻意追求吃素事實上犯了“執著”之戒，肉邊菜也是可以的。到別人家做客，要主人特別爲您做某一類菜本身就違背宗教精神。穆斯林在日常生活中對這方面同樣值得留意。當您生活在一個非伊斯蘭社會裏，處處要求他人照顧您的信仰，事實上構成了您對別人生活方式和習慣的干涉。

再次，在中國大家庭中生活，世俗文化的大部分內容其實和宗教是不對立的，尊重主流價值觀，您才能擁有朋友。只有朋友願意親近您，您才有機會展示伊斯蘭信仰的精妙。筆者在西安化覺巷清真大寺參觀時，裏面一位中年工作人員和我聊起來，張口就是“你



們中國如何如何”，讓我極端反感。中國和一個穆斯林國家打仗時，您是準備保家衛國，還是準備反戈叛國？日常言行會影響到一個多民族國家內彼此的信任，而這種信任是和諧社會的基礎。西安化覺巷清真大寺歷史建築是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中式古建，美輪美奐，但糟糕的是，大殿中間的中文牌匾居然被換成阿拉伯文。這不僅是對文物的傷害，也是對歷史和文化的不尊重。希望中國的穆斯林能留意這些細節。在寧夏的路牌、店牌等隨處可見阿拉伯文，中國的基督徒是否也可以到處寫希伯來文？佛教徒是否應該把古寺廟的牌匾改成梵文？如果都像西安化覺巷清真大寺那樣，中國將出現何等的亂象！

不論您的信仰多麼偉大，讓您身邊的人感到舒適和受尊重，是宣傳自己信仰的不二法門。也是與他人相處的基本修養，這與信仰無關。沒有人因爲信仰而被當作外人，除非您自己刻意塑造自己的例外！

至于歐美國家最近十多年來的極端伊斯蘭恐怖組織活動，中國的穆斯林應該有鮮明的反對態度。當歐美和中東極端穆斯林四處樹敵時，實際上在將全球穆斯林推向懸崖。中國的穆斯林必須要有自己的明確立場和原則。

下面再簡單談一下佛教和道教的問題。

佛教雖然深植于中華文化之中，但并不是說所有佛教徒都能很好地領會佛法的精神，大多數人不過是走佛教的形式罷了，如燒香，或拜佛求福等。佛教在過去兩千年中累計了豐富的佛學經

典，即使是出家弟子、佛學高僧或宗教學者都不可能閱讀一遍。佛教自從漢代開始傳播到唐朝高僧玄奘譯經，形成了佛教經典的語言風格，尤其是那些對梵文的直接音譯，雖然很好地保留了佛教的原始內容，但也給中國廣大佛教徒的學習帶來了巨大的障礙。而佛教界一些高僧故作高深，也成了佛教傳播的障礙。

因此，發揮佛教的教化作用，有必要從簡化或通俗化佛經作起。如果能以白話文，或明清文學的語言風格，對佛教經典進行集萃，編寫成一本小册子，必將能在佛法弘揚方面發揮巨大功效。

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對教徒的巨大影響力，與《聖經》和《古蘭經》的作用密不可分。當然，其傳播的方式同樣值得佛教和道教的參考，甚至中國世俗文化傳播也可從中獲取有益的啓示。

在佛教徒和道教徒的崇拜儀式中，沒有像基督教那樣系統性的查經或講經活動，信徒們一般就是燒香，許願而已。由于缺少系統性的學習和灌輸，宗教教義對信徒們的引導和制約作用難免受到削弱。大多數信徒只希望從佛祖和觀音那兒得到好處，付出的不過是少許香油錢。只有個別信徒保持長期的行善活動。很顯然，弘揚宗教在于教化社會的目的，在實用主義思想濃厚的炎黃子孫那兒很難發揮應有的效力。相對來說，基督教每周一次的禮拜或講座，則發揮了更好的社會教化效果。這就象共産黨員每周一次的政治學習一樣。

最近幾年，個別地區的佛教組織引進基督教的唱聖歌的手段，以達到吸引年輕人的目的。毫無疑問，這說明了一向“身段靈活”的佛教，在面對新的形勢開始尋求自身的完善和改革。但必須注意的是，這些只是形式而已，而上述佛經的編寫和系統性的佛法講解活動，才是解決當前佛教問題的根本之道。在佛教傳播方面，毛澤東是如何向幾億沒太多文化的農民傳播共産主義理

念的，是非常值得參考學習的。可惜，佛教高僧多數沒有毛澤東的哲學思辨能力和通俗易懂而又具感染力的語言文字功底。

如果說儒家思想爲中國人提供了修身和奮鬥的動力，那麼，道教則爲激烈競爭時代的中國人提供了精神休息的信仰空間。而道教在一兩千年的發展過程中，摻入了不少迷信的內容和形式，在語言上也如同佛教，有著太多的玄語。道教的真意則掩蓋在這種"包裝"裏，引不起人們的興趣，而其迷信色彩所產生的實際效果，則與宗教教化的本來目標背道而馳。看來，中國人在創立宗教方面需要向中東人學習。尤其是隨著競爭的加劇，財富的增加，引導人們對自然和樸素的回歸，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無論各宗教未來如何發展或如何改革，宗教和文化寬容目標是不可回避的。這也是避免文明衝突的基礎所在。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一改革方向對各宗教教徒本身的素養和胸懷提出了較高的要求。即便是佛、道及一些民間宗教，雖然具有比基督教和伊斯蘭教較少進攻性或排它性，這方面的問題同樣不可忽略。

筆者本人的下述經歷，更堅定了對宗教包容性的關注和建立這種包容精神的意義:

2002 年 8 月，筆者幾乎帶著"麥加朝聖"的心態，去了一趟馬來西亞的歷史城市馬六甲。這是馬來西亞脫離英國統治，簽署獨立宣言的城市。但對于一位中國人來說，這個城市有著特別的歷史意義——這兒曾是明朝鄭和艦隊下西洋的南洋中轉站。鄭和的超級艦隊在這裏添加食水，或等待馬六甲海峽的季候風。而從旅游圖上可以看到三保山、三保井（此井是借名，與三保太監鄭和沒有任何關係）、寶山亭等景點，這正是本次旅行的目的地。



宝山亭旁边立着这座“南洋(二战)遇难同胞纪念碑”，蒋公题写了碑文。民族的荣耀、羞辱在海外的这座小山下会合，令人感慨万千。这儿没有到处可见的中国游客，只有笔者和两个槟城来的华人女孩在此凭吊、清扫、拍照。后面的香坛上纸灰尚新，残香乍灭。(2002.8)

到得山脚，只見山小、樹矮、景亂。但見一座小廟靜臥山下，正是寶山亭。進得廟裏，直奔廟堂正廳仰望，沒見鄭和公公的畫像；這兒原來是一座大伯公廟。不禁疑惑和失望。大伯公像兩側有一幅對聯，細辨可識：

魂依甲地萬古幽冥沾福德

公庇征人千年享祀配春秋

讀罷方才明白，該廟確實是爲祭祀那萬里遠征的中華男兒而立的。但還是有些疑問：爲什麽不將鄭和像挂在大堂中央，他不是更好的圖騰嗎？帶著不解隨處看看，在廟院落的右側，擺放著一尊很不起眼的小雕像，配劍而立，遙望遠方，正是鄭和。而且雕像很新，剛擺放這裏的，且被雨淋濕了。

在對鄭和的“待遇”甚感不滿的同時，突然猛醒：鄭和是位回回，而對著穆斯林燒香祭拜，有不敬之嫌。在南洋一帶，除了和當地馬來人結婚，華人一般不信回教。這無疑給祭拜鄭和以及同行的其它回回隨員帶來了諸多不便。筆者見此，不禁感慨：祭拜先人，發乎于心，如果因爲不同信仰而不能盡情一拜，或不予祭祀，同爲華夏子民，啓不嫌生分了？後生專爲追尋先輩足迹而來，怎能拘泥于宗教條規，思想僵化，見到爲中華文明史添色甚巨的鄭公公及其隨員，豈有不拜之理?

念此，不及多想，忙摸出些碎銀子，請大香三支，面對大伯公像三拜，對鄭公公像再三拜，插香入爐，頓覺心懐坦然。鄭公公及其隨行的穆斯林同胞在天之靈有知，對來自祖國的晚輩，斷不會以非禮斥之。領導世界最大艦隊，背靠世界最强帝國，胸懷

四海，乘風破浪，布威于天下；鄭和及其將士們的胸懷，豈是當今凡俗信徒可比？面對後生這突如其來的香火祭拜，定會大贊曰：

"後生可教，故國當興矣！"

那麼，中國在過去的十多年中，在宗教和文化傳播方面，是否有值得參考的成就呢？

有，那就是李洪志和他的法輪功。這聽起來有點不可思議。

李洪志以高中文化程度，并不精彩的語言，和拼湊的《轉法輪》一書，能在十年的短時間內，在大江南北，全球各地吸引上千萬的學徒，其中包括大學教授、博士碩士、著名醫院院長、共產黨的領導幹部，僅用中國現在的信仰真空來解釋是不够的。無論如何，李洪志和他的法輪功，在中國的宗教傳播史上，具有特別的意義。

筆者本人出于對所有能影響多數人的文化或宗教的强烈好奇，認真閱讀了《轉法輪》一書，參加了七個晚上的學習班，以學習李洪志廣州教功的錄像。對于習慣了國內政治學習的人來說，這并不是個負擔。當然，也參與了一些練功活動。《轉法輪》一書，基本上是將佛、道、民間宗教和神鬼傳說集合在一起，對于讀書喜歡挑刺的筆者來說，該書的漏洞就不說了。李洪志的講"法"，沒有什麼動人之處，但是，李洪志相當高明地將本章所提的宗教基本結構，勸人向善、好處、報應等，完全地包括進去，這就構成了一門宗教的基本架構。由于他開始打著"弘揚佛法"的旗號，又有不少佛教的內容，而大多數人對佛法實際上又知之甚少，因此，法輪功的吸引力也就在所難免了。畢竟中國佛教界從來沒有采取過這樣近距離的方式，生活化的語言來傳播佛學（李洪志的演講雖然不動聽，但比共產黨那種空洞乏味的自言自語更



吸引人）。而佛門中人慣用的玄妙佛語，對弘揚佛法沒有任何的用處，只是少數人夢囈的專利。

正因爲法輪功的完善宗教結構和佛教幡旗，對所有參與的人構成了行爲上的規範和制約，這就不難理解，在法輪功的練功場所，當學員離開時，都能將自己坐的報紙等物清掃乾淨，宗教教化的效果也就顯現出來。

而將宗教傳播和練功强體一起“推銷”，則增加了額外的吸引力，也成了他的一項獨到發明。

但李洪志畢竟不是佛門中人，當學徒越來越多，他自己也飄飄然起來，“一個俗人”的本質逐漸表現出來，不甘于一代“高僧”的成就，要把自己塑造成新一代“佛祖”。從他廣州教功的後段內容中已表現出來。一直穿著西裝似乎有些不像，又做了一件袈裟披上，却留著長頭髮不捨得剪掉。更要命的是，開始自不量力地對抗起世俗政權，焉有不敗之理？當然，李洪志在中國的失敗是早晚的事，因他自己還遠沒有修煉成佛，但又誤以爲成佛。

筆者雖然對李洪志後期的演講和《轉法輪》一書的內容不敢苟同，但筆者在海外參加法輪功活動時，無意揭示其中的詭异，因爲看到法輪功學徒能積極向善，中國民衆在世風日下的時代，總算有了一個可以依賴的精神憑籍；對于憂國憂民的筆者來說，曾寄予過希望；畢竟世界上沒有完美無缺的宗教。只希望李洪志能逐漸完善他的“學說”，把自己真正放到弘揚佛法的正確位置。如果真能如此，那麼，李洪志在中國佛教傳播史上的重要地位，應不亞于基督教發展史上的馬丁 · 路德。

很遺憾，也很痛心，俗人畢竟是俗人。

法輪功已被中國政府打倒，但他的傳播方式肯定有值得中國政府、文化界、教育界和宗教界注意的內容。不論是經驗還是教訓，都應該很好地加以總結，不能簡單地一“批”了之。如果中國政府能在推動世俗文化教育、宗教界能在宗教信仰傳播方面，學習李洪志的經驗，那麼中國人民的精神依歸也就可以期許了。

如果中國宗教界能在宗教傳播的角度上，稍微向世俗方向傾斜（法輪功如果專心于佛教傳播的話，將是個宗教世俗路綫的成功案例），將會帶來更好的社會教化效果，雖然這面臨操作的問題。而宗教界本身也能保持進退自如的空間。在這方面，佛教和道教不存在太大技術問題，但對基督教來說則是個不小的挑戰。如果不慎與世俗文化的唯物色彩和科學精神產生强烈對抗，宗教傳播的負面效果也就在所難免了。自新文化運動引入科學精神以來，中國的發展大受其益，對科學的倡導始終應是中國社會的最强音，宗教界不應該抱任何的雄心壯志，來挑戰甚至顛覆科學的意義。尤其對于基層民衆整體教育層次不高的中國大陸，這一點尤其值得宗教界的重視。中國政府可考慮立法規定：任何宗教不得勸導、接受 20 歲以下的中國人加入該宗教，或參與宗教儀式；對于回教家庭的孩子，在 20 歲之前，其父母不得强制孩子參加回教儀式；嚴禁宗教進入大學，等。

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中國都將，也應該保持强大的世俗文化的主體地位。



让哲学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第九章　城墙殘垣的哀怨[1]

1998 年，當美國總統克林頓訪華，西安以大唐的禮儀來迎接遠來的貴賓時，攝像機將那世界獨有、隆重而典雅的入城式傳遍全球。那時最感失落的要數北京人了，因北京的城墙已被拆除。

不少北京市民立即犯了中國人的老毛病：將毛澤東不假思索地埋怨了一番。

北京，千年的國都，曾經擁有世界上最宏偉的城垣和都市規劃。您只要想一下紫禁城太和殿的龍床正好位于北京城的中心點上，就能感受北京城市設計師們的匠心獨運。任何人，不論是明朝的昏君，還是清朝的明主，只需往這個點上一坐，帝國中央政權君臨天下的威儀，立刻顯現出來。

這是世界獨一無二的城廓，也是最能體現中國大一統文化的都城。然而，當我們迎接民族新生和復興的時候，它的厄運也將

[1] 本章大部分文字沒有做調整，雖然第一版出版後的這十多年，舊城保護意識越來越强，但并不是說該書内容已經不合時宜，曾經的荒謬也是歷史一部分，而荒謬還不斷發生，比如，過去十多年金融街規劃和建設，就是城墻被毀之後北京城市建設史上最荒謬的行爲（第二版加入）。要完全杜絕這種荒謬，前途漫漫！

隨之來臨……



孤零零的前门箭楼在昭示着北京城曾经的辉煌

一、古都的困惑

1948 年冬，北平和平解放前夕，身在西柏坡的毛澤東，托人請清華大學著名建築學家梁思成先生在一張軍事地圖上標明北京城內重要古建築的位置，爲的是萬一和談失敗，解放軍被迫攻城時，能够保護好城內外千百年留存的文化遺產。

就是這些曾在戰火之中竭力保護的古建築，却在和平時期的城市建設中被毀掉了。1950 年代，梁思成與陳占祥提出完整保護北京古城，另辟西郊行政中心區的方案。按照他們的設想，古代文物建築集中的北京城，應該成爲“像羅馬和雅典那樣的世界旅游城市”。環繞北京的城墻應該盡可能保留，幷改造成全世界獨一無二的“一帶環城的文娛圈、立體公園”。但這一建議被拒絕，理由是梁思成的建議不切實際，建新行政中心超越國家財力。

1951 年，政務院按照周恩來的指示撥款 15 億（法幣）修繕城樓專款，這筆錢修繕了城墻和後來被拆除的東直門、安定門、阜成門等六座門樓及箭樓。1953 年開始，拱衛北京數百年的古城墻開始被拆除，到 60 年代北京考慮建造地鐵而將城墻連根挖掉，消失在故都的地平綫上，只有那幾座孤零零的門樓和角樓，還在昭示著北京城曾經有過的高貴、氣派和風華。

梁思成抱城磚痛哭，不僅是在哭城墻的死去，更是在哭一座充滿城市規劃最高智慧的帝都的消失，及一系列中國古城行將來

臨的厄運。

毛澤東當年在天安門城樓上憧憬：不久的將來，前門一帶將布滿了烟囱[1]。筆者完全能理解毛澤東一代領袖們對國家工業化的期盼心情。但對城市建設的盲目而造成的損失是無法挽回的。拆除城墻，不論是否毛澤東的主意，他沒能加以阻止而不能逃脫領導責任。筆者對此曾長期不得其解：解放北京之前盡力避免戰爭對它造成傷害，和平時期爲什麽容不下一座城墻？[2]

在對毛澤東及其一代領導人批評之前，有必要作點稍微深入的思考，畢竟，毛澤東的智慧和文化素養并不比你我差。

城墻不同于故宮等名勝古迹，在五十年代的很多人的心目

---

[1] 第二版加注：毛澤東的這段話，我沒有找到原始出處。這是 1980 年代談論北京城墻話題時，媒體上常引用的。1950 年代初期，政府對城墻的處理原則是：外城因城墻質量差，原則拆除，內城（即現在二環路所在位置）建築質量高，城門樓宏偉，予以保留。毛澤東的暢想其實與城墻沒關係，前門一代屬于外城。只是與城市規劃理念有衝突，算不上多大問題。這裏維持第一版時的陳述。

[2] 第二版加注：關于拆除北京城墻的領導責任，筆者找不到官方資料。目前找到明確提及此話題的正式出版物是 2016 年東方出版社出版的《城：我與北京的八十年》，作者孔慶普，曾任北京市政工程處總工程師，參與 1950 年代的城墻修復和後來的拆除。該書第 123 頁有如下描述：最後張友漁（時任北京副市長）同志說，有一件事情向大家下點毛毛雨，少奇同志說，北京要建設成爲一座新型城市，要清除一切妨礙建設的建築物，城門和跨于街道上的牌樓、門樓都要拆除。該書第 151 頁有如下描述（時間是 1956 年 6 月 16 日）：大家對拆除一座好端端的、才修繕四年半的城樓很不理解，覺得十分惋惜。大家議論說，劉少奇不知道是怎麽想的，看來劉少奇是要把北京城一掃光啊！難道總理和毛主席也都同意？單士元說，據說彭真曾找過毛主席，主席說“我分工管黨內事，政府的事少奇同志分管”。該頁最後兩段有“拆除城門是劉少奇下的命令，彭真同志并不同意拆除城門。趙鵬飛說，五百多年歷史的北京城竟然毀在劉少奇手裏！”

以上內容爲孔慶普回憶內容，只供參考。準確的答案唯有等政府的檔案公開。

中，城墻很難被列入文物的範疇，萬里長城除外。在中國古代城市中，有城必有墻，是處處可見的城市防禦工事。就連家鄉的小縣城也曾有一圈城墻環繞，爲劉、鄧大軍攻城帶來不少的麻煩。由于清朝較少修城墻，留下來的城墻大多是明朝建造的。在北京拆除城墻時，除著名建築大師如梁思成等，反對的聲音非常弱。而普通的百姓和知識分子沒人看出拆除城墻的錯誤，或保留城墻的意義。這本身才是中國後來一系列古城、古建築被毀的真正根源，也是中國人的最大悲哀之一。

而這種悲哀的細菌至今在華夏大地肆虐。這也是本書涉及這一話題的真正目的之所在。

筆者于 1990 年曾在北京的親戚家小住數日，和那位身爲滿清貴族遺少的姨夫聊起北京城的變遷。他對拆除城墻的看法是：一座破墻，留著何用，且影響交通；改成現在的二環路多好！

1984 年筆者上大學時，曾在一本雜志上讀到過一篇憧憬北京光明前途的文章。文章詳細描繪了未來作爲國際大都會的北京的遠景：北京將是摩天大樓林立的大都會，而故宮和天安門廣場將成爲北京的“盆地”……。雜志的編輯看來爲這篇文章描繪的景象所陶醉，甚至在該文的最後加了一幅手绘插圖；從圖中可以看出，在故宮周圍、人民大會堂及歷史博物館的後面，是清一色高聳入雲的摩天大樓；只能從摩天大樓之間的空隙中，才能部分看到天安門城樓和人民英雄紀念碑。筆者能記住這篇文章和插圖的細節，概因該文描述的景象給筆者留下實在太深的印象；筆者曾幻想：我偉大祖國的未來能真的變成這樣，那該多好！

今天看來，在熱情和美麗的幻想背後，隱藏著中國知識分子的群體性愚昧和無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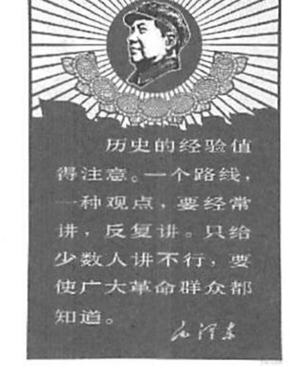
在 1984 年的輿論環境下，能在數量有限的刊物上發表文章的人决非一般書生，雜志的編輯也必然代表主流或官方。但除了極少數的建築大師，哪個中國人敢說自己未曾在這方面無知過？下面的例子將會使您發現，這種無知具有相當高的普遍性，幷曾經或將要發生在你我的身上：

時間已到了公元 1989 年，中國人已多進步了三十多年，在天安門廣場西部不遠處的宣武門一帶，一座高聳入雲的大樓拔地而起，這座大樓的主人是人才薈萃的新華社。沒人敢說新華社的人沒有學問，新華社裏也沒人對自己辦公的這座大樓是否唐突而發出疑問。

這還不算太過分，尤其荒唐的是，在天安門和王府井之間，除 70 年代建的那個在北京城市建設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北京飯店新樓，到了九十年代又冒出一座十層高，可俯視紫禁城的大樓，它既不是高雅的文化殿堂（如果不算在裏面附庸風雅的話），也不是什麽政府機關，而是一家燈紅酒綠的俱樂部。該大樓的主人在其推介的資料裏甚至驕傲而厚顔無耻地提到“可俯視紫禁城”。請相信，筆者絕對不是因爲自己沒錢弄它張會員證而和它過不去。

和北京城市在最近二十年遭受的摧殘比起來，上述幾座大樓實在是小巫見大巫。

北京除作爲政治文化中心，她還不滿足，在發展成那麽多“中心”的過程中，已使這座故都重荷難負。如果說巴黎和東京因國家地狹人稠而不得不建成功能多樣化的大都會的話，那麽對于地域遼闊的中國來說，北京的城市功能如此多樣，且集中了中國和華北的那麽多“中心”，則是難于理解的，也是不明智的，在市場經濟時代就更顯愚蠢了。如果說毛澤東時代沒有太多錢來糟蹋



這座古城的話，那麼到了今天，北京的官員們已有足够的資本來拿這座城市隨意地揮灑。中央和北京市的領導顯然沒有悟透北京城市發展的合理目標，及中國區域經濟布局的合理規劃；他們更發揮了莊家和暴發戶的"蠻勁"來對待這座獨特的都市；用中央的財政支持，加上他們的魄力和有力的大手，在北京中心城區拍板了一條條大道，一座座高樓。市中心的容積率越來越高，人流和物流也越來越大。他們似乎遠沒過癮，又在本來應該有一份寧靜肅穆氣氛的天安們廣場地區，人民大會堂的背後，建一座將帶來巨大人流，且奇形怪狀的蛋形歌劇院，似乎在以此來證明領袖們對藝術的重視和鑒賞能力。殊不知，這根本就是對文化和尊貴的褻瀆和騷擾。

有時真的幻想：如果我們的領導人將他們無與倫比的魄力能分一些用來反貪，該有多好！

如果他們對文化和藝術真懂，或一點也不懂而只好給專家更大發言權，也肯定比知之皮毛，却因擁有重權而忘乎所以來得强！

就連故宮這樣的場所，也駐進了一家美國咖啡連鎖店。如果故宮管理人員真想設立個游客能够休息而自己又能賺錢的場所，也該設個明清仿古茶館。幾乎可以肯定，這個咖啡館的背後要麼有一群蓋章的笨蛋，要麼有人受賄。很難想像法國人會同意在梵爾賽宮開設一家麥當勞！

到陳希同時代，他似乎有所醒悟，對"大蓋帽"突然情有獨鍾，不小心又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在大大小小的樓房上都不忘加至少一個中式屋頂。以至于游客見到一座古建築時懷疑它是否真的那麼古老。如果您有機會站在復興門立交橋南望，映入眼簾的是一座高樓（國家經貿委大樓），上面至少有五個"小蓋帽"，

既破壞了大樓的現代氣息，也沒能體現出“大蓋帽”的氣勢，更像是在一座現代化大廈屋頂上，奇怪地長了幾個蘑菇。

筆者每次回家都要經過北京西客站。這是在領導鍾情大屋頂的非常時期建設的非常建築。在這京九回歸綫的起點，這座現代化的建築頂上，加了一個毫無用途、耗資八千萬元的中式閣樓。它沒有任何的創意，也缺少其它建築組件的合理襯托，只能孤零零地架在空中，空著個巨大的肚子，吐納著五湖四海的人群。如果建築師和領導人真的希望將中式風格熔入現代建築當中，這本身沒什麼不對，那正門兩側伸出的兩個巨大而毫無實際用途的鋼鐵桁架結構又意味著什麼哪？這種有趣的後現代風格和那中式屋頂放在一起，更顯得滑稽和格格不入。從這座龐大的建築物上，能强烈感覺到中國建築師們在傳統和現代、長官意志和個人創意之間的苦苦掙扎。

筆者幷不反對偶爾建設個古色古香的建築，象民族文化宮等民族風格的建築一樣美倫美幻。更無意否定不同風格的相互融合，但對基于“領導喜歡”而隨意堆砌，則是荒謬和不負責任的。最近幾年，北京新建了不少的大樓，設計日益多姿多彩。位于復興門內大街的北京國際金融大廈(泰康人壽保險公司大樓)，現代風格的建築物上却用了極爲簡明的中式窗戶，形成完美亮麗的結合。筆者絲毫也不懷疑，中國建築師們只要能充分發揮他們的智慧，一定能爲城市建起一道道動人的風景綫。但這建基于中國建築學界整體人文素養的提高，和由此帶來的審美意識的升華。

在“一切向錢看”的時代，房地產和商業的發展爲北京的歷史遺產構成新的威脅和摧殘。由清華大學著名建築大師吳良墉教授主導設計的“菊兒胡同”，作爲四合院改造的成功典範，它的示範作用顯然難于吸引房地產發展商的注意和興趣。當然，即使

是“示範”，也不應該讓所有的四合院都走這樣的模式，必須將大量四合院原汁原味地保留下來。北京的故宮及皇家園林、四合院及胡同，構成了皇家顯貴和平民生活的歷史文化見證。今日，北京的四合院和胡同正在商品經濟和短見政客的操作下加速消失。法國《費加羅報》這樣評價中國拆除胡同的行爲：“似乎沒有什麽可以阻擋住這場文化自殺，把自己偉大的文化變成平庸。”

筆者在游覽了發達和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後，更堅定地認爲四合院和胡同必須原汁原味地保留下來這一信念；無論是歐洲城市的古老街區，南洋一帶傳統建築（古老的不過百年），雖然看上去破舊不堪，但一個城市的文化氣息則從這種破舊中散發出來。如果和歐洲及南洋一帶的傳統民居建築比起來，無論就歷史悠久，還是文化內涵方面，北京的四合院、江南水鄉的民居、上海的部分石庫房，各地的少數民族建築，有著更濃郁的文化內涵。常年生活在這些破爛房子裏的中國人絲毫沒有意識到它們的價值，中國城市管理人員的審美水平，和喜歡看城市大樓的那些首次進城的農民處于同一個欣賞水平上。

北京在拆除和改造四合院和胡同時有條理由，那就是汽車開不進去胡同。在歐洲城市鼓勵用自行車的今天，中國的達官貴人却讓歷史爲自己的汽車讓路（不知是否因爲中國人窮得太久，現在稍微有點錢就立即照抄西方的生活方式，而西方人對自身生活方式的反思和在此基礎上對自然和傳統的回歸，則引不起我們的興趣）。如果說拆除城墻是因爲它防礙公共交通還不涉及道德問題的話，那麽上述拆除四合院的理由則未免有點卑鄙和自私了。如果中國的官員真想住四合院的話，就請你們貪污或浪費點公款，到近郊造些鋼筋混凝土的四合院吧！如果嫌偏遠，就再挪用點公款給你們家的大人孩子和寵物各配輛轎車，只要你能不糟蹋

老祖宗的這點遺産就行！揮霍光國庫裏的錢，人民還能再掙；可毀掉這些歷史的財富，我們的子孫有再多的錢，也無法買到一睹其芳容的門票。

無耻的强盜總比沒有教養的敗家子稍微可愛一點。

北京市領導們最喜歡談論的是金融區、中央商業區、中國矽谷等，似乎誰都忽略了這兒曾經是集千年榮耀于一身的一代歷史文化名城。除了故宮等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其餘的一切都不再賺得人們的關注和愛惜。在世界上，像北京這樣的歷史文化名城，除了羅馬、開羅、雅典等，實在太罕見了。

北京，這位曾經風華絕代的貴夫人，經她無知兒女的濃裝艶抹和胡亂穿戴，已變成一個艶俗的老太太。

北京市政府的這幫瘋子還不善罷甘休，一個顯然缺少基本人文素養的建築師不知是出于嘩衆取寵，還是投領導所好，或爲了個人的前途，提出了一個在亞運村建設亞洲第一高樓（雙塔）的“宏偉”設想，任何一個對北京城市發展稍微有點認識的人必然對此嗤之以鼻，然而却令北京市領導們和媒體雀躍不已，甚至將大幅模型圖像懸挂在亞運村的交通路口，印在申辦奥運的資料裏，不論多少人抗議也一概不理。北京始終有和上海競爭的意識，既然上海有了金茂大厦，北京當然也要趕上。北京人見到上海姑娘穿了條超短裙，而毫不猶豫地將自己的華貴旗袍剪至大腿根部。

直到 9 · 11 事件的發生，北京才决定放弃這一自命不凡而又荒謬透頂的構想。如果它真的被建成的話，就象在那個已經艶俗不堪的老太太的嘴裏，又放了一根惱人的雪茄。

北京市政府當然不會放弃建高樓的執著，因爲他們的審美水平和個人素養基本停留在這個水平上；要他們理解“高樓并不等

同于現代化”是困難的。而中央政府顯然缺乏足够的遠見和魄力來阻止北京市的胡作非爲，只要看一下北京對那麼多“中心”的熱衷，就不難發現中央政府在其中的角色和領導過失。在炒賣“中央商業區”概念時，北京市政府又準備在三環路與二環路之間，國貿中心對面建一座 300 米高的“標志性大樓”（國貿大廈 A 座），它不遠處就是古觀象臺和古城墻東便門角樓。北京這樣一個遍布輝煌歷史建築的故都，今天居然需要一個賣弄風騷的現代高樓作標志，實在荒唐得很。如果巴黎的標志建築不再是埃菲爾鐵塔、羅馬不再是古角鬥場、倫敦不再是泰晤士河塔橋、雅典不再是巴特農神廟，而都改以現代摩天樓作爲標志，那麼，人類回歸野蠻時代爲期不遠矣。這座高樓建成之日，天安門城樓會爲之哭泣：滿負歷史滄桑的高貴和榮耀，居然不敵一個靠賣身爲生的寫字樓。

固然，舊城保護和改造是個世界性難題，但很少有像北京這樣文化薈萃的故都，具有不難確定的發展方向。可是，當我們從五十年代至今多進化了五十年，還在重複著同樣的錯誤，製造更多的悲劇時，我們有什麼資格對北京城墻的被毀而指責他人？！

在看《雍正皇朝》的時候，其中九門提督的角色引起了筆者的注意。這不過是把守北京九個城門的領兵首領，却能在宮廷的鬥爭中扮演關鍵的角色，而成爲炙手可熱的要角。如果放在今天，此人一定能成爲國防部長的當然人選。這令筆者忽發奇想：當年毛澤東拆除北京城墻，是否基于這方面的顧慮？深研歷史的毛澤東，對九門提督及歷史上的相關事件，應有所瞭解；他是否擔心：北京城墻的存在將爲共和國政權的穩定和生存製造某些不確定因素？很顯然，只要封鎖北京的幾座城門，幷阻止直升飛機的進出

（這并不難），并切斷電力和通訊（這同樣不難），中央政權將立即面臨傾覆的危險。

當然，這僅僅是個永遠無法被證實的聯想。

也許，定都北京本身就是個錯誤。當我們還沒有來得及讀點書，使自己有點修養，并穿戴整齊的時候，就貿然闖入了一個價值連城的博物館，并將裏面的“舊銅爛鐵”隨意處置。

今日北京的發展方向如不立即改道，中國政府早晚都要考慮遷都的必要性[1]。否則，北京市政府一定會利用首都的優勢，繼續更多不明智的行爲。當年美國人設計燕京大學時，梁思成設計清華一至四號樓時，貝聿銘設計香山飯店時，他們小心地選擇建築風格和高度，但今日的這些三流工程師將繼續隨意而自信地揮灑他們的庸俗。

工商業和政治集中在同一座城市裏，本身就是極其不理智的，這必將導致首都工商業內部競爭的不公平性，和首都與其它地區競爭的明顯優勢。在中國這樣一個中央政府擁有巨大不受監督權力和掌握大部分國家資源分配權的情況下，這類商業競爭的不公平將更加嚴重。而建立公平的競爭環境，是健康市場經濟的基礎之所在。

---

[1] 第二版加注：2003 年筆者所作的判斷，隨著北京市政府遷往通州，雄安新區規劃，以及北京去非首都功能的啓動，已經得到證實。筆者無法爲自己的先見之明感到得意，更多的是一種悲哀。雄安，是否在戰略定位和規劃上能够真正高瞻遠矚，經得起千年的考驗呢？但願吧！城市規劃必須戰略研究先行與支持，但戰略研究根本就不是任何名牌大學可以培養的專業，是需要一群高資質個體组成的团队，及廣博和跨界的知識結構培養，才可能具有宏觀把握的戰略眼光。當代大學教育出來的這些“大師”們能勝任戰略的策劃嗎？玄！

北京金融街規劃和建設，則是改革開放以來對古城保护與合理規劃的一次大破壞。[1]

當今天的北京市民爲城墻被拆而惋惜時，他們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對老北京的糟蹋，如果說過去的糟蹋方式只是一座墻，幾座樓的亂來，那麼和北京現代史上最誇張的糟蹋——金融街規劃建設相比，都小巫見大巫了。筆者寫此書第一版時，還以爲北京這個古城不會再糟到哪裏去了，萬萬沒想到，在過去的十幾年中，他們居然進行了如此大規模而不可逆轉的大破壞！天哪，他們真的瘋了！

1993 年國務院批復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提出在西二環阜成門至復興門一帶建設國家級金融管理中心，集中安排國家級銀行總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總部，北京金融街應運而生。金融街占地 1.18 平方公里，是北京城市六大功能區之一。2007 年 10 月北京市市長辦公會討論通過《關于對金融街區域拓展和功能完善的意見》，提出要將金融街核心區從原規劃的 1.18 平方公里拓展到 2.59 平方公里。至于北京規劃該區的原始動因，是學習紐約華爾街，打造“ 中國的華爾街”的宏大抱負密不可分。

這個規劃從任何一個角度看都有問題。

二環路和北京兩條東西主幹道本來已經擁擠不堪，下班高峰時成爲大停車場，這標志著北京市中心的承載能力已經超越極限。因此，北京城不論如何規劃，都不應該在二環路兩側規劃大

---

[1] 關于北京金融街這部分爲第二版新加內容。在第一版寫作時，北京金融街剛剛啓動不久，我不瞭解具體情況，所以沒有觸及。隨著過去幾年筆者在城市規劃和戰略及産業諮詢行業的經驗積累，以及去北京實地看一下金融街後，開始意識到這個規劃錯誤之嚴重。

型高容積率辦公區，這將加劇本來就超載的中心區道路，嚴重削弱城市效率。如果北京非要搞個金融業集中區，也只能向東三環 CBD 的外圍拓展，因爲當今城市各業態中，純粹的金融區在全世界都不存在，即使金融機構高度集中的華爾街、香港中環、新加坡萊佛士也不是純粹金融區。華爾街金融街的形成有它的歷史原因。但是，那幫領導和規劃師們只懂城市規劃，而缺乏產業業態特徵的深度認識，鑄造了北京金融街這一個怪胎。金融街事實上已經和 CBD 難以分割，兩個大型辦公區應是毗鄰，或者金融集中區本來應該是 CBD 的延伸功能區，但北京東施效顰，硬是分割開來，中間隔著個本來就高度擁擠的二環內區域，即加重了北京的中心區負擔，也弱化了兩個大體量總部辦公區之間的溝通。

好啦，北京市願如何亂搞功能區規劃，即使不請我做顧問，我根本沒功夫生氣；但你們萬不該以拆除二環路內側的大片四合院來搞，那些破四合院有我這個炎黃子孫的一份。在首都搞一個大型功能區空間布局錯誤已經夠荒謬，現在却以另一個更嚴重的錯誤作爲墊背。

金融街建築以其高大體量對二環內的四合院社區造成壓迫和天際綫破壞。可以想像，過去在西二環的立交橋上行駛，一側是繁榮的現代都會，另一側是寧靜低矮樹密、視野開闊的古老四合院城區，一條西二環隔開了古老和現代，那是一種多麼美妙的城市感受。但這種感受已經永久性地消失了，只有兩側的高樓大厦展示著一個越來越同質化的街道景觀。整個涇渭分明的二環路城市分割帶總算被這幫短見的傢伙徹底毀了。

隨著時間的推移，當北京市的這些精英們進化到對玻璃大樓已經不再覺得了不起時，他們才會發現，成片的古老四合院社區將是多麼寶貴的財富，但那時一切都已經晚了，就像北京城墻、

濟南老火車站、中國無數的城墻和古宅等，只會在中國糟糕的古建和古城保護史上再添加幾份遺憾而已。同時記錄下的是背後那些政客和規劃師們低劣的素養。


被誉为“从白令海峡至马六甲海峡”之间最漂亮的建筑（中间圆顶），今天被一群现代高楼所包围。

二、上海風華的殘影

中國的其它城市也好不到哪兒去。上海是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例子。

上海是中國半殖民地的產物，除了周圍的松江和原來的上海縣，及徐家匯出過一位大名鼎鼎的徐光啓之外，這個城市和周圍的小兄弟如杭州、蘇州等比起來，似乎沒什麼值得誇耀的歷史。因此，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上海在城市發展和規劃方面，具有很少的歷史包袱。果真如此嗎?

就城市老城區的規劃和發展來看，這個曾被幾個流氓占山爲王的城市，是中國領土上典型的“怪胎”。由于各租界各自爲政，上海似乎從來沒有過統一的城市整體規劃，要找一條直一點的街道也不容易。和北京的道路比起來，上海完全可用“亂七八糟”來形容。正是在這些橫七豎八的狹窄街道兩側，在帝國主義的壓迫下，誕生了中國近代民族工業、近代交通運輸、近代通信、近代文化藝術的先驅，也培育了後來影響全中國的新生活方式。即將領導中國人民走向獨立和發展的核心政治力量——中國共産黨也在這裏標上個紅色的起點。它也曾是日本統治時期，韓國流亡

政府的臨時首都，以及猶太人的二戰歷史記憶。

因此，如果忽略這些街道兩側灰濛濛的建築裏發生的歷史，實際上是對中國近代歷史的輕視和褻瀆。

上海的歷史雖然不長，但在中國幾千年文明史上具有不可忽視的特殊地位，畢竟它是中國近代史最具代表性的城市。不論它身上曾經承載的血泪還是希望，都是中國歷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上海特殊的歷史進程和曾經帶有苦澀的輝煌歲月，也爲上海留下了豐富多彩的城市建築。可以不誇張地說，在全球範圍內，找不到第二個城市像上海這樣，擁有幾乎所有主要建築流派的經典作品。上海是當之無愧的萬國建築博覽會。它屬于中國，也屬于全人類。

直到 1949 年徹底趕走了帝國主義，才搶回了這些用中國人民的血泪打造的建築財富。我們搶的問心無愧。但我們是否能管理好呢？

很遺憾，我們沒能管理好，因爲我們根本沒有完全意識到上海老城的歷史文化價值。

1982 年筆者到上海讀書時，上海中心城區基本保留了原來的模樣。尤其是外灘從延安東路到蘇州河沿岸的精華區，不論建築的風格還是建築的質量都在展示著昔日的輝煌。後來筆者有機會游歷南亞、歐陸和美國，在比較中才發現上海昔日的繁華和不同凡響。上海的建築即使放在歐洲和美國的任何一座城市的中心區，也絕不遜色，至于南洋一帶就更不可相比了。如新加坡，雖然曾是英國殖民地和海運及貿易樞紐，但新加坡在同一時期的建筑和上海比起來，更像是個屯子。

至于上海建築風格的多樣化，更令其它城市望塵莫及。僅從


这样的穿插，感觉如何?

延安東路到蘇州河沿岸的外灘一帶, 就有帶拜占庭式屋頂的原匯豐銀行大厦（後曾爲上海市政府）、外灘地標的鐘樓、帶有別具一格綠色鑽石屋頂的和平飯店北樓、有中國民族風格屋頂的中銀大厦、以及美國二、三十年代建築風格的摩天大樓——上海大厦（原百老匯）和外白渡橋，組成了世界上絕無僅有的城市天際綫和標志建築群。如果站在外白渡橋上，還可發現位于四川路上帶有鐘樓的郵政大樓。如果說建築是凝固的音樂，那麽外灘建築群無疑奏出了最動人的旋律。

從聯誼大厦建成至今，浦西精華區內大量毫無風格的高樓所形成的噪音，已攪亂了這難得一聞的雅樂，從今以後將再也無法聽到。站在外灘，看到那麽多金碧輝煌的高樓大厦和新舊建築的反差，上海市民無不爲自己城市的日新月异而激動。但不久之後，等他們冷靜下來重新審視自己的審美角度，或者在海外周游一圈回來，他們將會爲今日不當分泌的腎上腺素而後悔。曾令他們得意的“昔日和現代”在外灘的交融，將變成不倫不類的雜貨鋪。

從外灘沿南京東路、延安東路和蘇州河往西，一直到人民廣場、國際飯店和四川路的郵政大樓一帶，如果進行舊城改造的話，在高度上應嚴格控制，向外延伸的地區應采取高度遞增的方式。上海人口密度大，地價昂貴，多建高樓是正常的，但還沒到無土地可發展的地步。上海市建委應對上海老城區進行徹底的普查，將浦西精華區和一些特色建築的街道、地區及歷史意義的建築及周圍街區列爲重點保護對象。但很遺憾，他們顯然是失職的。

直到今天，在大陸範圍內一向最自信的上海市民恐怕很少認識到，他們熟悉的城市已經失去了一些最寶貴的內容。

本書引北京和上海爲例, 概因這兩座城市有著中國最高的市民整體素質，和最强烈的自信。當北京人和上海人相互傲視對方的時候也許沒有發現，他們誰也不比對方高明。



笔者于巴黎新凯旋门前(1997.9)

三、來自巴黎的眺望

當筆者在巴黎艾菲爾鐵塔觀光時，吃驚地發現不遠處一座高聳的現代建築蒙帕納斯大厦，在全是傳統建築的巴黎市中心顯得格外刺眼。後來特意留意了相關的資料，發現巴黎市政府曾有過在市中心建設多座高層寫字樓的計劃，以滿足日益增長的辦公需求。

但巴黎市民不幹了，他們群起抗議，最終逼迫政府放弃了原來的龐大計劃, 而改在香榭麗舍大街的最西端郊區建設巴黎新區。

今日的巴黎新區已經成爲巴黎這類文化名城現代化建設的成功範例。尤其是那作爲新區標志、和著名的巴黎凱旋門遙向對應的新凱旋門，更算得上是點睛之筆。在互不干擾的傳統和現代之間，靠兩座巨大的凱旋門遙相呼應。

至此，筆者不禁幻想，如果當年的北京也能接受梁思成的建議，在京西建新的行政中心的話，北京將變得格外迷人。但今天的北京及不少歷史名城，已變成了一個嘈雜的兵營；而其城市建築，更像是在博物館的青銅器旁邊，擺了個銅火鍋銷售櫃檯。

巴黎能，爲什麼北京、上海不能呢？至少以下內容值得注意：

首先，巴黎全體市民能認識到政府的錯誤，而北京、上海的市民爲什麼不能？固然，北京有過梁思成，但一個人的聲音是微弱的，只有全民人文修養的提高，才能從根本上對自己生活的城市負起責任。即使梁思成顧得了北京，也肯定顧不了全國。只要看一下當今中國大城市居民和年輕讀書人的功利心態，就能明白今日國人的浮誇和淺薄，他們已沒有興趣作稍微有點深度的思考。

其次，從北京、上海到巴黎，似乎一再發出可悲的消息，那就是政府經常做些愚不可及的事；這很正常，公務員幷非各領域的專家。問題是，政府官員是否認識到自己的不足？擁有了權力，你可以擁有榮譽、財富，甚至一切（對竊國大盜而言），但幷不會使你自動擁有智慧、學識、眼界和品味。

巴黎市民的不滿，能有效地傳達到政府的耳朵裏，幷形成輿論壓力。中國民衆的意見，是否有可行渠道表達出來？即使表達出來，政府不聽怎麼辦？

在最近幾年，中國民衆和知識分子正逐漸對城市建設有了較成熟的認識，如對人民大會堂後面的那個光蛋歌劇院，不少專家學者提出强烈反對，但政府繼續我行我素。拆毀定海古城的動議被披露後，許多有識之士紛紛反對，全國歷史文化名城專家委員會的許多專家一致發出了“刀下留城”的吶喊，要求立即停止拆遷。而舟山市的群衆也自發行動起來，努力阻止拆毀古城，還憤然狀告有關部門破壞歷史文化名城的行爲；新聞單位在報道古城蒙難的消息時也發出了强烈呼籲。這種上上下下爲保衛古城奔走疾呼的情景，被當地百姓稱爲“第二次定海保衛戰”。定海，歷史上的炮聲曾喚起國民覺醒的古城，却最終在短見、商業利益、愚昧和長官意志面前，難逃被毀的命運。當定海古城被毫無特色

的現代建築替代之後，定海將和別的城市沒有兩樣，雖然新的定海城將會崛起，但文化的定海已經死了，因其“歷史神韵”已經消失。[1]

領導們看來還需要很長時間才能習慣把自己當成是個普通人。然而，在一片拍馬屁的叫好聲中，多數人都難于擺脫人類的本能弱點，指望他們能正確地認識自我，似乎有點難爲他們，他們將繼續用糟糕的書法去污染大好河山，用空洞乏味的說教占據各類電波的黃金時段。要讓他們清醒一點，唯一的出路就是建立一個體制，當他們自以爲是時，將碰得頭破血流。到那時，他們才真正能够“深刻領會”輿論的力量和自己的平凡。

固然，中國人口稠密，需要較多的發展用地，但是否一定要讓歷史爲後人讓路？清華大學的吳良鏞院士說，“無視歷史文化名城的價值，只把其當‘地皮’使用，無异于拿傳世字畫作紙漿，將商周銅器當廢銅！”即使從人口密度來看，歐洲很多國家不比中國低，即使在古城之中也可以進行改造和保護中的開發。歐洲到處存在的寧靜小城，它們的魅力正在于歷史的色彩，它們同樣沒有阻礙生活在那兒的人們享受現代的生活方式。

中國的城市建設管理部門的人員組成雖然不是本之所在，但在過去和將來相當長時間內，將扮演重要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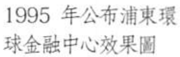
在中國，當面對權力時，科學和文化的力量經常顯得蒼白乏力。這突顯了中國在邁向文化復興的道路上，還有太多的“人性”障礙有待克服。這不能不說是一大悲哀。

但是，這不是說中國人只能選擇宿命和回避。知識分子的吶

[1] 筆者 2013 年做産業規劃項目時曾去定海，那裏雖然有點舊建築的保留，但已經不具備一座古城的古建規模和氛圍。事實上，後來去漳州古城，有同樣遺憾。全國範圍來看，最近 30 年古城大破壞的損失，超越十個“文革”。

喊，不論政府是否理睬，發出這聲吶喊本身就是義不容辭的責任，它將喚醒億萬民衆的智慧和思考。

北京大學季羡林教授說："什麼是'愛國主義'，這幷不是一個空泛的概念，你要成爲一個愛國主義者，首先就要愛你的家、愛你的城！你必須懂得文化遺産對一個國家、對一個民族所産生的巨大凝聚力！"



1995 年公布浦東環球金融中心效果圖


1995 年後半年上海市建委要求重新設計確定的設計效果圖

1995 年，筆者從《文匯報》上看到一則簡訊，談及日本財團將在上海建設最高的建築——環球金融中心。從模型可以看出，該大樓的上半部分有一個三角形切面，而三角形的上半部份有一個巨大的圓孔，成了該建築的鮮明標志。當時筆者立即聯想到：如果在該大圓孔裏用紅色燈光打亮，同時用白光照亮三角形切面，那麽一個如假包換的日本國旗將懸挂在上海夜空的最高處。也許日本人幷沒有準備這麽做，但筆者還是將自己的這一疑慮寫信給清華大學土木系的劉西拉教授（給劉教授寫信，只因聽過他的一堂課，得知他在美國做博士論文時將《毛澤東選集》列爲參考文獻，斷定此人不俗）。劉教授很快回信，肯定了筆者的想法，幷將信轉交時任上海市建委主任（劉教授的同學）。一年多後得知，上海市建委已迫使日方改變了頂端圓孔的設計。

這件小事提醒我們，個人是可以有所作爲的。筆者作爲一名知識分子個體，對國家事務常有無力感。個人的精力和學識不足以應付中國所存在的一切問題。中國的事要靠全體中國人的努力。全民公民意識和素質的整體性提高，將從根本上避免以上各

種悲劇的重演，才能將“愛國主義”轉化爲切實的行動。

當筆者在拿破倫的家鄉，站在巴黎艾菲爾鐵塔最高處觀景臺上不禁遙視東方，穿過萬里雲霧，似乎看到昆侖的白雪、長城的殘軀、草原的牧馬。心中不禁自問：騰躍世界舞臺幾千年的東方雄獅，您何時才能完全蘇醒?

可曾聽到，梁思成抱城磚痛哭的聲音并沒有消失，將在北京城墻的殘垣上空永遠回蕩，以喚醒更多的人們對先輩文明遺產的認識和珍視。他痛哭的泪水已浸濡大地，必將澆灌出文化復興的遍地花朵。



新家（国画，1973）


毛主席视察长江舰

第十章 日本侵華與中共的勝利

“沒有‘西安事變’，蔣介石就能消滅共産黨”、“共産黨保存實力不積極抗日”、“沒有日本侵華，共産黨不可能在內戰中勝出”……，這是在臺灣及反共華人當中極有市場的觀點。即使在大陸和親共尊毛人士當中，對這些說法也有某種程度的認可。

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歷史上團結抗敵、民族自救的重要事件。毫無疑問，在蔣介石領導下，國民黨軍隊爲打敗日本的侵略做出了巨大的犧牲和貢獻。不論其戰爭的戰略戰術運用是否得當，戰役是否取勝，都不應影響任何一個中國人對國軍將士的尊敬和紀念。他們是中華民族當之無愧的優秀兒女。

那麼，那些在共産黨領導下的八路軍、新四軍、敵後游擊戰士，和在毛澤東“人民戰爭軍事理論”指引下發動起來支持抗戰的千萬軍民呢？如果忽略了他們的犧牲和貢獻，同樣是非常不應該的。和國軍將士們一樣，他們同樣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同樣永遠值得我們感激和紀念。

本章的目的就在于，在理性探討毛澤東勝利必然性的同時，恢復歷史的真相，還所有曾爲民族獨立浴血奮戰的人們一個公道，充分肯定毛澤東領導下積極抗日的千萬軍民爲民族獨立所做

的貢獻。

毫無疑問，這超越一切意識形態的思想框架，也遠遠超越爲毛澤東個人、共產黨及其軍隊進行辯護本身。



1944年作

一、沒有“西安事變” 蔣介石能消滅毛嗎？

這是個歷史假設性的命題。對此，用實證的方法顯然是不可能得出答案的，因無法重演歷史。但如果以歷史的軌迹爲基礎，加上當時的實際狀態，幷配合嚴密的邏輯推理，應能得出可信的結論。這是在科學和工程上常用的方法，在歷史研究上同樣適用。

先回顧一下國共兩軍交戰的歷史軌迹，尤其是共產黨一方在毛澤東掌握領導權時期國共軍隊對抗的戰績。對于毛澤東被剝奪領導權時期的戰役，也在此以時間順序列出，以突出毛澤東的軍事才能。

戰例一：1930 年 10 月底始，10 萬國軍兵分八路，采取“長驅直入，分進合擊”之術，在江西境內 500 公里戰綫上，自北向南，圍剿 4 萬紅一方面軍，兵力對比爲 5:2。

戰前雙方狀態：紅三軍團兩次攻打長沙，紅一軍團參加第二次打長沙，剛回師蘇區不久，又奉命打 AB 團錯誤導致內訌。國軍占盡天時、地利、人和。

毛澤東提出“誘敵深入，集中兵力殲敵于運動中”的作戰方

針。

戰役結果: 國軍失利。國軍第十八師 9000 餘人被殲, 繳槍 9000 余支，前敵總指揮張輝瓚將軍被俘後，經公審斬首。國軍撤退過程中，其第十五師的一個多旅被殲，繳槍 2000 件。整個戰役，國軍損失 1.5 萬人, 共軍繳獲武器共 1.2 萬件, 蘇區得到鞏固和擴大, 武器裝備大爲改善。毛澤東有詞爲證: 《漁家傲 · 反第一次大“圍剿”》（1931 年春）：

萬木霜天紅爛漫，天兵怒氣衝霄漢。霧滿龍岡千嶂暗，齊聲喚，前頭捉了張輝瓚。

二十萬軍重入贛，風烟滾滾來天半。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幹，不周山下紅旗亂。

戰例二: 1931 年 2 月，毛澤東上首詞吟聲未落，蔣介石即命何應欽爲主帥，調 20 萬國軍，以“穩扎穩打，步步爲營”之策，兵分四路，圍剿 3 萬 5 千左右紅一方面軍，兵力對比 6:1。同時配合對紅軍根據地的經濟封鎖。

戰前雙方態勢: 此時紅軍尚未從上述第一次反“圍剿”戰役的疲勞中恢復。

毛澤東則制定“誘敵深入，避敵主力，打其虛弱，乘退追殲”之作戰方針應對。

戰役結果: 經半個月的戰鬥，國軍失利。共軍殲敵 3 萬人，繳獲武器 2 萬余支，共軍乘勝追擊，占領閩西、閩西北、贛東、贛南廣大地區，進一步擴大根據地，并用繳獲武器組建紅軍獨立第四、第五師。毛澤東爲此賦詞《漁家傲 · 反第二次大“圍剿”》（1931 年夏）：

白雲山頭雲欲立，白雲山下呼聲急，枯木朽株齊努力。槍林

逼，飛將軍自重霄入。

七百里驅十五日，贛水蒼茫閩山碧，橫掃千軍如卷席。有人泣，爲營步步嗟何及！

戰例三：1931 年夏，蔣介石“御駕親征”，携德、日、英國軍事顧問（蔣公似乎身邊經常有外國軍事顧問，請這些外國人在孫子的家鄉班門弄斧，似乎有點信心問題。毛澤東對“共産國際”的人則從不買帳），采“長驅直入，分進合擊”之法，率 30 萬國軍圍剿共軍。這時，中央根據地只剩 3 萬紅軍。兵力對比 10:1。

戰前雙方態勢：紅軍尚未從前兩次反圍剿的疲勞中恢復，且分散在閩西、閩西北、贛南等廣大地區，分散休整，結果措手不及，只得以少數紅軍和赤衛隊的配合下，遲滯國軍正面進攻。

毛澤東繼續用他慣用的誘敵深入，運動中殲敵的戰法。

戰役結果：國軍失利。共軍殲敵 3 萬餘人，繳槍 3 萬余支，這次戰役因兵力極爲懸殊，成爲中國，乃至世界軍事史上以少勝多的典型戰例。以井岡山爲中心的中央根據地也從此進入全盛時期。

面對巨大的勝利，毛澤東這時已沒有心情再吟出優美的詩句，後人永遠沒機會欣賞《漁家傲・反第三次大“圍剿”》了。

就在這次戰役的最後一仗——在方石嶺殲國軍第五十二師全部，紅軍軍長黃公略犧牲之後的第三天，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蔣介石命令 20 萬東北軍不許抵抗，使 2 萬日軍不費吹灰之力侵占東三省。蔣介石推出“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中國面臨著繼續喪失領土和主權的危險。有著强烈民族主義情懷的毛澤東，面對國家的生死存亡，此時的心情不難想像，自己政黨的勝利在國家存亡關頭，已沒什麽值得高興的了，哪還有情調吟詩賦


远 望

詞?

戰例四：1933 年春夏，蔣介石再次“御駕親征”，何應欽爲主帥，率 40 萬國軍圍剿 7 萬中央紅軍, 兵分三路殺將過來。兵力對比 5.7:1。

戰前雙方態勢：紅軍以逸待勞，但共産黨已受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綫的影響，毛澤東被共産國際代表周恩來、李德和博古剝奪了紅軍的領導權。朱德任總司令，周恩來任政委。國軍的不利在于：蔣介石對日本的不抵抗政策招致全國軍民的反對，愛國將領已無心再打內戰；國軍第二十六軍一萬多人宣布起義，加入紅軍。

中共臨時中央采取毛澤東一向反對的“主動進攻戰略”。但在戰鬥過程中, 朱、周主要采取了上三次反“圍剿”的戰略戰術。

戰役結果：國軍失利。

戰例五：1933 年秋至 1934 年 12 月初，50 萬國軍圍剿 12 萬中央紅軍，兵力對比 4:1。

戰前雙方態勢：毛澤東繼續被剝奪軍隊領導權。蔣介石向國際借款采購飛機等武裝國軍，但國軍內部反戰情緒高漲，戰爭過程中，國軍第十九路軍將領蔡廷鍇等人宣布抗日反蔣。

紅軍完全放弃毛澤東的游擊戰和運動戰作戰思想，初期準備“禦敵于國門之外”，失利後又采取“以堡壘對抗堡壘”、“短促突擊”等毛澤東堅决反對的陣地戰打法。

戰役結果：紅軍慘敗，大片根據地丟失，被迫戰略轉移，開始長征。長征紅軍 8 萬 7 千人被殲滅 5 萬人，留守紅軍 3 萬餘人



历尽艰辛为人民

被殲滅 2 萬餘人。

這是共産黨領導集團在否定了毛澤東的領導權後得到的最大苦果。紅軍長征在遵義會議重新確立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前，幾乎成了沒有明確作戰思想的潰逃。

戰例六：1935 年 1 至 4 月，40 萬國軍“圍剿”黔北的 3 萬 7 千長征紅軍，兵力對比 11:1。

戰前雙方態勢：紅軍人困馬乏，喪失根據地，難以補給；但優勢在于：經“遵義會議”，毛澤東的軍事思想被逐漸接受。國軍占盡天時、地利、人和的優勢。

戰役結果：紅軍以 1 萬人左右的代價突圍而走，繞道雲南渡金沙江北上。達到突圍的目標。

這次戰役前後的“四渡赤水”，智調滇軍，跳出了數十萬敵軍圍追堵截的圈子，成爲毛澤東軍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筆。從此，幾乎陷入絕境，充滿悲觀情緒的紅軍，開始神奇般地恢復活力，變被動爲主動。

這次戰役是毛澤東重新取得領導權後第一次打仗，幷取得勝利，終于詩興再起，賦《憶秦娥 · 婁山關》（1935 年 2 月）：

西風烈，長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馬蹄聲碎，喇叭聲咽。

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從頭越，蒼山如海，殘陽如血。

詩人對紅軍曾經歷的重大挫折和當前面對的巨大困難，以及一切不得不從頭開始的沉鬱和感慨，表露于字裏行間。毛澤東在解放後的政治鬥爭中果斷出擊，再不作任何妥協，筆者估計與毛澤東的上述慘痛經歷有關。

1935 年 10 月，紅一方面軍到達陝甘根據地邊緣的吳起鎮，勝利完成長征的壯舉。這是人類軍事史上罕見的壯舉。它讓歷史上一切偉大的軍事遠征相形見絀。西方軍事史上的“戰略之父”，古羅馬時代的迦太基戰神漢尼拔，15 天孤軍穿越阿爾卑斯山的壯舉和紅軍長征比起來，在斯諾看來，“更像是一次休假的遠足”[13]。領導紅軍克服重重困難，從失敗走向勝利，從絕望走向光明的毛澤東，此時的豪邁之情和必勝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在他的壯麗詩篇《七律 · 長征》（1935 年 10 月）裏表露無遺：

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閑。
五嶺逶迤騰細浪，烏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雲崖暖，大渡橋橫鐵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軍過後盡開顏。

戰例七： 1935 年 11 月，30 萬國軍（20 多萬東北軍和數萬 17 路軍），圍剿陝北蘇區的 2 萬多紅軍，兵力對比 15:1。

戰前雙方態勢：中央紅軍剛到陝北數日，疲憊不堪；紅 15 軍團尚未擺脫肅反擴大化的陰影，內部矛盾尚未解決。

戰役結果：國軍被殲滅一個整師，和一個團，俘虜 5300 人，繳槍 3500 支。共軍損失不詳，但可以肯定的是，共軍的主力保存下來，否則就不會有後來的再次更大規模的剿共。

1936 年 12 月，50 萬國軍準備圍剿陝北 8 萬紅軍，兵力對比 6:1。

戰前雙方態勢：紅軍三大主力已于 1936 年 10 月會師，士氣旺盛，以逸待勞。紅一方面軍于 1935 年 10 月到達陝北後，通過東征和西征，擴大了陝甘根據地，有了較充分的物資保證。通過

制定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方針，極大地宣傳了共產黨的抗日主張。而國軍方面，張學良的東北軍面對家鄉遭受日軍的蹂躪，無心內戰。而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正使全國人民失去耐心，各地抗議浪潮風起雲涌。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 1936 年 12 月即將發動的戰役中，蔣介石與毛澤東的實力對比差距，是過去六年歷次戰役中最小的；無論是軍事力量，內部凝聚力，還是民意傾向上，毛澤東的軍隊都擁有過去未曾有過的優勢。隨著日本的步步進逼，"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激起了全國人民此起彼伏的抗議浪潮，而共產黨的抗日統一戰綫政策則獲得越來越多國人的認同和支持，大量熱血青年對共產黨開始產生嚮往之情，奔向延安，其中包括後來成爲毛澤東夫人的江青。在國民黨掌握主要輿論工具的情況下，共產黨第一次在輿論方面變得較爲主動。從反共的著名作家林玉堂的《中國人》（又名《吾國吾民》）也可看得出，林對共產黨的認可和稱許。

那種認爲"西安事變"前紅軍走投無路、坐以待斃的論點，純粹是對上述歷史的不够瞭解，和對紅軍實力的估計不足。即使您不能接受共產黨的政治理念，也不得不承認，那跨越 11 個省，歷時一年多的兩萬五千里長征是一驚天動地的壯舉（臺灣朋友則將長征看成是共產黨丟臉的潰逃。沒錯，開始確實如此，但能在敵軍尾追堵截情況下逃跑兩萬里生存下來，這本身就值得人們的驚嘆）。

長征，是對人類體能和意志的極限考驗。一個經過了這一考驗的群體，還有什麼困難不能克服的呢？要戰勝這樣的隊伍又談何容易？毛澤東領導下軍隊的强大戰鬥力，其精神的歷史起點當爲長征。

認爲“‘西安事變’導致國軍丟失大陸”的論調，完全無視當時錯綜複雜的國內外局勢，爲蔣介石在抗戰和內戰之中的一系列錯誤開脫責任。蔣介石更將張學良作爲代罪羔羊，將全部的怒火發在了他的身上。

單看蔣介石令國難家愁的張學良和他的東北軍去“剿共”，就不難明白蔣介石在用兵上的嚴重問題。在家鄉遭受日軍蹂躪的時候，東北軍的熱血男兒不能奮勇殺敵，却在忙著兄弟殘殺，情何以堪！蔣介石派任何一支部隊剿共，也比派張學良和失去家園的東北軍來得高明。他連自己軍隊將士的愛恨情仇都不瞭解和不關心，又如何戰勝對手？而毛澤東在一場新的戰役開始前，經常多次電報來往，總要就戰役的目的和戰術盡力做說服和徵詢意見工作，直至前綫指戰員心悅誠服爲止，而從來就不是簡單地下道命令讓對方執行；到西柏坡的蘇聯代表對毛的指揮藝術甚至疑問：這是軍事命令嗎？

蔣和毛比起來，高低立見。蔣介石在井岡山山區無法消滅共軍，在溝壑密布的黃土高原，他同樣做不到。因蔣介石既不知己，更不知彼。

二、共產黨抗日的歷史真相

國民黨罵共軍不抗日，說他們不打大仗，只有一次“百團大戰”。國民黨羅列了二、三十個會戰來說明自己打的大仗。 可是只要研究一下日軍投入的兵力就會發現，除了早期的淞滬、武漢、

徐州、太原等少數戰役外，尤其是 1939 年進入戰略相持以後，在大多數“會戰”中，日軍投入兵力的規模并不比敵後大掃蕩大。尤其重要的是，共軍的敵後游擊戰爭，雖然沒有大規模會戰那麼壯觀，但其戰爭效能總和則是極爲重大的。[1]

即使蔣介石的那麼多“會戰”，從戰爭的戰略戰術上講，未必是正確的。看待對戰爭勝利的貢獻，還要看對最後勝利發揮的實際效果。共軍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比國軍進行較少“會戰”，而是積極開展運動戰和敵後游擊戰。這戰術上的差別，實際上是建基于毛澤東和蔣介石對中日戰爭的戰略問題截然不同的認識。

自蔣介石宣布全面抗戰開始前後，中國就存在著兩種截然不

---

[1]臺灣出版的文獻裏雖然也提到諸如游擊隊戰術、共軍爲國軍舉辦游擊訓練營等，但共軍抗戰的詳細資料却很難找到，因此，本章引用數據只能來自大陸出版物，尤其是抗戰時期由共軍將領寫的文章。這是無奈的。本章并不完全依賴數據，更注重結合當時局勢的分析。但臺灣出品的如電視系列片《一寸山河一寸血》第 28 集重點描述游擊戰時，引用外國軍事家的談話，獨不提毛澤東這個世界公認的游擊戰宗師的理論。裏面提到游擊戰威力和牽制日軍 60%力量，但唯獨不提游擊戰中這些農民的組織者和培訓者是誰，甚至采訪的游擊戰士提到誰教他們製作地雷時，只說“專門人才”，唯獨不提這些專門人才和指導員實際上是共産黨部隊的事實。采訪的一個浙東四明山游擊隊員，唯獨不提她就是活躍于浙東四明山的共産黨浙東縱隊(國軍在這裏沒有部隊)。采訪的人士中，只有日本老兵提到八路軍，而在臺灣的中國人則隻字不提，要提也從反面講。看完該系列片的 28、29 集，感覺游擊隊主要是國軍領導打的，而共産黨在游擊戰中的貢獻似乎不足挂齒。直到 28 集最後才提到“延安是最大的游擊隊基地”時（既然最大，爲何到最後才提？大到領導 100%還是 80%游擊戰？），立即提到“雖然抗日，但并沒有放弃對國軍的攻擊”。甚至其中引用《地道戰》和《地雷戰》的片斷的出處也不注明（但《血戰台兒莊》注明了出處）。大陸的資料臺灣方面不信，臺灣方面則不提，或如上面這樣的處理手法；提到“百團大戰”就不忘提日軍大掃蕩對百姓的殘害。臺灣政治環境已很開放，應該比中共更容易做到對歷史問題的灑脫和客觀。看來，只有領教過游擊戰的日本的資料才能提供可信的參考。可筆者接觸過有關日本和游擊隊作戰的資料裏，却從沒提到國軍游擊隊，而“八路軍”的出現率高的驚人。

同的戰爭觀："一種是中國必亡論，一種是中國速勝論。前者產生妥協傾向，後者產生輕敵傾向。他們看問題的方法都是主觀的和片面的，一句話，非科學的"[14]。而毛澤東在全面分析了中日戰爭的形勢後，則提出了"抗日戰爭是持久戰"的觀點。在具體戰略戰術上，毛、蔣之間的差距更是顯而易見的。從戰爭初期的國軍"大會戰"中，可以看出蔣介石對戰爭進程的理解帶有速勝的企圖心。但毛澤東則在《論持久戰》中指出：

"我們的戰略方針，應該是使用我們的主力在很長的變動不定的戰綫上作戰。中國軍隊要勝利，必須在廣闊的戰場上進行高度的運動戰，迅速地前進和迅速地後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這就是大規模的運動戰，而不是深溝高壘、層層設防、專靠防禦工事的陣地戰。這并不是說要放弃一切重要的軍事地點，對于這些地點，只要有利，就應配置陣地戰。但是轉換全域的戰略方針，必然要是運動戰。陣地戰雖也必需，但是屬于輔助性質的第二種的方針。在地理上，戰場這樣廣大，我們作最有效的運動戰，是可能的。日軍遇到我軍的猛烈活動，必得謹慎。他們的戰爭機構很笨重，行動很慢，效力有限。如果我們集中兵力在一個狹小的陣地上作消耗戰的抵抗，將使我軍失掉地理上和經濟組織上的有利條件，犯阿比西尼亞的錯誤（請讀者注意：後面將要分析毛澤東對"百團大戰"的不滿，理論根據在此）。戰爭的前期，我們要避免一切大的决戰，要先用運動戰逐漸地破壞敵人軍隊的精神和戰鬥力（請讀者注意：毛蔣抗日觀的根本不同）。

除了調動有訓練的軍隊進行運動戰之外，還要在農民中組織很多的游擊隊。須知東三省的抗日義勇軍，僅僅是表示了全國農民所能動員抗戰的潛伏力量的一小部分。中國農民有很大的潛伏力，只要組織和指揮得當，能使日本軍隊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時，

使之疲于奔命。必須記住這個戰爭是在中國打的，這就是說，日軍要完全被敵對的中國人所包圍；日軍要被迫運來他們所需的軍用品，而且要自己看守；他們要用重兵去保護交通綫，時時謹防襲擊；另外，還要有一大部力量駐扎滿洲和日本內地。

在戰爭的過程中，中國能俘虜許多的日本兵，奪取許多的武器彈藥來武裝自己；同時，爭取外國的援助，使中國軍隊的裝備逐漸加强起來。因此，中國能够在戰爭的後期從事陣地戰，對于日本的占領地進行陣地的攻擊。這樣，日本在中國抗戰的長期消耗下，它的經濟行將崩潰；在無數戰爭的消磨中，它的士氣行將頹靡。中國方面，則抗戰的潜伏力一天一天地奔騰高漲，大批的革命民衆不斷地傾注到前綫去，爲自由而戰爭。所有這些因素和其它的因素配合起來，就使我們能够對日本占領地的堡壘和根據地，作最後的致命的攻擊，驅逐日本侵略軍出中國。”（請讀者注意：沒有美國的原子彈和蘇聯出兵，中國也必然能最後徹底戰勝日本，根據在此）

毛澤東的上述分析，體現了對中日兩國國情、軍情和國際局勢的準確把握，逐步推導出抗日戰爭的階段性和戰略戰術，直至最後戰敗日本侵略的必然性。從共産黨游擊隊在敵後對日軍的沉重打擊，以及從國共內戰中，解放軍大量采用運動戰，幷最終戰敗蔣介石，說明毛澤東在敵我雙方力量對比于我不利情况下采取運動戰的有效性。從中也可看到，毛澤東對蔣介石“大會戰”的陣地戰打法，不以爲然。

由此不難理解，爲什麽國軍有那麽多的會戰，而共軍則采取廣泛開展敵後游擊戰和運動戰的根本原因。在全面抗戰初期階段，毛澤東向華北、東北、華東、華南派遣了大量的八路軍幹部，“分散以發動民衆，集中以應付敵人”。尤其是發動農民的力量，建立廣布敵占區的抗日根據地，爲後來戰績卓著的敵後全民抗戰作了充分的準備。

而蔣介石的抗戰思想基本上是完全寄希望于軍隊，而將人民的力量放在了一個較次要的、輔助的位置，這和毛澤東“人民戰爭的軍事理論”顯然南轅北轍。劉伯承曾批評蔣的抗戰爲“執行不要人民群衆參加的、單純政府的片面抗戰的路綫。”[15]

我們不妨在此作個假設：如果抗日戰爭的中國統帥是毛澤東，而不是蔣介石，中國抗戰的局面會怎樣？可以肯定的是，國軍不會有那麽多會戰，而是預演國共內戰時期的解放軍運動戰的戰略戰術，初期以消滅日本有生力量爲目標，不會太在乎一城一地之失，在運動中殲敵，將日軍分割到一個個據點，進而各個擊破，最後解放區連成一片，形成全國戰略反攻之勢。如果沒有美國的原子彈和蘇聯的出兵，日本的投降也許會推遲，但按照毛澤東的戰略戰術，日本必敗的命運已經注定。但如果按照蔣介石的打法，在沒有共産黨敵後游擊隊參與的情況下，從 1940 年後國軍“會戰”的地點、規模和戰績也許可以看出，中國戰勝日本將是一條極爲漫長的道路，當全民爲悲觀情緒所主導的情況下，中國亡國不是不可能的。

尤其當日本占領幷有效控制中國的大部分東、北部地區，中國的資源將能被日軍所用，打敗日本將變得更加漫漫無期。但毛澤東的敵後游擊戰和人民戰爭的軍事思想决定了，日本即使占領中國的所有國土，也不可能有效加以控制和利用，因爲日本不可能從人民戰爭的海洋中解脫出來。

日本東京大學教授近藤邦康評價到：“我很佩服《論持久戰》。日本被中國打敗是當然的，這樣非常好的戰略著作在日本是沒有的。日本特資方面和科學技術方面都優于中國，武器優越于中國，但沒有這樣的以哲學爲基礎的宏遠戰略眼光，日本沒有。日本的軍隊是速决戰，中國的戰略是持久戰，結果，日本被中國



的持久戰打敗了。”

從戰後幾十年中，遍布全球的各國游擊隊，在不掌握資源優勢情況下的生存能力和戰鬥力，可以看出游擊戰術的有效性和强大生命力。而作爲全世界游擊戰宗師的毛澤東，在熟悉的中國大地上創造游擊戰的輝煌戰果就不令人驚奇了。

舉幾個共軍反“掃蕩”作戰典型戰例：

戰例一：1939 年 4 月，日軍調集 8 個步兵聯隊（24 個步兵大隊）和支持部隊共三萬余人攻擊晋東南。當地有八路軍 6 個團，共産黨領導的山西新軍兩個團，和國民黨的騎四師。我軍節節抗擊，成功將敵軍分割。集中四個主力團將日軍主力白岐聯隊全殲于長樂村，并重創日軍占米地旅團，斃敵 2200 餘人。日軍全綫潰退，我軍三個星期斃敵四千多，收復縣城 18 座，晋東南全部光復。

戰例二：1941 年，日軍調集十餘個大隊 15000 餘人掃蕩太行山區。共軍以一個團抗擊十倍之敵八天，斃敵 1000 多，日軍疲憊不堪後撤時又被共軍主力兩個旅伏擊，半小時即弃尸 1500 多具，狼狽潰逃。

戰例三：1938 年平型關大捷後，敵進犯忻州與國軍激戰。當時敵飛機二十余架從陽明堡起飛轟炸國軍陣地。八路軍 129 師之一部，奉八路軍總部命令，用一切辦法炸毀陽明堡的敵機，以配合忻州國軍作戰。該部 769 團營長趙子德率隊于黃昏出發，殺入敵陣，將陽明堡敵轟炸機二十四架全部燒毀。該營長光榮殉國。這證明共産黨人與八路軍對國家民族之忠肝赤膽，與日月爭光[17]。

戰例四：1941 年日軍進犯浙江、福建沿海，國軍潰敗。共軍敵後游擊隊經一年艱苦戰鬥，粉碎日軍對浙東的“清鄉”活動，形成包括三北和四明山在內的浙東游擊根據地。

在 1941 年至 1942 年，是共軍敵後抗戰最困難的時期，一方面國民黨的妥協傾向和抗日政策的動搖，另一方面，日軍開始將共軍及其領導的游擊隊視爲頭號敵人而集中 60%的主力予以“掃蕩”（筆者一直懷疑，日本人將共產黨的部隊作爲主要敵人，與蔣介石和日本人的間歇接觸有關，使得日本人認識到蔣介石幷不那麼可怕）。1941 年 7 月至 1942 年七月，八路軍和新四軍共作戰 14648 次，斃傷俘日僞軍 13.2 萬人。八路軍由 40 萬減少到 30 萬，根據地人口由 1 億減少到 5 千萬。

共軍抗日的另一結果就是日軍在華北戰場上四易主帥。

日寇征服華北的陰謀始終遭受華北軍民頑强英勇的反抗，不僅沒有實現占領華北的目的，而且拖住了敵人進攻大後方的後腿。這自然引起日寇極大焦慮，所以在六年抗戰中，華北敵寇已四易統帥。1938 年初寺內壽一爲華北方面軍總司令，代替了原來的華北派遣軍司令官香月清司。于 38 年 8 月就又撤換了。繼任華北方面軍總司令者乃杉山元。當時抗日政權與游擊隊已在各地發展與建立，到處翻車破路，伏擊截擊，予敵以極大威脅，敵寇認爲是“擊滅蔣政權的絆脚石”，故于占領武漢後回師華北。當時的敵人超過二十個師團，占在華北全部兵力一半以上。抗日根據地幷未如杉山元所希望的被其消滅。又不得不在其上任周年紀念日（39 年 9 月）讓位于多田駿。

多田到任不久，即提出所謂“囚籠政策”，沿鐵路公路兩側挖成深溝高壘，實行嚴密封鎖，割裂抗日根據地，敵寇依據這些占領之點綫，向各根據地壓縮。共軍則發動“百團大戰”，粉碎了敵寇“肅清華北、確掌華北”的迷夢。多田在這一慘敗的教訓下，提出改變老套戰法，實行所謂“牛刀子戰術”，即“集結極優勢兵力突擊一點”之意，結果又被我神出鬼沒分散之游擊戰所粉碎。敵寇複提所謂“分散

配備、靈活進剿”，依然無效。至此，多田駿就不能不計竭勢危，宣告退休，于四一年七月代以號稱日本軍閥三杰之一的岡村寧次郎。[17]

除華北主戰場外，共軍還在全國建立了分布廣泛的抗日游擊力量，如著名的海南瓊崖縱隊、東北抗日聯軍、廣東東江縱隊等。

八路軍、游擊隊的抗戰偉績，譜寫了中國軍民共禦外侮的壯麗詩篇，其無數可歌可泣的抗日事迹豈容在此一一羅列?

從侵華日軍與東京的來往電文中，也可發現，自 1941 年始，日軍在中國戰場的主要對手不再是國民黨軍隊，而是共産黨軍隊。日本的作戰方針，則是以“剿滅華北建設致命之敵中國共産黨軍爲目標”。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整個抗日過程中，國軍出現了不少令親者痛，仇者快的事件。除國軍對共軍的防範和直接攻擊，還出現了不少投降和“僞化”的事件。汪精衛能在短時間內組建一個新的“中央政府”，幷集結數十萬的僞軍（初期全部是國軍“僞化”的），就是個明證。毫無疑問，共軍和國軍的兵員來源沒有任何的區別，但他們所在部隊的表現却有天壤之別。共軍在整個抗戰過程中沒有一起向日軍投降和“僞化”的事件發生。這只能說明國共兩黨、兩軍在治軍上的嚴重差异，也必然導致軍隊戰鬥力的差异。

“沒有不好的士兵，只有不好的將軍”。即使在蔣介石本人和其身邊高層官員中，妥協氣氛此起彼伏（蔣可能受到“百團大戰”的刺激），這不能不說是問題的根源之所在。而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就從來沒有考慮過在日軍占領我領土的情況下和敵人妥協的可能性。抗日的時候如此，49 年建國後的歷次民族戰爭中始終如此。

八年抗戰，共産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共與日僞軍作戰 12.5 萬

次，殲滅日軍 52.7 萬人，僞軍 118.6 萬人，繳獲各種槍械 69 萬余支，各種炮 1800 門，抗擊了日軍的大部和幾乎全部僞軍，收復國土 100 萬平方公里，解放人口 1.2 億。共軍共 60 余萬官兵爲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獻出了寶貴的生命。至于那些在共産黨發動下，積極抗戰的千萬人民爲此付出的巨大犧牲（如日軍的“三光”政策），已不可能統計出來。他們已將自己的血肉溶入到祖國的萬里河山。考慮到共産黨幷不擁有國家資源，取得這樣的戰績是極爲驚人的。

蔣介石在抗戰前“剿共”，從來不需要理由。然而，抗戰結束之後，他不得不尋找發動內戰的理由；沒有共産黨在抗戰中的巨大貢獻，以蔣介石的個性，就不可能邀請毛澤東到重慶會談，裝模做樣地伸出個塑料的橄欖枝。毛澤東的軍隊以卓越的戰績爲己方爭得了籌碼；爭得可歌可泣，爭得光明正大。

如果說抗日戰爭讓共産黨受惠的話，那麼可以說，是抗日戰爭給了毛澤東及其政黨和軍隊一個絕佳的機會，以證明自己的軍事政治領導才能和强烈的民族主義精神。而同時也給了蔣介石及其領導的國民黨一個機會，以暴露其內部的一系列弊端。

如果把國共內戰看成是一種特殊形勢的兩黨選舉的話，那麼抗日戰爭時期則是一個預選的過程，它讓人民看清楚，誰才是中國可以托付的力量，才是中國真正需要的領袖。

歷史和人民選擇了毛澤東及其政黨。

人民投票的方式是國共內戰時期的百萬輛手推車和擁軍鞋。

至于有人拿解放後毛澤東接見日本人時所說的“感謝日本”的話來做文章，就未免有點太無聊啦。正如當今不少“鶏湯文”中常說的“感謝您的敵人”，搞銷售的要牢記“感謝每個拒絕您

的人”等類似，道出了看待事物的格局與高度。毛澤東在和日本友好人士打交道時，以他特有的方式表現出自信和灑脫。

彭德怀指挥百团大战

三、“百團大戰”及其它

提起共軍抗日，不能不提 1940 年的“百團大戰”，這是共軍抗日最具規模的一次戰役。自 8 月 20 日起到 12 日 5 日止，歷時三個月又 15 天的“百團大戰”，以我敵後軍民的偉大勝利、敵人的慘重失敗而告終。在整個戰役過程中，我敵後軍民共進行大小戰鬥 1800 多次, 計斃傷日軍二萬多人, 僞軍五千多人, 俘日軍 280 多人，僞軍一萬八千多人；破壞鐵路九百多裏、公路三千里；破壞橋梁、車站 258 處；幷繳獲了大批武器和軍用物資。

但從毛澤東在“百團大戰”勝利後對此次戰役的評價：“戰術上是正確的，戰略上是錯誤的”，似乎可以看出，作爲共軍實際最高統帥的毛澤東，在“百團大戰”發動前幷不完全瞭解這次大規模戰役，這是令人費解的。在資料裏似乎難于查到令人信服的解釋。而在可查到的有關“百團大戰”的資料裏，均提到朱德、彭德懷、劉伯承、鄧小平，却很難見到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名字；這是不正常的。由于這是共産黨抗日的最著名戰役，共産黨似乎不願對其中的細節說長道短，以免影響人們對共軍抗日的認識。但在反毛高潮時，人們基于毛、彭之爭中對彭德懷的同情而對毛澤東就“百團大戰”的上述評價進行批評，才暴露了“百團大戰”背後的這一獨特細節。毛在“廬山會議”上針對彭德懷重提

這一事件，看來此事在毛澤東心中留下的陰影似乎很重。如果彭德懷真的沒有將實際的作戰計劃和兵力調動情況通報毛澤東，其中是否存在著違犯紀律的嫌疑?

筆者以爲，毛澤東的上述評價幷不太超出預料之外，仔細分析，也許正在情理之中。八路軍游擊隊極大地牽制了日軍。從對日作戰的角度考慮，日軍最頭疼的莫過于找不到共軍的主力作戰，以便集中殲滅華北共軍；而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精妙之處就在于，我軍無處不在無處在，這使得日軍的優勢裝備難于發揮作用。對神出鬼沒的游擊隊和運動中殲敵的八路軍，日軍又找不到有效的應對方法。因此，共軍一次將如此大規模兵力暴露在日軍面前，似乎更符合日軍的願望，而有別于毛澤東所偏愛的戰法。更何況，當時中日之間初步進入戰略相持階段，距離全面反攻還有很長一段路。如果戰爭的戰術運用不當，或低估敵軍的實力，結果將不堪設想。華北共軍爲迎接戰略反攻所做的準備將會面臨重大挫折，延誤抗戰勝利的時間。

萬幸的是，這次戰役我方贏了。

從當時國共兩黨的微妙關係來看，共軍是否應組織這樣大規模的戰役同樣令人懷疑。在蔣政府內部始終有一股妥協的力量，這股力量有兩派組成，一爲再戰必亡派，一爲堅决反共派。而後者對共軍在抗戰中的迅速崛起及表現出的戰鬥力非常不安。蔣本人就基于反共的考慮而有明顯的對日妥協動作，和日本的接觸時斷時續。“百團大戰”的勝利，雖然鼓舞了全民、全軍（包括國軍）的士氣，但對蔣介石的國共團結抗日政策却可能帶來動搖。而後者對全民抗戰來說才是最大的威脅，和最應該盡力避免的。

毛和蔣有長期打交道的經驗，沒人懷疑毛是最瞭解蔣的人。毛澤東實際上是在抗日夾縫裏游走，既要按照《論持久戰》的戰

略方針積極抗日，爲最後的全面反攻做準備，同時又要避免國共團結抗戰中途夭折，導致親痛仇快。其中分寸的拿捏當屬不易。

不記得是哪部電影中有這樣的鏡頭：當蔣介石聽到“百團大戰”勝利的消息，不禁皺眉：“華北共軍一下就集中了一百個團，海南、廣東有幾個團呢？”。這個情節是根據史實還是編劇的杜撰難以確證，但這樣的情節并不離譜。只要回顧一下 1939 年底抗日正酣之時，蔣介石就在十一月調整了他們在晋冀魯豫地區的力量，安排了互相配合著的三路反共大軍：一路是以它在太行山南部和中條山區的軍隊，配合閻錫山反對山西新軍的活動，從南面、西面壓迫共軍，企圖消滅太行山南部與晋南的山西新軍和八路軍；一路是以九十七軍軍長朱懷冰所部進到太行山北部，配合鹿鐘麟等，企圖控制冀西地區，割斷共軍太行和冀南的聯繫，爾後進取冀南；一路是以石友三部的兩個軍和冀察游擊總指揮孫良誠等部，從東面向冀南、冀魯豫共軍進攻[17]。1941 年 1 月 7 日更爆發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蔣命令國軍第三戰區 8 萬余人向九千人的新四軍發起攻擊，導致 6000 名新四軍陣亡。之後蔣更宣布新四軍爲“叛軍”，撤消番號，軍長葉挺革職審判。“事變”激起了全國軍民的强烈憤慨。在輿論的壓力下，蔣介石不得不在 3 月 6 日宣布“以後决無剿共之軍事”。[1]

---

[1]快要亡國了，蔣總統還在剿共。臺灣方面的普遍說法是：新四軍爲擴大實力主動攻擊國軍，與大陸的說法完全相反。上述石友山等部與共軍的摩擦，臺灣方面的說法也是共軍主動攻擊。到底是國軍壓縮共軍地盤還是共軍主動攻擊國軍？何種說法更接近事實呢？要判斷這一點，毛的軍政謀略將是主要依據，因毛并不是頭腦簡單，只知道搶錢糧的土匪。對毛澤東來說，國共合作破裂并不符合共産黨利益，當時國民黨掌握輿論的主動，如果共産黨敢這麽做，無疑于將自己放在全國人民的對立面；更何况毛從來重視群衆力量，這是共産黨起家的本錢，如主動攻擊國軍，難道他不怕毀掉共産黨的形象和失去人民支持？　遠離（接下頁下）

乘蔣介石"圍剿"共軍之機，日軍趁勢擴大戰果，襲擊了共軍的根據地，提起來就更令人傷心了。

不論蔣介石在北伐和抗日中做出了多少貢獻，但他的一系列的作爲却讓每個國人深感窩囊。筆者剛出國時，曾打算利用在海外查資料的方便，而爲大陸中國人專門著述，爲蔣介石平反，但每念及老蔣的一系列窩囊事，都令人提不起說他好話的勇氣[2]。從政治遠見、意志力、軍事才能、民族精神等各方面來看，他都不適于成爲民族獨立和興旺的寄托。

（接上頁下）共軍主力的新四軍如主動攻擊包圍著自己而且力量大得多的國軍，無疑以卵擊石。毛澤東有這麽蠢嗎？而筆者閱讀過一些美國人有關抗日戰爭的片斷，從來沒有共軍主動攻擊國軍的記述。這種說法只存在于臺灣和反共人士之間，是否有些不太對勁？考慮到蔣介石在戰前剿共、抗戰中拒絕美國提出的將援助物資和共軍分享、不許投降日軍向共軍繳械、拒絕毛澤東建立聯合政府倡議等事實來看，蔣在抗戰中壓縮共軍地盤以阻止共軍發展的說法，具有更高的可信度。

[2] 蔣介石所做的窩囊事還包括後來請侵華日軍將官作軍事顧問幫助打內戰，其中有侵華時間最長，罪惡最大，製造"濟南慘案"和施行"三光政策"的侵華日軍首要戰犯岡村寧次。據中央社 1949 年 1 月 26 日電："由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舉行複審後，于十六時由石美瑜庭長宣判無罪。當時庭上空氣緊張。岡村肅立聆判後，微露笑容"。之後連同其它 260 名日本戰犯沒有受到任何懲罰而被蔣介石送回日本。如果封蔣爲抗日英雄，那麽這個英雄的光環上有著太大的污點。毛澤東爲此發布《中共發言人關于命令國民黨反動政府重新逮捕前日本侵華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和逮捕國民黨內戰罪犯的談話》，之後又在《中共發言人關于和平條件必須包括懲辦日本戰犯和國民黨戰犯的聲明》中首次罵蔣介石犯下賣國罪（確實賣國賣得離譜）。岡村 1950 年又被蔣介石聘爲"革命實踐研究院"的高級教官。1955 年後，岡村糾集日本陸海軍舊軍人組織"戰友會"，積極參與復活日本軍國主義活動。日本今日對侵略歷史的態度與當時懲罰戰犯不力密切相關。而日本天皇沒有受到懲罰，蔣介石更難辭其究。在"開羅會議"上，羅斯福和丘吉爾準備戰後廢除天皇制，并徵求蔣的意見，蔣却建議讓日本人民作出抉擇（德國人是否有資格决定希特勒的命運？）；考慮到日本人的民族性，這等于維護了天皇制，使得最大戰犯裕仁逃脫制裁，繼續享受 40 多年的尊貴地位。蔣對天敵日本戰犯比對中共還友善，這和慈禧太后有何區別？蔣的親日延續了臺灣島內的親日力量，爲今日"台獨"力量崛起負有責任。

至于蔣打擊新四軍加緊剿共，如果是受“百團大戰”帶來的心理衝擊，彭德懷和朱德的錯誤未免太嚴重了。毛澤東對“百團大戰”的評語將更顯準確。而毛澤東一直到“廬山會議”還舊事重提，就容易理解了。畢竟，這不僅涉及到紀律問題，也影響到上下級、中央和前綫指揮員之間的信任（領兵將帥擁兵自重的嫌疑是很危險的）；而毛澤東却又無法對“百團大戰”和彭德懷等人提出公開批評，否則會影響到外界對他本人和共産黨抗日積極性的質疑。

毛澤東作爲一百多年來民族主義思想最强烈的政治家，讓他面對外國的威脅和侵犯而不積極抵抗，是不可思議的。從他後來的一系列軍事行動中也可看到，當面對外侮時，他從不因爲對手的過分强大而退却，那麼，他在抗日戰爭中不積極抗戰也就難以想像了。因此，當對毛澤東就“百團大戰”的態度進行評判時，更應從軍事和政治戰略高度予以把握，而不能因爲對彭德懷後來政治命運的同情而加入對毛澤東的偏見。否則，在毛澤東領導下，八路軍、新四軍和敵後游擊隊那轟轟烈烈的抗日烽火，又將如何解釋呢?

那麼，毛澤東何時才展開大規模對日反攻呢？根據《論持久戰》和國共抗戰的微妙關係，毛澤東會通過全面游擊戰和運動戰來推動對日包圍和各個擊破，當在中國大片國土（如華北和華東）上形成對日本的絕對優勢，同時確保有足够的力量對付蔣介石可能的背盟攻擊（這事老蔣肯定幹得出來）；只有在此情况下，毛澤東才會組織大兵團作戰，爭取最短時間趕出日本侵略軍，然後和蔣介石的內戰也就很快登場。在這一天來臨前，共産黨只能選擇游擊戰和運動戰，只有這樣，才能確保國共抗戰統一戰綫的存

在，同時不斷打擊日軍，擴大根據地面積。

“百團大戰”打得有點早了！

而“百團大戰”之後，日軍將華北共軍作爲首要敵人，幷集中大部兵力對付裝備很差的游擊隊和游擊隊出沒的村莊，使得在之後的短時間內，華北共軍建立的敵後根據地損失慘重。甚至可以說，彭德懷發動的這場戰役，很可能打亂了毛澤東的戰略規劃。

如果毛澤東完全從自身政黨利益出發的話，那麽，彭德懷在“百團大戰”之後很難再在共産黨內享有後來那樣的地位。事實是，一直到“廬山會議”之前，毛、彭還維持著不錯的合作關係。

四、蔣介石的遺憾　民族的幸運

抗戰勝利之日起，內戰就已經開始，這首先是因爲國民黨壟斷受降權引發的。日本投降後次日，蔣介石發出命令，要求國民黨軍隊“加强作戰，積極推進”，“不得稍有鬆懈”，要求中共軍隊“應原地駐防待命”，“勿再擅自移動”。于 1945 年 8 月 15 日，蔣介石指令駐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要求“聽候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之命令”。具體負責受降的何應欽在給岡村的指令中要求，凡非蔣介石或他本人指定之受降軍官及代表和部隊，日軍絕對不得移交，幷應拒絕其通過，防止其占領城市（在全球反法西斯國家中，只有中國人給予侵略者這樣的待遇，其它國家都在利用最後的機會給侵略者以劇烈打擊和報復）。國民黨企圖剝奪堅

持抗戰八年的中共的受降權，顯然是中共不能接受的。由于中共軍隊多在敵後，位置有利，在受降時迅速收復了大量敵戰區及中小城市，控制了相當數量的交通綫，使解放區的面積達到近百萬平方公里。國民黨軍隊主力部隊遠在大後方，在依靠空運接受了南京、上海、北平、天津、瀋陽、長春、武漢、鄭州等大城市後，對廣大敵戰區的接收，尤其是華北、華東部分地區，需要通過解放區，或者要接收的已經是解放區，這就不免與中共軍隊發生衝突，引發內戰。

毛澤東要求“脫離分散游擊狀態”，編組正規兵團。各解放區編成的野戰部隊合計近 60 萬人。

上述受降情況回顧，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在抗戰中共軍和游擊隊的對日作戰情況；而處于後方的國軍對日作戰的機會以及給日軍的威脅，顯然不如處在敵後廣大地區，與敵近距離接觸的共軍及其領導的游擊隊。也表明了國共內戰的不可避免。[1]

1946 年內戰全面爆發前，國民黨軍隊整編後共 36 個軍 150 個師 400 萬人（蔣介石當時號稱 800 萬），其中正規軍 200 萬。共產黨有軍隊 120 萬，其中野戰軍共 60 萬人。雙方兵力對比爲 3.6：1。

請讀者注意上面這組數據：後來日本投降後的繳械，用來換裝和充實部隊。那麼，投降前共軍游擊隊和民兵這 120 萬軍隊（共產黨沒理由故意誇大這個數字）的裝備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不

[1] 抗戰結束前夜，毛澤東發表《論聯合政府（1945 年 4 月 24 日）》談到成立民主的聯合政府構想（詳細說明參見第五章第一節）。毛澤東真心希望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的現代中國。可當時蔣自恃擁有美式裝備的八百萬大軍，三個月可消滅中共，使中國錯過了一個建立多黨民主國家的有利機會。而蔣介石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脚，也導致數十萬人民的死亡和直到今日的國家分裂。早知如此，何必當初！蔣的失敗根本不值得同情。他的教訓對今日臺灣執政者來說，是值得參考的。

論武器性能如何，至少每人應該有一支槍（包括部分自製土槍）；當然，蔣介石不可能如此慷慨幫助共軍，共軍本身沒有這樣的軍工能力，蘇聯在抗戰初期的援助給了蔣介石（斯大林指望蔣能協助對付日本），那麼共軍的武器主要可能渠道是戰場繳獲。如果這個推理正確的話，要取得這樣龐大規模的武器配備，共軍要殲滅多少敵人呢？至少 120 萬人，而且都能由共軍清理戰場；共軍自身犧牲人員的武器大部分都能由戰友揀回來，且武器損耗很小。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上節中有關共軍戰績的數據，即：殲滅日軍 52.7 萬人，僞軍 118.6 萬人，繳獲各種槍械 69 萬余支（槍支數量的差額部分是蘇聯將繳獲日軍的武器給了共軍），各種炮 1800 門，共軍共 60 余萬官兵獻出了生命——這一論述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八路軍游擊隊和發動起來的人民抗日力量的抗日偉績也就有了可靠的證據！

至于說共軍乘日本侵華期間壯大，是顯然的；但他是在積極抗日的過程中壯大，而不是在無所事事中發展，否則，這一壯大所需要的軍需配備就沒有了來源（日本人也不會那麼蠢，允許共軍在自己身邊壯大而不予打擊）。而這種抗日中的發展壯大不僅不應受到指責，相反，應該獲得所有炎黃子孫的敬重和感激！他們在如此艱困的條件下還能得到巨大發展，并牽制日軍總兵力的 60%，這本身就證明了這支軍隊令人贊嘆的能力。國軍爲了擴大兵源，采取“抓壯丁”的方法（農村老一代的人皆知此事），造成百萬家庭的苦難經歷；而共軍徵兵則采取耐心說服的方法，從不强迫。據老人們講：這些“土八路”的方法是“軟磨”（類似現在的保險從業員的手法），一次說服不了會來幾趟，甚至坐在家裏不走，幫助打水、劈材、掃地等做一切能幹的活，使得這些農民們看到這個軍隊的精神面貌，自己的娃兒跟著這些好人應該沒

問題。等决心從軍時，這些農村青壯年的思想教育工作已經完成，共軍紀律嚴明、戰鬥力强且受到人民尊重也就不奇怪了。老農們笨拙的嘴都會說一句："毛主席的軍隊是好人"。（這種注重思想工作而非濫用威權的手段實在值得任何時代政治家、軍事指揮員學習。）

就武器裝備來看，雙方對比有明顯的差距。國民黨正規軍主要爲美式裝備，而共産黨軍隊武器配備多爲歷次戰爭中繳獲的，配備最好的是東北野戰軍，因蘇聯將繳獲日本的武器給了共軍。在以東北野戰軍爲主力組成最初的抗美援朝志願軍時，僅步槍的口徑就有 15 種之多；爲減輕後勤壓力，在入朝參戰時選配了其中的五種。從武器上來看，共産黨軍隊是一支標準的"雜牌軍"。

就是這樣的"雜牌軍"，在短短四年多的時間裏，如秋風掃落葉般將有美國强力支持的國民黨軍隊趕出了大陸。幷在其後的短時間內徹底消滅了盤踞在大陸各地的一切地方武裝，實現了蔣介石執政時期從來沒有真正實現過的國家的大統一。

與美國對蔣的支持相比，蘇聯對共軍的支持之微則是相對令人遺憾的。斯大林從反對毛澤東過長江，大使館跟隨國民黨政府南遷廣州，斯大林從來就不希望毛澤東統一全中國。1949 年後蘇聯對華援助方面的積極配合，筆者一直懷疑與斯大林內心的這點對中國共産黨的虧欠有關，使得他不得不表現出更大的誠意，消除中、蘇兩黨間的歷史心結。

從共軍抗日和國共內戰期間共軍的戰鬥力來看，在相對力量對比明顯處于劣勢的情况下却能取得輝煌的戰果，證明了毛澤東戰略戰術的正確性。那麼，有什麼理由認爲，沒有日本侵華，擁有同樣高超戰略戰術的毛澤東，就不能一步步取得同樣輝煌的戰

果幷最終戰敗蔣介石呢?

毛澤東最終戰勝蔣介石的根本要素，是毛澤東首先發現了中國社會的根本問題——農民問題，幷通過“土改”最大限度地建立了和占中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民的血肉聯繫。毛澤東同時認識到推動歷史前進的真正源動力——人民。毛澤東人民戰爭的軍事理論實際上是將人民的力量與軍事鬥爭聯繫起來，甚至後來的經濟建設中也可看到，“發動民衆”在毛澤東政治哲學中居于核心地位。而蔣介石則更多地表現了“只識彎弓射大雕”的武夫形象，和完全依賴軍事力量的軍閥作風。二者的這些根本性的不同，決定了蔣介石沒有戰勝毛澤東的可能，而毛澤東戰敗蔣介石則更符合歷史的必然，因毛依賴人民。

毛澤東身上强烈的民族主義和大無畏英雄主義氣概，也正符合積弱百年的中國所急需的領袖性格。蔣介石在北伐戰爭中廢除外國在武漢的治外法權，後來又陸續廢除了外國在中國的租界和特權，雖然有國際環境于我有利的一面，但蔣介石身上仍然表露了强烈的民族主義的色彩；但在抗日戰爭前和抗戰中後期的妥協政策，則極大地破壞了他本來不錯的形象，讓中國人民，尤其是知識分子，倍感失望。他領導下的中華民國無所不在的貪污腐化、對底層人民苦難的漠視、軍隊的嫡系旁系之別、高級將領貪污軍費嚴重、對前綫戰士利益的漠視（國民黨軍隊的嚴重問題，有興趣的讀者可讀一下美國人寫的文章、回憶錄或評論。其中有些內容比中共反蔣的描述還可怕。如：司徒雷登的《在華五十年》、約瑟夫 · W · 埃謝裏克的《在中國失掉的機會》、布賴恩 · 克羅澤的《蔣介石》等）、他本人對戰爭前綫具體戰術的過分干預，無不暴露了蔣介石失敗的必然性。

因此，打敗蔣的有兩個人，一是毛澤東，另一個就是蔣介石


农民欢送子弟参加志愿军

本人。

蔣介石的失敗和毛澤東的勝利，也爲今日的中國執政當局提供了正反兩個方面的教材。但他們吸收了其中的經驗和教訓了嗎?

隨著中國貪污腐化的日益嚴重，軍警自軍隊經商以來所遭受的形象、內部道德和官兵關係的破壞（雖然還沒嚴重到不可救藥的地步），是值得中共當局認真檢討的。很顯然，他們已將歷史的教訓全部忘却。

他們也許沒忘，只是缺少行動的勇氣、能力和道德力量罷了。

順便請讀者看一下解放戰爭中的一個小插曲。這是毛澤東于1949年4月30日，就英國軍艦在長江上對解放軍開炮所發表的聲明，譴責英軍的暴行：

“我們斥責戰爭販子丘吉爾的狂妄聲明。四月二十六日，丘吉爾在英國下院，要求英國政府派兩艘航空母艦去遠東，‘實行武力的報復’。丘吉爾先生，你‘報復’什麼? 英國的軍艦和國民黨的軍艦一道，闖入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防區，幷向人民解放軍開炮，致使人民解放軍的忠勇戰士傷亡二百五十二人之多。英國人跑進中國境內做出這樣大的犯罪行爲，中國人民解放軍有理由要求英國政府承認錯誤，幷執行道歉和賠償。難道你們今後應當做的不是這些，反而是開動軍隊到中國來向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報復’嗎? 艾德禮首相的話也是錯誤的。他說英國有權開動軍艦進入中國的長江。長江是中國的內河，你們英國人有什麼權力將軍艦開進來? 沒有這種權力。中國的領土主權，中國人民必須保衛，絕對不允許外國政府來侵犯。” [25]

筆者之所以抄錄于此，概因這是 1840 年鴉片戰爭以來，第一位中國領袖對英國發表義正嚴詞的譴責，而當時解放軍距取得全國勝利還有一段距離。而蔣介石的中華民國政府呢？不說蔣在抗日戰爭中的那份心不在焉，在二戰後，身爲戰勝國，也是世界四强之一的中國，爲抗擊法西斯做出了極大的犧牲和貢獻，然而，我們的蔣大總統却和蘇聯簽署《中蘇友好條約》，放弃外蒙，同意蘇聯駐軍旅順，共管大連和中長鐵路等（這哪像是個戰勝國）。甚至爲了準備打內戰，而放弃“開羅會議”已經達成的戰後中、美雙方共同派駐對日本占領軍的權利。蔣介石的短見給中國和東亞帶來永久性、戰略性的不良後果；否則，今日的釣魚島之爭不會出現，日本也不可能控制琉球，相反，由于歷史和文化的淵源，琉球沒有可能再回到日本人手裏，更可能面向中原[1]。如果在東京周圍有一支哪怕只有兩千人的中國軍隊，日本在戰後也不會那樣狂妄，更別說參拜靖國神社了（臺灣的親日台獨分子如李登輝，至少腦袋會稍微清醒一點）。日本投降後，中國軍隊解放越南，後來又阻止了法國試圖對越南的重新占領，正當中國軍人受到越南人民的歡呼和感謝時，蔣介石却在重慶和法國簽約，將越南的控制權重新交給法國，中國軍人浴血奮戰的結果却是將對中國有著重大戰略利益的印度支那重新交給戰敗者。在這種對比中應不難看出，毛澤東的勝出對提振民族精神，恢復民族尊嚴，具有比蔣更明顯的優勢，也更符合中國社會發展的需要。作爲一名英勇

[1]開羅會議時，羅斯福曾兩次建議中國接收琉球都被蔣介石拒絕，後來蔣對此的辯解是：唯恐美國人以爲他有領土野心。唉，有這樣膽小怕事，瞻前顧後的領導，國家之不幸。再聯想一下毛澤東第一次訪問蘇聯時就向斯大林提出收回外蒙，因此受到斯大林的冷落；雖然當時毛有求于蘇聯。蔣介石當時的心態在過去百年的中國精英群體中，具有代表性，那就是面對西方列强時，謹小慎微，謙卑恭敬，唯恐得罪西方國家。而毛澤東則是天王老子都不放在眼裏，唯國家利益是求。

的軍人，在蔣介石這樣的統帥麾下殺敵，有時難免感到窩囊。

直到建立新中國，才結束了外國在中國的一切特權，甚至連蘇聯“老大哥”的面子也不給。在毛澤東 49 年第一次訪問蘇聯的 70 天裏，雖然中國有求于蘇聯，但在國家主權完整的爭取上費盡周折，幷使得蘇聯同意在 1952 年底提前結束在上述《中蘇友好條約》中于中國攫取的特權（由于韓戰而推遲到 1955 年才撤出）。雖然毛澤東爲蒙古問題做了一番努力，但蘇聯不可能做出讓步。在中國軍事顧問團和物資的支持下，于 1954 年“奠邊府戰役”將法國人趕出印度支那，消除了歐洲强權通過印度支那對中國南部的威脅，改善了中國的地緣戰略環境。

對不少的臺灣同胞來說，由于從小學開始接受的教育，對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有相當高的認同，這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沒有毛澤東的出現，蔣介石的這一政策在歷史的評價上將具有相當大的說服力。當蔣介石的這一政策在抗戰前被廣大知識分子瞭解後，人們自然對蔣的“韜光養晦”和“遠見卓識”產生由衷的敬佩，也對蔣的不抵抗給予理解，從學貫中西的林語堂的《吾國吾民》中可見一斑。

“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出發點是：蔣介石認爲中國的對日抗戰還沒作好準備。在戰前，中國在蔣介石的領導下，確實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大後方建設高潮，川江航道得到疏浚，多條鐵路綫加緊建設，東部部分工業設施西遷，陪都重慶和四川大後方的發展步伐也大大加快等。所有這些都說明蔣介石確實在進行認真的備戰。



首批入朝的志愿军炮兵装备陈旧，多是骡马拖拽。这是在第二次战役中，炮兵将火炮拆开，把沉重的炮零件扛到阵地上去。

共產黨雖然同時受到蔣介石的尾追

堵截，損失慘重，也從來沒有因爲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而罵蔣爲賣國賊。這是任何中國人都必須承認的事實。筆者雖給予理解，仍對這一政策的可行性有所疑問：蔣介石是否考慮到人民的感受和接受能力？民心可用而不可泄。日本人是否能等著你準備好後再擴大侵華戰爭？當日軍發動“七 · 七盧溝橋事變”後迅速向南推進時，已經證明了蔣介石政策的理想主義色彩。如果日軍跨越黃河天塹，控制越來越多地區和資源時，中國備戰增加的實力，能否一定大于日本同時在中國擴大的實力，這本身就是個未知數。

另一個不可思議的是，面對兩萬日軍對東三省的入侵，蔣介石却令 20 萬東北軍不抵抗，而拱手將東三省讓給日本人，那麼國防建設的目的何在？如果 20 萬軍人打不過 2 萬日軍也就算了，問題是中、日之間根本沒有認真交手，中國就無條件認輸，將當時中國軍隊中屬于最精良的東北軍大量裝備和東北豐富的資源拱手讓給日本。對這一事實無論如何解釋都是令人難以接受的。如果能向劉邦對付匈奴那樣，打得過就拒敵軍于國門之外，打不過的話，到時再來一面“和親”，“租借”東三省，一面“安內”兼“韜光養晦”，那您蔣總統的智慧和能屈能伸的氣魄，無論如何都要被歷史濃濃地贊揚一筆！

在蔣介石積極推行“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十多年後，另一件由毛澤東主導的“好戲”，則徹底否定了蔣介石這一政策的歷史評價，這不能不說是蔣介石個人的重大遺憾：

1950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幾個月後韓戰爆發。毛澤東在全面權衡下，决定“抗美援朝，保家衛國”。下面就抗美援朝戰爭和“九一八事變”前後中日戰爭的背景及敵我實力作個對比：

國際政治局勢的對比：日本侵華必然對美國和蘇聯以及歐洲



志愿军二级战斗英雄王天保用拉-11 活塞式飞机，击落F86喷气式飞机四架。除了中国军人，还有谁如此“有种”？西点军校教官在总结韩战失利时谈道：蒋领导下的中国军人象一群鸭子，没想到在毛泽东统率下变成一群狮子。

在亞太地區的特權構成威脅。如香港之于英國，澳門之于葡萄牙，印支之于法國，中國東北之于蘇聯，整個西太平洋之于美國等。而美國將戰火燒到鴨綠江，只有蘇聯的地緣戰略利益受到挑戰（不計中國，因此處中國爲參戰國）。而美國出兵朝鮮是在聯合國的名義下進行的，幷有四十多個國家的軍事參與或物質及後勤支持。這决定了中國抗日要比抗美援朝具有相對較爲有利的國際環境。

從日、美前後兩個對手的當時實力來看：日本是東亞强國，但其綜合實力與當時的亞太强權美國和蘇聯相比，無論是經濟、資源、人口還是領土面積，日本不僅不占任何優勢，而且具有劣勢。而美國在二戰中不僅毫髮無損，而且一躍成爲世界超强，無論經濟、科技和軍事實力都遠超越蘇聯。美國有戰略武器原子彈，日本沒有具有特別優勢的裝備，雖然整體軍備比中國强。

從當時國力來看：1931 年國內有 6 萬“共匪”占山爲王，控制區域不到半個江西省的面積，控制地區人口 150 萬；“共匪”除得到共産國際的精神支持外，孤立無援。而 1950 年大陸有蔣介石殘餘部隊及各地方武裝近百萬人，遍布在東南沿海島嶼和中西部省份；蔣得到美國的支持，伺機反攻大陸。至于國民經濟情況，直到 1953 年大陸才恢復到抗戰前的水平。抗戰和三年內戰摧毀了中國大陸的經濟基礎。

從當時國共軍力的相對對比來看：蔣介石在“九·一八事變”後就配備了飛機，而抗美援朝初期志願軍還沒有配備。蔣介石的武器主要是美式和德式裝備；前面已經提到，初期組成抗美

援朝志願軍的東北第四野戰軍，步槍的口徑就有 15 種之多；爲減輕後勤壓力，在入朝參戰時不得不選配了其中的五種。當然，抗戰爆發後，外國和海外華僑的支持，以及抗美援朝開始後蘇聯的軍備提供，在此不提。從日、美參戰部隊的戰鬥力和作戰經驗來看，不少日本軍人是緊急徵召的年輕人，日本戰綫長，而美國參加韓戰的部隊如八軍、陸戰一師、騎一師都是美軍中響噹噹的王牌軍，且又剛打過二戰，富有實戰經驗，裝備有世界最新型的坦克、火炮和各種輕重武器。幷且擁有絕對的制空、制海權。其它參戰國派出的也都是他們的勁旅，如被志願軍擊潰的英軍第 29 旅皇家重坦克營等。

從戰場“地利”和“人和”角度來看，抗日戰爭發生在中國自己的廣闊領土上，無論是地利還是人和，我均占優勢。而抗美援朝發生在面積狹小的朝鮮半島，我方沒有地利，也談不上人和。

從民意上看，日本侵華激起全民抗日熱情，而蔣介石抗日也得到“共匪”的支持和配合。而抗美援朝開始前，中共高層反對聲音很强，蔣介石當然不會配合，反而會極大地牽制解放軍的力量。入朝參戰後，大陸掀起全民支持抗美援朝的高漲愛國熱情，另當別論。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毛澤東發動抗美援朝時與“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的處境相比，在政治、物質和軍事條件上幷不占任何的相對優勢。考慮日、美這前後兩個對手的狀態，毛澤東的相對劣勢幾乎大到不可思議的地步。從敵我雙方彈藥的消耗也可看出裝備上的差距和戰爭的慘烈：美國在 3 年時間內，在朝鮮半島 22 萬平方公里土地上消耗的彈藥爲 330 萬噸，相當于美國在整個二戰期間全球戰場總消耗量（690 萬噸）的一半，而志願軍消耗

15 萬噸，彈藥消耗爲 1：22。而按中國和美國公布的己方傷亡數據，雙方傷亡人數基本持平[31]。韓戰勝利向世人展示了中國軍人不僅善于運動戰和游擊戰，在陣地戰方面同樣一流；也否定了毛澤東的軍隊只善于人海戰術的看法。[1]

抗美援朝戰爭取得了令世界震驚的輝煌戰果，也讓中國的國際地位空前提高，極大地振奮了民族精神。美國軍事歷史學家沃爾特·赫爾姆斯在《朝鮮戰爭中的美國陸軍》中說："從中國人在整個朝鮮戰爭期間所顯示出來的强大攻勢和防禦能力中，美國

---

[1]有關韓戰各方傷亡人數，各方統計資料有些差別。但無論是美、韓、英、中的資料中，聯合國軍的傷亡人數都在一百萬以上。1988 年中國出版的《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戰史》統計數據爲：中朝軍隊共殲敵 109 萬餘人，其中美軍 39 萬餘人（這個數據不同來源差別較大，從 4 萬到 30 多萬。基本可以肯定的是，美國公布的 4 萬多美軍傷亡的數字有誤；僅第一戰役的西綫第 8 集團軍美 2 師一個下午就損失四千人，該集團軍被瓦解，在驚慌逃跑時集團軍司令沃克中將車禍身亡；筆者一直懷疑美國爲掩蓋其失敗而將沃克陣亡謊稱車禍。東綫長津湖一戰，2 萬人的美軍王牌勁旅陸戰一師被包圍，最後損失一萬一千人突圍。第一戰役的巨大損失使得美國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緊急徵兵。如果 3 年僅損失 4 萬人，剛經歷二戰的美國沒必要全國進入緊急狀態），韓軍 66 萬餘人,其它國家軍隊 2 萬餘人。志願軍共傷亡 36 萬餘人（其中陣亡 11.5 萬余人，戰傷 22.1 萬餘人，事故傷亡和病故等非戰鬥死亡 2.5 萬餘人），失踪、被俘 2.9 萬餘人（部分被强制送往臺灣）。只有兩岸一些中國人認爲戰爭結局是平局，而臉皮最厚的美國人也認爲美國慘敗；因中美于鴨綠江交火，在三八綫停火，美軍被打退 500 公里，這哪是平局？更奇怪的是，不少人說毛澤東慣用人海戰術，可他的軍事生涯中很少有在人數上占明顯優勢的時候。這是失敗者蒼白無力的辯解。當然，在具體戰術上，他一向强調"集中力量打殲滅戰"，這是局部戰術的正確運用。只有白痴才喜歡用較少的力量對付幾倍于己的敵人，只有上帝才能在這種情況下常勝。解放軍在歷次戰爭中"上帝"水平的表現另當別論；例如，志願軍一級戰鬥英雄譚秉雲一個人靠三個手雷，一支步槍，不顧頭上流血的傷口，堵住美軍機械化騎兵二師 8 小時，保證我大部隊安全渡江，擊毀敵人坦克兩輛，汽車一輛。戰鬥英雄劉光子更"過份"，一人俘虜了 63 個英國兵（這些不識幾個字的農民實在可敬可愛，就不知他們的能耐爲什麽會那麽大？）。"上甘嶺"就不用說了。


参加过韩战的“常香玉号”飞机现在北京昌平的航空博物馆里展出

及其盟國已經清楚地看出，共產黨中國已成爲一個可怕的對手。它再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那個軟弱無能的國家了”。

隨著歷史檔案的不斷解密，人們對朝鮮戰爭的前因後果，或過程曲直會有不同的認識，但對中國來說，一個直接的收穫是：奠定了東北工業基地的安全基礎，確立了中國的軍事和民族信心；如果沒有抗美援朝，後來的中國人面對世界強權時的自信，必然大大折扣。

在抗美援朝進行的同時，新生的共和國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徹底摧毀了蔣介石在大陸的一切殘餘，及盤踞內陸各地的地方武裝，解放西藏，實現了除臺灣和個別沿海島嶼之外的國家大統一；徹底消除了賣淫、賭博、吸毒、黑社會、封建會道門等社會醜惡現象；在大陸範圍內，基本完成了土改；完成了國民經濟的恢復，遏止了建國初期的惡性通貨膨脹暗流。大陸軍民在抗美援朝中得到了考驗和鍛煉，民族凝聚力空前提高，爲將要起步的國家工業化和大規模基本建設奠定了堅實的社會基礎。

從戰後美國人的表現也可看出，美國對這場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進行的錯誤戰爭”恨不得徹底忘掉。好萊塢的電影導演們，圍繞那場失敗的越南戰爭和二戰，拍了大量的電影，以表現美國大兵的勇敢、幽默和浪漫；但對朝鮮戰爭，面對更强的對手，理應找到更好的素材來證明美軍的勇敢和善戰。但很遺憾，韓戰後期，美軍見到中國軍人就投降，整個戰爭找不到值得自豪的戰役，確實令編劇們泄氣。即使想描述一下對手的殘暴和無能，就像二戰電影那樣，似乎也不可能，正如“聯合國軍”總司令李奇微在《朝鮮戰爭》一書中所說：“中國人是堅强而凶狠

的鬥士，他們常常不顧傷亡地發起攻擊，但是我們發現，較之朝鮮人，他們又是文明的敵人”。麥克阿瑟狂言：如果中國參戰，朝鮮戰爭將變成一場大屠殺；英國簡氏國防周刊則諷刺道：如果武器來個對換，那將真是一場大屠殺。讓好萊塢拍一部歌頌中國軍人的電影顯然是不好意思的。

但是，中國人對抗美援朝的“健忘”則是令人費解的。過去幾年，中共中央花幾億元人民幣拍描述內戰的電影《三大戰役》，中央電視臺拍了大量的古裝電視劇，一部《三國演義》就耗資過億元，可對抗美援朝這種能極大激發愛國主義熱情，又是令每個炎黃子孫驕傲的題材却置之不理[1]。筆者强烈希望，趁抗美援朝的老戰士還健在，加速整理抗美援朝的每一個細節，幷通過人民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表現出來。抗美援朝戰爭即使在一千年後仍值得後代自豪。它畢竟是中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對外戰爭之一。

抗美援朝爆發後，全國青年爭相報名參軍上前綫，一個人口兩千萬的浙江省就有 100 萬青年人要求參軍，一個普遍性的埋怨是：參軍比選駙馬還難；一百人報名只能錄取一個。北京石景山鋼鐵廠的職工們，通過增加産量、義務加班、揀廢鋼鐵、捐獎金等辦法，捐獻了“石景山鋼鐵廠號”戰鬥機一架。著名豫劇演員常香玉在半年內演出 170 場，省吃儉用，將收入捐獻出來買一架飛機（這幾乎超越體能極限，再看一下當今嬌嫩而自負的“星”和“腕”們，就能理解“人民藝術家”和“戲子”的根本不同）。

[1]據瞭解，中央電視臺 2000 年投資開拍的紀念抗美援朝的電視劇《抗美援朝》，但製作完成後被江澤民時期的外交部建議禁止播放，擔心影響中美關係。美國人拍那麽多二戰的片子，怎麽就沒擔心過影響美德關係？！一群孬種連自己家的體面和自豪都要不敢展現，讓人徒呼奈何！中國外交部過去三十年的對外關係處理中，明顯看到戰略眼光的缺乏導致的惡例比比皆是。

重慶市 63 歲的勞動婦女彭淑貞，臨終前將其一生洗衣所得的積蓄 3 個金戒指、5 枚銀元和一間房屋，全部捐獻了出來。湖南湘潭縣一位 76 歲的勤雜工譚楚雲，每月只有 8 元的收入，從抗美援朝總會發出捐獻號召之日起，就做了一個竹筒，上面鑽一個小孔，每天工餘挑三、五擔水，把賣水的錢裝進去，竹筒上寫著"抗美援朝捐獻 · 譚楚雲記"的字樣，老人家說："我是毛主席的家鄉人，不能給毛主席丟臉！"。遼寧彰武縣一個小學的 1200 余名小學生，利用放學後和假期中的閑暇時間，揀糧食、打柴禾、打柳條子，積累了 1200 多元，全部捐獻給了抗美援朝。截至 1952 年 5 月底僅一年時間，全國人民共捐獻人民幣 5.565 億元，相當于當時 3710 架戰鬥機的價款。對于當時貧窮的大陸人民，這筆財富的意義是難以估量的。

抗美援朝烈士杜西富的老父親得知兒子犧牲後，去了已回國換防的連隊，對團長說："我有五個兒子，有三個參軍，算這個死了兩個，要是沒有共產黨我翻不了身，我還有兩個兒子，你們再要兵，我還讓他們來！"正是千萬個這樣的人民托起民族復興的希望。

後方人民全體動員積極支持抗美援朝的動人事迹，展示了我們民族的可貴精神和巨大力量。還有什麼題材比這些能更好地反映中國人的精神面貌？但大陸的藝術家和文化部門，對此置之不理，却將鏡頭始終對準中南海和清朝皇宮內的一切。

抗美援朝的勝利，爲國家贏得了未來幾十年的安定局面，使得一直到越南戰爭時，美國再也沒有了當年麥克阿瑟在朝鮮戰爭初期的狂妄，面對中國的參戰警告，再也不敢越雷池半步。

如果說蔣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是因爲他還沒有爲抗日作好準備，那麼毛澤東發動抗美援朝幷取得偉大勝利，他又做了哪



湘谭县 76 岁的勤杂工谭楚云老人把挑水卖的钱存入竹筒，为购买武器作贡献。有这样的人民，敌人想不输也难。

些準備呢？他一手攘外，一手安內，一面進行國家建設，用他的大手掃除了中國一百多年的暮氣，揮灑出中華民族勃興的新世紀。毛澤東用他的軍事實踐，否定了“落後必然挨打”的歷史規律。證明意志的懦弱才是真正的弱者。

抗日戰爭中，國軍不少戰役慘敗給日軍，日軍在太平洋群島上被美軍打的暈頭轉向，包括內戰中被俘、起義加入解放軍的國軍將士在內的中國軍人在朝鮮把參加過太平洋戰爭的美軍打得屁滾尿流，這是爲什麼？這個閉環對抗鏈中唯一不同點是中國的最高統帥換成了毛澤東。

抗美援朝救了蔣介石一命，使得粟裕箭在弦上的“渡海艦隊”（應該說是漁船才對）偃旗息鼓，導致海峽兩岸直至今日的分裂局面，幷被昔日的手下敗將美、日所利用。至于這是中華民族之福，還是遺憾，則取决于海峽兩岸問題的最後解决方式：

如果能和平實現國家的統一，則蔣介石逃過的這一劫將間接成爲抗美援朝的一大成果。因海峽兩岸當時沒能統一，使得臺灣避免了大陸過去的政策失誤，更重要的是，在國際社會對大陸技術和貿易禁運的情況下，臺灣這個“反共基地”得以享受市場開放的便利和全球技術進步的成果，幷發展成具有全球影響力的資訊工業中心。至少在個別領域，部分地發揮“復興基地”的作用。

如果海峽兩岸以戰爭收場，則間接成爲抗美援朝的負面後果，以及昔日的手下敗將對中國的殘酷報復。

可喜的是，海峽兩岸的命運畢竟已掌握在中國人自己手裏；



光荣参军（油画）

可悲的是，臺灣總有人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幷不惜作別人手中的棋子；遺憾的是，毛、蔣政治智慧帶來的默契，在當今兩岸政治人物當中已很難再現；欣慰的是，包括筆者在內的不少中國人，對兩岸和平統一的前景還沒有絕望。

有必須聲明的是：本書將毛澤東和蔣介石的對比，無意否定蔣介石在軍閥混戰的年代爲統合破碎的國家所做的有效努力，無意否定他領導時期中國教育和工商業發展上的成績，更無意對蔣介石抗日的貢獻提出過分責難，只是希望在這種比較中看清毛澤東的偉大，闡釋毛澤東勝利的必然性，幷從中提煉出對後代中國人有巨大參考意義的政治和軍事建設的經驗和教訓。沒有毛澤東，蔣介石將毫無疑問是二十世紀中國政治舞臺上耀眼的巨人，但他很不走運，他遇上了毛澤東，使得他不論怎樣努力始終都是錯的。這是蔣介石政治人生的悲哀，但無論如何看待，都是中華民族之幸。

看到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阻强敵于朝鮮，鬥沙俄于北疆，殲印敵于西南，收西沙于南海……，助臨邦鏖戰奠邊府，驅趕美國佬，敵人再不敢一窺我河山；强漢之風再現，盛唐威儀初露，這是包括臺灣同胞在內的所有炎黃子孫的驕傲。您一生的追求在您的老對手“潤之賢弟”的領導下初步實現，作爲民族主義者的蔣中正，您老人家當含笑九泉矣；您個人中原逐鹿的失敗相較于民族的崛起，又何憾之有呢？

二戰中獲得崇高威望的丘吉爾被毛澤東大罵爲“戰爭販子”

而無可奈何，英國却在歐洲國家中第一個承認新中國。法國政府正陶醉在打敗德國取得歐陸核心地位而得意，但因印度支那戰敗而在國內灰頭土臉。杜魯門迎接了二戰的勝利和戰後超級强國地位的確立，但却在韓戰中爲美國掙得第一次敗績，連帶一群小兄弟損兵折將，也斷送了自己的連任之夢。中印戰爭讓高傲的哲學家尼赫魯丟盡了自己與國家的榮耀和威望而鬱鬱而終，印度國家聲望再也抬不起頭來，幷把宿敵巴基斯坦和中國推到一起。越南戰爭讓約翰遜和尼克松兩任總統損兵折將，承受千夫所指，且毫無收穫。還是尼克松高明，通過和毛澤東的握手却奇迹般地爲自己的政治生涯樹立了紀念碑，爲“從哪兒摔倒從哪兒爬起來”增加了最好的例證。赫魯曉夫實在頭痛和毛打交道，今天撤走專家，明天又送來米格 21，最終還是失去中國，也迷失了自己，爲蘇聯造成最大的戰略灾難。勃烈日涅夫則始終搞不明白該如何對付中國，核訛詐用了，但被毛澤東摔的兩顆核彈給嚇得沒有訛詐到任何東西，反而把中美推到一起；珍寶島也打了，可還是沒有搶回來。麥克阿瑟，西點軍校歷史上公認最杰出的畢業生，却在背負滿身榮耀的情况下，于朝鮮一戰落得被撤職的下場。二戰日軍在各戰場有不少勝迹，唯獨和八路軍游擊隊的交手中找不到任何的自豪。以上所有這些風雲一時的人物、軍隊或國家，他們的耻辱和失敗中總離不開一個人的影子，他就是毛澤東。因此，蔣介石的倒黴也就不足爲怪，更無須遺憾了。靠貶低毛澤東來抬高蔣介石更顯得荒唐，因要全世界相信蔣介石比毛澤東和同時代全球所有政治家都更偉大幷不容易。

蔣介石在敗退臺灣之後，抗拒美國的壓力而拒絕從金門、馬祖撤軍，反對臺灣問題國際化和“台獨”的圖謀，保留了作爲 20

世紀主要政治家的最後體面。但他留下的是 2300 萬臺灣同胞至今還在歷史和現實、情感和理智之間的苦苦掙扎。

五、解放軍的力量和潛在問題

2001 年中美南海撞機事件發生後，美國國防部長辯稱：中國飛行員爲了顯露自己高超的飛行技術，在跟踪美機時，經常飛得很近。

筆者雖然對美國官員談話的客觀性從沒有信心，但這次筆者堅信那位國防部長沒有撒謊。說得坦率一點：解放軍的將士們特別勇敢而且好鬥。在全世界都怕美國時，解放軍的勇士們却以超人的膽略向靠近國門的美軍挑戰。撞機犧牲的英雄王偉實際上向舉國人民和潛在的敵人傳達了一個明確的信號：不論面對多麼强大的敵人，中國人民解放軍將誓死保護祖國的每一寸領土，每一片藍天。

如果一名外交官過于好鬥的話，則肯定是個缺點。但對于軍人來說，這則是極爲寶貴的優點，也是軍隊保持强大戰鬥力的關鍵之所在；因爲它體現了一種軍人精神。

爲了“炫耀”筆者對中國軍隊問題的發言權，在此介紹一下筆者親屬中的幾位軍人：

王繼民，筆者的姨夫，五十年代後期從軍，并在軍隊入黨。退伍後曾長期擔任大隊支書。計劃生育開始時，他以身作則，率



笔者与五弟(1993 冬)

先在自己的大家族中實現了“一胎化”，對于農村來說，這簡直可用“偉大”來形容。也是當今中國難得一見的從不貪污的幹部，家鄉碩果僅存的真正共産黨員。對今日共産黨的現狀常搖頭嘆息。讓他大侄子參軍，曾參加對越反擊戰，頭上的鋼盔數次被子彈掃掉。他的大兒子王廣現，秉持嚴父的傳統，已確立自己的聲望。從姨夫的身上，能看到軍人黨員的不同凡響。他是毛澤東時代中共黨員的活化石，在他身上能清晰看到毛澤東時代中國人精神風貌的影子。

張金友，小舅，曾參加對越自衛反擊戰。小腿中彈，榮立三等功。復員後在稅務部門工作。至今兩袖清風。

董鳳軒，四叔，曾參軍六年。剛就任大隊主任。

董玉春，五弟，從軍三年。屬山東人典型性格，爲人仗義。原大隊領導介紹一種子商販給村民，但種子不合格導致誤農，老實的農民敢怒不敢言。在筆者的鼓勵下，五弟挺身而出，聯合村民告狀，最終將該商販判刑，大隊領導受到批評。在四叔剛任大隊主任不久，某項公務處理方法招致物議，遭到五弟的率先反對。看來，這位主任四叔即使想貪污，大家庭這一關也不好過。爲了幾個破錢讓別人點脊梁骨，是難以容忍的。

介紹這些，概因在這本書裏這是最令筆者驕傲的一頁；畢竟，在祖國的萬里國防前綫，曾撒下了自己親人的汗水和鮮血。從他們及其戰友身上，對中國軍隊和軍人的風采有了更直接的認識。

筆者在大學也認真參加過一個月的軍訓，慚愧的是，7 發子彈打飛 2 發；因數靶時自己還在練習瞄準的違規行爲，而被領訓的解放軍叔叔照屁股上踹了一脚，至今還隱隱作痛。

毛澤東時代創立的運動戰術，是否還能適于未來的戰爭幷不重要。軍事上有千年不變的軍事思想，沒有千年不變的戰略戰術。中國的國防戰略也已經從“誘敵深入”轉化爲“拒敵于國門之外”。但毛澤東留給中國軍人永恒不變的寶貴財富則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以及必勝的信心；而打擊强敵的輝煌戰果，爲這種信心提供了堅實的歷史背景、作戰案例和心理基礎。毛澤東爲中國軍人確立的人民軍隊的特徵，和不惜一切犧牲捍衛領土和主權完整的戰爭實例，已經成爲中國軍事文化的核心內容；它隨著每年新兵的入伍，而一代代傳承下去。

那麼，解放軍將士和其它國家以及臺灣的軍人有什麼明顯的區別呢？區別是顯然的。

筆者在海外期間，特別留意臺灣及外國有軍旅生涯的年輕人對戰爭的態度。明顯感覺是，外國及臺灣年輕人在從軍的時候，普遍害怕戰爭。這沒什麼奇怪的，這是人類對生存的本能願望。

那麼，這些和平時期成長起來的解放軍戰士呢?

如果說軍官喜歡打仗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高級軍官；但在解放軍裏，對打仗的渴望之情遍布各級將士，一致求戰心切。筆者遇到的退伍戰士，普遍的一個說法是：當了幾年兵居然沒打過仗真不過癮。那些曾有機會參加戰爭的軍人，如對印、對越反擊戰，在戰爭結束時往往憤憤不平和不能理解：司令部爲什麼令他們後撤，而不讓取得更大的戰果?

這種全球軍隊中罕見的戰鬥精神，有時可能會導致挑釁的行爲，但這絕對是軍隊戰鬥力的最根本保證。狹路相逢勇者勝。可以說，在戰爭爆發前解放軍已經先勝對手一籌。雖然中國的文官越來越愛財，但將士不怕死肯定是國家强盛的重要保證。這種精

神加上指揮、軍備、國力、政府的動員和組織能力和民族主義等要素，决定了解放軍始終是全球最具戰鬥力的軍隊。

在和臺灣國軍兄弟比起來，容易發現，這是解放軍相對于國軍的最特別之處，也决定了兩軍戰力的必然差距。尤其海峽兩岸的兄弟們接受的是同樣的文化教育，但却有如此明顯的不同，突顯了毛澤東給中國軍人置入的這些寶貴基因。所以，臺灣當政者以爲多買先進武器就可以阻滯解放軍的進攻，是對解放軍的根本不瞭解。看來，當年國民黨在大陸犯的錯誤，臺灣當局并沒有吸取教訓。海峽兩岸應避免一切可能導致軍事衝突的摩擦，不誤判形勢是重要一環。臺灣執政當局如果希望避免解放軍攻台的話，增加武器采購肯定是最無用、最白痴的做法。臺灣即使花千分之一的武器采購資金在福建造幾所“希望中學”，也肯定比幾十億美圓的先進武器能更好地阻止兩岸的衝突。請“台獨”人士不要誤會，大陸那幫窮鬼還沒到非指望您來捐錢的地步。如果簡單地回顧一下國共內戰和 49 年後解放軍的歷次戰爭，臺灣當局就該明白，不論你的武器多麼先進，也不會有任何的用途。看一下當年毛澤東面對蘇聯核威脅，美國、印度的敵意包圍而不回避珍寶島衝突，就該明白毛澤東訓練出來的解放軍是一支什麼樣的部隊。但是非常遺憾，也非常危險，無論是領教過解放軍的美國人，還是臺灣當局，都在不斷地根據兩岸的武器裝備來判斷雙方的戰力，而對操作武器的人，不予考慮。

這自然引出一個話題，那就是未來兩岸統一之後，臺灣繼續保留自己的軍隊是否合理？筆者無意质疑臺灣男兒的勇敢和愛國心，但類似解放軍的軍事文化是國軍所欠缺的。而這又不是靠幾本軍事教材所能够掌握的。這涉及到部隊精神與歷史的延伸和傳承。看一下臺灣國軍在“集集大地震”後六小時才趕到受灾現場

救灾，就可看出國軍在反應速度和應變能力上的嚴重問題；如果和解放軍在地域遼闊的大陸救灾中的表現對比，這種反差尤其明顯。臺灣國軍的問題并不出在士兵上，關鍵還在政府和軍隊高層。

現在解放軍在部隊建設上不是沒有問題。雖然這些問題還不至于立即帶來戰鬥力的明顯下降，但如果不注意亡羊補牢，任其發展，可能會斷送毛澤東時代留下來的建軍傳統。那將是我們民族的一個最慘重的損失。

第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退伍軍人的安置[1]

中國每年退伍的人數相對于整個就業市場，并不算什麼。國家應考慮爲每位退伍軍人的就業提供協助，如鼓勵薪金較高的企業界（如優秀國企和外企）接納這批人員，并保證三年之內企業不得單方面終止雇傭關係。當然，這種安置并非必須是"吃皇糧"的工作。安排工作的目的是在退伍後的最初三年，能讓這些年輕人積累一些基本的財力。國家當然不能擔保他們永遠有工作。但現在農村兵退伍後兩手空空，即使想做生意也難有條件，一切必須從頭開始。幾年的軍旅生涯給他們帶來的只有物質上的損失，而沒有任何的好處。退伍軍人實際上是勞動力中的佼佼者，在沖勁、吃苦耐勞、誠信、眼界、遍布各省的戰友關係等方面，决非一般民工可比。如果他們擁有一定經濟實力，不少人在經濟領域能有所作爲。退伍軍人安置在包括美國等所有大國中都是個非常重要的政府服務。

[1] 2018 年 3 月 17 日第十三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組建退役軍人事務部，作爲國務院組成部門。這體現了對退伍軍人事務的實際關注。這之前各地發生的退伍軍人抗議事件，實際上是長期積累的結果。筆者 2002 年寫這段內容時，對此事務有所擔心和期待，總算引起中央高層的關注，并采取實際措施。



第二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老兵欺負新兵的現象。

這一現象雖不算特別嚴重，但值得軍事高層的留意。這一現象在國外的軍隊中幷不鮮見。長期以來，解放軍在新兵訓練上一直采取非常嚴格的標準，這無疑是正確的；但在具體操作上，如果不經常性地對參與訓練的老兵予以强調，導致偏差的出現是難免的。這對新兵的心態會造成不利的影響，是需要留意的。

第三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官兵之間的送禮問題。

由于解放軍的士兵來自五湖四海，探親回來自然也會帶些地方特産，如果能大家分享一下，這本來是件好事，但由于受社會大環境的影響，基層官兵之間的一些家鄉土特産贈送，就帶來了一些問題，直接影響到官兵的同志式關係，對職務安排、提銜、轉志願軍等帶來不公平性。長期以來，積極健康的官兵關係一直是解放軍的治軍特點，師團長和下士在一個食堂吃飯非常平常，毛澤東甚至一度取消軍銜制，可能與此考慮有關。但如果受到現在社會大環境的破壞，對國家的損失未免太大了。在這方面，一向具有嚴明紀律的解放軍，可否做出明文規定：對任何收受禮品的軍官，不論多少，哪怕只是一隻德州扒鷄或金華火腿，也必將被送上軍事法庭。自毛澤東之後，中央軍委在軍隊管理上過于放鬆，不能不說是個天大的遺憾。說句不好聽的話，毛澤東之後的軍隊管理根本就像是娘們兒治軍。

第四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設立軍隊職業心理輔導員。

這是目前的一個空白。尤其是受計劃生育影響的一代，在社會污濁大環境下，軍人心理的輔導是值得考慮的。

第五，高學歷軍人的訓練培養和戰鬥力問題。

解放軍現代化建設和軍人學歷的提高同步進行。但對這些學生軍增加的同時，是否能同時失去傳統軍人的優良傳統，幷帶進來中國知識分子的一些劣根性，是值得注意的（解放軍將領普遍喜歡農村兵，概因農村兵樸實易帶，軍紀容易保持）。最近幾年，解放軍在宣傳建軍成就時，常以多少軍官擁有博士、碩士、學士學位作爲指標之一，這是否最終會導致學位本位意識，正如公務員們拼命業餘搞博士、碩士學位一樣，是值得關注的。一個英勇衝鋒的排長反而不如一個軍校生擁有更多擢升機會是不合理的。

最近幾年，尤其是海灣戰爭之後，中國學者型軍官中出現了一種奇怪的心理變化，那就是自信心的下調。面對美國的高科技武器，中國學者型軍人看到美國軍事科技上的强大而立即底氣不足，而對基層將士們的大無畏英雄主義精神視而不見，過去的那份必勝的信心有所動搖，這是值得注意的現象。當然，我們不能無視于別人的長處，否則就很難做到知己知彼。但必須不能忘記，戰場上的最後決勝因素始終是人。看一下毛澤東時代的歷次民族戰爭就明白了。對高學歷軍人的思想教育、紀律强化和性格磨練至爲重要，否則，他們操作先進軍事武器所增加的戰力，將被意志的薄弱、小市民氣和知識分子的臭毛病等不利因素所抵消，他們有了知識，但失去了氣概。因此軍事高層同時可考慮：是否在各級軍官中確保一定比例從基層上來的人員。實際上，不少農村兵的智商幷不差，只是由于家庭窮或家鄉教育落後而無法考上大學；如果把他們放在大城市，不少人具有上名牌大學的能力。

第六，獨生子女政策下的徵兵問題和軍人戰鬥力的保證。

無論中外，家中“獨苗”的人生都倍受關注，對于有傳宗接

代觀念的中國農村家庭，獨子的安危尤爲關鍵。如果處理不好，解放軍的未來徵兵和戰鬥力必然受到影響。對此，可以考慮利用現在已非常成熟的人工受精技術，通過廣泛的宣傳，使得人們認識到獨子的犧牲，幷不意味著宗族傳承的中斷。國家同時在烈屬和殘疾軍人的家庭生活保障方面進行立法。這似乎有點“狂想”，但畢竟是現實無奈中的一種選擇。當年計劃生育開始時，農村到處播放人體生理和生育的電影，農村姑娘們各個低頭做害羞狀，城市姑娘也不敢喘一口大氣；但是，今天如果在村頭上聽到小媳婦們大聲說“明天上縣醫院帶環去”，千萬不要被嚇一跳。只要成爲公衆習慣，什麼事情都是可能的。

國家應該將未生育軍人納入精子和卵子冷藏儲備對象。一旦有軍人犧牲，可以通過有效機制啓動爲烈士培養後代的法定程序。確保從人工懷孕，到子女出生和撫養，直至大學教育和工作安置的全流程國家責任執行。

第七，軍隊的換防。

由于中國的地域廣大，解放軍不同連隊之間的生活和值勤條件差別非常大，大城市的駐軍和在西藏邊防值勤的官兵，他們的待遇和付出的差距不可同日而語。即使在連隊內部，隨著官兵關係受社會大環境的不良影響，也會導致一些偏差。中央軍委可否考慮將軍隊的跨軍區輪防，以及軍區內部各駐地之間的輪防制度化；參考地域的環境、和崗位的艱苦程度，爭取做到：任何軍人必須在最艱苦地區駐防至少一至兩年的時間，才能調往城市及內地駐軍。如將西北、西南、東北地區作爲任何軍人的“必經之路”，否則不能轉業、轉志願軍或調入機關工作，甚至軍校生在畢業前也必須經過這一過程。這種換防的一個好處是，一旦邊疆

發生大規模戰爭，可確保國家能有數量充分和曾經歷艱苦環境鍛煉的軍隊進行輪換；否則，將南京軍區的士兵調往東北、新疆或中印邊境，他們將難以適應當地的嚴寒和高原環境，甚至可能導致凍傷等有損戰鬥力的現象發生。如果發生中小規模局部戰爭，一個濟南軍區作爲戰略總預備隊是足够的，但如果爆發全面戰爭、兩場同時進行的局部戰爭或大規模的長期局部戰爭（如韓戰），解放軍的任何部隊都應該具備成爲預備隊的能力。韓戰期間，中國各省駐軍幾乎都經過了入朝作戰的輪換，就是個例證。當然，如果和中印邊境、東北中俄邊境、新疆和獨聯體邊境當地的氣候條件比起來，朝鮮半島的寒冬“好過”多了。

第八，軍人的革命傳統教育和紀律建設。

當然，最好的教育方法是各級軍官能以身作則，首先處理好官兵關係，排除社會大環境的干擾。對軍官的個人操守應密切留意。地方執法不嚴的現象，應避免在軍隊出現。

如果解放軍的高級將領和軍委的領袖們，在商品經濟的大潮中不能傳承解放軍的優秀建軍傳統，或中央軍委在軍銜授予方面不能嚴格把關而摻入太多權利鬥爭要素或人際關係內容，你們將成爲真正的敗家子和歷史的罪人。一個自私而短見的將帥，或一個不負責任的行爲，可能毀掉幾十年的建軍成果；一旦損毀，是幾代人都難以恢復的。毛澤東時代的民族凝聚力，在地方民衆中已大爲降低，解放軍的精神風貌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是民族精神的最集中體現。



當今社會風氣對軍隊的不良影響，軍隊高層的懦弱、庸俗和短見，解放軍高級將領在面對社會惡劣環境時的應對能力和對各種誘惑的抵禦

能力，實在令筆者有些不放心。

第九，軍隊國家化的可能性初探

今天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是在共産黨領導下的軍隊，簡曰“党指揮槍”。在現代國家裏，政黨擁有軍隊很不符合現代政治發展的潮流，但不能因此而說中國“黨領軍”是封建的，因爲中國共産黨作爲唯一執政黨的現實决定了中國共産黨對軍隊領導的必然性。但是否因此就認爲當今軍隊領導的體制沒有問題呢？軍隊國家化在當今党國一體的情況下是否就失去了意義了呢？非也！

只需要考慮下列問題，就能意識到軍隊國家化的必要性：

未來海峽兩岸統一後，臺灣可能被允許保留自己的軍隊，但這支軍隊和解放軍是互不隸屬的兩支軍隊，還是在中央軍委統一領導下的不同軍區呢？很顯然，沒有軍隊的統一，國家的統一不僅沒有實質的意義，也缺乏穩定統一的保障；尤其是臺灣處于重要的戰略位置，且一些士兵受“台獨”思想侵蝕，如果臺灣駐軍和大陸駐軍之間沒有統一指揮和協調的話，東部沿海的國防安全將面臨挑戰。因此，未來臺灣駐軍應毫無疑問地成爲中央統一指揮下一個臺灣軍區。這自然帶來一個問題：臺灣將士是否和大陸將士擁有同樣的機會獲得擢升，甚至調入中央最高軍事領導機關，或出任軍委副主席這樣要職的機會呢？很顯然，中央軍事領導體制必須確保這種公平性，如果給臺灣將士造成“嫡系旁系”的誤解，那對軍心的影響和臺灣與其它各軍區之間的協同作戰肯定會帶來負面影響，蔣介石失敗的教訓是必須吸取的。

今天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和國家中央軍事委員會雖然是一班人馬兩塊牌子，在党指揮槍的情況下，則使得上述問題無法解决，因臺灣杰出將領沒有共産黨員。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將目前黨的



中央軍委這塊牌子摘掉，只留一個國家軍委的牌子。這也是在體制上回歸憲法。至于解放軍目前基層單位裏的黨組織則可維持不變，國家中央軍委內部可以設立黨小組，以便在軍事動員方面發揮作用。當然，這并不是說統一後立即選拔臺灣軍官進入中央軍委。由于臺灣島內台獨勢力的存在，如果不幸選擇一個隱性台獨的軍官進入軍隊核心層，國家將遭受慘重的損失。但有必要爲臺灣回歸及回歸後十年內實現臺灣人進入决策層做體制上的改變。再者，軍隊國家化雖然對于當今中國的政治現實不會帶來實質性的改變，但至少在國家形象上將會有所幫助。至于統一後臺灣軍隊的改革問題則有待未來的注意。

從長遠來看，党、國、軍最高權力分割的問題必須解决，這是確保國家穩定和高效率的保證。第二代軍隊和党、國核心權力的分割并不是健康的體制，這在全球大國當中也是罕見的。如果說當時的權力分割有國家轉軌時期的特殊性，鄧絕對的個人威望和高齡的實際問題，那麼江、胡時期中央党、國、軍核心權力的分割則未免有些荒唐了，這是體制問題而與胡、江之間的個人關係無關。毛澤東時期毛劉之爭和第二代領導人的鄧胡、鄧趙的教訓至今還沒有吸取。[1]

---

[1] 第二版加評：本書上述議論，在經過胡錦濤時期江澤民肆意干政，大搞山頭主義，導致軍隊高層腐爛透頂，再次爲我們敲響了警鐘。習近平上臺後對軍隊的大整頓，是建立在習近平“紅二代”的特殊背景之上的權威性，也有賴于胡錦濤的全退。有這種權威性的存在才有能力阻止軍隊的進一步腐敗。但這裏有太多的偶然性。中國的國運不能寄托在這種偶然性身上，我希望習近平能善用天下之智，用好自己的權力，爲中國的長治久安建設一個系統長效的機制。



第十一章　毛澤東與女人[1]

一、毛婚姻生活的遺憾

毛澤東一生的婚姻生活是坎坷的。一些學者發現，毛澤東對父母之命的第一次婚姻并不是傳說的那樣抗拒，實際上毛澤東對第一任辛苦持家的賢妻羅氏有著很深的感情，而她 21 歲過早地不幸病逝，讓毛澤東痛苦不堪。有學者認爲，毛澤東的詩《虞美人 · 枕上》實際的寫作時間并不是 1921 年，而是更早。筆者細讀該詩似乎有所觸動：

堆來枕上愁何狀，江海翻波浪。夜長天色總難明，寂寞披衣起坐數寒星。

曉來百念都灰盡，剩有離人影。一鈎殘月向西流，對此不抛眼泪也無由。

毛和楊開慧 1920 年冬結婚，第二年即使暫時的別離，也不至于“堆來枕上愁何狀”，更不至于能讓一個革命青年“曉來百念

[1] 在本書第一版寫作時，本來沒計劃寫此章內容，但當時正值《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這本書熱銷之時，給毛澤東的形象造成巨大的破壞，筆者在資料有限的情況下只能增加本章內容。在第二版出版時，本章內容的前面兩節維持不變。

都灰盡”這種痛苦到灰心而絕望的地步，這顯然是不正常的。因此，有學者認爲是後來故意在時間上作了改動，以掩蓋毛澤東實際上存在多年的第一場封建婚姻，毛本人可能也不願意讓人一窺他這個革命家內心的這段帶有封建氣息但情深意重的婚姻經歷。那個賢良淑德的傳統性妻子羅氏才是詩中的“枕邊離人”，而不是目前普遍認爲的楊開慧。不論後面的婚姻多麼浪漫，毛的樸素初戀應該用在這位“離人”身上。這種樸素的婚姻經歷對重情而懷舊的毛澤東的影響甚至不亞于後來的毛楊婚姻。尤其是，毛澤東對母親感情很深，而第一任妻子的辛勤持家，孝敬公婆，對于一個中國男人來說，比任何的鮮花美酒和撒嬌更激起他的感激。後來毛楊婚姻是現代自由戀愛，楊開慧畢竟是現代女性，對于毛澤東這種還留有一定傳統思想的男人來說，在陶醉于自由戀愛時，不可能沒有和前面那個賢妻的對比。從《賀新郎 · 別友(1923年)》這首詩中可以看出，毛楊之間曾存在著不小的誤會，而這種現代婚姻不可避免的磨擦，在和那位百依百順的前妻之間根本不可能發生。再看另一位才子胡適的婚姻觀，就更容易理解他們這一代人思想上雖然高呼解放，但自己的雙脚却還留在傳統。如果因此而爲兩位古人喊遺憾，則大可不必，給他們一位現代女子，未必一定是他們的上選。後來人們將“革命”隨意加入毛澤東的情感經歷和詩詞的理解上，是學者們自作多情，也可能爲了滿足時代需要。毛直到 80 歲高齡時將這首詩憑記憶寫下，幷交秘書保管。人只有老了，才能放下“革命家”的外衣，表現出真性情。

當然，毛、楊之間的感情無疑是很深的，他 1957 年所作《碟戀花 · 答李淑一》中可見一斑。楊開慧和毛有事業上的支持，最後因毛而亡，令重情和懷舊的毛澤東不可能割捨掉對先人的感激和思念。但如果說毛、楊感情比第一次更深的話，則毫無根據。

斯諾著《毛澤東的離婚》日文版，對毛澤東和賀子珍關係的惡化有些記載：1937年紅軍有幾個月平靜的難得戰爭間隙，這時史沫萊特將舞會引入，引起延安已婚婦女們的不滿，毛賀之間的誤會由此産生；賀子珍的强烈個性使得她經常和毛澤東吵架，最後不理毛澤東的再三挽留而去蘇聯看病。當毛澤東捎信讓抵達迪化（烏魯木齊）的賀回來，結果她捎給毛澤東一個寫在手絹上的絕交信[1]。據陶鑄夫人曾志回憶她和毛澤東一次有關賀子珍的對話：毛澤東談起賀子珍，流露出一種發自內心深處的傷感，這傷感過去我從未在毛澤東身上發現過，看到的都是歡天喜地的大丈夫氣概。毛講："不是我要離開她，而是她要離開我。她脾氣不好，疑心大，常爲一些小事吵架。"毛還告訴曾：他在中央蘇區受到錯誤路綫打擊，被從領導崗位上撤下來後，名義上是蘇維埃主席，但無實職工作，又患了病，連賀子珍也不怎麽理他，不去照顧他，却强調自己有事情要幹。李敏在《我的父親毛澤東》這本書裏，也不含糊地將毛、賀離婚的責任歸咎于母親。有人認爲毛對賀"始亂終弃"，顯然是不客觀的。毛、賀的不和是賀離國的重要原因，并爲江青進入毛的生活留下了空間。

江青是在毛的事業有了一定基礎或取得重大成就，取得党的領導地位後進入毛的生活的，雖能共同革命，但無共渡苦難歲月的經歷。而毛和江青生活環境的迥异，知識和經歷的巨大差別也使得他們能成爲生活的伴侶，但曾經滄海難爲水，婚姻中的愛情成分已不敢奢望。中年毛澤東需要的是個伴侶。當然，筆者不會

---

[1]以上內容來自網上，筆者本人沒有見到《毛澤東的離婚》日文版原書；本處敢于采用，是因爲過去曾讀到過有關毛澤東婚姻的類似文章中也提到這本書。


恩爱夫妻（毛泽东和江青）

無聊地對江青說長道短，毛的地位和形象决定了，他吸引包括江青在內的女性的傾慕也是人之常情。

從毛的詩篇中可以看出他的浪漫主義情調和對所歌頌對象的深情，他對國家和民族的改造也體現了他的深厚感情和理想主義。是否可由此推論，他對自己的婚姻有著某種夢幻般的期盼，這是基于同甘共苦、生死相守、相敬如賓的夫妻深情，這種婚姻遠離事業成敗得失、名譽權位、物質追求等一切世俗內容。很不幸，重情的毛澤東却在感情上一再遭遇巨大挫折；很遺憾，他的地位和權力注定了後來沒有人能給他帶來這種婚姻上的滿足。

當然，作者的上述分析絕對無意暗示江對毛的感情有任何不純潔。尤其作爲毛澤東的妻子本身，幷不比一普通家庭中的女主人活得輕鬆。對“文革”中江青的作爲，作者沒有一些受害者的那種深惡痛絕，換了別人也未必比江青做得更好。當年江青從上海奔赴延安，應該說是一很有理想的藝術工作者。如不嫁給毛澤東，她很可能以“人民藝術家”的榮銜度過晚年（看一下“樣板戲”的水平就不該否認，江青對藝術的理解和創造意識非一般藝術家可比。著名劇作家吳祖光曾在2000年的全國人代會上對江青的文藝水平給予坦率的贊譽。任何研究中國傳統曲劇改革歷史的人，都不應忽略江青這個名字）。但她嫁入了政治的中心，幷在全民狂熱的非常時期，不恰當地發泄了自己的權欲。

江青雖貴爲“神”妻，但不搞特權；據一些回憶文章批露：江青愛好攝影，經常到中國圖片社沖洗相片，每次都能分文不少地付錢；甚至部下從家鄉帶來的土特產她也要照價付錢。江青對自己要求嚴格幷不是秘密。單就這一點，足以讓後來批判她的人

汗顔。毛澤東對失敗的對手曾經給予寬容，勾結日本的溥儀得以安享晚年，蔣介石的奉化祖墳即使在“文革”期間也得到保護（而蔣的手下可未曾放過毛澤東的祖墳）。然而，作爲毛澤東的妻子，江青却被她“文革”時的對手判了個死緩，是否有點過分？[1]

毛和江的關係在建國前已觸礁，他曾講“要不是快進城了，非和她離婚不可”[2]，體現了毛澤東作爲人民領袖的負責和無奈。

建國後，毛澤東的生活中是否出現過其它的女人，這是被議論較多的話題。

建國時他才五十五歲，和江青的婚姻已名存實亡。如果他不是領袖，可以選擇離婚（五十年代中國曾出現過一次離婚高潮，尤其是進城的幹部將鄉下的老婆休掉是非常普遍的現象）。以他大詩人的浪漫、文學家的風采、哲學家的智慧、書法家的灑脫，再配上他那偉岸的形象，幽默的談吐，吸引成群的美女當不成問題。然而他的地位使他放弃了離婚的權力，作爲人而不是神，有個別其它女人出現在他空白的生活中應是非常正常的。在這方面，作爲他爲之奉獻一生的炎黃子孫們，是否應對他老人家多一份理解和寬容呢？更何况在他放弃離婚的權力時，已同時體現了他犧牲自我而對國家負責的高尚人格。很顯然，以江青在同時代

---

[1] 打倒“四人幫”後，一些人不擇手段地抹黑江青，説她過著資産階級生活方式，純粹是無稽之談，更透露出政客的無耻。目前人們關于毛澤東和女人的資料有多少是客觀的，又有多少是痛恨毛澤東的人的惡意捏造？什麽“江青不顧醫生勸告而讓毛澤東翻身加重毛的病情”、“毛澤東批評江青‘我死後別人非整你不可’”等此類有板有眼的傳聞充斥市場。總之，一些人爲誣衊毛澤東和爲打倒江青尋找支持，不惜采用一切手段。就人格高度來看，後來猛批毛澤東和江青的急先鋒們，并不比被批判者高明，甚至更加下作。

[2] 毛澤東的這句話在打倒“四人幫”後被中共媒體頻繁報道，以此來證明打倒江青在道義上的可行性。但這句話到底是否真的毛澤東説過，則沒有找到確切出處。本書保留這部分，也是基于從最壞角度看問題的叙事原則。

政治家中的不受歡迎，即使毛選擇離婚也不會影響他的權力，但却會在百姓中造成不良的示範作用；作爲重情人和負責的政治家，毛澤東肯定不願意。

作者必須在此聲明的是，本人沒有遇到任何可靠的證據來證明毛澤東有，或者沒有其它的女人。即使他有幾個女人，也絲毫不應影響後世中國人對他的尊敬和評價，因他對民族復興的貢獻之大足以讓後人諒解他些微的瑕疵。實際上，作者對諸如毛澤東這樣的偉人的私生活幷不感興趣，因在這種人身上有著更多值得注意之處。遺憾的是，當太多人抱著各種目的，以私生活來不負責任地攻擊毛澤東，幷已傷害到他的光輝形象時，作者不得不在這一問題上爲毛澤東進行辯護。

二、李志綏的真面目

對毛澤東形象造成重大傷害的當數李志綏的《毛澤東的私人醫生回憶錄》（以下簡稱《回憶錄》）。據多位在毛身邊的工作人員回憶，書中有三分之一的內容是描述李到毛身邊工作之前的事，這部分內容要麽是道聽途說，要麽是自己杜撰。從該書中可以看出，毛和李的關係密切到了可談許多重大政治問題的程度，這與毛澤東的處事風格有出入。毛是一位頗有某種神秘感的人物，就連周恩來等相處大半生的人也不易把握毛富于超越性和跳躍性的思維；考慮毛對知識分子的不信賴，他不太可能和李談論有關黨內鬥爭的事，毛應該很清楚這樣做的後果是什麽。

對毛和其他女子關係的描述同樣令人難以置信。在毛不方便時，警衛員或生活秘書會允許李進入毛的房間去一睹內情？這是難以置信的。

當然，當時年輕姑娘們也不可能像書中所描繪的那樣，當著李這麼一個中年男人大談“主席真偉大，樣樣都偉大”的地步。如果把美國前總統克林頓的小情人萊溫斯基放在這個角色上，李的謊言也許會多一分可信度，儘管萊溫斯基當時還沒有出生。

假如毛對李的信任程度真的達到可談重大政治問題，及特許李在任何情況下可徑入毛的房間（我相信毛寧可將這種私人感情給農民出身、跟隨他半生的衛士長李銀橋，也不會給交往不久、留學歸來的知識分子李志綏）。那麼，李將信任自己的主子兼朋友的私生活抖露出來，又算什麼呢？出賣別人信任的人只能是小人。一個小人的書是否值得相信和捧場呢？很遺憾，有不少人將《回憶錄》作爲攻擊毛的又一顆重磅炸彈而反復使用；那不是出于無知和輕信，便是故意或別有用心。

出版商都有自己的出版原則，出版商有權要求作者做一定的修改，如果作者一定要出版的話。《回憶錄》的內容顯然附和了一些西方人搞臭共產國家領袖和他們不喜歡的發展中國家領導人的政治方向。要求作者對某些內容作擴充甚至誇張是完全可能的。有人更懷疑中央情報局參與了此書的出版。

美國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宣傳機器將自己的價值觀推銷給世界，當然包括對大人物進行美化整容或醜化。它不會放弃任何好機會將它的好惡强加于人。接收最成功美容手術的莫過于亞伯拉罕・林肯，他被美化爲解放黑奴的英雄總統，幷被全世界所接受。如果您還記得林肯在南北戰爭時所說：“如果不解放黑人也能統一南方的話，就不那麼做（解放黑人）”，就該識破林肯頭上虛

假的光環。

毛澤東私人醫生的特殊身分無疑頗具誘惑力，以此作爲醜化毛的利器將具有相當高的可信度，毛的對手們怎能不善加利用？你只需讀一下由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爲該書所作的前言，看一下黎安友之流得到這本書的得意和咒罵毛澤東的那種歇斯底里，就能對該書的傾向有個大概的瞭解。

至于毛澤東爲什麼讓黎安友這樣一個美國學者如此仇恨，從他對李志綏的一段評價中可見一斑，他這樣贊美李："李醫生那坦蕩而帶微笑的圓臉，在毛衆多家臣的團體照中特別突出。他率直的表情、柔和的笑容和整潔的打扮，總掩不住他所受的西方訓練；李醫生的外國氣質和西方儀態，似乎即說明了他的才幹，又說明了他的弱點，因此使他顯得特別不可多得……"。

原來，毛澤東的智慧和成就開啓了黎安友之類"西方中心論"者的惡夢；無論是朝鮮和越南戰場、中國的發展成就、還是國際外交較量方面，是毛澤東第一次讓西方人無法在中國及其周邊地區爲所欲爲，這讓黎安友等"白人優越論"和"西方中心論"者怎能不恨之入骨呢？而李志綏不過是他們手中一隻乖巧的木偶道具罷了。

當黎安友之流借一切機會詆毀毛澤東時，却又有不少美國學者在繼續對毛澤東的偉大貢獻和非凡智慧給予充分研究和肯定。這本身就給我們提供了思考的空間。

當然，黎安友這類人內心深處的文化優越感也使他們相信，中國的文化土壤上不太可能産生一位像丘吉爾和林肯這類"偉大民主領袖"；如果真有一位了不起的大人物的話，那一定是個魔鬼。他說"李醫生常瞧見毛手上捧著中國史書。毛愛讀流傳故事中權術傾軋和欺騙伎倆，他更是熟讀伺機而動、聲東擊西、迂回

攻退之法。他善用‘引蛇出洞’法，鼓勵別人表明立場再突而擒之。……”。這是多麼無耻和無知的聯想。[1]

毛澤東愛讀史書是皆知的，他熟讀中國歷史，無論是二十四史,還是歷代文學、哲學著作，毛澤東無所不讀，且常有獨到見解。看一下毛澤東在其談話和詩詞中對歷史典故的熟練運用，就可以瞭解他淵博的學識。在黎安友的思想裏，毛澤東不可能在中國史書裏學到什麼優秀的內容，只能是些“權術傾軋和欺騙伎俩”；至于讓其對手頭疼萬分的“伺機而動、聲東擊西、迂回攻退”軍事戰略戰術，不過是些整人的權謀之道罷了。《回憶錄》中對毛在男女關係方面的渲染和描述，確實達到了把毛描繪成魔鬼的目標。至于這些描述的準確性，在黎安友之流看來，《回憶錄》“既提供了第一手觀察紀錄，又呈現知人論事的洞見”。

像黎安友這類“半瓶子醋”的“中國問題專家”，到底能讀懂幾本中國古典文學和哲學著作還是疑問，讓他在哥倫比亞大學騙碗飯吃還可以，但他居然厚著臉皮能對中國人都難以正確認識的毛澤東說三道四，他還能達到什麼客觀的，或學術的層次，尤其在預先摻入自己好惡的情況下？他所能做到的，也只能是在自己預設的框架內胡言亂語罷了。

李志綏寫此書的全部目的是什麼，只有他本人知道。但《回憶錄》的最後還是露出了兩寸狐狸的尾巴。他先是描述了毛去世後，他在政治鬥爭的夾縫裏所受的委屈和無奈，“我們共度的苦

---

[1] 真是奇談怪論，丘吉爾和林肯這種人居然是偉大民主領袖！？您是否還記得：羅斯福在開羅會議前曾試圖說服丘吉爾在戰後將香港歸還中國，以換取戰後蔣介石的親西方政策，狂妄的丘吉爾叫囂：“除非戰爭，英國永遠不會放弃香港”。任何炎黃子孫都能識別黎安友之流心目中的“偉大民主領袖”是些什麼貨色；毛澤東沒被他歸入這類“偉大民主領袖”真是幸運。

難歲月終于使她（愛妻嫻）倒了下來”等，然後，“一九九Ｏ年，中央衛生局寫信來表示要沒收我的房子。我堅持不同意。一九九二年，他們還是將房子收回。我分別給前國家主席楊尚昆、中央警衛局長楊德中、衛生部部長陳敏章及總書記江澤民寫信申訴，但都石沉大海。我將一生獻給毛和中國，但我現在成了真正的無產者。我用哀痛的心情完成數十萬言的著作。我寫這本書是爲了（然後是冠冕堂皇的理由）……”。李寫《回憶錄》時，對自己爲毛辛苦一世，落得一無所有的憤慨和報復的欲望，已不可避免地影響到《回憶錄》的內容。當他對毛澤東及其政黨惡毒污辱時，也不可避免地羞辱了他無辜的祖國。

《回憶錄》的出版在國際社會引起很大轟動。李應能好好享受一下巨著暢銷的成就感，大量美元的物質滿足，報復和泄憤後的快感。但不久李即一命嗚呼。是死于被人利用的苦悶，良心發現後的深深愧疚，報復的心願總算了結，還是別的原因？[1] 可以肯定的是，李再也沒機會更正書的內容，或揭露該書背後的陰謀。（請進一步參考附錄四）

[1] 李志綏在 1994 年底出版該書後幾個月，即在美國的家中死亡。後來法輪功主辦的媒體將其歸罪于中共特工謀殺。但書已經出來，在該書引起轟動之時謀殺他對中共只會有反效果。因此，中共如果要謀殺他也不會選擇這個時間。我更傾向于認爲，要麽真如他合作的出版社所說是死于心臟病，或者是死于背後某個組織的黑手，因爲這本精心構建的摧毀共産黨領袖形象的書太難得了，它的威力頂得上歐美媒體幾十年來無數投入的效果，最好永遠不要做更正，更不希望作者有朝一日良心發現而揭發該書寫作過程中發生的一切。作者死掉是固化一切反毛成果最可靠的手段。



三、中國女性站起來了！可站得更優美

1918 年 11 月 16 日，湖南長沙一位叫趙五貞的女子，爲抗拒父母之命的婚姻而在娶親的花轎裏用剪刀自殺，引起很大轟動。青年毛澤東爲此在長沙《大公報》上發表《對于趙五貞自殺的批評》，尖銳地指出：趙五貞之死“是婚姻制度的腐敗，社會制度的黑暗，意志的不能獨立，戀愛不能自由”所致；“趙是被社會所殺”[19]。體現了對封建意識的憤恨和對女性命運的同情。也爲毛澤東掌握國家領導權後，對男女平等和婦女解放的大力推動，作了早期的注脚。

自新文化運動以來，隨著“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一起來到中國的還有男女平等和婦女解放的思想，幷被部分知識女性所接受。雖然經過了中國知識文人的大力宣揚，但在中國這樣一個具有悠久傳統的古老國家裏，婦女解放運動和男女平等的觀念幷沒有被社會廣泛接受，即使像胡適這樣的才俊在婚姻問題上也不能擺脫傳統禮教的束縛。“百無一用是書生”肯定過于偏激，但在中國的社會環境下，沒有政權的參與，中國知識分子改造社會的能力必將受到極大的限制。

婦女解放運動和男女平等的思想被廣泛傳播和被社會所接受認可，不是在蔣中正的中華民國時代，而是發生在 1949 年之後的人民共和國。

1930 年代初期的新生活運動，中華民國政府下達了一個英明的政令：禁止女性裹脚。當這一政令在孔孟之鄉得到貫徹的時候，

已經是三十年代後期，這使得筆者的母親成了中國女性裹脚陋俗的最後一代受害者。那些裹脚裹了一半就“勝利大逃亡”的奶奶伯母們，用她們那畸形的小脚，記錄了中華民國的這一重大成就。

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在其第一部憲法中才首次明文載明婦女和男子享有同等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建國後不久，全大陸範圍內徹底消除了賣淫和納妾的社會毒瘤和陋俗，維護了女性的尊嚴。最具代表性的一句口號是毛澤東的形象比喻：“婦女能頂半邊天”。而城市工業化的推進，女性接受教育機會的平等，農村集體化和人民公社化（在農村，成年女性是不能不參與集體勞動的）等，爲女性參于社會活動提供了機會，直接推動了女性解放思想的實現和普及。重抄一遍在第八章第一節中提到的毛澤東 1965 年致馬爾勞的信，他就中國婦女解放的問題寫到：“從開始便給婦女法律平等，但到現在一切仍然有待完成。造成舊中國婦女地位低落的那些思想、文化和習俗一定要消失，而無産階級的思想、文化和習俗必須出現。中國婦女還未存在于群衆中；但他們已開始要求存在”。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毛澤東及其政權在推動中國的女性解放方面做出了歷史性的偉大貢獻。

不論作何種評價，也不論毛澤東在個人男女關係方面受到怎樣的揣測，對中國女性解放做出最大貢獻的政治家當數毛澤東。他開創了中國人，尤其是女性生活的新形態。

那麼，大陸女性解放運動的成果如何呢？

要用量化的方式對這一社會運動進行描述是困難的。但作個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橫向比較，可以得出一些結論。如果拿中國和日本及韓國比較的話，中國女性在家庭和社會上的地位及活躍程


全心全意　1970年作

度遠超越日本和韓國女性，這應是沒有爭議的。即使和臺灣的女性做個比較，其觀念和行爲上的差別也是明顯的。臺灣社會雖然已很開放，但以筆者本人和臺灣男女朋友的接觸和瞭解，能明顯感覺到臺灣女性身上濃郁的傳統氣息。表現在做家務上，臺灣女性要比大陸女性主動的多。當然，負面的發現是：臺灣男人身上也較多地保留中國傳統的特點，如大男子主義。對大陸的男人們來講，如果你想展露一下男人的威風，必須作好面對暴風驟雨的思想準備。

中國女性就業率更以 73%而問鼎全球。從一個角度展示了中國女性參與社會活動的活躍程度。很難想像，幾十年前這還是個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型社會。

當然，如果因此而認爲大陸的女性解放運動已經大功告成的，未免有些草率，在職場等方面歧視女性的現象仍然存在。但另一個極端來看，筆者對大陸婦女解放的目標和成果產生懷疑，甚至是否有矯枉過正的嫌疑，是由一件震撼人心的事件引起的：

1991 年筆者到北京讀書期間，得知位于中關村一帶的科學院和幾所著名高校有很多中年知識分子英年早逝，其中包括一些享有聲譽的科學家。在清華校園裏就曾見到兩份 訃告，逝者皆是 50 歲左右的老師。這一現象曾引起中國政府的關注。當時較普遍的看法是：這些人經歷過“文革”，在事業上受到較大的衝擊等。但如何解釋那些更年長的，且經歷過反右的知識分子呢？以筆者掌握的有限信息表明，這些英年早逝的知識分子，大多有一位事業心很重的夫人。

另一件令筆者震撼的事是從師母那兒聽到的：導師的一位多年不見的老友來訪，他是西安某高校的教授，其面色紅暈，精神

抖擻，與幾年前面黃肌瘦的他判若兩人。一問方知，這位老教授的老伴去世了，之後娶了一位在校門口開飯館的守寡老太太。他的前妻是一心撲在事業上的同道，而新娘子則對他關懷得無微不至。老教授感嘆地說："都土埋半截的人了，才知道啥叫生活。"當然，師母，這位曾作過小學校長的善良老太太，講這個故事給筆者的真正目的，是希望晚輩端正找對象的思想，尤其是在拒絕了她老人家的一次熱心爲媒之後。這個故事在筆者的心裏却有別樣的衝擊，因爲，這類現象决不是個別的，而是在任何一個知識分子雲集的地區普遍存在的事實。這裏面更涵蓋著一個對中國社會的健康發展、改善家庭生活質量至關重要的課題，那就是：

女權運動的目標和中國女性的自我定位。

在中國歷史上，女性地位長期低下，居于從屬地位。而儒家思想，尤其是後來的宋明理學强化了這種不平等性，强加給女性沉重的文化枷鎖。在家庭裏，女人成了男人中心主義的受害者。當然，如果因此就認爲中國女性在家庭中地位全無，是不全面的。孔子在《論語》裏的一句"惟小人與女子爲難養也"，得罪了中國女性，成了女性受歧視的鐵證；但這句話實際上對中國男人的思維幷没有發揮什麽影響，有地位和家底的男人照舊娶好幾個，而從來不嫌女人難養。尤其在百姓家裏，男耕女織是封建自然經濟的體現和需要，男女之間的分工協作，决定了家務的瑣事和男人外出謀生的艱辛一樣的不輕鬆。爲了生活的幸福，中國歷史上就將夫妻相敬如賓、舉案齊眉視爲理想的模式，這不能不說是對"夫道尊嚴"的有趣修正。尤其當女人成了母親、婆婆或奶奶之後，不僅能和男主人一樣享受晚輩的孝道，甚至在多數家庭裏，


女拖拉机手 （1964）

男主人遠不如女主人受到晚輩更多的關心和尊重，這與中國家庭裏男主人喜歡表露的"家長威嚴"密不可分。

雖然，"一夫多妻制"給後來的女權主義者找到了攻擊的把柄，但那只是不到百分之一男人的福氣，大多數男人最多來個"望梅止渴"。無論是經濟能力還是家中的老婆，都不允許他們得享齊人之福。

有意思的是，在男人中心主義的中國家庭裏，男人可能是形式上的中心，男人怕老婆的歷史同樣悠久而且普遍。從唐朝的唐中宗懼內，到宋代的"河東獅吼"典故，中國男人怕老婆與地位和學識沒有關係。《紅樓夢》第七十五回裏的賈府宴會，賈政坦率承認"怕老婆"，以取悅衆人。在《醒世因緣傳》第九十一回中那位可憐的吳推官及一干隨從，除一喪偶一不帶家眷者，皆爲懼內者；吳推官辯解道："世上但是男子，沒有不懼內的人。陽消陰長世道，君子怕小人，活人怕死鬼，丈夫怎得不怕老婆？……風土不一，言語不同，惟有這懼內的道理，到處無异"。有些男人坦率承認懼內，但大多數中國男子更願意在外人面前表現出自己的家長地位不可侵犯，但在家中的能耐只有自知。多數懂事的女人也願意在外人面前給男人這點面子，把自己放在"小鳥"的地位，但幷不會因此而放弃自己在家裏的權力。當關起門來時，女性會有獨到的手段來化解男人的威風。這不能不說是文明古國的一大特异風景。當然，這也表現了中國女性的不錯修養。至于個別女人做"胭脂虎嘯"狀而驚動鄰里，只是不小心暴露了家裏的故事罷了。

哪位西方人曾說："女人，你的名字叫弱者"。可如果他有機會到中國的家庭住幾天，立即會發現自己是多麼的孤陋寡聞。

總體來看，中國女人雖然大多數沒機會像武則天或呂後那樣飛揚跋扈，名垂青史，也沒平等的機會去像穆桂英那樣馳騁疆場，更沒多少機會做買賣，但似乎中國的女性對這種基本屬于男人的特權沒有表現出憤憤不平。男人打仗、出外謀生，或背負光宗耀祖的責任而懸梁刺股、寒窗十載等；筆者實在看不出這點特權有任何值得女人羡慕之處。

當然，對于那些有一定宏偉志向的女子來說，中國的傳統社會顯然是對她們人生夢想的制約。慶幸的是，在傳統的中國女性中，這樣的女子所占的比例實在太小，大多數的中國女人還是滿足于家庭的小圈子，知足常樂，安貧樂道。在交通工具極爲落後的時代，讓中國女人像男人那樣外出做買賣或砍柴放牧，即使給了女人平等的權力，她們未必領情。

如果和世界其它民族或文化比起來，歷史上同時期中國女性的地位并不低。不說回教世界和東方的日本、韓國，即使民主思想産生較早的西方國家女性，在基督教的影響下，被毫無疑問地放在了“一根男人的肋骨”的層次而難以解脫，至今還沒機會像神父那樣去作“神母”。這是上帝造人的時候犯下的一個大錯誤。

自古以來，中國的女人何曾僅僅是“一根男人的肋骨”？她們在相當多的情況下扮演了一個深藏不露的脊梁骨的角色。不過這樣也不壞，中國女人的偉大，也出現了像孟母、岳母、秋謹、“八女投江”等無數可歌可泣的偉大女性和動人事迹；她們豐富了中國文化的精彩內涵，讓她們僅做一根肋骨豈不是太可惜了。中華民族需要這樣的脊梁骨。她們不僅爲男人支撑起一個溫暖的家，也支撑起一個偉大民族。

自新文化運動，婦女解放的思想來到中國。中國的女性終于找到了走出家庭，在更廣泛的領域發揮聰明才智的機會。中國家

庭和社會的新紀元逐漸到來。本來枯糙乏味的男人世界，開始變得豐富多彩，繽紛萬千。中國少數知識女性開始用她們特有的細膩和智慧，造福于整個社會，而同時保留了中國傳統女性的一切美德：勤勞、節儉、相夫教子、孝敬公婆。他們的美麗和笑聲，爲社會帶來了新的生機。這時的中國女性可能是最美麗的一段時光。只需要看一下"五·四運動"前後，中國男性詩人言情詩的數量和水平就可有個大概的瞭解。而才女的群體比過去幾百年的總和還龐大。中國的文人騷客再也不需像過去那樣到秦淮河畔，或藏春閣的妓女那兒尋找浪漫的感覺。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中國女性解放運動迎來了新的春天。婦女解放運動無論在廣度上和深度上都有了巨大的飛躍。男女平等的概念更被應用到無遠弗屆的地步。除了對清理下水道和厠所的活沒有興趣，女性們要在所有人類活動的領域證明女人的能力，實踐男女平等的理念。這對男人來講本來不應該是件壞事。但後來的實踐表明，1949 年之後中國女性在迎接妇女解放的同時，也不小心導致了矯枉過正的嫌疑，爲男人、子女甚至自身帶來了損失和遺憾。

1949 年之後開始接受教育的女性，尤其是那些受教育程度較高，有著強烈的事業進取心的女性，開始發生一些值得注意的變化，這和當時的社會大環境密切相關。

在工作上，女性已表現得當仁不讓，這是正面的發展。但在家庭裏，却發生了一些與昔日女性明顯不同的變化。在家庭生活上，已將男女平等當作夫妻權力安排的標杆，在處理不慎的情況下，難免滑入"斤斤計較"的泥潭。不少女性孝敬公婆的美德似乎也被送進了博物館。當夫妻意見不合時，夫人們已越來越難于做出讓步。夫妻之間的那份親情，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響。

男人的本能弱點使得男人的生活能力、條理和細心程度始終不如女性；而陽剛易碎又決定了貌似强壯的男人自身的脆弱性，和女性陰柔而富韌性的特點相比，尤其明顯。造物主創造男人時，又爲男人設下了一個“死穴”，使得男人的生活不能離開女人的關懷，讓體態弱小的女人有了獲得男人保護的資本和誘因。這雖然體現了造物主創造人類的偉大智慧，但可苦了後來的華夏男兒，這肯定超出造物主的預料之外。

固然，女人體格上不如男人强壯的不足，已隨著技術的進步而逐漸得到彌補。當看到體態嬌小的女子駕駛著汽車飛奔時，你無法不驚嘆于社會的進步。而隨著社會的發展，男人的高大形象除了在相親時派點用場，已越來越像是多餘的擺設。

當中國的女人表現出越來越强的陽剛之氣，中國男人本來就有點懼內的遺傳基因，更加走向了極端。所以當中國的女人呼籲“中國男子漢”時，她們越來越失望。1991 年，上海電視臺製作了《海派丈夫變奏曲》的節目，其主題歌成爲上海女人“尋找男子漢”的寫照：“男子漢哪裏有？大丈夫滿街走。小李拎菜藍呀，老王買煤球；小張拿牛奶呀，老趙買醬油。妻子吼一吼呀，丈夫抖三抖！工資獎金全上繳，殘湯剩飯歸己有；重活髒活一人幹，任打任罵不還手。”很顯然，幾千年來中國男人身上的那份“虎性”，在“河東獅吼”震懾下，已變成了“猫的溫柔”。

男人造就世界，女人造就男人。有什麼樣的女人，必然產生什麼樣的男人。當女人爲今日中國男人的退化而感慨時，是否注意到女性自身的責任？如果把歷史上的英雄豪杰放在今日的中國，他們很難有名垂青史的機會。跟著劉備到處跑，劉備的夫人肯定不同意。有不少海外學子希望畢業後回國工作，然而夫人的不悅之色使得他們只得放弃回國的打算。

也許，昔日中國男人馳騁天下的輝煌歲月，已很難再現。因爲，他們身上的那份野性已蕩然無存，而在有限的活動空間裏，又必須得到夫人的恩准。你還能指望這樣的中國男人做得成什麼？即使看一下當今中國的貪官們，他們的背後至少會有一個女人的影子。如果他們不貪污的話，女人的那份攀比和虛榮心，將令他們在家裏無地自容。

如果女人真願意和男人來個角色對換也沒什麼。中國女人在各方面攻城掠地，馳騁天下，那也一定是中華之福。男人理家，女人掙錢養家。但女人們似乎不答應。筆者不止一次聽到女士們的高論：男方的收入當然不能比女方低。這時，男女平等的標尺自然被拋到九霄雲外。既要有理想的收入，又必須有所成就，大小事物的決策權又掌握在夫人的手裏；對當今的中國大陸男士們來說，似乎活得越來越難。隨著女性性觀念的開放，離婚率的提高，男人更不敢掉以輕心。

男人受點委屈也許活該，但孩子們的委屈則令人難以接受。當今的女性甚至對給孩子喂奶這種令筆者羨慕的美事，也是女人天經地義的責任，都感到頭疼。據說是爲了保護身材，也可能是因爲事業，不願意花時間在孩子身上。在孩子剛出世不久，就不得不面對媽媽解放的苦果。這是令筆者這樣一位大男人最無法接受，又最無可奈何的事，誰讓上帝不給男人這項功能？

作賢妻良母已被越來越多的女性不以爲然。問題是，如果女人不成爲賢妻良母，那麼你的社會角色應定位在何處？如果不考慮職業上的定位，那麼女性的角色只剩兩個，一是朋友，一是性伴侶。不知聰慧的女性們是否注意到，一位賢妻良母的美麗可持續一生，甚至直至身後，而性伴侶的美麗很可能只有一個小時。

一般情況下，男女平等在家庭生活上被體現出來沒什麼不妥，但如果因此導致親情的削弱就未免有些可悲了。人的一生難免一些窘境，只有親情的存在才是唯一最可靠的，如果不恰當地濫用男女平等，女權運動的庸俗化就是難以避免的了。

筆者曾調查過三年困難時期家鄉餓死人的事。針對“那幾位爲什麼會被餓死而其它人却可以挺過來？”老一輩的人給了筆者一個令人震驚的答案：餓死的人，他們老婆不賢惠。因爲男人飯量大，而他老婆在一家人之間搞口糧平均分配，使得女人和孩子有足以活命的口糧，但對男人來說，這點糧食已難以應付。經歷過苦難的人也許會發現親情的可貴，也可能發現婚姻關係的冷漠。

三年困難時期，筆者的大哥、姐和父母能安全度過，頭腦靈活的父親付出了巨大的艱辛，用他的雙腿跑到安徽蚌埠、河南濟源、河北邯鄲等地，用家鄉的白芍換回些許的玉米。甚至 1960 年除夕之夜，父親從邯鄲帶回玉米的途中被凍僵在村莊南面的路旁，直到被村民救起。而母親的辛勤持家和無私的愛對家庭渡過難關，是必不可少的。她不停地尋找一切可以入口的東西，包括菜葉、植物根須等，當父親在外奔波時，維持著這個岌岌可危的家庭生命。母親常說：“要不是你爹，咱過不了那一關”，而老爹則說：“這個家虧得你娘”。一場驚天大災難，不但沒有摧毀他們，反而使他們彼此終生抱有感激。這和文化程度沒有關係。

母親代表了那最後一代受封建禮教影響的中國女性。她將全部的愛用日夜的操勞，無所保留地給了家庭。她沒聽說過女權運動，也不在乎男女平等的標杆，甚至沒興趣計較自己是否吃虧，但誰敢因此而嘲笑她的落伍？

當然，母親并非真的對男女平等一無所知。當筆者大學畢業時，母親，那個從來不讓兒子進厨房的母親，硬是逼著筆者跟她



先父 董鳳林　　先慈 孫振蓮

學做飯，理由是：以後成家了，兩個人上班，你總不能下班後就坐著等飯吃，老讓上一天班的媳婦做給你吃合適嗎？母親毫無疑問地瞭解男女平等的含義，但對自己她却放弃了追求的權力。在她身上輕易發現母愛的偉大和神聖。

當代的女性們也許會對母親一代生活的不够浪漫或缺乏情調而不屑一顧，但你絕對不敢說她們自私。她們用辛勞的汗水揮灑著那熠熠閃光的母性。在她們身上了保留了女性最偉大的品質。

母性是女人有別于男人，與美醜、貴賤、膚色、種族無關，且令男人永遠無法超越却又永遠期待和需要的女性特質。但當今日的中國女性已越來越普遍地收藏起她們體內的母性燥動，那麼，除了"性"和生育的功能，您還剩下些什麼特別之處呢？如果男人結婚僅僅獲得了一個穩定而免費的性伴侶，及作爸爸的機會，轟轟烈烈的女權運動似乎又回到了原點——女人不能接受僅作爲滿足男人的性需要和作爲生育機器而存在。這未免令婦女解放運動推動者們倍感失望和尷尬。

對于男人來說，失去母性的擁抱又何嘗不是一大悲哀呢？

女性走向社會無疑是人類的一大進步，也令世界變得更加繽紛萬千，極大地改變了女性的形象和精神風貌，也給男人自身的世界帶來了豐富多彩的內容。如果女人只是待在家裏，因沒有機會豐富自己的素材而使她的智慧不能充分轉化爲生活的創意；同時，也必將過分關注男人的一舉一動和衣服口袋裏的內容，男人褲子上粘的一根長頭髮將足以令她緊張萬分；也給男人的正常生活帶來無形的壓力。因此，女人走出家庭的小圈子而進入社會的大環境，對女人和男人都是一件幸事。

但如果女人走向社會的同時，將家庭和親情帶入到一個扭曲的狀態，將是極其悲哀的。考慮到男女身體和心理素質的差异，男人在當今社會面臨來自家庭和社會的雙重壓力必然會拉大男女平均壽命的差距。有朝一日，隨處可見孤獨的高齡老太太，而她的老伴早已乘鶴西去。那時，女性解放運動和女性自身定位的偏差所帶來的惡果就要顯現出來。很遺憾，您只有獨自吞下這一惡果，而無用的老頭子再也沒機會去撫慰您晚年的孤獨和哀愁。

隨著西風東漸，中國的男女們似乎開始懂得“愛情”的意義。她們開始爲了“愛”而不惜一切。很遺憾，對婚姻關係中的“愛情”成份，中國的現代男女們只搞懂了不到一半。中國千百年來對夫妻關係的最正面描述是“恩愛”，且“恩”字在前，“愛”在後。“愛”是所有動物的本能所在，人類雖習慣將自己的愛情描述得偉大异常，但實際上，和動物界的愛情比起來，人類的愛情幷沒什麼特別之處；如果說有，那是人類學會用歌劇、詩詞或鮮花來表達或歌頌愛情，而動物則沒這點天分，最多來個“孔雀開屏”，或幾聲夜猫的嘶叫。中華文明在婚姻上的首要體現是“恩”，有所謂“一日夫妻百日恩”之說，隨著性觀念開放，您準備爲未來的另一半把“恩”置于何處？正是這種對“恩”的記取和報答，體現了人性的高尚，成就了中國人婚姻關係的穩定和夫妻關係的高質量。這是西方文化下“愛情萬歲”主導的婚姻所無法比的。但今日的中國男女在不顧一切地追逐所謂的愛情時，捨弃了最能體現中國人家庭價值的“恩”字。即使再過幾千年，重“恩”的品德也比對“愛情”的重視，更能體現人類文明的進步程度。浪漫、鮮花固然令人陶醉，但生活的根本則是下面覆蓋的泥土，其中飽含真愛、尊重和感激的元素。

愛情可能是人類關係中最不靠譜的關係之一，正因爲他的激動人心而又難以預測，它才成爲文學藝術永恒的主題。正如足球比賽之所以引人入勝，就是因爲結果的不可測性。而中國人歷來對家庭的重視所體現出的親情中心主義和感恩心態，才是更高層次的婚姻關係。

西方不少學者對中華民族的深入研究後發現：我們這個民族令人敬畏的特點莫過于超人的忍耐和堅韌、聰敏和勤勞，以及保守的家庭觀。而當今風起雲涌的性開放，將從根本上摧毀中國的傳統婚姻和家庭觀。中國人的生活質量和精神質量必將大打折扣，因爲我們失去了一個穩定和可信賴的生活和心理療養基地——家庭。性開放和個人主義根本是對有序社會的挑戰。據傳聞，80 年代美國中央情報局曾策劃在北京大學的學生中間鼓勵性開放、享樂主義和個人主義。如果這個傳聞屬實的話，那美國人無疑抓到了打擊中華民族的一根最敏感神經，它比原子彈能更有效地摧毀我們這個民族，因它要動搖的是我們文明的基石。而中國的一些以學術名義而肆意宣揚性開放的學者、文妓和不負責任的戲子們則毫無疑問地成了毀我中華的幫凶和走狗。

筆者夢想中的未來中國應該是：政治上民主，言論上開放，文化上寬容，家庭上保守，工作上敬業和進取。

當然，本節所及之女性現象，幷非發生在每個女性身上，而是因爲這些現象與過去相比有愈演愈烈之勢，使筆者不忍回避。

面對過度計劃生育和享樂主義及事業追求動機下導致的生育率大幅度下降，大部分女性在生育階段重回家庭的可能性，也許是值得探討的。尤其是生活在海外的炎黃子孫們，爲了事業和擔心撫養孩子的精力不够而拒絕多生孩子，已經成爲具有普遍性的

現象。這是海外中華民族成員不負責任的種族自毀之路。甚至可以說，生活在海外的炎黃子孫，如果夫妻不想生育超過兩個孩子，給您一個思考題：您個人事業的成功爲所在國家貢獻良多，然後讓外族去享受您的成果，自己的後人因人口不足而難以獲得足够政治權力，甚至最後逐漸退出歷史舞臺。這是多麼愚蠢的價值觀：只給外族貢獻，而自己不享用，自己的那點成就感還有意義嗎?

中國政府如何通過政策和福利配套讓女人回歸家庭，將是未來值得研究的新課題。

當然，幷不是說今日女性解放運動已經過時，在現實社會生活中還有很多歧視女性的現象，這是值得男人們不斷改進的課題。

女性解放運動的最大成果是讓女性走向社會，幷和男人平等地參與社會活動。女性對自身定位的偏差，進而導致與人類自然本性的衝突，生育責任意識的淡化，和陰陽相協的動搖。雖然這點遺憾是瑕不掩瑜，但如果當代中國女性能對女性的定位和女權運動的方向再做更精細的思考和調整，無疑將令中國的女性們變得更加可親、可愛和美麗。

本節談論女性解放的話題，幷不意味著男人們可以袖手旁觀或隨意推卸責任。一個男人如果不積極進取，如果不懂得付出，你還有什麼資格對女人指手畫脚?

尋找一條讓男人、女人和孩子都不至于太累的生活道路，無疑是擺在中國女性面前的任重道遠且深具意義的課題。對此，中國的男人們就不便說話了。



左圖：美國婦女在國際婦女節游行，標語寫著『婦女能頂半邊天』



1974年底。毛泽东称赞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

第十二章 毛後時代鄧小平及中共中央之失[1]

本書多處以鄧小平和中共第二代領導層的事業作比較，無意否定鄧的一生爲中華民族的解放和發展事業所作的巨大貢獻，更無意對改革開放的正確性提出質疑，只是爲了在比較中能更清楚地看待毛澤東對中國發展所作的貢獻，及其所犯錯誤的歷史必然性。對過去過分貶毛、過高抬鄧的做法予以糾正，部分地還歷史真面目。當然，近二十年來的瘋狂反毛運動，發端于鄧小平主政時期，也是作者不得不作一比較的重要原因。即使鄧小平本人對毛澤東形象曾給予有限保護的一面，幷堅决頂住全面否定毛澤東的傾向，也不能讓筆者回避這一極爲重要的歷史片段。



[1] 1998年筆者所寫的著名八章網文《爲毛澤東辯護——兼談鄧小平的歷史責任和本來面目》中的一章"鄧小平的歷史責任和本來面目"，被網友單獨拿出在網上傳播甚廣。本章即在該文基礎上擴充而成。第二版只對第一版的部分內容做了微調。

一、結束毛澤東時代方式的拙劣和短見

一九八零年初，學校曾組織我們高中一年級的學生觀看鄧小平七九年訪美的記錄片。在歡迎鄧的音樂會上，當一群美國小學生用中文演唱"我愛北京天安門，天安門上太陽升，偉大領袖毛主席，指引我們向前進……"，來表示對客人的尊重和歡迎時，鏡頭在鄧的臉上停留五秒鐘；鄧僵硬的、沒有半點喜色的臉給年僅十四歲的作者留下深刻印象，也一定讓美國主人感到奇怪。過于早熟的政治意識使筆者強烈地感覺到一場反毛運動將要來臨，而以鄧小平爲首的"文革"受害者們將在實是事求是的外衣下，不可避免地摻入個人的情緒和報復的本能衝動。[1]

八一年，《決議》在鄧小平的主持下獲得中共中央的通過，拉開了批毛反毛的序幕。雖然從《決議》中能感覺到中央試圖以委婉的語言達到對毛的批評，但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這已經是過分。畢竟，中央在結束毛澤東時代及其影響時，完全忽略了人民應有的心理準備，以及由此帶來的政治後果，使得《決議》帶

[1] 在第一代領導人中，資歷比鄧深，毛更加信賴的大有人在，但毛澤東對鄧小平則特別地欣賞。"文革"期間鄧的待遇比同爲劉鄧集團的劉少奇好得多，後來再次啓用。筆者懷疑毛澤東有刻意栽培和考驗鄧的目的。在 1976 年毛已時日無多，却再次"批鄧"，目的何在？筆者懷疑毛澤東有如下動機：接班人肯定比鄧政治上可靠，但未必比鄧有能力，故先打倒鄧，由接班人再啓用鄧，鄧必傾力報答"新君"。當觀看《雍正王朝》中康熙臨終廢大臣時，忽有上述奇想。但鄧毫不客氣地把啓用他的華國鋒給趕出局。當然，這個亂想只是亂想。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來了一個矯枉過正的實際效果。所造成的衝擊和思想混亂，遠遠超越《决議》的框架範圍。

《决議》除對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前的七年予以充分肯定外，毛澤東領導下的其餘二十年幾乎被否定。在全黨學習《决議》的過程中，各界掀起了檢討毛澤東過錯的聲浪。文藝界更不甘落後，通過電視等一切手段否定建國以來的成就。當打開國門看到外國的發達時，更全民埋怨毛；似乎要不是毛澤東的錯誤，中國就應該如何發達，人民就應如何富有。他們無視其它和中國建國時有相近國情、而已遠比中國落後的國家的存在；只看到發達國家的富有，而不看中國薄弱的基礎和發展環境的惡劣；"實事求是"變成了反毛的專用藉口。毛的語錄被刷掉，畫像被撕毀，塑像被推倒，家裏的石膏像被扔進垃圾箱……。而中共中央對此沒加以任何的控制，這在中國的政治環境下已經等同于認可和支持。

讓當時年青的作者感到一絲安慰的是在農村。農民們將毛主席畫像保留，或擔心犯政治錯誤而像春節後送神像般燒掉，或將石膏像悄悄藏起。在這些土氣的鄉下人身上，總算保留了整個民族的一份良心。

作者在修改此書時，每讀至上述這段歷史回顧，總禁不住情緒激動。一位爲我們民族的獨立、發展和尊嚴做出無與倫比貢獻的偉大領袖，大半生求救國真理，南征北戰，家庭因他離零，國內外敵對實力從來沒有放鬆過對他的攻擊。然而，他做夢也不曾想到，爲之奉獻滿腔熱血的民族却在他身後對其進行了厚顔無耻的羞辱。當我們爲自己五千年悠久文明而自豪時，我們是否意識到了我們身上的庸俗和市儈氣？我們這個民族真的那麽成熟嗎？

尤其是反毛急先鋒的中共領袖和見風使舵的知識文人們，你們什麼時候才意識到自己的渺小和不足？和那些目不識丁、滿身塵土的鄉巴佬比起來，你們顯得多麼可悲而又可笑！令人恨鐵不成鋼的中國知識分子，你們曾是毛澤東錯誤政策的布道者和幫凶，轉身又成爲毛澤東的詆毀者，你什麼時候才能秉承自己的一份良知，堅定地肩負起對社會和公義的責任？！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毛澤東作爲一個具有超凡智慧和膽略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其所做所思豈是幾個庸才凡夫可以輕易領會？二十年前我們批評毛澤東的一系列錯誤，今天不正在證明我們的淺薄和輕率嗎？"緣槐螞蟻"有"誇大國"的勇氣，但却沒有撼動大樹的能力。

正是這種不健康情緒的彌漫，導致對毛澤東時代的處理變成對毛澤東時代的簡單否定，缺乏冷靜思考，爲國家帶來了重大損失。第二章第三節提到的人民公社改鄉鎮，就是這種簡單思路的典型案例。



深入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

二、"集體結晶論"及其它

在毛澤東逝世後，知識分子從檢討毛的錯誤迅速上升到檢討共產黨的錯誤、馬列主義理論和社會主義制度的錯誤，這是必然的發展邏輯。鄧小平慌忙推出了"四個堅持"，即"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當然不忘强調"毛澤東思想是集體智慧的結

晶”。鄧試圖將毛澤東和共產黨、社會主義制度割裂開來的作法顯然是短見和幼稚的，他似乎沒有注意到毛澤東和整個中共的歷史、社會主義制度、人民解放軍已熔爲一體，沒有毛的中共還是中共嗎？沒有毛的社會主義還是這樣的社會主義嗎？沒有毛澤東軍事思想武裝的解放軍還是人民子弟兵嗎？隨著時間的推移，鄧小平、周恩來等人的得失可游離于共產黨之外而作爲個體予以評價，但毛任何時候不可能和中共及社會主義制度分離、和人民軍隊分離。

“毛澤東思想是集體智慧的結晶”是頗爲滑稽的集體撈功之舉。打開和毛一起戰鬥過的革命家如朱德、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的文集，然後再讀毛澤東雄文四卷，能强烈感覺到他們和毛根本不在一個哪怕是接近的思維層面上。奠定中共革命理論基礎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等大作完成時，其它領袖們還沒搞清楚該幹什麼呢。沒有上述領袖們參與革命，毛澤東身邊肯定會有其它人參與幷取得革命成功；但沒有毛澤東參與，上述領袖們根本找不到革命成功的道路幷名垂青史；長征前後中共及其軍隊的經歷就是最好的證明。要拿國共兩黨同時代的軍事將領和政治家進行對比，除毛澤東外，共產黨其他人幷不比國民黨裏的同級別領袖高明多少，把朱德、劉少奇、鄧小平和周恩來等放到蔣介石手下，看他們還有機會“集體智慧”嗎？

當然，正如諾貝爾科學獎得主們的助手也爲科學發現做了不少工作，其它領袖們幷沒有無所事事，但他們的貢獻還沒到有資格强調“集體智慧”的地步。“沒有毛澤東就沒有新中國”是長期的、成功與失敗的無數次反復實踐中得出的正確結論，“集體結晶論”無疑是對此結論的歪曲。

即便筆者本人對以上所有領袖們的崇敬之情，也不能因此而放弃評價歷史的辨證思維和科學精神。從以上分析也可以看出，是毛澤東讓中共其他政治家和軍事家以勝利者的姿態名垂史册，幷蔭及後人，因此，這些毛澤東同時代的政治家和軍事將領及其後代，是最不應該對毛澤東說三道四的，是最應該對毛澤東持感恩與崇敬之心的。但從毛後時代的表現看，他們中的大多數從做人的角度講，顯然是不合格的。

流行海內外、將鄧和毛相提幷論的作法更是奇怪無比。如果說毛開闢了中國發展的新紀元，那麼鄧則是在新紀元裏開始了一個繼往開來的新階段。毛對中國的影響是長期的，甚至是永久的，鄧只可能是短暫的。鄧比之于毛，如月亮比之于太陽；當鄧的支持者試圖因太陽黑子而遮住太陽的光芒時，自己也失去了光亮。

目前中共一個有趣的結論是“沒有鄧小平就沒有今日的幸福生活”，這一結論大有值得商榷之處。“沒有毛澤東就沒有新中國”表明了毛是新中國得以成立的必要條件，是“無數次成敗反復”證明了的；那麼鄧是否是今日新生活的必要條件哪？換了別人是否就不行了呢？是否經歷過“無數次成敗反復”證明了的？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鄧對中國的發展方向幷沒像毛那樣制定系統的指導理論，“摸著石頭過河”是他的選擇。實際上，經歷毛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後轉向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爲主的輕工業優先戰略是自然的轉換，國際環境許可下對外開放也是歷史的必然，將基于計劃的人本經濟轉向市場經濟也是大勢所趨。趙紫陽任總理時曾講“沒有‘文革’的失誤就不會有現在的大徹大悟”，部分說明了改革開放的必然趨勢。沒有鄧，其它領導人最終都會走改革開放

的道路，都會“摸著石頭過河”。林彪在他的“五七一”紀要中已表露了後來改革的部分思路。

當然，今日“幸福生活”的內容如果僅指物質上的，那無疑比過去“幸福”許多，但信仰迷失、社會風氣敗壞、貪官污吏橫行、少兒失學嚴重、百姓怨聲載道、弱勢群體遭受欺壓而得不到保護等，表明今日的生活幷不那麽“幸福”，甚至比那信仰明確、爲官清廉、民風樸實的年代更多了幾分愁苦。

另外，將“沒有毛澤東就沒有新中國”和“沒有鄧小平就沒有今日的幸福生活”相提幷論，强烈暗示毛澤東主要只在建國之功，而將建國後的主要發展之功歸于鄧的名下，本书前面章節已對此作了否定。這樣幷列的口號不僅有違“實事求是”精神，甚至具有歪曲歷史、抹殺二十八年中幾代人無私奉獻的反動性質！

至于對毛澤東“三七開”的判斷，更是荒謬之極。

毛澤東的建國之功，在其一生的功績中至少占五成，那解放後毛澤東的錯誤就要占到六成才能湊够這個比例。按照這個推理，解放後所有的過錯都是毛澤東的，還未必湊得上這個六成的比例。建國後 27 年中，沒有毛澤東似乎中國可以發展的更好？看一下八大前後劉周鄧主導國家事務後的糟糕國家管理能力，就可以看出，沒有毛澤東就不可能有中國的發展成就，更不用提建國後幾次民族戰爭所挽回的民族自尊和自信，中國基礎設施和經濟建設的偉大成就，毛澤東後期近乎百分之百的兒童入學率，完善的各級醫療體系，以及遠超越中國實力的外交影響力。所有這些，指望劉鄧周已經證明是不可能完成的，至少，沒有毛澤東的堅持，劉鄧早就讓“兩彈”下馬了，“一星”也不可能上天了。

即便毛澤東建國後有錯，那他的過錯也已經固化，而用毛澤

東軍事思想武裝的人民軍隊，毛澤東幾十年致力于建設的平等觀念和民族思想解放，恢復的民族自信，基礎建設成果等，將讓中國人永遠受益，也就是說，如果以時間跨度爲分母，以毛澤東對中華民族的持續貢獻爲分子，那這個分子將會隨著時間的延長而日益逼近分母，或者說，毛澤東的錯誤占比將逐漸趨向無窮小。

正是以這樣的歷史大格局來看問題，毛澤東才對秦始皇給予了肯定。和中國兩千年政治體制穩定和國家大一統比起來，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只能算是微不足道的小錯誤。以同樣的格局看待毛澤東，不難得出更客觀的結論。中國在大變革的時代裏，在整個民族需要一次徹底的自我改造時，需要毛澤東這樣的領袖來推動領導民族的大復興，這絕對不是“摸石頭過河”層次的領導能力所能勝任；雖然在這個波瀾壯闊的過程中難免瑕疵，也比一個什麼大方向都抓不准或不敢抓的“完美者”更令人尊敬，也更符合民族復興的需要。至于那些蠅營狗苟、濫用權力的自私政客，你有什麼資格對毛澤東評頭論足？

公者千古，私者一時。

——雷潔瓊感言于韶山毛澤東故居

三、“批毛”的不良後果及中共的代價

《決議》的通過和接踵而來的批毛浪潮，造成了八十年代中國人思想的空前大混亂，“六·四”事件是十年來思想混亂的必然結果。至今還有不少人大罵“共産黨當政以來沒幹多少好

事”，能怪他們嗎？在中共自己傳媒和文章中已清楚表明了這一點。“六・四”後鄧小平沉痛地總結道：“改革開放以來最大的失誤在教育”。很遺憾，鄧至死都沒有認識到禍根在哪裏。前蘇聯在允許對列寧、斯大林肆意攻擊時還指望蘇維埃聯盟的完整，中國對毛澤東不負責任批判時還指望人民對共產黨有堅定的信心，都是不切實際的幻想。國際間存在明爭暗鬥本是非常自然的事，外國搞“和平演變”也屬正常，“必自侮，而後人侮之”。

“文革”表面上的混亂幷沒有從根本上動搖中共建立起來的堅實政治基礎和社會基礎，人民對執政黨和其社會制度的信賴幷沒有改變。在華國鋒時代，中國人思想上還基本保持毛澤東時代的純樸和堅定信仰，如果中共中央能抱更寬闊的胸懷，更高瞻遠矚，采取溫和漸進方式對建國以來所犯錯誤進行黨的集體反思，對建國二十七年歷史指出失誤的同時肯定進步和發展事實，用個案處理兼說服教育的方式對冤假錯案一次性處理，在不損害毛光輝形象的情況下在領導層面上對毛進行保護性批評，用三、五年時間內實現毛澤東時代的“軟著陸”是完全可能的。

《决議》的通過也在國際上給中共造成了難以彌補的損失。

在“文革”時期，雖然有不少的西方人堅决反共，但對毛澤東却有複雜的心態，反對者有之，推崇者更不乏其人。在“毛澤東與個人崇拜”一章中已有論述。這實際上是中共在毛後時代的一筆財富。但《决議》通過後，海外擁毛人士失去了市場，而反毛、反共力量則趁勢而爲。直到九十年代，對毛澤東給予較高評價的聲音再現，但已很難搶占輿論的主流。1999 年 10 月 1 號，《紐約時報》刊登社論《中國革命五十周年》（“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論述中國五十周年的成就，談到“數百萬人民在毛的奇怪經濟政策中喪失了生命，在六十至七十年代

的狂熱‘文革’期間犧牲了個人的事業和熱情。實際上，半個世紀的所有經濟成就都是自 1978 年鄧小平放弃毛的社會主義和對外開放，解放了人們的創業熱情後實現的”。一位叫瑞蒙·勞塔（Raymond Lotta）的學者給該報社發文，對該社論提出質疑，以數據列舉了毛澤東時代取得的成就，最後問到：“如果這不是進步的話，那是什麼？”。很自然，也遺憾，《紐約時報》拒絕予以刊登[20]。全面强調“文革”的非人道性，進而否定中共和毛澤東，已成爲一些人士的慣用伎倆。

“文革”在毛澤東逝世後即自動結束，高考恢復，科技大會召開，人民的思想覺悟和勞動熱情繼續高昂。如能善加利用和引導，對過去采取辯證的揚弃方法論，中國的改革開放將會更加順利，今日中國的很多弊端也不會這樣嚴重。

多年來，每當作者想及中共通過《决議》這種疾風暴雨方式結束毛澤東時代，幷放任各界對毛肆意攻擊和報復時，總深感惋惜。爲國家失去毛澤東時代建立起來的堅固社會和政治基礎而心痛萬分。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開創了蘇聯和東歐歷史上思想空前混亂的時代，培養了導致蘇聯解體和東歐巨變的一代領導人和民衆。《决議》則開啓了新中國歷史上思想空前混亂的八十年代，幷影響了一代人。

蒼天有眼，當我中華民族在東方崛起。蘇聯解體、東歐巨變發生及時，讓中國知識分子猛醒，給中國人民上了生動的一課，初步結束了持續十多年的思想混亂。這既是執政黨的幸運，也是我中華之福。毛澤東時代還不太遙遠，那時的人還在，知識分子們重新購回已扔掉多年的《毛澤東選集》，掀起了全國性的、自發的“尋回毛澤東”的高潮。他們在《毛選》裏看到了對現實世

界的精闢分析，開始用“矛盾的、鬥爭的方法”來辨別這個本來就很複雜的世界。當美國總統克林頓訪華，向中國的大學生們兜售他的“民主自由”時，學生們非但沒有照單全收，反而送上了“湖南的紅辣椒”。

毛澤東時代培養的年輕人已肩負起當今中國的領導責任，今日的中國青年也完全有能力肩負起這個大國未來的重任，雖然當今教育方法和幹部選拔制度弊端甚多。這是毛澤東幾十年致力于民族教育和改造的結果，决不是什麽“集體智慧的結晶”。

對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的階級鬥爭問題，是中共與蘇共的主要理論分歧之一，蘇共認爲剝削階級被消滅後就不再産生，永遠不會有復辟的可能。而毛澤東則認爲，在社會主義時代階級鬥爭仍然存在，剝削階級復辟的危險幷沒消失，因此提出在共産黨領導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而蘇聯解體和東歐巨變，則直接證明了毛澤東思想的正確性。

至此，誰還能說毛澤東建國後一系列政治運動完全錯了呢?

1953年作

四、毛後時代軍隊領導上的失誤

鄧小平的歷史功過，留待歷史評說。筆者怎敢，又怎能以一家之言以蔽之?

但鄧小平的一些重要政治失誤是不能回避的。提出的目的不在責備，更無意進行惡意攻擊，而是希望警醒

當今和未來。歷史研究的價值正在于此。尤其在毛澤東巨人的背影之中，能更清楚地看出問題之所在。

當中國爲一個錯誤付出高昂的代價之後，後來者必須有所總結和警惕，以避免類似錯誤的重演，否則，豈不白交了這筆學費?

“文革”雖然局勢混亂，人民軍隊的紀律和純潔并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人民子弟兵繼續保持高昂的鬥志和鋼鐵一樣的紀律，軍民魚水情成爲國家最重要的社會基礎要素。然而，在八十年代初，鄧小平一句“讓解放軍分享改革開放的成果”，在軍委主席任內，開始了空前絕後、文明國家僅見的軍隊和武警大規模經商，完全背離了毛澤東時期軍隊搞生產的本來目的；對軍隊的紀律、戰鬥力、和人民子弟兵的光輝形象，造成了難以彌補的重大摧殘，也爲當時的國家正常商貿活動造成了巨大的干擾。這支毛澤東建立和發展，并用毛澤東軍事思想和政治思想武裝的軍隊，徹底結束了幾千年來“好漢不當兵，好鐵不打釘”的輕武風氣，將軍人的崇高武德和軍人榮譽感首次撒滿中華大地。解放軍以大無畏的犧牲精神有效地捍衛了國家領土和主權完整，極大地恢復了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成爲中華民族最重要的精神支柱之一，是毛澤東留給中華民族的一筆巨大遺産。如果不是人民軍隊過硬的政治軍事積累和光輝的歷史背景，真難于想像，遭受十多年糖衣炮彈的狂轟爛炸，他是否還能衝鋒陷陣? 而“六·四”對解放軍的濫用，更進一步衝擊了子弟兵和人民的魚水深情，爲我們可愛而偉大的人民軍隊留下太大的遺憾，也成爲鄧小平領軍生涯中無法抹掉的污點。再經過江澤民二十三年（江澤民主政十三年，垂簾干政十年）的無作爲，導致整個軍隊高層幾乎爛透。鄧江兩代短見的領導人對解放軍戰鬥力的破壞超過國軍、日軍、美軍、越軍、蘇軍、印軍對我軍傷害的總和。值得慶幸的是，習

近平一代受毛澤東時代的教育，對毛澤東思想武裝的人民軍隊本來應該什麼樣還有清晰的記憶，又有先輩傳承的强烈責任感，以極大的勇氣和意志對軍隊大力整肅，初步結束了軍隊的進一步腐爛。要說習近平挽救了軍隊，不算誇張。

每念及此，筆者都爲中華民族曾擁有毛澤東這樣的領袖而慶幸；不論他是否給了我錦衣美食，至少他給了我們作爲一名中國人的勇氣和自豪。他不再讓我們像先輩那樣害怕洋人，更不會讓我們任人宰割。他的這筆遺產將讓中國人民世代受惠，對毛澤東一個人或其一代人，我們還應苛求些什麼呢？他給我們的即使僅這一筆遺產，難道還不够多嗎?

一名美國西點軍校的教官總結韓戰時道:“美軍不怕中國軍隊現代化。因爲在這方面他們永遠趕不上我們。怕的是中國軍隊的毛澤東化，或按中國術語叫革命化。中國軍隊離毛澤東越遠，（如果中美開戰）美軍的勝算也就越大。毛澤東是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善于以弱擊强，以弱勝强的軍事天才，毛澤東軍事思想體系及實戰應用非常的精妙獨特。至今還沒有好的應對破解辦法。雖然我們是在把他當作對手來研究，但是我對中國的毛澤東始終懷有最深的敬意。西點軍校崇敬的兩個中國的也是全人類的兵家泰斗，一個就是毛澤東，還有一個是孫子。”[41]很痛心，毛後中國全方位的“去毛澤東化”已經讓中國人付出慘重的代價。



讀到這裏, 讀者們應不難理解爲什麼一些西方人不放過任何機會詆



毛泽东思想育新人

毀毛澤東。對付解放軍這樣的對手和毛澤東教育和組織起來的人民，靠先進武器是難以奏效的，最佳的方法就是摧毀毛澤東在百姓和軍人心目中的地位，使他們懷疑一切；而中共高層的短見政客和一些無知的大陸知識分子則無意或有意間成了他們反華的幫凶和代理人！

五、值得注意的問題及無奈中的期望

本文對鄧小平的批評，如果令讀者因此而忽略或否定了鄧小平在中國歷史上里程碑意義的貢獻和地位，那將是遺憾的。對鄧小平過高的評價，或試圖對鄧的全面否定，或別有用心地貶鄧以揚毛，都是不客觀的。

鄧小平的遺憾，從某種意義上講又何嘗不是中共中央第二代領導集體的遺憾，甚至是中共的歷史性遺憾？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隨著"撥亂反正"的進行，尤其是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取得初步成功，改革開放逐漸啓動，中共宣傳部門和高級領導人以及御用文人，開始了對鄧小平的極力吹捧和宣傳。

這實際上是由于體制的原因，中共幾十年來的一貫通病，即在一元化的輿論和非制度化的用人環境下，"拍馬屁"風氣的盛行。任何領導人爲了保住自己的位子，總是盡力證明自己和核心的步調多麼一致，以及對核心的無限敬佩，爲此不惜利用任何場合和各種肉麻的形容詞來達到這一目的。而無論是毛澤東還是鄧

小平，都有著人類的本能弱點，“六十而耳不順”幾成常態。在此情況下，錚錚鐵骨的直諫“大臣”也自然難于涌現。必然導致中共體制內長期存在的“逆向淘汰”現象的延續，幷最終對核心的歷史形象造成難于彌補的傷害。

當然，這一由體制導致的劣質政治文化也將長期制約公務員整體素質和執政水平的提高。這與公務員們學位的高低沒有關係。“諫我者友，諛我者仇”的警句用在自己的身上，又是多麼的困難。

尤其糟糕的是，中共之後的輿論中逐漸出現了將鄧小平和毛澤東的隱約對比，甚至出現不惜貶毛以揚鄧的趨勢。這實際上構成了對鄧小平的真正傷害。

一本由國內知名學者撰寫的《影響中國歷史 100 名人》（1999 年 7 月版，民族出版社），甚至將鄧小平和黃帝、大禹、孔子、秦王嬴政、劉徹、毛澤東等列入“作爲‘民族之魂’的貢獻最大的 10 個歷史人物”，李世民、康熙、孫中山、曹操等則排入“政治家”之篇中；如果該書能將鄧小平列位于“改革家”名人，和管仲、王安石、商鞅等幷列，至少能較貼切地反映鄧小平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雖然在中國歷朝歷代中像鄧小平這樣繼往開來的人物幷非個別。該書實際上代表了中國輿論界和政界普遍性的不良傾向。這只能留下歷史和學術研究上的笑柄。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格問題，和學術研究上科學精神的欠缺，也表露無遺。

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作爲歷史上罕見的時代，留給後人的是巨大的財富，也有教訓。但對毛澤東的認識和研究必須拋弃一切偏見或爲尊者諱的心態，文過飾非或否定失誤都是極其錯誤的；即便筆者本人對毛澤東的尊敬和辯護，也反對一切將毛澤東時代錯誤政策的極力美化和掩飾，因爲這根本上是對歷史評價的

不負責任。一本名爲《評說毛澤東》的書，將三年經濟困難導致數百萬人死亡的慘劇描寫到："1960 年，正是國家經濟最困難的時候，全國人民都感到糧食不够吃，有一種饑餓感"[21]。這種寫法不是嚴肅地維護毛澤東的形象，而根本上在否定歷史，效果只能是適得其反。而中共和大陸學術界對鄧小平地位的處理，同樣有這種"刻意"的成分，并最終傷害到對鄧小平的客觀評價。輿論、民心和歷史評價的强力反彈是不可忽視的。[1]

不錯，鄧小平是一位政治家，一位政治上的"高個子"，在共和國幾十年的歷史上，其地位和影響應僅次于毛澤東而在周恩來之上。但當您非要讓他和一個高得多的巨人一比高低時，正好襯托了他的矮小，這豈不正是對他的不敬和羞辱？但很遺憾，甚至鄧小平最忠誠的部下和最親密的親友，也沒能認識到這一點，

[1]在筆者完善該書第二版時，全國人大通過修憲提案，刪除對國家主席任期限制。對此，我是完全理解幷支持的。今日中國在歌舞升平的外表下，其實面臨巨大的風險，經過改革開放近 40 年政治墮落，從上到下腐敗透頂。尤其軍隊內部兩位軍委副主席是巨貪，凸顯了軍隊內部問題的嚴重性。因內部問題沉垢積累太厚，習近平推動的强力反貪必須長期堅持下去，稍有鬆懈就可能斷送好不容易開創的反腐倡廉的局面，甚至徹底斷送國家的未來，因此，修憲以給習近平持續領導這個絕對不能中斷的大業，是有必要的。制度固然重要，但如果沒有合格的人來執行，制度等于虛設。習上臺前後，中共幷沒有根本制度的改變，爲什麽他上臺前體制內如此腐爛，而他上臺後却能够嚴明紀律？中國現階段必須保持制度的靈活性，才能爲未來的制度穩定性創造條件。國家不論選擇哪種制度模式，國情現實和國家根本利益永遠是唯一考慮的要素。中共在這次修憲前後沒有做好必要的解釋宣傳工作，是一大失策。至于學者們對修憲的非議，也許出于好心，但缺乏智慧。制度的靈活處理需要高層領導的自我約束和自知之明。我相信習近平。此人是否有大戰略家的智慧還需要時間檢驗，但絕對是位有强烈責任心的政治家，是位不俗的人。在完成清党，廉政建設大局砥定，黨和國家制度完善大見成效，習近平那時必然聲望如日中天，相信他會激流勇退，重新恢復主席任職期限制度。最關鍵的是，在逆向淘汰的大環境下，習近平能聚集什麽樣的人才，這是根本。筆者爲此寫網文《中國取消主席任期限制的無奈和現實必要性》。

更不可能及時地予以警醒和糾正，爲鄧小平身後的任人評說，留下了太多的不確定性。這究竟是對鄧小平的熱愛，還是對他的不負責任呢？答案應該是顯然的。

在中國現有的政治體制內，靠制度去逼迫一個領袖接受某種觀點或改變，并不容易，因制度自身存在缺陷。領袖們自身的智慧、胸懷以及營造良好的環境以鼓勵進言，就顯得特別重要；但這不可靠。李世民在晚年不再虛心納諫就是個很好的例子。這時，最信賴的人（包括下屬和親屬）的作用有時會扮演關鍵的作用。這是可悲的，也是無奈的。

從這件事例中，至少可總結出以下幾點：

首先，毛澤東本身并非聽不進不同意見，而是對屬于局內人的政治人物的意見，會有所懷疑。這裏涉及到兩人的關係親密程度、政治理念、甚至政治鬥爭的相關聯想。實際上，毛澤東解放後的決策失誤與他所掌握的信息錯誤密切相關，畝產萬斤糧就是典型的代表，雖然毛澤東開始不信，但浮誇風太猛，以至于沒有人向中南海紅墻內傳遞真實的信息。不妨作個假設：毛岸英是一個聰明的人，從後來公布的私人信件中可以看出他也是一個很有理想、很不俗的青年，并受其它領導人的喜愛；如果他不犧牲的話，可能成爲毛二世（這讓人不舒服），但中國很可能避免那許多的失誤和荒唐，將人民的熱情和凝聚力用在發展上，因毛岸英可提供令毛澤東信服的資料。正如蔣經國在國民黨敗退臺灣後所發揮的作用那樣（今天有些人說毛岸英參加抗美援朝是去鍍金，問題是，毛澤東那麼多親人爲革命犧牲，包括毛岸英的母親。即使他不上前綫，誰能阻止他的擢升？毛岸英像千萬爲國捐軀的英雄們一樣，理應得到我們的尊敬和紀念，做出上述猜測根本是愧對良心。今天作上述評判的人無論個人素養，還是犧牲精神根本

沒法和毛岸英比）。

能做這種假設本身就是中國政治體制帶來的無奈。

其次，毛澤東的親友與自己不可能有“利”的衝突，只有“利”的一致。

再次，領袖人物的部下和親屬作爲旁觀者，是領袖的另一雙眼睛，可以協助發現更立體的事物全貌；如果不能以旁觀者角度保持警覺和智慧協助，至少應懂得珍惜。當全國人民的眼睛和歷史的鐵筆瞄準你親人的時候，對個人的得失應有一份超然。

以此可以看出，政治人物的親信的作用，是值得探討和注意的。鄧小平的遺憾，與他親信下屬的作用密不可分。那麼江澤民呢？中國風起雲涌的貪污腐敗浪潮，江的親信是否涉及或是否受到江的庇護？親屬和部下又是否注意到問題的癥結所在呢？自己提拔的兩位軍委副主席是巨貪，江澤民沒有直接責任?

在中共現有的體制內，能登堂入室者多爲中庸思想的實踐者，出現耿直之臣的概率實在太低了。高層領袖多半不要指望下屬能給您敞開心扉。

本書對鄧小平的批評和與毛澤東的對比，無意襯托鄧小平的矮小，相反，希望能將鄧小平和毛澤東拉開一定的距離予以評價，更好地，也更客觀地恢復鄧小平的本來形象。遺憾的是，對鄧小平的全面評價幷非本書的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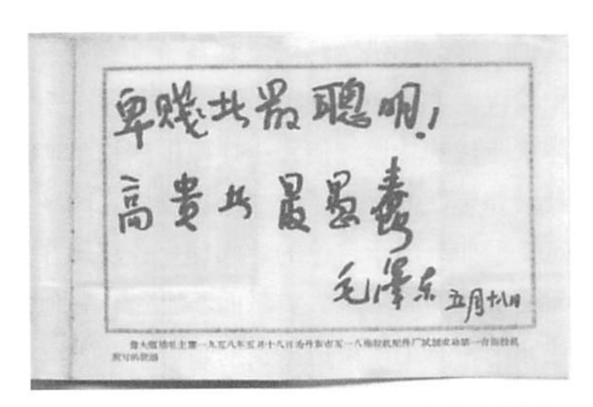
當您把鄧小平看成是聖人，他的錯誤將摧毀他神聖的外衣；但如果將他視爲一個偉大的凡人，則更突顯他的偉大。

鄧小平以超然的膽略啓動四個經濟特區，幷帶領中國人民從毛後的基于計劃的“人本經濟”時代逐步走向基于市場的商品經濟時代；1982 年，他以智慧和鐵碗迫使鐵娘子撒切爾夫人在香港

回歸問題上配合中方，幷成功實踐“一國兩制”，也促成了澳門的回歸；結束了領導幹部的終身制，終結老人政治時代；1992 年，退休的鄧小平以近九十歲的高齡南巡，推動已停滯兩年的改革開放事業，表現了一個老共產黨員“生命不息，戰鬥不止”的高度責任心和奉獻精神……，對此，任何一個中國人都應抱持一份深深的感激和尊敬，身爲一名民族主義者的筆者，又豈能例外?

> 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情的愛著我的祖國和人民！
>
> ——鄧小平

不論如何對毛後時代的中共領導人進行美化，中國社會和共產黨自身的變遷已經殘酷地證明了毛澤東生前的擔憂是高瞻遠矚的。毛後時代中共高層是不可能回避掉自己的短見所鑄造的一系列遺憾。



毛澤東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八日爲丹東市安東機器廠(五一八廠) 試製成功三十馬力拖拉機題字。體現了他對底層人民智慧的一貫重視，激勵廣大民衆勇于創新的精神。當時正值反右時期，也可能精英階層的表現强化了毛澤東對他們的藐視，進而有感而發題寫了第二句。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第十三章 以動機判斷道德 以結果判斷能力

如何評價歷史，如何評價政治人物，無論對評價者還是被評價者都是至爲重要的課題。固然，要簡單地設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統一標準幷不容易，但基本的評價原則，以筆者之見，應遵循：以動機判斷道德，以結果判斷能力。

對今日和未來的當政者來說，如果不能牢記這一原則，而是報著自私自利的心態，不惜犧牲國家利益，則理應，也必然受到歷史的否定和譴責。

對于毛澤東時代的功過評價，上述原則同樣是適用的。就拿"文革"的發動如果僅僅是爲了中央高層的權力鬥爭，那麼毛澤東必須被否定；但如果出于自己的建國理念，那麼在評價毛澤東的時候，應該基于他的其它重大貢獻而不應拋弃對他的尊敬。如果忽略了上述原則，對毛澤東這樣長期領導一個大國的領導人，是不可能給予公正評價的。

有些人以反毛反共爲預定目標，然後再尋找或編造證據的做法，根本不值一駁。他們要麼抱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要麼帶著不健康的心態，對任何有利于毛澤東形象的歷史事實一概視而不見

或低調處理。筆者在聯繫本書出版的過程中也曾遇到這樣的情況，有間出版社明確答覆：對于歌頌毛澤東的書，他們不感興趣。

筆者對蔣介石的評價不易提高，概因他在抗日之前及過程中的表現，證明他將自己政黨和個人權力放在了國家民族利益之上，而他對自己親信在抗戰時仍不收斂的貪污腐化行爲置之不理，也證明了他的私心。

美國某前總統在當選後，故意放慢經濟的步伐，待到下屆大選前一年，再讓經濟恢復發展，以達到連任的目的。這樣的總統不論做出過多大的貢獻，其存在的道德問題也是不應被否定的。

對于鄧小平來說，前面提到的軍隊經商問題，如果鄧小平是基于讓軍隊官兵擁有充裕資金改善連隊生活，那麼鄧小平的這一做法雖然短見，但不涉及道德問題。但如果是希望用這種方式，來達到拉攏軍方對自己的支持，那麽，鄧小平的道德問題就未免太嚴重了。

今日中國的貪污浪潮，到底是中央高層的能力問題，還是高層的道德問題，只需要認真瞭解一下這些高層領導人是否曾包庇過自己親信的貪污受賄行爲，是否本身就有貪腐之舉，就成了問題的關鍵。中共在反貪中偶爾會抓些“大蟲”，其出發點是爲了打擊异己，還是基于堅决反貪而不加入人際關係的好惡，將决定反貪的成果和領袖們個人的道德。

在過去的幾十年中，中國興建了大量的巨型工程。其中不少工程的科學性及决策過程是值得懷疑的。中國政府領導人在建各類大型工程時，是考慮國家或社會發展需要爲動機，還是僅僅爲了建設政績工程，或爲自己樹立紀念碑？1994 年 5 月 24 日《光明日報》報道了“渤海海峽跨海通道”的文章，論述了建設一條從烟臺至大連的火車輪渡航綫和一條蓬萊—長島—旅順的“南橋北

隧”公、鐵兩用綫；文章寫到：“錢偉長等 20 位著名科學家進行論證後，一致認爲，這是一項極大增强國力、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的宏偉工程”。筆者對建設一條輪渡綫完全贊成，但對那條“南橋北隧”感到震驚，花幾天時間的認真思考，筆者無論如何也看不出這樣一個需要巨大投資的工程，到底如何“極大增强國力”；同樣的錢用來建四條複綫京九鐵路，或在長江上建 30 座大橋，肯定能更好地增强國力（未來國家資金充裕了，建設此通道還是有必要的）。其中的玄妙就在于“深遠歷史意義”。筆者當時曾給有關部門寫信加以反對，但這個項目肯定能上馬，因爲後面有一群傢伙排隊等著題字、照相、簽名、數錢。

不知是否因爲中國的歷史太輝煌，很多人都不擇手段把名字弄上去，游客會在故宮紅墻上寫上“某某人到此一游”，隔壁的政客比游客臉皮厚多了，他們乾脆花幾億造個工程，痛快寫上自己的名字。而科學家們要想有機會寫上自己的名字，快捷方式就是跟在領導屁股後面，提個讓領導歡欣的主意，也借此爲自己樹立紀念碑，甚至騙個院士頭銜。三峽工程就是個代表性的例子；一些唯利是圖的科學家和政客在對三峽工程的一片叫好聲中，掩蓋了這項超級工程的潛在技術問題；它由全國人大代表靠幾頁帶有明顯傾向性的介紹資料投票決定三峽是否上馬，樹立了濫用民主的惡例。

毛澤東時期建立起來的廉明親民的公僕文化，自第二代領導人開始江河日下，到第三代已面目全非了。只要看一下這兩代各級領導人對自己的部下和親屬的“無限”寬容和關愛，就能明白當今貪污腐化的根源和反貪不力的主因所在。對今日中國在短短十多年中從原來的清明廉正蛻變到今日的嚴重貪腐狀態，作爲第二代領導核心的鄧小平和第三代核心江澤民，對此能逃得了歷史



"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
—刘英俊同志为保卫人民生命安全英勇献身

的評判嗎？在民主和政法體制建設難于跟進的情況下，貪污腐化已成爲今日中國一系列社會和經濟問題的總禍根，幷直接影響到主要矛盾的解决；也對中共的執政地位提出了道德和意識形態上的嚴峻挑戰。毛澤東時期的法律體系遠不如現在健全，但他可以對自己喜歡的"紅小鬼"劉青山以及張子善等貪官親自下達處决的命令，而蔣介石則不能，鄧小平、江澤民同樣不能。所謂"改革過程中出現貪污是正常的"論調，根本是無能者的蒼白籍口。

指望每位政治人物都有聖人之德，或超人之能，是不切實際的。關鍵在于他是否在用心工作，而不是整天玩弄權術，要小聰明，或得過且過。真正政治家的首要素質是無私、智慧、膽略和對偉大理想的執著追求，而不會專注于個人權術上的"奇技淫巧"。在網絡時代，認爲人民是傻瓜的政客將是必然的失敗者。

偉人和凡夫，政治家和政客，他們的差別其實只在一綫之間。而這條綫是智慧、勇氣、胸懷和無私，超越人類的自然本性。這條綫涇渭分明地分開了大智慧和小聰明、遠見和短視、勇敢和懦弱、博大和狹隘、無私和自私、大忠和小義、尊貴和齷齪……，也自然地分開了偉大和平庸。然而，這條綫又是多麽地難于跨越！畢竟，在中國幾千年的文明史上，能跨越這條綫的又有幾人！

有缺陷的戰士還是戰士，完美的蒼蠅也只不過是蒼蠅。

——魯迅



第十四章 假如歷史上沒有毛澤東

當很多中國人對毛澤東倍加責備時，不知是否思考過這樣的簡單問題：如果毛澤東從來就沒有在中國歷史上出現過，那麼，中國將會怎樣？或者說中國的國力、國際地位，以及人民的生活是會更好，還是更糟？中國的社會穩定和社會風氣會怎樣？

在前面的一些章節中，已多少涉及到這方面的話題。如：在第一章中就中國基礎工業和大規模基本建設的成就，談了毛澤東的特殊貢獻。本章將就前面沒有談到，或不够系統的論述，進行總結和推導。

很顯然，假如歷史上沒有毛澤東，雖然不可能準確描述出中國歷史可能的軌迹，但可以肯定的是，蔣介石將會繼續在整個中國（包括大陸和臺灣）執政，共産黨沒有取勝的可能。中國共産黨的歷史，以及亞洲其它共産黨的最後命運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因此，蔣介石在大陸和臺灣執政的兩個時期，其執政特點和效果，就成了描述本章假設型命題的主要參考。

如果沒有毛澤東，將可能呈現出另外一個截然不同的中國：

首先，中國的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方面。

現在的海峽兩岸分裂狀況將不可能出現[1]。但西藏和新疆的穩定將面臨挑戰。如果西藏和新疆出現社會動蕩，蔣介石則肯定采取軍事的手段予以鎮壓，但這種强硬路綫對處理國家統一和民族融合這類問題經常産生巨大的負面效果。他從來就不會像毛澤東那樣對群衆工作和輿論的重視和運用。蔣介石的軍隊是純粹的軍事機關，而毛澤東的軍隊除軍事功能外，還具有聯繫群衆、宣傳教育、生産建設的功能，强調的是軍民魚水情，這構成了解放軍在處理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這類複雜問題方面的特別優勢。大陸解放後，毛澤東在邊疆建設了龐大的生産建設兵團這種既扛槍有拿鋤的特別部隊，對促進邊疆的發展、穩定、民族融合發揮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如果蔣介石繼續在大陸執政，蒙古還是會獨立的，這是他對蘇聯的承諾。即使沒有這個承諾，在蘇聯的介入下蔣介石也沒有足够的膽略强制性收回蒙古。蘇聯會憑《中蘇友好條約》在旅順長期駐軍，幷共管大連和中長鐵路，中國的主權完整就談不上了。美國的在華勢力也將繼續保持下去。

第二，從經濟發展上來看。

如果蔣介石繼續在全中國執政，今日的臺灣肯定不會有這樣的經濟成就。美國對撤退到臺灣的蔣介石給予關照，但肯定不會對蔣介石領導下的一個龐大中國給予特別關照，相反，會給予防範。蔣介石帶去從大陸搜刮的黃金和部分跟隨而來的大陸資本家，也爲臺灣本土工商業的起飛提供了一個現成的消費群體。蔣

[1] 新加坡《聯合早報》網頁版 2004 年 3 月 8 日發表作者文章《台海：中華民族的天賜良機和對策》，文章認爲：海峽兩岸 1949 年後的暫時分裂，實際上是中華民族復興的特殊機遇，只要善于利用，對中國的整體利益是利大于弊。

介石撤退臺灣後所推行的土地改革當然也不可能發生，因這是他總結在大陸失敗的教訓後，才認識到“土改”的重大意義。當然，大陸的土地將會繼續集中在大地主的手裏，中國多數農民將繼續在沒有保障的條件下生活，一部分農民會繼續逃荒要飯，或生存在城市的邊緣，成爲中國的邊緣人。由于南京將繼續是中國的首都，那麼，上海在亞太的地位肯定超越香港，但臺灣、港粵、京津及大陸其它地區的發展就不可能像今天這樣繁榮。尤其是毛澤東領導下大力發展中西部地區的國策，在蔣介石的自由市場經濟情況下不可能達到毛澤東發展中西部所取得的成就。

在第一章已經談到，蔣介石在中國執政，中國的基礎工業和軍事工業不可能像今天這樣的發達，因他得不到蘇聯的幫助，發達國家只可能將國際分工的低技術層次和原材料工業分給中國。

在蔣介石的領導下，會出現不少的超級富豪（他們不少的財產會存放在國外）和繁華都會，但同時也會有幾億赤貧階層，貧民窟遍布各城市周圍。蔣和毛的一個區別是：毛澤東注重平民利益，對社會精英階層保持警惕，而蔣介石則忽略底層人民利益，而和上層階級保持密切聯繫。中國的貧富差距比今日的南美和南亞將更加嚴重。土改也不可能發生，蔣介石和地主階級及地方豪紳保持著密切的關係，形成地方霸權。

由于蔣介石對官員貪污的寬容，1949 年前不少的中國官員在海外擁有財產；高級將領貪污軍餉和在大城市擁有房産和股票更是平常，如果蔣介石繼續執政，官員貪污和資産外逃將會非常嚴重，甚至根本上窒息中國的發展。而毛澤東執政時期的官員清廉，確保了社會財富的均布和資金在發展上的有效利用。看一下南美和南亞國家就該明白蔣介石的治國之道將會帶來的後果；大陸的基礎、規模和複雜程度非臺灣可比，因此臺灣的成就不能說明蔣

介石在大陸可取得同樣的成就。[1]

毛澤東對人民的教育和發動，使得大陸軍民以極大的個人犧牲，換回國家基礎建設和各項事業的成就。而蔣介石則在發動和利用民衆力量方面乏善可陳，他更喜歡用物質的手段來激勵。難以置信的是，蔣介石甚至將物質鼓勵應用到軍隊打仗中。

第三，社會風氣建設方面。

如果沒有毛澤東，中國的賣淫嫖娼、黑社會、吸毒等將會更加泛濫，看一下 49 年前的大陸和 49 年後的臺灣，以及改革開放後十多年大陸的變化就明白了，中國人可能至今還躺在“東亞病夫”的病床上。蔣介石本人就和黑社會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回顧一下大陸在過去十多年的“掃黃”、“掃毒”和“打黑”成績就該明白，鏟除這類社會醜惡現象，僅靠法治的力量是不够的，而毛澤東則有效地發動民衆，同時幷用鐵血手段對付黑社會和地

---

[1]據美國政府估計，1940 年代中國缺乏資金購買抗日軍備時，國民黨高官在美國的私人存款却達 3.3 億美金。而美國提供的 2.5 億美元的援助，有 8 千萬元被高層私人瓜分。內戰失敗後那麽多國民黨高官移民美國就很說明問題。抗戰時國府向美國購買飛機，宋靄齡都要抽傭，後來美國不再提供現金援助。現在大陸出現一股推崇宋美齡的邪風，真是一邊受貪污之苦，一面抱貪官臭脚。毛澤東雖然有大笔稿費（估計有千萬元量級，不算政治出版物，僅詩詞稿費也不少），却讓民政部保管，不讓家人接觸，給兒女沒有留下分文遺産，毛澤東去世後，民政部給了他女兒李納的只是一台電冰箱（毛的詩詞稿費，理應屬于毛澤東的後人）。而江澤民、朱熔基、李瑞環等高官都在任內和退休後靠出版他們的講話稿之類出版物獲得幾千萬，甚至上億的稿費。僅可查證的朱熔基、李瑞環等人的稿費捐贈就高達幾千萬元。而他們書稿和講話都屬于職務創造，按照國際通行慣例，這些稿費應該屬于國家，他們最多拿點獎金（朱熔基是最喜歡和國際接軌的，可在這個問題上似乎忘了接軌）。而江澤民通過“三個代表”和講話稿有關的著作所獲得稿費，據傳在上億元。這是明目張膽的假公濟私和中飽私囊。如不遏制這股歪風，政治局常委各個都將是富豪，太具諷刺意味了。毛後時代領導人都特別財迷，位居如此高位還對金錢看不開，太俗氣啦，真是令人嘆息的現象。

方武裝，才在解放後迅速消滅了這些盤踞中國千年的社會毒瘤。對于今日的大陸民衆，和幾十年來倍受金權、黑社會、色情業困擾的臺灣人民來說，應不難理解毛澤東的這一貢獻及其意義。通過"三反"、"五反"運動，大力倡導學習雷鋒及英雄人物等，在大陸建立起健康向上的社會風氣，實現了全民精神上的空前高尚和統一。 通過破除迷信和"破四舊"，千年累積的封建迷信思想被清除，爲現代化思想的傳播創造了條件。

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政壇，沒有第二個人能在果斷剔除社會毒瘤，積極有效教育人民方面，像毛澤東那樣取得成功。

第四，軍事力量

蔣介石在軍隊建設上的失敗無須多提，他在大陸的慘敗就是明證。在第八章第五節已就解放軍的戰鬥精神和臺灣國軍作了比較。可以肯定的是，在軍隊建設上毛澤東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他賦予了中國軍人强大的信心和民族精神。如果沒有毛澤東，中國軍人在面對軍事强國時是否擁有今日的戰力和自信，將是個未知數，因蔣無論如何也會避免和美、俄等强權的正面衝突，看一下作爲戰勝國的蔣介石和蘇聯簽署的那個《中蘇友好條約》，就該有個大概的瞭解。而毛澤東在他的軍事生涯中，靠解放軍的劣勢裝備和世界所有大國軍隊，如日、美、俄、印、法（奠邊府戰役）、英（韓戰中殲滅英軍皇家第 29 重坦克營這支勁旅）等交手幷取勝，以輝煌戰績向國際社會和中國人自己證明了中國軍人的能力。而這構成了中國軍人珍貴和永久的精神財富。而人民解放軍在國家建設等各方面的獨特角色，則使中國軍人成爲世界上獨一無二和最具道德力量和戰鬥力的軍隊。

第五，國際地位。

中國今日的國際地位不是別人給的，而是打出來的。如果蔣介石執政，他會采取對美國的一面倒外交政策。而美國對中國發展核武器和洲際導彈會采取某種制約措施，看一下美國對歐洲和日本的一些政策就明白了。中國今天的國際地位，與中國在發展中國家的“丐幫幫主”角色密切相關，而蔣介石對開展發展中國家外交似乎不像毛澤東那樣，將此作爲全球戰略的核心環節。中國的周邊安全環境將會很糟，中國會成爲冷戰雙方的角力場而不是單獨一極，法國會在東南亞存在下去。甚至後來英國是否會在香港問題上配合中方，都將成爲疑問。中國的全方位外交和地緣戰略環境將面臨挑戰。

第六，國家的組織管理和動員能力

毛澤東時期依托共産黨組織建立起遍布大陸每個角落的管理網絡，農村至各鄉村、城市至各街道，形成蜘蛛網式的密集網絡。在防禦外敵入侵、抵禦自然灾害和救灾、大型基礎工程建設、流行病防治和全民保健方面，發揮著巨大而又無可替代的作用。使得中國成爲世界上最具組織性的國家，考慮到這個國家的人口規模就能明白該組織能力對國家發展的重要意義。這是毛澤東時代留給後人的一個世界獨一無二而又高效低成本的行政和社會基礎。幾千年來全體中國人第一次被組織起來，幷激發他們的民族主義和集體意識，完全納入到國家的整體力量之中，一旦動員起來，必將戰勝一切人類或自然界的敵人。看一下這些不識字的農民在歷次戰爭中和大規模基礎建設中的表現就清楚了。只有這樣的網絡才能將“人多力量大”變成現實。在面對自然灾害時的反應速度和調動能力，只需和經濟技術比大陸發達且面積狹小的臺

灣進行一下對比，就能理解毛澤東留下的這筆財富的深遠意義和無窮價值。它也必將讓我們民族世代受惠。如果和印度、印尼、中東、南美這些失序的國家進行對比，將更能看清國家組織能力的重要性。隨著中國國力的日益增強，這種重要性將更加明顯。

固然，沒有毛澤東中國不會爆發“文革”和反右，但將會失去的是國家的長治久安和前途。毛給了中國強健的體魄和心態，雖然偶爾讓他的人民摔得鼻青臉腫，但肯定比體弱多病來得强。

如果沒有毛澤東，即使中共僥幸取勝，也不可能像毛澤東那樣，將全國人民的勞動熱情和奉獻精神充分調動起來；雖然毛澤東時代對人民的勞動熱情幷不總是恰當應用。

當然，沒有毛澤東，後來的反毛急先鋒的中共高層領袖和部分學者根本不可能有機會胡說八道。中共高層領袖們有機會登堂入室，名垂青史，與毛澤東這樣的領袖是分不開的。而建國後掌握各級領導權的人員構成，要麽是曾參加過打天下，要麽是來自社會各層的模範或優秀代表。他們是毛澤東智慧領導的直接受惠者（蔣介石手下和其它國家共產黨的能員强將則沒這麽幸運）。沒有毛澤東，沒人會記得鄧小平、周恩來、劉少奇、陳雲是誰，改革開放也就根本不需要了，因中國無論如何改革也會像南美和南亞那樣，改革不出任何的名堂，因社會利益集團的龐大勢力將窒息任何挑戰他們既得利益的改革措施。

有人認爲，1949 年後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成就不應歸功于毛澤東，而主要是其它技術官僚的，如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等，幷且認爲毛在 1949 年後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領導方面，負面作用大于正面作用。問題是，沒有毛澤東，不說上面這些領袖們根本沒機會領導中國，他們根本沒有足够的道德和智慧力量將

全民緊密地團結起來，他們的個人魄力也決定了，舊中國的大部分社會弊端都會保留下來；再看鄧小平領導下中國官員的迅速腐化就不難明白，沒有毛澤東，上述官員根本沒辦法在中國這樣落後而複雜的國家建立起廉潔的官員隊伍，也必將導致早期的有限資源在經濟發展上無法有效應用，中國的發展也就根本談不上了。

上述官員固然是杰出的領導人，但具備他們這種素質的官員在蔣介石的政府裏也不乏其人。前面第二章第五節提到毛澤東 **1965** 年針對國家衛生部沒能爲農民服務的批評，才啓動了意義深遠的農村赤脚醫生隊伍和基層城鎮衛生體系的確立。這裏存在的問題是：當時的一綫最高領導人劉少奇和周恩來總理（還有鄧小平、陳雲等一批擔任或相當于副總理，但人們從來沒有批評過的官員）領導的國務院職能部門衛生部，爲什麼在解放後十多年沒有注意這方面的工作？如果沒有毛澤東的批評，可能到 **1976** 年周、毛逝世還沒能爲農民和小城鎮建立起有效的衛生保健體系，中國人的整體健康素質和壽命、底層人民的生活質量、政權的人道主義色彩，乃至社會的安定等都將面臨挑戰。沒有人懷疑周恩來總理爲人民服務的公僕之心，也沒人懷疑周恩來、鄧小平等是極爲杰出的官員，但沒有了毛澤東這樣縱觀全域和切實理解和同情占人口大多數的底層人民的領袖，周恩來是否能很好地發揮他的才智，將是令人懷疑的。

毛澤東作爲國家最高領袖和人民的統帥，在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具體事務上，他并非是最內行的專家，但作爲最高領袖，在把握國家發展大方向，有效教育和調動人民積極性，弘揚積極向上的社會風尚，維護社會公正，照顧弱勢群體，發展經濟和文教衛生事業，建立强大國防和外交，建立高效廉潔政府體系等諸方面，說他是失敗的并不客觀。要求毛澤東是個完人，是不切實際的。

當然不能把中國發展成就歸功于毛澤東一人，但完全漠視他的領導貢獻同樣是錯誤的。今天批判毛澤東，尤其是詛咒“文革”十年耽誤了中國發展的人們，實際上陷入了一個自相矛盾的幻想之中：一方面，他們咒罵毛的錯誤，似乎沒有毛澤東中國就會更好；另一方面又要求毛澤東時代的社會基礎、人民對中共的堅定信仰、高昂的勞動熱情和奉獻精神、官員的廉潔奉公、中國軍事和外交成就，及由此帶來的國際地位和民族信心等一切沒有毛澤東就不可能建立起來的有利因素全部存在——這種對待毛澤東歷史評價的方式，怎麼看都有點無耻！

缺乏歷史的縱向和國際的橫向對比、缺乏對中國各項國情的全面把握而去批評毛澤東，是輕率和不負責任的。後來批評毛澤東的政治人物、學者等，有多少人能跳出個人的、局部的、暫時的、表像的得失，真正能從歷史的、全域的、發展的、本質的和科學的角度去評價毛澤東及其時代呢？很遺憾，他們的眼界、胸懷、經歷和知識結構，爲他們造成了難以擺脫的局限。

中國劣質政治文化特徵之一是：多幹多錯，少幹少錯，不幹不錯。而毛澤東則希望在有限的時間裏對中國所有落後的方面進行革命，犯錯就在所難免了。但他爲國家的後續發展完成了“三通一平”的艱巨基礎工作。他不論有多少已知和未知的錯誤，不可否認的事實是：他及其時代留給中國的寶貴遺產是爲民族復興打下了堅實而全面的基礎，包括高效而廉明的行政基礎，物質基礎，科技基礎，文教衛生基礎，全民族素質基礎，外交、軍事和安全基礎，以及民族主義、集體主義、婦女解放、破除迷信、公民意識、平等思想和民族信心的精神基礎！



第十五章 共同的責任

一、弘揚毛澤東時代的精神遺產

向雷锋同志学习 毛泽东

從政權意義的角度來看，毛澤東時代已成爲過去。但毛澤東時代爲我們留下的財富和教訓實在太多。尤其在遺產的整理上，值得今人的關注和努力。

以中國幾千年的文明史視角，毛澤東時代在相當大程度上實現了先賢對“大同世界”的部分幻想。對于“一盤散沙”的中國人來說，這也是極少的一段全民族空前團結的時代。在這個時代的大陸，像雷峰、王杰、王進喜、向秀麗式的英雄模範人物層出不窮，遍布各行各業，爲了革命工作而放弃節假日、廢寢忘食的工作，是那個時代具普遍性的現象。中國國內的平民百姓第一次將自己和整個國家聯繫在一起。由于對民衆創造力的不當利用，雖然也導致了大煉鋼鐵和毀林造田的悲劇，但這種民族大團結以及高漲的勞動熱情，帶來了社會經濟建設的空前高速度，積累了巨大的內部凝聚力。不要說外國，即使臺灣在毛澤東時代要在大陸搞諜報活動，也是極端困難的。

毛澤東領導下的這段時期，雖然有著不少的哀痛，但無論如何評價也不能否認，毛澤東讓我們看到了中華民族最閃光的群體品質：淳樸、耐勞、强烈的民族意識和團結精神、大公無私的品德，以及驚人的創造力。這一系列民族品質在毛澤東時代的集中表現，爲以後的中國人提供了必要的信心，也證明“一盤散沙”幷不是中華民族的本質特性，而維護民族利益不惜自我犧牲，才是我們民族的真本色。不信，您去瞧瞧毛澤東時代!



那麼，今天的中國政府和人民在面對未來時，又怎麼捨得置這筆寶貴的精神財富于不顧呢？毛澤東給中國的最寶貴遺産，其實正在于對中國人來說永遠需要的那份精神示範。如果只盯著反右的遺憾、饑荒的哀痛、“文革”的失敗，而將其它的一切予以忽略，將必有遺珠之憾。

雖然毛澤東時代讓幾十萬，甚至上百萬的中國人遭受冤屈（靜態地看占總人口的 0.1%，如果動態計算，即受害人數除以從反右擴大化至 1976 年中國生死的人口總量，該數據肯定更小），但如果因此而忽略幾億人民的精神奮發，無异于一葉障目。

毛澤東時代的遺憾和光輝，都已成爲那個時代中國人的群體記憶；後代中國人也許不會相信和理解，他們的先輩曾經在沒有獎金的情况下拼命地工作；在條件極爲簡陋的情况下創造一個個科技奇迹；科學家放弃國外的優越條件而回國效力，雖歷經政治風雨而不悔；核武器研究的科學家們（包括兩彈元勛鄧稼先），明知道核輻射對健康的破壞力，但在條件簡陋的情况下無怨無悔地賠上自己的健康；更有母親送兒上戰場的動人事迹……。但是，如果不能設法讓後代中國人瞭解這些，豈不是一個天大的損失？

毛澤東時代的政府廉明，實際上對今日中共帶來了很大的壓力，使得政府對中國遍布的貪污腐化始終不敢掉以輕心（相對來說，世界不少國家的貪污問題，人民和政府已經麻木，甚至不抱任何解决的希望），這本身就是毛澤東時代爲後人留下的無形資産。

毛澤東時代的成就和失敗并沒有很好地加以研究和整理。那時的經驗，在反毛的聲浪中被拋弃，而教訓似乎并沒有很好地被吸取。今天，中共理應利用電影、電視等形式，宣傳謳歌毛澤東時期舉國人民無私奉險的精神風貌，不能因爲這期間的錯誤而顧慮重重。對錯誤，我們已經檢討，并將繼續反思；對成就及黨和人民群衆的獻身精神，我們也不該回避！

北京電視臺曾采訪解放前來到中國，并在中國終老的美國人陽春和寒早的兒子陽和平。他改革開放後移居美國，在美國生活工作期間切身感受了美國資本主義的另一面，與自己在中國國有企業工作生活的比較中有更深體會；他後來返回北京定居。采訪的最後，他提到自己的父母時說：我告訴我的妹妹，沒有人比父母更幸福，他們從來都不後悔在中國生活（此時陽和平不禁激動落泪）。他們從事自己喜歡的事業，都是人民需要的事業。毛澤東時代有那個大環境，人們不爲生存而奔波，他們不追求比別人多，也不追求做人上人，這樣他們就可以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解放全人類的事業上。

這個美國人的話，事實上表達了毛澤東時代偉大的國家治理理念和可貴的精神遺産。今天精英階層對毛澤東時代的否定，實際上是他們自己的極端自私心態下導致對社會治理的無能爲力的必然結果。但不能因爲今日市場經濟和私字當頭的大環境，後人


杨根思

就隨意拋弃毛澤東時代那偉大的社會文化和精神創造。

積極發掘和弘揚毛澤東時代的這筆遺産無疑是值得嘗試的，它是一個時代的特質和驕傲。在民族精神和凝聚力上，中國人畢竟曾經闊過。

二、整理和發展毛澤東時代的文化遺産

在文化藝術領域，當代作家和藝術家們對毛澤東時代是否定多于肯定。畫家被迫放弃傳統國畫，而改去畫宣傳畫；作曲家把大部分精力用在創作革命歌曲；曲藝大師們放弃傳統的表現手法而投入到革命樣板戲的行列；作家沒機會去寫兒女情長和生活的哀愁（使得他們“强作愁”的能耐難以發揮）而改寫人民的革命熱情和沖天幹勁……。經歷過毛澤東時代的文藝工作者，不免帶著歷史和藝術創作的悲情，回顧過去的這段歷史。

不可否認，毛澤東時代在强調藝術的使命時，始終圍繞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精神，“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相結合”則指出了新中國文藝的創作手法。使得藝術家不得不將他們的興趣隨時代進行調整。如果因此而認爲毛澤東時代的這種調整是對中國藝術的摧殘，或認爲是中國文藝創作的損失的話，那麽，當今藝術家們還有必要作進一步的反省；必須認真思考的問題是：藝術的目的到底是什麽，到底是爲什麽人服務？《講話》的精神是否正確？直到今天，中



國的藝術家們在抨擊過去的文藝路綫時，却没人否定《講話》的正確性，《講話》使得昔日的戲子，成了人民藝術家。這本身就爲我們提供了對藝術發展方向再反思的基點。

中國傳統的國畫大師們，他們驕傲于自己細膩的筆法，豐富的想像，協調的布局，創造出一幅幅美侖美奐的藝術精品。高山流水，小橋殘雪，青松古柏，茅屋亭台；如果說生命的內涵，不外乎彩蝶飛舞，猛虎下山，水牛牧童，老者遠眺。中國傳統人文思想極大地影響了中國畫的創作形式。但他們的一個共同的特點是對“人”和時代刻畫的輕描淡寫，中國畫創作的千年發展中，始終没有將“人”納入主要的範疇，更别提對平民生活和社會變遷的刻畫了。一直到毛澤東時代，中國驕傲的畫家們才開始了以人物刻畫爲核心的時代，這是政治使然，也是中國畫家被迫進行的一場劃時代的藝術革命。

今天重新翻開昔日的政治宣傳畫，任何不帶偏見的人都無法否認：這些畫作所表現的人物形象，體現了一個時代人民的樂觀主義和沖天革命幹勁的精神風貌；輔導學生的農村女教師、田野裏的赤脚醫生、拼命工作的石油工人、學習雷鋒的解放軍戰士，滿面滄桑的農民老漢的微笑……，作爲一個時代的特徵，難道他們不值得藝術家們的刻畫和歌頌嗎？和奔馬、毛驢、老虎相比，中國各行業人民的無私奉獻和對祖國未來的美好憧憬，有著更深厚的人文內涵。金黄的麥田，雪白的棉花，連綿的工廠，和青山、翠柏、冬梅、荷花、青竹比起來，有著别樣的活力。至于這些畫作的藝術水平，就讓那些批評毛澤東耽誤了他們藝術生命的藝術家們去評判吧；如果這些畫作的藝術水平低的話，只能說明中國

藝術家們的專業造詣還沒有到家。看來，他們除了參考前輩畫家的作品進行發揮，似乎缺少繪畫內涵革命的能力和勇氣。而對刻畫的主題進行責備，并不是强者所爲。

當今中國的藝術家們已沒有多大興趣將目光盯在飛速發展的中國社會，他們要麼選擇回歸風險較小的傳統技法，要麼在一個少女的裸體上塗點油彩，然後在“人體”、“行爲”後面强奸式地加上“藝術”兩個字；它除了說明當今藝術家們創造力的枯竭，要麼昭示了部分藝術家的人格頹廢。

固然，畫幅山水，可以讓藝術家和評論家們語無倫次地評價一番，但一幅過于貼近現實的作品，他們再也不敢隨意評判。當代畫家也越來越精明，一幅山水畫要比刻畫一位老人的表情容易的多。這就是所謂“畫鬼容易畫人難”的道理。當他們評論一幅畫時，首先會看一下畫家的身份。

中國的曲劇創作在毛澤東時代來了個翻天覆地的變革，以“十大樣板戲”爲代表的“現代革命X劇”(其中的X代表各劇種的名字)開創了中國傳統曲劇的偉大創新時代。中國百姓總算從《捉放曹》、《蘇三起解》、《打金枝》的百聽已厭中，找到了換換口味的機會，無論是《紅燈記》、《沙家浜》、《朝陽溝》、《人歡馬叫》等，都很快風靡全國。就連當時的老人也發現，哼上幾句阿慶嫂、銀環栓寶的段子，絲毫也不亞于“花木蘭”所帶來的享受。這些作品中的人物塑造有人指責爲“高大全”，但“高大全”難道不該是藝術化加工的方向之一嗎？當然，讓現代一些藝術家再去創作“高大全”的作品已難爲他們，因爲他們自身的道德素養和欣賞口味，已離“高大全”過分遙遠，創造點“矮小黑”才是他們的專長。






革命现代京剧《草原儿女》　革命现代京剧《杜鹃山》


革命现代京剧《龙江颂》剧照





毛澤東時期這些來源于現實，又高于現實的作品，歌頌了中國人民真善美的精神風貌。這些具有鮮明時代特色的作品，完全消除了劇情和百姓的距離，使得《講話》的精神真正轉化爲人民喜聞樂見的藝術實踐。其意義就如同小說創作史上，《金瓶梅》開創了以日常生活爲描述對象的世情小說時代一樣偉大非凡。但《金瓶梅》的色情成份絲毫没有阻礙它對後代世情小說的巨大推動，幷直接導致一百年後《紅樓夢》的横空出世；但樣板戲的政治背景，却使它在毛澤東之後即被束之高閣，中國曲劇創作的黄金時代也因此變得遙遙無期，因爲我們放弃了曲劇發展史上最輝煌和最集中的創造，除了翻翻老祖宗的發黄劇本，再也拿不出新的篇章。每當中央電視臺舉辦的春節聯歡晚會請一些所謂的“大腕”唱一腔除了老段子還是老段子，除了老票友還是老票友，您就知道傳統曲藝界在毛澤東之後變得多麼無聊。改革開放以後二十多年，中國藝術發展的乏善可陳，很能說明了問題。而年輕觀衆對傳統曲劇的敬而遠之，無疑敲響了不思進取、墨守陳規的中國傳統曲劇衰微的警鐘。


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

毛澤東時代的革命歌曲，絲毫没有埋没作曲家們的才華，這些嘹亮高亢的曲調，不少已進入經典歌曲的寶庫，至今被廣泛傳唱。這些昔日的“戲子”們用他們優美的歌喉，喚醒和鼓勵各族人民對祖國的贊美和對獻身精神的謳歌。令某些歌


革命现代京剧　《平原作战》






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


革命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

手遺憾的是，他們的青春年華用來歌頌雷鋒和工農兵，而沒有用來歌頌愛情，雖然他們連愛情是什麼還沒有搞懂。

毛澤東時代的電影，雖然技術上比較落後，情節上也未必完美，但導演和演員的真情投入，體現了表演藝術的最高境界，使得當今最傲慢的電影明星相形見絀。現在這幫電影和電視劇藝術家越活越邪門，他們的電影作品恨不得囊括人類的全部哲理，插入他們對男女關係的所有風流體驗：可以在客廳裏進行的對白，非搬到床上進行，然後以一個擁抱臥倒結束；一個普通的對白非加入一些挑逗；擁抱一下可以表達的深情和別離，非加入一個接吻的鏡頭；他們不顧中國人喜歡舉家看電視的習慣，這幫"戲子"什麼都敢拍。把電影和電視劇拍得更像是導演和編劇旁若無人的自慰。中國電影已經發展到什麼都有的地步，唯獨缺少觀賞性和健康的娛樂性，以及積極而不太肉麻的教育性。看當代中國的電影，幷不比"文革"時期的電影舒服。而滿足中國億萬農民和兒童需要的電影作品幾乎絕迹。中國電影電視藝術工作者的頹廢人生在他們的作品中暴露無遺。中國藝術界出現那麼多"大腕"時，却少有大藝術家的身影。他們的作爲至少從一個側面說明毛澤東"修理"知識分子的運動在理論上不算離譜。如果毛澤東重新從紀念堂裏走出來，中國當今的作家和藝術家們，不少人都會被打倒而不會引起任何的同情。《講話》告訴他們如何成爲人民藝術家，可他們不知好歹地非要重作"戲子"。

中國作家在過去 20 年的作品始終離不開性、頹

廢、政治悲情、故作一鳴驚人的無聊。不說《京華烟雲》或



《家》《春》《秋》，甚至比得上《艷陽天》的又有幾部？過去二十年中，除了個別，如二月河的歷史小說，值得擺在書架上，十年後還能讓人一翻的著作有幾部？

在中國幾千年的文明史上，不同的時期，總有帶朝代標志的文化創造：春秋戰國之百家爭鳴，鑄造了中國的人文基礎；秦漢奠定了大一統的政治文化，漢晋時期道家的興盛和佛教傳播，唐朝之詩、宋朝之詞、元之曲劇、明朝之小說、清代小說繁盛、民國之新文化運動，那麼，共和國幾十年來的主要文化創造是什麼呢？如果將本節所談之以《講話》精神指引下的文藝革命完全否定，那麼，共和國交出來的將是白卷。

在中國幾千年的文化發展中，毛澤東是唯一的"統治者"，强力揪著中國文人騷客那高傲的腦袋，去主動引導中國文藝發展的方向——文藝必須爲民衆服務。

筆者無意否定對傳統文化的繼承，但在原汁原味傳揚傳統文化的同時，藝術家們必須放弃固步自封的，唯傳統馬首是瞻的一貫作風，應以滿腔熱情投入對新生活的體驗和發掘。中國文化復興的目標幷不全是復古，更重要的是在傳統精華基礎上的創造。毛澤東時代已經爲我們作了雖不完美，但確是最具創造性的開端。

"陽春白雪"未必比"下里巴人"更具價值。"和寡"者未必一定"曲高"。藝術幷不總是能讓多數人欣賞，但藝術不能總不讓多數人欣賞。否則，藝術的價值和藝術家的人生價值必將大打折扣。

藝術家們以維護傳統爲理由而對現時代的逃避，實際上是對自己有限創造能力的蒼白掩護。"向江青同志學習"，不是學她在政治上的作爲，而是學她對"樣板戲"的革命性推動和積極的創造

精神。這聽起來似乎有點不可思議。

三、自覺維護毛澤東的形象

本書幷非全面評價毛澤東，因此較少深談毛所犯的錯誤，因爲批評毛的文章實在是太多了。對毛澤東的辯護也不可能以此書結束，因爲對毛澤東的詆毀還在繼續。

對毛澤東聲譽的維護，不僅應是中共的自覺行動，也應成爲天下炎黃子孫的共同責任。實際上，毛澤東作爲民族主義者，他的一生和文化、經濟、政治、軍事、外交方面的遺産，已和整個民族熔爲一體，沒有毛澤東的中華民族在二十世紀將黯淡許多。

當然，筆者幷不是說要粉飾或掩蓋毛澤東的錯誤，但關鍵是當我們批評毛澤東錯誤時，是爲了否定他的目標去斷章取義地尋找證據，還是真正去理解他及其時代的情况下去客觀分析昔日的正誤？尤其是毛澤東的偉大絕對不是現在的一群膚淺之輩所能理解。比如，《禍國的輝煌》一書（香港夏菲爾國際出版公司出版）中“王震對赴疆女兵集體逼婚”一節中提到王震如何在內地騙一些女大學生去西北，然後勸她們和當地軍官結婚，幷鼓勵多生孩子。筆者堅信這段內容有相當高的可信性，而且肯定毛澤東知道此事。問題是，毛爲什麽同意王震這樣做？新疆過去百年與祖國的分合歷史，使毛澤東清楚地認識到，在邊疆少數民族集中地區，必須不惜一切手段增加漢人的比例，同時絕對不允許任何由少數民族領袖組成的地方幫派勢力。毛澤東爲達到這個目的，通過就

地轉業和發展生產建設兵團而在新疆立即留下了幾十萬常駐人口，而且鼓勵她們將內地的家屬帶去，當然也要幫助他們結婚生子。上述書裏譴責王震的作爲和大談“愛情的不幸”根本是對先人良苦用心的漠視和無知。爲了民族的長遠利益，毛澤東和他領導下的幾代人作了他們可以做的一切，爲國家的長期統一做出偉大貢獻。他爲國家把那麽多困難的事做了，後人理應抱有一份感激。然而換來的是後來這幫無知後生的謾罵，你們良心何在？內蒙古在解放後的行政區劃多次改變和後來的“內人党”事件，筆者判斷都是毛澤東這一建國大戰略的具體表現，可他老人家和中共又絕對不能明講這一切的動機，筆者在是否應寫上述文字時也猶豫再三[1]。這件事至少告訴後人，在謾罵毛澤東之前，首先提高一下自己的智慧。否則，必然是盲人摸象，同時敗壞我們的良知和人格。

不知是誰說過這樣的一句名言：“阿拉伯人現在還在尋找自己的毛澤東，而印第安人則已經永遠找不到他們的毛澤東了”。作爲一名炎黃子孫，有理由爲曾擁有毛澤東這樣的英雄而驕傲。在他的領導下，這個曾經是“一盤散沙”的民族，終于團結到一起，并昂首挺胸地邁向民族復興的目標。和這一歷史事實比起來，對他的意識形態色彩的爭議就顯得微不足道了。

在毛澤東身上更多地表現了民族英雄的形象，意識形態僅僅是他實現民族振興的工具。斯大林對毛的社會主義一直有所保

---

[1] 毛澤東之後給人以最開明形象的領袖當屬胡耀邦，可他在邊疆政策問題上一系列看似開明實則禍國的幼稚行爲，極大地摧殘了毛澤東一代辛苦建立的邊疆社會基礎。胡耀邦及同時代的中央高層，在邊疆問題上是有負于國家的。第二章提到對邊疆漢族采取與內地無差別計劃生育政策，是另一個必須批判的錯誤行政。就憑這類邊疆政策，就足以給第二和三代領導集體打差評。


毛主席和外國朋友(1978,油畫)

留，一位美國學者曾講：“毛澤東是唯一有勇氣放弃馬克思主義的人，如果他發現籍此不能帶來民族振興的話”。他革命所走的道路和所建社會主義的模式和列寧的模式有很大差別。確切地講，毛的社會主義應稱“民族社會主義”才比較貼切。在海外對毛澤東評價較高的高層政治領袖中，以資本主義國家右派政治家占多數，而社會主義國家和西方左派政黨領袖則較少；中、蘇對立以及蘇聯在全球社會主義陣營的意識形態主導地位固然是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也是由于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總讓正統“左”派不以爲然；毛澤東本人更毫不含糊地批評意大利共産黨總書記陶裏亞蒂的交槍投降主義，和美國共産黨總書記白勞德的修正主義路綫。毛澤東對歐、美右派則表現出一定的好感。使得中共成爲社會主義陣營的“另類”。

至于毛澤東參與創立和發展的“中國共産黨”，如果外界對這一名字不太喜歡的話，應稱“中國人民黨”較爲妥當；因“爲人民服務”是其根本宗旨，而“實現共産主義”僅僅是一“遠大（遙遠而且偉大）理想”，而非現實的行動綱領。

對于一個黨派，有一美好的理想并沒什麼不對。實際上，無論是共産主義社會、先人幻想的“大同世界”，還是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都體現了人類對美好世界的嚮往和期盼。正如基督徒相信自己死後可上天堂，佛教徒相信死後將去西方極樂世界；至于他們死後是否真的到了天堂和極樂世界，因去的人都沒有回來而無法得到證實，是否因此就可以說基督教和佛教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了呢?

理解了對毛澤東創立和發展的中國共産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

上述說明，大陸以外的中國人、華人對神州大地也許會多一分親和感，少一分距離感；外國友人也許會少一分先入爲主的成見；對毛澤東和他的事業將有更好的理解和認識。

中華民族是個英雄輩出的民族，而孔子、孫子、毛澤東則是爲數不多的具國際影響力的中華偉人。當全球軍事機構對毛的軍事思想進行深入研究，世界範圍的游擊隊將毛的游擊戰術作爲必學內容，不同政治信仰的各國政治家們對毛推崇倍至，國際衆多學者窮大半生研究毛的政治哲學思想和經濟發展道路，更多第三世界國家將毛看成他們的力量和榜樣……，作爲炎黃子孫，對此您能毫無感覺？那裏面沒有意識形態，沒有共産黨，只有屬于中華民族的一份驕傲！

當全世界印度人盡力維護聖雄甘地的尊貴，美國人拚命美化林肯的嘴臉時，中華民族的成員們却爲了一己之欲而塗黑自己的民族英雄他們一定忘了，毛澤東在國際上已經成爲這個民族優秀素質和豐厚文化的象徵性人物，在抹黑毛的同時，也抹去了自己的一份榮耀。他們是否意識到，一個不出英雄只出大流氓的民族是難稱“偉大”的，一個詆毀自己英雄的人也必受外人蔑視。正如郁達夫所說：“沒有偉大人物出現的民族，是可憐的生物植群；有了偉大人物出現而不知崇敬愛戴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

當筆者讀到多篇由歐、美人士撰寫的爲毛鳴不平的文章，作爲毛澤東爲之奉獻一生的中華民族的一分子，真不知該深感欣慰，還是無地自容！

在由西方輿論和文化主導的世界天空上有一顆我們自己的

星，那就是毛澤東。希望更多的同胞行動起來，共同拭去上面的塵埃，恢復其原有的光亮；無需爲其裝飾美化，他本來已經够美够亮。



附錄一　隨想：重建中華文化的自信[1]

筆者按：在筆者關注過去二十年中國社會變遷和否定毛澤東的現象時，總有個“中國人的心態”問題，或者說一種文化現象總在頭腦盤旋。關注毛澤東的過去和當今，實際上已遠遠超越政治意識形態範疇，而不可避免地涉及對文化和中華文明走向的思考。尤其是毛澤東在中國人經一百多年慘敗後信心無存的時代橫空出世，再現唐漢的威勢，從極弱一舉托至强勢，更能爲當今和未來的中國人提供思考的坐標。毛澤東的研究不能沒有文化的探索，圍繞毛澤東的一生構成了繽紛的文化景觀。由于他的出現，將中國文化多方面、多層域的展現出來，而且綫條比任何時代都更加鮮明。遺憾的是，更深層次的文化探討是本人的弱項，本書的部分章節如第八章等只是作淺顯地思考。

本附錄的內容是自己在觀察毛澤東現象時的隨想，談不上深入和成熟，只望能拋磚引玉。原本準備作爲該書的第十四章，但因它的不成熟性而只好列入附錄，同時也可避免把本書的主題拉得太遠。

對于大多數否定或不公正批評毛澤東的中國人來說，他們并沒有其它的政治目的，而是由于受輿論導向，學術界和政界對毛澤東時代認識的偏差，或個人和親友在毛澤東時代的痛苦記憶，以及個人的知

---

[1] 附錄內容在第二版基本維持不變。雖然其中部分內容已經與今天的實際有所不同，比如附錄一所探討的文化自信問題，但作爲一個時代的印記，作爲原貌的記錄值得保留。隨著最近幾年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基礎設施完善，製造業和部分服務業等迅速達到國際一流水平，中國人的自信心大增，但并不意味著我們曾經發生的一幕可以忘記。自《河殤》之後三十年中國人具普遍性的時代精神症候群，即便以後徹底改觀，仍然不能忘記那個曾經精神殘缺的自我。

識局限和對中國國情的認識不足等，導致他們對毛澤東及其時代抱持否定的態度，這是可以理解的，但對相當一部分中國人來說，除此以外，是否還有其它的要素在發揮作用呢？

在海外生活多年，對海外生活的中國人、海外華人，以及外國人的生活形態，有機會近距離接觸；對中國自身的認識，也得以置身“廬山之外”，以識其真面目。當思考一個志士仁人百年深思的問題“中國向何處去？”似乎撞到了筆者的某根神經，由此導致對該章內容的遐想（您有權理解爲“瞎想”）。

尤其是最近幾年，一些中國人以否定中國的英雄爲樂（如認爲雷鋒過時了，拿董存瑞開侮辱性的玩笑），將否定體現民族精神的文化遺產視之爲“科學”和“客觀”（如南方某文學刊物上的新編《沙家浜》將阿慶嫂描寫成蕩婦，嗨，中國文人的人格實在有必要做個清洗），這種心態上的疾病，在否定毛澤東的時候也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使得筆者沒法回避這一涉及未來中國文化和中國人心態走向的大課題。很顯然，這既影響到中國人對毛澤東的評價心態，也遠遠超越之。

毛澤東身上那強健的人格力量和國際事物中的强烈自信，尤其爲後世樹立了參考坐標。

一、從拿破倫和毛澤東的身後談起

拿破倫的東征西討，將法國在歐洲的地位抬高到空前的地步。也極大地改變了歐洲的政治版圖。但他的赫赫戰功掩蓋不了一個殘酷的事實：他帶領法國人民的對外征討，犧牲了大量法國青年的生命，折損了法國的財力，但最後又回到了原點。他沒能替法國擴充版圖，甚至失去了部分原來的領土；是他以 8000 萬法郎將路易斯安娜州賣給

美國。他帶給法國更多的是犧牲，最後甚至讓反法聯軍直搗巴黎。但是，法國人民沒有埋怨他，相反，所有的法國人都將拿破倫視爲法蘭西民族的驕傲。法國人民顯然沒有忘記拿破倫爲自己民族曾經帶來的那份短暫榮耀。

那麼毛澤東呢?

從“革命”舞臺的規模（拿破倫的戰場分布雖南至埃及，東至莫斯科，但面積不比中國大），一生領導戰役的次數，對“一盤散沙”的中國進行內部整合，對外確立中國的大國地位，中國內部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等方面，無論是看過程，還是結果，毛澤東沒有任何一個方面遜色于拿破倫。拿破倫的一生最光彩照人的是他的軍事成就，但他除了經常性地直接帶兵打仗（毛澤東更喜歡運籌帷幄），幷沒有像毛澤東那樣開創新的戰術和軍事理論，幷爲世界各國所廣泛學習。在文采、理論建樹等“文”的方面，拿破倫與毛澤東相比，更沒有什麽值得特別一提的了。

但是，與拿破倫相比，毛澤東在中國人民心中的地位是否太低了呢？尤其考慮到還有那麼多中國人在歇斯底里地咒駡毛時，您不能不産生一個疑問：中國和法國人民對自己英雄的不同態度，其根本原因是什麽？尤其是外國高層領袖和學者在不斷給予毛澤東極高評價的情况下，一些中國人對毛澤東的態度就更顯得有些怪誕了。

其實，如果留意一下當今中國人的一些價值觀念，或者說得不好聽點，看一下當今不少中國人的嘴臉，對上述問題就不會太奇怪了。

長期以來，中國人似乎養成了一種習慣：談軍事必談拿破倫、巴頓，甚至包括彭德懷的手下敗將麥克阿瑟也能被常挂在嘴上；談政治家當然少不了丘吉爾、華盛頓、戴高樂；談文學更是羅列一長串從托爾斯泰、大仲馬到馬克·吐溫的西洋作家，已證明自己的文學修養(可悲的是，就連某高層領袖接受外國媒體采訪時也不能免俗，他羅列自

已一長串閱讀的著作中居然沒有一本是中國的。不少中國的大學生沒有通讀過四大名著，還有不少中文系畢業生至今認爲《金瓶梅》是淫書）。更荒唐的是，一些財富新貴在家裏或辦公室裏，不忘擺上一些古巴雪茄，以此來證明自己的成就和情趣。有些中國人分明可以用流利的中文進行表達，但他非穿插一些英文不可。在外企工作或喝過幾天洋墨水的中國人，更隨時準備證明自己的與衆不同。在清華讀博士時，曾請一位從美國回京探親的年輕學者作個講座，談談他的課題；該仁兄在短暫的講座中，每隔幾句話就肯定以拉長的音調說："在美……國…"。筆者能記住，概因該仁兄的這句話實在倒了胃口。

筆者的一位好友，是位美麗而高雅的中國姑娘，她的公司裏多爲歐、美、澳白人，她能很自然地和他們擁抱和親面頰，可當筆者面對這位很久不見的美麗老友，開玩笑道："可否擁抱一下？"她痛快地拒絕了，理由是："你是中國人，沒這個習慣。"筆者幷不意外，因在國內曾就這類話題和朋友爭論過。其中的問題是：西方人來到東方，幷不考慮入鄉隨俗；他們知道東方女性的矜持，却還是在東方社會裏行西方的禮儀，而東方女性則可以接受而無怪罪之意，但面對同爲男人的中國好友，却不好意思起來。如果中國人到歐美去，可否帶著自己的習慣而不會受到非議？比如問一下對方的年齡，或誇贊一下對方胖了（在中國的傳統習俗中，誇誰胖了是一種禮貌，證明對方過得不錯；相反，如果說"你瘦了"，那分明是在說你過得不怎麼如意。中國幾千年來第一次對"瘦"情有獨鍾，甚至已經很瘦的女孩也反對別人說她胖了，真是病態的審美心理。而只有西風東漸之後，中國人才歷史上第一次對自己的年齡諱莫如深）？我們從不會嘲笑來到東方的歐美人不會用筷子，但對海外生活的同胞使用刀叉的笨拙却感到難爲情。最近幾年越來越多中國優秀女性嫁給歐美男士，這沒什麼，但您很容易發現，不少這類幸運男人的素質和層次之低與那位中華女兒很不般配。這裏的問題是，我們的女同胞却對同樣層次的中華男兒完

全看不上眼！一個低素質白人在中國可以輕而易舉地讓不少女孩子“送貨上門”。

提及這些，概因這涉及到毛後時代，中國人的不健康心態：當國門打開，西風東進之時，一些中國人在內心深處産生了文化自卑心理。在這樣的心理基礎上，除了盲目崇洋，就是文化自卑和自虐，間或狂妄，因此也不可能對自身給予正確的認識和評價。在沒有一個健康的心理平臺基礎上，對毛澤東這樣的影響深遠的民族英雄進行肆意的攻擊，也就見怪不怪了，因爲他們對中國的所有精彩內容，均缺乏基本的欣賞能力和興趣。但對西方的一切，至少給予理解，甚至接受。聯想到最近幾年，中國一些人對“學習雷鋒”提出質疑，拿董存瑞等開下流玩笑。一些中國人在否定自己的美好內涵方面，已達到頹廢和墮落的境地。

今天的中國人在對自己的任何肯定之前，都會習慣于看一下外國人的看法。外國人隻言片語的贊揚也一定令中國人深受鼓舞，就象學生期待老師的表揚一樣。有記者提到“美國西點軍校也學雷鋒”（實際上沒這回事），令中國人立即激動不已（美國人學習與否都不影響我們對雷鋒精神的頌揚）；一篇有關某中醫課題的研究報道，也不忘提到：該成果受到美國專家的高度評價（一個不熟練應用中文的人居然能成爲中醫權威，聽起來真有點荒唐）。中國人已經到了非指望別人的肯定才能相信自己的地步。筆者在寫該書的時候，不得不大量使用外國人的觀點，因爲如果不這樣，要說服那些自卑而又粗魯的同胞，還真的很難。

再看看法國人對自己歷史和文化的自豪，就不難理解法國人對拿破倫的推崇。正是對自身文化的信心和由此帶來的健康審美心態，使得法國學者成爲海外研究毛澤東最早，對毛澤東最推崇的海外知識分子群體，他們懂得欣賞偉大。

柏楊先生在《醜陋的中國人》中談到：中國人自傲，自卑，就是

沒有自尊。也許柏楊的話不够全面或過分刻薄，但在今日的中國人當中，犯有這類疾病的人不是個別。不論才子佳人，高官顯貴，還是商賈學者，概不能免俗。這實際上也是中國教育失敗的一個證明。

二、從賽艇和龍舟看中國人的文化心態

1999 年，每年一度的“北大清華賽艇對抗賽”拉開首次比賽的帷幕。可以想像，兩校領導和學生會主席莅臨比賽現場，發表熱情洋溢的講話，不外乎什麼“賽艇比賽體現團隊精神”、“增進兩校友誼”等，筆者對此沒有什麼特別的感想，這是兩個學校之間的一場體育比賽而已。再怎麼比賽，兩校的學生還是照舊互相貶低對方，抬高自己。

雖然兩校領導都不好意思講明，但誰都清楚，這是“牛津劍橋賽艇對抗賽”和“哈佛耶魯賽艇對抗賽”的中國翻版。雖然缺乏創意，但“向先進看齊”的做法肯定不應該受到批評或嘲笑。

當然，比賽之後中國的各大媒體和兩校校報，對這場比賽進行了熱情洋溢的報道。尤其是令這一比賽的發起人（當然是兩校學生會）感到得意的是這樣的文字：“北大清華賽艇對抗賽、牛津劍橋賽艇對抗賽，以及哈佛耶魯賽艇對抗賽，成爲世界三大賽艇對抗賽”。在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過程中，至少有一項已經進入世界級。至于這“三大”是誰封的，當然是兩校的才子們自己。世界高校的賽艇比賽肯定不會只這幾所。如果是一些三流學校，而不是牛津劍橋、哈佛耶魯率先舉行這類比賽，中國最頂尖的兩所大學當然沒興趣跟進，“體現團隊精神”只好找別的方式去體現了。

面對中國高校等各方面缺少創意的刻板和教條，筆者早就習以爲常，不以爲怪，這種現象在中國各行各業幾乎都能找到。筆者也不認

爲有什麼需要特别評判的，直到下列事件的發生，“北大清華賽艇對抗賽”背後所隱藏的嚴重問題，才引起筆者强烈的關注和思考：

地點：新加坡，這是個人口五百多萬，華人占總人口 77%的南洋小國。

時間：2001 年端午節下午

事件：在濱海灣舉行端午節慶祝活動，展出有關端午節的故事，包括介紹屈原這位愛國詩人的生平以及愛國情操。另一項展覽是，圖文并茂地介紹世界各國賽龍舟的情况，其中不少還是歐洲國家。這次活動正進入最後的壓軸節目——新加坡國立大學與南洋理工大學一年一度的龍舟對抗賽的首届比賽在此舉行，爭奪由時任新加坡總理吳作棟贊助的“總理挑戰杯”。吳作棟也暫時卸下政務到濱海灣觀賞龍舟賽，并主持敲鑼開賽儀式。比賽結果，南大龍舟隊技高一籌，從總理手中捧走獎杯。

至于吳作棟總理爲什麼贊助這兩所高校的龍舟賽，他在賽後的茶話會上提到：他希望借此在兩所大學之間樹立一個良性競爭的優良傳統，就像英國的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一年一度的賽艇比賽一樣，發揚健康的競賽精神。他是從這兩所世界級名校的這項傳統競賽中獲得啓示而發起的。從他寫給 2000 年新加坡國際龍舟賽特刊獻詞中能更準確地把握他的動機，他提到：劃龍舟强調的是團隊精神，這種精神對一個國家的成功非常重要。他也提到和端午節有關的傳說，并贊揚詩人屈原的偉大愛國主義及爲國犧牲的精神。他也對新加坡龍舟協會積極推動龍舟賽，及在保留中華文化傳統上扮演的角色表示贊賞。

新加坡華人和世界其它地區的海外華人一樣，在當地土族文化的環境下保持著對民族文化的傳承。很顯然，由于新加坡曾是英國殖民地，而新加坡不少社會精英曾在英國讀書，對牛津劍橋賽艇對抗賽應該比清華和北大的學子們知道得更早，但是他們選擇老祖宗的龍舟

賽，而不是照抄牛津劍橋的賽艇賽。固然，這沒能讓他們獲得進入“世界四大賽艇賽”行列的自慰，但他們更好地尊重和表現了自我。

從比賽規則和比賽技巧等方面來看，龍舟和賽艇沒有太大的不同。但是，他們的文化內涵則有天壤之別。賽艇僅僅是一種體育運動，談不上任何的文化色彩；但龍舟則輕而易舉地帶領人們穿越兩千多年的時光隧道，與中國厚重的文化和價值核心聯繫起來。這是綿延不斷的中華文明最大的魅力之所在，也是中國人之所以是中國人（這裏的中國人泛指文化意義上的中國人，當然包括還沒丟掉中國文化傳統的海外華人）的文化標簽。

在“清華北大賽艇對抗賽”的背後，是當今中國人，尤其是年輕知識分子不健康的文化心態。[1]

在文化的傳承和發揚方面，大學，尤其是年輕一代學人的作用至關重要，這也是義不容辭的責任。然而，在中國高校與國際接軌的過程中，忽略掉自己民族的精彩內涵，未免太可悲了。“北大清華賽艇對抗賽”激起的浪花，掩蓋不了中國知識分子和青年學人對自身文化內涵的漠視，和對幷不優秀的外來文化的輕易接受；這裏面包含著盲目的崇洋，和無知帶來的文化自卑。是那位中文幷不流利的新加坡總理吳作棟，而不是北大和清華的黨委書記和校長，在强調著對中華文化的傳承和發揚。

---

[1] 題外話：中國教委的那幫家伙已將岳飛從民族英雄的名單中剔除，相對而言，屈原愛的是位于湖南、湖北的楚國，更應該被剔除；否則他們不擔心山東人和陝西人造反？不明白爲什麽中國這樣一個人才濟濟的大國的中央政府裏總有一些徹頭徹尾、不值一辯的白痴。可不理他們又不行，如果任由他們這樣折騰，中國的整個文化價值體系都將面臨危機，至少“炎黃子孫”是不能再用了，否則中國的維吾爾族、朝鮮族和俄羅斯族同胞有理由造反。而秦檜則因統一國家有功而成了英雄。考慮到共産黨的目標是全人類實現沒有國家的共産主義，那麽今日的賣國分子將成人類的功臣？！中國少數民族曾爲中國文明史做出了輝煌的貢獻，他們從來沒有因爲歷史形成的漢文化和中原政治歷史的主體地位而感到不自在。就連康熙皇帝都極爲尊重岳飛。而中國教委則以小人之心揣度中國的少數民族，實在悲哀得離譜。

正如蘇州人自豪于“東方威尼斯”的稱號、海南人得意于“東方夏威夷”的美譽、東方人自稱亞太爲遠東等，都是在自我感覺良好的同時，墮入了“西方中心主義”的邏輯陷阱。

清華、北大無疑是中國最杰出的大學，自然也是筆者少時的夢想。在山東曹縣一中讀書時，更以多次高考模擬考試第一名的成績而成爲當年最有希望考進清華的，但在關鍵時刻蒼天安排的一場疾病，使筆者沒能進入清華園，只得“上妓院”（上海機械學院的荒唐簡稱）。筆者在這裏學習格外從容，得以“不務正業”，對學院圖書館的非本專業類書籍進行了四年的盡情“掃蕩”。當在大街上、火車上不時聽到“我是交大的”、“復旦的”，筆者實在不好意思報出自己母校那奇怪的校名。可看到這些天子驕子過早地擺出一副文人騷客的姿態時，筆者才算找到了自信。當 21 歲大學畢業時，帶著廣博的知識而傲視同齡，當需要“騷”一下的時候，在多個領域沒人敢輕易視在下爲外行，更具備了同齡人不可多得的宏觀視野。當然，也爲本書全面重新評價新中國歷史和把握改革開放後中國社會的脉搏作了最初的、全方位的知識鋪墊。同樣也爲後來避免中國年輕一代精神的全盤西化，注射了“疫苗”。

不瞭解自己，就不可能懂得欣賞別人的長處。只有充分認識自己的文化深度，才能不去嘲笑別人的粗糙文明，同樣不會因爲看到別人的燦爛而立即自卑起來，因爲您已經具備了健康的文化自信。

考慮到人類的本能弱點，文明的糟粕有時比文明的精彩成果更容易被人接受，因爲文明成果的亮點，難免有對人類行爲的規範和個人欲望的遏制，這是建立有序社會的必然要求。相對來說，文化糟粕中不少是對人類自私和醜惡本性的放縱，以及對社會秩序的懷疑和挑戰，如個人主義和性開放。中國過去十多年“國際接軌”中出現的問題，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清華、北大作爲中國最好的大學，在民族文化傳承和發揚方面，理應發揮方向性的作用。尤其在這兩所學校均隨時準備“傲視群倫”的時候，總不能老拿“國學四大導師”和“五四運動”來炫耀，那畢竟已是明日黃花。

清華大學最近要開多門用英文授課的專業課，可看作是衝擊世界一流的大膽嘗試。理論根據不外乎國際學術交流的方便。但更多的疑問隨之出現：

今日英文的國際地位，是由于世界經濟和科學中心先後輪到英國和美國這兩個英文國家的緣故。後來雖然有蘇聯在科學上的成就，但封閉的經濟和政治，造成了蘇聯不可能具備向英語世界挑戰的可能；而日本和德國就更沒能力了。在世界主要語言體系中，隨著中國和東亞的崛起，中文是唯一具備向英語世界提出挑戰的語種，而中華文化的包容性和作爲世界文化圈的一極，也最有可能成爲世界主流文化的最重要部分。畢竟，在歷史和文化的延續、民族凝聚力、國家的規模、發展的潛力、歷史和當今國際影響力、海外華人的全球分布廣度和數量，等，中國具有世界獨一無二的優勢。在人類未來的生活形態和精神建設方面，我們有資格去作領頭雁！

當然，要達到這一步，中國人自己的努力是必需的。中國人對英文的態度趨向和對中文推廣的執著程度，就變得非常關鍵。在這方面，中國的大學、科學院所和教育部門肩負義不容辭的責任。由于中文字自身的豐富內涵和組詞特點，也不可能出現象朝鮮語和日語那樣的音譯尷尬。如果中國大學的科目多用英文授課，中文在學術領域的崛起將是不可能的；而中文的學術刊物也不可能成爲國際性刊物。如果中文不能進入學術語言層面，將只能是語言的配角。隨著中國科技實力的不斷增强，高素質論文越來越多地發表在國際一流學術刊物上，中文學術刊物的再定位和文章發表于審評制度的完善，到了該認

真考慮的時候了。[1]

最近，馬來西亞華社正在和馬國政府教育部發生激烈爭吵。馬教育部要求所有的華文學校的數理科目必須用英文授課；而華社則堅持使用中文教學，以更好地傳承中華文化。

實在有點悲哀，從新加坡到馬來西亞，中國文化的傳承看來只能依靠海外華人了，中國納稅人巨資支持的清華大學似乎更願意使用英文。

至于中國學校如何更好地教授英文，則是另一個課題。固然，中國的年輕一代學人必須學好英文，這是沒有疑義的。但必須搞清中英文語言的不同角色，和復興中華文化的歷史責任。以筆者的經驗，不論中國人的英文水平有多高，思考語言還是中文。雖然有些中國人堅持讀英文小說以鍛煉英文，但要在只有幾百年穩定歷史的拼音文字的作品中，得到像中國古典名著那樣的文學享受，是根本不可能的，無論是莎士比亞，還是馬克・吐溫，都不可能像笑笑生和曹雪芹那樣，將簡單的文字堆積出一座座精彩處處、玩之不盡的絢麗迷宮，這是只有幾百年穩定歷史的拼音文字所無法實現的。

爲了提高中國學人的英文水平，是否可以考慮如下建議：任何一門課都設定一定的外文資料閱讀量，至少掌握各門課的英文專業詞

---

[1] 中國現在一流的學術成果首先是用英文發表在歐美雜志上，對提高中國學術界的聲譽有積極意義。但國家巨資投入科研的目的不僅僅是爲了國際上的名次。由于英文刊物價格昂貴，在中國各圖書館和資料室的普及程度不高，中國學者的英文水平也并非都那麽高，所以這類文章發表後受益最大的實際上是西方國家，或者說，中國用巨資幫全世界做科研。當今國際競爭是科技的競爭，中國政府是否應該考慮如何鼓勵最好的成果首先在中文刊物發表，尤其是多少涉及到國防應用和一些新興產業的領域，如新能源等，學者爲了文章能順利發表和成果可重複性，往往給出詳細的研究方法和數據。這些文章中不少都是應用科學的，是免費和全世界進行知識分享。要知道，對于歐、美、日發達國家來說，以他們的工業基礎和科研能力，對于這些成果產業化有更大優勢。美國當年爲與蘇聯爭霸，研發 F117 隱形飛機時，美國工程師就是從蘇聯科學家發表的一篇英文文章中獲得理論啓發。但蘇聯受制于資金和工業基礎却沒有從該文中得到實際好處。

匯。至于用英文講說，就憑中國人的薄臉皮，只有少數學生可利用這樣的授課機會來鍛煉自己的英文。看一下在海外留學的中國學生在課堂上的那份沉默，就明白了。

清華和北大在文化傳承和弘揚方面尚且如此，對他人就更不敢抱太高希望了。下面再舉一些有代表性的例子，能更好地發現中國人當今心態的疾病。

2001 年 12 月底，筆者在夜幕中欣賞了一下北京長安街兩側的新變化。在從復興門到天安門廣場的這段路上，發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在北京西單時代廣場大廈和前面表揚過的國際金融大廈上，英文“HAPPY NEW YEAR！”（新年好！）的霓虹燈格外刺眼。筆者在歐美旅行時，每見到中文的招牌，都有一份欣慰，那是海外華人對祖先文化的繼承和驕傲。在中華第一街，由中國人自己在中國公司的大廈上，主動寫上英文新年賀詞，又意味什麼呢？這比昔日帝國主義壓迫下的文化殖民還讓人難受。看來，這裏的主人是決心不給中國人拜年了。如果這兒的主人想炫耀一下自己的外文造詣，用這樣簡單的詞匯也太沒水平了，他們應該到南美或非洲部落中尋找幾個文字才更顯玄妙。如果這也是與國際接軌的話，中國人都該把頭髮染黃。

當然，如果和部分上海人比起來，北京人立馬發現自己對中華文化的弘揚是多麼的執著。在相當一部分上海人中，從他們的消費習慣就可看出，他們對中國的“老土”是多麼的不屑一顧，只要和外國粘上點邊，那也一定價值猛增。上海家用電器市場上，外國進口品牌的市場占有率始終是全國最高的。對不少上海人來說，中國的電視機哪比得上日本貨，可這些沒有任何技術認識的人根本沒有意識到，日本電視機在電壓波動巨大的中國電網上難免出現圖像抖動，而中國國產電視機的開關電源則是針對中國國情設計，具有更好的穩定性。真是無知者無畏。和相當一部分上海人頭腦中的外國崇拜情節比起來，一

台家用電器實在不算什麼：美國進口的桔子當然比南昌蜜桔還要甜，在海外頗受歡迎的山東和陝西蘋果，哪有厚皮的澳大利亞蘋果更能體現個人消費層次。那本書《上海寶貝》中，美麗的女作者必須放上個藍眼睛的外國"男孩"爲主角（中國的無聊文人成功地將藍眼睛、黃頭髮塑造成美麗的標準，甚至用"金髮"來形容黃毛，真是自我作踐到病態的地步。我咋就沒看出過去稱爲"色目"的藍眼睛和黃頭髮特別好看在哪裏。有位嫁給中國人的外教，曾自嘲：她老公的朋友都以爲她頭上布滿了金絲），這老外的體毛怎麼看都比新疆或湖南男人的體毛更能勾起她體內的動物燥動；如果放個山東大漢在她身上磨蹭，那多沒品位。上海女人的涉外婚姻案例一直是全國城市中最高的。看上海建築物上的霓虹燈標牌，英文的比中文的還多，筆者在一本雜志上見到幾幅介紹上海的圖片中，建築上的中文標牌數量甚至不到四分之一。今日的上海也許以建設國際化都會爲目標，但從人們的崇洋情節可以看出，上海的方向似乎是剔除中國色彩的國際化。如果讓上海作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窗口，這沒什麼，但如果將上海視爲中國全面現代化的旗艦和樣板，那麼，當中國實現現代化之時，也將是中國人文化身份定位的迷失之際。

當中國的多情男女自以爲時髦地過情人節時，他們不會知道西方情人節背後的任何趣聞，那更加凄美動人的七月七牛郎織女相會的中國情人節，他們却絲毫沒有興趣。也難怪，在私欲橫流的今天，中國的情人們是否真正懂得"情爲何物？"

海峽兩岸的政治領導人也似乎隨時準備亮一下他們的英文。如果哪天美國總統能用中文發表演講，中國人一定會爲自己國家領導人的英文造詣和對外國客人的語言禮儀，大表自豪。

當然，如果我們的賣命表現能得到外國人的贊賞，至少也沒有白費工夫，說不定外國朋友一高興給個出國的機會，也未可知；如果別人禮貌性贊揚幾句，自己又多了份自豪的資本，可以到媒體上吹噓一

下，以滿足自己那可憐的虛榮心。但稍微有點文化修養的外國人來到東方，似乎對這兒英文的普及不感興趣，更多地是對東方，尤其是對中國文化的興趣和探究。

在新加坡繁華的烏節路上有一家希爾頓酒店。在酒店正門兩側各立了兩個塑像：一個是唐朝開國大將秦叔寶，另一是尉遲敬德。某日，一群美國游客面對這兩尊塑像倍感好奇而不知所以。他們在問一個過路的中國人，得到“對不起，我不知道”的答覆後，剛好路過的筆者熱情走上前去，向他們介紹了這兩尊塑像背後的歷史傳說。最後問他們：“華人新年時，去過美國的唐人街嗎？”“是的。”“是否注意過華人門上貼的畫和門兩邊的文字？華人的這一新年習俗就來自于這一典故。”“是嗎？太棒了。”

從他們那愉快的神情中，能體會到那句話：“民族的，才是最美的”。這是他們在新加坡旅游期間，最難忘的文化之旅，他們對華人新年的有趣習俗居然在這裏找到了出處。他們一定爲希爾頓飯店的這一設計喝彩。如果哪天他們搞一副“哼哈二將”或“關羽張飛”的門神畫貼在自家門上，將不會令人意外。當然，中國自己的旅店絕對不可能在自己的酒店門前搞出這樣的噱頭，他們寧可弄一個他們自己也搞不明白的後現代雕塑或裸女放在門前。後來筆者有意無意間問過幾個本科學歷以上的中國朋友，很遺憾，除一人外，全部不知這一典故，而他們對美國某個城市的四季氣候變化，或某個牌子的洋酒却能知之甚詳。在他們對中國的節日習俗一無所知的時候，却對“洋節”抱有持續的熱情。中國人的心態問題，可見一般。這些美國白人應多爲基督徒，從他們比著在塑像前留影，可以看出，他們沒有中國基督徒對中國神鬼傳說的那份敏感，在文化和信仰的區分上，他們似乎比中國基督徒成熟得多。

筆者有個明顯的感覺，那就是從大陸出來的人比海外華人，更多地表現了中國文化的虛無意識，同時又伴隨著傲慢和自負（這種關聯

是必然的）。當他們試圖爲自己的祖國辯護的時候，又不小心披上沙文主義的袈裟。這些可能與中國的整個教育體系和注重意識形態的宣傳手段有關。真是不敢想像，如果中國有朝一日成爲第一强國，膚淺而傲慢的同胞是否會比今日目空一切的美國人和日本人更令世人討厭。就像日本人因爲自己能造最好的電器就以爲自己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一樣；一個不瞭解自己的民族，就無思想的深度，也必然導致自卑或狂妄的極端。

正因爲這種虛無意識的潛移默化，使得當今中國的任何難題，都喜歡去國外尋找答案；而自己的精彩成分則無人過問。如，經濟學、投資界、政治學上被廣泛濫用的“馬太效應”，出自《聖經新約》“馬太福音”第十三章：耶酥對門徒說：“……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凡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取。”這裏的宗教色彩是顯而易見的，這一借用也不太準確。但中國古代哲學中，有關經濟學上的這一理論，有比《聖經新約》更淺顯明白的哲學論述，而且不涉任何宗教內容。在《道德經》中有句盡人皆知的話：

“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而奉有餘”。

它更準確地反映了經濟學上的這一原理，點明了單靠市場經濟的“人之道”（人們追求個人欲望的自然本性），貧富差距和地區發展不平衡將會日益加劇，只有靠行政力量“替天行道”，才能縮小地區經濟的不平衡發展和貧富差距。但中國的學者對這樣的精確描述不予理睬。

必須强調的是，筆者無意反對向西方先進文化的學習和吸收，更不會花精力浪費在“體用之辯”上。但只有我們首先瞭解了自己的家底，才能更好地把握我們缺少什麽，或國外的何種文明成果需要引進。到時才不會有遺珠之憾。如果我們置自己的財富于不顧，帶著一個空白的大腦面向世界，其它文明的成果被吸收的同時，也會一起吸收別人的糟粕，甚至將別人厠所裏的一個臭石頭，當成舊石器時代的

文物。

在前面第八章中談論華人基督教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時也曾提及，華人基督徒有個具有普遍性的問題，就是國學功底的淺薄。

三、金字塔陰影下的文化自信

正是中國人對中華文化普遍性認識缺乏，在國門打開之後，民族虛無意識和自卑心理的發酵，將是難免的。

隨著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有機會去歐洲旅行，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同時出現，那就是對歐洲文明的嘆服，和對中國自身文化的些許自卑。對于那些去過希臘和埃及的人，就更別提了。歐洲雄偉的教堂、多姿多彩的雕塑、精美的壁畫，還有希臘的神殿、埃及金字塔等，無不令人贊嘆。不少中國人嘆息：咱們中國爲什麼就沒有那麼歷史悠久的宏偉建築？中國建築多爲木結構，經不起歲月的考驗，可爲什麼就沒有歐洲和埃及的石料建築，我們的祖先是否太偷懶了？這些中國人出于民族自尊，他們不好意思對中國文明史在世界上的位置產生懷疑，但內心的文化自信已大打折扣。

如果仔細研究一下歐洲、埃及和中東的一些古老建築，不難發現，它們大多與宗教有關，如埃及和希臘的神殿、巴黎聖母院、科隆大教堂、羅馬聖彼得大教堂等；或者與王權和貴族階級有關，如金字塔、羅馬競技場等。中國和歐洲歷史進程、文化發展的根本性差別，導致了這類建築只可能在歐洲和中東出現，而不太可能在中國完成，即使在中國產生，像萬里長城，也是歷史的偶然，而非必然。

首先，歷史發展進程的巨大差別。

埃及、希臘、中東、印度和歐洲，有過漫長而發達的奴隸社會，

其封建社會相對短暫而且落後。而中國則奴隸社會較不發達，却有著世界上最輝煌和最漫長的封建社會。中國的道德文化又使得中國的奴隸社會與西方和埃及奴隸社會的生産關係差距巨大。這導致的不同結果是：歐洲王權和貴族階級，在追求奢華和排場方面，能較從容地利用勞動力——奴隸，而無須爲此承擔太大道德、經濟和政治的風險，他們在迫害奴隸後可以通過禱告換得上帝的寬恕。而在中國封建經濟環境下，中國百姓早已擺脫蒙昧狀態，朝廷不要說對百姓不顧死活地强制勞動，即使横徵暴斂也會導致政權的覆滅。埃及建造金字塔和希臘建造巴特農神殿，在没有先進工具的條件下，必然導致成千上萬奴隸的死亡；如果同樣的事發生在中國的任何朝代，必然會激起民變。中國歷史上最浩大的兩項工程——秦始皇修長城、隋煬帝挖運河，雖然爲後人留下了驕傲，但却導致秦、隋兩朝的覆滅，以及“暴君”的惡名。

因此，中國没能修建太多的浩大工程，與中國社會制度的極大進步和高度文明密不可分。當然，中國木結構建築的普及，也與此有關，畢竟其需要的工作量比石料建築小得多。尤其是中國的都城遠離優質石材供應地，給石材的采運帶來更繁重的勞動。故宫乾清宫後門臺階上的那個巨大石雕，采自河北；爲運到北京，不得不開挖一條河道，利用冬天的河道結冰運來，朝廷也肯定費了不少的銀兩；可要搬運金字塔和希臘神殿上的巨大石塊，要消耗多大的民力？如果需要爲此支付餉銀的話，他們還能建得起嗎？

其次，在文化發展進程和內涵上的巨大不同。

儒家思想的核心內容，并不是在孔子的時代突然形成的，而是貫穿于之前的整個信史和傳說時代，從炎黃二帝、堯舜禪讓、大禹治水過家門而不入等等，中國人文傳說所包括的仁義道德思想，已根植于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也必然對後來當政者和奴隸主階級帶

來道德的規範和影響。這決定了，中國的奴隸社會要比其它文明的奴隸社會階段少了一份血腥和殘暴，多了一分人道色彩。而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是建立在對西方歷史進程的研究基礎上的。所以，要按照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觀點劃分中國的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分水嶺，幷不容易，因爲中國的奴隸社會（春秋時代及以前）實際上擁有明顯的封建生産關係的特徵。所以，奴隸社會的暴君代表人物商紂王，讓歷史唾罵幾千年；但如果和埃及爲自己建造金字塔的法老比起來，商紂王的酒池肉林、多殺幾個宮女，又算得了什麼呢？但基督教撫育下的歐洲人對有恩于他們的上億印第安人進行了徹底大屠殺，一直到 1930 年代，美國的基督徒們還會饒有興趣地觀賞一個黑人男孩被吊起來燒死，他們的耶和華神此時肯定睡著了（據我觀察，耶和華神多數時候是睡覺的）；但我們祖先給中華民族植入的仁慈基因千百年來則從來沒有睡著過。

另外，中外歷史上宗教力量的不同影響。

中國歷史上，在佛教傳入前，就沒有過一個帶來普世影響的宗教體系。所謂信仰不過是築個檯子拜拜天、祭祭地、祈祈雨。而中國統治階級也從來保持世俗政權的性質，即使皇帝也不把自己的信仰强加給人民。這樣，也就不可能利用信仰的力量來恐嚇、組織和發動人民給予無私奉獻。毛澤東及其共産黨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瞭解信仰的力量，幷有效發動之的中央政權。相對來說，從埃及的神廟、希臘的神殿，到歐洲、土耳其的教堂及清真寺等，都說明了宗教的巨大力量。尤其是西方和中東在漫長的歷史中，保持著宗教王權的性質，爲利用宗教和奴隸制度的雙重便利，提供了條件。今日歐洲最著名的教堂，大多是在文藝復興及以前建造的。

佛教從來就不是中國的國教，且是相對溫和慈悲的宗教，但在過去的兩千年中，仍爲中國留下了輝煌的石雕藝術、繪畫、寺院及文化

典籍。西方殘酷且瘋狂的宗教歷史留下雄偉的宗教建築和藝術成果，就不令人奇怪了。

那麼，在沒有輝煌的建築作爲歷史見證的情況下，中國的文明程度，或者說中國人民的智慧發展，是否就沒有了充分證明了呢？一位西方歷史學家曾說過，中國除了“四大發明”，還有第五大發明，那就是如何在漫長的歷史上，管理如此龐大的國家。當然，和漢字、《易經》及經絡學比起來，那“四大發明”就不算什麼了。

漢字經過幾千年的發展，內容日益豐富的同時，也保持了相對的穩定性，使得今日的中國中學生可輕而易舉地讀懂兩千年前的《論語》和一千多年前的唐詩，而英國的優秀大學生只能讀懂五百年前英文作品的 30%。漢字的特點，也爲中國的文人們發揮他們的才智，提供了廣闊的空間，拼音文字的文學作品不可能達到像《金瓶梅》和《紅樓夢》那樣出神入化的精妙，帶給讀者無窮的文學享受，中國文字的特點令文學天才們可以借音、借意、借型來達至神妙的境界，這是拼音文字所無法實現的。今天，隨著信息和知識爆炸，面對那層出不窮的新概念、新詞匯，漢語的優勢更加明顯。隨著網絡時代的來臨，中文在傳輸和存儲上的優勢更加明顯，如果將一部小說分別存成英文和中文版本，那麼中文版本所占字節數，只有英文版的十分之一。

經絡學是中醫學的核心應該是沒有疑問的。出現于公元前 5 至 3 世紀的《黃帝內經》，相傳是黃帝和臣子討論醫學的內容。可以肯定的是，經絡的發現肯定要遠在《黃帝內經》成書之前。經絡的發現本身是不可思議的。按照對經絡的描述，它遍布人體，具有“决生死，處百病，調虛實”之能。如此說來，當今西醫研究的目標離此還遠著呢。但長期以來，雖然給炎黃子孫的保健醫療做出巨大的貢獻，但是，隨著西醫的發展，尤其看到西醫院裏的先進醫療儀器，人們對經絡是否真的存在產生懷疑，西方人更長期視經絡爲無稽之談。直到中國科

學院院士祝總驤教授帶領的研究小組，用電學和聲學的現代科學方法，終于證明了經絡的存在，以及强導電、導聲的特點。測試的結果和古代經絡圖完全吻合。

主要表皮層經絡綫只有一毫米寬，用解剖的方法難以剝得出來，用顯微鏡難以看到，但它確實存在。那麼，我們的祖先在科技極爲落後的情况下，是怎麼精確地發現它，幷認識到它的功用的呢？人們常稱埃及金字塔的建造有太多不可思議，但幷非不可想像；但經絡的發現過程，已遠遠超出當今人們的想像力。

1998 年在筆者人生最困難的時候，小腹部又出現經常性的疼痛，真是“屋漏偏逢連陰雨”，而新加坡的醫生們只會給些止痛藥，無論怎麼樣提醒他們止痛藥不能根除病因，他們還是照舊；如果這也叫醫學的話，醫學院早該關門了。靠人不如靠己；從此花五個晚上，一頭鑽進中醫學的著作裏，最後找到靠穴位按摩治療的方法，集中在胃經和大腸經諸穴位，兼用丹田深呼吸，只用三天即腹痛全消。讀這點中醫書極大地提高了“治病救人”的自信。後來在美國矽谷出差期間，曾幫助一位擁有護理學學士學位的白人美女治好了脚部突發的疼痛，幷因此賺得一個慷慨的擁抱。當她好奇地問治療的原理時，筆者自信地告訴她“這是中醫的方法”，令她大感驚奇。至于到底靠什麼中醫學原理把她治好的，憑筆者的那點中醫學知識，當然不可能知道。

很痛心，中國燦爛文化當中有那麼多精彩的內容，但中國教育部門對此置之不理。在中學有《生理衛生》課，講述人體的結構，但中醫的知識一點不提，甚至連經絡都被忽略。中國古代讀書人大都讀過《黃帝內經》，對醫理略通一二。要學會西醫治病救人，至少要幾年的學習，如果針對性地學點中醫，只需幾天就可應用。科學的發展，不是使科學更複雜，人們更遠離科學，而是更簡單，使人們能普遍地掌握科學的手段。如果說人類在電子科學領域，從模擬時代發展到數碼時代，使得非電子專業畢業的人稍加學習即可設計數字電路和計算

機，說明了數字技術更好地逼近對自然規律本質的認識；那麼經絡學則直指人體生理的核心，它避開了現代西醫學大量複雜的內在機理研究。可以預期，西醫學走漫長的一圈後，最終將會在經絡學的研究上落脚，打開生命體系的真正核心。經絡學的研究已經證明，不僅人體，就連樹木等植物和動物也有明顯的經絡存在。

《易經》對宇宙的陰陽二元描述，在很長時間內被視之爲唯心的、非科學的。直到數碼時代來臨，人們才認識到，不論自然界的何種現象，如天氣、地震、聲音、圖像等，均可用 0 和 1 來描述，甚至控制，這才有了數碼音樂、數碼影視、自動控制等。在計算機技術中，0 和 1 幷不是簡單的數量詞，而是電子技術中“開”和“關”兩種狀態的描述符號，這實際上就是“陰”和“陽”在電子物理上的表現。如果將“陰”用 0 表示，“陽”用 1 代替，則八卦就成了數字電子技術中用二進制數表示的從 0 到 7 八進制數。而六十四卦則成了從 00 至 77 的八進制描述，其運行本質都是二進制運算，即 0 和 1，或陰和陽。《易經》的哲學價值遠遠被低估了。從哲學對普遍規律的概括性和對人們認識和改造自然的指導性角度來看，包括馬克思辯證唯物論在內的西方任何哲學體系，也無法和《易經》相提幷論。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國人無論在國家行政和長城建造的大規模管理方面，還是在科學發現的智慧表現方面，或最高哲學原理的形成方面，都絲毫不遜于世界任何文明。當埃及人强迫數十萬奴隸建造金字塔時，希臘人被迫建造巴特農神殿時，中國人的祖先則在探討人體的奧妙、仁義的精神和宇宙變化的規律。

建築不過是人類文明的表像成果，而人類文明的核心則是對自然、自身以及宇宙變化的認識和利用。動物尚且會壘窩、挖穴、搭巢，何况擁有靈巧雙手的人類？但動物任何時候不能完成簡單的哲學發現，或認識自己身體的生命原理。

順便說句題外話：華人基督徒們普遍對猶太人有份特別的推崇，因爲以舊約，猶太人是上帝的特選子民；可關乎身體健康的經絡學和宇宙奧秘的《易經》，上帝咋就忘記給猶太人了呢？仁慈與寬容，比金錢更能獲得上帝的恩典。

當然，筆者幷非貶低其它文明，西方文明中有太多值得我們學習的。但這遠不足以令中國人自卑。中西文化各有特點，只有認識自己才懂得去理智地欣賞別人。而不至于看到別人的光輝，立即感覺自己的灰暗。

筆者曾聽到不少從巴黎回來的人大贊梵爾賽宮的後花園。在筆者去之前，頗有一份强烈的好奇：能讓以園林藝術自豪的中國人稱贊的花園，一定不同凡響。甚至顧不上去欣賞梵爾賽宮的內部奢華，直奔後花園而來。很遺憾，這個占地巨大的花園，居然沒有任何足以令筆者稱贊的地方，尤其是在去了歐洲其它花園之後。這兒除了歐洲花園都有的噴水池、兩側的幾座雕像外，中國園林建設最忌諱的設計這兒全有了。這兒的樹木全被修剪得整整齊齊，花園從頭一望到底；那個正中心方方正正的池塘，怎麼看都像個巨大的游泳池。而歐洲園林的花壇更是一律將各種花卉平攤在地上，像是個穆斯林編織的地毯。這個著名的花園還有面積巨大的樹林，但除了面積，看不出任何的精妙。如果是中國園林，一定會在這個樹林裏鋪有鵝卵石的彎曲小徑上，突然冒出個堆滿亂石的荷塘，或靠在假山下的小亭，甚至還有路易十四或拿破倫的手迹，再取個“什麼亭”之類的雅號。

固然，東西文化的不同，可能使筆者無法欣賞這一名園的妙處。但人類的基本情趣，如對香、甜的喜好和對臭的反感，整齊的單調和曲綫的動感，應該沒有太大的區別。像梵爾賽宮後花園這樣的地方，實在想像不出，到底誰會長期在此游園而不感到單調。但筆者在清華讀書期間無數次去圓明園遺迹跑步，穿越于小山、湖泊、小橋和樹林

之間，每次都會有愉悅的感覺。這種感覺應該與種族無關。但對這種感覺的發現和如何滿足這種感覺的需要，則因文明的發展軌迹和程度不同而有所區別。

西方貴族會建一座巨大的城堡，中國的豪門則會修一座精巧的園林。西方人會把樹剪成病態的整齊，中國人則會花更多工夫把樹搞成病態的彎曲。西方人喜歡修草坪，以便視野開闊，而中國人則喜歡使用“障眼法”，避免一覽無餘；要麼曲徑通幽，要麼九曲回橋，再來個別有洞天。今天，中國的城市建設者們也向國外學會了修草坪，但因不讓踐踏而成了奢侈的擺設。至于不分青紅皂白修草坪而不是多植樹，憑藉的是什麼審美情趣，只有鬼知道。

即使像餘秋雨這樣見多識廣的學者，在對外域文明的欣賞上，也會不小心踩著自己的脚。餘秋雨的文筆和敏銳眼光是筆者所喜歡的，但他在美文《扼守秋天》[29]一文中，對英國貴族階級所表露出的那份“仰視”，似乎表示，他也會不經意間迷失一下自我。1621 年英國的羅伯特·伯頓在《憂鬱症的解剖》（Anatomy Of Melancholy）一書在英國出版，被貴族階級罵得狗血淋頭。書中對中國科舉取仕的制度大爲推崇，寫到：“這是一套完整的選拔人才制度，我主張英國借鑒中國的先進經驗。這個主張如果被接受，這些貴族就要喝西北風了。……顯貴來自事業上的成就，而不是由于出身的高尚。……憑自己的德才升上來的人——只有這些人才是顯貴，也就是被認爲可以治理國家的人”[23]。辛勤耕作的農民，廢寢忘食的科學家，頂風冒雪站崗的戰士，行色匆匆的工商界人士……，這些人顯然沒工夫像貴族那樣去矯飾自己的語言、服裝和步伐，他們身上的特殊氣質雖然沒有貴族般莊重，但更突出了一種生命的活力。而那些只可做花瓶的貴族對于中國社會，既不能代表最高的價值理想，也不能成爲時代的標簽，只能是些無聊的擺設，中國根本不需要他們。在英國貴族當中，雖然也間或冒出個“滑鐵盧英雄”，在歷史上更多地扮演了不勞而獲和享

樂主義的奢靡角色。而中國“貴族”即使要把國學好好研究一下，以便使自己像個有高尚教養的中國貴族也不容易，因爲，面對那麼多有文化的“賤民”，他們要讀更多中國浩瀚的文化典籍才行，而這會使一個人早生華髮，面容憔悴，并與貴族的外觀形象根本對立。因此，中國最近幾年出了一些想作貴族的人，把子女送往國外的貴族學校（這是世界上最無聊的父母，據可靠消息，某高層人士的小孫子甚至被送到大名鼎鼎的伊頓公學，希望他學成後最好別回來，如果讓他來治國，會比一不識字的農民還糟，因爲他不瞭解中國，且又故弄高貴），或經常炫耀一下自己的外語能力和對西方生活方式的瞭解和欣賞能力；很顯然，這比學習中華文化容易的多。幾天時間可以學會打高爾夫球，但這點時間連讀懂《紅樓夢》和《金瓶梅》的故事情節都不够。在中國作個地道貴族還真不容易。

身上的泥土要比燕尾服和文明杖更令人感到塌實和可靠，也更能體現出文明的活力。相信余秋雨教授不會爲中國無法“盜版”貴族而感缺憾。英國貴族是歷史的“闌尾”，如果不“發炎”的話，留之無礙；但對“闌尾”進行欣賞，則是滑稽的。如果某個英國貴族可敬、可愛，絕對不是因爲他是貴族。《憂鬱症的解刨》開了餘秋雨一個玩笑，使得《扼守秋天》和他的《十萬進士》[30]，怎麼看都像是一對矛盾。

當然，中國人在欣賞外域文明的時候，并非都是盲目的誇贊，更多地是基于不同而好奇，出于好奇而欣賞，這無疑是正常的，也是健康的。任何人都難于避免這種情趣，除非是天生的自戀狂和吹毛求疵癖。但必須搞清楚自己是在欣賞差別，還是在不加思考和對比地嚮往差別，甚至誘發對自己本身文化的排斥和自卑。筆者堅决反對像民國時期還留著大辮子的愛丁堡大學碩士辜鴻銘老先生對中國文化不分青紅皂白的辯護，但對全盤西化論者和中華文化虛無意識更嗤之以鼻。友人曾給筆者介紹一位法國留學歸來的美女，令筆者衝動不已；

但第一次的交談中她對法國生活方式表現出强烈的嚮往和傾慕，這沒什麼不對，但對中國人生活方式的嘲笑，徹底冷却了筆者的熱心。她沒有去瞭解一下法國人對“寧可食無肉，不可院無竹”的審美情趣是否體會。看來，一杯清茶、幾本雜書、一杯薄酒，再來一盤燒牛肉，更合在下的胃口。燭光紅酒無過，偶爾爲之，固然别有情趣，但畢竟不是生活的常態。

面對那麼多與我們完全不同的文化景觀，對于少有機會出國，或少有機會認識一下自己的中國人來說，精神的“出軌”幷不令人感到意外，就連一些敏銳的學者也難例外。關鍵是，您是否還能重新找回自己？當中國人丟弃了自己的標簽，或爲自己的文化身份感到自卑時，在這個弱肉强食的地球上，我們必將迷失自我，甚至是在自我埋葬；對“我是誰？”這樣的簡單問題，將難以找到答案。

哈佛的杜維明教授對中國人有個有趣的層次劃分：一、自然生命的中國人；二、社會習俗的中國人；三、文化意識的中國人。只要有中國血統的人，都符合第一類；懂得欣賞和加入中國民俗文化的人，則符合第二類中國人；但是只有經過自覺的反省而能够把中國的文化價值內化的才有資格達到第三類的境界[24]。海外“香蕉”華人當屬第一類，大部分海外華人屬第二類。那麼生活在中華文化發源地和大本營的中國大陸人，又能列入第幾類呢？很痛心，他們中的大多數，尤其是城市人和知識分子，由于他們缺乏對民俗文化的欣賞和加入，只能進入到第一至一點五的層次上，這未免有點令人寒心。

RICHARD LYNN 在他的《優生學再評價》一書中說：“在西方世界的中國威脅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爲那 13 億保守智慧的人民”。中國幾千年沉積的優秀文化精髓鑄造了智慧、勤勞、節儉、謙虛、保守的性觀念以及對家庭的忠實等一系列中華民族的優秀品質。如果我們放弃了這些而在開放中引進西方文明的糟粕，我們將是真正的失敗者。中國過去一百多年的落後挨打，幷非由于我們文化內核的

缺陷，而是長期中央王國地位帶來的政治惰性所使然。而發揚中華文化的優勢是我們重新站在世界前列的根本保證。那些對西化、個人主義和性解放的鼓吹，實際上是對中華民族的新鴉片麻醉，如不予以制止，將從根本上斷送中華民族的前途。看一下日本年輕一代在過去幾十年對西方的全方位吸收所帶來的變化就明白了。

有了對中華文化的信心，中華民族面對外來文明的衝擊時才不會茫然，才能真正做到虛懷若谷。謙虛從來都是以自信爲基礎的，而自卑只能導致輕狂。盛唐的出現，離不開統治階級和士大夫階層的智慧和信心，正是這種信心的存在，使得唐朝在接納八方來客，吸收异域文明方面，比任何朝代都寬容和積極。1840 年後，中國人遭受的外來文化的衝擊之大，爲前所未有。經過志士仁人的辛苦探索，民族求存的百年掙扎，我們總算走上了獨立和復興的道路。在人類的歷史上，有多少文明古國面對巨大外來衝擊而消亡，然而，中國再次跨過了民族發展史上最艱困的這段歲月，一個古老的民族不但沒有消亡，反而煥發了青春的活力，碩果僅存的古老文明再次成功經歷考驗。這是多麼令人自豪的。固然，中華民族的兒女們在過去的百年遭遇了太多的不幸和羞辱，但是，考察人類的發展史和中華文明的自身歷史，今日的中國人沒理由繼續抱有一份悲情或妄自菲薄，中華民族的强大生命力和適應力使我們有足够的理由滿懷信心，笑傲江湖。

面對新世紀的開端，中國人在物質的建設上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自信過。面對西方世界在過去千年的悲歌和新時代的困惑，久經歷練的中華文明將爲人類的新時代提供釋疑解惑的文化套餐。把中華文明撒播于世界，成爲人類新紀元的主要精神養份，是炎黃子孫的共同責任。擺在中國人面前的幷沒有其它更好的選擇：傳播中華文化的福音，重建中華文化的自信，熔鑄中華文明的强大精神。

附錄二　美國經濟學家對毛澤東及“文革”的看法

作者：梅森

本書作者董玉振按： 筆者在海外生活期間得以感受資本主義長期發展的成果，有直接的機會瞭解其它國家在過去幾十年的發展經歷和今日的尷尬結果，心中總有一個解不開的結：沒有拌稀泥似的革命和政治運動，中國社會的面貌會怎樣呢？在世界很多發展中國家，人們對貪污已習以爲常，社會的利益集團關係錯綜複雜，國家對經濟、社會各方面的調控能力虛弱等，貧民窟和富有階層同時存在，宗教和傳統文化習俗對社會的進步有强烈的抗拒。中國雖然政治上保守，但無論是中國人還是在華工作的外國人，普遍的感覺是：中國是個有充分自由和心態開放的社會，甚至超越日本。執政黨在反貪上始終有一種無形而巨大的壓力，對進步文化的接受抗拒較少，國家在發動民衆力量應付各種危機時得心應手，等。這裏面毫無疑問有中國優秀文化的作用，但毛澤東的革命和政治運動是否發揮了作用了呢？如果改革開放提前十幾年開始，即在“文革”前啓動後來改革的政策，結果真的會象今天這樣成功嗎？筆者在百思而難理清頭緒之際，却在網絡上發現了這篇文章，某些方面的思路非常新鮮，部分回答了筆者的疑問。附在此，以供參考。

對毛澤東的評價很大程度集中在對“文化大革命”功過的判斷上。啓發我對“文化大革命”的經濟學思考是這樣的：去年經濟史學

家 Doglas North （1993 年諾貝爾獎得主）來我在的學校作了一次演講。他把中世紀歐洲的經濟史和美國十九世紀經濟史扯到了一起，得出了和自文藝復興以來主流觀點完全相反的見解。North 的演講啓發我寫了一篇關于從經濟發展的角度理解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文章。由于文章結論和關于“文化大革命”的主流觀點相背，且又缺乏實證資料的支持，我一直沒有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而公開我的想法。從經濟史的角度，文章對“文化大革命”關于經濟制度轉換和社會結構功能的演變是這樣切入的（從歷史文化的評價另當別論）：

1）中國“文革”前出現九十年代後官僚和新貴結合的社會勢力將會減緩或窒息中國的現代化過程。

“文化大革命”前，中國的土地改革和“統購統銷”制度爲中國的工業化起步提供了穩定的農業剩餘。但是，在中國大陸的基本工業體系沒有建成之前，如果出現類似九十年代後官僚和新貴結合的社會勢力，這個穩定的農業剩餘很可能象巴西和印尼一樣，被官僚、警察、軍隊和經濟貴族網織的社會勢力鯨吞很大一塊，阻礙或打斷發展的過程（董玉振按：看一下自價格雙軌制以來，中國特權階層和利益集團之間勾結獲得特別利益，國企改革時一些人借機鯨吞國有資産，就該明白該論述的正確性）。極端情況下，中國將會象印度一樣，演化的上層勢力通過制度沿習完全擁有發展民族工業的珍貴農業剩餘，造成社會中窮的極窮，富的極富。永遠陷入三流國家而無法發展的陷阱。

中國的實績是，土改和統購統銷一方面爲中國從制度上彙聚了穩定的農業剩餘。另一方面，“三反”、“五反”、人民公社、“四清”運動和“文化大革命”從城鄉兩個完全相异的社會構造裏打掉了中國在工業化基礎建立之前出現鯨吞農業剩餘的寄生階層的可能。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國從根本上消滅了工業基礎建成之後出現任何權力和經濟新貴在制度上合法結合的土壤（董玉振按：“文革”前隨著三年困難時期的結束，中國部分中高層領導人及其家屬的特權

行爲有所抬頭）。農業剩餘有了，鯨吞農業剩餘的現代化絆脚石式的社會勢力不在。這就是中國今天成爲繼日本之後世界上第二個上億人口國家在二十多年長時間經濟騰飛的秘密。

2）中國“文革”後在九十年代出現了官僚和經濟新貴結合的社會勢力，但由于經濟起飛的基礎工業體系已經建成（董玉振按：參見本書第一章的論述），社會承受這種破壞現代化過程的能力加强。“文革”結束後，工業體系基本建成。鄧小平的開放政策使得中國的工業化過程加快，社會財富急劇增加。八十年代後期，經濟新貴和官僚權力在社會轉型期結合起來，借制度漏洞不公平地攫取新增財富（董玉振按：中國的新貴階層有多少是完全的合法經營，依法交稅？）。這種勢力在九十年代有加速擴大之勢。但是，由于農業在工業的支持下，爲全社會提供了穩定的糧食，城市發展也使絕大多數市民生活獲得改進。鯨吞新增社會財富的勢力在社會中引起動蕩，但沒有大到足以抑制現代化進程的程度。表明：工業化後出現鯨吞新增社會財富集團時，發展過程已走出童年期，免疫能力相較前一期要强。

3）九十年代新貴勢力劇增，特別是軍隊經商、警察違法、海關走私和基層中層幹部大面積結合貪污，威脅中國存亡的時候，中國平民階層在 1950-1980 三個十年的長足發展中已占社會的主流，累積了能够打倒這批新貴的社會綜合力量。江澤民、李鵬、朱熔基等制止軍隊經商等就是平民老百姓和中央地方正面力量占優勢地位的明證。如果中國沒有“三反”、“五反”到“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全社會趨向平民化的過程，九十年代的反貪很可能是印尼的樣子。同樣，巴西和印尼比中國大陸經濟早起飛二十年，他們的軍隊、警察和地方新貴勾結起來，盤根錯節，普通老百姓和中央的一批改革派幾乎無能力實行任何有意義的改革。兩國不僅經濟結構缺胳膊少腿，而且再行發展的經濟動力也不够。

這說明，中國在社會基本力量的分布上，已經是個平民階層主導

社會發展的格局。這是個現代化國家的政體，雖然她和西方現代化國家政體的表面構造不一樣。印尼、印度和巴西是傳統落後國家的政體，雖然她們在表面構造上和西方現代化國家的政體相同。中國土地改革到“文化大革命”的洪爐，化掉了社會中的傳統筋骨，使其在構造成份上達到了現代國家的比例（董玉振按：形象比喻，見地之論）。

“文化大革命”是快了些，委屈了一批人，尤其是不到全社會3%（董玉振按：此數據是在西方國家很流行的“文革”受害人數，既2、3千萬之多。實際數據分析請參閱本書第四章第三節）的教育、科技、影視和地方鄉紳。這是它的副作用。但“文化大革命”不僅在當時，即使在今天和明天也堵死了中國走回傳統社會力量分配格局的路，它偏向了中國普通老百姓。（董玉振按：西方學者在看待毛澤東時代時，并不拘泥于人權、民主等局部，他們在接受被誇大的毛澤東時期政治運動受害人數的情况下，却能從更宏觀視角看待毛澤東時代的全方位貢獻和對中國社會的深遠影響；相反，中國學者則拘泥于少數受害者的不幸，進而忽略那些對整個國家更具根本性的貢獻。）



1968 年，意大利米蘭群衆走上街頭支持毛澤東和中國文化大革命，標語上寫著“毛澤東的馬列主義哲學萬歲”

如果從這個意義上來理解“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是今天中國經濟長足發展的制度設計人，而不僅僅是開國元勛。（摘自：www.cmilitary.com，2001 年 7 月 16 日。没查到正式出版物来源，但部分代表笔者观点）

附錄三　從歷史的尺度看新中國的特色與成就

作者：何炳棣

本書作者董玉振按：該文是美國芝加哥大學歷史系旅美教授何炳棣根據“文革”期間在大陸的所見所聞，加上自己的學術分析而完成的。毫無疑問，對于一位在美國長期生活，受教育于民国时期的學者來說，共産黨要對其在考察大陸前進行洗腦是困難的。根據筆者對其中部分數據的考察，沒有發現明顯錯誤或有意誇大的成分。該文资料和結論具有相當高的信服力，故附錄在此。該文原載《七 O 年代》一九七四年三月號。

讀了這篇文章，筆者不禁感嘆：中國大陸那麼多的社會學家，且曾經歷過毛澤東時代，爲什麼拿不出這樣具有學術價值而又極具說服力的論文？這篇文章對大陸的觀察細緻和深入，一些大陸人忽視的社會變化，却沒有逃脫該文作者的眼睛。

一、人民的真正解放

“中國人民真正解放了”是今日中國最流行的口號之一。表面看來，凡是口號都或多或少地具有宣傳性。但從歷史觀點看來，這口號是無可否認的、空前的、嶄新的基本事實。從最早有文獻的商代起，

國王是世襲的，"國"是"王室"的擴大，國家的土地是國王的"産業"。商部落國家最大多數的成員，即卜辭和《尚書》"盤庚篇"中的"衆"，直接間接都是商王的隸屬，從事生産，擔負勞役兵役。周代疆土擴大了，不得不施行封建，土地和人民都屬于周天子和列國封君；因爲列國封君是由周天子所封，所以理論上"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經過春秋、戰國幾百年的巨變，秦、漢大一統帝國的出現，帝國制度延續到辛亥革命，共兩千一百多年。在這漫長的帝國時期，土地所有和賦役制度，人民在政治、法律、經濟、社會地位，各朝代之間都有些性質及程度上的不同，本文不必細論。但值得注意的是當西漢皇帝制度建立之際，民間稱皇帝爲"國家"。以縣吏成天子的劉邦，和以貧農成天子的朱元璋，祭祖時除犧牲菜饌之外，還陳列了賦役圖册。歷代少數君主，爲延續皇朝的生命，保持社會的安定，有時不得不采取些所謂"惠民"的治標措施。但無疑義地，兩千年來人民始終是田賦、勞役、兵役的對象，是被統治者、被剝削者、被鞭策者，決不是國家的主人。文顔博對宋神宗："殿下爲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一語道破了兩千年的基本史實。

即使歷代"起義"的領袖們，從秦漢之際的陳涉、吳廣直到晚清太平天國的洪秀全，基本政治社會觀念都是陳舊的。其中比較激進的，在起義初期雖多少有些原始均産的號召，但這些起義，或者失敗，或者將要成功時已經變了質。起義成功者，建立新皇朝，人民仍是被統治剝削的對象。太平天國的下級成員雖較富于"革命"思想，但洪秀全和其它主要諸王生活腐敗，"天朝田畝制度"大體都没有實行。辛亥革命，民國建立以後，直到一九四九年，不斷的內憂外患，軍閥割據下的窮征暴斂，國民政府二十二年當權期間史無前例的自私自利，使得人民的處境較若干前代更爲悲慘。國民黨當政以後，出賣了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利用江浙財閥與各省土豪劣紳共治天下，建立了多種近代型的經濟金融機構，以吸取民脂民膏。正因爲這些機構是近代型

的，所以吸取民脂膏的效率遠遠超過以前任何皇朝。這些基本史實已是中外無政黨背景的人士所一致公認，勿庸多論。

解放前人民真正的地位，可由我親身閱歷中得到最好的反映。我于一九四二年初，奔父喪，由昆明趕回浙江金華祖籍，再設法接濟天津的母妹，在淪陷區困居一年之久。次年三月中才自上海經徐州轉商丘，再從安徽亳縣往“無人之境”，重入自由區，在河南漯河鎮遇雨，暫時無法繼續內進。有一天午飯後在街上看見警察打人，打得很慘。我加以攔阻，對警察說，如果這人犯法，可以帶他去法院或縣政府以法審判，不應加以毒打。那警察毫不遲疑的向我大叫：“這些老百姓不揍，還揍誰？”我回答說我也是老百姓。他向我上下端詳一番，見我身穿已經露綫的蘇格蘭海立斯厚呢上衣和卡嘰布褲，瞪著眼回答：“你穿著西裝，還是老百姓！？”當時我雖不是第一次體會到老百姓處境的悲慘，但却是第一次充分體會到原來我這新型的“士大夫”，究竟還是屬于統治階級的最外圍。

兩千年個個皇朝都“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可是國民黨政權末期，極大多數的新型“士大夫”都被通貨膨帳弄得一貧如洗，朝不保夕了。一個絕對自私不顧一切剝削人民的政權，畢竟自行潰爛了，被人民摒弃了，無形中加速了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我這個後知後覺者，當時雖已身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專攻英國史和西歐史，也就在金元券、長春、淮海戰役之中，開始逐漸發現了“大我”。

中國人民解放的鬥爭，開始于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後半。這次鬥爭與前代起義的基本不同在領導與目標。前代多次起義領導的觀念與目標，都很陳舊，都是希望建立新皇朝。這次解放鬥爭的最高領導，不是貧下中農和工人，而是抱負大、眼光遠、毅力强、不自私、有理想、接受近代共產主義的高級知識分子。他們充分瞭解大多數被壓迫的人民是最大的革命潛力，發揮這龐大革命潛力要靠組織、思想教育、和積極行動。他們的目標，是徹底改造舊社會，建立一個以最大

多數貧苦人民爲主人的新社會。這次革命最初雖以蘇聯爲榜樣，但主要策略和步驟與前者很有不同。帝俄末期的共産黨最初并無革命武力和革命基地。最高領袖列寧是遲至一九一七年才被德國用專車秘密送回俄國的。十月革命成功的步驟是共産黨員乘帝俄歐戰潰敗疲倦不堪之際，滲入聖彼得堡和莫斯科兩京，吸取對現狀不滿駐扎兩京的若干沙皇軍隊單位，逼迫沙皇中央政府和臨時政府的崩潰，然後才把革命逐步推展到全國。而中國共産黨革命的“主流”，從一九二七年起即瞭解大都市之不足恃，即著眼于組織農民軍隊，建立農村革命基地。中國共産革命的理論動力雖是自外引進的共産主義，但革命的最高領導，自一九二七至今四十六年來，不斷地以理論與實踐互相印證，不斷地就國內外情勢因時因地制宜决策，將一個引進主義逐步變成了一個適合國情的革命建國綱領。在這個新的革命建國綱領之下，特别是經過了文化大革命，中國人民才第一次變成了國家的真正主人。

今日中國的人民，除了極少數反革命分子以外，憲法上都規定了同樣的權利，而且并無性别和民族的歧視。憲法上所規定的公民權的範疇與西方民主國家幾乎完全相同。政治方面包括選舉和被選舉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和宗教信仰的自由；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護，居住和遷徙的自由，以及控告違法失職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權利。此外，公民權還包括工作、教育醫藥、福利等權利。

但是，在實踐上，享受以上極爲廣泛的公民權有一先决條件——“個人”的言行和意識必須不反人民的利益與意志，而“人民”是極大多數貧下中農和工人。換言之，政府剝奪少數反革命、反無産階級專政的人們的政治權利。進一步分析，正因爲“個人”必須服從“人民”這個前提的存在，憲法上所規定的公民個人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自由也就有了局限性；爲了調劑各地區的人口與物資，爲了經濟建設，個人居住、選業、遷徙的自由往往也不免受了限制。

因此，西方自由主義者和海外傾慕自由主義的中國人總不免要批評新中國幷非真正民主，幷强調現代西方與今日中國的基本不同－－個人在集體社會中的地位和價值。我們先討論自由的問題，然後再檢討新中國是否民主。

近代西方政治及憲法理論上最基本的單元是個人，國家和社會集體不能侵犯個人的公民權利、尊嚴、政治信仰和言論，與在法律範疇以內的任何行動。在新中國的政治及憲法的理論上，個人雖也是國家和社會的最基本的小單元，但個人無法脫離社會階級而存在，屬于少數階級的個人，必須服從最大多數貧下中農和工人階級的意志。特別是從文化大革命以來，寓個人于人民的趨向日益顯著。

從純理論看來，今日的中國和西方誠然有基本的不同，但從實踐上看來，二者間性質和程度的不同遠不如一般想像爲甚。我們在比較當今中西政治觀念和制度的短長之前，必須要瞭解西方極端個人自由觀念產生的歷史背景，及其局限性。西方極端個人自由觀念萌芽于美、法革命之前，大起作用于此兩大革命之後。美、法革命深受十八世紀的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的影響。十八世紀的功利主義相信“自然秩序”(Natural order),相信每個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但社會的總利益和秩序却自然而然地會得到和諧。因此功利主義者主張國家和政府不應干涉個人的自由和一切經濟力量的自然發展，應采取放任(laissez-faire)的主義和政策。

不消說，這本是過于天真樂觀，决經不起歷史考驗的一種看法。即使西方資本主義經典派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一七七六出版的《原富》之中，已部分地指出，個人與個人之間、社團與社團之間，往往存在著利害上的矛盾與衝突。英國工党的“精神祖父”邊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雖系功利主義之集大成者，進一步强調指出各階級間利益往往衝突，調整這些衝突的機構應該是議會，議會立法應該根據他所提出的基本原則－－“最大多數的最大幸

福。”他這主張，經過十九世紀晚期費邊(Fabian)社會主義者的發揚，勞工運動和組織的日漸發達，和工党的正式成立、競選、幾度當政，就成了英國型“社會福利”國家的理論基石。西歐、北歐和英聯邦中若干國家大致也走了這條歷史路綫，因此逐漸以“社會福利立法”彌補資本主義社會的種種不公道和不平等。

事實上，這些西方民主國家和新中國的社會立法，基本上有很大的共同點，二者是不謀而合地根據“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這一原則。即以理論淵源而論，早期的馬克思，也是深受邊沁影響的。惟其如此，所以無論在西方或在中國，隨著經濟生產和社會組織的日趨複雜，社會(也就是嚴複譯成的“群”)的“權界”日益擴大，個人(嚴譯的“己”)的“權界”日益縮小。即使在民主的西方，個人的淨餘“權界”，在生活實踐上已與憲法及政治理論上的個人“權界”發生了相當大的差距。

今日西方和中國對于個人“權界”還是有一些差距。這差距的存在是因爲歷史傳統和歷史發展程序的不同。英國和西北歐若干國家有代議制度的傳統，社會福利立法是歷經代表多數選民的政黨在議會裏長期鬥爭的成果；其歷史發展程序是漸進的，不是經過革命的。因此，這些國家大體上允許個人信仰和言論的自由和理論上(但決不是實際政治行動上)激烈政黨的存在。帝俄和解放前的中國，人民受統治階級種種的壓迫與剝削，人民生命財產沒有充分法律保障，更沒有代議制度的傳統，從立法上逐步改善人民福利的道路根本不存在，解放人民的唯一道路是革命。革命的初步目的既是建立無産階級專政，革命成功之後，當然無法允許殘餘反革命勢力的復辟。因此，在新中國“個人”的“權界”，在理論和實踐上，確是多少受了“寓個人于人民”的局限。

客觀評估新中國人民的實際地位和檢討新中國是否民主，我們決不可忽視與自由具有同等重要、甚至比自由更爲重要的因素——平等。根據我個人對西洋史的粗淺認識，我把民主分爲“初級”和“高級”

兩個階段。“初級”的民主，一般僅做到以憲法保障個人的自由，較“高級”的民主，才考慮如何逐步減少社會各階級間因貧富懸殊而引起的種種不平等。很顯然，即使在所謂“高級”民主的英、美等國，雖已有了一些社會福利立法，嚴重的社會不平等依然存在。美國最近出版了兩部對平等問題理論上頗有啓示的新書。一部是我芝加哥大學同事、人類系教授費樂思(Lloyd Fallers)的《不平等》(Inequality: Social Stratification Reconsidered)，他根據多年對非洲若干原始及近代型社會的調查研究，并與當今美國社會對比，得到一個綜合的結論——一般西方社會學上所謂的“社會階層化”，不過是以成套的術語掩飾社會階級間種種真實的不平等。這是打破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學虛僞的一針見血之言，對我們探索社會公道和民主真諦甚爲有用。另一部是哈佛大學政治系教授羅爾斯(John Rawls)討論社會公道理論的新著《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他雖囿于美國傳統中對個人自由的極端重視，并坦白承認社會階級間的不平等無法徹底消除，但主張國家法令措施應以促進社會上最窮階級的福利爲原則。他這一主張仍不超過邊沁理論的範疇。所不同者，邊沁生時，任何國家最大多數的人民都是窮因的農民和工人；而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資本主義最發達的美國，最大多數的人民已經屬于“中産”階級，而最窮困的人民，已經變成少數了。他對邊沁基本原則因時制宜的修正，值得我們采用，作爲進一步探索社會公道和民主真締的共同分母。

不用多說，凡是沒有政治偏見，訪問過新中國的中外人士，都不得不承認，文化大革命以來，中國一切法令措施幾無一不以貧下中農和工人的福利爲準繩，無一不暗合較羅爾斯的立法標準。與其它國家和社會比較，新中國的人民生活方式，更接近真正的平等。誠然，國內薪酬還有高低幾級的存在，而且一個近代複雜的社會，不能沒有精細的社會分工。但薪酬等級雖仍存在，各級薪酬和收入之間的絕對數量差別，事實上已遠較資本主義社會、蘇聯和其它東歐社會主義社會

爲小。而且新中國的薪級差別今後會逐漸縮小。更重要的是領導幹部（用陳舊的術語是"統治者"）和工作成員（"被統治者"）之間的關係非常密切，彼此平時互相砥勵，必要時互相批判，而且幹部一般都以身作則參加勞動生產，生活方式與勞動群衆相同。美國、西歐、戰後日本等資本主義社會貧富階級層間生活方式之懸殊，勿庸贅述。即使在蘇聯，勞動人民和擬定執行生產計劃的各級"官僚"幹部之間，還是有很大的隔閡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六十年代中，美國若干科學家會講出真實的笑話：在國際多種科學會議的場合，蘇聯科學家閑談時，往往提到他們的薪酬相當都市工人薪酬二十倍以上，甚至很自豪地顯露他們在黑海克裏米亞半島有別墅。無可否認，新中國社會裏，平等的成分較舉世任何其它社會爲高。

在窮索民主真諦時，我個人覺得還須應用前此未曾被人提到過的第三尺度——從日常生活上權衡比較今日中國與西方人民"當家作主"的程度。無論在何國家，人民與政府最高決策的關係，都是很間接的，所以人民是否當家作主非從最基層單位中去探索不可。西方和日本等資本主義社會中，種種小規模獨立經營者雖仍存在，大多數人民都是大小企業和各種機關的雇員，雇員當然不是主人，理論上，只有在一切生產工具都屬于人民的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才能作主人。但在蘇聯及東歐，生產計劃之擬定與執行自上層層而下，一般人民在基層單位中是處于被動的。惟有在新中國，人民在基層單位中充分表現出主人的地位。以占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而論，最基層的單位是生產隊。在生產隊中，每個成員都參加草擬全隊的預算和生產計劃，計算工分，攤派收入，決定公積金和再提交的合理分配。負責人和成員之間關係平等、直接、親切。通過負責人，生產隊對生產大隊以及更大的公社的生產及分配都能參加商討。十九世紀前半，西歐有些烏托邦社會主義者，曾極小規模地作過類似的試驗，但因整個社會未變，都失敗了。新中國六億農民如此當家作主，確是人類史上嶄新

的一頁。

結束本節：我們必須强調化學式百分之百純粹美備的民主制度，人類史上至今尚未出現，也許永不會出現。我們用個人自由和社會平等兩個尺度衡量中西理論與實踐之後，不得不承認西方先進國家比新中國尊重個人的自由，但還做不到新中國社會平等的地步。中西社會制度互有短長，是由于歷史傳統和歷史發展程序的不同。片面地褒此抑彼，不顧歷史背景，專唱人類還未出現過的"理想國"的高調，都不免有失公道。我們如再用社會基層單位中人民當家的程度作爲第三尺度來衡量，天平顯然要倒到新中國這邊。"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乍看似宣傳，窮索是事實。惟有抓住這個基本事實，才能瞭解新中國其它的主要特色和成就。

二、組織能力與思想教育

歷代盛衰興亡關鍵無一不在于廣義的國家組織能力。傳統中國悠久歷史之中，戰國、秦、西漢這段時期國家組織能力最强。西漢以後，層層自上而下的國家組織之中往往發生不少阻力，削弱了國家組織能力。在內憂頻仍外患空前的二十世紀前半，誠如中山先生所說，諾大的中華民族已像"一盤散沙"。新中國却能在短期之內，將一盤散沙般的民族轉變成空前富于組織能力的國家。爲加深瞭解新中國組織能力的革命，先扼要將古今作一對比。中華民族在戰國期間已開始表現高度組織能力，大體上由于兩個主因。一、戰國期間主要七國之間生存競爭非常激烈，逼使各國非力求富强之道不可。富國强兵之道，幷非高談"仁義"的儒家所能把握，而是幾派法家的專長。法家的最終目的是造成絕對君權，在當時也就是絕對的國家權力。法家雖不否認社會

上尊卑貴賤的存在，但主張在君主一人之下，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消除春秋式貴族特權階級，建立以個人才幹爲標準的官僚制度，推行郡縣制，逐步走向一元化集權國家的方向。二、爲了生存競爭力求富强，法家瞭解農民的重要，因此把農民解放爲自耕農，增加農產，擴充兵源，逐漸變成以農、戰爲本的軍國主義的國家。法家是爲絕對君權服務，幷不是爲農民服務，只是爲了增强君權才不得不解放農民。新被解放的自耕農雖是擔負賦役的被剝削者，但身份權利畢竟遠勝于農奴，而且從力農和戰功還有上升爲統治階級的機會，因此廣大的農民多少發揮了些積極作用。

秦行商鞅之法，百五十年間改革比其它六國徹底，最後征服六國，建立了統一帝國的基礎。劉邦攻下咸陽，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禦史律令圖書藏之"，可見西漢一承秦制。漢武初年雖崇儒罷黜百家，西漢政制本質，由一代政治天才漢宣帝（公元前 73－49 年）數語道破：

"（元帝爲太子時）……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史，以刑名繩下，……嘗侍燕，從容曰：'陛下持法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史實，不知所守，何路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漢宣帝這席話非常深刻坦白。一、他强調指明西漢的政制仍是根據自戰國、秦以來的法家系統。在法家循名核實的原則下，全部龐大複雜的國家機構——自丞相、禦吏大夫、中央官吏，經郡守、縣令長，以至縣以下的鄉、亭、裏、伍、聚落——尚能得到合理的推動。西漢郡守權重責專，也是行政效率較高的一個原因。二、漢宣帝確是鋭利靈驗的預言家，西漢之開始衰亡，正由于元（公元前 48－33 年）、成（公元前 32－7 年）諸帝盲目崇儒的種種惡果。

經過元、成和東漢的開國，儒家成了長期的正統政術。儒家重"禮"

實在是維持不平等階級社會的理論工具，與法家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原則恰恰相反。東漢開國的君主劉秀，本人就是南陽的大地主，他建立皇朝時依靠不少其它地區豪族的擁護。儒家的主張正適合東漢皇朝的需要，成爲辯護豪族私利的理想理論工具。東漢最重孝道。二百年間雖不乏篤行的孝子，但孝道也成爲豪族、士大夫自私行爲的掩飾品。各地豪族魚肉鄉里、抗避國家賦稅固不可謂"忠"，但侵吞小民田産，略略周濟貧乏族人，在當時士大夫操縱的"清議"之下，却往往被認爲是廣義的"孝"。此外，漢武帝時臨時監察性的十三部刺史，在東漢已漸形成爲超級的大"省"。州牧往往出身于世家豪族。因此從東漢後期起，國家的組織能力，受到地方政權和社會豪族雙重的阻力，終于演變成三國割據的局面。在以後的朝代，這兩種阻力或不同程度地繼續存在，或阻力形式有所改變，但無疑義地，國家組織能力都被各種阻力所削弱。

最後分析起來，影響國家組織能力最基本的因素是人民是否有積極性。在廣土衆民的中國（公元後 2 年人口已經六千萬），自皇帝到庶民層層複雜的國家機構，如果不靠人民積極的所作所爲，是不可能充分發揮組織能力的。在以法家爲政術的六國和秦，各國君主爲競爭圖存，不得不解放農奴，保障自耕農的利益，所以農民多少有些積極性。秦始皇大一統之局既成，列國間生存競爭的壓迫已不存在，好大喜功，不再體恤民力，以致覆亡。西漢雖承秦制，不時抑制豪强，但始終無法阻止土地的兼幷和貧農的流離。東漢以降，直至解放，雖不無政治上和社會上安定的時期，但人民始終處于被動的地位。人民消極的抵抗是逃避賦役，積極的抵抗是參加農民起義。因爲種種政治和社會上的阻力，長期人民消極或積極的抵抗，兩千年來，華北一再陷于五胡、遼、金，全部中國兩度征服于元、清，幷幾番演出了地方割據。即使在一統局面之下，人民的被動性也嚴重地影響了國家的組織能力。

二十世紀前半的中國，承繼了自清初以來，因人口爆炸而產生的種種空前的社會經濟困難，自清末督撫專權兵爲將有所引進的多種政軍弊端，幷面臨曠古未有的民族生存危機——西方及日本帝國主義的榨取鯨吞。當時救國主張雖多，回顧起來，惟有中國共產黨深刻瞭解自上層改革的無效，帝國主義控制下的幾個大都市的不足恃，真正救亡圖存的辦法是到落後的農村解放人民，建立革命基地，從基層發揮人民積極的組織力量。正因爲共產革命的領導堅信救亡必先救民，而領導方面自始即與民衆同甘共苦，所以解放以後，特別是經過文化大革命，政府一切措施無一不根據最大多數最貧苦人民的意願與福利，政府的目的是建立一個史無前例的平等的社會。在這新社會的基層中，人民確是主人，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新中國無疑義地是世界上組織最嚴密的國家之一。上自中央政府，中經省、市、自治區、縣，下至城市裏的街道鄰里，鄉村裏的生產隊，無一不包括在組織網之內。就純理論而言，有兩點值得分析。一、僅有組織，未必能充分發揮組織力量，古今中外實例甚多，不勝枚舉。二、新中國嚴密的組織網中，是否還有削弱組織的阻力。事實上，文化大革命以來，以上兩個問題在實踐上都已不存在。基本原因是今日的中國不是專靠形式上的組織，而是特別注重政治、社會上每個階層之中，各種階層之間，不斷地搞思想教育、討論路綫問題。思想路綫教育的結果，不但使組織上可能的阻力不能存在，而且激發組織成員的工作積極性。這是文化革命以後的中國的最主要的特色之一。

誠然，古今中外當權者無不瞭解廣義思想教育的重要。傳統中國和傳統歐洲都施行愚民政策，都曾有多次程度不同的思想統制。即使在最尊重個人自由的近代西方，每個人從幼到老，不知不覺地都被政府、教會、學校、社團、家庭等等不斷地洗腦；進一步分析，國家及社會大小單元用以洗一般人民的腦的價值觀念和行爲規範幾無不源出于廣義的統治階級。洗腦决不是新中國的專利。但新中國敢誠實地

把思想教育叫作洗腦，而且思想教育的方法備極周至，收效獨宏。傳統中國和古今西方的思想教育都是像孔子所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只有新中國的思想教育是："民不可使由之，必先使知之。"換言之，新中國思想教育的目的，是從反復討論分析之中，使每個成員都發現他的"大我"，洗滌了他過去可能有過的自私觀念，然後徹底檢討有關措施的理論與實踐，是否真正符合國家和最大多數人民的意志與利益。因此，這種史無前列的思想教育才能提高人民的政治覺悟，發揮人民積極的組織能力。

歷史工作者在此應該順便提出新中國與前代還有一重要不同之點。歷代政制積弊之一是帝王居于深宮，官官層層相護，往往上方命令不能認真執行，民間疾苦也無由上聞。新中國有全國性嚴密的傳播組織，報紙、期刊、廣播經常向民衆申析最高領導的政策與意旨，報告各地建設、政情和民隱。成千成萬的大字報更是人民主動發表意見的特殊媒介。凡此諸端無一不促進上令下申，民情上達，更增强八億人民戮力同心建國的意願和信念。

綜合古今，新中國之所以最重視思想教育，似與我國源遠流長的理性與人本主義的傳統有關。早在史前和商代，宗教的重心已經不是正統的神，而是廣義的"人"。解放後各地區發現的史前陶且（祖）和石且，且的字的源，和商代的祖先崇拜，都是明證。至晚在商、周之際，理性和人本主義的思想已經萌芽。周初的政治家雖表面上談"天命"，實際上不但對"天"的權威表示懷疑，而且强調國家的興亡基本上是靠人民的意志和努力。周初文獻和金文例證甚多，茲不贅。即使祖先崇拜，經過了孔子和荀子的理性化，大體上已變成爲了滿足人類心理和社會需要的一種儀式，脫離了正統宗教的性質。這理性和人本的傳統，經過南北朝和隋唐期間與佛教的鬥爭，不但取得了最後的勝利，間接地使近代中國種種改革和革命運動都無須與"上帝"搏鬥，（人類史上，宗教一向是籍"上帝"的權威反對任何開明改革和社會革命

的。即使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革命，都不免暗遭宗教的頑抗。）儘管儒家的政治和社會哲學爲歷代帝王所利用，它對人本主義的發揚傳播，對社會環境和教育力量的極端重視，至今還有普遍的影響。新中國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不但把傳統上爲製造士大夫的教育變成了爲人民服務的教育，幷且從幾十年寶貴的實踐經驗之中，把思想教育方法改得周至美備。因此充分激發了人民和國家的組織能力。新中國思想教育的核心－－以人民的意志與努力改造人類社會－－既不能說沒有深遠的歷史淵源，又不能不認爲是“古爲今用”最輝煌成果之一。

三、民族“武德”的重現

人類史大部分都是殘酷無情的生存鬥爭史。缺乏尚武精神的民族是無法長期獨立生存不被异族征服控制的。軍事在國史中，尤居關鍵地位。春秋時代的軍隊大體上爲各國貴族所包辦，戰爭規模比較大，軍隊下層也包括當時所謂的“國人”，也就是庶民裏最上層的自由民。春秋的軍隊既以貴族爲主要成員，所以當時風氣皆以當兵爲榮，士兵一般也遵守武士的行爲規範。據我閱覽所及，春秋時期對“武”或“武德”解說最詳的是楚莊王。他在公元前五九七年悖之戰敗晋複霸之時，曾提出“武”的字義是“止戈”，幷說明“武”的廣義作用：“武、禁暴、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證以史實，楚莊王所謳歌的是高度理想化的“武德”，在傳統中國從來沒有完全實現過。

傳統中國最健全的尚武時代是戰國。列國之間戰爭規模日益擴大，生存競爭日益激烈。因此，各國不得不解放農奴爲自耕農，實行普遍的徵兵制。秦國自商鞅變法以後，人民尤其肯當兵，爲國家盡責，藉農、戰以求仕進。秦漢一統之局既定之後，徵兵的原則仍然存在，可是有資産的人們已經不必親身服軍役，可以出錢雇人代替。西漢有

戰爭時，已一再發遣“亡人”（流民）、“贅婿”、“賈人”、“死囚”、“惡少年”和投附的外族人從軍。但西漢繼戰國秦皇之餘烈，并幸而西北沿邊諸郡一向尚武的“良家子”之中，産生不少像李廣等的將才，所以還能以軍事和外交解决了匈奴的威脅，并在西域（即今新疆和俄屬中亞之一部）建立了一大帝國。

東漢光武帝廢内地郡國兵，又廢了更戍（徵兵）制以後，兵的品質，每況愈下。班超（公元 31－101）在西域的豐功偉業，全憑他過人的膽識機智和以夷制夷的策略。東漢時期，漢族的人一般都已不願當兵，也不能當兵。兵源大多仰仗内附的外族，早已種下五胡亂華的根苗。不僅如此，地方政權和豪族的興起也就是部曲私兵的開端，這一現象，往魏、晋、南北朝更爲普遍。西魏、北周到盛唐百餘年間，半徵兵式的府兵制度雖曾發生過一些積極作用，但在沉重賦役擔負和將弁剥削之下，府兵制内的士兵，至晚從武后時起，已經大批逃亡。使得玄宗不得不廢府兵而采取募兵制。杜甫的“新豐折臂翁”就是府兵末期士兵生活悲慘力求避役的寫實。

安史亂後，藩鎮割據，各養私兵。唐末、五代、以至北宋，將領防止兵士逃亡，往往在兵士面上刺字，使士兵們畢生戴上社會賤民的烙印。明初衛所制度略仿府兵餘意，寓兵于農。二百余萬平民一被列入軍籍，法律上子孫永無脱籍機會。自十五世紀二十年代起，清查軍籍的法令雖多，兵士逃籍的也越來越多。中葉北疆海防吃緊，正規軍嚴重缺額，幾乎全不可用，明皇朝不得不靠各將領自行組織的多種“民兵”。此後兵驕將悍，弊端從生，清代八旗兵士，入關未兩三世，已習于安逸，坐吃山空，靠皇室周濟。漢人組成的緑營，兵士類皆各地土著，以當兵爲世業，自始即操練與應役不分，號衣之外，另有應差衣帽。至晚從乾隆末年起，緑營兵士的地位比近代的勤務兵還不如，無异將弁的僮僕。“好男不當兵”一諺，實是傳統中國兵士品質低劣、身份卑賤積累史實的結晶。

國民政府軍隊的品質，抗戰以前稍有提高，抗戰後期日趨低劣。我于一九四三年春自淪陷區返昆明，五月初過貴州，在盤縣歇夜。山頂上只有一家小飯鋪，內中只有兩張圓桌，被一班兵占用吃飯。某兵士狼吞虎咽了一碗夾沙米飯之後，去搶盛第二碗時，被班長拳打脚踢，幾分鐘後才勉强爬起。當時國民政府規定士兵每人每日領生米二十二兩半，何以晚飯盛第二碗就要被毒打？因爲軍官層層扣糧中飽。抗戰最後兩年，在西南各處不時見到脚戴鐵煉長串踉蹌的活骷髏——國民政府拉去補充兵源的"壯丁"！這些都是衆目共睹鐵的事實。

兩千年來，中國屢次部分地或全部地被异族征服，近百餘年來飽受西方和日本帝國主義的欺淩，都是"武德"淪喪的後果。但正值民族面臨曠古未有的生死鬥爭期間，久已淪喪的"武德"開始復興了——孕育于江西的紅軍和陝北的八路軍，成熟于中國人民解放軍。

解放軍是人類史上從來沒有的真正爲人民服務的軍隊。除了保衛國家、駐扎國防重地、維持治安以外，解放軍經常與人民幷肩從事經濟建設和政治教育工作。解放軍的宣傳部組對政治教育、民衆娛樂的貢獻，不亞于其它黨政機構和學校。解放軍往往領先擔起建國過程中最艱巨的工作，首先響應醫藥衛生深入農村的號召，就是一例。瀋陽解放軍醫療隊成員，不避生命危險成功地試驗了以針灸治療聾啞的技術，然後再推廣到全國。廣州聾啞學校學生朗誦的歌："解放軍、親又親，軍民團結魚水情，爲了治療聾啞病，不畏風險來練針"，句句都是寫實。

不止如此，新中國社會裏，青年男女幾乎無一不以入解放軍爲極大的光榮、極可貴的資産。解放軍人數在三百萬以下，請求入伍的太多，非有最好工作表現和高度政治覺醒的，很難入選。入選之後，當地整個的居住或工作單位認爲是集體的光榮，往往舉行慶祝。這種彌遍全國地對軍人的高度尊敬，是我一九七一年秋從南到北親自考察訪談所得的印象，此外，新中國還有千萬以上的男女民兵，工作之暇，

經常操練，以保衛國家促進生產爲己任。近年間民兵的組織已推廣到邊疆地區的少數兄弟民族。（比較起來，蘇聯何以不敢使烏克蘭人組織民兵，臺灣雙十和元旦的軍事檢閱何以不敢發給兵士實彈，都是耐人尋味的問題。）

誠然，林彪事件發生之後，西方不少的"中國通"曾揣測今後解放軍將領陰謀政變的可能性。這類揣測是極膚淺而錯誤的。一，他們不瞭解制度上解放軍自上到下與黨、政、群衆層層地密切結合、相互制衡，將領中即使有陰謀家，陰謀也無法實現。二，解放軍自始即嚴格遵守黨的控制，黨對軍的控制，今後只有更爲周密。三，軍政方面最基本的安定力量是每個現任和退伍軍人的高度政治覺醒。長期思想教育的結果，使得每個軍人都公忠體國，能辯是非。最高領導，自解放軍草創伊始之際，即深刻瞭解歷代軍政的積弊，因此有關的組織與教育，無一不爲了根本防止軍人的跋扈。解放軍絕對不許有勤務兵，就是當初建軍籌劃極富遠見的實例之一。（相反而又有趣的是美國至今日才發覺勤務兵是軍制中積重難改的主要弊端！）

綜合古今，楚莊王所謳歌的"武德"，在兩千六百年中小部分實現過，但大體不過是崇高的理想。可是在今日的中國，這崇高的"武德"確是無可否認的事實。一個"武德"長期淪喪的文化，必有因"重文"而產生的幾種民族劣根性：自私、因循、苟且、膽小、推諉、欺詐、經營、只保身家、不顧公益、欺軟怕硬、懼外媚洋等等惡習。新中國崇高"武德"的出現，不啻是民族的一服强烈清泄劑。魯迅先生九泉有知，想也會推開《阿Q正傳》對著這朝氣勃勃、頂天立地、勤朴武健的新社會拈須稱許了！

結束本節之前，我們必須要瞭解"武德"與黷武主義的迥然不同。從歷史的觀點看，近代中國受西方列强和日本的欺凌已到忍無可忍的階段，愛國運動、民族主義才發軔；共産革命成功之後，"武德"才在國內普遍出現。"武德"是民族長期救亡圖存鬥爭中的副産品，其性質

與納粹德國和二次大戰結束以前的日本的黷武主義恰恰相反。中華民族和最高領導的集體智慧，與對歷史教訓的深刻認識，決不允許新中國走向變相帝國主義的“超級大國”的道路。新中國建設所需技術物資雖遠不能完全自給自足，但對很多國際盟友都盡力予以經濟和技術的援助。新中國是否真尊重新國際平等的原則，是否是黷武的國家，現任巴基斯坦駐美大使可汗(Sultan Mohammad Khan)先生的談話，就是最好的答覆。他在一九七三年五月十五日應芝加哥大學政策研究中心的邀請，晚宴後講巴國的國際關係和外交政策。講完討論之中，好幾位芝大同事反復探問美國援巴是否有秘密條件。我最後問他中國援巴的問題。可汗大使的答覆很長。他首先指出他曾任駐華大使，對中巴關係很熟悉。如以國家全國經濟能力作分母，中國多年來給予巴國的經濟援助比例上遠較美援爲多。他繼續誠懇地說，巴國政府和人民對中國的印象一向最好，原因之一，正是中國援巴始終毫無條件。他還記得曾經當面問過周恩來總理，巴國應該怎樣處理中國的經濟援助，周總理毫不遲疑地回答：“這是貴國自己的事，中國完全不過問。”我的美國同事和校外來賓，聽了之後，爲之動容，似乎還相當慚愧。

最後分析起來，“武德”的出現與人民的解放有牢不可分的關係。“武德”不僅是新中國受世界尊敬的主因之一，而且對于中華民族的性格已經起了革命性的滌清作用。

四、經濟建設成就舉要

近三年來。中外訪華人士和團體對新中國各方面的成就已有不少報道。這些報道大體上對新中國的社會改革、福利措施、婦女保健、兒童教養、醫藥衛生等方面的進步，都有比較一致的意見；但是對經濟建設的成就與展望，意見上有程度不同的分歧。因此，本節所論新

中國的成就，以經濟方面爲限。

我以治史者的眼光，對新中國經濟建設的成就和展望，具有相當客觀的樂觀看法。這是因爲我深信今日的中國具有曠古地未有的人力、物資、技術、精神總動員的能力。讓我們先列舉近年一系列經濟的成就——二萬萬市畝以上的新耕地的開闢；各地區極廣義的水利建設（包括地下水的利用）；不少西北半乾旱區破碎山谷地的改成梯田；內蒙等草原地區的部分水利化和畜牧業的較速發展；全國性的平整地貌的工作；大規模的植林綠化運動；海河流域及其它地區鹽鹼地的逐步灌疏改善；各種糧食及草棉種籽的科學培育；糧食和工業作物搶地矛盾的逐漸解决；復種、間種係數的不斷提高；按照各地不同的自然條件，農、林、牧、茶、絲、竹、藥材、鮮幹各果、各種"山貨"的全盤綜合利用和生産；真正科學農業的開端；兩條腿走路政策之下，舉國各地大中小型化肥工業的迅速發展；輕工業消費品種類、質地、供應的不斷提高；新興各種人造纖維及塑料工業堅固基礎的奠定；中央和地方所辦萬萬千千輕工業企業向國家所繳的利潤的驚人加速地增加；近兩年來國家對礦冶設備工業异常巨額投資以爲鋼鐵工業加速"起飛"的準備；煤、鐵、鋼、大型複雜機器、大小農業機械等工業的品質、種類與數量的進步；特別是石油生産和各種石油化學工業的突飛猛進，等等——基本上無一不靠全國各民族人力、物資——技術和精神的總動員。以上所舉的各項進步，有些在遼遠的邊疆地帶，新疆、青海和西藏都已開始出現了。

除了一九五八年至五九年的統計數字有些紊亂了以外，中國政府多年來對統計數字都非常謹慎，很少發表全面性的數字。這給予海外關懷祖國的炎黃子孫很大不便。據我個人粗淺的揣測，一九七三年的糧食總産量應在二萬萬六千萬噸左右（不包括大豆和油料作物）。如果這估計不太錯誤，中國無疑義地達到了食糧自給和各地合理的儲糧備荒（八億人，食糧平均每人六百五十斤左右）。小麥和少量大豆的

入口，僅抵全國糧食總生產的百分之二，但同時中國還要輸出大體相抵數量的稻米供應和接濟亞非的盟邦。我國薯類，尤以甜薯，產量居世界之冠，可充副食飼料。除稻米外，我國他種糧食作物每畝產量仍遠不及美國水準。所以糧食生產的潛力還很大，要等到化肥能充分供應時，才能發揮。農業的前景是决不悲觀的。

最使我們欣慰的，是一窮二白的中國由事實證明確有積累建國資金的能力。理論和事實上，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都不斷地替國家積累資金。相形之下，自解放以來，輕工業在比例上替國家積累的資金最快最多。主要原因是中、小型輕工業創建時所需成本較少，建廠需時較短，出貨快，所出的貨品多是人民日常必需的，所以在市場上無不暢銷，利潤多而且快。利潤一部分上繳國家，一部分自留用于再投資，擴充設備，甚至改變企業原來的性質與範圍。中央大型輕工業企業也起同樣的作用。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人民日報》曾有概括性的報告："由于生產發展，今年（一九七三年）全國輕工業系統上繳國家的積累，比去年增加百分之十左右。這筆資金用于建設，可以開發十幾個大慶油田或建設七十座南京長江大橋。"僅就上海一市而言，"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二年，全市輕工業企業給國家上繳的利潤，等于同時期國家給上海輕工業企業投資的四十六倍。"從我一九七一年秋在中國六大都市城鄉若干工廠的訪問視察的經驗，我覺得《人民日報》這種綜述决不是誇張的，而是真確的。

我一九七一年冬返美之後，在芝加哥大學政策研究中心，曾對新中國的印象作一演講。講後第一個發言人是前任社會科學院院長約翰孫教授(D. Gale Johnson)，一位著名的農業經濟學家，幷對蘇聯及東歐經濟很有研究。他說新中國經濟政策的成功，有二主因：一，定價制度合理，適合國情。二，計劃執行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有密切的聯繫，所以消費品的品質爲消費者所歡迎，因此暢銷，國家得到合理巨額的利潤。這是與我所講大體相符的。他進一步幽默地把蘇聯和東歐

的經濟政策叫做"空架子"的政策。意思是，蘇聯等國的計劃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有一鴻溝，前者一般都是"官僚"不管人民實際的需要和好尚。偶而消費品質地較好較合用時，人民搶購一空。但大部消費品都不合用，所以賣不掉，遲早也非從架子上取下不可。總之，架子上多半是空的。我回想三幾年前，蘇聯百貨公司裏確有若干百萬雙皮鞋很少人買的真實笑話。英國劍橋大學著名前輩經濟學家魯濱孫夫人(Mrs. Joan Robinson)，曾幾度訪華，也强調指出過中國經濟制度的主要優點之一，是消費者有權參加生產計劃的討論與擬定。可見這類獨立、深刻的經濟分析和本文第一節中所討論中國人民在基層中當家一點，是完全符合事實的。

我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下旬啓程返美時，已開始體會到中國的經濟已經有了向上的螺旋運動。因爲農業達到自足而稍有餘，供給輕工業所需多種原料便會刺激輕工業的加速發展；輕工業就會加速替國家積累資金；國家就可以大量投資在重工業的某些部門；重工業若干部門進一步發展之後，不但也積累資金，而且還能刺激輕工業和農業更高的發展。這不是平面的周而復始，而是向上的螺旋運動。經過兩年將半的考慮，我更相信我原來的看法大致不錯。但是，這不是說農業和輕、重工業三大部門之間，每大部門本身之內的無數小部門，在同一時期發展都能平衡。相反地，各大部門之內，三大部門之間，發展照例幷不平衡，有多有少，有快有慢。但較長時期看來，不平衡之中能有短期的平衡，而總趨勢是隨著螺旋繼續向上轉動的。

在重要經濟部門之中，數量上發展較慢的是鋼鐵工業。一九七二年產量達二千三百萬噸，居世界第七位。主要原因不是缺乏原料，似乎部分是由于資本，部分是由于此種重工業性質程序的複雜。中國煤藏之富，僅亞于美、蘇，而且極大部分的煤都是"硬煤"，也就是美國所謂的"乾淨煤"。近年證明煤藏絕不限于華北，華南西南都有。鐵礦之大者在鞍山一帶，首都西北、包頭附近，大冶的礦藏遠較數十年前

所估爲多，而且是含鐵百分之六十以上的高質礦。此外，甘肅、貴州、廣東等處都有相當的鐵礦藏，海南島的是高質礦。一九五八年曾有報導，因航空測量，在江西新喻一帶無意中發現七十億噸的鐵礦，在河南新安、澠池一帶發現了十五億噸的大鐵藏，氧化鐵百分之五十以上。即使江西和河南的巨礦尚待進一步證實，即使現知中國較大鐵礦是低質礦石，藏量至少已是幾十億噸。美國的鐵，大多是“貧鐵”礦，集中在大湖區最北的密沙比丘陵(Mesabi Range)，其總藏量約十五億噸，但已使美國自一九一三年起，操世界鋼鐵產量牛耳六十年之久。所以從礦源講，中國鋼鐵工業的遠景是很好的。

至于鋼鐵工業發展較慢的原因，主要是製造程序不但複雜，而且各種鋼的合金和最後的鋼材都需要特種技術和設備，因此整個鋼鐵工業需要很大量的投資，中國資金積累的能力很強，但很多工業都需要資金，投資就必須有緩急先後。六十年代的國際情勢使得中國非走完全“自力更生”的路綫不可。欲增鋼産，首先必須投資在開礦的種種機器設備，不僅要增加鐵礦石的生産，同時還要增加煤和石灰石的産量，煤必須煉成焦炭。低質鐵礦又須先煉成較高的質鋼石，冶成鐵之後要再煉成鋼塊，最後才造成種種鋼合金和多種專門鋼材。一九七二年開礦機器設備猛增百分之六十八點二，即反映政府對鋼鐵的政策是從根本入手，與日本近十五年來只重鋼材製造迥然不同。從長期建設的觀點看，中國的鋼鐵政策是正確的、治本的、極富遠見的。

最可喜的是近年勘探得了很大的新油藏。除了新疆、青海、甘肅、四川、哈爾濱西北重要的大慶油田之外，《人民日報》一九七四年一月三日，第一次公開承認“我國是一個石油資源豐富的國家。經歷近十年的勘探，全國已有不少省、市、自治區發現了儲藏豐富的油氣田，有些油氣田已投入開發。我國海域的大陸架也有遠大的前景”。同時，第一次正式報告繼大慶之後第二個成功的勝利大油田。翻檢美國政府新近出版的中國地圖，這油田在山東境內，距黃河口不遠的利津、蒲

台、博興一帶。此外，《人民日報》首次報告：“另一個油田——大港油田，目前一面緊張地進行勘探，一面加快開采。經過幾年的工作，現已證明這裏有很有利的含油地區，油田分布廣，面積大，油層厚，滲透性能好，油井産量高；原油質量也比較好。”一九七四年一月九日的《紐約時報》，根據西方曾經訪問大港油區的人的報告，大港在天津之東，陸上海底都有油，但以沿海近陸處爲多。此同條新聞裏，有由日本外相傳出的消息，年初周總理與他談話中提到去年的原油産量是五千萬噸（據我粗計，已相當一九七一年美國原油産量的十分之一；美國至今是世界産油最多的國家，因爲中東區所産雖多，但國家單位也多）。

西方對此消息，目前疑信參半。我個人在一九七一年秋從中國官方得悉渤海灣大油田的發現的消息。次年夏天，台籍和在台受教育的十位釣魚臺運動愛國青年學人訪華兩月，返美之後，也帶回同樣消息，并且國內某相當高級的官員告訴他們，根據初步估計，中國內陸和沿海已知的油藏，相當世界已知油藏的三分之一；這還不包括尚未勘探的黃海、東海、南海以至國境最南端南沙群島沿岸大陸架可能很富的油藏。以上這些新聞，有的可以認爲是有價值的啓示，有的尚待進一步的證實。

從純研究的立場，我曾向芝加哥大學充任美國某大石油公司總裁的一位校董，請求看他公司研究室精心繪製的世界和中國的氫碳盆地的地圖。氫碳盆地是從地質觀點最可能蘊藏石油和天然氣的地區。反復細看之後，發現中國內陸及沿海的氫碳盆地的面積都較他洲他國同類盆地的面積大；其它最精細的地圖，又發現中國全部沿海的大陸架，深度在二百米以內的地區，面積也較他洲他國爲大。中國至今還沒有大規模用最新技術勘探大陸架的油藏，但照常理推測，我個人深信中國氫碳資源開發的前景是非常遠大的，甚至五年十年之內，中國新油藏的發現可能引起世界能源地理分布的“革命”！石油和天然氣

前景的光明，對我國長期經濟建設是極爲有利的。

此外，去年中國國際貿易的新傾向很值得注意。中國報章期刊雖仍舊只公布與亞非盟邦和東歐社會主義集團的貿易，甚至不大提與西方各國的商務關係。美國報紙和刊物却偶有重要報道。美國《時代》雜志于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濟欄中有一醒目的標題“東西貿易的大躍進”，主要內容是一九七三年中美貿易額由七千萬美元左右猛增十倍以上，超過八萬萬美元，這是美聯邦政府商務部夢想不及的。美國對華出口中有十架最新型的波音噴氣式客機和得克薩斯州休斯敦市愷洛格(Kellogg)公司所簽價值二萬萬美元、建造八個最新型的化肥廠。此外中國正在與美國數家大石油公司洽購最新探油及深海打油井的技術與設備，同年之內，中國還向英國訂購大批開礦機器設備及其它工業品，向日本訂購了幾個肥料和熱電廠，還向法國訂建一完整的石油化工廠。與英、日、法三國的合同總值約達十萬萬美元之巨。《紐約時報》在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對中美化肥商約報告較詳。計劃中三四年內建成的八間化肥廠，每廠每日生產純氨的容量是一千噸（一年 365,000 噸），此外還有價值九千萬美元的合同，另建八個製造純尿素的工廠，每廠每日的尿素生產容量是 1,620 噸（每年 581,330 噸）。以上諸廠建成投產之後，每年共可供給氨和尿素約八百萬噸。（約折成純氮四百五十萬噸。）一般商業習慣，化肥必須滲入大量細砂等物填裝成袋，否則純化肥要燒死農作物。中國一九七二年所產裝袋的化肥大約超過二千萬噸，折合純氮約二百余萬噸，此外還有較少量磷、鉀化肥的生產。與美簽約諸廠三四年後建成，中國化肥肥田的能力要增加兩倍半，再加上一向使用的人畜糞和綠肥，每畝必會大大提高。在不久的將來，農業對中國向上的經濟螺旋，必會發生積極的作用。近年國內特重礦冶設備和化肥，正是反映經濟計劃重根本，講步驟，有遠見，富理性。

文化大革命以來的經濟成就，决不可能不歸功于“自力更生”和

“兩條腿走路”的基本政策。這兩政策之成功，靠全民族的精神覺悟，化剩餘勞力爲建國資本的集體努力。在六十年代的國際情勢下，“自力更生”是民族唯一的生機，逼得中國的科技人員和廣大的群衆不得不從反復實踐之中解决工、農技術上極大部分的困難，使得今日的中國日益接近技術自給自足的地步。“兩條腿走路”的後果是成千成百的中、小型鋼鐵、化肥、水泥等廠在全國各地如雨後春笋般地孳乳生長起來。這不但減輕了對原來幾處大工業基地的要求，減少了國家運輸部門的擔負，減少了都市和鄉村經濟性能的差距，而且促使各地方經濟日趨平衡和自給自足。在核子武器威脅人類生存的時期，中國經濟建設的集中與分散相結合的模式，實在是極富遠見和智慧。在完全“自力更生”的政策之下，經過了六十年代的艱苦奮鬥，中國人民確已建成了初步繁榮的社會主義經濟。

從晚近歷史看，五十年代蘇聯對中國的吝吝嗇嗇（與蘇聯給予印度、古巴、中東各國的援助對比），六十年代對中國的蠻橫狠毒，逼得中國不得不走完全“自力更生”的路綫。但七十年代國內外形勢一片大好，中國的經濟政策，在恪遵“自力更生”的原則下，似乎不妨開始考慮與先進國家建立一定原則和限度以内的經濟科技合作。一九七三年份中國與美、英、法、日等國貿易的激增，是一可喜的現象。這一趨勢如果繼續加强，必可加速中國的工業化。今日的中國是受舉世尊敬的三個最大國家之一，有能力充分保障國家的權利，絕對不會再受二次大戰前式的帝國主義的榨取剝削。中國如與西方先進國家商簽較大規模的商約，條件無疑地是平等互惠的。唯一的問題是中國所提延期付款的辦法能否滿足國內各種重工業較長期的巨大入口需要。近代史上，工業化過程之中，沒有任何國家在資源、資本、技術等方面完全依靠自己的。即以蘇聯而論，目前還極力設法吸引日本的資金和技術以開發西伯利亞西部的油藏。中國如肯與美國相機合作，大規模勘探大陸架的油藏，以大量增產的原油的一部分換取國內鋼鐵等重工業

的加速建成投産，應該對中美兩國都很有利。一定程度的中美經濟合作，不但對“自力更生”有輔助的作用，而且在外交上還可以減少中國北顧之憂。

本節小結：從以上的示例與分析，新中國的經濟成就已甚可觀。照目前國內外情勢推測，今後向上的經濟螺旋的轉動應該日益加快。與經濟發展緩速息息相關的基本問題是人口。我雖對中國人口史及其相關問題研究多年，但身在海外從來無法知道新中國人口政策推行的實況。幸而韓素音大夫根據她多年來的研究和屢度的調查訪問，最近發表了一篇對于中國人口前景極深入的報道和分析。今後中國人口每年的增長率如果能長期降到百分之一或者更少，新中國的經濟建國必可加速完成。

五、結 論

從歷史的尺度看，新中國的革命，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是人類歷史上最徹底的革命。只有徹底的革命才能使中國人民在基層當家作主。惟有人民當家作主，新中國才能憑籍組織和思想教育的力量把全民族的精神、人力、物資、新技術全部動員，“自力更生”地逐步經濟建國。以一個本來一窮二白的國家，在短短的二十四年之內，能克服種種的困難，建設起一個不愧稱爲初步繁榮的社會主義國家，成就不可謂不大。

中國社會改革的種種成就，西方凡無政治偏見的人士都已承認。只是有些囿于資本主義經濟觀念的人，對新中國的經濟前景，不無疑問。誠然，中國目前的經濟成就，如與人類史上最富盛的美國和近十餘年西方盛稱的日本的“經濟的奇迹”相比，確實還有相當差距。可是近年西方及日本累進性的自然環境污染和最近證實的“能源危機”，已

經引起西方較有遠見的人們開始懷疑西方經濟制度的優點，開始指出資本主義百餘年來恣情浪費世界資源的禍害，幷開始批評以無限制的商品消費來刺激"繁榮"的種種弊端。甚至已有不少的人大聲疾呼，西方專重物質享受的人生觀的不健全，應該恢復或追求比較健全的價值觀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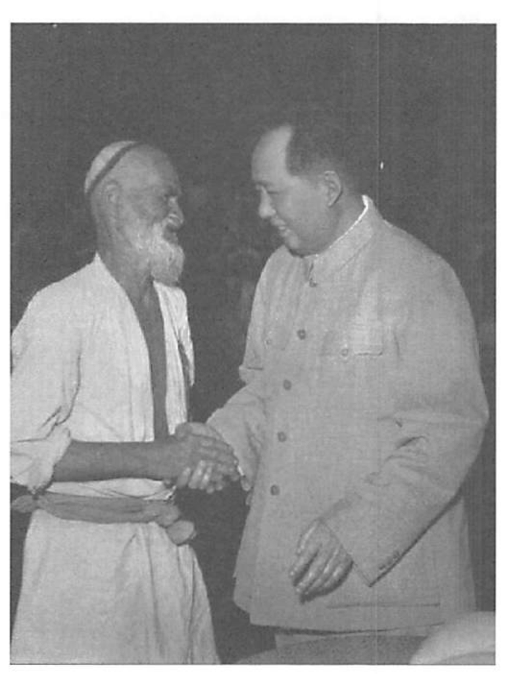
治史者有時有他固執的地方，我雖在北美將近三十年，始終不爲"經濟的奇迹"等說所動。相反地，我總不忘以研究法國舊制度及十九世紀前半美國民主制度聞名的法國史家陶克斐爾(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長期預言。他在百四五十年前已經感覺到將來在世界上鼎足而三的大國應該是美國、俄國和中國。那時美國人口還很少，國土大多沒有開發，俄國雖大，尚很落後，中國仍在傳統文化和制度中昏睡。陶氏的預言决不是根據當時的國際情勢，而是歷史家對較遠的將來的一種直覺。但他的直覺不是沒有道理的，因爲國家强大雖靠很多自然和人爲的因素的配合，自然條件確是基本因素之一。果然幾經戰爭和革命，今日世界三個最主要的國家就是美國、蘇聯和中國，都是廣土衆民資源豐富的"大陸"型的國家。

今日的中國，論軍事，論經濟，論國力，當然還趕不上美國與蘇聯。在本文第三節中，我已推測解釋何以即使新中國的國力趕上或超過美、蘇，也决不會主動地做"超級大國"。但綜合中外古今之後，我深信新中國廣義的建國，包括經濟建國，一定會成功。最重要的理由是新中國有曠古未有的組織能力，此點在本文中已一再解說，此處不必重複。此外，這次民族生死存亡的革命鬥爭的成功，使得一個已有七千年歷史的民族，脫胎換骨，返老還童了。這次革命的成功，是民族性格與靈魂的徹底澄清劑。試想：在我（生于一九一七年）受小、中、大學教育備嘗國耻之苦之時，怎敢相信今生今世會看得到一個"阿Q式"忍辱待斃的民族一變而爲一個艱苦卓絕、坦誠果毅、憂思深遠、勤朴武健的民族？！這才是人類史上最大的奇迹！能造成這種奇迹

的民族，一定會勝利地完成建國工作，并且可以長期防範歷史上一些制度、社會、經濟等等弊端的重演。

最後，根據我對古今中外歷史的瞭解，我有勇氣無條件地指出，人類自有史以來，從來沒有比中國開國的氣魄和規模更加集遠的。我并相信我的論斷大體上能經得起未來歷史的考驗。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八日　芝加哥



1958年6月28日，毛主席在北京親切接見75歲的新疆維吾爾族庫爾班·吐魯木老人家。後來又接見一次。對促進民族團結發揮了積極的影響。無論是蔣介石，還是歷代統治階級，誰會像毛澤東那樣與底層勞動人民有自然而密切的關係。

附錄四　關于《毛澤東的私人醫生回憶錄》一書的公開信　(1995年2月17日)

本書作者董玉振按：該公開信是由紐約華社發起，并刊登在當地的報紙上。附上以作爲本書內容的補充和支持。這封信的發起人和署名人中，大部分是來自臺灣在美國工作的才俊。他們在反共反毛的教育環境下成長生活，却能超越意識形態之爭，從整個民族利益的角度看待毛澤東對中華民族的貢獻。尤其在和一些大陸知識分子的對比中，更能讓人有所省思。臺灣人民經歷了比大陸人民更複雜的心路歷程，尤其是那些隨蔣介石去臺灣的人們，他們被逼離開熟悉的家鄉而來到臺灣這個小島上，不得不面對22 · 8之後島內敏感的省籍對立情緒，家鄉在毛澤東時期又遭遇了三年經濟困難和“文革”，甚至在大陸的親友也在政治運動中因爲他們而受到牽連……；本來他們更有責罵毛澤東的理由，但他們却能超越個人、家庭甚至自己政黨的得失，以更恢弘的氣度看待大陸的歷史和毛澤東的功過。相對來說，有幾個大陸人能以這樣的超然姿態超越個人所遭受的衝擊？如果海峽兩岸的中國人都能以這樣開闊的胸懷相向，海峽兩岸的和平統一將不再是遙遠的夢。今日兩岸的那點爭執，和千萬年積累下來的歷史文化和生命情感的共同特質比起來，實在微不足道。注：部分（）內文字是董玉振所加，以解釋原文中的英文。

去年秋天，曾經擔任毛澤東保健醫生的李志綏，同時出了中文版和英文版的回憶錄。英文版由美國的 Random House 出版，書名“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毛澤東的私生活》）”。中文版由臺灣的時報出版社出版，書名是《毛澤東的私人醫生回憶錄》。這本書的出版引起美國媒體的高度重視，在出版前夕，New York Times（《紐約時報》）頭版報導，US News And World Report（《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周刊刊出全書摘要。一些知名的學者也紛紛發表書評。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Andrew Nathan（黎安友）更是積極參與這本書的出版幷特別爲它寫了前言。

這是一本以醜化毛澤東和毛澤東領導的社會主義爲主旨的書。李以毛的私人醫生的名義，對毛的性生活描繪了一些所謂內幕醜聞。用男女關係的問題，攻擊政治上的對手本是常見的手法。80年代初，中國出現了非毛的潮流，社會上關于毛的私生活議論很多，也起了一些短期的作用，但十年之後，毛澤東又成了廣大中國人民最尊敬的歷史人物。很明顯的，多數中國人民尊敬他，幷不是因爲他是沒有七情六欲的聖人；那些力圖醜化他的人，之所以至今還仇恨他，大約也不是基于他私生活方面的原因。

對歷史人物性生活方面的人身攻擊，一般而言沒有反駁的必要。然而書中那些無中生有的“醜聞”竟成了美國媒體注意的焦點，無論是記者的報道，或黎安友等學者的評論，都津津樂道地轉述李所公布的獨家秘聞；指控毛澤東是荒淫殘酷的封建暴君，共産黨行殘害人民的暴政等等。讀過此書，我們發現中英文本有一些微妙的出入，而可看出這本書對毛澤東進行惡意的人身攻擊和污蔑，已經遠遠超過了表達個人意見正當的範圍。此外，在主流傳媒中爲此書造勢捧場的文字，特別是一些以“中國通”自居的學者和記者借題發揮的種種謬論流傳甚廣，不僅醜化了毛的形象，也侮辱了廣大中國人民。如黎安友的前言，便是一篇嚴重辱華的文字，通篇充斥著美國人文社會科學界流行的對中華民族和中國社會的八股偏見，充分暴露了文化帝國主義者對中國人的輕蔑。對于這樣的論調，應該有中國人迎面作出批駁。站

在二十一世紀的門檻上，中國面臨一個歷史的時刻。李和黎的言論不是孤立偶然的現象，其中反映了一些所有關心民族尊嚴和前途的人都必須面對和思考的問題。

以下是我們對這本書和其中涉及的幾個問題的共同看法。

書中內容究竟有無根據 ？

李志綏醫生對毛澤東的指控和攻擊究竟真實性如何？這一點可以從李醫生的行文和中英文的差异來判斷。這本書以暴露毛私生活的醜聞爲號召，但所謂揭發醜聞，往往只是在回憶所見所聞的中途插上一句對毛的性生活的駭人聽聞的描述，而沒有拿出可資左證的事實材料。

正是這些沒有根據的描述，成了主流媒體熱衷傳播的所謂醜聞。舉例而言：全文在很多地方一再提到毛澤東參加舞會，有很多年輕的文工團員和他共舞，這本是中國民衆知道的事情。叙到這裏，他總會提醒讀者一個他所掌握的獨家內幕，說這些年輕美麗的文工團員，很多與毛有性關係，有些“備感榮耀。引介親姐妹，共沾雨露”，但是象這樣驚人的獨家內幕，任何一個負責任的作者，都會向讀者作具體的事實說明，因爲事關毛的形象及女當事人的名譽，也涉及廣大讀者的關心和感情。而李志綏醫生却不交代：他究竟有什麽根據？在衆多傳聞之中，他親眼看到親身經歷的是哪一部分？

李醫生在行文之中，凡是他親自見聞的與毛有關的，即便平凡無奇的小事，他都詳細的記述，而且往往細得讓人難以置信。此外書中還有揭發其它人男女關係的內幕，如李銀橋、鄧小平等，他都講了細節，爲什麽全書的要害，最驚人的關于毛的性生活的內幕，他語焉不詳，一筆帶過？因爲他沒有掌握任何事實的根據。

中英文本對照暴露了其中的弄虛做假。

李志綏醫生的回憶錄，出了中英文兩個版本。仔細對照中文本和英文本，我們發現了一些重要的玄機。首先看到的是中英文版本大體一致，但恰恰在所有最引人注意的有關毛澤東性生活，也就是全書要害的地方，中英文本有重大的出入。且舉幾個例子。

在媒體中很引起興趣的一個“醜聞”是毛患有性病，并傳給他的女友。實際上原書不論中文本、英文本都不敢直接說毛曾患性病。英文本提到毛有性病的只有一處：“性生活如此之多，性病實際上是不可免的”（英文本 P.363），接下去就叙述毛染上了滴蟲病而非任何性病傳染給他不計其數的女友。在中文本裏相應的地方（中文本第349 頁）却沒有影射毛有性病的那一句話。中文本任何其它地方也都沒有叙述或影射毛有性病的文字。

可是，黎安友的前言却偷天換日地說：“……性病在毛的女友中蔓延”。對于這句話，中譯本改成了“滴蟲病在毛的女友中蔓延”。爲甚麼李志綏要改黎安友的前言，在中文本裏把性病兩個字删掉。道理很簡單，滴蟲病是由寄生蟲引起，很容易通過衣物傳染，而不是什麼性病。

如果毛有性病，李志綏醫生一定能說得出病名。李志綏不敢公然造假說毛澤東有性病，于是不惜擅改黎安友所撰前言。至于英文本前言中所謂毛有性病的醜聞，完全是爲了在英文媒體造勢的需要捏造出來的。

書中說毛行道家采陰補陽的房中術，中文本是這麼說的：“毛在67 歲那時成爲道家的實踐者，性的功用是延年益壽，而不單是享受”（中文本第 343 頁）。英文本却在這一句之後，加了一句：“他最高興和最滿足的是和幾個女人同時共睡一床，他鼓勵他的床伴，介紹其它的女人來集體性交，說是可以健身益壽。”（英文本 P.358），英文本中講到集體性交的還有一處：“就在這文革高潮時，毛有時和三個四個甚至五個女人同眠”。然而就此一句，沒有任何解說，怎麼樣

看到的，誰看到的，完全不提。中文本則全書從頭到尾沒有集體性交的説法，原因很明顯：中國人一眼就會看出個中破綻。而李在 BBC 電視節目訪問中是這樣説的：中國的農民沒有其它的娛樂，（性）是唯一的消遣。姑不論中國農民究竟如何，這樣的説法首先暴露了李志綏本人是如何的心態。

這是本什麼樣的書?

由中英文對照看，這是世界出版史上少見的書。英文版列出原著人是李志綏，英譯者戴鴻超；中文版本的封面列出的原著人是李志綏，英譯戴鴻超，中譯李志綏，然而沒有説明哪一個文本是原著。如果原著是英文，爲何要有英譯本？如果原著是中文，爲何又有中譯本？何況中英文本之間有很多的出入。我們認爲，這本書名爲個人的回憶錄，實際上可能幷不如此單純。英文本在前言中指出黎安友從頭就參加了本書的出版，另外還有專人負責參考核對已出版的有關毛的著作，其中一個外國人參與了英文本的寫作，另一個中國人參與了中英文的加工。在中文本的謝言裏却不提這個內情，也忘了感謝那個中國人的貢獻。從英文本與中文本不同之處可以想見，有人根據中文材料改動加工，上文舉了幾個所謂“醜聞”的例子，中文本沒有，却硬編造出來塞在英文本裏。除此之外，英文本（P314—315）有一條與毛的私生活無關的醜聞：鄧小平在 59 年廬山會議期間，讓一位護士懷孕，後來强迫打胎，中文本把這一段也删掉了。

書中關于周恩來鄧穎超的描述沒有任何值得注意的內幕，但行文之間，對二人却盡是人身攻擊的用詞，罵周是毛的奴隸，對毛唯命是從，是奴性十足的忠犬，一付老門房的模樣，周的夫人鄧穎超極端自私自利，邀寵固位，是泥鰍樣的人物。

聽其言而知其人。

李志綏在媒體中被包裝成一個誠實的人，說他的的回憶錄是誠實的記錄，但從李志綏的言行看起來，實在與誠實相去太遠。李志綏在毛身邊二十多年，得到毛的信任，更是汪東興的親信，參與了上層的派系機密，就連絕密的逮捕“四人幫”的行動，他也參與。毛去世以後，事業受到了些挫折，失去了院長的高位，之後來到美國。毛生前他跟著毛澤東和共產黨走，被視爲毛澤東思想和共産主義的忠實信徒，到了美國，又能得到反共學者的寵信，靠醜化毛澤東和共産黨來謀生致富。

此書有兩個版本，兩種內容，處處玩弄手脚。這樣的作者分明是欺世盜名的騙子，怎麼能說是誠實可信的見證人呢？當然，政治信仰是個人的自由，任何人也都有覺今是而昨非的權利。但是做人要有基本的人格，作爲中國人更要顧惜民族的尊嚴。李志綏爲了私利不顧醫護人員的基本信條，在書中公開有關毛的生理健康的種種材料。他把因工作關係而獲得的國家機密當作可以出賣的商品；他夥同帝國主義反華的人，捏造事實，對毛澤東進行污蔑和人身攻擊。不論是根據中國還是外國社會的道德價值和法律的標準，這樣的言行都是正直的人所不齒的。

黎安友把李志綏污蔑捏造的回憶錄吹捧成是記錄史實的著作。說是比照其它著作可以證實書中的許多細節，但這本書原本就是參考對照其它的著作寫成的。英文的謝詞中已經透露。與其它的材料符合，又能證明什麼，黎安友的說法，實在是信口欺人之談。他把李志綏有關所謂“醜聞”的議論說成是具有獨特的歷史價值。我們認爲這是違背學術基本原則的做法。

李和黎的言論不僅是攻擊毛澤東，也是對廣大中國人民的莫大侮辱。他們把毛澤東時期的中國全盤否定，把社會主義說成是一項災難。解放後的中國比國民黨時期不進反退。按照他們的邏輯，難免得到一個結論：生活在共産暴政之下的絕大多數中國人民，或者是敢怒

而不敢言，或者是愚昧無知。更有甚者，黎先生的前言充分暴露了歐洲中心主義者的偏見和對中國人的輕蔑。他惡毒地辱罵毛澤東和他身邊的人："女人如上菜般輪番貢入"。全國的黨軍政治處徵召大批少女獻作他的床伴；同時却吹捧李志綏的"外國氣質和西方的儀態"，在"板著臉的"中國人間特別突出。在他的眼中，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是愚昧無知的農民，只有少數象李這樣有西方訓練和外國氣質的中國人能和他一起把中國人民帶向現代化的前途。黎的周圍環繞了一批所謂"民運"精英致力于他所策劃的"憲法項目"。在他的眼裏，億萬中國人民，努力建設自己的國家，但只有他黎安友才能爲中國人民的事業做歷史的裁決。他根據一個醫生的"醜聞"就可以全盤否定中國人民的道路。

另一方面，文化帝國主義者也需要李志綏這樣的中國人，去代傳西方的福音。可憂的是在中國象李志綏這樣的人還不止一個兩個。李志綏自稱要爲歷史做證人，揭發中國共産黨的暴政，這樣的歷史證言，竟然先靠人捉刀，用英文發表，然後出口轉內銷，翻譯成中文。中國人要詆毀自己中國人所走的道路，竟然要在外國電視上來進行。美國的主要媒體，象 CNN，紐約時報，和黎安友這樣的學者，都變成了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治歷史道德領域的裁判官。

毛澤東是中國人的光榮，毛澤東是中國和世界歷史上一位偉大的人物，廣大的中國人民，因爲中國出了一個毛澤東這樣的人而感到光榮。人們之所以尊敬他，懷念他，是因爲他有一個崇高的政治理想，并爲了實現這個理想奮鬥終身。在奮鬥的過程中表現了令人折服的勇氣、魄力和無私的品格。更重要的，他讓廣大人民看到了光明和希望：一個公正平等的社會完全是可以實現的。而今天有人所以還要污蔑他，攻擊他，正因爲那麼多的中國人仍然尊敬他，懷念他，嚮往他所指出的道路。

對政治人物進行嚴肅的評價，應該問的是他在公共領域說了什麼

做了什麽，而不是用卑鄙的眼光去猜測他的內心深處在想什麽，關起門來在做什麽。今天一些反毛的人再次想用性關係的問題來攻擊毛澤東，但作爲一個歷史的人物，恰恰是在婦女解放的領域裏面，毛澤東的理論和實踐，在解放後的中國帶來了全世界矚目的成就。讓人們看到了性別歧視的制度性的根源是可以被清除的，男尊女卑的觀念是可以被打破的。蓄妾、娼妓等歷史悠久的社會現象從新中國的土地上消失了。這樣的成就不僅與舊的社會不可同日而語，與世界各國相比較，也是足以讓中國人民感到驕傲的。

黎安友說這本書是至今爲止最能暴露毛澤東真實面目的書，我們認爲這本書所暴露的不是毛澤東的真面目，反而恰恰是李志綏和黎安友墮落和下作的真實面目。

無可否認的，百年來，備受强權欺淩、宰割的一個弱國，在半個世紀多一點的時間裏，變成了世界上舉足輕重的强國。這完全是因爲在毛澤東和共産黨的領導下，中國民衆之中激發了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熱情，走出了一條帝國主義者所不願見到的道路，也取得了黎安友的前輩的文化帝國主義者所不曾夢想到的成績。

中國正面臨了極其光明的契機，但前途道路上也不免險惡的風浪。之所以光明，主要是因爲在毛澤東領導之下，走了獨立自主的道路，過去的血汗，打下了民族振興的基礎，之所以有危險，就在于帝國主義者不願見到中國的興起，而中國人裏面還有太多人甘爲他們的文化先鋒，在中國民衆之中散布文化帝國主義者的論調，把民族主義說成是義和拳思想，把社會主義說成是灾難。黎安友李志綏這一批人今天所以如此囂張，無非是他們認爲中國人民和政府軟弱可欺，對于這樣的侮辱和挑釁，大約總是處之以沉默和姑息。行動才能禦侮，團結才有力量。對于這樣的行爲必須迎頭痛擊。否則，媚外求榮的歪風將越吹越甚，文化帝國主義的盛氣更將不可一世。

公開信署名者：

花俊雄，紐約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巫正夫；李騰芳博士；譚南平；王中平，洛杉磯華夏政略研究會；李榮武；王津平，統一聯盟秘書長；韓東平；龔忠武博士；黃嘉平；董叙霖博士；王春生，亞太婦女小組；葉先揚，加州大學教授；翁啓元博士，華盛頓戰略研究會；楊重光；王曉波，海峽評論社長，世界新聞大學教授；許建康；程君複，天普大學教授；黃哲操，紐約市立大學教授；李和；桑湘明；王麗清，亞美藝術基金會執行理事；徐守騰；張聖輝博士；楊高雄博士；景埃埃；王顏鑄，霍華大學教授；居乃虔；林長杰；蘇慶黎；趙瑨；董慶圓博士；陳映真，人間雜志發行人；張世雄，中華兩岸文經貿促會秘書長；劉生余博士；林國炯博士；朱立創；毛鑄倫，統一聯盟主席，中興大學教授；姜思章，統一聯盟執委；林碧芬，統一聯盟執委；梁電敏；林書揚，政治受難會創立會長；林麗峰，政治受難會現任會長；陳欽賜，統一聯盟執委，中醫學院教授；唐志遠，教師人權促進會會長，統一聯盟執委；廖天欣，遠望雜志社長；張敏生，統一聯盟經委會召集人；汪立峽，勞動党中常委，中櫪服務中心主任；張健行博士；印鐵林；潘家牛，亞美文化協會；闕文亮；許登源；孫大成，紐約大學機械系教授；戴新生，中國科學院數研所研究員；雁湫博士；淩志；朱衆惠；蕭文鸞；阮建平；林梅芝；繆思丹；遲中博士；金寶瑜，密西根社區學院教授；顧維寬博士；沈頌祺博士；周本初博士；謝宗海博士（部份名單）。

參考文獻

作者按：在本書的寫作過程中，大量使用了筆者長期閱讀的記憶和筆記，很多內容已難于憶起詳細出處。有些內容雖記得來自哪本書，但出版社和出版日期難于確定。多數沒有記錄具體的頁碼。也有些內容來自網上的資料（只有本人判斷這些網上資料具有可信度，才予以采納），但不知作者姓名，甚至有些網址出處也沒能記錄下來。故此處參考文獻難于詳列，甚憾！**第二版修改時，新增加的參考文獻的大部分則直接在正文下以頁脚注明。**

1. 《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1998）》，中國統計出版社，1998 年 11 月。
2. 《中國統計年鑒 2000》，中國統計出版社。
3. 《鄧小平文選》1 至 3 卷。
4. Maurice Meisner, *Mao's China And After—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1999, Division Of Simon & Schuster Inc. New York.
5.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與事件回顧》，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 年。
6. 淩志軍，《中國經濟改革備忘錄》（1989-1997），東方出版中心，1998 年。
7. 發展研究所綜合課題組，《改革面臨制度創新》，上海三聯書店，1988 年。
8. 王夢奎主編，《中國經濟改革的回顧與前瞻》（1979-2020），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9 年。
9. 仲大軍，《中國社會內部的巨大衝突——戶籍分別》，黎鳴主編

《中國的危機》，上册，改革出版社，1998 年。

10. 李茂嵐編，《中國農民負擔研究》，山西經濟出版社，1996 年。
11. 謝少波，《弗・杰姆遜的毛澤東情結》，萬維讀者論壇 - www.creaders.org，1999 年 12 月 09 日。
12. 《毛澤東周恩來尼克森基辛格密談記錄》，http://www.chinatime.com.tw，1999 年 1 月 10 日。
13. 愛德加・斯諾，《紅星照耀中國》（又名《西行漫記》）。
14. 毛澤東，《論持久戰》。
15. 劉伯承，《我們在太行山上》，《星火燎原》（選編之一），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士出版社，1977 年。
16. 呂正操，《冀中平原游擊戰爭》（一九四〇年三月四日），呂正操在十八集團軍總直屬隊幹部會上的報告，最初發表于《解放》雜志第１１０期。收錄于《晋察冀抗日根據地史料選編》，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
17. 彭德懷，《我們怎樣堅持了華北六年的抗戰》，《解放日報》1943 年 7 月 3 日。
18. 朱宗震，汪朝光，《解放戰爭史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年 3 月。
19. 《近代中國報道（1839-1919）》，首都師大出版社，P823。
20. Raymond Lotta，When the People Had Power:The Economic Miracles of Maoist China，http://www.mcs.net/~rwor。1999.10。
21. 榮晨等，《評說毛澤東》，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 年 10 月。
22. 劉秉勛，《毛澤東决定解散農村食堂的來由》，《百年潮》1997 年第六期。
23. 新加坡《聯合早報》千禧年特別報道《歷史大現場》，玲子傳媒，2001 年 3 月。

24. 二十世紀中國學術文化隨筆大系，《杜維明學術文化隨筆》，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 年 1 月。
25. 《毛澤東選集》1 至 4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
26. 《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决議》，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國共産黨第十一届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决議文件，摘自人民網 www.peopledaily.com.cn。
27. 何炳棣，《從歷史的尺度看新中國的特色與成就》，原載《七〇年代》1974 年 3 月號。
28. 譚宇權，《梁漱溟學説評論》，臺灣文津出版社，1999 年 8 月。
29. 余秋雨，《行者無疆》，華藝出版社，2001 年 10 月。
30. 余秋雨，《山居筆記》，文匯出版社，1998 年 9 月。
31. 徐焰，吳少京，《抗美援朝戰爭畫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 年 7 月。
32. 雙石，《劍吼西風——1950～1953：中國軍隊出兵援朝》，http://twostones.yeah.net
33. 李敏，《我的父親毛澤東》，遼寧人民出版社，2000 年 10 月。
34. Rius & Friends，《毛澤東思想淺介》，香港博益出版集團，2001 年 10 月。
35. 王邵軍，《聖者人生·梁漱溟》，山東畫報出版社，1998 年 10 月。
36. 三峽探索網 http://www.threegorgesprobe.org/gb/index.cfm
37. 何清漣，《現代化的陷阱——當代中國的經濟社會問題》，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 年版。
38. 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4 年。
39. 《中華人民共和國資料手册（1949-1999）》，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40. 《世紀的輝煌——中華人民共和國全錄》，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9 年 8 月。
41. 中華文明網 http://www.encyna.com/phpnuke/html/
42. 王建朗，《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歷程》，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年 4 月。
43. 吳冷西，《憶毛主席——我親身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段》，新華出版社，1995 年 2 月。
44. 李捷，《毛澤東與新中國的內政外交》，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 年 12 月。
45. 孔慶普，《城：我與北京的八十年》，東方出版社，2016 年 5 月。
46. 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上下册），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年 12 月。
47. 戚本禹，《戚本禹回憶錄》（簡體全本），香港中國文革歷史出版社，2016 年 4 月。
48. 胡治安，《統戰秘辛——我所認識的民主人士》，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0 年 2 月。



後　記

當您讀完該書，您的感覺是什麼呢？是撥雲霧而見天日的驚喜，超出意料之外的驚訝，還是令您難以容忍的憤怒？筆者有信心地認爲，您很難說該書是老生常談。如果您感到憤怒，繼續堅持您對毛澤東及其時代的固有否定看法，這當然是您的自由，但如果能指出該書在立論、引證、推理分析上的明顯漏洞，筆者隨時準備洗耳恭聽。但當您在咒罵毛澤東的時候，如果不考慮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城市底層人民、爲國家出生入死的解放軍指戰員、受毛澤東感召下無私奉獻的前輩們的感受，那您未免太自私了。毛澤東的智慧如同大樹，我們這些後生們的閱歷和智慧也許像爬在樹上的螞蟻，使得我們無法輕易閱盡毛澤東智慧的完整光譜。較高的資質也曾讓筆者不知天高地厚地自負過，但在認識毛澤東的過程中才發現自己是何等渺小。你在農村生活過幾年？是否瞭解國營企業？對經濟、社會、歷史、工業發展規律、國際政治、社會保障、教育和學術、軍事、信仰和文化等你是否稍微用心地探討過？如果你對這些沒有興趣，或缺乏起碼的認識和閱歷，也就是說你根本不瞭解中國的國情，那麽，你也就根本不具備批判毛澤東的資格，你只能依靠一些帶傾向性的文章或歷史片段，去作出魯莽的評判，并必然得出片面的結論。

對那些由于毛澤東時代的錯誤政策而受冤屈的人們，請相信，本書并不意味對您個人和家庭痛苦經歷的漠視。但如果您無法從自己的家庭悲情中解脫，要讓您接受該書的內容，顯然是强人所難。但如果該書能多少幫您對歷史釋懷，無疑是筆者的莫大榮幸。

該書寫作初期考慮的讀者群以來自大陸的讀者爲主，因此，其中的一些用語習慣和政治取向肯定有不少令來自臺灣讀者感到不適。書

中一些帶有挖苦、批判和諷刺的文字風格，也可能會令一些讀者不習慣。如果這本書能令臺灣讀者對毛澤東少一點反感，對大陸過去的歷史多一些認識，必將令筆者欣慰非常。

“中國女性站起來了！可以站得更優美”一節，是令筆者極爲矛盾的一段文字，甚至在是否應該保留這節內容方面也徘徊良久，畢竟，沒有哪個作者願意去得罪讀者，尤其是得罪我們可愛的女性們。如果女性讀者對此節感到不適，筆者只能深感遺憾。但因這一話題涉及到中國未來家庭生活的質量，而使得筆者不忍忽略。得罪中國女性的這些直率話，就讓筆者一人來承擔責任吧，這類出力不討好的探討必須得有人去做。它肯定不是最後真理，只希望能喚起中國女性對女權運動和自身定位的再思考。

在該書出版之時，中共中央第四代領導班子已經產生，新的領導班子也表現出不同以往的清新形象，其中的個別文字可能已沒有與時俱進，但出版時就不改了。歷史評價的公允與否，并非短期所能判別的。只希望在新一屆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任滿之時，筆者能情不自禁地爲他們鼓掌。現在爲他們鼓掌還稍微早了些。希望他們身上能少一些中國公務員隊伍裏彌漫的俗氣和劣質政治文化，少一分懦弱和自私，多一分自知、膽略、遠見和責任心，爲歷史做好接續，爲後代做好鋪墊。只需要考慮一下：在個人智慧、學識、眼光、道德、能力和膽略方面，您比毛澤東若何？他尚且會犯嚴重的錯誤，您不拿出十二分的努力，百分之百對國家和事業的忠誠，清教徒式的無私，又怎能肩負得起人民的重托？毛澤東離開政治舞臺後，中國人民照樣生活，離開了您國家同樣運轉，除非您以巨大的貢獻和德能向人民表明：這個時代，舍我其誰？

但願本書的歷史評論，能成爲一面鏡子，促使新一代黨、政、軍領導人對自己的政治人生慎之、思之、鑒之。

2003年2月



作者董玉振簡介：

1965 年生于山東曹縣孫老家鎮，工學博士（後），當代雜家，出版人，戰略諮詢專家。曾就讀于上海機械學院、哈爾濱工業大學、清華大學。1996 年南下南洋理工大學做博士後。之後加入半導體行業。2002 年底復建新加坡南洋出版社，以出版本書第一版和他主編的全球第一套雙版本合輯《金瓶梅》。2011 年跨行業加入城市規劃與諮詢行業，歷任新加坡某城市規劃顧問公司副總規劃師和副總裁、新加坡國有裕廊顧問有限公司副總裁等，以其跨越多個理工科、社科與人文领域的罕見獨特優勢，在該領域如魚得水，成爲戰略諮詢與產業研究方面的綜合性專家。

董玉振博士至少在八個領域有高學歷、專著、論文（包括頂級刊物專家稿）、項目實際操作經驗等。具體包括：

一、理工科領域涉足多個專業：在機械工程、電子與計算機控制系統設計、康復工程有學歷和實操經驗。擁有工學博士（後）學位。在工業界曾先後任職機械工程師、電子工程師、晶圓處理工藝和裝備工程師、集成電路製造裝備工程師等。



二、企業管理學：有專著《如何分析直銷公司》，是全球第一本解析直銷公司運作機理的著作，填補學術空白。是新加坡直銷史上唯一被公共機構邀請做公開直銷演講的學者，以協助民衆識別欺詐性傳銷。在直銷專業刊物《中國直銷》發表專家約稿《中國直銷公司兵敗新加坡探因》。

三、古典文學：古典文學名著《金瓶梅》研究已成顯學。關于《金瓶梅》版本關係的研究是學術方向之一。董玉振從“崇禎本”眉批中發現明確證據，證明“崇禎本”是《金瓶梅》的祖本，挑戰了學界普遍認識。他主編出版了全球第一套雙版本合輯《金瓶梅》，對《金瓶梅》普及閱讀做出貢獻。他關于版本的研究成果首見于他爲此書第一版所寫的序（2003 年）。在第十二屆國際《金瓶梅》學術研討會上，發表了《“崇禎本”眉批揭示其是<金瓶梅>祖本的事實》《對普及<金瓶梅>閱讀的體會與建

議》。在第十三屆研討會上發表《“崇禎本”評點者刻意杜撰第三十回眉批的可能性分析》《就崇禎本第四回一個眉批和對應正文內容的比較分析》（這兩篇在論文集被合幷成一篇）

四、珠算傳承：他修補注釋出版《曹縣董家祖傳·經典珠算術集萃》，成爲唯一有注釋的古代珠算書籍，對珠算文化傳承做出貢獻。有些古老打法如古代田畝計算口訣，他是當今極少數會打者。《珠算與珠心算》雜志刊發了董玉振所寫的該書介紹文章《家族百年傳薪 成就珠算經典傳奇》。

五、社會科學之新中國歷史研究 涉及多領域的專著《巨人的背影》和早期網絡文章《爲毛澤東辯護——兼談鄧小平的歷史責任和本來面目》（1998 年），傳播甚廣。在該文出現後，中國學術界才開始大量出現正面看待毛澤東時代各方面貢獻的著作。該網文和書中的內容被國內學術界大量引用，催生了民間和學術界對毛澤東時代全方位的正面認識。網上流傳甚廣的《反思毛澤東時代的經濟成就》《建國以來中國經濟發展的艱難歷程》《巨人的背影——客觀認識毛澤東時代的經濟成就》《文革十年中國人在幹什麽？》《鄧小平的歷史責任和本來面目》等都是被讀者從該文或該書中的章節單獨成篇的文章。曾有網站稱董玉振的上述文章是開啓毛澤東時代再認識最早最全面和最具影響力的文章。

六、經濟學：本書中大量涉及經濟學領域的內容，包括上述單獨成篇的關于新中國建設成就的文章。這些文章被經濟學家廣泛引用。2015 年，中國最具影響力的財經類雜志《財經》發表了董玉振所寫的專家稿《鋼鐵業病態布局之禍》。

七、臺灣問題研究：所寫臺灣系列文《臺灣是如何失去大陸的》被廣泛傳播。應臺灣朋友的邀請深度參與臺灣大選，所寫宣傳文甚至被洪秀柱支持者製作成宣傳貼，準確預測朱立倫換柱的陰謀。在《聯合早報》網頁版發表文章《台海：中華民族的天賜良機和對策（2004 年 3 月 8 日）》

八、在新加坡《聯合早報》言論版頭條發表文章多篇，涵蓋財經、政治和新加坡城市規劃。

九、網絡熱點文章：過千萬閱讀人次的文章包括上述毛澤東有關的系列文、《福島核輻射陰影下中國人冒死游日本》（該文是對抗戰勝利 70 周年獻禮，阻斷了安倍經濟學導致的中國人日本游的升溫趨勢）、《畢福劍事件暴露國人價值混亂與失序》、《從曾蔭權判刑和梁錦松被迫辭職時內地人士反應看中國現代化的差距》等。

十、出版人：在盜版猖獗和海外中文書閱讀風氣日減情況下，他以情懷驅動，靠諮詢業收入補貼，爲南洋出版社設定了高品質出版物定位目標。出版了全球第一套希特勒著《我的奮鬥》全譯中文本，國家絲路基金贊助英文出版項目 China’s Road，該社已成爲中文出版界主要的《金瓶梅》資料出版機構，除他主編的雙版本合輯排印本《金瓶梅》，該社即將推出的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新刻金瓶梅詞話》（介休本）灰度影印本，是該書首次以盡可能接近原貌面世，在金學界引起轟動。加上董玉振所著《巨人的背影》《如何分析直銷公司》《曹縣董家祖傳·經典珠算術集萃》的影響力，南洋出版社已經成爲南洋一帶享有盛譽的綜合性出版機構。

十一、社会認可：董玉振以其在文化和出版等方面的貢獻，得到社會各界的認可與尊重，《聯合早報》、《南洋商報》都曾對他做進行報道。入選《新加坡華文作家傳略》。

十二、**戰略諮詢與城市規劃**：主導和參與了多個國家級高新區戰略定位與規劃、多個文旅園區策劃、生態城研究、高端產業新城戰略定位研究、物流業規劃（包括中新（重慶）互聯互通物流規劃項目）、多個一帶一路項目諮詢等，獲得客戶的一致好評。董玉振獨特的知識結構和研究能力，構成了他在戰略諮詢領域的獨到優勢，使得他能跨越這麼多細分領域，并都能做出令客戶滿意的成果。現爲獨立諮詢師，從事城市與産業園區規劃與産業定位、商業地産策劃（如綜合體）、文旅項目策劃等，以及政治經濟綜合課題研究（比如：共青團新時代發展戰略研究策劃）。

戰略研究不是一門大學專業，戰略型人才是長期個人積累、思考、閱歷和素質的綜合，與學歷和工作背景無必然聯繫。不要指望到黃埔軍校和西點軍校去找毛澤東式的戰略家。戰略性人才可遇而不可求！董玉振博士是您值得信賴的合作伙伴。

新加坡南洋出版社出版物列表：（可見官網 nanyang.ws）

書名	作者	出版年份
董玉振著作		
巨人的背影——爲毛澤東辯護及當代中國問題省思	董玉振 著	2003 年第一版，平裝 2018 年第二版，精裝
如何分析直銷公司	董玉振 著	2011 年 3 月
曹縣董家祖傳·經典珠算術集萃（古籍綫裝、宣紙、書函）	董鳳林及先祖撰，董玉振 釋注修編	2016 年 7 月
《金瓶梅》系列		
完整版《金瓶梅》（上下册），（全球唯一簡體全版、雙版本合輯、帶 200 圖和評點，無删節）	蘭陵笑笑生 著 董玉振 主編幷寫序	2003 年第一版，平裝 2006 年第二版，平、精裝 2016 年第三版，平、精裝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新刻金瓶梅詞話》（介休本）灰度影印本（古法宣紙綫裝，21 本，四函）	蘭陵笑笑生 著 董玉振 主編	2018 年 10 月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新刻金瓶梅詞話》（介休本）灰度影印本（硬皮精裝，四册）	蘭陵笑笑生 著 董玉振 主編	2018 年 12 月
彭城張竹坡批評金瓶梅第一奇書（古法宣紙綫裝，26 册，四函）	蘭陵笑笑生 著	2017 年 9 月
金瓶梅詞話（大安本影印）(硬皮精裝，五册）	蘭陵笑笑生 著	2017 年 10 月
新鐫綉像批評原本金瓶梅（内阁文库本），（古法宣紙綫裝二函，22 册））	蘭陵笑笑生 著	2017 年 12 月
新鐫綉像批評原本金瓶梅（内阁文库本），（硬皮精裝）	蘭陵笑笑生 著	2018 年 9 月
其它中文書籍		
我的奮鬥（全球第一本從德文原著翻譯的全譯本）	阿道夫·希特勒 著，王誠 譯	2016 年 11 月
加法人生	徐惠 著	2011 年 4 月
理想國之探索	史亮 著	2017 年 12 月